



#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英」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第二卷

大跃进 1958—1960

WEN HUA DA GE MING DE QI YUAN

#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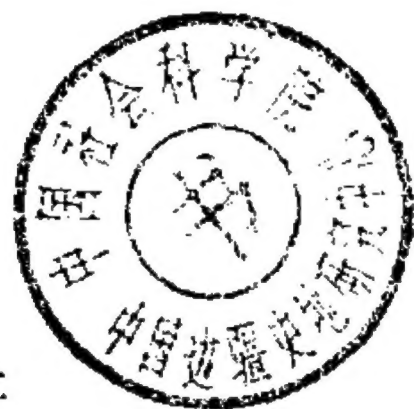
## 第二卷 大跃进

1958—1960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著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译组 译

戴汉笠 校

河北人民出版社



0503317



# 前言

我计划中写的研究文化大革命起源三卷书中，第二卷在第一卷完成后很久才出版。或许值得重申一下我的目的：考察1956年—1965年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对于中国领导人思想、行动的影响以及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以便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决定推翻并重建他曾花了那么多精力建立起来的政权。

对我来说，拖延一直是一种烦恼，但也是幸运的。1974年—1979年，我当下院议员的5年中，曾设法继续一些研究和写作。这部分地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并且一度使用了我在查塔姆大楼的大学旧办公室。但是，政治活动的紧迫实际上不允许我有闲情逸致对中国20年的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思索。另一方面，在议会的几年使我有了一连串政治问题和政治过程的亲身经历：领导的作用；领袖和同事的

关系；政治家与职业文官的相互影响；政策的酝酿制定到实施的曲折道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党的活动分子对于首都政治家的重要影响；当事情涉及紧迫的国家利益时政治家的行为；良心和现实、个人信念和党的团结、自制和雄心之间的不断冲突；还有时机、偶发事件和运气常起到的关键作用。英国不是中国，国会不是全国人大，英国工党不是中国共产党，20世纪70年代的低调英国社会主义远非50年代中国大跃进时代的空想共产主义。由于我自己也从事政治，我希望，我能以实践中掌握的更加深远的眼光和理解力，来研究北京政治家的行动。

拖延写作这本书的第二个好处是，在我离开议会前几个月，即1979年初，许多新材料开始由中国涌来。这极大地丰富了我对大跃进的认识。<sup>\*</sup>

1980年初，在利弗霍姆信托组织的慷慨资助下，我开始全力投入新材料的研究工作。这个信托组织的主任罗纳德·特里斯为我安排了款项，允许我利用机会到国外从事研究工作。

在富布赖特旅行奖金的资助下，我移居美国首都华盛顿，以研究员的身份在伍德罗·威尔森国际研究中心的令人振奋的气氛中度过了一学年(1980—1981)。与詹姆斯·比灵顿、副主任普鲁斯·吉佛德以及他们的友好而能干的同伴在中午、下午以及晚上的交谈与讨论，给人以极大的知识享受。而当我需要着手写书时，这些口头交流便不能继续进行，他们也能谅解。在那儿，我写完了本书的最后一章。威尔森中心的另一些人也给过我帮助，我必须特别提出东亚规划基金的首任干事哈里·哈丁和他的助手莉莎·华尔森；泽德里克·戴维和他的全体职员是我在华盛顿地区查找图书资料的密切纽带；艾洛斯·邓恩教会我使用一种文字信息处理机，并且照看机器的运转情况；弗朗西斯·亨特在必要的时候坐在门外以阻止外界的干扰。我的研究助理邦尼·格拉斯和<sup>\*</sup>参见“关于书目的说明”。

杰弗里·王花费了很多自己的研究时间考查和回报了大量资料。我的第三卷书也将得益于他们的工作。

我将本书第10章的草稿作为威尔森中心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从与会主要讨论者的深刻评论获得了极大的收益。他们是：道克·巴尼特、西里尔·贝克、亨利·布拉德休、菲利普·布里汉姆、马里克·麦斯勒、莱曼·米勒、查尔斯·纽哈斯和姚伟；以及哈里·哈丁、汤姆斯·罗宾逊。此外，汤姆·伯恩斯坦、朱利·道姆斯、菲利普·艾姆森、汤姆·费逊、麦勒·戈德曼以及戴维·贝克曼也给我许多有益的启示。约翰·费正清曾要求我提交本书第一卷作博士论文，他阅读了本书的许多章节，一直给我源源不断的鼓励和帮助。

我在华盛顿的时候，王启（音译）引导我浏览了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藏书；菲利普·艾姆森借给我许多资料，节省了我许多时间；在P.K. 于主持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来伦·周和库克森·鲁克殷勤地向我提供了他们最新的出版物，其中包括令人心碎而有价值的、直到那时尚未公开的8本红卫兵资料集。我还得益于与下列一些人的交谈：罗伯特·巴兰德生、罗伯特·马歇尔·弗尔德、查尔斯·弗里曼、詹姆斯·格雷厄姆、卡罗尔·哈姆林、谢春牡、保罗·克赖斯拜格、尼古拉斯·拉德、肯尼思·伯梭、雷·奥林斯、罗伯特·奥克斯耐姆、卢西恩·派伊、罗伯特·萨特和理查德·维克。迈克尔·奥克森布格对最初写的几章初稿提出过中肯的批评，他是一位经常为本书提供精辟见解和建议的人。

回到英国后，我根据新的材料修改了前面的章节。巴兹尔·克拉克主持的查塔姆大楼的中国小组与我详细讨论了一些观点。沃纳·克拉特曾对前几章作过评论，现在，他以他惯有的严密作风查看了后面的大部分章节；早在大跃进年代，那时我正在为伦敦的《每日电讯》编年史，克拉特的忠告就曾使我从未相信那些被夸大了的产量。并且，在那几年，亚非研究院的斯图亚特·斯科



内姆、肯尼思·沃克和克里斯托弗·豪通过讨论和他们所写的文章帮助我理解了大跃进这一时期。

在查塔姆大楼，研究室主任伊恩·斯玛特和他的继任者盛廉·华莱士一直对那些对我的书稿能否最后完成持怀疑态度的人表示他们的坚定信心。当书稿完成时，伯林·维克汉姆以负责的态度迅即让很有经验而细致的朱迪思·莱旺斯科特当了本书的编辑，她早些时候曾在《中国季刊》工作。当要解答编辑上的疑问时，我正有幸与本杰明·施瓦滋一道在哈佛大学教学。学生的提问和评论以及与他和其他同事的交谈帮助我推敲一些问题，哈佛——燕京研究所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图书馆又使我能够迅速地解决这些问题的细节。然而，最后定稿付印的过程推迟了，因为两位慷慨的英国学者给了我他们不久前得到的一些主要的中国“内部”刊物。很幸运，这些刊物的材料加强而不是动摇了我的论点。不必说，我在这里热情感谢的人中没有一位对本书任何错误和遗漏有责任。

在多年的酝酿过程中，我的妻子艾米莉一直对本书的问世保持信心。她一直不断地对本书内容提出富有见识的批评。并且还试图阻止我过份在词句上下功夫。我们的孩子拉里沙和罗里宽容了我长期在打字机旁不和全家共乐。并且，更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装订《人民日报》。这本书献给他们。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1982年3月于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

——恩格斯《反杜林论》

# 目 录

## 前言 导言

- [ 7 ] 第一编：冲锋
- [ 9 ] 第一章 毛泽东在莫斯科
- [ 13 ] 第一节 秘密的中苏防卫协议
- [ 18 ] 第二节 赫鲁晓夫对毛的鼓励
- [ 27 ] 第二章 政治局委员巡视全国
- [ 29 ] 第一节 杭州会议和除四害运动
- [ 32 ] 第二节 南宁会议和对财政部的批评
- [ 37 ] 第三节 《工作方法六十条》
- [ 41 ] 第四节 1958年的人代会
- [ 50 ] 第三章 成都会议
- [ 52 ] 第一节 毛反对向苏联鸚鵡学舌
- [ 55 ] 第二节 毛指责专家
- [ 57 ] 第三节 河南指明了方向
- [ 59 ] 第四节 农业机械化问题
- [ 76 ] 第四章 大跃进的发动
- [ 77 ] 第一节 刘：有组织的动员
- [ 80 ] 第二节 毛：解放能量
- [ 81 ] 第三节 毛泽东保护计划制定者



[85] 第四节 党坚持自己对政府的领导

[88] 第五节 党对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权

[95] 第六节 党维护在外交活动中的地位

[99] 第七节 在十三陵水库

[111] 第五章 人民公社的兴起

[112] 第一节 陈伯达的作用

[116] 第二节 北戴河会议

[122] 第三节 钢铁狂热

[132] 第六章 高潮

[133] 第一节 台湾海峡危机

[140] 第二节 “全民皆兵”

[143] 第三节 集体主义生活

[147] 第四节 发扬共产主义道德风尚

[148] 第五节 新时期的教育

[154] 第六节 土法炼钢运动

[169] 第二编：退却

[171] 第七章 武汉退却

[171] 第一节 少中取多

[180] 第二节 对大炼钢铁的反思

[182] 第三节 关于人民公社的理论退却

[184] 第四节 同莫斯科缓和

[199] 第八章 毛泽东转右

[199] 第一节 人民公社的调整

- [201]     第二节   广东省的“本位主义”
- [206]     第三节   一盘棋的概念
- [208]     第四节   毛泽东的重新思考
- [209]     第五节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 [217]     第六节   毛泽东的解决办法
- [218]     第七节   毛制止陶铸
- [234]     第九章   刘主席
- [234]     第一节   从郑州开始退却
- [237]     第二节   陈云出山，理所当然
- [240]     第三节   陈云和1959年钢铁生产指标
- [244]     第四节   农村的现实
- [246]     第五节   上海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 [262]     附录1. 正名：人民公社名称的混乱
- [267]     第三编：冲突
- [269]     第十章   庐山的激烈交锋
- [269]     第一节   一次引发旧情的返乡之行
- [273]     第二节   登庐山
- [276]     第三节   黄瓜引起的争论
- [284]     第四节   彭德怀尝试发表意见
- [287]     第五节   奇特的一对
- [290]     第六节   海瑞——转移注意力的人物
- [296]     第七节   彭德怀的炸弹
- [301]     第八节   毛的反击

- [307] 第九节 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会
- [309] 第十节 苏联的联系
- [312] 第十一节 彭德怀的孤立
- [317] 第十二节 彭德怀的命运
- [320] 第十三节 庐山会议对解放军的影响
- [327] 第十四节 新上台的国防部长
- [330] 第十五节 再度发动跃进

#### [363] 第四编：失败

- [365] 第十一章 中苏分裂的出现
- [365] 第一节 中印边界之争
- [367] 第二节 塔斯社声明
- [371] 第三节 赫鲁晓夫在北京
- [375] 第四节 北京进行痛苦的重新估价
- [378] 第五节 华沙条约组织会议
- [380] 第六节 中国的孤立
- [383] 第七节 在列宁纪念日的进攻
- [386] 第八节 在北京的游说，  
在布加勒斯特的威吓
- [389] 第九节 俄国人执意前行，  
俄国人执意前行
- [393] 第十节 莫斯科会议
- [417] 第十二章 大跃进的终止
- [417] 第一节 刘少奇的海南研讨班
- [420] 第二节 毛的经济研究
- [423] 第三节 以农业为基础



- [430] 第四节 城市人民公社
- [431] 第五节 鞍钢宪法
- [434] 第六节 托拉斯
- [435] 第七节 培养资本家
- [440] 第八节 教育改革
- [443] 第九节 意识形态的逆流
- [447] 第十节 农业灾害

[464] 结 语

- [464] 第一节 跃进的平衡表
- [470] 第二节 大跃进的起因何在?
- [472] 第三节 毛泽东的作用

[481] 索 引

[517] 关于书目的说明

[519] 书 目

---

自从大跃进席卷中国以来，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但是，它的余波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产生中苏争端的催化剂；莫斯科和北京的分裂又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格局。大跃进代表了经济平衡发展原则的放弃；今天，中国人仍将他们的经济问题追溯到那个决策。大跃进的前提是动员大量的人力资源，于是，又导致了计划生育的废弃；当计划生育在13年以后恢复时，中国已经增加了2亿人口。大跃进激起了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国家高级军事领导人、国防部长彭德怀之间的对抗；党和军队之间关系紧张的痕迹依旧存在于中国的政界。大跃进产生了新的社会组织——人民公社。它的作用在几年内就衰微了。但是，直到1981年，中国的经济改革者才开始谈论对它彻底加以取消<sup>①</sup>。

大跃进是逐渐形成的。中国领导人到1957年秋对全国形势开始感到失望。毛泽东曾试图在非斯大

国明显处于劣势。在两国各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苏联的人均粮食产量是中国的两倍。1932年，斯大林的集体化冲击以后，苏联的粮食产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产量减少了25%，但是，由于使用高压手段，苏联农民被迫向国家出售这25%的缺额。即使这样，1932年，当这场充满创伤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人均粮食产量也比中国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高60%。在那几年，苏联政府对农民的态度相对说来小心而巧妙。总之，苏联的人口与粮食生产的平衡使斯大林能够实施对农业的榨取方针，吸收大量粮食，用以购买机器和供应城市工人数增长的需要，而与此同时基本上完全不顾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被迫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发展农业，但还是只能得到比苏联少得多的剩余农产品。

1949年，国家的和平、统一以及随后在土地中没收地主的土地，给了中国农业一个良好的起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量增加了3%，粮食产量每年增长比率约在0.92%（有能力的外国分析家的最低估计）到3.78%（由中国统计员推导出的最高数字）之间。农业投资每年增加5%（主要是肥料和杀虫剂）以追求更高的增长率。但是，产量的增加主要依靠传统技术：更多地使用劳力、通过双季耕种更紧张地使用土地和扩大灌溉面积。

根据官方数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1957年，粮食产量仅增长了1.3%。工业增长率比苏联更密切得多地与农业增长率联系在一起，1957年的工业产量是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第二个最低点。而且，和平、统一和公共保健措施带来的人口增长率由上半世纪的每年1%增长到20世纪50年代的2%。在人口成倍增长和大规模工业化规划的双重负担下，中国农业丧失了满足全国需要的能力。中国的领导者几乎肯定缺乏信息，不能够理解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的历史本质。但是，1957年秋末的粮食短缺必定足以明确从根本上重新估价他们的发展战略的必要性③。



4 在他们面前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他们可以实施一个大规模农业现代化的规划，把资源转移到与促进农业发展直接有关的工业，这个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采用了；另一条是，试图利用传统方法，特别是增加水利设施，把农业产量扩张到极限。正是采纳后一种战略的灾难性决策才导致了大跃进的出现。

中国领导人的希望是争取达到一个经济上的突破以使中国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面对自然和经济客观规律的轻率态度以及他们急躁冒险的行为导致了灾难。但是，跃进战略的基本构想是正确的。广泛动员农民群众被经济学家看作是  
把剩余劳动力转化为资本的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方案。实行小规模具有“乡土”特色的工业规划（大跃进的另一个特征）被称为土、洋双重技术的合理开发。<sup>④</sup>

或许，在1957年秋天的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并未提出上述精细的分析，其实，也没有制订总体战略。当时，高层领导的情绪显然是不满意和不耐烦交织一起，重新评价1956年生产“高潮”的构想就是标志。毛泽东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号召加快发展速度，农业进一步精耕细作，增加钢铁产量。但是，有意义的是，在这个阶段，他仅仅设想到1967年或更晚些时候，中国年产2千万吨钢。而在一年内，他又把3千万吨钢作为1959年最低限度的产量。还在1957年，毛泽东还坚决提倡计划生育，而中国宣传家们在大跃进期间宣称的“劳动力短缺”还没有出现。毛的雄心和失败在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上得到了具体的反映，他说：“难道我们不能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更快吗？”不过，当时，这还仅仅是一个问题，到那时为止，还没有立即提出产量的跃进数字。也没有提出号召动员全民行动起来<sup>⑤</sup>。

奇怪的是，毛泽东日益反对的俄国人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挑战的建议，在莫斯科而不是北京，毛泽东宣布了导致大跃进灾难的第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设想。

## 注释:

1. 关于中国人对大跃进影响的典型分析, 参见结论。关于当时中国人对中国人口政策多变的看法, 参见刘政(音)、宋健:《中国的人口问题与展望》, 特别是第58—65页。关于取消公社的提议, 参见林田《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的探讨》, 载《经济管理》1981年第1期, 译载于《国外广播新闻——中国——81—046》第125页。
2. 有关1957年秋中国领导人的心情, 以及对这种心情的形成原因的分析, 参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的有关章节, 特别是该卷的结语。(译按: 在以下各章的注释中,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一律简称本书第1卷,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一律简称本书本卷; 凡作者标引的这两卷著作的页码, 均为英文原版本页码)。
3. 上面的分析, 很大程度上是以下述著作或文章为基础的: 帕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 1368—1968》, 尤其是该书第13—78页; 安托尼·M·唐:《农业政策及其作用》, 见艾克斯坦、盖伦森、刘大中主编的《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向》一书的有关部分, 尤其是第466—468页、第491—497页; 赵冈:《共产党中国的农业生产》, 第227页; 埃尔文:《中国历史的模式》, 尤其是该书第285—316页; 利皮特:《中国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发展》一书各有关部分。
4. 参见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 尤其是该书第54—59页; 安托尼·M·唐:《农业政策及其作用》的有关部分(见艾克斯坦、盖伦森、刘大中主编的《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向》一书第503—505页)。
5. 关于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参见《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483—497页。



第一编

冲锋



## 毛泽东 在莫斯科

---

1957年11月，世界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云集莫斯科，庆祝布尔什维革命40周年<sup>①</sup>。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了损伤以及匈牙利事件之后，再次强调团结，重申原则，这是一个机会。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到会并在会议上支持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地位，以巩固团结，反对帝国主义。除南斯拉夫外，一个所有执政的共产党的联合声明，一致阐明了世界形势的状况，和平与战争问题，共产党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准则。但是在统一阵线的背后，中苏在关于如何估计国际阵营间力量的对比，以及共产主义革命应该采用和平还是暴力方式等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根据这个分歧，毛早就警告他的中国同事，不要他们与苏联人维持“不正当”的关系<sup>②</sup>。不过，毛对共产党团结的承诺，以及苏联保证与中国进行军事和科学方面的合作，使得毛主席支持赫鲁晓夫。

并允许达成妥协。

奇怪的是，曾经在1956年<sup>③</sup>使中国感到困扰的斯大林问题，似乎没有在莫斯科首脑会议期间的，中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的会晤中出现。随后，中国对此次会议的披露没有提到毛关于这个问题对苏联的再次责备<sup>④</sup>。确实，10月6日，在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中，毛认为，苏联共产党克服个人崇拜的方法是：“明智的。”<sup>⑤</sup>也许，当毛在莫斯科时，苏联人说服了毛：在秘密报告中攻击斯大林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毛回国后不久，据说赫鲁晓夫告诉中国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毛主席对苏联攻击个人崇拜表示理解，并给予彻底的支持<sup>⑥</sup>。也许，毛认为损失已经造成了，再因为赫鲁晓夫自己正在扭转非斯大林化运动<sup>⑦</sup>，因此没有必要进一步进行责备。首要的问题是要表现团结，防止进一步出现灾难。

中国代表团和苏联代表团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根据后来北京的报导，共产党如何夺取政权，这是一个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问题<sup>⑧</sup>。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的正式报告中，他争辩道，共产党人也可以通过议会方式夺取政权<sup>⑨</sup>。随后，中国私下通知苏联，他们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他们回顾性地声称，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八大的讲话中谈论到中国革命时指出，使用类推的方法，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sup>⑩</sup>

在莫斯科，毛和他的同事“做了大量的工作”，与俄国人既协商又斗争，并与其它代表团建立联系。据中国方面说，苏联的声明草案中仅仅提到了和平过渡<sup>⑪</sup>。因而，在11月10日，中国代表团向苏联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的意见概要”。其中，他们接受了关于使用和平过渡这个词在策略上要有好处的观点。但是坚持，暴力革命也必须被提到，因为，“世界上仍然不止一个国家，在那里这种可能性[和平过渡]具有明显的实际意义。”<sup>⑫</sup>在“反复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俄国人准备了两份声明草案，中国准备



了一个修正草案。然后，由两党产生一个联合声明草案提交给其它党<sup>⑬</sup>。最后的声明无疑地使和平过渡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由于中国的坚持，加上了一句，“非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应该牢牢地记在心中<sup>⑭</sup>。”毛认为声明虽经修改，却仍不能令人满意，这是毫不奇怪的。后来，中国有关这件事的报导指出，正是出于同志般的希望才没有使苏联处于困难境地，毛没有迫切要求拒绝考虑赫鲁晓夫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论点。<sup>⑮</sup>

9 但是，无论中国对“和平过渡”有多强烈的意见，这毕竟不是那么密切影响他们的问题。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革命过程取决于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但是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提出的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新理论，却直接关系到中国。这就是如何对付美帝国主义的问题，这将是1960年中苏第一次公开争论的焦点，它已经使中国领导人激动不安。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的是中国在莫斯科并没有强调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

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赫鲁晓夫承认，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sup>⑯</sup>。”但是他又争辩道，自从那理论形成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共产主义集团，中立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工运动已经形成了建立和平的强大力量，正因为如此，虽然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经济基础仍然存在，但“战争并不是注定的不可避免。”<sup>⑰</sup>

在苏共二十大会议的同时，《人民日报》支持这个“深刻的”分析，并把它刻画成“对那些重视和平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人心的力量<sup>⑱</sup>。”赫鲁晓夫的理论适应了当前中国关于和平共处的思想，以及他们以为缓和紧张将是国际形势中的关键因素的观点<sup>⑲</sup>。但是，到1957年秋天，中国对美国和国民党所作的和平姿态没有得到对等的反应，毛对西方的友好的所有希望被破坏了<sup>⑳</sup>。此外，有关苏联洲际弹道导弹8月份所展示的优越性以及

10月份和11月份发射的头两颗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使他确信，不能仅仅对美国采取强硬路线，而且也要显示实力地位<sup>②</sup>。11月18日<sup>③</sup>，毛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的聚会上发表了他对全球两个阵营间的实力对比乐观估计：

10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sup>④</sup>

除了引证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据一个参加者说<sup>⑤</sup>，毛嘲笑美国至今甚至不能把一个土豆送进太空轨道——毛列举了10个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蒙受的主要失败以证明他的关于国际形势已经到达“一个新的转折点”的观点的正确性<sup>⑥</sup>。中国方面认为，毛所进行的争辩，关于共产主义集团力量增强的意思是，有更多的机会去制止世界战争的爆发<sup>⑦</sup>。但是，真正使他的许多听众感到震惊的是，他已经准备想象那种不可想象的，并冷酷地估计即将发生的原子战争会是什么样，如果它一旦发生的话。11月6日在最高苏维埃，他公开的宣称，仅仅西方将会被毁灭，而共产主义集团将会生存下来：

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sup>⑧</sup>。

他私下里用具体数字说明了他的观点：

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

12年以后，在莫斯科的另一次国际共产主义会议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谈到：“这里的许多同志也许记得毛泽东在1957年的会议中在这个大厅里的讲话。在令人吃惊的轻率和讥诮中，他谈到了在一次原子战争中二分之一人类被毁灭的可能性”<sup>②</sup>。那时，使俄国人感到焦虑不安的并不是毛泽东的所谓讥诮，而是他的轻率。因为，他们认为毛断言的共产主义集团的优势并不真实。俄国人并没有宣称，他们在火箭方面的成就使得东方处于全面的“优势地位”，仅仅是东方比过去“强壮”而西方比过去虚弱而已。俄国也没有声称他们据有完全的军事上的优势。他们承认，在一场核战争中，苏联将承受“巨大损失”<sup>③</sup>。因此，对毛的关于把拥有核武器装备的美国描述成“纸老虎”特别感到震惊<sup>④</sup>。赫鲁晓夫也许开始感到困惑，取得毛的支持是否花了太高的代价。

11

## 第一节 秘密的中苏防卫协议

毛之所以在莫斯科能忍住没有批评赫鲁晓夫对美国的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领导确实愿意帮助中国装备核武器。10月15日，签订了一个关于“国防新技术”协议<sup>⑤</sup>，这个协议的存在只是在8年后才被披露。至今，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它的细节以及它是怎样签定的仍然是个谜。当中国最终攻击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时，他们并没有说明是那一方提出要这项协议，什么样的谈判导致了它的缔结，以及谁代表双方签的字。当俄国回答对它的指控时，他们唯一的辩解是，“事实”已经被“带有倾向性地歪曲

了。”他们坦率地承认了确有这样一个协议存在，并谴责中国“无视它作为盟友的义务，并滥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已经着手公开那些有关社会主义集团国家防卫的秘密文件和情报……<sup>⑤</sup>。由于有这样的考虑，俄国明显地不象中国那样倾向于揭露协议的任何细节。

12 看起来可以肯定的是，协议包括了对中国核武器计划提供一定程度的帮助。这也许包括传播有关领域里的科学知识，而不是在制造武器方面进行直接的合作。提供导弹技术也许包括在内。中国使用“新”这个字眼来形容技术，这也许说明他们在有关核武器和导弹的领域内缺少专门知识。从1955年，苏联一直在核物理领域内帮助中国，并在1958年实现了建立一个研究反应堆的诺言<sup>⑥</sup>。秘密协议可能把合作扩展到武器领域。

毛长期以来就希望中国拥有原子弹<sup>⑦</sup>。1957年秋天，在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后，中国方面的急切心情使得它向莫斯科施加压力以求分享部分与苏联新技术。就赫鲁晓夫本人而言，他急于得到毛的支持。因为在他清除“反党集团”之后，以及苏联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党首脑会议上反对波兰和南斯拉夫，他需要支持。但他不能用经济援助来取得这种支持。苏联的经济已经过度紧张，很难应付东欧骚乱所产生的后果<sup>⑧</sup>。但是，他确实清楚毛想拥有核武器的决心。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议也许是确保中国支持的适当的办法，同时还能进行监督，有可能多少控制中国核武器的发展。

协议签定后3天，一个大型的，高级科技代表团到达苏联，以进行为期3个月的谈判。在1958年1月18日，最终签定了协议。这个代表团的公开目标是要取得苏联对中国12年科技规划的全面援助<sup>⑨</sup>。但是在后来的报告中指出，代表团所设想的，需要进行合作研究的关键领域是物理以及和平利用原子能<sup>⑩</sup>。也许，这次访问是早就计划好了的，但在事先，中国也许向苏联施加了压

力以签定一项包括先进武器的防卫协议。

关于秘密协议的许多分析不仅把它与中国科技代表团的访问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它与11月6日到达莫斯科的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联系在一起。但这个协议无法解释在周年庆祝会前夕后一个代表团的准时到达。当国防部长彭德怀作为毛代表团的一个成员于11月2日离开北京去莫斯科时，并没有迹象表明，在几天内，他将开始扮演中国军事代表团首脑的角色。秘密防卫协议已签订了两个星期，中国科技代表团的名单也早已宣布了。并没有事先预示将军们需要到莫斯科去。当然，短期内把将领组成一个负有重要使命的代表团也显得不正常。

13 此外，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即将开始他们的使命前的声明中，并没有暗示他们的使命的目的。在10月30日的广播中，叶剑英元帅声明，苏联成功地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sup>⑨</sup>。10月31日，刘伯承元帅写道：

今天，苏联武装力量已经高度现代化，据有最现代的战争武器，包括洲际弹道导弹……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军队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将学习所有苏联的先进经验。<sup>⑩</sup>

11月4日，彭德怀元帅写道：

自从二次大战以来，苏联武装力量在军事科学和技术领域不断取得成功，而这震惊了世界。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成功表明苏联武装力量在科学技术方面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苏联是中国武装力量现代化的最大的榜样。……通过向苏联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力量学习，加之正确的学习方法，我们军队现代化的完成将少走弯路。<sup>⑪</sup>

这三段声明的特点并不在于强调向苏联学习，甚至也不在于特别强调苏联的导弹技术，它使中国感到兴奋并向毛证明了中国所在的集团在世界对阵中的军事优势。其正使人感到奇怪的是，3位元帅没有在他们的声明中指出，自二次大战以来苏联军事力量发展的更为重要的成就——打破美国对核武器领域的垄断。

自从中国明显地相信，甚至在核武器领域，苏联也在某些方面领先于美国，这种遗漏看起来使人特别惊奇。这一点在另一篇周年庆祝的颂文中出现，但是，文章的作者是一个科学家而不是一个军人。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核物理专家钱三强在10月31日在一个科学家的聚会上说，苏联是第一个生产氢弹的国家<sup>②</sup>，一个著名的中国科学家把苏联氢弹的发展列入苏联科技成就的第一项也许反映了北京科学界的兴奋情绪，期望在新的协议下与苏联同行在这个领域内进行合作，而元帅们对此没有提出任何暗示，在签订协议后两个星期，他们并没有预见到它与他们自己有任何直接关系。

也许可以肯定，军事代表团的出发是在毛和彭德怀到达莫斯科以后决定的，也是他们在那里进行谈判的结果。我们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以及中国人的争辩中得知，在某个时候，苏联领导人同意给中国原子弹样品<sup>③</sup>。中国人的争辩指出，提供原子弹样品与秘密协议有关，但不是协议中的一部分<sup>④</sup>。它看起来是这样，因为在莫斯科毛和赫鲁晓夫第一次会谈时，苏联领导人同意除了在协议中已经规定的技术合作外，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

用一件对方不会拒绝的可观礼物来欢迎国家领导人的访问，以保证一系列接踵而来的谈判的成功，当然是一种为人熟悉的外交“手段”，赫鲁晓夫在即将召开的首脑会议上需要毛的支持，这是不言自明的。此外，在签订秘密协议与毛到达莫斯科之间，赫鲁晓夫解除了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的职务。朱可夫是他在夏季反对反党集团斗争中的重要同盟者。这个变动在北京再次引起了疑



虑，赫鲁晓夫的领导能持续多久，如果他经常清洗他的伙伴的话。主动提供原子弹样品，也许对毛是一种强烈的诱惑，使他暂时搁置对赫鲁晓夫及其政策的疑虑。

但是，当中国最高当局沉醉于“掌握核武器”的前景之中时，赫鲁晓夫的宽宏大量也许加剧了毛与彭德怀之间关于中国应拥有什么类型的武装力量的分歧。分歧基本上来自两个方面：对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有不同看法，以及中国的国防建设缺少经费。毛的观点是似乎是，中国应该拥有核武器，有了它，中国可以在世界上扮演更加瞩目的角色，同时也可以削减常规武器现代化的支出。彭如果被迫选择的话，明显地，他宁愿拥有现代化的常规力量，并依靠苏联的核保护，并相信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是苏联集团中的一员<sup>⑤</sup>。

15

11月27日，彭德怀元帅在莫斯科宴请苏联领导人的宴会上，在他的军事代表团起程回国的前夕，中国的国防部长再次强调了拥有现代化武器的重要意义：

在20多天的访问中，英雄的苏联军队给了我们极其深刻的印象。苏联军队是拥有最新现代技术的装备、有着良好的军事训练和高度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军队……苏联军队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良好榜样。我们一定把这次访问所学到的东西带回国去，认真研究，根据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

在答词中，朱可夫的继任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强调，共产主义军队的力量更多地取决于它和党以及人民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现代武器。这是一条在朱可夫事件发生后很难使人感到惊奇的路线，它重新确定了苏联共产党的红军的领导<sup>⑥</sup>。总之，马利诺夫斯基拥有这个职位大部分是由于他公开表示在这个政策上与赫鲁晓夫



合作。也许最明显的是，马利诺夫斯基表明苏联愿意向中国正在进行的军队建设传输他们的“经验”。这也许表明苏联将不会向中国提供大量的现代常规武器。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原因可能是出于毛的反对。

对莫斯科的访问也许是毛与彭德怀之间关系的转折点。赫鲁晓夫撤换朱可夫的快速和轻松给中国党的领导与他的国防部长之间已经存在的病态关系带来了心理上的震颤<sup>⑩</sup>。毛在他已经从苏联得到了对他所需要的那种国防力量的援助的保证之后，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按照他自己的意愿重新制定解放军的建军路线，彭德怀不支持就得离开。

## 第二节 赫鲁晓夫对毛的鼓励

16 不管他们两位在外交政策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有多么深，毛和赫鲁晓夫也许发现他们对经济的看法令人满意地相似。甚至在他去莫斯科前，毛曾为赫鲁晓夫迅速地实行苏联经济权力的下放感到鼓舞，并使毛利用手中的权力试图在中国进行同样的变革<sup>⑪</sup>。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经济发展的进程的看法是相似的，而不仅仅是在对共产主义经济的理想结构上具有一致的意见。

毛和赫鲁晓夫都是奔放的乐观主义者。在1957年5月，赫鲁晓夫声称，“在最近的将来”，在肉类、黄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最迟不超过1961年。他嘲笑那些谨慎的苏联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怀疑这个目标能否达到。他指出，有许多集体农庄在这几方面的产量大大增加了。赫鲁晓夫接着为迎合毛的思想，但不使用他的言词说，“这些怎么能用数字计算？这是个政治奇迹。”<sup>⑫</sup>

在毛11月到达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已经增强了信心，肉、黄油、牛奶的目标一定能达到<sup>⑬</sup>。并准备提出更富有雄心的目标以

施加压力而被放弃<sup>⑨</sup>。赫鲁晓夫的冒险主义破坏了周以及他的同事们原先准备对新“高潮”加以节制的任何希望。1956年采用的“高潮”到这个时候仍然用于建议中的经济运动<sup>⑩</sup>。当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毛修订了《人民日报》一篇关于1956年“跃进”的口号——“多、快、好、省”的社论<sup>⑪</sup>并送一封信到北京，警告财政部的谨慎的干部：中央领导不支持他们<sup>⑫</sup>。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面前，他表示，在他个人的首创下，中国将在15年内在经济方面赶上英国<sup>⑬</sup>。12月2日，毛从莫斯科回国不到两周，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大会上公开阐明了毛的新的经济目标：

在15年内，苏联能够在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上赶上或者超过美国，在同样的时间内，我们应该在钢铁以及其它重要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sup>⑭</sup>

- 18 5天以后，毛的新目标受到国家计划的主要制定者李富春的赞同。当他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会议上讲到五年计划时，李预计，在15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的钢产量将达到4000万吨，英国目前生产2000多万吨钢，将不可能达到那个指标。他表示了他的信心，中国在15年内将在煤、金属切割机床、水泥及化肥等方面的产量超过英国。<sup>⑮</sup>

李虽然也承认，计划的制定者对执行“多、快、好、省”的政策不够重视，但保证他们在将来会更加注意<sup>⑯</sup>。他宣布的新的第2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指标并不体现——除了一个例外——在一年前中共八大会议上批准的那些指标为基准上的大的飞跃。钢——1200万吨(李的新指标)，1050万吨至1200万吨(八大指标)；煤——2.3亿吨(李的新指标)，1.9亿吨至2.1亿吨(八大指标)；电力——440亿千瓦(李的新指标)，400亿至430亿千瓦(八大指标)；

水泥——1250万吨(李的新指标), 1250万吨至1450万吨(一年以前的指标)。石油的产量比1956年计划要低一些, 这是由于开采的困难、指标适度调整的例外是化肥, 可能那是因为它对十二年农业计划的重要性, 李把1962年的指标从八大批准的300万至320万吨提到700万吨<sup>①7</sup>, 是修订的十二年计划中指标的最高水平(500至700万吨)。<sup>①8</sup>

比工业目标更使人感到惊讶的是李富春制定的1962年的农业目标。在八大会议时, “经济保守主义”盛行, “急躁和冒险主义”受到攻击。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包括2.5亿公吨的粮食, 240万公吨的棉花以及2.5亿头猪<sup>①9</sup>。14个月以后, 在中共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预示了“经济保守主义”的失败, 并恢复了十二年农业计划以及“多、快、好、省”的口号之后, 李富春提出了新的五年计划目标, 低于上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 2.4亿公吨的粮食, 215万公吨的棉花以及2亿头猪。<sup>②0</sup>

19 显然, 无论毛和刘少奇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态度和看法如何变化, 他们并没有把这些变化变成计划委员会的硬指标。毛在晚些时候指出, 全会只对有关水利和积肥作出了具体的决定<sup>②1</sup>。计划制定者大概很关心, 没有足够的、新的苏联援助的投入,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很难达到。而苏联的援助将很难再得到, 因为苏联已经决定把东欧各国的经济负担包下来, 以防止那里进一步发生骚乱<sup>②2</sup>。如果要达到一个生产高潮的话, 就使得动员劳力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唯一富裕的资源是劳力。如果要使一个与生产高潮相适应的全面指标被制定下来, 毛本身也许得做很多工作。这需要时间和对全国的巡视, 这也许就是八大二次会议悄悄延期的原因。这次会议原计划在1957年年底召开。<sup>②3</sup>

#### 注释:

1. 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一直是大量研究的对象。我始终认为已经没有必

要继续详细加以论述。我所引用的资料来源，除注释中已注明的外，还有布热津斯基的《苏联集团：团结与分裂》、克兰克肖的《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弗洛伊德的《毛与赫鲁晓夫的对阵》和哈尔彭的《战后世界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 《毛泽东选集》第5卷340—341页。
3. 见本书第1卷第四章注16和注17。
4. 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0—74页。
5. 见《人民中国》第23期(1957年12月号第5页；另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对毛泽东路线的令人作呕的评论：《对中国的感想》，第85—86页。
6. 见《彭德怀在外交领域的十大罪行》，《联合报》(音)1967年8月11日第4版第4栏。
7. 赫鲁晓夫在1957年5月发动了一场对苏联作家的反击。关于苏联这一活动对毛泽东所产生的影响的论述，见本书第1卷第298页。
8.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1页。
9. 他报告的有关部分，见《中苏论战之概观》，1963—1967年第44—46页。
10.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65—66页。
11. 同上，第71页。
12. 同上，第106页。
13. 同上，第72页。毛泽东的11月8日的讲话中可能提到这四个草案，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14页。
14. 《中苏论战之概观1963—1967年》第54页。
15.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2、74页。
16. 《中苏论战之概观1963—1967》第43页。
17. 同上，第44页。
18.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239号第30页。本书第1卷第41页引用过同样的话。
19. 见本书第1卷第42页。
20. 同上，第299—301页、第316—317页。
21. 见谢兰莉(音)：《共产党中国在核时代的战略》第76—83页。
22. 在莫斯科的十月革命庆祝活动期间，举行了两类正式会议；一类是从11月14日至16日召开的由执政的共产党(除南斯拉夫外)代表参加的

会议，并产生了一个宣言；另一类是从11月16日至19日召开的有在莫斯科的64个党的代表（包括南斯拉夫）参加的会议，发表了一个和平声明。

23. 见《毛主席语录》第80—81页。据说毛泽东的关于东风与西风的提法来源于一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译按：即《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0页和《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12页）。
24. 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约翰·高兰，引自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1963—1967年》第80页。
25. 同上，第79—81页。
26. 同上，第82页。
27. 《人民中国》第23期（1957年12月号）第6页。
28. 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1963—1967年》第82页。关于他所说的对苏联的看法，见同上，第83页。关于对法国共产主义者的看法，见费特勒：《中国—苏联》第199页。在7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同样明确地提出了同一理论（当时他对他的关于29亿世界人口的估计进行了修正），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08页。
29. 《苏联新闻》（伦敦，苏联大使馆）第5493期（1969年6月10日）第128页。
30. 对俄国人的观点的这种分析是以扎戈里亚的《中苏冲突（1956—1961）》第155—160页作为根据的。
31. 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1963—1967年》第83—84页。
32. 见中国政府1963年8月15日的声明，引自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1963—1967年》第105页。
33. 同上。根据麦克金托什的说法，俄国人的“新技术”一词可能意为原子武器、导弹和电子战设备。见麦克金托什：《苏联对美——中危机的态度》，引自哈尔波林所编《中苏关系和军备控制》第206页。
34. 哈尔波林，《中国和原子弹》第75—82页。
35. 决议包括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一讲话当时虽未公开发表，但可以肯定俄国人已知道了讲话的细节。见本书第1卷第68—69页。
36. 同上，第313—314页。
37.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96号第34—35页。

38. 克莱门斯:《军备竞赛和中苏关系》第17页。
39.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44号第27页。
40.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96号第34—35页。新华社在10月30日发表了这篇文章,但刊登在10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
41.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49号第29—30页。
42.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45号第27页。
43.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269页;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1963—1967》第105页。
44. 吉廷斯:同上。
45. 见本书第1卷第68—69页。
46. 引自谢兰莉(音):《共产党中国在核时代的战略》第102页;亦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63号第48页。
47. 见科尔克维兹:《苏联军队和共产党》第130—142页;伦纳德:《斯大林之后的克里姆林宫》第253—260页。
48. 关于两人之间的早期紧张关系的叙述,见本书第1卷第147页。
49. 同上,第67—68页和第315页。
50. 见施瓦茨:《斯大林后的苏联经济》第109—110页。施瓦茨评论说:“这是赫鲁晓夫的一种预兆,随后不久中国人将此类做法称之为‘大跃进’。”
51. 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1957年11月6日)第12页。
52. 当赫鲁晓夫发出在畜产品的产量上超过美国的号召时,他说:“我们并不想用炸弹摧毁资本主义世界。如果我们能在肉、奶和黄油方面超过美国的水平,我们就是向资本主义的支柱发射了一颗重磅炸弹……我们敢于向美国挑战,在某些极为重要的经济领域同美国进行和平竞赛……”(引自施瓦茨:《斯大林后的苏联经济》第111页)。
53. 见注释51的赫鲁晓夫报告。第24页。
54. 同上,第22页。赫鲁晓夫在此将美国1956年的这些产品的产量同苏联1956年的实际产量和1972年预计要达到的指标进行了比较。
55. 直到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向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提交关于七年计划的报告时,他这个论点才予以公开。见《苏联新闻》第3957期(1958年11月24日)第167页。

56. 关于《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和口号(译按: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的出台,见本书第1卷第27—32页。在1958年1月的讲话里谈到,《纲要》和口号出台的时候,毛还提到“促进委员会”,并指出这三者都是被1956年反冒进运动吹掉的(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47页)。根据对毛泽东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进行分析,这个委员会不是提出1956年小跃进主张的某个或某些特殊组织。但他确实表明,全党和政府要成为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的观点。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2页。此外,在毛选的中文版中,毛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被定名为《做革命的促进派》。有关毛后来提到促进派(在成都会议上)和促进委员会(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情况,见《毛主席文选》第83页和《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20页。我推测对《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即刻进行修改,是由于欠收而必须调整《纲要》中有关水利方面的条款,以使其能适应不久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指示中阐述的现行政策。见奥克森伯格《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制定:群众性大兴水利运动情况(1957—1958)》第11章。有关《纲要》的错误的根据,见克拉特:《中国模式》第104页。
5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0页。
58. 见本书第1卷第312—315页。全会的举棋不定大概是第二个五年计划难以定案的原因。一个英国政治家在1957年10月访问中国时,会见了薄一波,被告知周恩来一年前在中共八大上所提出的有关指标的细节正在研究讨论之中,他明显地感到指标的调整只会向下,见唐纳利:《三月风》第241页。
59. 见本书第1卷第7章。
60. 在《人民日报》的11月13日和19日的社论中,分别称为农业和工业的“高潮”。“大跃进”一词的首次使用见1958年1月31日由毛泽东签发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16条)见《当代背景》892号第4页,但官方并未公开使用。第一次公开使用见1958年2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为全国人大的年度会议所发表的社论。
61.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2卷第310页。
6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50页。毛在莫斯科时与其他中央领导进行协商明显有困难,他的主张估计是根据三中全会的决议。不清楚毛



为什么会发出这种警告，可能是他在莫斯科时，呈送他审批的一份财政部文件不合口味的缘故。

63. 根据薄一波后来的说法，见《国外广播新闻——中国——81——145》第 K 33 页。
64. 见《新华半月刊》，1958 年 1 号第 2 页。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译按：指工会八大）并致词。不过，更具重要意义的是他在 5 个月后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认为提出赶超英国的“战斗号召”的是毛（见《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27 页）。但并没有迹象表明刘少奇不赞同毛的首创，虽然他个人可能对发动这场运动的专断形式有保留。

人们得假设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之前，毛的高级同事们对他的首创很晚才有所知，但迅即表示赞同。宣传机构也只在最后才了解到他的倡议，否则就不能理解《人民日报》在刘少奇 12 月 3 日讲话时为什么没有强调这个重要的新目标。在 12 月 8 日李富春讲话时也只粗略提及。

65. 《当代背景》483 号第 6 页。在次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谈到 15 年的目标是使煤炭达到 5 亿吨（为当时的 4 倍），电力达到 4500 亿瓩的能力（根据毛的说法，是当时指标的 10 倍，但实际上却超过了 20 倍）。见《中国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12 页。
66. 见《当代背景》483 号第 5 页。
67. 李的目标，见同上第 10 页。这些目标在八大上得到赞同，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第 1 集第 236 页。
68. 见第 6 条，刊载在 1957 年 10 月 26 日《人民日报》。
69.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第 1 集第 240—241 页。这里的指标是采用中国的计量单位：粮食为 5000 亿斤，棉花为 4808 万担（1 斤大约等于 0.67 公斤，1 担等于 0.0492 吨）。
70. 《当代背景》483 号第 11 页，按原来的中国计量单位是：粮食 4800 亿斤，棉花为 4300 万担（《人民手册》1958 年第 26 页）。
71.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 155 页。
72. 见克拉特在《中苏争端》第 37 页的叙述。
73. 见本书第 1 卷第 315 页“结语”注 14。

## 第二章

### 20 政治局委员 巡视全国

---

毛一向相信到基层视察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避免官僚主义的手段。这一次他主张高级官员一年应该花4个月时间离开首都去收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因为中央仅仅是个加工厂而已。他说：“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觉得脑子空了，一出北京又有了东西。”<sup>①</sup>

到12月中旬，离开北京的有毛、陈云、邓小平（党的总书记）、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邓的副手）和薄一波（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sup>②</sup>。事实上，到这个月月底，政治局的大部分其他重要成员离开了北京<sup>③</sup>。在1958年的前4个月，他们忙于在全国旅行，主要在各地而不在北京互相商量，虽然他们之中大多数不时回到首都。讨论的目标显然是基层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在他们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制订大跃进的计划。大跃进是2月初在人大年度会上初步提出而在5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加以完善并正式发动的。

21 毛本人旅行的地方或许和任何领导人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些的话，而他在这个期间的活动会使人们了解一些政治局视察范围的情况。他在杭州——位于海岸中间的浙江省——呆了大约一个月，或许是从1957年12月初到1958年1月初<sup>④</sup>。在这里，1月初，毛召开了一系列最高层和地方领导人会议中的第一次会议<sup>⑤</sup>。1月6日，毛乘飞机到达国家最南端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在那里，他召集了另一次会议。1月11日和12日，他在会上作了讲话。尽管工作紧张和水温只有零上17℃，他还是两次在邕江中游了泳<sup>⑥</sup>。1月25日，他到达广州<sup>⑦</sup>。到28日，他已回到北京，召开了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和一年一度的人代会<sup>⑧</sup>。毛出席了2月11日人代会最后一次会议，而在13日他在东北访问了辽宁省省会沈阳附近的煤矿业中心——抚顺<sup>⑨</sup>。毛很可能在东北度过了2月剩余的大部分时间，因为那里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区。但是到3月5日，毛已到达西南——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四川，3月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sup>⑩</sup>。其中，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在该省省会成都召开的另一次最高层会议上。这次会议最低限度从10日开到22日。但是在会议期间或会后，他仍抽时间进行了视察<sup>⑪</sup>。28日，他从重庆坐船在四川省(李井泉)、湖北省(王任重)、上海市(柯庆施)第一书记的陪同下用此后的3天时间穿过长江的几个峡谷作了一次雄奇壮观的旅行<sup>⑫</sup>。他在湖北省会武汉结束了这次水上旅行，在那里一直呆到4月11日<sup>⑬</sup>。在这期间，4月6日，他在汉口——组成武汉的三镇中最重要的一个——的一次会议上讲了话<sup>⑭</sup>。12日，毛到了他的故乡湖南的省会长沙。<sup>⑮</sup>到4月15日，他在广州。我们手头关于他的旅次的最后报告是4月30日从该市发出的<sup>⑯</sup>。大约在5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第四次全体会议，为5月5日开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作了准备。<sup>⑰</sup>

## 第一节 杭州会议和除四害运动

关于1958年1月头10天举行的杭州会议，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透露出来<sup>①</sup>。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毛用他的个人声望支持了全国公共卫生运动。这个运动是以消灭四害为中心的。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是在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一项专门条目中确定的。<sup>②</sup>

22 毛很长时间以来就强调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这在1944年12月他就写道：

统治者利用人民的无知，而我们则利用人民的才智。我们必须使人民从无知和不卫生的状态下解脱出来。各地的政府和党的组织应当把文化教育工作的四个项目放到议事日程上——报纸、学校、文艺和卫生。

迟至1957年10月，他还告诉最高国务会议他对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中除害条文有特别的兴趣<sup>③</sup>。的确，这个纲要的再度提出鼓励了省级当局发动除四害运动。例如在四川，省报在11月30日就这个问题发了一篇社论，接着在12月25日登出了一个省级党政机关联合发出的正式通知<sup>④</sup>。在1月初，毛访问了著名的卫生单位杭州的一条小港，询问了四害的流行情况<sup>⑤</sup>。然后在南宁会议幕后，毛发出了一个指示：

应该开展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应该实行函月检查，这样才能打好必要的基础。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把除四害以外的其他目标也合并到运动中去进行。<sup>⑥</sup>

几天之内北京市就掀起了一场旨在推进除四害运动的竞赛热潮<sup>②</sup>。而在1月27日，四川日报就公布了它的第一张对照表，载明全省各地消灭四害的数字。早些时候，新华社的一篇来自重庆的通讯就透露说，该市200万人口中平均每天有一半人从事对四害进行的斗争。从12月24日开始，他们已杀死23万多只老鼠，掘出差不多两吨苍蝇蛹，清除了600多吨垃圾。<sup>③</sup>

关于这一运动的更有情趣的描述见于新华社另一篇关于人民解放军部队的创造性的通讯：

23 许多部队的官兵热心研究老鼠和麻雀的活动规律。掌握了这些资料，他们就制定了具体办法和实施计划。驻在上海的某部官兵发现麻雀晚上藏在树林里，因此很难捕获。于是他们想出一个新办法。他们摇动树枝，麻雀被从窝里惊动出来，用手电筒迷惑麻雀的视觉，然后用竹竿去打它们。这个办法被认为很有效。副排长王树华一竹竿就打死了4个麻雀。<sup>④</sup>

捕获命运不幸的麻雀的另一种技术被当时派往中国充当顾问的一位苏联科学家亲眼看见。他后来回忆是这样的：

一大早，我就被一位妇女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吵醒了。我冲向窗户，看到一个年轻妇女正在临近的房顶上来回跑，她手里拿着一根竹竿，竹竿上拴着一个布条，一边跑一边拼命地挥舞竹竿。突然，那妇女停止了叫喊，显然是为了喘息一下。下面的街上响起了鼓声，她重又开始那可怕的尖叫，疯狂地舞动起她那特别的旗帜……我注意到，在这个旅馆的高层楼上，穿着白衣服的妇女们正挥舞着床单和毛巾，这是要使麻雀不落在这栋房子屋顶上。<sup>⑤</sup>

当然，从取得政权以后，政府一直集中精力抓公共卫生。成就之大使一位前来访问的英国记者<sup>②</sup>把他随后写的一本书题名为《中国没有苍蝇》。1958年运动的特点是它的巨大的规模和开展的认真程度。一位加拿大科学家亲眼看见了下面的事件：

我们穿过一条铁路线，据说是一通自往一座煤矿的支线——看到了一幅令人震惊的场面：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正在铁路边忽东忽西地发疯般狂奔。显然在用一块布摔打着地面。“噢，她正在追赶着一只苍蝇，以便打死它”，田先生说。这件事最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所进行的消灭苍蝇、臭虫、麻雀的努力的激烈程度。我在中国近1个月期间，没有看见一只麻雀，我坚持数苍蝇，看见一两只苍蝇只有15次。那只不幸的苍蝇还正在被飞奔着的一个中国人追赶着。只有1次，我在西安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台上看到一群苍蝇。它们围着几只竹篮·嗡嗡着，每只竹篮里装有四只小猪，等待着上船载运。<sup>③</sup>

24

虽然这些活动在来访的外国人看来是怪诞的，但是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正是人们这种消灭害虫的真诚努力鼓励中国领导人去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公共卫生运动。这场反映美好愿望的运动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1月2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在杭州进行卫生视察的消息，强调了主席个人对除四害斗争的关心。接着，在2月12日，公布了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的发动除四害运动的官方指示。这个后来证明出于毛之手的指示透露，有11个省和6个大城市计划5年内消灭四害。在这些城市中，南京计划1958年完成，北京计划1959年完成<sup>④</sup>。在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运动的时，还有着同所有的主要疾病作斗争的目的。这些最顽固的疾病当中有一种就是血吸虫病或叫作肝蛭病（埃及血吸虫病）而1958年6月宣布<sup>⑤</sup>，江西省有一个县已经根绝了这一

种可怕的病。这使毛兴奋异常，以至夜不成寝，写下了大跃进第一年中唯一的一首诗：<sup>②</sup>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sup>③</sup>

在文化大革命中，1958年被说成是毛在卫生战线取得成绩的一年。除了除四害群众运动以外，不仅要求增加对中医的研究，而且医学教育也要改革<sup>④</sup>。事实上，下述一点已经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场改革本身远不是那样壮观，而其政治意义，回想起来却比人们所能想象的复杂得多。<sup>⑤</sup>

### 第三节 南宁会议和对财政部的批评

5 虽然毛在南宁会议上发出了关于公共卫生的指示，但那不是他在1月11日和1月12日在这次会议上讲话的主旨。从这些讲话和毛31日签署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成为大跃进第一年的开头，毛的目标在于改变党和政府内部的作风，为了计划中的生产高潮把官场动员起来，为此，首先要重新强调国家机构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正是在南宁，毛第一次提出了这样一种想法：经过3年全力以赴的努力取得经济上的突破。“苦战三年改变中国面貌”的口号首先由安徽省提了出来。最初，毛对此有保留，



但是这个省的领导人通过给他看他们的蓄水计划而说服了他。不过，出于文字上的谨慎，他把人们熟悉的“基本上”这个副词加上，来修饰“改变”这个动词<sup>⑤</sup>。毛自己评论南宁和随后的成都会议时说：

我们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批评了那些对敢于前进的反对意见。我们决定不允许对敢于前进作进一步的反对。我们提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如果没有南宁会议，就不会形成这条总路线。<sup>⑥</sup>

毛的猛攻如此成功，以致后来声称，南宁会议以及此前的三中全会标志着那些警告要反对冒险主义的人的失败<sup>⑦</sup>。被毛批评的人中有周恩来总理、商业部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这个政权建立之初的经济巨头陈云以及财政部长李先念<sup>⑧</sup>。按照毛的说法，商业部剥削和欺骗人民<sup>⑨</sup>。但是他的主要火力对准经济保守主义的堡垒——财政部。

世界各国的财政部很少不是作为经济上小心翼翼的倡导者行动的，在中国，更有充分的其他理由采取这种态度。仅仅10年以前，在国民党政权的末期，中国经历了现代历史上最糟糕的通货膨胀<sup>⑩</sup>。国民党对物价的失控疏远了一直是他们忠实支持者的城市资产阶级。共产党人恢复了物价的稳定，是他们最初的最重要的成就<sup>⑪</sup>。财政部官员们不愿意看到这个成绩被冒险主义者的经济政策葬送掉。而正是他们，至少在毛看来，是阻止1956年早期跃进的主要责任者。<sup>⑫</sup>

26

财政部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在杭州讨论过了，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它的一些高级官员应召出席了南宁会议<sup>⑬</sup>。在那里，他们受到毛口头的申斥。在会议期间，他透露，自从1956年的跃进刹车以来，他一直抵制他们的文件。他解释说，他认为《人民日报》一

篇论证刹车是必要的主要社论滥用了自己的语录，对此他感到特别愤怒，“用毛泽东的话去反对毛泽东”<sup>④</sup>。虽然很清楚，愤怒是毛为什么采取这种行为方式的理由之一，但是还有一个更为含意深刻的理由。毛普遍攻击了国家机构呈送过多的冗长、咬文嚼字、高度技术性的文件给政治局，而财政部则是既有这种错误，又总是在很晚才呈送文件<sup>⑤</sup>。结果，按毛的话来说，政治局就变成了一个橡皮图章，就象“杜勒斯的联合国。”<sup>⑥</sup>

毛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决体现在一个月以后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在该条例32条和33条中，他谈到情况和文件的呈交：

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材料。……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sup>⑦</sup>

27 当然，早些提交简单些的文件仅仅可以作为解决毛所指出的根本问题——怎样确保对国家机构的政治控制——的辅助手段。《六十条》或许有这样一点暗示：毛对国家机关干部们的谴责比对政治局成员——例如财政部长李先念，后者是前者的发言人——的谴责更严格些。第33条规定，“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业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业务。”<sup>⑧</sup> 这种说法有些含糊，但这可能适用于李先念。据认为，李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他的国务院办公厅<sup>⑨</sup>，他正是从那儿主管食品、商业、对外贸易部、

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再加上他的财政部的<sup>⑤</sup>。他不在的时候，财政部的工作是由副部长吴波负责的，<sup>⑥</sup>吴从建国伊始一直是部内一名高级官员，在3任相继的部长领导之下工作<sup>⑦</sup>。对李先念来说，把政治局观点强加在吴波和他的财政部的头上是可能的吗！或者更为寻常的是李作为国家机关干部在政治局的代言人，相信国家机关干部主流观点的旗手不可避免地会发挥很大的权力？

对有着庞大机构的政府都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则差不多是同样困难的，即使信息比中国更灵通的国家也是如此。对毛来说，主要的是应该通过正常的途径向政治领导提供情况，这样它才能形成一种对经济应当如何发展的集体的观点，然后把这种观点让政府机构加以推行。1956年11月，在共产党中央的二次全会上，他建议预算应该进行三轮讨论，这样，非专家也可以对财政问题有足够的了解，并对专家们提出的建议进行有根有据的判断<sup>⑧</sup>。而在南宁，毛明确表示，为了取得对经济机构必要的政治领导，他准备把个人声誉和正要到来的跃进连结起来。

参阅他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毛使读者认识到这个序言在1956年跃进的发动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他表示，可能有人 would 认为序言是对他个人崇拜的一部分，这也丝毫奈何不了他，重要的是它的效果<sup>⑨</sup>。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有必要，1958年他会再次这样干的。

28 在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试图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支持被他称之为向自然开战的号召<sup>⑩</sup>。前一年的“大鸣大放”使各地都焕发出积极的精神。“过去不能做的事现在能做了，过去无法办到的事现在有办法了”。“中国是一穷二白”，毛补充道，这个短语几个月后发表，成为很有名的一句话，但是穷，就要求革命，一张白纸，好写漂亮的文章。<sup>⑪</sup>

毛对非共产党的听众采取怀柔态度。毛说他很高兴，因为在民主党派的高级干部中不是很多人成了右派分子，而在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的人中只有10个。中共有错误，民主党派也不例外。无论中共还是民主派，都是旧社会的产物，所以中共产生了高岗、饶漱石，民主党派也有类似人物，这显然指右派分子。<sup>⑧</sup>

毛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改造的一贯要求，用了当时几个月变得流行起来的一个短语，强调又红又专的必要性：

红是政治，专是业务。不红只专是白色专家，搞政治的，如只红不专，不熟悉业务，不懂得实际，红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搞政治的要钻业务，搞科技的，要红起来。十五年赶上英国，要有成百万、上千万，忠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sup>⑨</sup>

这种劝勉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毛似乎已经决定再次试图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6个月以前，他一直在讲培养庞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而不仅是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的知识分子的紧迫需要<sup>⑩</sup>。很可能，在1958年1月大跃进的开始阶段，由于赫鲁晓夫自己对跃进的爱好，毛暂时恢复了对苏联模式的兴趣，加之1月中旬中苏科学合作协定又签订了。这位主席想重新实施1956年跃进的策略给国家干部和资产阶级专家施加压力，以便从传统的斯大林的发展模式中得到更大的启发和帮助。在杭州会议期间，毛用飞机把3位上海的知识分子接来，就中国科学发展的前景进行了深入的讨论<sup>⑪</sup>。直到同年晚些时候，毛才认识到通过大力加强小型、土生土长的，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的技术有可能缩短这一条发展道路。

当1956年跃进的失败仍记忆犹新的时候，为了赢得知识分子

接受使经济迅速增长的思想，毛向他们强调不断革命的必要性，他把这叫作趁热打铁。毛把自己的观点同托洛茨基的观点作了区别，提出托洛茨基企图提前历史的步伐，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sup>⑤</sup>。他断言：

劲，可鼓而不可泄。有了缺点、错误，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sup>⑥</sup>

### 第三节 《工作方法六十条》

没有迹象表明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公开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而且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即《六十条》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党内文件<sup>⑦</sup>。有一点也是清楚的，《六十条》第一次是在某次会议上出台的<sup>⑧</sup>，估计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之类的会议，这次会议可能举行于1月末，也可能是2月初。<sup>⑨</sup>

《六十条》的大部分条文都是毛根据他在杭州和南宁会议上听到的情况写成的。在一些情况下，他只是简单地记录了别人的观点。关于规章制度的“重要的一条”是由刘少奇根据同地方干部商量的结果写成的。并不是所有的条目都涉及工作方法问题。毛自己指出，一些条目涉及工作任务，一些条目体现了理论和原则。为了征求意见，在政治局批准以前进行修改，文件被发下传阅。<sup>⑩</sup>

30 《六十条》是毛试图在新的“生产高潮”<sup>⑪</sup>或“大跃进”中给干部提供一种工作手册。大跃进这个名词是第十六条中第一次提出的。原来它只是用于水利运动的一个名词<sup>⑫</sup>。没有《六十条》的指导，广大干部在新的跃进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困难面前就会再度陷入犹

豫不决<sup>⑩</sup>。第十五条根据安徽的经验总结出毛希望广大干部掌握的态度和方法。该条还确定了一张大跃进的时间表。

10年决于3年，争取在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3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sup>⑪</sup>

大跃进真的从1958年持续到1960年。

在最长的两条(21、22)中，毛精心地表达了大跃进哲学的精华部分——不断革命和又红又专的观点<sup>⑫</sup>，第3个组成部分——冲破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清规戒律——很明显是在刘少奇的“重要的”条目内加以详述的<sup>⑬</sup>。有趣的是，这一条保留着内在的矛盾，听起来似乎在鼓励土法上马，实际上很清楚，是被看作一个严密控制的过程<sup>⑭</sup>。这或许反映了刘的态度中互相矛盾的两种情绪——向前跃进的热情和对秩序和组织的偏爱——但是条文中所暗示的“一般规律”还表明，赞成跃进的领导人们还不准备或不能够完全无视周恩来和他的同道的警告，因为“多快……”的大跃进口号是以计划人员喜欢的“按比例发展”来修饰的。<sup>⑮</sup>

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的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sup>⑯</sup>

但是随着这一年时间的进展，这种小心的，通过不同途径增长的平衡让位于毛主义者的名言，也同时是在《六十条》中的说法，“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sup>⑰</sup>

31 刘的第二十三条对政府在大跃进中的作用，仅保留了一点实质性的内容，以便同党区别开：这个作用就是附和党中央批准新



的规章制度。但是在地方一级，正是党才有权调查和废除旧的制度；其他条文还表示以后党应该在管理经济方面起干预作用。或许意义最重大的一条是第2条。那里列举了党委应当抓的十四项工业方面的工作，声称这些项目可以为《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供一个基础<sup>⑧</sup>。很清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草拟一个工业发展的四十条纲要来与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相匹配。如果这样一个纲要制定出来，那么必然导致精心编制出来的政府各部的五年计划的废弃，即使在那阶段，《六十条》还是根据这些计划拟定的。<sup>⑨</sup>

甚至在五年计划制度没有被推翻的情况下，《六十条》的第九条就已暗暗埋下了动摇精密计划的基础——统计制度的种子。到那时为止，中央当局在某个既定的年度一直实行为各省确定单一国家指标的制度<sup>⑩</sup>。在第九条毛故意引进一个有3套计划的新制度。中央当局有两套：第一套必须完成的，也是要加以公布的；第二套是争取完成的，但不公布。这种中央的第二套计划作为地方的第一套计划必须完成。然后地方也有自己的第二套计划（加起来一共3套），这个计划是要争取完成的<sup>⑪</sup>。事实上，这种双重的计划制度不仅限于中央和省两级，它还被延伸到县一级。这样实际上就出现了第四套生产计划。这种制度的直接结果是指标的不断加码。首先国家指标下达的过程中，就已层层加码；在接到基层乐观的预测数字以后，中央当局再次把指标调高。这就产生了另一次加码高潮，或者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在指标上的大跃进<sup>⑫</sup>。这种拥有两种指标——公开的是最小值，私下的是最大值——的制度，持续了整个大跃进期间。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即使公布了的生产预测够高了，但在背后，毛本人正在确定更鼓舞人的目标——从而直接导致1959年的统计工作失败。

大跃进的许多主要内容都在《六十条》中有所阐述：高积累（第16条）、大集体主义（第17条）、试验田（第18条）<sup>⑬</sup>、广泛推广先进经验（第19—20条）、中学和大学都办农场和工厂（第48—50

条)、在地方一级建立化肥厂和农具研究所(第52—53条)、推广高产良种(第54条)、鼓励种植薯类(第56条)。但是大跃进时期意义最为重大的两个产品——人民公社和土法炼钢却没有预料到。

在没有预料人民公社和土法炼钢的情况下,《六十条》真正使不明真相的人感到惊讶的事同大跃进本身没有关系,这就是毛在最后一条正式地在私下宣布他想辞掉两个主席职务中的一个——国家主席职务。他解释说,这样他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可以获得更多的时间集中到党的工作上,这对他的健康也有好处。这个建议已得到政治局、中央和地方许多干部的同意,认为是个好主意。现在各级干部都应该了解这件事并提出他们的意见;对那些不赞成这样做的人,应向他们说明,在国家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毛还可以再次担任国家主席这一职务。<sup>④</sup>

在本书第一卷中我已阐述过,毛决定辞掉他的一项职务是他自己所说的在政治局常委中退到第二线的第一步<sup>⑤</sup>。毛一直震惊于苏联近期的权力斗争,他把这种斗争部分地归结到斯大林的继任者缺乏声望,显然指他挑选的法定继承人马林科夫。为了防止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毛希望把他的同事们树立成可信赖的理所当然的国家领导人。这样在他死后,他们就有资格领导国家了。他这样做就是要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逐渐把权柄移交过去,让政治局常委第一线的成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越来越多地决定事情。如果作进一步探讨的话,那么人们必须这样假定:毛的这个精明的愿望,是为了树立他比斯大林高明的形象。

33 毛的打算可追溯到1956年。因此,宣布他将辞掉国家主席一职,并不表示是对1957年整风运动出了问题的一种自我批评。尽管如此,一些干部还可能对这一问题有所思索,尤其是在毛签署《六十条》两周之内举行的人代会上,另一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周恩来也放弃了他的职务之一——外



交部长<sup>⑥</sup>。我将研究周的免职的意义并说明，毛是怎样考虑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保护他的。

#### 第四节 1958年的人代会

1958年的人代会是一个分水岭，是中国领导似乎仍按照相当节制的经济指标行事的最后一个公开场合，虽然这种节制是以大跃进的语言为外衣的。两位主要的经济发言人，财政部长李先念，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都对自己的部门在1956—1957那个冬天的保守主义表示歉意<sup>⑦</sup>。但是李对新的预算的赞颂所能说的仅仅是它“反对任何保守主义倾向”<sup>⑧</sup>，而由薄宣布的产量指标也是不过分的：粮食——1.96亿吨，比1957年增长5.9%；棉花175万吨，比1957年增长6.7%；薄对两者的增长率都只能以“相当高”来形容<sup>⑨</sup>。1958年的工业指标也不比农业指标更令人兴奋：钢——624.8万吨，比1957年增长19.2%，1957年比1956年增长17%；煤——15072.4万吨，比1957年增长17.2%，1957年比1956年增长16.6%；电力224.5亿瓩/小时，比1957年增长18%，1957年比1956年增长14%<sup>⑩</sup>。此外，钢和电力较高的增长率仅仅是根据前一年新建成的工厂的数目测算出来的数字，而不是通过额外的努力来达到。<sup>⑪</sup>

34 不过，在向1958年的人代会提交的经济报告中出现了两个意义重大的数字。李先念宣布，国家对农业的资助1958年将有显著的增加，特别是国家在农业上的支出（主要是基本建设）将比1957年增长40.78%<sup>⑫</sup>。几乎一年以前，毛说过，“因为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80%以上的农业大国，因此，它的工业和农业必须同时发展。”<sup>⑬</sup> 增加农业支出是执行这个政策的第一步。

对1958年剩余时间的发展进程甚至产生意义更重大的影响的，是水利运动显示的成功。这种水利运动是自从1957年9月24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之后掀起的。1957年10月到1958年9月，最初的灌溉计划是4390万亩，到1957年10月，增加到6180万亩<sup>⑤</sup>，然后增加到9200万亩。薄一波能够宣布，1亿男女劳力的辛勤劳动使得最新的指标在4个月之内很容易地被超额完成了，到1958年1月31日，已灌溉的土地已达11700万亩<sup>⑥</sup>。后来透露，1958年和1959年过分强调蓄水造成河北、河南、山东土地含盐量大面积地增加，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sup>⑦</sup>。但是在1958年初，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下述这一点：用纪律武装起来的农民劳动大军能够取得的成就表明1958年的大跃进——这个口号是周恩来提出来的，它公开作为全国的战斗口号出现是在全国人大会议结束的时候<sup>⑧</sup>——可以用同1956年的跃进完全不同的原则组织。在这个情况下，毛开始了他的又一次旅行。到了3月初，当他为成都会议到达四川时，他准备排除对全面的生产高潮的残余障碍。

#### 注释：

1.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56页。
2. 当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在12月12日接见工会八大代表时，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在场(《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3日)。
3. 12月14日，周恩来陪同一些缅甸的高级领导人去杭州(《人民日报》12月15日)。按《人民日报》在12月17日的一篇报道，毛泽东“在南方”会见了缅甸客人，可能是在杭州。12月22日，周恩来同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陆定一(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上海，他和上海的第一书记柯庆施一起视察了上海郊区(《周总理的故事》第55—58页)。1月份，他在安徽(《人民的好总理》第2辑第347—348页)。12月20日，刘少奇仍在北京，他接见了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的党的领导人，陪同他的只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人民日报》12月12日)。

由于众多的领导人的外出，只好由具有威望但没有实权的朱德元帅以毛的国家元首的副手身份在一些重要的农业和财政会议上讲话。

除朱德外，还有三位担任政治局委员的元帅没有外出巡视：陈毅（可能还忙着熟悉外交部的工作，他在1958年2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接替周恩来任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彭德怀和贺龙。

4. 在北京最后一次在正式场合露面可能是在12月2日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人民日报》，1957年12月3日）。当缅甸副总理吴觉迎于12月4日抵达北京后，毛并未会见他，所以，毛可能在此时已离开北京。12月7日，毛在一个未透露的地点会见了捷克军事代表团。从所发表的会见时的无明显特征的照片上推测，会见不是在北京（《人民日报》，1957年12月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杭州露面（见前注3）是他在12月中旬会见吴觉迎和他的同事、（副总理）吴巴端。再次报道毛在杭州的时间是1月1日（《人民日报》，1958年1月29日）。1月3日，他会见了由周恩来陪同的也门王子（《人民日报》，1958年1月4日）。到1月5日，他仍在杭州（《深切怀念罗瑞卿同志》第121页）。
5. 《当代背景》892号第1页。
6.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46号第2—3页。关于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讲话，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45—154页）。
7. 28日，毛泽东在广州会见了印度大使，《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01号第29页。
8. 毛泽东出席了28日起和30日的最高国务会议，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54—159页。至少，毛出席了全国人大会议的开幕式（2月1日）和闭幕式（2月11日），见《人民日报》1958年2月2日和12日。
9.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61号第4页、1766号第1—3页。
10. 3月5日，毛泽东在成都视察了一家工厂；见《四川日报》1958年4月7日和《人民日报》1958年4月11日。
11. 毛泽东在3月10日、20日和22日出席了成都会议，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59—180页。有关他视察的报道，见《四川日报》1958年4月7日和《人民日报》1958年4月27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66号第3页。
12. 见1958年4月15日的《人民日报》。
13. 4月2日晚，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一些波兰领导人（《人民日报》1958年4月4日）。4月3日，他视察了武汉的一家饭馆，见《中国大陆报刊

- 概览》1779号第1—4页。《人民日报》在1958年4月15日报道了毛在武汉的活动。
14.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80—186页。
  15. 见1958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亦见《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40、251—253页。
  16. 见《红旗》1958年第1期第4页，《人民日报》1958年5月1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79号第6—10页。4月30日，毛泽东参观了一个农业机械展览。刘少奇、邓小平、康生和陆定一在4月的后10天内也参观了同一展览(《人民日报》1958年5月4日)。
  17. 《人民手册》1959年第32页。
  18. 我们只能知道这次会议的大概日期，因为毛告诉我们这次会议是在南宁会议之前的1月份举行的，见《当代背景》892号第1页。并且，从《中国百科年鉴》(1981年)第562页上，我们可以知道南宁会议是从1月11日至22日召开的。毛阐述了在杭州会议上以及后来在南宁会议上的讨论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基础。在月底，他便制订出《六十条》，见《当代背景》892号第1页。
  19. 见《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6日。《纲要》修订草案的这一条与原来的该条有所不同，见《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25页。现在仅只有吃粮食的麻雀被列为有害动物，该条不适用于城镇和林区。
  20. 见毛泽东1944年12月16日为《解放日报》所写的社论，引自《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教导：1928—1966》、(《新人卫》翻印，人民卫生出版社，1967年6月)，《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2号第5页。毛泽东于1957年6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12页。
  21. 见《四川日报》1957年11月30日；同上，1957年12月26日。
  22. 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07号第10—12页，直到1958年1月29日，有关毛泽东视察的新闻才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23. 《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2号第11页。
  24. 见1958年1月16日的《人民日报》。
  25.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22号第26—27页。
  26. 同上，第14页。
  27. 科罗契科：《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68页。

28. 乔治·盖尔，曾在1954年陪同英国工党代表团。
29. 威尔森：《中国一月》第207页。
30.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22号第1页。这一指示的拟订者毛泽东和《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1960年版的有关卫生的条款，见《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2号第10—12页。
31. 见1958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
32. 至少，这是他在1958年发表的唯一的一首诗。
33. 译文摘自陈志让《毛和中国革命》第349页。译者解释“牛郎”是一个星座。还有另一首诗。
34. 关于医学教育的改革，见《城市“老爷”卫生部反对“六·二六”指示的滔天罪行》（《红医战报》和《八一八战报》，1967年6月26日），摘自《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98号第33页。有关发扬中医问题，见《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2号第10—11页。
35. 兰普顿：《大跃进时期的卫生政策》，《中国季刊》60号（1974年10—12月）第668—698页。
36.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41页；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31—32页。
37. 毛泽东：《短论》第123页。
38. 见《（中国机械战线的）两条道路斗争史》《农业机械技术》1968年第9期，摘自《中国大陆杂志选》633号第7页。
39. 薄一波：《崇敬与怀念——献给党六十周年诞辰》，《红旗》1981年第13期；《修正主义的吹鼓手》，《北京公社》，1967年5月26日，第1集第3页。
40. 同上。
41. 见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特别是第八章：“中国与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比较”。
42. 见夏：《共产党中国的价格控制》。
43. 见本书第1卷第87—88页。
44.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51页。
45. 同上，第146页、151—152页；本书第1卷第87—89页。
46.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48—149、151—152页。
47. 同上，第149页。毛泽东称政治局为“表决机器”，这一比喻含义清楚。

48. 《当代背景》892号第9—10页。
49. 同上, 第10页。
50. 多尼索恩:《中国经济体制》第365页; 亦见巴尼特:《共产主义中国的干部、官僚主义和政治权力》第21页。
51. 多尼索恩:《中国经济体制》第517页。
52. 同上, 第365页。
53. 吴波的个人经历的概述, 见李嘉(音):《中共税收系统》的附言第17—18页。
5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4—335页。
55.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49页。
56.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57页。这一资料来源明显概括了毛泽东1月28日和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28日讲话的删节本包括在《毛主席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第1—3页, 转摘自《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10—14页。
57.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54页。这一文件首次刊登是在1958年6月1日的理论性月刊《红旗》第3页上, 其文本, 出自1958年4月所写的一篇文章不是这次讲话文件的译文, 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52页。
58. 同上, 第158页。高岗和饶漱石都是党的高级干部, 高是政治局的6名最高成员之一, 1954—1955年期间被清洗。
59. 同上, 第159页。按《中国共产党术语汇编》第194页的说法, 红与专的名称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1957年提出来的。刘少奇在1957年11月6日的一次讲话中强调了红专结合的重要性, 见《共产党中国, 1955—1959: 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00页。
60. 见本书第1卷第298页。
61. 《怀念毛泽东同志》第208—213页。
62. 见《中国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13—14页。
63. 同上, 第14页。
64. 《当代背景》892号第1页。
65. 同上, 第14页。
66. 毛泽东为《工作方法六十条》所写的序言的时间是1月31日。这一文件

显然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月19日下发的(同上,第1页)。江苏省把这一文件在2月下旬发至县委书记一级(根据1958年5月14日《人民日报》所刊登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一篇文章,转摘自《当代背景》509号第6页)。但是,无法从内部资料中弄清毛的序言是为讨论《六十条》的会议而写的还是为干部而写的。一般说来,在南宁会议后毛为序言的“构思”和起草需要一段时间,他在南方视察期间,可能没有时间顾及这一文件。同时,最高国务会议从1月28日至30日召开,全国人大会议从2月1日开始举行。讨论《六十条》的高级会议我推测是在4月31日召开的。

67. 《当代背景》892号第1页。
68. 同上。
69. 同上,第4页。“大跃进”一词的使用似乎与水利建设有关,见奥克森伯格:《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制定:群众性大兴水利运动情况(1957—1958)》13页;亦见后面的注99。
70. 关于1956年的第一个“高潮”的叙述见本书第1卷第1编。
71. 《当代背景》892号第3页。
72. 同上,第5—7页。
73. 同上,第7页。
74. 《当代背景》892号第7—8页。
75. 参见李富春在中共八大上的讲话,引自本书第1卷第124页。
76. 《当代背景》892号第7页。
77. 同上。
78. 同上,第2页。
79. 见第8条;同上,第3页。
80. 李:《共产党中国的统计制度》第71页。
81. 《当代背景》892号第3页。
82. 李:《共产党中国的统计制度》第72页。李叙述了(在第77页)新的目标体系是如何被强加给国家统计局的以及如何指责旧体系是保守和消极的。
83. 1958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生了一个关于试验田的指示。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20号第5页。种试验田的运动是从湖北省的红安县兴起



的。下放干部划出试验田，试图找到更好的耕作方式，同上，第5—12页。中央把这一运动作为鼓励干部联系群众和帮助生产，实现又红又专的方法。见《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2月15日；亦见同上，第12—15页。

84. 《当代背景》892号第13页。

85. 见本书第1卷第105—107、152—156页。

86. 关于周在整风运动中的作用，见同上第33—35、180—183、218—219、231—240和274—278页。

87. 《当代背景》493号第5页(李的文章)；494号第6页(薄一波的文章)。

88. 《当代背景》493号第6页。

89. 《当代背景》494号第9页；《新华半月刊》1958年5号第15页。

90. 薄一波所说的目标见《当代背景》494号第15页。我所计算的1957年超过1956年的比例是根据薄一波的1957年的增产数据和《伟大的十年》第95页所提供的1956年的数据(后一来源的数据与薄的数据并不一致。然而，我所感兴趣的并不是实际产量而是薄制订1958年目标的根据，因此，我未理会《伟大的十年》中的1957年的数据，尽管这些数据更为精确)。

91. 《当代背景》494号第2页。按薄的说法，1957年完成的主要工程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任何一年都要多(同上)。

92. 《当代背景》493号第11页。

93. 在他的讲话中有些矛盾之处，见《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94页。

94. 奥克森伯格：《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制定：群众性大兴水利运动情况(1957—1958)》第11章(一亩等于0.1647英亩)。

95. 同上，第13章。

96. 见薄一波在1958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讲话，《当代背景》494号第4页。

97. 同上。李先念估计用于水利工作的投资要60亿元(《当代背景》493号第12页)，或者国家用在农业费用中的水利工程方面的费用要增加两倍。

98. 《人民的好总理》第3辑第40—41页。

99. 《人民日报》1958年2月12日的社论《掀起跃进的会议》。薄一波在周恩来逝世后所写的纪念周的文章中透露，“大跃进”这一口号是由总理提出的。当毛泽东问包括周在内的一群同事，这个词是从何处来的时，



总理谦虚地保持沉默而让其他人告诉主席(《人民的好总理》第3辑第33页)。但是,尚不清楚是周本人提出来的还是周采纳了别人的口号。1957年11月17日,《河南日报》第二版上的一篇关于济源县山区的报道中使用了这一词,该报在1957年12月1日的关于棉花产量的大字标题中再次使用了该词。至少在《河南日报》11月17日使用该词的一个月以前,《湖南日报》仍然使用的是1956年的《高潮》的口号,见《湖南日报》1957年10月20日关于扩大的六次全会的报道。扩推测,“大跃进”一词可能是在这两个日期之间的某个时间里提出的。我尚未发现其他省的报纸在这一时期内使用了该词。当前,由于西方国家所拥有的这些报纸是不完全的,因此,不能绝对断言该词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过。然而,那种河南省是大跃进的开路先锋的说法,却似乎可以有理由假定该词是出于河南省。亦见前注69。

## 第三章

### 35 成都会议

---

成都,四川省的省会,位于一个广大的平原的中部,由于纵横交错的灌溉系统,很早以前就以“陆上水乡”著称。两千多年前,一个省级地方官的水利建设使它变成世界上土地最肥沃,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sup>①</sup>。这个城市反映了围绕着它的农村的繁荣。半个世纪以前,这个西南的名城那“宽阔的,清洁的街道,饰金的商店招牌,无数的饭店、酒店、药店,或者那充满着贵重的川丝和舶来品的大商店”,曾经激发了年轻的朱德的丰富的想象。<sup>②</sup>

50年代末期,成都刚超过100万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不算多<sup>③</sup>。但是作为这个国家人口最多的省份——当时它的人口已达7200万的省会和重要的余粮产区之一的中心,成都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sup>④</sup>。这种重要性由于下述情况而愈增加了:四川人在中央委员会所占名额较多,在政治局正式成员中有:朱德、邓小平、陈毅、刘伯承,形成了

以省划分的第二个人数最多的集团<sup>⑤</sup>。正是刘和邓作为共产党的第二野战军的司令员和政委，在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四川时起了主要作用，虽然成都本身事实上是由湖南人贺龙解放的<sup>⑥</sup>。这三个人在共产主义政权的初期继续留下来管理整个西南地区——四川、贵州、云南。邓和贺龙离开以后仍和四川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后来被毛主义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斥之为阴谋。

36

1958年四川的关键人物是该省党的第一书记李井泉。他是江西人，在贺龙和刘伯承的部队里工作过。他在四川解放后一直就在那里<sup>⑦</sup>。有证据表明，在1956—1957年间，李井泉并不是毛的放宽限制开明实验的支持者之一<sup>⑧</sup>，但是他显然对毛发动1956年的跃进作了热情得多的反应。在国家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公布之后，四川制订了自己的十二年农业纲要<sup>⑨</sup>。李是1958年大跃进的一个同样热情的支持者，尽管文化大革命对此作了相反的论断<sup>⑩</sup>。作为一种礼遇的对象，毛在成都会议上赞扬李井泉在生产高潮中保持冷静的能力<sup>⑪</sup>，似乎已经确定地选中了李和上海党的领导人柯庆施，柯是毛在以前开展整风运动的忠实支持者<sup>⑫</sup>。在访问四川期间，毛作了多次对城市和农村的视察访问，一般情况下是由李陪同的，最少有一次还加上了柯<sup>⑬</sup>。当3月18日，会议结束之后，这位主席从重庆坐船作了3天水上旅行，穿过长江几个峡谷去武汉。这3天，毛是由李、柯和毛的另一名亲信湖北省党的领导人王任重陪同的<sup>⑭</sup>。显然，一场跃进如果要在地方分权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话，那么省委书记的锐意支持是关键。因此，下述情况不是值得惊奇的：大跃进初期的大部分党的会议都是在中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举行的，而毛对该省领导人也表现出异乎寻常地信任。

联的模式仍然照搬<sup>①9</sup>。毛本来应该附加一句，他的许多观点只是重复前一年“资产阶级右派”的批评而已。<sup>②0</sup>

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虽然中国的确有一些自己的经济专家，但是他们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影响只得用苏联的那一套加以抵消。加之，“对全面的经济形势都没有认识。而认识中国同苏联经济形势的区别，更谈不到<sup>②1</sup>。”不过，毛断定，“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sup>②2</sup>

38 如果毛当初只想抵消对苏联模式的过分屈从，那么他提供一系列类似于或鸡蛋和鸡汤更严重的例子，以说明盲目的照抄的危险就行了。例如，周恩来几年前即已警告外交部，在外交事务上不要太密切地仿照苏联<sup>②3</sup>。但是毛走得更远一些，他的讲话的一大部分用来分析从1949年以来中苏政策的不同。他有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几点有趣的评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我总是比斯大林矮一些<sup>②4</sup>。”毛对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作了区分，正确的个人崇拜就是要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提出的真理，而不正确的崇拜则是简单盲目的服从。<sup>②5</sup>

1956年，斯大林受批评，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象，我们挂象。<sup>②6</sup>

毛攻击赫鲁晓夫以突然诋毁斯大林的方法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是虽然他断定中国大多数党员对此感到愤怒，但又补充道，有些人屈服于苏联的压力，想推翻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sup>②7</sup>”，这里，人们感到毛对下述情况的愤恨：他的一些同事，利用非斯大林化来削弱这位主席的地位。<sup>②8</sup>

毛在讨论赫鲁晓夫粗暴进行非斯大林化时表现了他对这个问题在中国内部的反响是很敏感的，但是事实上他只举出解放后中

苏论争的一个事例。毛提醒他的听众，“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sup>②</sup>。”他告诉他们，他在解放后立即访问莫斯科和斯大林争论了两个月。他承认，在双边防务条约和其他一些问题上，他作了重大让步：

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sup>③</sup>

39 结果是中国被迫接受东北(前满州)和新疆(中国的土耳其斯坦)的“特殊的”地位。只有中国人和俄国人才允许在那里居住<sup>④</sup>。当考虑到刘少奇等人在1960年各国共产党会议上受到同赫鲁晓夫的勾结的指控时，应该怎样看待毛在苏联的压力面前不得不让步这一事实呢？<sup>⑤</sup>

尽管莫斯科条约缔结了，但斯大林仍然认为中国革命是假的。直到朝鲜战争中，中国人表现了他们的勇气，斯大林才改变了他的主意<sup>⑥</sup>。毛暗示甚至那以后，斯大林仍与高岗调情，而高在斯大林死后一年内即受到谴责<sup>⑦</sup>。接着而来的是对非斯大林化的分歧，而当毛在1957年2月作关于内部矛盾的讲话的时候，俄国人显然在私下斥之为“鼓动自由主义”，并拒绝接受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存在着矛盾的概念。<sup>⑧</sup>

尽管人们承认毛有喜欢谈说历史的倾向，但从成都会议长篇论述中苏关系还是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毛认为让中共高级成员记住某些事实是必要的。这并不是说毛已预见到60年代中苏之间的尖锐的争论了。但是根据莫斯科和北京前两年的关系，毛可能顺理成章地感到，进一步的冲突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想象的。干部们应该为此作好精神准备。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同苏联的文化合作在成都会议结束后几周内也因而大幅度缩减了。<sup>⑨</sup>

但是，首要的任务是把中国从苏联经济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毛说明了这一过程开始于1956年4月他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sup>③7</sup>。大跃进时期分管农业的谭震林，在1958年底的一次讲话中直接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使斯大林的神话破灭了，这也就使人们从苏联经济发展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sup>③8</sup>。解放的进程随着毛1957年2月关于矛盾的讲话而继续着。

- 40 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出“工业和农业应同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和控制生育”的建议<sup>③9</sup>。毛赞成控制生育的论述——这种论述在官方出版的文本中删去了——<sup>④0</sup>是令人吃惊的，因为这种论述看来不过是他的政策的一种革新，而出现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种对中国巨大人口的赞颂。这种赞颂基于这样一种议论：人口越多，生产越多。迟至5月，毛似乎还在探索跃进的战略。但是他对苏联模式的攻击表明，经过3个月在国内的旅行，他对赫鲁晓夫经验的热情已经淡薄。不过赫鲁晓夫对经济发展的观点很多地方同毛是类似的。然而中国的经济情况完全不同于苏联，毛在所到之处一直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他必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 第二节 毛指责专家

毛泽东对第二个目标的攻击对大跃进战略的形成关系重大。由于他日渐失去对专家的尊重，就为完全依靠群众的劳动作了准备。直到1月底，毛还在表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好感。他甚至在成都会议上还表明，更多的知识分子支持中国共产党是整风的结果<sup>④1</sup>。在4月杭州会议上，他提倡“冷却”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sup>④2</sup>。甚至到了7日，还派其他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彭真、陈毅、柯庆施——一再向知识分子保证开创新的政治气氛，在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作用<sup>④3</sup>。知识分子反过来也向党“表衷心”，

也进一步交了心<sup>④</sup>。

但是，尽管有这样持续的矛盾心理，从成都会议产生的主要思想倾向来看，是对有效地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起着完全相反的作用。在3月22日成都会议上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对过分尊重“教授”的行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41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sup>⑤</sup>

毛泽东指出，世界上大多数作出重大贡献、创立新学派新思想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如孔子、耶稣、释迦牟尼、路德、马克思、达尔文、孙中山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闹革命时，也都是20多岁的青年人。“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sup>⑥</sup>

毛的意思是说，真理比知识更重要，红重于专。他并非说真理或者红本身就足够了。他作为受过辩证法教育的领导人，总是能够掌握潜在或实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但大多数中共党员短于知识，长于“真理”。根据这种最高领导的旨意，他们在跃进期间漠视专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尤其是成都会议对统计工作中教条主义的批评，损害了国家统计局（经济机制的监督机构）的信誉，并为后来3年光怪陆离的浮夸铺平了道路。<sup>⑦</sup>

为了压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减少他们的影响，毛泽东提倡的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大量出版党办刊物。他透露说，陈伯达（毛以前的政治秘书……）最近忙于向科学家宣传“厚今薄古”，<sup>⑧</sup>并且转变了原来死也不想再办刊物的态度，同意办一个党的理论



性杂志。他鼓励各省都办自己的理论刊物<sup>④</sup>。毛让各省主办省级理论杂志，只要他们每年给中央杂志送五、六篇文章。他确实别出心裁，提出：“搞点民歌好不好<sup>⑤</sup>？”现代诗歌没有人读，结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新诗，只能在民歌传统的基础上创作。

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或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sup>⑥</sup>。

42 显然，毛泽东作为一位诗人，对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名义创作的诗歌是大叹不行的。但在同时，他又希望现代诗人不要象他那样常常大作古体诗<sup>⑦</sup>。毛可能也想压倒那些在百花齐放时期令他失望的专业诗人和作家。当然，这种愿望正如他们所预料到的那样，在大跃进期间实现了，在此期间收集或写出了千千万万首不知其数的民歌<sup>⑧</sup>。

### 第三节 河南指明了方向

除了诗歌以外，毛在成都会议上并没有发动大跃进；大跃进是两个月以后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产物。但是，他在3月20日发表的讲话确立了大跃进的总路线的最终形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sup>⑨</sup>——并且透露，河南省已经制订出了一个宏伟的规则，别的省都觉得必须向河南看齐。

河南的规划就是，保证十二年农业规划的主要目标——把粮食产量提高100%或者更多，建立完整的水利系统，消灭四害和文盲<sup>⑩</sup>——在一年内完成。仅仅是除四害的指标，就可以表明河南的领导人特别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他曾经是毛20年代中期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的学生<sup>⑪</sup>）在不断升温的跃进热情中达到了何种程度。就在一个月之前，在下令展开全民除四害运动



的指示中，只提出1958年在河南省5个市县里消灭四害的保证<sup>②</sup>。而现在，省委领导人准备完成自己省内100多个县市除四害的指标。河南的所有提议都独出心裁，难以实现，这就使毛陷于两难的窘境之中。他倒不会指责河南领导人“急躁冒进”，因为那样做就会冒抵制跃进热情的险，特别会犯他所谴责的计划者犯过的错误，那个错误中断了1956年的跃进进程<sup>③</sup>。另一方面，他显然不太愿意把全权委托给省委领导人。他不让公布指标，并告诫其他省不要制订象河南省那么高的指标<sup>④</sup>。如果在下一个8年或10年才完成十二年农业规划，那也不会冒被开除党籍的危险。

43 毛泽东预见到，这种水平的指标在工作中很可能造成“巨大的缺点”，在人民中也会造成“过度的紧张”。<sup>⑤</sup>

建设的速度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10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它，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根、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浪漫主义是好的，没有措施不好。<sup>⑥</sup>

毛泽东这番告诫显然起了作用。河南的方案将意味着1958年达到粮食增加100%的目标。但成都会议似乎规定了增产10—20%的指导性目标，而18—27%的增产建议明显地被看作“左倾”。3个月以后，后一种建议已开始被视为不左不右，甚至是“右倾”了<sup>⑦</sup>。况且，尽管毛提出了公开的谨慎告诫，但由于他建议秋收后比较各省产量增加的数量，这又明显地鼓励省委第一书记们互相进行激烈的竞争。<sup>⑧</sup>

#### 第四节 农业机械化问题

即使成都会议之后对会议提出的指标的合理性一直存在怀疑，但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则已进入议事日程，所以会议显然又讨论起完成增产目标的方法问题了。机械化是一个关键问题，为此，会议制订了题为《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的文件，接着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sup>④</sup>。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毛和他的一些同事之间的分歧。因此，不妨概略地说一下问题的背景。

44 按一位学者的说法，从15世纪到20世纪之间，中国的农业工具技术普遍处于停滞状态。“在华北平原上，20世纪使用的大多数工具，早在北魏时期(公元5世纪)，可能是汉代(公元3世纪灭亡)就被普遍应用了<sup>⑤</sup>。这种技术的停滞不前，不可能是由于农民保守。人们一般认为，没有内燃机和电动机，就不可能有进步。<sup>⑥</sup>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时存有一种天真的想法。他们认为机械化之所以值得进行，仅仅是因为美国和苏联已经广泛地走上了机械化道路<sup>⑦</sup>。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地唯一分歧是，机械化必须象苏联那样在合作化之前实行呢，还是在合作化之后实行。刘赞成苏联的模式；毛持否定意见，并且用1955年合作化运动成功的事实来证明他的观点<sup>⑧</sup>。毛泽东并不是看不起机械化；相反，他是重视它的。1955年7月31日他在关于合作化的讲话中说：

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在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遭到极大的

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sup>②</sup>

十分清楚，毛泽东也犯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错误，即相信农业生产率是同经营规模大小紧密相连的<sup>③</sup>，因而他就看重机械化。但到了50年代中期，有些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中苏两国之间土地和劳力两个生产要素之间比例的差别。1956年，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明确地说，“由于中国农村拥有如此巨大的人力资源，具有如此复杂的耕作制度，因而使机械化的推行不大可能……如果实行了机械化，农村劳动力的剩余问题就会非常尖锐，以致于无法解决。”<sup>④</sup>

1957年春，一份似乎基于实地调查的报告送到了毛和其他领导人手中。这个报告认为：

45 依照任何国家的情况来看，发展农业机械常常是人力匮乏的结果。农业机械的重要作用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就每一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来讲，农业机械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因此，由于我国人力和物质资源十分丰富，农业机械化的技术政策是否正确就值得研究了<sup>⑤</sup>。这个论点得到了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的赞同。<sup>⑥</sup>

虽然上述观点看来具有表面上的说服力，然而这个观点是有缺陷的。在农村最繁忙的季节，劳动短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sup>⑦</sup>毛泽东青年时期在农村家乡无疑记得这个事实<sup>⑧</sup>。况且，中国共产党在十二年农业规划中提倡通过种双季作物来增加产量，并鼓励人们从1956年起实行这种耕作制度。这样一来，就促使了劳动力供给的紧张<sup>⑨</sup>。1955年，毛泽东含糊共词地说明他的信念，机械化不会使几百万农民失业。但是，面对不热心于机械化的人提出的论点，他也许感到有必要委托康生（政治局候补委员，文化

大革命中是毛的最亲密顾问之一)这位坚决支持机械化的人为他作些研究。<sup>①</sup>

由于毛泽东的观点和威望的作用,似乎导致出现一种妥协。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1957年末写道,外国的农业机械常常不适合于中国农田的地形,并且总要消耗掉中国稀少的石油。但他又批评了认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目标与机械化直接相矛盾的“偏见”。他补充说:

最近,我们组织了一批干部和技术员,派他们到农村去土地考察。我们还同农业和水利部门的人交谈。我们开始认识到农村的真实情况,与我们过去所认为的大不一样。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指示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理解得更清楚了,认识到我们过去的想法是错误的。<sup>②</sup>

在这篇文章以及1958年初的另一篇文章中,黄敬说,他清楚地意识到,机械化可以帮助解决多季作物种植和农忙季节中的问题。<sup>③</sup>

46 成都会议《关于农业机械问题的意见》的文件体现了妥协的观点,其要旨就是,农业工具的改进是刻不容缓的任务<sup>④</sup>。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机械化问题时说:

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脑,否定肩挑的反面……。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全机械化<sup>⑤</sup>(着重号是我加的)。

成都会议的文件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sup>⑥</sup>。这个指示

并不设想在机械化方面搞任何跃进,指出这一点是很必要的。8月,在毛泽东发出的一项指示中只包含一个具体的命令,即要求讨论哪些工具可以适用滚珠轴承<sup>④</sup>。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发表了一篇拥护毛主义的文章,此文在论述机械化问题时透露说,1962年9月和1966年2月,毛主席号召在25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sup>⑤</sup>。如果在这前后相距3年半的时间里没有使毛改变他的发展规划的时间长度的话,那么人们就会设想,在规划中所提的25年不过是粗略的估计。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没有对机械化讲任何更具体的话,因而人们必然认为,后来被说成是毛主义的机械化战略的其他要点,只是在会议的文件中大致勾画了出来。这些要点,包括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发展和管理机械化,分散制造和研究农业机械。

关于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来掌握机械化的可能性,显然是早在1956年夏天,康生进行调查的问题<sup>⑥</sup>。1956年,拖拉机的使用数量几乎上升了150%<sup>⑦</sup>。在那一年,全国只有大约11%的拖拉机被农业生产合作社占有,国营农场拥有的数量接近37%,仿效苏联拖拉机站建立的农机站拥有的数量则超过50%<sup>⑧</sup>。对斯大林来说,拖拉机站是保证党控制农民和向国家提交公粮的关键因素<sup>⑨</sup>。但是,可能康生并不象文化大革命材料所暗示的那样,敢于提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创造性想法。苏联领导人在康生1956年春访问东欧时,很可能已经私下里争论起拖拉机站的作用问题了。

康生的研究促使黑龙江省和北京地区1957年开始了试验。离北京不远的南苑农机站把它的机器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管理,但保留所有权(“国家所有,集体管理”),而黑龙江省的百泉农机站则把它的机器彻底地移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所有和管理”)。1958年1月<sup>⑩</sup>,赫鲁晓夫宣布将要取消拖拉机站。中国的农业部这时召开了农机站负责人会议<sup>⑪</sup>,并在关于农机站的报告中肯定了上述试验。刘少奇也赞成这个政策,显然是由于他感到

拖拉机站经济上不太合算<sup>②</sup>。但中国人远比俄国人谨慎。报告再次宣称，“目前，我国的国有拖拉机站仍然是农业机械化的主要形式”，并反对拖拉机站放弃职能或者甩包袱的倾向<sup>③</sup>。3月，成都会议提出，“农业合作社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农业机械化”<sup>④</sup>。国务院第7办公室（监督农业部及有关的部）于5月提到1月会议的报告时主张，“把农业机械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管理，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sup>⑤</sup>。但是，第7办公室的说法是非常自相矛盾的，因为它一方面指示农业部就由于将农业机械转交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出现的新问题作调查和报告，另一方面，它又同意农业部关于1月会议的报告，这个报告如同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强调继续发挥农机站的作用。因此，虽然1958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为人民公社）拥有的拖拉机数量扩大7倍，但显然主要是把急剧增加进口的拖拉机输送给农业合作社所致；因为在同一年中，农机站拥有的拖拉机数量下降不到10%<sup>⑥</sup>。中国的这种情形同苏联恰成鲜明的对照。在苏联，到了1958年末，“大多数”拖拉机站的机器转交给了集体农庄<sup>⑦</sup>。赫鲁晓夫比中国人大胆得多。

48

中国人在成都会议上作的关于委托地方工业制造农业工具和机械的决定，在用语上也是十分谨慎的：

农业机械的制造（包括机引农具、新式畜力农具和改良农具），除了大型的和技术要求较高的农业机器以外，一般的应该以地方工业为主。由各个地方或者经过各个协作区，根据当地的条件和需要，自行安排；中央有关部门在技术和经验交流方面予以帮助。对于地方工业基础较差的地方，在协作区内省间调剂仍然不能解决的，中央有关部门应当组织调剂<sup>⑧</sup>。（着重号是我加的）

当人们考虑到前一年苏联的赫鲁晓夫对几十年来由斯大林建



但是，不管有多少领导人准备促进双轮双铧犁的使用，劝阻这么做的人也是不少的。1956年1月提出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到了这种犁，但1957年10月中央三中全会提出的十二年农业纲要修改稿中就没有提。有材料证明，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对这个纲要的第2次修改稿中仍然没有提<sup>⑩</sup>。

然而，即使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同事象对待生产指标那样谨慎地对待机械化，成都会议的气氛却不意味着要束缚那些与会的省级领导人<sup>⑪</sup>。毛泽东通过批评苏联模式和资产阶级专家，就抛弃了促使经济决策谨慎行事的两个重要因素。通过在成都会议上再次批评周恩来和陈云，他又减少了促使经济决策谨慎化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的影响<sup>⑫</sup>。况且，他甚至还减少了自己过去提出的警告的影响，因为他提出不反对与自己观点相反的意见。邓小平在成都会议上也表示了这种态度<sup>⑬</sup>。这样一来，成都会议在解放中国高级干部思想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意味深长的是，邓小平在会上说，毛自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一直在解放思想<sup>⑭</sup>——并且在要求他准备设计出大跃进的宏大计划 and 目标。

#### 注释：

1.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要地》第96——97页；特里格：《中国地理》第76——77页。
2.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时代和生平》第71页。
3. 成都并不在中国人口最多的6大城市之列，其人口数量甚至不及四川省的另一个大城市重庆。见《伟大的十年》第12页。
4. 关于各省的1957年的人口数据，见同上，第11页。关于余粮省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见《陶铸、赵紫阳在农村工作中追随刘少奇的罪行材料》（《反修战报》1967年7月8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19号第3页）。陶是中南地区的党的第一把手。据该材料引用陶的话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谁手中有粮，谁就比别人更有力量”。亦见《令人震惊的政治迫害》、《红色造反者》（广州？）1968年1月4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123号第2

页)。

5. 湖南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两位最优秀的代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出生地。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比例,见沃勒:《中国共产主义政治人物的变更,1931—1956》;亦见斯卡拉皮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第58页。
6. 关于毛泽东将贺龙派往四川,以便同四川出生的刘伯承保持牵制平衡的推测,见惠策恩:《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年》第19页。
7. 同上见图表,A、C、D。
8. 见第1卷第109、254页。
9. 见1957年12月5日《四川日报》。在国家的《农业发展纲要》作出修改后,四川省也发布了该省的《农业发展纲要》修订草案。
10. 见古德曼:《李井泉和西南地区,1958—1966:“土皇帝”的生活和“罪行”》,《中国季刊》1980年1—3月号,第74—75页。
11. 毛泽东1958年3月20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60页。讲话中所提到的用“×××”来表示的四川的领导人,肯定是指李井泉。李好象在中共八大上因四川省合作化过程的缓慢而露出窘态。据推测,毛在成都对李的评论,可能是让李放心,不会因此而使主席失去对他的信任。
12. 柯庆施在延安时期曾与毛泽东是同一个党小组的成员,见何德全(音)《和毛主席在一个党小组》,《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05号第1页。
13. 见1958年4月11日、12日、15日和27日的《人民日报》和1958年4月6日和7日的《四川日报》。
14. 1958年4月15日的《人民日报》。
15. 这些讲话的时间是3月10日、20日和22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59—180页。《问题与研究》1973年11月号第95—98页转载了3月10日的讲话。该刊1973年12月号第103—112页转载了3月20日和22日的讲话,3月22日的讲话亦收入《毛主席文选》第78—83页。在3月1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曾提到“昨天”说过的事情(《问题与研究》1973年11月号第97页)。但是,如果他在3月9曾有过讲话,则我们尚未见到。
16. 《问题与研究》1973年11月号,第95—96页。
17. 同上,第96、98页。



18. 同上，第96页。
19. 同上。毛泽东对照搬苏联教育经验的批评，后来被说成是针对刘少奇和陆定一的，见《十七年教育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教育革命》1967年5月6日，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第41卷，932号第27页）。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则可以推测是因为刘和陆在当时是全面负责教育和宣传工作的。但是，毛对照搬苏联经济经验的批评，则可以肯定是对周恩来的。换言之，毛对照搬苏联经济的批评，似乎不能认为是对他的某些高级同僚的个人的攻击，即使他感到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走的太远了。应当指出的是，根据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第41卷，932号所引用的所有材料都与《问题与研究》1973年11月号第96页所刊登的毛的讲话不相符合。此外，根据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所引用的材料可推测出毛对刘少奇和陆定一鼓励仿效苏联报刊的模式的做法进行了抨击，而刘却早在1956年就严厉批评了苏联的报道方法（见本书第1卷第76页）。
20. 见麦克法夸尔：《百花齐放运动和中国知识分子》第26、27、46、64、78、80、92和220页。
21. 《问题与研究》、1973年11月号，第97页。
22. 同上。
23. 《人民的好总理》第3辑，第59页。
24. 《问题与研究》1973年11月号，第97页。
25. 同上。
26. 同上，第98页。
27. 同上，第97页。
28. 见本书第1卷第99—109、157—159页。
29. 《问题与研究》1973年11月号，第98页；亦见德迪耶：《铁托讲演集》第331页。
30. 《问题与研究》1973年11月号，第98页。
31. 同上。有关毛泽东在讲话中所提到的“殖民地”是指1950年在满洲和新疆创办的中苏联合股份公司、中苏联合管理的中长铁路及中苏联合使用由苏联军队守卫的大连（旅顺口）海军基地的共同协定。毛的这次讲话中给我的最有价值的材料是第一次透露俄国人还要求不许第三国的

国民住在这些地区。

32. 见《刘少奇生平大事记(1899——1967)》，《当代背景》843号第19页。
33. 《问题与研究》1973年11月号，第98页。
34. 同上，第97页。有关高岗事件，见泰韦斯《中国政治及清洗》的有关章节，及欣顿：《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的“无原则争论”》。
35. 《问题与研究》1973年11月号，第98页；亦见本书第1卷第316页。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毛曾指出《纽约时报》全文登载了他的讲话全文。《纽约时报》通过波兰的来源得到了这个受到欢迎的论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并在1957年6月13日刊载。但《纽约时报》从未声称其所刊载的是全文，因而，很清楚所刊载的并非全文。因此，毛在成都所谈到的全文登载，可能只就大体而言。但可以设想，透露给他的《纽约时报》全文登载的错误消息是为了诱使他出版一个经过修改的正式文本（见本书第1卷第266——267页）。
36. 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70年》第152页。
37. 《问题与研究》1973年11月号，第97页。关于对这一讲话的评论，见本书第1卷第61——74页。
38. 《关于邓小平问题的初步综合材料》（“彻底粉碎谭震林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联络站”，1967年3月17日），第22页。
39. 《问题与研究》1973年11月号，第98页。
40. 参见《纽约时报》1957年6月13日文本的摘录在《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87—288页的官方文本的第7条的有关部分。
41. 《问题与研究》1973年12月号，第107页。
42.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85页。
43. 见《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摘编》第17页，《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第7、8、11页（北京：“新人大公社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1967年5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转摘自《中国大陆杂志选》639号第6、8、16页；《东方红战报》第71期第5页、第81期第6页；《对陈不显第五次假检讨的批判》（《工人造反报》1968年2月10日，转摘自《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131号第6页）。据报道，柯庆施的口号是“整风运动会暂时结束，但是，整风的精神决不能丢掉”。刘少奇1957年12月在统战部部长的一

个会议的讲话中已经预见到再次争取资产阶级的苗头。见《彻底清除刘少奇破坏统战、民族和宗教工作的修正主义罪行》，转摘自《中国大陆杂志选》645号第7、8、12、13和15页。

44. 科罗契科：《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74—76页。
45. 《问题与研究》1973年12月号第108—109页。
46. 同上，第109——110页。
47. 孙治方：《加强统计工作，改革统计体制》，《经济管理》1981年2月15日。
48. 《科技革命》（1967年8月），第14—17页。关于陈与毛的关系，见本书第1卷第17—18页。
49. 《问题与研究》1973年12月号，第108、110页。
50. 同上，第111页。
51. 同上，第112页。唐朝的杜甫和李白都是众所周知的创造中国文化的伟大的杰出的诗人。由于杜甫对他所处时代的宫廷的尖锐批判而被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尊奉为“左派”。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领袖、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1971年把杜甫从“人民诗人”的地位上拉了下来。见郭的《李白与杜甫》，以及楚文江（音）对该书的评论（《中国季刊》1973年第10——12月号第796—798页）。
52. 见本书第1卷第178—180页。
53. 关于作者所称的“百万首新诗运动”的论述，见 S. H. 陈：《一致性中的多样化：诗和大跃进》，《中国季刊》1960年7—9月号第1—15页；亦见戈德曼：《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分歧》第244——249页；福克玛：《中国的文学理论与苏联的影响：1956—1960》第202—208页。

著名诗人何其芳在对河南进行考察旅行后指出：仿照农民的诗节，“我们有责任创作出几首打油诗”：

毛主席的眼睛象天上的星星，

哪怕住在深山里也看得见它们的光亮。（译按：按英文译出）

何也献出了他自己的一首赞颂农民诗人的诗（这说明全国著名诗人——他卷入了新诗运动）：

天上星星多又多，金星是最亮的一颗；

悠悠过去诗人多，李白、杜甫好诗多；

而今好诗何人作？

千百万的劳动人民。(译按:按英文译出)

这两首诗均收入许芥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第530页。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批评了某些同志不敢对犯错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批评(《问题与研究》1973年12月号第109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有人声称这些受批评的同志包括彭真和另外两个负责宣传工作的高级官员陆定一、周扬(《红色批判报》,1967年6月16日第3卷第2页)。但是,我并未发现证据能进一步证实这种说法。然而,毛对这些人的批评比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的批评还要严厉——彭和陆是由于他们对整风的态度,周扬则是因为毛所表扬的有些知识分子对他心怀不满,见本书第1卷第190—191、201、203页。

54.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66页。

“多、快、好、省”是早在1956年的高潮中就为毛泽东所接受的口号,见本书第1卷第30—32页。根据多方面的资料,周恩来在1955年底提出了“多、快、好”的口号并被毛所批准。后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提出加上“省”,也为毛所接受(见《人民的好总理》第3辑第33页;《人民日报》,1980年5月2日:《李富春同志对经济计划工作的巨大贡献》)。

“力争上游”,按毛泽东的说法,是在1958年跃进之前提出的(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19页),但我未能查到出处。这些口号中,只有“鼓足干劲”是专为1958年的跃进所提出的,并且还曾对是提“鼓足”还是“鼓起”进行过讨论,后来确定使用前者。“鼓起干劲”的提法可能只是指“调动某个人的积极性”,而“鼓足干劲”的提法则是“调动一个人的全部积极性”,增加了这一口号的气魄。因此,毛选中了这一提法(见同上和《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17页)。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鼓足干劲”和“力争上游”这两个口号合并在一起可能是《人民日报》1958年1月1日的元旦社论(见《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157页)。但是,在那个阶段只是推出了口号,并不表明对口号的一致赞同(在元旦社论中,“大跃进”一词的使用只是与1956年的经济发展有关)。

上海市党的第一书记柯庆施可能是第一个使用“鼓足”这一提法的,见他的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党的会议上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

号召“鼓足革命的干劲”(见《人民日报》1958年1月25日)。毛于1958年1月28日和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使用的是“鼓起勇气”这一短语(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55页)。财政部长李先念1958年2月1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重复了毛的提法,插入了“革命”一词,提出“鼓起革命干劲”(《新华半月刊》1958年5号第12页)。《人民日报》为全国人大会议所发的社论中(1958年2月3日和12日),简称为“鼓起干劲”。可能是在5个星期以后,毛才选择了“鼓足干劲”一词。因为,“鼓足”一词在后来已颇为流行。例如,可见《人民日报》1958年4月10日的大字标题和该报同年“五一”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完整地登载了这一大跃进的口号。

55. 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66页。我对这一过程的解释与《问题与研究》1973年12月号第103页的解释有所不同。这一过程是以“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开始的。《问题与研究》认为:“河南提出了在四月、五月和八月收获的建议……”,这里把“四、五、八”解释为这一年的四月、五月和八月。然而,我认为“四、五、八”与《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中有关粮食产量的重要条款有关。在《纲要》中提出:黄河以北的低产地区的产量应把畜产从150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地区应从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以南的地区应从400斤增加到800斤,见《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6日的《纲要》的修正草案第2条。

《问题与研究》认为“水利化”只是指“蓄水”,有失愿意。最主要的是,该杂志没有揭示出河南所提目标的雄心勃勃的特征,忽视了河南提出是在一年内提前完成而不是在十二年完成《纲要》的目标。

56. 见《新华月报》1979年1号第103页的一篇回忆的摘录。该文对吴在大跃进期间的行为作了保护性掩饰,只是说他对1949年以后的河南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吴从其被贬默的前任手中有效的接管权力的时间尚不清楚,见张旭成《中国的政权和政策》第54—56页。
57.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22号,第1页。即使是在2月份,河南省也是在除四害运动中最有雄心的省份。
58. 见本书第1卷第86—88页。
59.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66页;《问题与研究》(1973年12月号第103—104页。在此,毛泽东表扬了农业集体集体化,并把周恩来在

湖南集体化运动中慌忙的做法同李井泉在四川从容不迫的步伐作了对照比较，以表明他不再坚持追求速度的立场。

60.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66页。
61. 同上，第167页。
62. 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谭震林透露在成都会议上可能已经考虑了增加的问题，见他在《红旗》1968年第6期上的一篇文章。在另一次会议上，他透露在成都会议期间“左派”的目标，见《批谭战报》1967年8月5日第1卷第2页。
63. 见《关于谭震林问题的初步综合材料(续编)》(1967年4月6日)，第3页。谭所说的毛泽东的话，在可以得到的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中并没有所说的那么多，不过，在毛3月20日的讲话中可以明显看到有这种指示(《问题与研究》1973年第12月号第103—104页)。
64. 见《彻底清算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同伙破坏农业机械化的滔天罪行》，《农业机械技术》第5期(1967年8月5日)，《中国大陆杂志选》610号第19页。
65.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56页。
66. 同上，第57—58页。
67. 见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的一篇文章。(引自赵罔：《共产党中国的农业生产》第95—96页)。
68. 关于对刘带有敌意的争论的描述，见《中国农业机械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农业机械技术》1968年第9期(《中国大陆杂志选》633号第7—10页)。关于集体所有的拖拉机的问题，见本书第1卷第15—19页。
69. 见《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00页。
70. 关于这一错误的描述，见克拉特：《作为亚洲国家榜样的苏联农业》，《中国季刊》1961年1—3月号第116—130页；赵罔：《共产党中国的农业生产》第91—93页。
71. 《中国大陆杂志选》633号，第10页。
72. 这是1957年3月12日上文的报告。引文出处同上。
73. 同上。
74. 见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59—60页。
75. 毛泽东的家庭农场的劳动力短缺是毛与他的父亲之间的争论的原因之一。在一次秋收事变中，毛站到他父亲的佃户一边，见陈志让：《毛和

中国革命》第22页。

76. 沃克:《农业生产组织》,见艾克斯坦、盖伦森和刘大中:《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向》第405--413页。
77. 《中国大陆杂志选》633号,第10页。从这个报导中还弄不清楚康的调查是否应毛之请而进行。但是调查的目的和结果都有赞同的意思。这一报导肯定表明,农忙时节的人力短缺是毛的争论中的主要理由,同上,第11页。关于康对机械化的支持,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10号第28页。关于康可能与毛有密切关系的介绍,见本书第1卷,第148页。
78. 引自赵罔:《共产党中国的农业生产》第96页。这篇文章的全文转摘自《中国大陆杂志摘要》120号第34—43页。黄敬于1958年逝世,据说他是毛泽东妻子江青的前夫,见朱浩建(音):《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中国季刊》1967年7--9月号第148—149页。
79. 赵罔:《共产党中国的农业生产》第96—98页,和黄敬:《农业机械化问题和工农业同时发展》,《学习》1958年1月18日。(《中国大陆杂志摘要》128号第42—56页)。
80. 《中国大陆杂志选》610号第23页。
81. 《问题与研究》1973年12月第103页。
82. 《中国大陆杂志选》610号第23页。
83. 《中国大陆杂志选》633号第12页。
84. 《中国大陆杂志选》610号第20页。
85. 《中国大陆杂志选》633号第13页。
86. 赵罔:《共产党中国的农业生产》第109页。
87. 同上。
88. 施瓦茨:《斯大林后的苏联经济》第115—116页。
89. 《全国拖拉机站管理人员、专家会议总结报》,《全国农报》1958年第5期。(《中国大陆杂志摘要》147号第21页)。
90. 见施瓦茨:《斯大林后的苏联经济》第116—118页中有关苏联取消机器拖拉机站的争论的叙述。
91. 《中国大陆杂志选》633号第13页。
92. 同上,第22页;《中国大陆杂志选》610号第11页。在另一资料来源中,对刘是虚伪地拥护这一政策的指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显然考虑了



所需经费的问题，见第5页。

93. 《中国大陆杂志摘要》157号第22页。引用的文化大革命中关于这次会议的评论(《中国大陆杂志选》633号第13页)，似乎与以前对当时会议所提出的报告第三部分的类似评论是一致的。但是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版本也没有以为这次会议是一个主要的转折点。
94. 《中国大陆杂志选》600号第3页。
95. 《中国大陆杂志摘要》147号第16页。
96. 集体所有的拖拉机的数量从1957年的2416台，增加到1958年17380台；国营农场的拖拉机数量从10177台增加到16955台；农机站所有的拖拉机数量从12036减少到10995台(赵罔：《共产党中国的农业生产》第109页)在中国所使用的拖拉机总数从1957的24629台增加到45330台。但在后一年里，本国生产的拖拉机尚不到1000台(同上，第107页)。文化大革命中对谭震林不关心公社管理农业机械的指责可能是事实(《中国大陆杂志选》633号，第22页)。
97. 施瓦茨：《斯大林后的苏联经济》第117页。
98. 《中国大陆杂志选》610号第27页
99. 有关苏联权力下放的评论，见施瓦茨《斯大林后的苏联经济》第117页。
100. 《中国大陆杂志选》610号第22页。
101. 见本书第1卷，第90页。
102. 《浙江日报》的社论，转摘自《新华半月刊》1958年7号，第127—129页。
103. 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10号第24页。
104. 刘少奇的讲话摘要(为《人民日报》4月16日社论提供了基本内容)，见《新华半月刊》1958年7号第126—127页。
105. 《中国大陆杂志选》610号第6页，据说在这里所说明反对这种犁的其他领导人是指彭真和薄一波；另一种说法是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他也受到批评(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10号第24页)。
106. 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142页；这一承认在正式出版讲话时，被删除，(《毛泽东选集》第511—521页)。
107. 《新华半月刊》1958年7号第126页。
108. 《中国大陆杂志选》610号，第24页。在《问题与研究》1973年第11月号和第12月号上，刊载的毛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里，我未发现这一引文。

109. 见1958年4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
110.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58号第11页。
111. 关于1956年1月版的第11条的解释，见《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3页；关于1957年10月修正版，见《当代背景》479号第6页，（第7条）。1958年5月版没有出版（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见本章以下内容）但是，在谭震林向会议作的报告中，对有关机械化条款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修改时，没有谈及犁的问题。见《当代背景》508号第7页。《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的最后文本在1960年4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被通过，此时大跃进即将结束，1958年的异常热情已经消退，这一文本也没有提到犁的问题。《当代背景》616号第8页（第7条）。关于这一时期对机械化和工具改革问题的详细评论见斯塔威思：《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政策》第93—101页、第109—125页。
112. 并不是所有的中央和省的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见《人民日报》1959年8月29日社论。
113. 见1981年1月25日《朝日新闻》报导，转摘自《外国广播新闻—中国—81—049（附录）》第5页。
114. 在毛的3月22日的讲话中，他赞扬了一些“反对他”的来信，并称赞这些对他的百花齐放政策提出批评的人们的直率。见《问题与研究》1973年12月号第11页；本书第1卷，第179—180页。邓小平指出持有与主席这些观点不同的看法是允许的，见《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摘编》第4页。（北京：“首都红代会人大三红批刘邓第一支队”，1967年4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的这些言论被用来抨击他本人，但我不相信这些言论会在当时被毛认为是犯不恭之罪，因为主席本人是赞许邓小平的批评的（见本书第1卷，第4—5页）。这一资料来源表明邓的言论是在4月7日讲的，但成都会议却是在3月9日至26日举行的（《中国百科年鉴》（1981），第562—563页）。然而，另一资料来源注明邓小平的这些言论是在毛泽东离开四川之前并且是毛本人在场时所讲的，见《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话》（《挺进报》1967年6月14日，第1卷第1页）。
115. 见《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摘编》第4页。

## 第一节 刘：有组织的动员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了主要报告。这是不足为奇的，他在18个月前八大的第一次会议上曾起了同样的作用。但是，在1958年的背景下，刘的作用在政治上显得更加重要。

虽然刘少奇1956年的讲话暴露出他和毛之间的重要分歧，但那一次的讲话实际上是对前景的一个展望，是一个论述11年革命和统治的情况报告<sup>②</sup>。然而，刘少奇1958年的讲话目的在于发动一场新的运动。把这次运动同1957年的整风运动相对照是令人深思的。

在1957年，毛泽东不得不担任主角，他利用自己作为国家主席的地位在两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定基调的讲话。刘显然没有在这两次会议上讲话，他也没有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而毛在这次会议上则作了另一次重要讲话。刘局限于向省委组织讲话，并且论述了有些不同于毛的方针。这就表明，他显然并不完全赞同这个运动<sup>③</sup>。

在1958年，刘紧跟在毛的后面，并且大跃进运动可以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而不是在低一级的政府工作会议上秘密地下达<sup>④</sup>。这位主席从而可以有把握地说，他这一次将得到绝大多数党的高中级干部对这个政策的支持，而不会象前一年那样了<sup>⑤</sup>。尽管毛泽东喜欢勇敢地直接把个人的意志下达基层，他可能也乐于“利用正常渠道”贯彻他的意图。

而且，刘少奇说明大会通过的政策时，表现了对毛泽东的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同他在人大一次会议报告中的调子恰成鲜明对照。在1956年的那次讲话中，刘只在几处提到毛的名字，他的目的似乎是要贬低这位主席的作用<sup>⑥</sup>。而在1958年人大二次会议上，刘讲到毛时又回复到他1945年向党的七大作报告时采取的高

唱赞歌的调子<sup>⑦</sup>。他以赞许的口吻回顾了过去3年毛泽东所有政策的创造性，当然他仔细地区分了当时得到和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支持的政策<sup>⑧</sup>。他特别称赞毛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经济发展的想法：毛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写的序言<sup>⑨</sup>、“多、快、好、省”的口号<sup>⑩</sup>、十二年农业纲要<sup>⑪</sup>和《论十大关系》（在刘少奇的讲话中第一次公开了它的基本内容）<sup>⑫</sup>。刘总结他的讲话时说，“由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方针和政策，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巨大的作用<sup>⑬</sup>。”在论述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时，刘宣称，从1949年以来，中央和毛泽东就统一得象一个人一样，他们“历来的主张同样是很明确的，即应该采取快些好些的方法，拒绝慢些差些的方法<sup>⑭</sup>。”

按刘少奇的说法，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的胜利，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革命运动”的到来，毛关于要更快地发展经济的号召已经“迅速地深入亿万劳动人民的心中，并且已经转变为无穷的物质力量<sup>⑮</sup>。”

53

结果，在1958年春天，大跃进已经在各条战线上被发动起来。1958年前4个月的工业产值比1957年同期高26%；4月份增长42%。1958年钢产量将达到710万吨，煤将达到1.8亿吨。增长率远远高于原先计划规定的指标，并且会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任何一年的增长速度<sup>⑯</sup>。在农业战线上，最引人注目的跃进是在水利方面，它证明群众的“力量可以征服自然<sup>⑰</sup>。”

在概述了其他领域中的巨大进步之后，刘少奇用一段表达大跃进基本精神的话作了总结：

事实是这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人们精神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人们精神的解放，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跃进；这种生产力的跃进，又继续刺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进和人的思想的前进。人们在不断地改造自然界的斗争中，不断地改造社会和改造人们自

己<sup>⑮</sup>。

马克思预言过，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会有1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如果说我们过去在革命中经历过这样的伟大时期，那末，我们现在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不又是在经历着这样的伟大时期吗？在这里，人们看到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怎样涌现出自己创造历史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sup>⑯</sup>。

人们可以从这段话中看到，刘展示了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结合起来形成的大跃进。在另一段话中，他强调了经济发展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

要知道，机器是要人来创造和发动的，物质资料生产是要经过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事在人为，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伟大的动力。<sup>⑰</sup>

毛泽东自己恐怕也不会表达得比这更加透彻了。

但是，比较一下两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就会看出他们在跃进的方式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别。他们都相信人比机器更重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个差别。

54

对刘少奇来说，关键问题是对群众的能量加以驾驭和组织。党的领导是至关重要的，他的确用一整段话来论述这个问题。<sup>⑱</sup>在其他地方，他还谈到“动员”世界上最大的劳动队伍的必要性，谈到为了发展经济而“组织”中国的革命农民的重要性<sup>⑲</sup>。即使在强调敢想、敢说、敢做的革新者的意义时，他继续说道，只有依靠人民，“我们才能领导全中国人民开展一个又一个的大跃进。”<sup>⑳</sup>（着重号是我加的）

## 第二节 毛：解放能量

毛泽东并不曾否定过党的领导，但意味深长的是，他在八大两次会议上所作的五篇著名讲话中都没有提到党的领导。除了这一否定性证据以外，还有肯定他自己观点的证据，即在他看来，大跃进的实质是解放群众的能量，而不是去组织群众的能量。5月8日，毛泽东在第一次向大会作讲话时说了一段关键性的话：

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现在开始发挥创造性了。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爆发出来。<sup>②</sup>（着重号是我加的）

在5月17日和20日的第二和第三次讲话中，毛批评了斯大林的概念：“干部决定一切”。他问，如果那样的话，那么“群众呢？”<sup>③</sup>毛泽东在5月23日即大会最后一天的第4次讲话中，更清楚地表述了这一观点：

先跟什么人？后跟什么人？我们要先跟人民。人民的干劲，人民的多快好省，人民的许多发明创造……所以说，先要跟人民，以后人民才跟我们……先是理论来源于实践，以后理论又为实践服务<sup>④</sup>。

在另一段公开发表的讲话中，毛讨论了一位大会代表的建议。这位代表说，跟着毛主席走，就不会犯错误。毛针对这个建议说：

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  
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担大粪的，要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要跟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正确部分。<sup>②</sup>（着重号是我加的）

毛泽东的态度确实比较谦虚。但在这个声明中明显缺少的是，他没有提到是党而不是任何个人掌握真理这一正统观点！（刘少奇赞同这个观点<sup>③</sup>）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不论在成都会议上还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都竭力动员干部们破除“迷信”，让他们相信，只要敢想、敢说、敢干，任何成就都可以取得。然而，他援引的前例几乎全是获得成就的个人<sup>④</sup>。最主要的是，很难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把成功的跃进看作是目标一致共同努力的6亿中国人而不是共产党的产物。

当然，假如有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向毛泽东挑战的话，毫无疑问他会坚决表明对党的领导作用的信念；他肯定会引用自己多年来说的许多话，加以证实<sup>⑤</sup>。但是，当毛明显地赏识党动员和组织中国人的能力时，也不能怀疑上面所引用的他讲的话，即这位主席把大跃进视为觉悟分子能量的爆发，而不是群众动员的杰出例证。

显然，如果党的作用是解放而不是领导群众，那归根结底党便不是不可替代的了。但是，毛到60年代中期以后才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当时他同刘的分歧是在哲学方面，而且也不明显，可能两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分歧。两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在大跃进中发挥主要的作用。

### 第三节 毛泽东保护计划制定者

毛和刘可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对大跃进的反对者采取的



不同态度，当然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分歧引起了两人之间重大的摩擦。

56 早在1957年11月，党中央三中全会在批准了恢复1956年初高潮政策以后，刘就提出了并发挥了毛在三中全会上关于两种不同经济政策的论述，但强调指出，这两种政策代表着两部分人的思想：

完成这个任务(经济建设)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做事情快一些、好一些，另一种方法是做事情慢一些、标准低一些。我们应当采取哪一种方法呢？党中央认为，我们应当采用前一种方法，拒绝后一种方法……过去两年的事实已经证明，有些人抱有模糊的怀疑态度和反对态度，妨碍了我们事业的前进，损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压抑了潜力的发挥。结果，不仅没有取得高的数量和速度，也没有做到好和省，只造成了人力、财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sup>①</sup>。

在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刘少奇论述了上述观点，支持了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有两条道路的观点。他特别引用了两年前发表的毛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在这个序言里，毛泽东主席指责那些反对更快地发展经济的右倾保守主义<sup>②</sup>。现在，刘研究了毛前两年关于加速经济发展的各种提法的某些细节，并完全赞成这些提法<sup>③</sup>。刘在结束这一段话时提到了那些不太赞成大跃进政策的人：

曾经对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表示怀疑的同志，许多人已经从这样一次反复中得到了教训；有些人却还没有得到教训，他们说：“到秋后再同你们算帐。”让他们等着算帐吧，他们总是要输的<sup>④</sup>。

提到秋后是不难理解的。秋后的收成如何将表明农业跃进是否成功。显然，大跃进的反对者预测大跃进会把农业搞得混乱不堪，造成粮食减产。

刘少奇对争论系统而详尽的描述，无疑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人们看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党在“最重要问题”上的基本分歧<sup>⑤</sup>。

57 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了“秋后算帐派”，但他又增加了“观潮派”的概念。“观潮派”显然是指对大跃进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骑墙派，他们在秋后“算帐”以后就会站到赢的一方的行列中去<sup>⑥</sup>。并且，当刘预言算帐派会失败时，毛认为，必须同算帐派进行斗争，以便“团结他们，而不能把他们排斥在革命之外”<sup>⑦</sup>。

毛的态度同邓小平在成都会议上的态度一样，似乎始终认为，反对迅速发展经济是错误的，是“右倾保守主义”，但并不是政治路线方面的根本错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路线的分歧会导致党内的严重斗争，例如文化大革命就被说成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观潮派”和“算帐派”的错误不那么严重。毛认为他们在大多数场合犯的错误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其余都是正确的<sup>⑧</sup>。必须通过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道路进行反复说明，以便把他们争取过来<sup>⑨</sup>。

毛的窘境就在于，他希望制止对大跃进可能持反对态度的政府官员，但又要保护他们的政治领导人物，其中包括他最老的和最忠诚的革命伙伴。1956年，反对那年跃进人包括总理周恩来、第一副总理陈云、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毛认为财政部尤其该受责备）、副总理兼负责农业口的国务院办公室主任邓子恢，以及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sup>⑩</sup>。

到了1958年，他们中大多数人认识到不能再抵制一场新的跃进了。周恩来已经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在反对1956年跃进问

题上负主要责任<sup>①</sup>。李富春和李先念在八大二次会议后被安排进中央书记处。薄一波作为刘少奇的长期合作者，承接了周恩来移交给他经济决策权力，地位得到了提高<sup>②</sup>。如果在上述人中还有什么“算帐派”或“观潮派”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邓子恢了（在大跃进期间被剥夺了他对农业的有效管辖权，正象1955年合作化运动中为了类似的理由遭到同样的厄运<sup>③</sup>）。而且通过以往的行为判断，陈云也是“观潮派”或者“算帐派”。值得回味的是，八大二次会议后《人民日报》登用的照片包括了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唯独没有陈云<sup>④</sup>。

但对于毛泽东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这批人中没有谁（可能薄一波例外）会由于政策分歧而与他发生重大的政治对抗，然而他的同盟者刘少奇在前一年曾表示，他和他的合作者（如彭真）准备用对待整风运动的态度对待大跃进<sup>⑤</sup>。毛泽东经受不住抛弃他比较忠诚的支持者，也不允许他依赖那些和他本人关系不密切的人。所以，当刘暗示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达到了“路线”性质的程度时（没有毛的支持他不可能明确地这么讲），毛却竭力降低分歧的严重程度。（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支持毛，文化大革命中只是抨击他的态度<sup>⑥</sup>！）

最有意义的是，毛异乎寻常地为周恩来辩护，赞扬他1957年6月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反右讲话，并清楚地暗示，周是在放弃了反对跃进政策立场后才作的这个讲话<sup>⑦</sup>。周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他在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可能是他作自我批评的时机）之前就改变了反对的立场<sup>⑧</sup>，毛的赞扬是为了消除这位总理作为当时在主要政策争论中已经失败的一派的领袖的形象。然而，刘在三中全会之前，思想上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甚至毛也必须承认，三中全会是政策发生公开转变的时刻<sup>⑨</sup>。

毛还阻止对周恩来和他的亲密同事的批判，着重指出这样做会导致党的分裂。他在两次讲话中认为这样做会引起不亚于一场

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出现党内分裂，就要乱一阵子。（如×××、高岗那样不顾全局，党就要分裂，就会出现不平衡，虽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中央委员都要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会摔跟斗……不顾大局闹分裂有什么好处⑤？

我是讲要防止大的、不利于人民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的大分裂⑥。

不论刘少奇有多么大的反对意见，毛都可能用类似上面的言谈期望他动心⑦。

#### 第四节 党坚持自己对政府的领导

如果说毛泽东能够保护国务院的领导成员的话，那么他不希望维护他们的下属官员。他在南宁会议上对财政部的抨击表明了这样一种信念：中央的官员是一种保守力量，必须使他们服从于更激进的党的领导。毛泽东自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以来，曾提倡分权⑧，他希望通过这个手段来达到上述目的。经过一些鼓励和18个月的酝酿，1957年11月对国务院终于制订了一项法令，决定把工业、商业和金融方面的大量权力下放给省级机关，实际上就是给省委⑨。后来在税收、价格控制、粮食管理、计划和物资分配管理领域经过仔细修改制定的三个主要法令，在1959年6月促使80%的中央政府企业移交给省里管理⑩。省里的权力增大以后，其效果之一，就是省和省以下机关领导的企业创造的工业生产总值份额，从1957年的54%增加到1958年的大约73%，而在财政领域里，中央政府的开支1958年下降了14%，省里的开

支增加了几乎150%，占了整个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sup>⑤</sup>。

60

根据最近披露的材料，在3年中转给地方的资金不超过30亿元至36亿元，外加4500万至9000万美元的外汇，似乎进一步证明早先已作出的分析：尽管毛极为反感的财政部将权力进行全盘公开的转移<sup>⑥</sup>，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保住以前的影响，这是很明智的行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设计权力下放方案的陈云（在财政方面得到了李先念的帮助），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指责为歪曲了毛的意思，大搞形“左”实右，还被谴责为在新体制下剥夺了国家大量税收。事实上，陈云在1957年9月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会上就说，权力下放的措施经过一年实践的检验可以修改。陈云预见到权力下放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并在全会上提出必须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以实现全国的平衡<sup>⑦</sup>。所以，虽然国务院及所属部委确实失去了不少权力，部委的数量由1957年的41个缩减到1958年的33个和1959年的30个——可是中央对全盘的经济管理没有放弃。中央的意图似乎是把监督权力转移到与各省省委有联系的党的书记处，使其在行使监督作用中处于关键地位。

在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央书记处的这个监督任务就显示了出来。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和财政部长李先念均被安排进了书记处，其目的估计是使他们能通过党的这个组织来实施监督。陈云当时正全面负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从苏联进口工业设备的工作，故未被安排进入书记处<sup>⑧</sup>。否则就要出现规格地位问题，因为陈云比总书记邓小平地位高。按照毛的观点，他有理由为陈云关于监督的强烈愿望很可能破坏权力下放的实施而感到担忧。这也可能是陈云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没有公开的原因。同时，位居第四的书记处成员谭震林从前一年秋天以后一直抓农业政策，成了政治局正式委员，这样就使他比副总理邓子恢的地位还高，并在大跃进中，担负起合法的主管农业的职责<sup>⑨</sup>。

61

这些变动不仅使书记处在经济中发挥出重要作用，而且提高

了它在整个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以前仅有两位书记，即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进入政治局<sup>①</sup>。而现在9位书记中有5位成为政治局委员，他们是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和谭震林。

然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处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的书记处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把他自己的支持者安排进入书记处，并且在赫鲁晓夫1957年夏天击败反党集团之后，便直接提升书记处成员进入主席团，以便替换那些被清洗的人。在中国共产党书记处中，所有成员都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不能指望这个机构立即变成在邓小平总书记领导下的一个“政治上团结一致，牢不可破的组织”<sup>②</sup>。邓小平和谭震林都与毛有直接的联系<sup>③</sup>。彭真和刘少奇的关系更为密切。<sup>④</sup>李富春和李先念既在书记处任职，又是国务院的重要领导成员，虽然同时在邓小平的手下，他们大概仍然忠实于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则采取谨慎措施，经常列席书记处会议，亲自了解书记处的情况。<sup>⑤</sup>

如果说，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国政治格局中不像会占有多大优势，可在1958年却有许多迹象表明它发挥了巨大的新作用。在1957年底以前，国务院与中共中央共同颁布的指示一直较少。1955年有1个，1956年有4个，1957年有7个，到1958年该数字一跃到17个，其主要内容大多与农业和商业有关。这个数字在1959年降到12个，然后，又突然降到1960年的5个，1961年降到零，1962年的2个和1963年又降到零。国务院再次在指导经济工作中表现出它的根本作用<sup>⑥</sup>。

62 政府机构作用降低的另一个迹象是，国务院全体会议次数的下降。1957年有26次，1958年却仅有16次，到1959年次数降到9次<sup>⑦</sup>。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会议次数同样下降，从1957年的37次降到1958年的13次<sup>⑧</sup>。在相当程度上，这些数字也反映在大跃进中实行的是“游击作风”的领导。党的高级官员花费更多的时间巡视全国，在现场进行鼓励和指导。他们没有时间和



兴趣返回首都召开正式会议，然后逐级按步就班地下达指示。

在中共八大后的全会上，另外两位人物的提升，进一步证明了权力下放后增强党的机构作用的方针。提升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进入政治局，说明了省级党委的重要性。可以推断，这些地方领导人被选中，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所在地点重要，上海是中央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占经费的17.6%，在1958年占33.2%<sup>⑥9</sup>。四川是全国人口最多也是最大的粮仓之一。毛的干预对柯庆施的提升也许很有必要。正是因为1957年柯庆施支持毛的整风政策<sup>⑦0</sup>，使他疏远了许多同事。全会结束时的一张有点突出的像片，把他们两位和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乌兰夫（政治局候补委员）照在一起，这便说明了他们两位提升的重要性<sup>⑦1</sup>。

但是，如果大跃进表明省级党组织干部权力的扩大达到了高潮的话，那末全会也提醒他们在几个月后由于工作不力将受到惩罚。在会议上审议并同意撤换11个省党的高级领导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被指责的主要事情是，在农村提倡保守政策，伤害了大跃进的积极分子<sup>⑦2</sup>。看来毛自己相信一些干部撤销职务无非是省级党组织权力斗争达到高峰的反映<sup>⑦3</sup>。可是，由于这是他在10个月前青岛会议上批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结果<sup>⑦4</sup>，毛本人便也无话可说了。事实上，到全会开会时他已接受了例行的决定，并指责那些被清洗的人是分裂分子<sup>⑦5</sup>。他所能做的只是为倒霉者中的一些人降低一点调子而已<sup>⑦6</sup>。

63

## 第五节 党对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权

如果这次会议及后来的中央全会表明党的组织对政府机构控制权力增强的话，那末，紧接其后召开的历时两个月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便重申党指挥权的原则。更具体地讲，这标志着毛



力图使人民解放军抛弃苏联模式，恢复它的延安游击传统的斗争已经开始。

早在两年前，毛通过赫鲁晓夫争取到苏联在核武器技术领域给予中国援助、从而中国将拥有核武器的承诺，使毛能够征得大多数同僚的同意，削减现代常规武器的经费，把资金转到经济发展投资上去<sup>⑦</sup>。这个承诺似乎能因为获得苏联的援助而更快地变为现实。将领们对常规武器的任何要求可以很容易不予理睬。结果，到1958年早些时候，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过去主张中国应该集中力量使常规武装现代化，让苏联承担发展核武器的任务的观点<sup>⑧</sup>似乎只好向毛认输了。在1月22日的讲话中，彭同意毛的主张，“我们的军队的现代化必须在国民工业的现代化的基础上来实现。”因此，这就含蓄地抛弃了通过向苏联全部采购的办法，来达到军事现代化的一线希望<sup>⑨</sup>。

一个带有妥协味道的新的部队训练计划在1月下达了。彭德怀看来是没有重视在人民解放军中加强政治工作，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一方面，未来的训练目标应该是“为了部队随时准备应付任何事变，继续提高现代军事技术，掌握在现代条件下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本领”<sup>⑩</sup>。

64

但是，在训练的基本任务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全体人员的政治觉悟，学习毛泽东的有关军事方面的著作。”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也要学习，换句话说，延安的经验仍然是适用的，不能以苏联关于现代战争的理论代替它。<sup>⑪</sup>这些让步和妥协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个训练计划似乎再也没有人提起了<sup>⑫</sup>。

2月22日，彭德怀在苏联红军建军40周年时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论述了苏联红军正确处理三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军队和党、军队和老百姓、军官和士兵。主张向苏联学习<sup>⑬</sup>，并为人民解放军在政治工作方面的落后而辩护开脱。他进一步以和解的姿态建议解放军应用整风的办法来改善那些关系。在前年的整

风运动中他却没有对此表态<sup>④</sup>。然而，他显然没有强调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必要性。

从后来的发展情况来判断，这个讲话也没有达到它明显的目的。但有一点值得提一下，在论及战略问题时，彭德怀元帅提到具有现代化武器的帝国主义武装力量就在中国的门口，台湾必须解放，中苏两国军队有充分理由联合起来保卫远东和世界的和平<sup>⑤</sup>。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就两国人民和军队为保卫社会主义集团和世界和平必须联合斗争的方针<sup>⑥</sup>作了空泛的表态。彭德怀是不是在对中苏共同防御协定进行试探呢？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马利诺夫斯基在彭访问莫斯科过程中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了吗？我们将看到俄国人在1958年下半年正式提出某种联合防御协定，而正是这点引起了毛的强烈反对。如果中国国防部准备支持苏联的建议，这势必要加深彭德怀与党的主席之间的裂痕。

65 因为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多年愈来愈大的隔阂，也由于军队本身的特点，毛无疑知道他要加强对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控制的意图会遇到反对。况且，一旦出现了抗拒，毛必定会意识到这种抗拒将是有力的，因为在政治局中有7位元帅（军人的显赫地位正是由于人民解放军在中共的胜利中起过重大作用，这是苏联军队无法比拟的）。尽管彭和其他将领对党的领导从未有过疑问，毛仍会记得，他们有时就不服从他<sup>⑦</sup>。

所以，毛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提升彭德怀的潜在的对手，从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看，选择林彪元帅出任政治局常委是八届五中全会上最重要的人事变动。这位比较年轻（51岁），而一般不抛头露面的元帅，（据传身体有病），就这样成为中国7位最高领导人之一。从1954年开始，他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现在与彭德怀相比明显地突出起来了。林彪与彭德怀之间长期存在的嫌忌虽不明显，但是对中国领导人来讲是清楚的<sup>⑧</sup>。毛虽然不能预见到大跃进失败的后果，以及彭德怀利用这个失败对他进攻，但是他

很可能把他的助手林彪安插在能控制住国防部部长的位置上<sup>⑧</sup>。

维护这种优势的唯一可行的组织方法，就是通过毛自从1935年便一直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显然，自从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可能是因为毛忙于新政权的建设<sup>⑨</sup>，军事委员会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看来彭德怀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后，实际上负责军委的工作。据说彭德怀不喜欢党的监督，他宁愿军委被撤销或用一个不直接对中央负责的、名声较低的机构代替<sup>⑩</sup>。林彪的提升意味着军委有了一个在政治地位上比彭德怀高、具有能与彭德怀相匹敌的革命声望和专业知识的、并有时间献身于部队日常事务的副主席。

66

然而，看来毛没有用直接的方式安排林彪从彭德怀手里接过军委的日常工作<sup>⑪</sup>。毛从5月27日到7月22日召集了军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1000多名高级官员聆听了中国10大元帅中的9位元帅的讲话，其中彭德怀排在最后作总结发言。两位文官也讲了话，即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也许是毛的一个策略。重申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最好由到会军官的老首长来讲更容易被接受。令人注目的是，自从1935年以来，军委几乎一直是由军人组成的，仅有毛自己是例外。按毛经常引用的信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有理由假设主席采取了步骤以保证他的高级文官同事中没有另外人能直接指挥这个控制政权的机构<sup>⑫</sup>。

军委会议的焦点在于如何使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继续忠实于延安传统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无独有偶，在会议开始前4天，林彪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文章。在这里，他不仅赞颂了主席的著作，而且他还称赞工农出身的飞行员，批评了苏联顾问（特别有意义的是，刘正是一个曾在苏联学习过的人），批评外国的那种通过过分的安全保卫措施把官兵隔开的作法，并再次肯定在这个现代化军队中党委和政委的作用<sup>⑬</sup>。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从一个人民解放军中用先进武器装备军种的司令员的角度，

赞同毛的教条，即在战争中起决定因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在军事上同样可以运用人能够征服自然的大跃进精神。

67 按照刘亚楼文章的观点，毛在军委会议期间指名表扬刘亚楼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作者手头没有毛谈话的完整文本，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毛希望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对苏联军事模式采取更加批判的态度<sup>⑤</sup>。刘亚楼的文章和其它重要的证据表明党和军队之间进一步紧张的关系，以及毛在军委会议上势必坚持采取的措施<sup>⑥</sup>首先是围绕政委作用的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中国的司令员们企图像苏联那样削弱政委的作用，降低党委的地位，坚持认为政治控制会影响在现代化武装力量中和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军事效率。军委扩大会议尽力扭转这个方向，尤其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一些人认为过了时的问题的必要性<sup>⑦</sup>。在苏联，朱可夫下台之后重新对红军进行政治控制的主张很可能在道义上帮了毛的忙。

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官兵之间的关系。由于从1949年以来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和更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就是苏联式的军官组织体系，使游击队司令员和他的战士那种同志式的关系荡然无存。征兵制度以及那些在经验与出身经历方面和高级军官类同的老游击队员的复员同时实施。而且，新型的“资产阶级军官”不是从连队提升上来的，而是通过1949年以后的军事院校培养出来的。他们的等级观念往往比较强，并且轻视农民出身的士兵<sup>⑧</sup>。

估计前来参加会议的军官们听取并讨论了党的建议以补救这个缺陷。9月20日，即会议结束两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除年老的、身体虚弱的、有病的之外，全体军官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每年下连队当一个月兵；没有经连队锻炼而提升的年轻军官必须像所有老兵那样，在第一年下连当兵6个月。到1959年2月，大约150000名军官，其中包括160名将官，执行了这个指示<sup>⑨</sup>。

军委后来采取的措施说明了毛对等级制度、官僚主义和不公平待遇如此深恶痛绝，这个态度触发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措施表明了使人民解放军继承延安传统的真诚愿望。虽然，很清楚，毛也一定想要阻止一个团结紧密的中国军官阶层的形成，这种成长由于解放军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可能对党构成长远的威胁。没有谁该忽视毛对彭德怀在1956年至1957年的事件中的不同意见所产生的恶感<sup>⑥</sup>。

……赫鲁晓夫关于帮助制造核武器的承诺的重要性已经在前面叙述过了。但是，从1958年早些时候开始，苏联的行动使毛怀疑赫鲁晓夫的承诺究竟有几分诚意。

3月14日，赫鲁晓夫在加里宁暗示苏联要声明单方面废除核试验<sup>⑦</sup>。3月31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一个决议，停止全部核试验<sup>⑧</sup>。赫鲁晓夫紧接着于4月4日写信给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世界其他领导人，其中包括周恩来总理。

信中有一节，必然会使中国领导人进行思索：

迄今只有3个大国——苏联、美国和英国拥有核武器，所以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可是，如果现在试验不停止，那末一段时间以后，其他国家可以成为核武器的拥有者。在这样的条件下要达成停止核试验的协议当然就将成为更复杂的事情了<sup>⑨</sup>。

69 如果苏联总理——赫鲁晓夫这时在最高苏维埃代替了波德戈尔内，成为党政两方面的领导人——希望在中国研制出自己的核武器之前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他要帮助中国人发展这类武器的诚意有多大呢？赫鲁晓夫的创议会失败吗？在那种情况下，按照苏联总理的信，俄国人可以随意恢复他们的核试验<sup>⑩</sup>。

西方最初的反应是冷淡的，部分原因是美国人将要开始新的

一系列试验。杜勒斯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的行动是打算阻止这些试验或使美国丧失声誉<sup>⑤</sup>。但是，美国人无法立即拒绝这个提议，在艾森豪威尔4月8日的复信中，他建议美国和苏联的技术人员应共同研究监视试验的办法<sup>⑥</sup>。4月22日赫鲁晓夫复信拒绝了这个建议。其后，在5月9日的信中又出人意料地同意了<sup>⑦</sup>。

中国人对赫鲁晓夫的创议的回答必然是正面的。周恩来4月13日给苏联总理的信中，答应中国政府全力支持这一创议。尽管就像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周恩来还没有提到更多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危险<sup>⑧</sup>。到这个时候，中国人很可能研究了美国人的反应，也许会清楚地推论出赫鲁晓夫的建议将由于东西方在试验监督方面的分歧而告吹。但是赫鲁晓夫在5月9日的信中对这个问题作出的让步表明了一个意料不到的突破，呈现在中国面前一个新的形势。中国人不得不承认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也许能达成，那将使中国排除在核俱乐部之外<sup>⑨</sup>。

我们不知道莫斯科是否就赫鲁晓夫在5月9日信中的让步事先通知了北京。但在5月初，中国人可能开始怀疑，他的主动创议不单是想取得宣传上的胜利，而且表明了要实现禁止核试验的诚意。几乎可以肯定，这样的疑虑导致中国人第一次公开表示要制造核武器的决心。不管怎么说，在5月10日上午，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接见两位西德记者时，告诉他们中国可能在“将来”或“不久的将来”，拥有自己的核武器<sup>⑩</sup>。两周之后，刘亚楼在军委会议前夕发表文章，告诉苏联，中国将利用自己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在“不久的将来”制造出自己的核武器<sup>⑪</sup>。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副总理聂荣臻元帅在当年晚些时候证实了这件事情<sup>⑫</sup>。在这个事件之后，毛提出10年时间足够制造中国的核武器（这一次主席过低地估计了中国的发展速度），这也表明他不再指望苏联的帮助<sup>⑬</sup>。

刘亚楼的信息不只是一是要借赫鲁晓夫的弓射出自己的箭，它起



了保证毛建立一支以核武器装备起来的具有延安作风的军队的可靠性，它可避免在现代常规武器上进行巨额投资。对毛来说，虽然赫鲁晓夫近来的外交手段，暗中损害了他给中国原子弹样品的承诺，却使彭德怀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上，新出现的形势对他不利。他原来有这样一个设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与苏联武装力量之间进行分工，而这种分工必须建立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信任的基础上。赫鲁晓夫禁止核试验的建议，说明俄国人对帮助中国获得核武器不是诚心的。同时还证明所谓的秘密协议是一场骗局，这只能导致中国军方对同苏联合作丧失信心。的确，虽然当初毛对赫鲁晓夫的提议肯定感到失望，但毛不像彭德怀那样，他能借此启发人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走自己的路，依靠中国自己的资源，自力更生。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时发表的文章表明，无论彭德怀态度怎样，至少，其他几位元帅准备跟随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老、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肯定了中国革命经验和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并主张在这个基础上有选择地学习苏联的经验<sup>⑩</sup>。贺龙元帅在论述南昌起义时，回避苏联的军事理论和实践，只是强调30多年来“我们的武装力量是遵循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和军事行动原则的”<sup>⑪</sup>，虽然没有宣传毛的观点，但是，在8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的他在刘亚楼陪同下视察一个空军基地的照片，表明了他的共鸣<sup>⑫</sup>。

## 第六节 党维护在外交活动中的地位

赫鲁晓夫的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建议，除了对中国领导层内部关于中国军事现实和理论的争论产生影响外，同样会引起毛对苏联外交政策动向的忧虑<sup>⑬</sup>。在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态度比1955年夏季以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强



硬。他重申了毛关于全球权力中心从西方移向东方的分析，强调资本主义世界各国间相互经济纷争，并谴责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行动。最重要的是，他拒绝了外交界鼓吹的“两个中国”的主张，重申了中国要解放台湾的决心，一反在前两年里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常态<sup>⑭</sup>。

但是，周恩来的讲话，仍然表明了，在关于南斯拉夫这个重要问题上的稳健姿态。俄国人已经发动了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以表示他们对铁托拒绝参加前一年11月莫斯科会议并重新加入这个集团的不满，对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继续独树一帜也表示不满。但是，周恩来在谈到匈牙利事件时，只暧昧地提到“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sup>⑮</sup>。并且，他提到南斯拉夫时也是友好的。他把它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并列举了南斯拉夫副总统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如匈牙利的卡达尔和保加利亚的尤高夫先后对中国的访问<sup>⑯</sup>。

也许是赫鲁晓夫的禁止核试验的建议导致了后几个月中中国对南斯拉夫态度的突然较变。……南斯拉夫问题也许可以看作是对影响苏联政策的实际有效而婉转的方法。

72 4月5日，俄国人声明他们将不派代表团参加即将召开的南斯拉夫的党代表大会，4月18日，在大会召开的前3天，苏联共产党的刊物《共产党人》攻击南斯拉夫新制定的党纲是修正主义的纲领——它倡议共产党国家的不结盟和中立，主张非共产党党派能代表非共产主义世界的进步，并强调了所有共产党是平等和自治的。但是，虽然苏联的攻击是严厉的，但它们承认在国与国的基础上南斯拉夫还是朋友，在党与党的基础上是同志<sup>⑰</sup>。

5月5日，在南斯拉夫党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中国人对南斯拉夫的批判没有包含这些礼仪性的词令，而是简单把铁托和他的同事称作为南斯拉夫党的“领导集团”，并含蓄地指出，他们的“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纲领是按照美帝国主义的要求出台的。……

⑭……

然而，认为党的机构剥夺了国务院职能，或者说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变得无足轻重，这是一个错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结束，周恩来便离开北京前往朝鲜，与金日成就朝鲜战争结束后仍留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撤军问题进行谈判。

正如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话所表明的那样，他不得不遵循毛在外交事务上更加强硬的路线。此时，虽然一些中立国家在1958年已经感到，中国的态度从亲切变成凶猛，但这个态度并没有影响对南亚和东南亚中立国家的基本政策<sup>⑮</sup>。正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友——日本第一个受到这凶猛政策的冲击。

1957年至1958年的秋天和冬天，日本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国进行实质性贸易谈判……在1958年3月5日便得以签署了一个贸易协议。然而，5月2日当一个日本青年把长崎一座供中国展览邮票的房屋顶上的中国小旗摘下来并把它撕碎时，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反应；外交部长陈毅发表声明，提出这一事件表明日本岸信介政府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sup>⑯</sup>。5月10日，在东京的中国贸易代表团通知日本，所有业务都将被终止。

中国人对“红旗事件”的迅速反应出于以下一些原因：对岸信介提出的关于贸易往来不能影响日本不承认北京政府的政策的愤怒；东京对蒋介石的再度保证；日本与美国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前景；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挫败在任首相<sup>⑰</sup>。据一位学者说，“消息灵通的日本人士一般认为，中国的这个决策完全是政治性的；它是由陈毅自己制定，提交到政治局批准的”<sup>⑱</sup>。

我们不能肯定“消息灵通的日本人”的判断是否正确。但是，这种说法也许是公平的，即从气质上看，中国新的外交部长非常适合中国开展新的外交攻势。根据一个有权威的传记评论，“大部分报导表明陈毅是一个具有相当机智、并且生性直率的知识分子……”<sup>⑲</sup>在其后的年代里，作为国内战争中功绩显著的将军兼诗

人的陈毅,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中有许多直率事例:1959年10月威吓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sup>⑮</sup>;1960年4月在加德满都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就中印边境争端问题表达的愤慨<sup>⑯</sup>;1961年在日内瓦会议就老挝问题谈判的干脆风格<sup>⑰</sup>;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审问他时,他所表现出坦率的自我辩护<sup>⑱</sup>。

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选择陈毅元帅任外交部长,而没有选其他类似能干的人。他早些时候便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四位中国主要领导人有亲密的关系,而且似乎缺少大的政治野心<sup>⑲</sup>。假设他是所有人的朋友,没有一个敌人,他可以被当作一个比较中立的候选人为他提供一个可以让他充分发挥个性的职位。事实上陈毅似乎满足于继续在外交事务方面接受周恩来的领导。但是,由于大跃进时期周恩来忙于到各地视察,留在北京的陈毅,能在他的接触和言论中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刻划一个必要的、比较粗朴的形象。陈毅的不幸是,当文化大革命以后(译按:原文如此),中国恢复了他在联合国的席位,并进入了一个与一般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更友好的关系时期,政治上的逆境及多病的身体使他不能以他性格中欢乐形象显露在外交场面上。

## 第七节 在十三陵水库

5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结束,接着就是25日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会上,林彪和其他人正式接受任命<sup>⑳</sup>。同一天,毛带领他的大部分高级同僚到首都附近的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其后一个月,周恩来率领着一个包括500名中央委员和政府官员的队伍,在那呆了5天,住在附近的学校里,每天从下午3时干到11时<sup>㉑</sup>。叶剑英元帅抽出时间去写诗<sup>㉒</sup>。更重要的是,这支安营扎寨的劳动大军所提供的景象,标志着毛决心通过领导和群众的行动,共同恢复延安艰苦奋斗的作风<sup>㉓</sup>,并象征着其后几

个月把体力劳动置于一个重要的地位。动员更多人参加劳动的任务将赋予一个崭新的地方组织：人民公社。

**注释：**

1. 参见前面有关章节。中国共产党的新章程是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这一新章程规定每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曾有过在1957年下半年举行第二次会议的打算，但是，正如已经表明的，这次会议被推迟，以便毛和他的同事们先去动员干部和群众。八大的第二次会议最后成为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的唯一的一次年度会议，而且，本应在八大举行后五年举行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69年才举行。
2. 见本书第1卷，第184—217页。
3. 同上，第184—217页。
4. 整风运动是从1957年4月30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开始的。最高国务会议的这次会议没有公开报道，即使到现在，也对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说的话知道很少。而且即使传出来的那一点讲话的内容也引起了争论。见第1卷第210、278页，第十五章注53和第十八章注41。整风运动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的，但是即使这个事实也有人提出争论，甚至《人民日报》社论也加以否认，同上，见第212—217页。
5. 关于各省党的干部反对主席发动整风运动的情况，见本书第1卷第249页。
6. 同上，第100—105页。
7. 见刘少奇《论党》第8—10页。
8.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19页、第424—426页。例如，刘少奇明确指出，毛在1955年关于集体化的讲话和1957年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表的。此外，他在谈到后一个讲话时，并不把它作为一个讲话而是作为一篇文章，这就强调他仅仅同意经过修订的版本。（关于出版前对讲话进行了修改的情况，见本书第1卷，第261—267页。）
9. 见本书第1卷第26—27页。
10. 同上，第30—32页。

11. 同上, 第27—29页。
12. 同上, 第57—74页。有趣的是刘少奇指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他在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供了主要内容。(《共产党中国, 1955—1959: 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26页)这可能既是为自己的报告的一种辩护, 也是一种调和姿态, 因为刘肯定知道毛并不喜欢他的报告中的某些观点。
13. 《共产党中国, 1955—1959: 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26页。
14. 同上, 第425页。
15. 同上, 第422—423页。
16. 同上, 第422—423页。
17. 同上, 第423—424页。
18. 同上, 第424页。
19. 同上。
20. 同上, 第436页。
21. 同上, 第436—437页。
22. 同上, 第430—431页。
23. 同上, 第437页。
24.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95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192页。
25.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105页。
26.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218—219页。
27.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107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206页。
28. 参见斯图亚特·施拉姆:《毛泽东和刘少奇: 1939—1969》,《亚洲观察》1972年4月第277—278页。
29.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92—95页。参见上第41页。
30. 参见1949年毛泽东的论断:“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如果没有一个革命党, 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和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 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的革命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引自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18—319页。

31. 引自刘少奇11月6日在北京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参见《共产党中国, 1955—1959: 政策文件及分析》, 第399页。
32. 同上, 第424—425页。
33. 同上, 第426—427页。
34. 同上, 第427页。
35. 同上, 第429页。
36.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102页, 第105页、第106页。
37. 同上, 第106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205页。
38.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107页; 参见同上, 第155页; 邓小平在成都, 参见《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论摘编》(北京:“首都红代会人大三红批刘邓第一支队”, 1967年4月)第18—19页。
39.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105页。
40. 见本书第1卷, 第88—89页。有关毛泽东与周恩来、邓小平的关系, 见同上, 第7—9页, 第一章注36。李富春的妻子蔡杨是这时的中央委员, 她是毛泽东早年最亲密的朋友蔡和森的妹妹, 蔡和森在革命中去世。(见施拉姆:《毛泽东》第37页)
41. 见本书第1卷, 第88页、315页。
42. 同上, 第58页, 第五章注3。
43. 同上, 第18—19页。
44. 见麦克法夸尔:《论照片》,《中国季刊》1971年4—6月号, 第296—297页。以后的通信见《中国季刊》1971年7—9月号, 第552页。照片上有陈云出席这次会议(《人民画报》), 1958年7月, 在刘少奇作大会发言的照片中, 陈云清晰可见。
45. 本书第1卷, 第3、4编到处可见。
46. 《推进报》1967年3月26日, 第4版。
47.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103—105页, 在同一个讲话中, 毛泽东提出“高潮”延续到1957年6月。
48. 见本书第1卷, 第315页。
49. 关于刘少奇, 见《共产党中国, 1955—1959: 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27页;

- 关于毛泽东，见《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16页。
50.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09页，同样用了神秘的×××，所指何人，不清楚。
51. 同上，第113页。
52. 见本书，第1卷，第311页。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的提法：要注意分裂的可能。
53. 同上，第67—68页。
54. 这3个法令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65号，第1—10页中被译出。《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60—69页。按照毛自己的说法，《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2卷，第311页)八届二中全会之后，他还在为权力下放做工作。
55. 参见，拉迪：《中国财政管理的集权和分权》，《中国季刊》1975年1—3月号，第28—29页。
56. 同上，第29页。
57. 同上，第51—53页，这个数字见陈云在中共三中全会上的讲话，《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59页。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可能只是从讲话中摘录出来的。关于权力下放问题的广泛讨论，见舒尔曼：《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175—178页、第188—219页。
58.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58—59页；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94页。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谴责，见《北京公社》1967年1月28日，第2页。《炮轰李先念》(“北京公社第八战斗队”，“中央财经学院红代会”，1967年4月)第31页、第33页。另一个对陈云大跃进时候的冗长攻击，没有提到他1958年犯的任何错误。《财贸红旗》，1967年2月8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72号，第14页。
59. 《人民的好总理》第3辑，第32页。
60. 不清楚为什么谭震林不能真正地代替邓子恢做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领导，最好的假设是毛泽东不愿意使一个早年党内斗争效忠于他的人降职。本书第1卷第一章注36。选择谭震林接替邓子恢也是很策略的，这两个人在30年代曾共同工作过，谭震林可能比别人更乐意保护邓子恢的自尊(见谭震林、邓子恢传，科林和克拉克的《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还必须注意到，谭震林和任何人一样对“秋



后算账派”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在代表会上最后一次关于《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的讲话中，提到了这一点。《当代背景》508号第2页。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人说谭震林指责邓子恢直接违背毛的农业政策。参见《关于谭震林问题的初步综合材料》（彻底粉碎谭震林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联络站，1967年3月17日）

61. 彭真可能实际上是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参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39号第18页。1966年陶铸在成为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之前，担任了常委会秘书长。《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32号，第19页，可能彭真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担任过同样角色。
62. 这个词最先是60年代中期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用来描绘英国海员罢工的领导人的。从那以后成为英国的政治词汇，通常情况下是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威尔逊夸张地描绘了海员的领导人）。
63. 关于邓，见本书第1卷第140页。谭震林是毛泽东早年的追随者，参加了1927年的秋收起义，后来又随毛泽东上井冈山。
64. 同上，第146页。
65. 《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第70页。
66. 张万山（音）：《共产党中国的国务院：结构和功能分析：1954—1965》第57页。
67. 同上，第68页。
68. 同上，第33页。
69. 见拉迪：《中国财政管理集权和分权》第56页。
70. 本书第1卷，第18章。
71. 见麦克法夸尔：《论照片》，在这本书中我认为对乌兰夫的处理隐含着缓和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姿态。
72. 见泰韦斯：《中国政治及清洗》，《中国季刊》1960年7—9月号，第17页。
73.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一个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讲话中提出：在浙江，个人之间的权力争夺已结束。浙江的第一书记江华战胜了省长沙文汉，毛泽东曾反问：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问题与研究》1973年11月号第97页）这样的问话有损于胜利者江华的形象。但是，毛泽东接着说，在另外7个省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除了两个省外，其他5个省的结果都明朗了。（文件参见《当代背景》487号）

74. 被清洗者的罪名是地方主义和个人主义。参见泰韦斯：《中国政治及清洗》第22—30页。在青岛，毛泽东指责了这些错误。参见本书第1卷，第285—289页。
75.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14页。
76. 同上，第121页。毛泽东暗示不要惩罚古大存、冯白驹，广东省的这些高级干部被指责犯了地方主义错误(参见《人民手册》1959年，第16页；泰韦斯：《中国政治及清洗》第23—24页)。如果事情象我在本书第1卷中分析的那样：毛对广东省第一书记陶铸没有好感，毛会保护陶铸在本地的批评者古大存和冯白驹，这两个人前年曾使陶铸辞去广东省长的职务。广东是毛在成都会议上列出的有权力之争的省份。

潘汉年是上海市的负责人，1955年7月，以反革命罪名被逮捕。(参见他的传记，联合研究院：《共产党中国名人录》)他的案子绝对不可能因为1957—1958年省级干部的清洗而同时得到复查。在会议公报列举的复查案件中，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如果讨论了他的问题，就他的重要身份而言，一定会提到的，在这里很可能是毛泽东把潘汉年与潘复生搞混了，后者是河南省委书记。在会议后期，毛提到潘××是一个犯错误的人，允许他改正，(《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15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版毛的文章，隐去名字或部分地隐去名字都是为了限制传播，都是为了保全那些当时毛提到时犯了错误，而到文章出版时又恢复了职务的人的面面。潘复生可能属于这类情况。他从省级职务上被罢免后，一度消声匿迹，直到1962年又出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1969年编辑毛泽东文选时，他从候补中央委员擢升为九大的正式中央委员。

不清楚为什么毛为潘复生辩解，而又特别称道他的继任吴芝圃(参见毛泽东言论集《大海航行靠舵手》第24页)。但在关于潘复生案件的文件中，提到1957年潘复生敢当面欺骗毛主席(《当代背景》515号第2页)这表明毛在参观河南时，曾赞扬过潘复生。毛只是在河南代表团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同意清洗潘复生。在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尽管潘复生事实上放弃了工作，在北京呆了10个月，但是河南省还是迅速地清洗了他(同上)(河南省的干部说，潘复生的再现是他看到1957年春有了掀风作浪的机会，就在久病之后返回河南。也可能是毛为了发

动整风运动，迫切希望得到省级干部的支持，鼓励潘复生返回这个位置)。

在代表会议上，毛可能被迫把潘复生和广东的冯白驹、古大存列入搞分裂的名单，但他是可以把他们的名字从名单中删去的。(《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14页)。毛的这一态度，使这3个人在代表会议的公报中在8个人中间依然被称为同志。毛的愿望部分地得到尊重。毛引人注目的宽厚不是在代表会上，而是在只有代表团团长参加的人数有限的会议上，这可能是他想先看一看他们的反应，再作最后的决定。参见张旭成：《中国的政权和政策》第40—44页。

77. 本书第1卷，第66—74页。

78. 同上，第69页。

79. 引自谢兰莉(音)：《共产党中国在核时代的战略》第109—110页。

80.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86号第6页。

81. 同上。

82. 福特：《现代武器和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季刊》1964年4—6月号，第162页。两天以后，发表了苏中两国签署的技术合作计划。这件事大概使毛泽东相信了苏联帮助发展核技术、装备解放军的保证。

83.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19号，第26—31页。

84. 本书第1卷，第242页。

85.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19号，第26页；《新华半月刊》1958年6号，第116页。

86. 1958年2月23日《人民日报》。

87. 1940年著名的百团大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事件。在1967年以前一直没有公开谴责彭德怀违背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战略(《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212页。)但是查阅这一时期的文件表明这一谴责可能是事实，并不是通过回顾历史来破坏彭德怀的名誉。

在1938年11月，毛在一篇文章中把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反攻；在相持阶段游击战是主要的作战形式，正规战是辅助形式。(《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29页)。1939年10月10日，他写到相持阶段已经到来，只有日本方面或国民党方面能打破这种局面，同时，共产党应该利用这一时机准备反攻(同上，第297—299页)。1940年3月，

在发动百团大战之前,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现阶段是战略相持,仅在5个月之后,共产党就投入115个团(译按:实际为105个团),40万军队对日本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一进攻虽然有相当大的初期效果,但最后使共产党遭到日方的猛烈反攻,到1941年,八路军减到35万人。(参见约翰逊:《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第215页;吉廷斯:《中国军队的作用》第303页)。关于30—40年代毛泽东军事理论在贯彻中遇到阻力问题,参见惠策恩:《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第1章。

88. 在一个和周恩来会谈的报告中证实:毛对彭德怀和林彪怀有反感。参见《美国的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359页。
89. 关于林彪在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挑拨离间的问题,参见本书第1卷,第142—143页,第146—148页,第十一章注29,和本卷的第一章。在本书第1卷中,我暗示关于继承人,毛可能不是希望刘少奇,在他内心似乎赞同林彪和邓小平是更合适的继承人候选人。
90. 关于军事委员会的相对静止时期的报导,参见鲍威尔:《军事委员会和党对中国军队的控制》,《亚洲观察》1963年7月,第349—350页。吉廷斯:《中国军队的作用》第282—285页。
91. 《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176页。
92. 我们不能绝对地肯定这时林彪是军委委员,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大。现在有一些传记说他在1951年成为军委成员(见联合研究院:《共产党中国名人录》)。到1961年,除朱德、外交部长陈毅和被罢黜的彭德怀外所有的元帅都是军委委员(吉廷斯:《中国军队的作用》第287页),这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1958年也是这种情况。根据另一个资料,陈毅是名义上的军委委员,但他不参加会议,《中国大陆杂志选》637号第38页。
93. 1935年毛泽东接手负责军队,周恩来任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地图选》第22页)。到1949年以后,周恩来似乎放弃了这个职务。尚不清楚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是仅以党的总书记的身份发言或者还兼有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如果他还兼任后一个职务,这就进一步证明他与毛关系密切。参见本书第1卷第140—145页;《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的最后一部分第25页。关于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参见鲍威尔:《军事委员会和党对中国军队的控制》第350页,吉廷斯:《中国

- 军队的作用》第286—287页、310页。资料出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24页。
94.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00号第5—10页，刘少奇和林彪的联系参见科林和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中的刘少奇传。
  95.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15—21页。
  96. 这个题目的权威著作是乔菲的《党与军队：中国军队干部的职业化和政治控制：1949—1964》。其后的研究主要依靠这本专著。
  97. 同上，第57—72页、第121—129页。
  98. 同上，第72—80页、第106—119页。
  99. 同上，第133—138页。这些新干部的另一特点是他们和他们家庭享有特权，脱离百姓。1957年晚些时候，党已经采取了抑制特权的步骤。（同上，第80—84页，第129—133页）。毛泽东强调在解放军中要讲求平等的例子，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8—329页。
  100. 例如，彭德怀曾建议从1956年的党章中删去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本书第1卷第100—102页。
  101. 从他的讲话中抽出一部分，改写为《裁军问题文献（1945—1959）》第2部分，第967—968页。根据杜勒斯透露，美国人清楚地注意到这个暗示。（《美国对外政策：当代文献，1958年》，第1306页）。
  102. 《裁军问题文献（1945—1959）》第2部分，第978—980页。
  103. 同上，第981页，参阅《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53号，第45页。
  104. 同上，第982页。
  105. 《美国对外政策：当代文献，1958年》第1304页。
  106. 裁军问题文献（1945—1958）》第二部分，985页
  107. 参见同上，第1003—1004页，4月22日的信；同上，第1038页，5月9日的信。“意外地”是乔治·奎斯特在《核时代的外交：最初的二十五年》中的评论，第182页。
  108.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53号，第43页；谢兰莉（音）：《共产党中国在核时代的战略》第107页；福特：《现代武器和中苏关系的破裂》第165页中暗示这10天内中国没有作出答复具有某种意义。中国人可能要使自己相信，美国的反映将是否定的；但是应该注意的是：直到4月21日联合王国首相的答复才在莫斯科提交。

109. 东西方专家在7、8两月会晤后,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初看起来表明在核查禁止试验的新形式方面有很大的一致性。见奎斯特:《核时代的外交:最初的二十五年》。
110. 谢兰莉(音)《共产党中国在核时代的战略》第107—108页;梅纳特:《北京和莫斯科》第304页。赫鲁晓夫的信5月10日上午才提交华盛顿,如果陈毅事先被告知,他只会知道其大概内容。
111.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00号,第1—10页。
112. 引自他8月2日的文章,参见福特:《现代武器和中苏关系的破裂》第16页。
113. 陈志让主编:《毛泽东论文集》:文选及书目第84页。
114. 《当代背景》514号第1—4页。
115. 同上,第6页。
116. 现在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这就是刘亚楼,因为《人民日报》的照片说明,没有登出毛泽东两位陪同者的名字,也很少有刘亚楼的其他照片可作比较。照片上的第三个人几乎肯定是吴法宪(空军的政委,继刘亚楼之后成为司令员)。
117. 这一部分主要引自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第172—199页。
118. 我不同意扎戈里亚的观点:这一重要遗漏暗示中国人已经决定在1958年夏末在台湾海峡冒险。
119. 《当代背景》492号第2页。
120. 同上,第7页。
121. 参见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第178—180页。
122. 同上,第180页。
123. 1958年2月2日《光明日报》;同上,第181页。
124. 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第183页。
125. 同上,第187—188页。
126. 同上,第183页。
127. 参见本书第1卷,第315页。
128. 《红旗》1958年第1期,第11—18页。
129. 党的宣传工作者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为左派首领的王力和姚溱,

- 外交部官员是副部长乔冠华,乔从前当过记者,长期给周恩来当助手。70年代中期被提升为外交部部长,“四人帮”垮台后去职,直到1981年才重新露面,关于于兆力的身份,参见《王力是谁?》,见《野战报》第12—13期(1968年3月),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158号第9页。
130. 见哈尔彭:《战后世界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章。
131.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72号,第42页。
132.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参见哈尔彭:《战后世界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9章;马特苏摩托·什戈哈鲁:《日本与中国》,载哈尔彭编《对华政策》第132—134页;欣顿:《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第376—377页。
133. 哈尔彭:《战后世界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章。
134. 科林与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年》。
135. 哈尔彭:《战后世界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8章。参见《纽约时报》1959年11月19日,该报报道了苏班德里约博士遭到粗暴对待的事件,但没有提到陈毅要对此事负责。
136. 转引自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170页。
137. 参见拉尔著《共产党中国怎样打交道》第84—89页。
138.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07号第1—3页。
139.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陈毅和周恩来等一批年青的中国人赴法勤工俭学,据说在那里陈毅和他的四川老乡邓小平建立了友谊。1926年,陈毅加入了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参谋班子(译按:原文如此)。国共合作破裂后,陈毅是第一批到井冈山聚集在毛泽东旗帜下的人之一。此后,在40年代,刘少奇曾任陈毅所率部队的政委。(参见科林与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惠策恩:《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第36—37页,第四章;黄震遐:《中共军人志》第365—371页。
140. 利伯瑟:《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年》第112页。
141. 《我们永远怀念周恩来总理》第192页;《人民的好总理》第3辑第20页、47页;《人民的好总理》第379;《北京周报》1958年第18期,第12—14页。
14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选读》第136—137页。
143.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讲话时,明显地流露出他对延安精神的怀念。



## 第五章

### 77 人民公社的兴起

---

直至今天，1958年夏季人民公社在中国农村出现的原因，仍然使人感到扑朔迷离。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似乎使人一时无法分辨其本身的功过。出现这个新生事物的主要原因，似乎是毛迫不及待地推动，而当时甚至尚未获得政治局的正式批准。此外，在一段时间，强调人民公社的仓促出现，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产生困难的原因，而到后来则需要强调酝酿阶段，以挡住所谓成立人民公社缺乏客观基础的批评<sup>①</sup>。

似乎无可怀疑，公社是在1957年底至1958年初兴修水利运动中自动萌发的。当时毛仍然认为合作社将为国营农场所取代<sup>②</sup>。兴修水利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要求以更大规模组织人力，这就超过了合作社所能提供的人力。况且，1957年合作社的平均规模已缩小到164户<sup>③</sup>。尽管中央委员会在1957年9月还发布指示，赞扬小而权力分散的合作社<sup>④</sup>，

而当年冬季就为兴修水利开始合并合作社了<sup>⑤</sup>。过后，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肯定了那些合作社的合并，从而促使更多的合作社合并<sup>⑥</sup>。然而，毛在成都会议上做的长篇讲话中却只字未提这一问题。以此判断，合作社合并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的确，河南27个合作社合并成一个拥有9369户的大社，虽然后来被提出为突破的典型，但在当年4月才完成这一合并。<sup>⑦</sup>

78 再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并由谁做出决定，将扩大的合作社命名为人民公社，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中囊括一切的基层单位，兼管农业、工业、文化、商业和军事，从而赋予它以全新的形象。在一年后党内出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危机中，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公社是少数人凭主观愿望搞的，并且成立得“太早太快……”<sup>⑧</sup>。

## 第一节 陈伯达的作用

“人民公社”这一名称在《工作方法六十条》和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任何文件中都不曾出现。显然，无论毛还是刘当时都不认为合作社合并的意义十分重要，否则就会在那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及。尤其毛的讲话未提及合作社合并，这一点格外重要，因为他的讲话不供发表，他如果想谈这个问题，不必有任何顾虑。人们不得不由此得出结论，将扩大的合作社改成人民公社的问题在5月时仍未列入政治局的议事日程。

后来的材料说明，扩大的合作社起初名称各式各样，但到6月，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确定“人民公社”最好地体现了这一组织形式的实质，最受群众欢迎。

实际上是陈伯达在7月1日刊登在《红旗》第3期的一篇文章中首先使用这一名称的。陈在那篇文章中介绍了另外两篇报道湖北省一个优秀合作社的通讯。他引述这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

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公社”。<sup>⑩</sup>

在文章发表的当天，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做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八周年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援引毛的话说，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sup>⑪</sup>

79 这一证据表明，将扩大的合作社称为“人民公社”是陈伯达想出来的主意，然后被毛加以完善，使之包罗万象，并在6月最后一周某个时候树立为全国的典范。当然，毛后来否认人民公社是他的发明，但没有否认曾表示过赞同<sup>⑫</sup>。后来，有人颇令人信服地提出，人民公社的设想(并非名称本身，因为名称可能源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sup>⑬</sup>；关系重大的是“一大二公”的性质)可以追溯到毛年青时期对学者兼政治家康有为(1858年—1927年)在《大同书》中所阐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崇拜。<sup>⑭</sup>

疑问仍然存在。为什么陈伯达以及后来谭震林援引毛的讲话时，不直接了当地用“公社”一词，却要示意毛曾用过。是否因为毛用“大公社”这一名称时，想到的仅仅是“大”而“公”的合作社(即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非大人民公社？是否因为毛在正式与同事们交换意见之前不愿公开赞成人民公社？或者是否因为陈、谭援引毛的讲话时，场合显然是6月下旬与一位生产合作社(译按：指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的谈话。毛在《红旗》杂志第一期<sup>⑮</sup>赞扬那位社长的精神，因为毛只不过在考虑这一新设想，鼓励其发明者进行试验？<sup>⑯</sup>

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公社的构想、发展和被采纳，其过程仅仅根据有限的试验，时间短促得惊人。尤其是考虑到毛、陈从一开始就会明白，这个事物将引起意识形态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时更是如此。启发陈伯达将那个合作社称之为人民公社的文章，

发表于1958年5月25日<sup>⑭</sup>。这就是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个县委起草的报告，经过层层机构的审阅，终于送到陈伯达手里。而此刻，该县委却还不知道将由什么样的人物作出决定，把这份报告视为一种新的农村组织形式问世的信号，并为贯彻这一决定撰写了一篇文章(不知是否经过批准)。

成功地将工农业结合在一起，并启发陈伯达命名为人民公社的那个合作社，不过才有两个月的历史，羽毛未丰，承受不起意识形态方面如此有分量的桂冠<sup>⑮</sup>。然而，陈的文章发表不过两周，由谭震林主持的华北六省(包括河南)农业协作会议提出，由于合作社的管理和分配制度不够完善，必须研究并准备建立尚在试点的“比较高级的公社性的形式”。<sup>⑯</sup>

虽然毛经常到各地巡视，但在对成立人民公社的设想初步赞同时，却似乎尚未亲临现场进行他一向重视的调查研究。虽然在毛巡视中，各地可能会向他介绍扩大的合作社，但在运动走上正轨并取得政治局同意之前<sup>⑰</sup>，没有迹象表明他视察过开展人民公社运动最热烈的河南省。

最后，人们还必须考虑在6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估计毛的注意力一定集中在他所主持的重要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在对成立公社的设想表示初步赞同之前，能有多少成熟的考虑呢？

直到会期很长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于7月22日闭会和赫鲁晓夫7月31日至8月3日访问北京以后，毛才得以继续进行巡视，对人民公社做现场调查。8月4日至13日，他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天津和首都郊区的两个合作社<sup>⑱</sup>。正是这次视察中，没等政治局正式同意，他就批准成立人民公社。8月4日晚，毛刚视察过的河北省徐水县大寺各庄农业社就宣布正式成立人民公社了。在毛巡视了河南4天后，《人民日报》报道了他在那里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的消息，并说该公社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从合作社转变成公社。这篇报道的措词或许是故意让人摸不

准它的含意，但估计指的是陈伯达在《红旗》中所援引的毛的那段话。

毛在七里营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交谈中说，他希望七里营的生产成果能在全省推广。吴答道，有这么一个公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毛听罢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81 这里的用词又不准确。“社”这个字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中都会出现。而且，既使在毛明确的是人民公社的段落中，他仍然可以说他是在推广七里营的生产成果，并非新的组织结构。<sup>②</sup>

然而，毛于8月9日在山东公开表示他支持人民公社。当省委书记谭启龙透露某个地区提出要办大农场时，毛告诉他：“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sup>③</sup>。”一年后，毛明白他当时说得早了，便用责怪报界的方法为自己开脱<sup>④</sup>。我们将会看到，毛并非是唯一不愿意记者积极报道他在大跃进高潮期间讲话的中国领导人。

8月17日，即《人民日报》报道毛赞成成立人民公社的消息4天以后，政治局在河北海滨胜地北戴河召开了扩大会议。次日，《人民日报》在态度鲜明的大字标题“人民公社好”下，宣布河南省信阳地区全部成立公社。报纸没有点明那句话是毛讲的，但当时所有感觉敏锐的干部一定已经清楚毛的态度。可以说是大局已定。<sup>⑤</sup>

据推测，虽然政治局在8月29日之前一直未就人民公社问题做出决议，但毛这时已争取到主要同事们的支持。当然，刘少奇在7月中旬就在谈论将工业、商业、教育和军事与农业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了。在公开场合，他仍然用“合作社”这个词<sup>⑥</sup>，但私下却已开始使用“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刘在石景山说，工人和农民每年应该换工两个月；这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要用5至10年时间，这有助于实行共产主义。刘接着说：“工厂是农村，农村也是工厂，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农村的年青人可以去工厂，

## 82 工人的子女可以去农村组织共产公社。”<sup>②</sup>

这一迹象表明，毛泽东和陈伯达在首先建立农村综合组织的问题上得到了刘少奇的赞同。它还表明，尽管刘少奇本人小心谨慎，不愿在召开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以前公开使用“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但对他的批评毕竟是太多了，他不愿再在这个问题上落得个与毛的所作所为唱反调的名声。只有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只有当向彭德怀等人作争辩的时候，毛才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自己积极抢先表态表示歉意。

### 第二节 北戴河会议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跃进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跃进还只是在生产竞赛的基础上进行。夏收比1957年同期增长69%<sup>③</sup>。公社和土高炉已经出现，这本来是可以不过分张扬的。雄心勃勃的生产指标本来也可以冷静地加以控制。因此，北戴河会议本来可以是一次调整经济使大跃进走上正轨的机会。相反，这次会议却被看作是进一步提高生产指标，向共产主义又跃进的一次尝试。北戴河会议之前，中国看来能通过有组织的千百万民众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而使全世界感到惊奇。北戴河会议的结果却使1958年的全国取得的真正的经济成就。被中国领导人的灾难性的狂热自负掩盖了。

会议由于谭震林的两篇对农业前景作了美好描绘的文章而处于高度的乐观主义气氛中。谭从夏季的大丰收推断，该年的粮食总产量至少可达2.4亿吨，也许可达3亿吨<sup>④</sup>。较低的估计是25%的增长率，这个指标是本年早些时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译按：指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宣布的，更确切地说，是在1957年12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所要达到的指标制定的；较高的估计则要比这个指标超过50%。

以自19世纪20年代后期起就因与毛有密切交往而自豪的谭震林<sup>⑩</sup>，早在前一年8月就从他的老战友邓子恢手中接管了农业<sup>⑪</sup>。从1957年10月到12月，谭在河南进行了一系列视察，鼓励和指导了这个省的热火朝天的水利运动，并和当地升起的新星吴芝圃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一起首倡了公社这一事物。<sup>⑫</sup>

令人寻味的是，这个56岁的湖南人，早先的一个印刷和装订工人，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几个城市工人阶级的典型代表之一<sup>⑬</sup>。由于当年他追随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游击战争经验，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1949年共产党人胜利后，他在华东工作了一段时间，到1952年担任该大区的第三书记。在他的上级(饶漱石、陈毅)缺席期间主持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作为江苏省的省长和江苏省党的书记柯庆施一道工作。柯和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都被选为政治局委员<sup>⑭</sup>。大跃进期间，两人关系密切。当谭鼓励农民取得更大的成就时，柯则促使毛热心于钢铁战线。

很少有西方人与谭震林接触，甚至50年代中期他调到北京中央书记处以后也如此。但研究中共上层军事人物的权威把他描述(大概根据国民党将军和共产党背叛者提出的事实)为性格顽强的人，一个“顽固、狡猾、善于讽刺、冷淡、无情、事业心极强的组织家”<sup>⑮</sup>。大跃进期间，谭确实显示出自己是一个“事业心强”的人。但在大跃进以后，毛也不得不指出，他可能不够冷静：

谭老板，你那儿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些凄凄惨惨要好。<sup>⑯</sup>

谭震林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使他适于担任把中国引向美好境地



的任务，也表明大跃进期间他为什么总充满了干劲。当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有看到他们的人民早日富裕的愿望时，很少有人能比谭更生动地表达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

那么，共产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饭都有肉、鸡、鱼和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尼绒和羊毛制服……，狐皮服也会增多，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的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住房方面，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四，通讯方面，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往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到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总之，共产主义含义是：食物、衣服、房子、交通、文化娱乐、科学院和体育活动，这些意味着共产主义。<sup>⑤</sup>

这就是典型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但没有迹象表明谭与时代和毛脱节。根据谭的设想，毛描绘了一幅消费方面的幸福图景；每人每年的生活标准是750公斤粮食、50公斤肉、10公斤菜油和10公斤皮棉<sup>⑥</sup>。确实，毛8月4日视察河北时，建议如果徐水县的粮食有剩余，卖不出去，这样合作社的成员就可吃得

它的大规模发展是“完全可能的”、不可阻挡的，这个发展的基础是跃进的成功，它已激发起农民的政治觉悟。夸张的产量数字一个接一个地悄悄出来：农业总产已增加100%、百分之几百、百分之一千甚至百分之几千——对于了解情况的农村干部，这些数字高得吓人。

农业方面的发展导致打破农业合作社甚至县、乡之间的界线，导致组织和活动的军事化、日常生活集中化和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这个时候，想象代替了现实。农业合作社已不适应了，公社的发展是“一项基本政策，必须立即执行，以引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sup>④</sup>

公社的模式是，每乡一个公社（乡——农村的基层组织，集体化时包括两个以至更多的村庄）<sup>⑤</sup>，每个公社包括2000户，大约1万人。有6000户的公社也可以，只要那里的条件合适。就是有2万户的公社也不加反对。然而，比较可行的发展途径是通过公社的联合达到以县为单位。公社的党政组织必须合一，使公社成为农村权力机构的基层单位。这种公社形成的进程分两步：先由小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农业合作社，然后进入人民公社。如果这个过程能缩短为一个，那也好，但不得搞强迫命令，而且这种过渡不得影响生产<sup>⑥</sup>。在过渡当中，小型农业社将变成耕作区或生产队。<sup>⑦</sup>

87 在公社范围内，集体生活的模式是：有集体食堂、幼儿园、托儿所、裁缝店、理发店、澡堂、敬老院、农业中学和红专学校<sup>⑧</sup>。私人的小块土地也由集体耕种，但一些树木可归私人所有。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因为虽然让私人保留使用的土地，其面积不超过全部公有土地的5%，但这点土地对个体农家来说非常重要，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它的作用是：

- (1)提供一般生活所需的各种食物如青菜、水果、猪肉、家禽；
- (2)使许多家庭的生活标准从起码水平提高到一般过得去的水

平;

(3)通过农产品出售提供现款;

(4)与不稳定的集体收入相比,这点经济收入可提供某种安全感。<sup>⑩</sup>

各家庭的财产,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以及公众觉悟的提高,自然地转变为公有。大概政府不想使刚出世的公社为购买其成员的人社财产需负的债务所压倒,因而劝说农民赠送他们的财产给公社。当时还是集体所有制,多数地方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估计需要3至6年,现存的分配制度应当保留,但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实行工资制<sup>⑪</sup>。决议的最后一段看来是谨慎的。目前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但是看来

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sup>⑫</sup>

88 经验表明,中共习惯树立一种可以超额完成的指标。这种作法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再次得到支持<sup>⑬</sup>。根据这个情况,这种从关于公社的决议中引出的词句,可以看作是预先考虑好的对习惯的突破。虽然基层对过渡有非凡的热情,决议本身却清楚地预示着一个向共产主义的跃进即将出现。毛宣称,从集体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可能需要10至25年。虽然这个估计是粗糙的,但他并不企图表明,他对北戴河决议规定的时间表有什么异议<sup>⑭</sup>。刘少奇(后来像毛一样,对记者在大跃进期间对他的过分报导表示不满<sup>⑮</sup>)的话被《人民日报》引用来鼓动人民马上实现共产主义:现在不要认为共产主义是很慢的啊!只要我们好好干,实现共产主义就很快了。<sup>⑯</sup>

不幸的是,刘少奇(毛也如此)北戴河的讲话,没有作过报道,

其后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从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预测有所退却。确实，从1958年刘少奇在一些视察中所发表的言论看，刘的兴趣主要在“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出现”，并鼓励其发展<sup>⑧</sup>。令人惊奇的是，尽管毛在共产主义模式的形成和鼓励中的作用很大，这位党的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之后却没有集中精力在这些问题上，而是转移到了大炼钢铁的热潮之中。

### 第三节 钢铁狂热

简直令人感到惊奇，1958年下半年毛被钢铁生产迷住了。他承认自己的工业知识是微薄的<sup>⑨</sup>。以往毛一直把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放在头等地位，因此在中共取得领导地位。（译按：此说法不妥）同时，毛也把农业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放在头等位置，从此来寻找一条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道路。到1958年8月，毛看来获得了胜利。因为，1955—1956年的合作化经验和在1958年夏季创纪录的收成基础上秋季作物又丰收在望<sup>⑩</sup>，毛相信人民公社运动的稳定只是一个组织的问题了。他在政治上习惯于超前宣布一项事业的胜利，接着便想进行下一项事业，尽管前一项并没有完成<sup>⑪</sup>。作为对公社的过问，9月9日他告诉最高国务会议希望公社化运动在那个 month 基本完成，其他剩余问题可安排在同年冬及第二年春解决。<sup>⑫</sup>

8月，毛泽东一心投入了钢铁生产。北戴河公报反映了毛在这方面的新观点：

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因此，会议决定，全国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但是同时不应当放松农业的领导。……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

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根据当前全国人民对于钢铁的巨大需要和对于钢铁生产的巨大努力，根据钢铁冶炼设备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投入生产的情况，钢铁生产的飞跃发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sup>⑧</sup>

1957年钢产量为535万吨。在1958年2月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将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有节制地订为620万吨，5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则增加到800—850万吨<sup>⑨</sup>。7月17日，也许是在审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sup>⑩</sup>，毛决定钢产量比1957年增加一倍，达到1070万吨<sup>⑪</sup>。这个指标在政治局通过<sup>⑫</sup>。毛去世后，中国经济学家指出在大跃进期间，这个错误地加倍的指标打破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平衡<sup>⑬</sup>。毛曾承认他是这一指标的主要制定者，也承认上海市第一书记柯庆施是这个指标的建议人<sup>⑭</sup>。毛在一年后解释说，他没有考虑到炼钢运动中没有铁和煤的地区将需要大量的这种原料，而这又将大大加重中国铁路的运输负荷<sup>⑮</sup>。毛责备以李富春为首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说他在北戴河会议后放弃了他的责任，没有妥善地对待这个问题<sup>⑯</sup>。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起初在北戴河讨论中反对群众炼钢运动，但后来又表示赞同，以致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指责为过渡狂热！<sup>⑰</sup>

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自己在私下又流露出增大指标的想法。9月5、8、9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3次讲话中，他想像1958年的实际钢产量将达1100万至1200万吨。在一次讲话中，他举出这两个数字以实现的可能性说明他空想的程度，他打算在北戴河已增加100%的指标再增长24%。<sup>⑱</sup>

这种不现实的气氛随着毛对未来的设想而不断提高，即使是讲求点现实但又支持他的人，也恢复不了他的理智。毛的期望还在于，1959年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sup>⑲</sup>，这一估计在北戴河会议上也得到认可<sup>⑳</sup>。他还建议在1960年赶上苏联，生产6000万吨钢，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钢铁国家。毛还扩大了错误范围，认为到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62年,中国将赶上甚至超过美国,生产8000万至1亿吨钢<sup>⑤</sup>。后来他私下承认,他私下对1962年的估计更高,达1亿至1.2亿吨<sup>⑥</sup>。那时美国由于经济制度的局限性而使钢产量徘徊于1亿吨左右,中国则脱颖而出,不要几年将达到1.5亿吨。<sup>⑦</sup>在15年或稍长一些时间里,即70年代中期,中国将生产7亿吨钢,两倍于英国的人均产量。<sup>⑧</sup>

早在两年半前,即1956年冒进的前夕,毛还预计赶超美国需要50—70年<sup>⑨</sup>。到1958年夏天<sup>⑩</sup>,他已经大大缩短了这个时间。

### 注释:

1. 参阅1958年12月19日毛在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上的讲话,当时他说直到8月“才发现”公社问题(《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40页),而在彭德怀批评人民公社以后,1959年8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见《当代背景》590号,第23页)强调了1958年8月以前人民公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关于这个方面,参阅《中国大陆杂志摘要》210号,第13—16页。
2. 参阅1957年10月13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36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7页,《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504页。
3. 参阅施拉恩:《中国农业的发展,1950—1959年》第30页,表2—6。关于水利运动的规模,参阅奥克森伯格:《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制定:群众性大兴水利运动情况(1957—1958)》,第13章。有趣的是,当一年前周总理向一个来访的印度高级农业代表团表示怀疑高级社的活力,他提到他曾指示对这样一个高级社进行调查,调查报告结果说它经营良好,因为“那里有一个联合水利工程把人们团结起来了”。尽管有这个令人鼓舞的报告,但周对高级社仍保留“严重的怀疑”。被调查的那个社有3万人口,在1958年那时候,这是一个规模适当的公社。参阅《印度农业计划与技术代表团访华报告》,第25—26页。
4. 《新华半月刊》1957年19号第135—138页;沃克《农业生产组织》,载艾克斯坦、盖伦森与刘大中编《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向》第439页。沃克指出



(见注22)，迟至1957年12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仍主张初级社保留10年。

5. 参阅《人民日报》社论《人民公社万岁》，1959年8月29日。英译文见《当代背景》590号，第23页。毛后来声称，早在1956年河南省就建起了公共食堂，参阅《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37页。
6. 《当代背景》590号，第23页。
7. 《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广州，1981年版)，第2卷第345页。
8. 《当代背景》590号，第23页。
9. 同上。参阅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所载谭震林关于夏粮丰收的文章，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34号，第21页。陶铸后来宣称1958年4月广东省8个农业生产社和2个手工生产合作社联合成立了一个人民公社，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39号，第2页。
10. 《红旗》1958年第3期，第10页。
11. 同上，1958年第4期，第8页。
12. 我在这里认为，如果在《红旗》第3期陈伯达的文章付印前毛谈到过这些问题的话，那陈将会在文章中引用毛的话。因为《红旗》是半月刊，所以这似乎有理由认为，7月1日那期《红旗》不会早于6月23日以前付印。毛的保证可能是在6月23日至6月30日之间的某个时候作出的。(6月20日至23日曾有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工资制度，但有材料表明毛没有参加。参阅利伯瑟《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年》第115—116页)。

是陈伯达提出公社的设想，这在文革中陈倒台后得到进一步的证实。1971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对他进行批判，(虽没有提他的名字，但文中所用的材料清楚表明，批判的对象就是他)，说他在1958年对公社提出了过于夸大的理论根据。把人民公社的想法归到他身上，无疑会贬低人民公社，但与陈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材料使人们有理由认为，陈促成了公社的出现，特别是当我们想到，他是第一个支持公社的政治局委员。

毛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表示成立人民公社不是他的意见，参阅《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41页。毛逝世后对陈伯达在这个时期的左倾主义的批判，参阅芦苇：《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存在



- “左”和冒的问题吗?》，载《新华月报》(文稿版)1980年2号第49—50页。
13. 参阅朱力和田阶恽:《人民公社内幕》，第9页。
  14. 参阅纪文顺:《中共人民公社理想的来源》，载《太平洋海岸语言学》第2卷(1967年4月版)，第62—78页。陈伯达曾在毛身边工作过20年(参阅本书第1卷第一章注25)，他当然意识到毛对康有为的赞赏。
  15. 参看谭震林的文章(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34号，第21页)和毛在《红旗》1958年第1期，第4页的按语。没有材料表明是《红旗》的这篇关于合作社的文章(同上，第4—10页)提出建立公社的主张。它仅一般地举例说明艰苦奋斗、积极主动、团结一致的重要性。《北京周报》1958年第19期，第5页的文章说毛在6月底会见了农业社的领导人。
  16. 在陈伯达文章中所引用的从“应该逐步地”到“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段话(见《红旗》1958年第4期，第8页)，谭震林的文章也同样引用了。这些话大概出自毛。毛还发表了更长的一段话，见《科技革命》1967年7月号，第21页。《北京周报》1958年第19期，关于毛与农业生产社领导说话的报道，并未表明主席提到了“公社”这个词。
  17. 《红旗》1958年第3期，第17页。
  18. 同上，第12页。
  19. 《新华半月刊》1958年15号第114页。参阅罗伊·霍夫希兹:《中共的农业管理》，载《中国季刊》1962年7—9月号，第154页。这个为期8天的会议在7月14日结束。
  20. 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赞扬了河南省长葛县的深耕，但他清楚地表明，他没有到过那里，仅是看到了有关的材料(《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03页、123页)。
  21. 中国报刊报道这一段毛的行程是：4日在河北(《人民日报》8月11日)，6—8日在河南(同上，8月12日)，9日在山东(同上，8月13日)，10—13日在天津(同上，8月16日)，在13日乘汽车从天津返回北京途中，参观了北京郊区的农业生产社。七里营公社的社长后来对一位印度人口学家说，七里营公社是在毛参观后的第二天即7月20日成立的。参阅钱德拉一塞卡尔:《今日共产党中国》，第53页。
  22. 《人民日报》1958年8月12日。据《工人日报》的报道，毛和吴芝圃在谈话中都使用了“合作”这个词。这个报道的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

- 1847号，第5页。正如毛在《红旗》1958年第1期所介绍的那样，七里营农业生产合作社虽不属他参观的同一个县，但也在同一个地区。关于毛参观河北的情况，见《北京周报》1958年第31期，第21—22页。
23. 《人民日报》1958年8月3日，开头的第一句是：“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24.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41页。参阅本书本卷第十章。大跃进期间，中国报刊经常引用毛的语录——“人民公社好”。不清楚的是，这句话究竟是毛在和谭启龙谈话时说的，还是象毛所声称的那样，是在他和记者谈话时说的。这句话作为8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的标题首次发表。
25. 正是这篇报导激发我写下了关于公社的第一篇电讯稿，此稿载于伦敦《每日电讯》1958年8月21日。
26. 参阅有关7月12日晚毛在从天津到济南的火车上与学生谈话的报道，见《人民日报》1958年7月30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29号，第5页。
27. 《北京日报》1967年6月8日第5版。
28. 《人民日报》1958年7月23日。
29. 我推测这些文章的发表是为了影响会议的气氛，因为，虽然文章于8月份发表在中共的主要刊物上，但它们涉及到华东农业协作会议和夏粮的收成。这些都是6、7月间的事，按理是应该几星期前报道的。参阅谭震林《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红旗》1958年第6期，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摘要》144号，第1—7页；《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作者同上，载《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34号，第15—21页。事实上，关于谭在华东会议上讲话的详细报道已出现在1958年6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
30. 《批谭战报》1967年8月5日第2版。谭对他早年生活的回忆，参阅《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362号，第7—11页。
31. 参阅本书本卷第四章注60。
32. 参阅罗伊·霍夫希兹：《中共的农业管理》，《中国季刊》1962年7—9月号，第150—155页。谭出席了1958年7月在河南召开的党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吴芝圃的前任潘复生被正式免去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同上，第154页）；参阅本书本卷第四章注76。

33. 参阅科林和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中关于谭的传略,该书阐明了这个问题。
34. 同上。
35. 惠策恩:《中国高层指挥机构: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年》,第204页。
36.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1968—1969冬季号)第41页。这段话读起来有点奇特,因为毛讲话时似乎先对谭说些什么,然后再向其他听众谈论谭。这段话引自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37. 《谭震林的黑帮言论》,《红旗》(是一份红卫兵小报,不是党中央的刊物),1967年3月21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78号,第33页(我曾对译文进行整理)。此文可见《八·八战报》1967年3月29日第8版,以及《关于谭震林问题的初步综合材料》第35—36页。这是在陕西西安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不是在11月11日(据后一份材料),就是在12月(据同上书“续集”1967年4月6日)。对这个讲话的评论,参阅《进军报》1967年3月15日第3版。
38.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34号,第21页。
39.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39号,第2页。
40. 《关于谭震林问题的初步综合材料》(续集),第14页注115。关于毛的讲话,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15号,第1页。
41. 参阅《邓小平罪行调查报告》,《红卫兵》1967年第2期,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590号,第13页。没有人指出邓详细阐明他的共产主义理想的确切日期,但这份材料说明,这估计是在他两次到贵州遵义参观中的一次。而且他的讲话的基本精神也表明,这很可能是在他第一次到遵义参观(1958年11月)时说的,而不是第二次(1965年11月)。
42. 参阅例如:《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关于农业问题的五项指示(同上,1958年9月11日);关于半工半读的指示(同上,1958年9月20日);关于干部每年要有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同上,1958年9月30日)。
43. 指彭德怀。参阅《彭德怀的几个问题》,见《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英译文见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第77卷第668号第8—9页。

44. 参阅北戴河会议公报, 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46号, 第1页。
45.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53号, 第1—2页。
46. 霍夫希兹:《中共的农业管理》, 见《中国季刊》1962年7—9月号, 第142—146页。
47.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53号, 第2页。
48.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
49.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53号, 第1—2页。
50. 参阅沃克:《中国的农业计划》第23—41页, 特别是第41页。
51.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53号, 第3—4页。
52. 同上, 第4页。
53. 参阅本书本卷第31页。
54.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 第4期, 第41—42页。
55. 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参阅吴冷西的材料, 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62号, 第7页。
56. 《人民日报》1958年7月30日, 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29号, 第5页。这是早在7月12日刘少奇在天津到济南的火车上谈话的报道。
57. 引自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关于他在7月中参观山东的报道。《新华半月刊》1958年16号第39—40页刊登了这篇报道。参阅9月中, 他到河南参观的报道。在河南参观期间, 他倡议对儿童实行全托, 发展小学寄宿学校, 以强调社会教育, 而不是家庭教养。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11号, 第12页。这说明为什么文革中的材料有理由指责刘在大跃进期间的某些过头言论。参阅《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35—36页。
58. 本书第1卷第59页。
59. 虽然据报道某些地区遭到了百年不遇的黄河水灾, 但夏粮丰收似乎是没有疑问的。参阅《周总理的故事》第66—69页; 《人民的好总理》(1977年版), 第202页, 307页。
60. 1956年1月, 早在农业集体化实际完成以前, 毛就正确地宣告农业集体化的胜利, 并着手制订发动第一次跃进的计划(参阅本书第1卷第26—27页)。与此同时, 他错误地宣布了(象他后来承认的那样)社会主义的胜利, 并着手准备改善国内的政治气氛(同上, 第15—16页、第33—38页、第160—164页)。

61.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43页。
62.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46号, 第1页。
63. 同上。
64. 《资料选编》, 第230页。
65.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 第4期第39页。参阅《国外广播新闻——中国—81—145》, 第K33页, 在这里, 薄一波证实毛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就提出了1070万吨钢的指标。
66.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46号, 第1页。有趣的是, 北戴河的海风似乎经常使政治局对增加钢产量产生乐观的看法。1955年夏天在北戴河制定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钢产量达到1500万吨的指标, 但在一年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上, 被减为1000到1200万吨。《毛泽东思想杂集》第1卷第80页。
67. 柳随年:《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需要研究的一些问题》, 见《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5号第17页。
68.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 第4期第39页、41页、42—43页。
69. 同上, 第38页, 关于大跃进给运输系统造成影响的简短说明, 参阅吴元黎:《共产党中国的经济空间》, 130页、187页、194页、206页、289页。
70.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 第4期第38页、40页。
71. 《打倒“三反”分子、大叛徒和工交战线的恶霸薄一波》, 《东方红》1967年2月15日, 英译文见《当代背景》878号, 第6页;《薄一波的四十条罪行》, 《红卫兵报》第8期(1967年2月22日), 英译文出处同上, 第16页。
7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 第228页、230页、240页。
73. 同上, 第264页。
74. 同上, 第252页。
75. 同上, 第240页。
76. 同上, 第264页。
77. 同上, 第240页。
78. 同上, 第235页。
79. 同上, 第24页、34页。令人感兴趣的是, 当日后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时候, 他的这种过于乐观的预言是否还会在他的讲话中保留下来。在

某种情况下(第24页),当《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的时候(参见同上书,第216页),我们在这里引用的这个预言被删去了。而在别的情况下,这个预言和讲话的其余部分都没有再发表。

80. 以邓小平为首的书记处也受到当时气氛的影响,在北戴河会议后不久决定修建大型建筑物、扩大天安门广场,以纪念革命胜利10周年;见《缅怀刘仁同志》,第204—205页。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分别座落在天安门广场两侧,它们是这次大规模建筑项目的两个最主要的标志。这些工程都在1959年10月1日之前竣工,在10个月内就建成了!周恩来决定不必再为国务院盖新的办公大楼。《人民的好总理》第3辑,第21页。

## 第六章

### 91 高 潮

---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的两个月是大跃进的高潮。这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在生产领域里进行非凡努力的试验的时期。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巡视各地，大唱赞歌。此后，在1958年11月，现实主义开始恢复，12月的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下达了一个收缩的命令。

在那情绪高涨的两个个月里，人们的热情大部分是由干部激发起来的，因为毛泽东使后者相信，中国将很快进入极乐盛世。但是，如果不考虑当时的国际形势，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在那些秋季的日子里出现的高涨情绪。

对1959年夏季出现的国际危机，中国领导人是没有责任的。事实上，早些时候，总书记邓小平就向包括许多非党人士在内的听众担保，近期内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一般说来可以避免。中国的战略是经济竞争，通过发展经济增强力量，以



- 警告美国人、日本人和铁托。确实，美国人继续藐视一个没有原子武器，而且钢产量不足挂齿的国家。中国只有依靠中立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望其拒绝与西方做生意，并在美国和英国引发革命<sup>①</sup>。不过，这种冷静而又长远的考虑为后来闹哄哄的几周搅乱了，中国人的行动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形势，增强了中国国内战争气氛。也正在此时，北京与莫斯科之间出现裂痕，在中苏分裂的道路上树立起又一个里程碑。

## 第一节 台湾海峡危机

92

7月13日伊拉克发生政变，亲西方的费萨尔国王被推翻，国际形势骤然出现危机<sup>②</sup>。西方的反应是迅速向亲西方的另一些阿拉伯国家派遣部队，以防止发生类似的政变。7月1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美国军队进入黎巴嫩。7月17日，英国军队到达约旦。

西方关心的不是约旦和黎巴嫩的近期命运。伊拉克政变削弱了美国对苏联南翼的遏制，夺走了巴格达条约同盟(后来的中央条约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员。它也导致了温和的伊拉克和约旦阿拉伯联盟的突然解体。这个联盟是在5个月之前建立的，以抗衡1958年2月1日建立的激进的埃及和叙利亚(后来还有也门)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所以人们并不奇怪，苏联领导人(也许他们联想起自己的早年历史)担心英美登陆是伊拉克反革命东山再起的前奏，无论是直接动用英美部队，还是伊拉克原先的伙伴约旦作代理人，都可能使这一地区陷入更大的冲突，使苏联不得脱身，最后导致苏美直接核对抗。

为此，7月19日，赫鲁晓夫提议召开一个首脑会议，包括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和联合国秘书长(虽然会议不在联合国举行)参加，“以便立即采取可能采取的步骤，结束已经发生的冲突。最重要的是先避免事态拖延<sup>③</sup>”。尽管发出如此敦促，英美

93 的反应仍然是冷淡的，只是在7月22日（这一天正是赫鲁晓夫希望举行首脑会议的日子）作出一个答复，表示只愿意在联合国举行会议。赫鲁晓夫第二天答复说，为了会议的举行，建议7月28日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他重申要印度参加。这一次，英国欢迎苏联的让步，但美国保持冷淡，声称28日太早了，确实，28日和29日，国务卿杜勒斯要在伦敦参加巴格达条约国会议。但到7月28日，赫鲁晓夫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腔调，在一封信中指责美国背弃原来的立场，声称他愿意采纳法国关于在欧洲举行会议的建议。这种改变无疑是因为莫斯科看到西方势力并不打算推翻伊拉克新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大概感到需要注意主要盟国对危机的看法以及它们的处理意见。

中东危机是自毛宣称东风压倒西风以来发生的第一次危机。他主张共产主义阵营应摆出强硬的军事姿态，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显示力量。赫鲁晓夫关于首脑会议的匆忙建议，在北京看来是一种胆怯。当《真理报》社论因为美苏都拥有核武器而呼吁冷静克制时，《人民日报》反对对美国侵略作任何让步，声称要从共产党国家派遣志愿部队到中东去。北京的社论表示对诉诸联合国机构持怀疑态度。这种态度并不令人奇怪，因为在安理会占有席位的不是北京，而是台湾。在背后，还可能隐藏着北京对赫鲁晓夫建议印度出席首脑会议的怨恨。只是到7月22日，《人民日报》才最后赞同赫鲁晓夫召开紧急首脑会议的建议④。9天以后，即7月31日下午，赫鲁晓夫秘密到达北京，陪同他的有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⑤。

94 赫鲁晓夫之行最后发表的公报表明，中东危机是双方讨论的主题。毛泽东正式赞同苏领导人关于首脑会议的建议，虽然公报并没有详细说明首脑会议在什么情况下举行⑥。毛后来说，会谈中没有提到是否应是一个四强首脑会议⑦。这可能意味着毛并不想因为赫鲁晓夫提出伤害中国感情的建议而责备他，或者意味着

赫鲁晓夫已决定采取新的行动步骤，并将此向毛作了介绍，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总之，赫鲁晓夫回莫斯科后不久再次致函艾森豪威尔，按照毛已赞成的方案，不再提首脑会议的建议，因为美国拒绝考虑“在安理会之外召开政府首脑会议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在安理会的多数成员属于侵略集团，并且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这个机构不可能解决外国武装干涉阿拉伯东部国家的问题”<sup>⑧</sup>。赫鲁晓夫建议召开联合国特别会议。

即使苏联和中国在中东的外交行动完全一致，毛还是觉得赫鲁晓夫在西方面前缺乏坚定性。赫鲁晓夫离开后，在《人民日报》的一篇关于首脑会议的社论中，以最强烈的口吻反对让步，认为“靠与侵略者妥协和谅解就能获得和平的谬论”被严厉拒绝，那些天真地认为为了缓和紧张局势必须不触动敌人的好心的和平主义者遭到无情的嘲笑。而在莫斯科，《真理报》关于首脑会议的社论强调，“两国伟大人民的共同努力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防止新的战争灾难”。<sup>⑨</sup>

但是，毛产生怀疑和不满的主要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关于双方签订军事协议的要求<sup>⑩</sup>。根据赫鲁晓夫的意见，中国应允许苏联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和苏联在太平洋的核动力潜水艇进行通讯联系<sup>⑪</sup>。使苏联人惊奇的是，毛对此强烈反对，宣称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侮辱<sup>⑫</sup>。驻北京的苏大使尤金报告说，他与毛的会见象一个晴天霹靂，他（尤金）是我们和中国关系恶化信息的第一个传递者<sup>⑬</sup>。这个警告使苏联领导人感到，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应当秘密飞往北京<sup>⑭</sup>。

毛与赫鲁晓夫的会谈大多在一个游泳池旁举行。两位领导人在各自的浴巾上晒太阳，就象“热沙滩上的海豹”。赫鲁晓夫就建立无线电台一事向中国表示道歉，但坚持说绝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毛提出一个相反的建议：苏联提供贷款，由中国建立一座无线电台。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他声称，虽然这事

定下了，但中国人并未建立这种设施<sup>⑮</sup>。

随着无线电台问题表面解决，赫鲁晓夫又提出要求，允许为苏联潜艇加油。允许海员在中国沿海港口短期度假。根据赫的解释，他的建议实际上是在谋求一个基地。毛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同时提出，作为交换，中国潜艇应当可以进入苏联北冰洋港口<sup>⑯</sup>。

毛对会谈的简短概括把赫鲁夫的要求视为一种企图：封锁中国海岸，派一支联合舰队控制中国沿海地区<sup>⑰</sup>。同时，中国方面的另外报道还证实了苏联要求在大陆重建远程导航基地<sup>⑱</sup>。

也许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不够坦率和全面，也许他为舰队联合行动确曾提出过具体的要求。2月22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讲话包含了一个暗示：他将欢迎联合军事行动<sup>⑲</sup>。但是重要的是，双方都认为，不管联合行动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建议对中苏关系将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

96 中苏首脑会谈发表的公报没有提到台湾。据毛说，他和赫鲁晓夫没有讨论其后对国民党沿海岛屿的炮击<sup>⑳</sup>。赫鲁晓夫没有具体证实这一点，但1958年他与中国会谈的回忆中间接提到了它<sup>㉑</sup>。他确实说了，在那年的某个时候，中国曾要求从我们这里取得军事援助，说是为了对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他们需要飞机、远程大炮和空军顾问”。赫鲁晓夫表示满足中国的要求，并不企图限制北京，因为“我们认为他们试图统一中国领土是完全正确的”。苏联慷慨解囊多少不清楚。西方消息灵通人士认为，1957年到1958年，中国空军状况没有多少改善，它主要由米格—15和一些米格—17战斗机及IL—28轻型轰炸机组成。米格—15在朝鲜战争期间曾是中国空军的主要武器，但到那时“几乎过时了”。米格—17在苏联也在逐渐过时<sup>㉒</sup>。金门危机时期，中国空军变化的唯一象征是以米格—17更换米格—15，以对付对面的海岛。无论如何，米格—17比台湾的F—84佩刀式飞机是处于优势的<sup>㉓</sup>。

赫表示苏联还提出在中国驻扎歼击机中队，并为中国对这个建议的冷淡反应表示惊奇。这个建议体现了中苏“兄弟般的团结”<sup>②4</sup>。十分可能，苏联想在海峡两边的敌视状态中，在中国大陆驻扎歼击机和要求在中国海岸建立通讯设备及海军设施的计划，是为了通过掌握军事实力对一个盟国施加影响，使盟国不致因为轻视核战争的后果而造成最严重的后果<sup>②5</sup>。人们并不奇怪，苏联向中国提出的三项军事要求会引起中国的疑虑，它也可以解释为何毛没有预先通知赫：在他离开北京后3周，中国将发起对海峡对岸国民党的炮击。

97 毛赫会晤是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举行的。在此之前，中国发出解放台湾的号召，在声援中东的群众大会上也不例外。但这个号召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消失了<sup>②6</sup>。我们假设，最高会晤之后，毛决定单独行动以证明他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的批评是正确的，只有通过对抗，美国才会退却。他能采取对抗行动的地方就是台湾海峡。据毛自己的描述，炮轰金门是他在北戴河会议上精心研究的3件事之一（另两件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sup>②7</sup>。这表明举行军事行动的建议也在会上讨论过。

8月23日，当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猛烈的炮击就开始了<sup>②8</sup>。鱼雷艇负责阻止对金门的任何增援。迹象表明，中国的目的与其说是武力攻占金门迫使对方撤退，不如说是涣散对方士气<sup>②9</sup>。自8月27日起，中国大陆沿海的无线电广播向金门施加压力，威胁说将马上登陆，敦促其投降<sup>③0</sup>。有意思的是，这些警告从未向全国广播，大多数中国人对出现的危机还一无所知，……。

中国的炮击刚开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一篇关于中国海岸地区有军队集结的评论中警告说，美国对中共对沿海岛屿的攻击将不单纯看作是有限的军事行动，而是全面的进攻<sup>③1</sup>。由于中国的有效封锁，美国要为国民党的船只护航<sup>③2</sup>。可能是为了阻止美国的支持，9月4日，中国发表了关于十二海里领海主权的声明。

这个声明被美国断然拒绝。同一天，杜勒斯声称，美国将不受任何约束，以保护海岛<sup>②</sup>。当时看来，中美冲突的危险正在迫近。

但是，在第二天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向会议成员保证，政府将试图缓和危机，因为这对世界人民更有好处<sup>③</sup>。他没有预料到炮轰金门之后会引起世界性的震动，指出只有南朝鲜和菲律宾支持美国。然而，危机对那些处于麻木状态的人并不是一件坏事<sup>④</sup>。

- 98 不久后，他表示中国象苏联一样，不希望战争，而且确实反对战争。理由是核武器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中国没有核武器，而且他的听众也会想到，中国不可能依赖苏联的核武器。如果对方首先发动进攻，那么只能是战争。不过中国不怕战争。他暗示，用手榴弹武装起来的中国不会无视原子弹袭击造成的损失。但是，他试图象前年在莫斯科会议上那样使他的听众相信，即使全世界有一半人被消灭了，也不是全面灾难。他告诉他们，他就这个问题同尼赫鲁进行了讨论。不管中国人是否害怕，敌人都可能用原子武器进攻，不过为了保持士气，他们最好不要害怕。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在人民公社里大规模训练民兵的理由<sup>⑤</sup>。

毛9月5日的讲话直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发表，而且不清楚当时俄国人是否知道这个讲话。不过，当时他们急于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秘密前往北京<sup>⑥</sup>。据说，葛罗米柯9月6日参加了中国的政治局会议。他的短暂访问显然是为了弄清中国的目的。由于中国人事先没有就金门行动和俄国人进行磋商，因此他们担心他们在这个军事行动中将担什么义务。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的态度一直十分犹豫。这表明，他们因中苏条约而卷入一场不断升级的危机是非常勉强的<sup>⑦</sup>。这位俄国特使惊恐地听到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泰然自若地谈起苏联和美国的核交锋，而中国能经得起这种核交锋时，便坚决表示，莫斯科拒绝冒这个风险。大概正是由于毛后来所说的赫鲁晓夫过度谨慎<sup>⑧</sup>，以及杜勒斯的拒不妥协，迫使中国人果断地采取行动，来缓解这场危机。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一项



声明，同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只有到了9月7日，赫鲁晓夫才敢冒险写信给艾森豪威尔，保证全力支持北京，并宣布对中国的打击就是对苏联的打击<sup>⑩</sup>。

99 第二天，9月8日，毛以一种明显缓和的口吻，再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暗示，在美国政府内部，对金门危机的做法存在不同意见。他还提到美国人正在考虑沿海岛屿11万国民党军队的撤离问题。即使这些军队不撤离，中国也会继续进行大跃进。他承认，在与会者中有些人并没有考虑到这场危机的有利的一面。他反复谈到他先前的分析，危机的结果会使美国遭到全世界普遍的指责，就连英国也动摇了对它的支持，而中国只是在华盛顿、台北和汉城受到谴责。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毛讲话时，距离收到赫鲁晓夫的支持信不过24小时，但他感到苏联领导人只是同中国人“基本上”保持团结，并说：“他同意台湾应该归还我们，但是希望能够采用和平方式<sup>⑪</sup>。”显然，毛认为，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不会被赫鲁晓夫的恐吓所欺骗，而是得力图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当时，他还违心地签署了中共中央的一封复信，这封信对苏联就中国不受到攻击这件事所作的保证表示“由衷感谢”<sup>⑫</sup>。但是，几年后，中国人公开否认苏联在1958年的金门事件中同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的说法：

苏联领导人分别在9月7日和19日表示支持中国。当时，台湾海峡的形势虽然是紧张的，但是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也不需要苏联用核武器来支持中国。当苏联领导人认清这种形势时，只有表示支持中国……。⑬

其后，金门危机的发展出现了某些戏剧性的时刻，不过正象上面一段引文所强调的，主要决定已经由中苏领导人在9月的第一周末做出了<sup>⑭</sup>。



100 10月份，北京发表了题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毛的语录，目的是要使中国人相信，无论在国际事务中可能经历什么样的暂时挫折，他们终将获得胜利<sup>④</sup>。尽管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肯定了苏联的支持，语录还是谴责了那些过高估计敌人力量的共产党人，这显然指的是苏联在危机中的态度。但是在私下，毛并不象他提出的纸老虎理论那样乐观自信。显然中国驻伦敦的临时代办于1958年秋天向北京发出了认为西方盟国已分崩离析的乐观的信件。毛就此作了评论：

富强的论点是正确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的破裂当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着重号是我加的）<sup>⑤</sup>

.....<sup>⑥</sup>

9月5日，毛曾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美国和中国都害怕战争。问题是谁更怕谁。他请与会者客观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过一两年后再作回答。他自己的看法是，杜勒斯更害怕中国而不是相反<sup>⑦</sup>。

## 第二节 “全民皆兵”

101 毛从这次行动（译按：指金门事件）中所能得到的直接好处是，迅速地组建了民兵。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保持士气，减少对核打击的恐惧。<sup>⑧</sup>他终于使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将军们接受他的观点，即有必要组建民兵。事实上，“全民皆兵”运动是周恩来促使国际危机趋于缓和以后，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sup>⑨</sup>

民兵运动促进了公社内部的“劳动军事化”。这样有助于干部激发起群众爱国主义的热情，动员农民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一个月內，战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式成为民兵。仅这个国家人口最多的省份四川省就有3000万民兵。四川省成都市一家工厂的工人晚饭后用两小时的业余时间进行民兵训练，而在一个乡村每天要训练3小时。在民兵训练中，要养成“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睡觉、统一出工和统一收工”的习惯。“这大大地加强了集体主义的生活和组织原则<sup>④</sup>。”同样，山东省的2500万民兵除了加速民兵训练，“还在大炼钢铁和粮食生产战线上积极发挥主力军的作用<sup>⑤</sup>”。北京民兵有句格言：“生产不忙多训练，生产忙时少训练，生产紧张不训练”。《人民日报》发表这句格言可能是为了抑制过热的业余民兵训练<sup>⑥</sup>。被树为榜样的河南省，在步枪实弹训练中取得了好成绩，放了民兵训练的第一颗“卫星”<sup>⑦</sup>。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军事部门和自己唱的民兵歌曲：

左手拿稿，右手拿枪，

我们把田野当战场。

用锄能打千斤粮，

用枪苦练保国防。

美帝胆敢来侵犯，

坚决把它消灭光。<sup>⑧</sup>

102 尽管这一切都很活跃，印度的一名学者于1958年11月至12月访问了4个公社以后，发现北京附近的一个公社仍在计划组建自己的民兵。据报道，虽然他向公社主任和了解其他方面情况的翻译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决定使这些公社军事化的理由他还是没有弄清：

我在田间漫步，看到地里到处立着一堆堆步枪。我看到一队队农民背着老式步枪在操练军事队形。我问，农民在参加实战以前需要经过多长时间的训练。这位主任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他告诉我，这个伟大的公社运动正处在第一阶段。我来的时候，正值全国形成公社热，而且这个公社热正是盛行的时期。<sup>⑤⑥</sup>

这位主任躲躲闪闪、含糊其词，是可以理解的。1959年1月，2.2亿名男女被吸收参加民兵。尽管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呼吁发数百万支、最终达到数千万支的枪，呼吁每个省都制造轻型武器<sup>⑤⑦</sup>，但要想让这些民兵都接受实弹打靶训练还是难以实现的。普通民兵是由所有15岁至50岁的健康公民组成的，同时还吸收15岁至30岁的人组成一支“基干”民兵，他们不仅在军事方面起带头作用，而且在生产上也是标兵。河南省有2000万民兵，到1959年夏季只有20万基干民兵受过训练，其中仅有一半人经过“实弹”训练<sup>⑤⑧</sup>。确实，数百万没有受过实弹训练的人，被新使用的同生产任务相联系的军事术语从心理上动员起来了。这些术语把农民说成是“农业战线”上的“战士”，把农村地区说成是“战场”，把自然力当作要去战胜的“敌人”。<sup>⑤⑨</sup>

正象一名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1958年的群众性民兵组织在军事上是对常规技术和机构的否定。这类否定正是大跃进的特征<sup>⑥①</sup>。毛在9月底号召大办民兵师，这表明他提出的意见取得了胜利，即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使敌人淹没在“由数万万民兵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sup>⑥②</sup>。这是任何现代化武器所不能摧毁的。这还重申了他的原则：“武器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sup>⑥③</sup>。但是，毫无疑问，毛的胜利使许多职业军官感到不满。<sup>⑥④</sup>

### 第三节 集体主义生活

由劳动军事化迅速形成的集体生活方式，成为干部们宣传的企图向共产主义跃进的基础。一首流行的顺口溜(源出康生)颂扬道：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通向天堂的)桥梁。

这首顺口溜说明，为完成大跃进的艰巨任务，需要通过解放妇女参加生产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需求。

公社食堂是使妇女摆脱家务劳动的一种办法。《人民日报》10月25日在其《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中引用了列宁的论述，并援引了河南省的范例：全省兴办食堂意味着每个公社社员有3个小时的额外时间用于工作和学习，劳动生产率提高30%，意味着600万个妇女劳动从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这家报纸承认，集体吃饭“是改变全体农民的几千年来的生活习惯的大问题”。但是这家报纸说，如果食堂办得好，那么最初的那种不习惯和不方便的感觉就会得到消除<sup>④</sup>。但是，仅两个星期后，这家报纸不得不专门就食堂问题发表社论，因为相当数量的食堂办得不好，其中有许多食堂只有米饭没有蔬菜。这篇社论透露说，食堂运动的必然结果是收回农民的自留地，由公社统一耕作。<sup>⑤</sup>

食堂制可以给劳动力带来的实际好处还从它的发展前景得到保证。10月1月，《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许多公社正在实行免费供应粮食或免费吃饭制度，甚至基本生活必需品都免费提供：

有的〔人民公社〕实行“七包”或者“十包”：即包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发、看戏、烤火费和结婚费等等。这种供给制当然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但它完全冲破了“按劳取酬”的法权限制，适合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在“公”的方面向前发展了，因此它应该属于共产主义的范围，是共产主义的萌芽。<sup>⑥</sup>

据报道，农民感到高兴的是，保证下顿有饭吃的老问题已经解决。毛在视察安徽的时候表示既然一个公社能够实施吃饭不要钱的原则，其他公社同样能这样做。既然吃饭能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可以不收钱。<sup>⑦</sup>

在政治局关于公社问题的决议里，这些都没有提倡，尽管上海市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北戴河会议上明确提出吃饭不要钱的建议<sup>⑧</sup>。确实，刘少奇后来也承认，食堂制仅仅是10月1日由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强行实施的<sup>⑨</sup>。除了意识形态的崇高理想外，实行“免费供给”制显然是为了解决如下问题：即因把较富的和较穷的农业合作社并在一个公社里造成的问题，停止实施旧的工分制度带来的问题，收回自留地带来的问题和大跃进期间长时间体力劳动带来的问题。一些吃闲饭的人少和劳动力多的家庭反对这个办法，说它会降低劳动热情，使“懒骨头”的数量增多。在这些“落后”思想遭到批判的同时，有人想要建立起一种半供给半工资的制度。试图满足某些公社的这种要求<sup>⑩</sup>。刘少奇9月在视察江苏时承认，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能彻底消灭懒汉，但是他支持这种新出现的供给制度：

列宁曾经说过：共产主义的劳动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人们不管报酬多少，不管有没有定额，他们总是做得更多更好。<sup>⑪</sup>

毛本人最喜欢完全免费供给制。他由陈伯达和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陪同访问了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调查怎样建立这种制度。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快上升到党的高位<sup>②</sup>。连因职务的制约而比较谨慎的财政部部长李先念<sup>③</sup>，也认为供给制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件”。<sup>④</sup>

105 解放妇女参加生产的另一个办法，是发展寄宿小学甚至寄宿托儿所。而且，这样做也被看成是一项促进形成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措施。这种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被看作是早期培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世界观的一种方法。青年人的报纸《中国青年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描述社会主义化进程如下：

托儿所建立起来以后，孩子们从小就在托儿所、学校里长大；大家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玩、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什么玩具、糖果、教室、阿姨、老师，以至院子里的向日葵和其它劳动成果都是大家的。这样，孩子们的头脑中就只有“我们大家的”集体观念，而不容易产生“我的”私有观念。集体生活要有规律要互相帮助，这就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和互助友爱精神。<sup>⑤</sup>

寄宿学校运动显然受到了刘少奇的鼓励，表明他对培养共产主义幼苗有兴趣。他在9月视察河南省的公社时曾说过(大意)：

全托比日托好。小学应该把住校作为发展方向。儿童的社会教育应该加快，重点不应该放在家庭教育，尽管家庭教育是必要的。党组织应该加速对社会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的管理……。<sup>⑥</sup>

一位印度来宾曾问过一名在公社托儿所工作的教师，孩子们

是否想他们的父母。有人对他说：“我认为并不怎么想，因为我们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他们在这里有生活必需品，甚至很舒适。我看过去他们在自己的家里也从没有这么舒适。”虽然允许哺乳的母亲和生病孩子的母亲到保育院和托儿所里来看望，但由于孩子们得到训练有素的保育员和教师照顾，母亲的探望总被看成是没有必要的。父母们必须摒弃资产阶级的“母爱”，不要担心自己的孩子，集中精力做好工作<sup>②</sup>。为了减轻他们的思想负担，在托儿所里的孩子必须得到最高质量的照顾。邓小平总书记表示：

照顾婴儿将是未来最重要的一种工作。在全国需要有2000万人做这项工作……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教育人民和训练孩子关心大家……。

支付给他们的薪水应该高于大学教授。<sup>③</sup>

106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需要新的生活设施。老人不再需要照管孩子了。如果他们自己需要照顾，家里也不会有人来照顾他们。随之幸福院建立了起来<sup>④</sup>。这就是说，现在最需要的是解决供一对夫妇使用的宿舍。一位外宾看到田里堆放着一堆堆的砖头。有人对他说，农民们已经在为建造一排排公寓打地基了。这将代替他们老式分散的住宅。每个家庭都会有一居室或两居室不带厨房的公寓<sup>⑤</sup>。另一位来宾碰到过一位公社主任。这位主任显然被谭震林的所有农民住多高层楼房的想法所迷住了：

你们已经见过农民的小屋，既小又不舒适，而且杂乱无章地分散在整个村子里。但是随着这种公社的逐步建立，所有这种小屋将会被推倒。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拆毁这种小屋了。而且我们将会有公寓大楼。事实上，这里和邻近村子所有农民在这个公社的领导下，都将住进这个村子的一幢摩



摩天大楼里。用不了几年，我们的农村摩天大楼星罗棋布，楼内设备齐全，配有厨房、餐厅、裁缝店、学校、体育馆等等”。话说到这儿他停了一下，好让我能憧憬一下中国农村公社摩天大楼密布的美好未来。

他问：“他们对我说，你常去美国访问。他们的农村有摩天大楼吗？”我回答说：“没有”。他满怀信心地说：“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我们将超过他们。”<sup>⑧</sup>

#### 第四节 发扬共产主义道德风尚

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必须有相应的一心想着别人的共产主义觉悟相配合。王力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说，毛把大跃进的成绩归功于伟大的群众运动，归功于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王力在列举了群众性的兴修水利和大炼钢铁运动后，明确表示共产主义劳动是自觉的劳动，没有定额，没有额外报酬。这种自觉劳动本身就形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sup>⑨</sup>。到这时，在毛个人的鼓动下，整个物质刺激问题已经成为群众辩论的主题。<sup>⑩</sup>

107

上海的宣传家张春桥大概受到陪同毛视察徐水的鼓舞，并得到这位主席的鼓励，挑起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辩论。他把“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是工资制的基础。他认为当时的工资制同1949年前解放区的“供给制”相比是不合适的。“供给制”是免费供应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必需品：

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因为，工农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

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sup>④</sup>

这种对延安生活方式的怀念，在大跃进时期出现的大量文章中是很典型的。许多作家象张一样，明确把大跃进看成是重新点燃党在艰苦时期壮丽而纯真的革命火焰的机会。张列举了长征精神，并以藐视的态度批判那种只能靠工资制来刺激生产热情的思想。他认为这种思想是“金钱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他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坚持。但又申辩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资产阶级法权体制及其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应该系统化，并加以发展<sup>⑤</sup>。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是张在附和毛的看法。毛认为工资制是对资产阶级的让步，要靠提倡革命精神，不要靠物质刺激。<sup>⑥</sup>

张春桥的文章重新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毛为这篇文章写了没有署名、基本肯定、但多少有些含糊其词的短序言<sup>⑦</sup>。当时，报界正在报道上海的其他地方的许多工厂取消计件工资<sup>⑧</sup>。一个原因，可能是在产品迅速增长的时候，没有必要实行完善的工资制。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希望避免成本的提高和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大幅度增加工资的必然结果。除了这些现实的原因外，还想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尽可能地把物质刺激限制到最低限度。张春桥明确申辩道：无论怎么说，1958年计件工资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不存在，尽管计时工资仍被认为是合适的而得以保留。<sup>⑨</sup>

## 第五节 新时期的教育

教育体制的改革对灌输新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是基本条件。

最重要的改革是把生产劳动同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种新的体制虽然远没有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那么肯定和具体，但毛还是主张把它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在第48至50条，毛提出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有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这只是为了在这类学校的学生中实行半工半读。

一切高等学校的实验室和车间凡有条件的就应该从事生产，但必须保证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农业学校可以让教师和学生到附近的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sup>⑩</sup>。郊区的中小学“在可能的条件下”可以建立工厂和车间，或到邻近的工厂去工作。凡有土地的教育单位应该创办农场；没有土地而又邻近郊区的教育单位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去参加劳动。<sup>⑪</sup>

毛想让学生更多地参加体力劳动，而刘少奇对这个问题另有考虑。他想为青年人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以满足他们对教育的极大渴求。他在1957年下省视察时就已指出这一点<sup>⑫</sup>。刘透露，山东和江苏省农民家庭的学龄儿童有一半没有上学。一则没有学校，二则其父母供不起他们上学<sup>⑬</sup>。在全国范围内，情况最严重的可能是该上中学的适龄青少年（13—16岁）。他们有3700万人，其中只有大约700万人上了普通中学<sup>⑭</sup>。刘早在1957年11月就提议，“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该调查美国大学的经验，在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半工半读。中国是否可个别试办？请研究<sup>⑮</sup>”。而且，109 1958年5月7日，他再次同共产主义青年团谈话。30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专门讨论半工半读问题<sup>⑯</sup>。刘指出，学生们希望能继续升学<sup>⑰</sup>；在工厂找到工作的初中毕业生，经过大量的实际锻炼，却没有希望继续深造<sup>⑱</sup>。满足这种要求的唯一办法是鼓励地方加快创办半工半读学校。这样既满足了求学的要求，又不会给国家增加财政负担，而且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培养出一大批受过教育的技术员和大学毕业生<sup>⑲</sup>。刘强调，开办半工半读学校的另一理由是，除了使失学者能受教育外，还需要培养受过适

当教育的青年人。1957年中学毕业生有130万之多，其中80万学生不能继续学习，而且因他们没有技术也不能胜任工作。他认为创办半工半读学校的第三个理由是，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sup>⑩</sup>

到5月刘少奇批准半工半读劳动学校时，已经有几千个半工半读学校成立。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可能在3月7日党的书记处会议讨论的基础上，于3月中旬为此类学校开放了绿灯<sup>⑪</sup>。这些“民办学校”的主要形式是农业中学。这些农业中学不仅给不宜整天在田里劳动、尚未成年的青年讲授语文和数学，而且还给他们讲授一些科学的耕作方法，使他们了解政府试图逐步引进和推广的现代化农具和机械<sup>⑫</sup>。学生们的劳动课和生产劳动时间各占一半。尽管一些人可能挣到点零花钱，但他们把劳动所得都用于办学<sup>⑬</sup>。到1960年，有3万个农业中学，300万学生。<sup>⑭</sup>

110 发展以全日制学校和半日制学校为内容的“双轨制”教育制度由刘少奇负责，因为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同陆定一一起负责主管整个文化界<sup>⑮</sup>。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没有考虑到半工半读学校，尽管他清楚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是《工作方法六十条》所要涉及的。他提议，只要不增加国家的开支。凡有条件的地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可以招收额外学生。农业学校应该接收一些合适的农业合作社社员<sup>⑯</sup>。这些建议几乎与刘少提出的有效地解决失学问题不一致。这个分歧和刘的创议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批判的一方面。<sup>⑰</sup>

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家以自己的标准谴责“双轨制”，当然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表面上是赞成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的。这个指示是北戴河会议之前起草的，会上进行了讨论，并于9月19日正式公布。这个指示中特别称赞开办全日制和半日制学校是办学形式多样性的有效措施<sup>⑱</sup>。只有当刘少奇和

陆定一反对把体力劳动引进全日制学校的全部课程，才有理由说成是1958年关于教育战线的“两条道路斗争”。这个指控证据不足<sup>⑨</sup>。更确切地说，刘的观点似乎比毛更激进、更周密。此外，刘注重政治问题——群众对教育的需求；毛注重意识形态——人人参加体力劳动。

1958年初，毛、刘和其他领导人对提倡生产劳动的做法很谨慎，希望保证全日学校的教学质量<sup>⑩</sup>。从春到夏，半工半读学校开始推行，而且明确承认这类学校在教学质量上不如全日制学校<sup>⑪</sup>。北戴河会议后，毛、刘和陆定一全都鼓励在全日制学校加进生产劳动，刘提的意见比毛更具体。

111 毛8月13日视察天津时，一些高等学校经营工厂的方式给他留下了印象。就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发言赞扬这样做，同时他还奚落把农业大学建在城里<sup>⑫</sup>。9月9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说教育的中心问题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在指出俄国人对这个问题也想改革以后，他接着说：

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sup>⑬</sup>

这个月底，毛在湖北视察时，支持学生提出半工半读的要求以及学校普遍办工厂的做法。<sup>⑭</sup>

刘少奇9月在视察时，公开阐述他在石景山一次未报道的讲话中所表示的看法<sup>⑮</sup>。9月16日到18日视察河南时，他在普通学校和大学推行半工半读：

新的工厂能够建立学校，使年少的中学生到那里学习。一家工厂就是一所高级中学，那里的学生每天可以有学习时

间和工作时间。这样工厂就成了学校，学校就成了工厂。半工半读方法能够为高级中学采用，也能为大学所采用。学生一天工作6小时学习3小时，或者一天工作4小时学习4小时的制度必须建立起来。这样的安排必须相对稳定，持续8年或10年，直到学生从大学毕业。这样，学生和工人的数量都会增加。这个阶段结束时，他们既是大学毕业生又是有技术的工人。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sup>⑩</sup>

9月19日至28日访问江苏时，刘进一步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把工厂和学校合并。过去，工厂和学校一直是公开办的，将来逐步把工厂和学校合在一起办。一家新工厂是一所新学校，工人也是学生，他们将为劳动和教育部门共同录取。他们在经过初步训练后，将参加半工半读的学习，选修从初中到大学的课程。这样就能比较快地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培养出真正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sup>⑪</sup>。当时，刘的思想似乎向前迈了一大步，从提倡“双轨制”教育制度发展到设想不仅把两种教育制度合并，而且也把教育和工业合并。有意思的是，1958年9月刘对教育问题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成为非议或批判的目标。

112 到这时，刘少奇的观点明显地超过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指示制定的路线。陆定一作为相对次要的干部，为9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撰文，只是在指示的思想基础上加以发挥。如果把两者作一比较，这篇文章里还看不出文化大革命中集中攻击的反毛情绪<sup>⑫</sup>。对陆和其他人最严肃的指责是，他们决定在所谓削弱无产阶级政治的情况下，保证质量<sup>⑬</sup>。不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同样强调了保证“全日制”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性<sup>⑭</sup>。中共中央指示和陆的文章草拟的时间可能在7月或8月初之前。就毛和刘当时的思想发展之快而论，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陆的文章



一出台就显得落后过时了。

在教学单位，对新政策公开的反应正如预料的那样，是相当热情的。但是在背后，许多老师担心这将是教育界的灾难<sup>②</sup>。据武汉大学校长说，该校哲学系的师生下乡10个月，结果校长和农民对此都很失望<sup>③</sup>。福建农学院停课8个月，以便学生进行生产劳动<sup>④</sup>。昆明一所小学办在一座旧庙里，一位访问过这所学校的英国人看见，在陈旧的木门框上方刷着这样一条标语：“我们是学生，同时又是工人；这里是我们的教室，同时又是我们的车间<sup>⑤</sup>。”在重庆的一所小学里，他发现体力劳动包括割草、铲除路上的杂草及打扫教室。

而他们的大半时间是到当地一家汽水厂去，工厂让他们干一些零活，使他们习惯工厂的环境。我提到在英国，7岁小童在工厂里干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这位女校长听后不以为然，她镇静自若，对违背总路线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她说：“教育的原则是教孩子们工作，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去干活。”<sup>⑥</sup>

113

这位参观者谈到低龄儿童中普遍存在收集废铁的热情。<sup>⑦</sup>官方对这一情况作了详细报道。他们在中学和大学读书的哥哥姐姐们则把废铁炼成生铁和钢。到8月底，11个城市中的18所高等院校，号称有能力炼出近70万吨钢。在南京和广州，有34所中学拥有各式各样的高炉。在济南的一些中学里，7月份一周就安装了77座高炉<sup>⑧</sup>。到10月份，河南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宣布洛阳12所中学联合建造了一座钢铁厂。该厂开工第一个月就生产了130吨“高质量”的钢，现在每天产量达40吨。7岁至9岁的孩子在这里主要是收集材料，一天2小时，老师和10岁以上的青少年负责钢厂的许多实际操作。“由于适当地安排了学习、工作和休息的



节奏，学生的身体健康了，体重增加了<sup>⑭</sup>。”洛阳的作法甚至受到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的表扬。这很可能使低龄儿童的体力劳动强度增加。自然，到第二年，当刘少奇的9岁儿子经过8小时的劳动回到家里时，连他本人也踉跄起来了。<sup>⑮</sup>

## 第六节 土法炼钢运动

114 当然，中国的学龄儿童和学生仅仅是学习他们的长者。北戴河会议后，全中国投入一场全民炼钢的运动，努力实现1070万吨钢的新目标。据说，周恩来在会上表现积极<sup>⑯</sup>，他被毛分配负责炼钢运动<sup>⑰</sup>。这项决定耐人寻味，周早先和他的亲密同事认为这种运动是“盲目冒进”，不过从周的精力和组织能力看，这种安排又是合适的。周成了钢铁大跃进领导小组的负责人，经常主持国务院的炼钢会议，并亲自组织部长之间的协作会议。他和8位副总理把国家分成地区，每人管理和视察一个地区的炼钢运动。周还从大专院校调来队伍充实“第一线”，帮助群众炼钢。<sup>⑱</sup>

9月5日，一位《人民日报》评论员指示省报，宣传的中心必须从农业转向工业，特别是转向大炼钢运动<sup>⑲</sup>。《人民日报》社论要求人民做出更大努力<sup>⑳</sup>。尽管毛本身继续讲需要保持农业与工业的正确平衡<sup>㉑</sup>，但是大力宣传的后果还是不可避免的。到9月中旬，2000万以上的群众从事钢铁的生产<sup>㉒</sup>，据毛说，在炼钢运动的高潮中，参加人数增加到9000万<sup>㉓</sup>。彭德怀后来宣称1958年最后4个月炼钢运动耗费了900亿个工作日。<sup>㉔</sup>

作为中国平时炼钢工业核心的辽宁省，分到的生产任务占总目标的44%以上<sup>㉕</sup>，炼钢运动开始时，担负实现北戴河提出的指标的主要责任是中国的18个主要钢铁联合企业。铁的生产主要靠土法进行。但是到10月4日，大概由于钢的指标不可能按常规方法实现，《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掀起群众炼钢运动与炼铁运

## 虑台湾海峡危机:

我们从报纸上除了学会新的炼钢技术以外,还看到了美国侵略的消息。当帝国主义袭击中东阿拉伯国家时,我们中国正在进行和平建设。我们热爱和平……但是,如果美国人进攻我们,我们将同他们作战。我们这个公社有1200名民兵整装待发,随时准备上前线与美国人较量。<sup>⑩</sup>

那天晚上,在昆明剧院的幕布上贴有一句口号:“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sup>⑪</sup>

116 陈毅在5年后承认,在这种好战的和民族主义的过激气氛中,没有人敢对炼钢运动表示怀疑<sup>⑫</sup>。甚至象彭真这样实事求是的领导人,也赞扬在大炼钢铁运动中使用的土法<sup>⑬</sup>。尽管邓小平至少已经意识到土法大炼钢铁所带来的问题,这种土法还是得到了推广<sup>⑭</sup>。在1958年,张春桥虽然在大力宣传,热情还嫌不高。据彭德怀后来统计,长时间的额外劳动必须由中央政府支付20亿元的额外工分,省市也要支付20亿元补贴,这就使购买力突然增加,从而形成对市场的“巨大冲击”<sup>⑮</sup>。但这些作法毕竟产生了效果。由于成百上千万中国人在高炉旁拼命劳动,钢的日产量迅速增长,并于12月中旬达到1070万吨的目标<sup>⑯</sup>。而在农村,粮食、棉花和其他农作物丰收在望,等待收割,与此同时,一场巨大的灾难也在酝酿之中。

## 注释:

1. 《进军报》1967年6月14日第3页。7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统战会议上讲话。7月11日他在这个会议上讲话中有关对外政策的内容,见《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摘编》,第49—50页。
2. 关于中东危机的情况,参阅巴拉克劳斯《国际事务概览,1956—1958》

第八章。

3. 同上。
4. 这一段是根据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第195—199页的分析。
5.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27号第28页。
6. 同上, 第26页。
7. 在1958年11月30日。参阅《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35页。毛解释了为什么即使中国什么都没有, 西方也害怕中国潜在影响的原因。在这里, 毛还嘲笑了西方那种认为赫鲁晓夫因中国方面的压力而放弃美苏首脑会谈计划的说法。毛提到四大国首脑会谈是失言(当时所谓东西方首脑一般指的就是四大国), 还是向党员暗示他不赞成苏联推举印度也作为第五方参加会谈, 这就不清楚了。看起来不可能的是, 毛会在这样一个场合缩小中国压力的影响, 以便人们听信他的讲话。
8. 引自巴拉克劳斯:《国际事务概览, 1956—1958》。
9. 引自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 第203—205页。
10. “参阅1962年毛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32页;《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88页), 以及赫鲁晓夫的回忆, (《赫鲁晓夫回忆录: 最后的遗言》)第258—261页)。
11. 《赫鲁晓夫回忆录: 最后的遗言》第258页。无论是赫鲁晓夫的回忆还是毛的讲话, 都没有十分清楚地指出苏联第一次提出这个要求是在什么时候。西方一些分析家曾认为这是在1958年4月, 但他们的材料来源, 是英国广播公司收听到的一位中国官员1964年在日本就此问题发表的谈话(《世界广播概要》第5编: 远东, 1488号A2/1页)。这个谈话没有提到任何月份。使人们得出“4月”这个结论的, 除了两位分析家模糊的回忆以外, 最可能的来源似乎是一位现已去世的英国外交官。“4月”这个说法可能是对的, 但鉴于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及其在莫斯科引起的惊慌, 苏联领导人看来不可能拖了至少4个月以后才飞往北京。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拖了4个月才去北京, 那么最符合毛和赫鲁晓夫的说法的解释是, 建立长波电台的提议是4月份提出的, 而建立“联合舰队”的主张直至7—8月中苏会谈时才提出来。
12. 同上。
13. 同上, 第290页。

14. 同上, 第258—259页。赫鲁晓夫的访问使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空中通讯中断了3天。见科罗契科《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 第105页。
15. 《赫鲁晓夫回忆录》, 第259页。
16. 同上, 第259—260页。
17.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 第4期第88页。
18. 《世界广播概要》第5编: 远东, 1488号 A 2 / 1 页。
19. 参阅本卷, 第64页。
20.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58)第1卷第135页。
21. 《赫鲁晓夫回忆录: 最后的遗言》, 第261页。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在谈到他与毛的会谈详细经过时, 没有提到台湾海峡问题, 但却在另外一处说, “在1958年”, 中国要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以对付国民党。艾伦·惠廷拒不相信毛关于中苏首脑会谈没有提及台湾问题的说法, 但对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实际上承认了这一点也不作评论。参阅他写的《金门1958年, 毛的失算》, 《中国季刊》1975年6月号, 第269页。
22. 谢兰莉:《共产党中国在核时代的战略》, 第71—72页, 格里菲恩:《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224—225页。
23. 《纽约时报》1958年8月3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58年8月9日。
24. 《赫鲁晓夫回忆录: 最后的遗言》, 第261—262页。
25. 同上, 第260—261页。
26. 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 第201页、209页。
27.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 第138页。扎戈里亚在他的书中对中国发动炮击金门的一系列原因进行了卓越的研究。他列举了7点, 其中一些是重复的(见扎戈里亚所著书, 第206—208页)。某些原因很可能在政治局中进行过讨论, 但我认为这种分析过分估计了政治首脑, 特别是毛在对全面得失会作出综合分析的程度。主席可能采取更为简单的办法: 为了一个原因, 提出一个具体任务。如果他的同僚和追随者认为有必要得到一个更细致的理由来使他们信服, 那就得由他们自己去摸索了。
28. 欣顿认为, 这天正是缔结苏德条约的纪念日, 选择这一天是为提醒苏联人别忘了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危险性。见欣顿:《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 第266—267页。

29. 扎戈里亚指出：大多数的分析家都同意没有发动登陆作战的企图。炮轰是在台风季节到来前不久开始的，这时进行登陆作战将会遇到严重的困难。此外，进行登陆作战所必需的装备也从来没有集中起来。见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第206页。
30. 美国国务院发表了8月28日中国广播的文本，8月29日《泰晤士报》也刊载了这份文本。
31. 杜勒斯的这段话见麦克法夸尔《中美关系，1949—1971》，第159页。
32. 有关封锁的报道，参阅下列记者所写的电讯：弗兰克·罗伯逊，载《每日电讯》9月3日；汉森·鲍德温，载《纽约时报》9月5日；格雷·麦克格列高，载《纽约时报》9月6日。9月5日美联社的一则报道（见《纽约先驱论坛报》欧洲版9月6—7日）说到，“不断有未经证实的”报道说美国第七舰队不久将开始为国民党的运输船护航。罗伯特·弗兰克林则说（见《观察家》9月7日），美国早已准备好护航船只，但国民党至今仍未接受。
33. 文本见麦克法夸尔《中美关系(1949—1971)》，第159—162页。
34. 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为了向党外高级官员通报政治局已经作出的各项决定及其经济计划。有些不寻常的是，会议开幕的公报列举了参加者的名单，这大概是要在危机时刻显示出一副国家团结的形象。
35.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33页。
36. 同上，作第236—237页。
37. 这次访问只是最近才由葛罗米柯当时的随从，现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问题专家贾丕才透露给西方。参阅多克·巴尼特：《北京与亚洲的权力平衡：1958年的金门危机——中苏关系》，载《共产主义问题》1976年7—8月号，第38—39页。
38. 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9—1961)》，第211—213页；约翰·K·托马斯《联盟的限度：1958年的金门危机》，载加特霍夫编《中苏军事关系》，第124—127页、131—132页。另一种相反的意见则认为苏联实际上完全按中国要求做了。参阅摩尔顿·H·哈尔波林和邹说：《1958年的金门危机》，载哈尔波林编《中苏关系和军备控制》第265—303页。
39.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36页。

40. 参阅扎戈里亚《中苏冲突, (1956—1961)》, 第213—214页。
41.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 第238—240页, 有关赫鲁晓夫的引文在第240页。
42. 引自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 1945—1970年》, 第155页。
43. 引自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 1963—1967年》, 第92页。
44. 危机进一步发展的情况, 参阅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 托马斯:《联盟的限度》; 哈尔波林与邹谠《1958年的金门危机》。
45. 参阅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 第217—221页。
46. 《毛泽东思想杂集》, (1949—1968)第1卷, 第125页。
47. 1959年9月彭德怀被免职后, 粟裕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这可能使人认为他曾替彭免职, 因为当彭拒绝与毛合作的时候他却执行了毛的指示。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粟更可能认为, 解放军遭受耻辱是政治纠纷的结果。关于彭拒绝与毛合作的说法, 参阅《人民的好总理》(1977年), 第197页。
48.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第231页。
49. 同上, 第237页、255页。
50. “全民皆兵”的口号最先出现在9月13日《人民日报》, 该报当天还报道说, 这个运动已在几天前就开始了。然而, 在毛到当地视察并作指示以后, 8月河北徐水把武器发给了公社社员(《当代背景》520号, 第1页)。一个英国作家目击了成都的一次反美集会, 参阅沃拉斯顿:《中国的早晨》, 第107—110页。
51. 《当代背景》530号, 第20页。
52. 同上, 第12页。
53. 同上, 第7页。
54. 同上, 第3页。
55. 同上, 第6页。
56. 钱德拉—塞卡尔:《今日共产党中国》, 第51—52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57.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 第237页。
58. 参阅吉廷斯《中国军队的作用》, 第209—215页。
59. 参阅吉廷斯《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271页。更详细的论述参阅T·A·夏《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 第1—15页。

60. 吉廷斯:《中国军队的作用》,第211—212页。
61. 同上,第211页。
62. 引自乔非:《党与军队》,第90页。
63. 同上,第87—91页。
64. 《当代背景》538号,第2页。虽然在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地都开办了公共食堂,但一些省在当年初就已经开始这项实验了。参阅前引书第5—6页。
65. 《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0日;同上,第20—30页。钱德拉—塞卡尔教授在他所写的《今日共产党中国》第56页引用中国报刊上的一首诗,以说明公共食堂伙食坏到什么程度:  

休息钟声响,  
 我们进饭堂。  
 吃了一口饭,  
 沙子满牙床。  
 品尝蔬菜味,  
 青草菜里藏。  
 放下一双筷,  
 又去耕作忙。
66. 引自 A·V·谢尔曼:《人民公社》;及赫德逊:《中国的人民公社》第36页。
67. 田生:《从人民公社展望共产主义》,《政治学习》1958年第10期,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摘要》151号,第8页。
68. 据李先念透露,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公共食堂问题,参阅《北京周报》1958年第37期,第13页。关于柯庆施是这个提议的发起人,参阅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53页。
69. 《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5号,第26页。
70. 谢尔曼《人民公社》,第36—38页。
71.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67号第3页。7年后发出文化大革命第一阵冲击波的姚文元,也认为这种制度会鼓励懒人。参阅《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00号,第2—5页。
72. 参阅陆仲赞(音):《华国锋对毛泽东评价的漏洞》,《争鸣》(香港)1980



年第35期，第25—31页。

73. 参阅本书第1卷，第86—90页及本卷第2章。
74. 《北京周报》1958年第37期第13页。
75. 《中国青年报》1958年10月25日，英译文见《当代背景》540号，第11页。
76. 同上，第9—10页。
77. 钱德拉—塞卡尔：《今日共产党中国》，第55页，57页。
78. 《红卫兵》1967年第2期，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590号，第13页。
79. 钱德拉—塞卡尔：《今日共产党中国》，第55—56页。
80. 沃拉斯顿《中国的早晨》，第48页，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期间，参观了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新村庄，他奇怪为什么房子的后墙上没有开通气的窗户。当地的党委书记立即就这个建筑上的问题作出决定，并增添窗户（《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11号，第4页）。
81. 钱德拉—塞卡尔：《今日共产党中国》，第51页。有关谭震林对这个问题的评论，参阅本卷第84页。
82. 英译文见《北京周报》1958年第38期，第6页。关于王的身份，参阅本书本卷第四章注129。
83. 参阅吴冷西的说明，英译文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4期，第74页。
84. 《当代背景》537号，第2页。
85. 同上，第3页。
86.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48页；《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233页。《关于供给制的意见》，原文没有提供日期，但文章的调子表明是在1958年，而不是象《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中所提出的那样在1960年形成的。这可能摘自毛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但更有可能是毛私下的谈话，也许是对柯庆施、张春桥和他在上海的其他支持者的谈话。如果毛在北戴河或党内某些重要场合表示过这些意见，那似乎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敢给张春桥泼冷水。
87. 关于这个序言是毛写的，参阅《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4期第74页。
88. 同上，第17—24页。
89. 参阅查尔斯·霍夫曼：《中共的物质刺激政策》，载《中国季刊》1964年1

- 3 月号, 第101—103页; 珀金斯:《共产党中国的市场控制和计划》, 第150—151页。关于由张春桥发起的争论的其他文章, 参阅《当代背景》537号, 第8—17页、33—37页。其中的一篇文章透露, 1958年初, 一些计件工人所得工资, 是他们的基本工资的两倍, 由此引起他们同计时工人的矛盾; 同上, 第5页。
90. 文化大革命期间, 有人企图把毛的半工半读的指示说成是普遍适用的。这个企图表现在断章取义地引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有关条文的一句话上。参阅《刘少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广州:“学习毛主席著作办公室”,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 1967年5月编印), 第7页。指示中的不同之处(“能”和“应该”)是因为农业学校的师生理应在校办农场参加体力劳动。
91. 《当代背景》892号, 第12页; 毛的无标题文集第37页。
92. 本书第1卷第197页。
93. 参阅陈道元等《替‘两种教育制度’恢复名誉》, 《新华文摘》1980年第6期第198页。
94. 罗伯特·D·巴恩森:《中共的农业中学》, 见《中国季刊》1961年10—12月号, 第111页(注7)。这些数字是从陆定一写于1959年3月14日的一封信中透露出来的, 这封信在这所农业中学成立一周年时发表(同上)。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巨大差距, 充分说明许多适龄青年失学的情况。
95. 《新华文摘》1980年6号, 第198页第一行。
96. 引自5月7日讲话的内容, 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53号, 第29—30页; 以及《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 第33页。引自5月30日讲话的内容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53号, 第22—23页、29页;《前十七年教育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年表》, 英译文见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41卷932号, 第30页;《体育战线》(1967年5月6日)第3页;《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 第34页;《刘少奇材料汇编》(第1辑, 1967年4月天津), 第127—128页、131—132页。(《刘少奇材料汇编》, 第127—132页也收入了1958年及其以后在其他场合谈到这个问题的有关言论。)半工半读问题也许在1958年4月和6月召开的两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进行过讨论, 我们对这两次会议的议程可能了解得不够全面(参阅利伯瑟所著书, 第109页、116页)。当然, 在6月份召开的那次会议上, 陆定一转达了

刘5月30日讲话的基本内容(《陆定一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言论摘编》(北京:“首都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联合委员会”,1967年5月),第10期第10页,第80期,第80页,第86期,第19页)。

97.《中国大陆杂志选》653号,第22页。

98.同上,第29—30页。

99.《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34页。

100.《新华文摘》1980年6号,第199页。

101.关于农业中学早期的发展情况,参阅巴林森:《农业中学》第107—108页。关于书记处会议的情况,参阅利伯瑟所著书,第108页。

102.巴林森:《农业中学》,第111—112页、115—117页。据该书说,“公社似乎急需‘初级农业技术人员’。陆定一在1960年2月《人民教育》发表文章说,为完成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任务,中国需要1840000名农机操作人员和440000名‘农业技术干部’。他们要能够驾驶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维修电动排灌设备,在当地的化肥厂和农药厂中完成技术性工作,当测量员、兽医助理、图书管理员,能够在公社的农场和工厂中做类似的初级技术工作。”(同上,第112页)至于这些农业中学毕业生的技能,巴林森引用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话说,他们书本知识不够,但在生产劳动中是很出色的(同上,第118页。)

103.同上,第112页;《中国大陆杂志选》653号,第23页。

104.巴林森:《农业中学》,第110页。

105.参阅本书第1卷,第217有关刘负责新闻和宣传口的情况。正如宣传口负责人陆定一的活动所证实的那样,宣传口包括了教育。然而,刘在青年团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更多地表明了个人的而不仅仅是党的责任,见《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33页(这个材料说,刘的讲话是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但引文本身说明这是在与青年团开会时讲的)。几年后,周恩来声称,甚至身为总理的他,也无法阻止陆定一控制教育部,参阅《首长讲话集》第4辑,(北京清华大学卫东战斗兵团,1966年11月)第68页。

106.《当代背景》892号,第12页;毛的无标题文集,第37页。

107.参阅如《两条道路斗争大事年表》,见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41卷,932号,第30页;以及《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100号,第2页。这

种制度被叫做“双轨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批判刘少奇在天津关于半工半读的讲话是反对毛的，无视毛对武汉和江西的共产主义大学的指示，并说刘因自己的讲话而声称是半工半读的倡导者。参阅《当代背景》834号，第17页；《刘少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第7页；《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33页。

意味深长的是，既没有直接引述刘少奇在天津讲话的内容，也没有提供讲话的日期。遗憾的是，同一时期的资料也没有表明刘在天津什么时候说了些什么。但我们知道1958年7月12日刘在天津上了火车，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正是刘在天津视察时期（《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29号，第1页）。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指责刘无视毛的指示。因为当时主席还没有发表这些指示。毛在9月12日参观武汉大学（《当代背景》891号，第31页），而他对江西共产主义大学作指示的时间是1961年（同上，第36页），虽然周恩来曾说过，毛在1959年给江西共产主义大学写过信，并决定不发表这封信（《首长讲话集》，第68页）。

除了造反派不愿意直接引用刘在天津的讲话之外，另有证据确实表明，刘没有对抗毛的路线。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断言，造反派引述的1964年刘的评论并不能证实刘声称他的天津讲话有在这方面的倡导意义。事实上，刘甚至没有提到他在天津的讲话说了些什么内容，而仅仅对当时天津市群众热情的高涨作了评论（《刘少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第7页）。

108. 联合指示见《新华半月刊》1958年19号，第1—4页。指示中提到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不是公社这个事实证明，这个指示是在北戴河会议前起草的（同上，第2、3页）。（这个指示和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载《红旗》1958年第7期；《当代背景》516号）在指示中名称没有修改，大概反映了形势的发展迅猛，或是官僚主义的僵化。）指示对两种教育制度的支持，参阅《新华半月刊》1958年19号第3页。指示赞成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例子，参阅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41卷，932号，第29页。

109. 关于文化大革命批判的矛盾性的一个例子是，当谴责刘少奇和陆定一时，毛在1958年对旧教育政策的批评被认为是反对刘、陆而受到赞扬（《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见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41卷，

- 932号,第27页),而刘和陆所作的同样的批评则被认为是反毛言论被批判(同上,作第30页;《陆定一反对毛泽东思想》,第4页,注10)。
110. 关于毛,参阅本书第108页;关于刘,参阅《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100号,第21页;关于邓小平,参阅利伯瑟《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年》第108页;关于陆定一,参阅《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见美国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41卷,932号,第30页。
111. 《陆定一反对毛泽东思想》,第19页,注19。
112. 《毛主席教育语录》,第20页(两条)。
113.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41—242页。
114. 《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1934—1966)》,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19号,第31页。参阅关于毛在湖北、安徽参观学校的报道,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06号,第1—10页。
115. 《北京日报》1967年6月8日第5版。
116.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63号,第3页。
117. 同上,1867号,第3页。
118. 关于根据一些简短的、孤立的引语来批判陆定一的文章,参阅《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见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41卷,932号,第30页。陆关于1957年他试图提出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说法(《当代背景》516号,第8页)表明,他领导的中宣部甚至在1958年1月毛再次运用他的权威之前就提出了这项政策。如果是这样,陆可能是想使他自己避免任何落后于形势的指责。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周恩来被迫批判陆定一的教育路线时,他也不能从陆的话里挑出什么毛病,而不得不声称,只有到那时才可能看出陆的讲话中别有用心,而在当时是看不出来的。参阅《首长讲话集》,第67页。
119. 参阅《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100号,第2页;陆定一讲话的日期没有指明,但在1958年是不言而喻的。
120. 《新华半月刊》1958年19号,第3页。
121. 参阅唐纳德·J·芒罗:《中共的平均主义理想和教育现实》,载林德贝克编《中国:一个革命社会的管理》。
122. 《砸烂武汉大学的“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羊城晚报》1966年7月11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3747号,第8页。

123. 《打倒三反分子张再万(音)》，《红色造反报》(拉萨)1967年9月9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31号，第21页。
124. 沃拉斯顿：《中国的早晨》，第91—92页。
125. 同上，第87页。
126. 同上，第90页。
127.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62号，第16—17页。
128. 同上，1887号，第18—21页。
129. 《中国大陆报杂志选》653号，第30页。
130. 《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第68页。
131. 《人民的好总理》第2辑第287页。
132. 同上，第287—288页。
133. 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57号，第16—18页。
134. 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55号，第4—8页、22—24页。
135. 《资料选编》，第232页。
136.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55号，第41页。
137.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39页、41页。
138. 《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英译文见美国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77卷，668号，第8—9页。
139.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55号，第14页。
140. 《北京周报》1958年第40期第6页。早在7月，刘少奇就提倡业余炼钢。
141. 《人民的好总理》第2辑，第361—362页。据说9月20日早上周刚开完一个通宵会议，没有休息，就赶来了。这个日期说明，甚至早在10月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之前，可能在进行试验的基础上，一些群众被动员起来了。北京大学学生参加炼钢运动必须得到国务院的批准，这似乎在9月16日下达了。(同上)
142. 《北京周报》1958年第34期，第3页。
143. 沃拉斯顿：《中国的早晨》第115页。大跃进期间，一个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逃兵在山东省的一间造纸厂工作。他对炼钢运动作了更有偏见的“内部”报道，参阅卡诺：《毛和中国》，第101—102页。
144. 沃拉斯顿：《中国的早晨》第118页。在看完《第十二夜》的演出后，周恩来建议上海的一个剧团上演反映当前斗争的戏剧。参阅《人民的好总理》

第2辑，第519—520页。

145.《文革风云》1967年第9期第28页。

146.《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60号，第6—8页。

147.10月中旬在河北视察期间，邓提倡把土法炼铁变成洋法炼铁，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63号，第4页。

148.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77卷，668号，第8页。

149.《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30号，第17—20页。



## 第二编

退 却

## 武汉退却

---

### 第一节 少中取多

问题在早春季节就很明显了，1958年3月，两名援助中国科学院的苏联科学家乘火车在中国中部作了一次旅行。他们谈到，虽然正值春播季节，但稻田里的农民却很少。他们得出的结论，找到了原因：“我们每天看到数以千计的烟囱在冒烟，从早到晚火光不断，农民们正在贯彻党的指示，在矿山，在土高炉前夜以继日地工作，以便完成‘发展地方钢铁生产’的任务”<sup>①</sup>。甚至在农民卷入大炼钢铁运动之前，那种试图在工农业战线同时搞大跃进的趋势，就已经导致了“城市和农村互相竞争劳动力的紧张局面”<sup>②</sup>。到1958年底，工业职工的数量已由1957年的900多万增加到2500多万<sup>③</sup>。显然，其

中大多数是缺乏劳动保险和医疗条件的临时工和合同工<sup>④</sup>。仅四川省就增加了200多万，河南省增加了100万<sup>⑤</sup>。其后果是，100亿个农业工作日——大约为正常年景用于农业生产的1/3时间，在1958年白白丧失了，虽然损失时间的一半，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而得到了补偿。<sup>⑥</sup>

为了解决工农业战线之间竞争劳动力的问题，采取了一个权宜之计，在公社里组织后备劳力，需要时便调到工业战线。<sup>⑦</sup>在农闲时，全国大约有40%的农业劳力在为完成工业任务，特别是炼铁任务而苦干<sup>⑧</sup>。在河南——这个其他省份要赶超的省<sup>⑨</sup>，这个数字看起来超过了50%<sup>⑩</sup>。当跃进之年进入狂热的尾声时，需要“突击队”返回田间，以便尽量收割丰产的庄稼，并完成其他农活。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了紧急通知，指示突击抢收庄稼和抢运农产品<sup>⑪</sup>。学校停课，机关干部和商店营业员应征参加劳动，非重点建设工程也停了下来，以便提供更多的劳力<sup>⑫</sup>。根据官方的记载，农民们：

劳动不计报酬，不计时间，哪里需要，他们就到哪里，需要干多久，他们就干多久，不分白天黑夜，干在哪里就吃住在哪里，其中既有青年人，也有老年人；既有妇女也有儿童。<sup>⑬</sup>

那些有点头脑的突击队只工作到午夜，而那些过分积极的突击队往往连续干四、五天都不休息<sup>⑭</sup>。1958年7月初，刘少奇在一次谈话中，倡导要劳逸结合，以免人们因疲劳过度而“长眠不起”。但根据当时谈话的具体场合判断，这个劝告的性质看起来远没有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指控的那样严重，并不反映对大跃进有什么反感<sup>⑮</sup>。直到11月9日，《人民日报》才发表社论《要注意保证农民的休息》。社论赞成每个月突击性的劳动时间不超过一星

期，正常的劳动时间应有20天，其余3天为政治、文娱以及社员个人活动时间。而突击性的生产活动时间，每次以不超过48小时为宜，这时一般也要做到每天有6小时的睡眠时间。此外，对青少年和孕妇还规定了更多的休息时间<sup>⑮</sup>。如果用这样的时间安排来保证农民的休息，那么，一个竭尽全力的突击运动的严酷性是很容易想象出来的。毛泽东还在继续坚持突击劳动的做法。<sup>⑯</sup>

121 即使搞了突击劳动，很多地方的庄稼还是没有全部收获上来，这一点后来被承认了。在山东，谷物收获量“低于原来的计划，原因是粗糙的秋收以及其后的损失和浪费。”<sup>⑰</sup>在安徽，第一书记曾希圣承认：“由于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大炼钢铁方面，没有彻底、仔细地做好收割工作。结果，我们浪费了一些粮食。”<sup>⑱</sup>在四川，出现了大丰产，但“由于思想工作和组织管理工作没有迅速跟上去，结果造成了粮食的严重浪费。”<sup>⑲</sup>据说，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曾在私下抱怨：“虽然工业产量增长了66%，但与派成千上万的人上山而造成的农业方面的损失相比，我们得到了多少？而我们的损失又是多少呢？”<sup>⑳</sup>

这些当事人的评论，为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的抨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材料。即使在今天，当获准可以坦率地、公开地批评中国的大跃进的时候<sup>㉑</sup>，要想对1958年的粮食损失作出准确的估计也是不可能的。在一些地区，那些担心不能给集体食堂提供足够粮食的干部们隐瞒了粮食，因而，向农民提供的“免费”粮食远比他们预计的要多得多<sup>㉒</sup>。这种既有浪费，再加上靠不住的产量报告，使得判断实际收获量变得非常困难，同时，统计部门受到压力和冲击，也给这一工作带来困难<sup>㉓</sup>。由于气候条件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产量也确实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真实信息的欠缺，使政治上受到压力、相互攀比的党的干部们提出大大夸大的产量数字，并要求他们忘乎所以的上级去相信。<sup>㉔</sup>甚至一位可以称做是成熟的现实主义者的高级领导人也冲动地宣

称,1958年人均分配的口粮将是625公斤,1959年将达到1050公斤,而到1962年将是2500公斤,他还说:“我们想要多少,就能生产多少”。<sup>②</sup>

1958年11月至12月间,中国领导人举行了3次较重要的会议,它们分别是,11月2日至10日在河南召开的郑州会议;11月21日至27日在湖北召开的武昌会议;以及11月28日至12月10仍是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由于武昌是武汉三镇的一部分,这次会议常被称为武汉会议)<sup>③</sup>。在这些会议上,甚至在私下的谈话中,毛看起来对1958年粮食产量的情况并没有表示过分的疑虑。他在30日提到“不真实的报告”是一个主要的、普遍问题,但紧接着,他宣称1958年的粮食产量是3.75亿吨,比在北戴河估计的最高数字还多了2500万吨<sup>④</sup>,并且是1957年产量的两倍多。为了保险起见,毛主张只公布90%的增长率——总产量3.5亿吨——这意味着比估计的产量少算了6%。12月9日,毛在六中全会的讲话中,再次提到干部撒谎假报数字,但他在这时赞成公布3.75亿吨的数字,而10天以后,又有更高的数字出现了。新数字是4.3亿吨(其中包括一部分薯类作物的产量)。要在新数字上打将近12%的折扣才是原来的数字<sup>⑤</sup>。如果这样的折扣对于与会者来说,似乎还算是冷静和明智的话,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准备把这个降低了的产量作为现实主义的东西来接受,而实际上,这个仍然夸大的产量数字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违背农业常识的。

他们持这种态度的理由是,在各地农村中的一些实验田里,极大地提高产量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他们错误地相信,这种成功能在全中国范围内推广。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争辩说,这样高的产量在小块田里能够做到,但不能在所有的大田里做到。然而,《人民日报》却以社论的形式驳回了这种反面论调。社论认为,小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天河”;“既然在小面积上可以这样做(实现高产——作者注),为什么不可以在大面积上这样做?”<sup>⑥</sup>

使报纸充满信心的基础是，在大跃进期间，农业当局已经找到了取得成功的妙方。在大跃进前夕1957年10月修订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有12条规划被列为决定农业成败的关键<sup>①</sup>。1958年1月底定稿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把这12条扩充为14条<sup>②</sup>。1958年5月，当把《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交到党代表会议时，谭震林强调了6条<sup>③</sup>，但在6月份，他提到7条<sup>④</sup>。也是在6月，农业部长廖鲁言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处提的是6条，而在另一处提到8条<sup>⑤</sup>。北戴河会议前几周，在由高级农业干部主持的各省农业会议上，在提出的条数上也显出同样的差别。<sup>⑥</sup>

123 北戴河会议前夕，谭震林在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试图总结归纳各种不同的“妙方”，他列举了保证丰收的8条“土办法”即：水利、肥料、土壤改良、推广良种、合理密植、防治病虫害、田间管理和工具改革<sup>⑦</sup>。这些是形成最终条文的基本成分，但其间在排列顺序和强调重点上还有出入，而且还有所变更。

在北戴河会议上，谭震林列举的8项减至5项——“水、肥、土、种、密”。土壤改良有了新的含义——深耕，并被认为是提高产量的中心技术环节。关于深耕的特别指示是北戴河会议后发出的5个有关农业问题的文件之中的一个(其他几个文件涉及社会主义教育、水利、肥料和除四害运动)<sup>⑧</sup>。10月1日，《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按照同样的顺序列出了上述5项。但在一周之后，该报登载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一篇文章，张提出的5项略有不同：“水、肥、土、密、管。”<sup>⑨</sup>

10中旬，在另一个有许多省参加的农业会议开始时，谭的以毛的意见为基础的八项措施，以最终确定的次序出台，即：水、肥、土、种、密，防治病虫害、改良工具和加强田间管理<sup>⑩</sup>。这个有华北和东北9省市负责人参加的西安会议，可能是1958年大

有农田普遍推行<sup>⑧</sup>。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称做“三三制”的耕作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总耕地面积的 $\frac{1}{3}$ 用于精耕细作生产粮食， $\frac{1}{3}$ 用于造林， $\frac{1}{3}$ 休闲<sup>⑨</sup>。毛可能是从被称为“基本农田制”的发展中得到了启发。在山西，这个“基本农田制”年初时就作为弥补劳动力短缺的一个办法提了出来<sup>⑩</sup>。北戴河会议后，在北方和东北诸省（包括山西省）负责人参加的农业会议上，这个问题的细节方面显然得到了研究解决，因为其后一周，《人民日报》登载了这些省份的一些县和地区取得高产的报道和社论<sup>⑪</sup>。在这次会议上，尽管有山西参加，一个称做“卫星田”运动的新方针，已被另一个北方省河北提了出来，这个新方针的主要内容是用耕地的10%的从事精耕细作<sup>⑫</sup>。几天后，《人民日报》又提到“高产地”、“丰产田”和“基本田”；《人民日报》强调，这些革新表明，在落实毛的“三三制”方面，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sup>⑬</sup>。接着东部诸省的会议决定，把10%到20%的耕地（福建50%）划出来作为卫星试验田和高产田，以便带动其他的普通田<sup>⑭</sup>。这个决定开辟了依据各地具体条件落实“少种、高产、多收”方针的道路<sup>⑮</sup>。西北各省在他们召开的会议上提到，依据基本农田制，划出10%~15%的土地作为卫星田，推广少种高产的方针<sup>⑯</sup>。南方和西部诸省同意划出10%的土地作卫星田。看起来这一措施象其他省一样，是作为贯彻“少种、高产、多收”方针的一个步骤。<sup>⑰</sup>

后来的报道说明了各省是怎样筹划执行会议决议的。先行的省份山西，1958年的播种面积已经比1957年的数字有了减少，现在又打算在1959年进一步大幅度削减实际 $\frac{1}{3}$ 的耕地面积，数字达到210万公顷<sup>⑱</sup>。其他一些人口相对稀少，而且农业不占主要地位的北方和西北的一些省份，象内蒙、青海计划减少21%的可耕地面积<sup>⑲</sup>。另一方面，人口稠密的“米仓”四川省，仅打算减少8%多一点。这个省计划用15%的谷物耕地作为高产田，指望1959年高产田的粮食产量能达到1958年普通田每公顷产粮7.5吨的10倍，



甚至普通田的产量也要达到每公顷22.5~37.5吨<sup>⑩</sup>。东北的吉林省也确立了相似的目标,但由于吉林省的地形有利于大面积耕作,因而没有计划减少耕地。<sup>⑪</sup>

126 由于统计数字的零散,因此要比较各省减少耕地面积的计划  
和它的执行情况是不可能的。但后来的一些报道证实了四川省计划数字所提供的线索。这个人口稠密、地处中心地带的省份,没有冒完全采用毛的“三三制”这样大的风险,即企图以1/3的耕地来养活全省人民。在安徽,1959年小麦播种面积减少了大约16%,广东只减少7%,辽宁减少8%。黑龙江——那是大面积耕作的典范,耕地面积实际上增加了10%。河北、湖南的数字表明,这两省1958年的耕地面积已有少量的减少,在这样一些省份中,1958~1959年两年多来连续减少耕地的影响也许是值得重视的。例如,河北1959年耕地面积只减少了7%,但这只是1956年以后连续减少耕地中的最后一次。在此3年期间全省已削减耕地130万公顷,大约占总耕地的14.5%。即便如此,这个数字也比毛要求的1/3要少。况且人们知道,如果推广双季作物的话,减少耕地面积并不一定意味着减少播种面积。1957—1959年间,山东耕种面积减少10%以上,但小麦的播种1958年减少9%,1959年却上升13%,使小麦播种面积的增长超过了1957年的数字。同样,安徽省1958年耕地面积缩小,播种面积却增加了。<sup>⑫</sup>

尽管有一些省委书记在贯彻“少种、高产、多收”方针的过程中显得非常谨慎,1958年谷物播种面积还是减少了600万公顷,1959年又减少了1160万公顷,两年累计减少13%<sup>⑬</sup>。显然,参加1958年11月至12月几个会议的中国高级干部中,几乎没有人对重大统计错误有丝毫的觉察,而这些统计数字又是盲目乐观计划的基础。在六中全会上,毛重申他所倡导的“三三制”。这说明,他确信没有必要去束缚农业方面的跃进,虽然他承认,“农业宪法”不能控制太阳和气候<sup>⑭</sup>。的确,这种对粮食产量的盲目自信,能

够解释为什么全会在面临着其他战线的退却时表现出相对的从容镇定。正如一位外国观察家后来指出的那样，党的干部们

127

倾向于认为，考虑诸如灌溉、排水、渗漏、地下水位、湿度保持能力、盐碱度、河流水量、水污染、排洪等问题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情绪的反映。在1958年和1959年那些轻率的日子里，党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大自然是变化无常而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党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匆忙地修建了数量惊人的水利工程。这能给其他国家和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却影响不了大自然。<sup>⑤</sup>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前一年的水利成就仍有深刻的印象，这有助于说明他之所以对农业跃进继续保持乐观态度的原因。<sup>⑥</sup>

要想了解1958年下半年那种席卷全中国的狂热的起因，纯理论但不切合实际的设想是一个方面，但主要还是国家领导人对虚假的报告深信不疑。据刘少奇原先的秘书在最近的一次讲话（这个讲话太敏感，目前很难公开发表），一位高级领导人也被一个农业劳动模范所蒙骗，使他相信，这个农民在1亩田里能生产7万斤水稻<sup>⑦</sup>。即使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国家公布的平均亩产量也只有400斤<sup>⑧</sup>。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位有过科技训练的干部说服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元帅（译按：1958年11月，聂荣臻担任该职）带他去见毛泽东，送上一份报告，说是如果把一个苹果植入南瓜里，这个苹果就会长得和南瓜一样大<sup>⑨</sup>。没有记载毛对此有何反应，但是，如果事先估计主人不会采取积极姿态，这位一般干部看来是不大有胆量争取这样一次接见的。

毛泽东的态度使谭震林有理由进一步敦促党的省委书记们在农村使用新工具，争取更高的产量。后来，当文化大革命的鼓动

者试图为毛主席在大跃进中的过火行为开脱时，谭的这些做法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左倾”<sup>⑩</sup>。毛泽东温和地批评了西安会议（这里间接地批评谭震林，他主持了这次会议）把注意力过份集中在粮食生产上，却疏忽了经济作物<sup>⑪</sup>。10年之后，刘少奇，有时还有邓小平，也一起受到谴责，要他们对从少量的耕地中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的方针负责。其实，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在推动这个方针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领导的角色。如果说大跃进的倡导者们要因1958年下半年的过火行为而受到责备的话，那时的“责任者”肯定包括刘少奇、谭震林以及其它好多人，但毛得首先承担责任。<sup>⑫</sup>

## 第二节 对大炼钢铁的反思

毛泽东在对估计过高的1958年粮食产量充满信心的同时，又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含蓄地承认，大炼钢铁运动缺乏现实主义基础，他要求同事们不要让外国人的吹牛作风钻进自己的头脑！在已生产的1070万吨钢中仅有900万吨质量是合格的<sup>⑬</sup>，在随后到来的秋季，这个数字又进一步减少到800万吨。在发动土法炼钢运动之后的两个多月，毛泽东准备在私下里承认这是一个错误。在修正对今后产量的估计方面，他的退却程度显得更为突出。在9月，他曾认为，根据中国的生产能力，1959年能生产出3000万吨钢，1960年将达到6000万吨，1962年能达到8000万吨至1.2亿吨。<sup>⑭</sup>而这时，他觉得这样的指标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完成，他讲到要把1959年的指标改为1800万吨至2300万吨，1960—1961年改为3000万吨至4000万吨，而1962年的指标则是5000万吨至6000万吨<sup>⑮</sup>。他仍然处在幻想之中。但是，很明显，他是试图把幻想同现实结合起来。早些时候，他曾经承认，在为1959年制定的3000万吨指标中，有1000万吨是“主观主义”的想法。他又表示，一个

人如果没有经历过一件事情，那他就不知道这件事的困难。<sup>⑦</sup>

毛泽东在钢铁问题上的觉醒，似乎是在11月上旬召开的郑州会议以后。他到达武昌以后（即11月21日以后）曾透露，他对于钢铁指标已有了另一个想法<sup>⑧</sup>。在12月9日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宣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大概到1962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显然，这番话在那些热情高涨的干部中引起了一些惊愕，他们不明白搁置这一计划的内情<sup>⑨</sup>。从毛的谈话来看，不清楚的是，为什么在去武汉的路上，他对钢铁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也许他到达武汉时，对于土法炼钢的价值有了现实的估价。也许在武汉——这个国家主要的钢铁生产中心之一，工厂的平部们鼓起勇气讲出了实情。毛泽东肯定会醒悟到，引起交通运输危机的原因在于要向全国各地运输煤炭，以便为大炼钢铁提供燃料。<sup>⑩</sup>

在郑州，毛泽东可能仍处在开路先锋式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影响之下，加之周恩来又没有在那里向他陈述现实情况<sup>⑪</sup>。但自那以后，总理（曾在8月初指定搞了一个关于大跃进进展情况的李富春的调查<sup>⑫</sup>）和他的在经济方面富于经验的部长们大概能够把事实提供主席参考。后来据说王稼祥（中共中央委员，曾担任过一届政治局委员，并同毛有特殊关系<sup>⑬</sup>）在武汉对毛的想法产生了影响<sup>⑭</sup>。不管怎样，毛在那里承认了他的错误，并且保护了计划制定者们免遭那些仍然过分热衷于大跃进的人们可能进行的机会主义的攻击。……毛泽东还抵制了在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现实主义计划上泼冷水的企图<sup>⑮</sup>。反过来，周恩来维护了毛泽东的过火热情<sup>⑯</sup>。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一段著名的讲话中不得不承认：

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打炮三件事，别的事情没有想。北戴河决议

现在要改，那时是热心，没有把革命热情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武昌会议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决议要改，两条腿——俄国的革命精神与美国的实际精神。<sup>⑤</sup>

130 最重要的是，毛现在开始强调计划制定者们遵循的原则——可靠、稳定的基础、协调、全局的观点，并提出全国一盘棋的主张，这句话在以后的几个月内被反复强调<sup>⑥</sup>。此外，毛显然准备容忍计划制定者请苏联对大炼钢铁问题表示意见<sup>⑦</sup>。周恩来也觉得有了勇气去指示一个被参观的公社（他陪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参观了它）停业炼钢，因为这个公社既缺少铁矿石和燃料，又没有掌握炼钢技术。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步骤，它发生在一个外国领导人的注目之下，并且表明，这次参观可能是非常有损面子的。周恩来的指示在那时没有公开。<sup>⑧</sup>

### 第三节 关于人民公社的理论退却

早在郑州会议时，毛就已认识到，需要抑制那些过分狂热的干部们，这些干部曾为刘少奇和毛泽东本人的讲话所鼓舞，相信中国或许能够在3至5年的短时间内，通过人民公社跃进到共产主义<sup>⑨</sup>。毛警告说：“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即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即人民公社）走向全民所有制（即国营农场），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sup>⑩</sup>。（译按：括号内的话是著者加的）

毛在郑州的讲话中详尽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承认：有一些同志反对在两种所有制之间划分明确的界线<sup>⑪</sup>，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就意味着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其中包括在人民公社中实现从集体所有制的转变<sup>⑫</sup>。毛泽东反对这种把人民公社看成是类似于鞍山钢铁公司那样的全民所有

制单位的观点，并且认为，如果忽视两种所有制之间的差别，那么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失去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增加产品供应，并以此来促进所有制向更高的阶段过渡。他还认为，人民公社是我国农村由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再由此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将来，当这两个过渡完成时，人民公社将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sup>④</sup>。

陈伯达是毛泽东在郑州指责过的那些过度热情的人中的一个，他曾提议要取消商品生产，废除货币。这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露出来的，它有令人费解的一面，即难以解释为什么在大跃进期间，一直在思想上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的陈伯达，会突然跑到毛的前面。<sup>⑤</sup>至少有这样的可能性：陈伯达出于毛泽东的默许提出了他的想法，但毛泽东不得不否定它们，因为郑州会议的讨论表明，那些想法将引起反对并产生混乱。

毛泽东向狂热的思想观点泼冷水的举动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最初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持的态度表明，他曾是那些非常热心的人中的一个，而且在夏天，他还让子女们到北京附近的人民公社去劳动。<sup>⑥</sup>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不切实际的产量被宣布出来，他评论说：“我们受骗了。”当徐水的人民公社宣称已经进入共产主义时，刘少奇私下也进行了调查。出于那个特定时代的考虑，虽然刘少奇发现徐水的宣称纯粹是胡扯，但他没有明说，这显然是为了不使干部们沮丧。<sup>⑦</sup>只有当毛泽东已经表态，他的同事们才开始跟着转向。

毛泽东在郑州的讲话肯定会发到随后武汉全会的参加者手中，他在郑州会议的讲话中谈到，他觉得没有必要过多地涉及实现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两个过渡。<sup>⑧</sup>全会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诸如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在农村），以及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的问



题。这两个过渡以及更早些时候的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将意味着要普遍地成立县联社。象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那样，这一过程需要3至6年的时间。但即便在这样一个阶段，也仍然要以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只有当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时才有可能实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宣布人民公社立即进入共产主义是把共产主义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sup>⑨</sup>。毛在私下里曾非常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表，即：15—20年或许更长一点的时间<sup>⑩</sup>。而这个决议则更为保守得多，它提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国需要15—20年，甚至更多一些的时间<sup>⑪</sup>。毛泽东去世以后，所有这些论点都被嘲笑为“穷过渡”，并且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sup>⑫</sup>

132

#### 第四节 同莫斯科缓和

全会决议中有节制的观点几乎可以肯定是为了试图同莫斯科缓和。毛泽东本人承认，全会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主要锋芒是直接针对国际上那种虽尊重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情，但反对它的操之过急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观点<sup>⑬</sup>。显然，前几个月，苏联在这一问题上施加了压力，其顶点是赫鲁晓夫决定要召开一个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在这个会上他要把中国的思想意识纳入正轨。这种压力终于有了结果，苏联的胡萝卜是展示经济援助的前景。中国人迄今已认识到，他们的工业发展速度是否能保持得住，苏联的经济援助是至关重要的。<sup>⑭</sup>

尽管中共中央在公开退却，但是对于赫鲁晓夫来说，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政治、中外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所引起的问题是太重要了，这使得他不能放弃他的抨击。不过，尽管他肯定知道毛泽东在私下里仍然准备使人民公社的实践远远超出官方的宣传



界限，他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还是采取了明智的调和态度。在许多言论中，他实际上是接受了中国人的主张，即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之间是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他仍坚持社会主义阶段是不能随心所欲地超越过去的。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速度问题上，他坚持说，在胜利面前不能止步，但切不能操之过急，过分匆忙地推广尚未成熟的经验。

133 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上，赫鲁晓夫一反由苏联最主要的哲学家 T·A·斯坦波尼扬在苏联对人民公社极为恼火时提出的一个主张。斯坦波尼扬曾试图推翻中国的过热观点，宣称欧洲的共产党国家将作为一个集体一起首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后，亚洲的共产党国家最好也同样一起进入共产主义（因此，中国要等待朝鲜和越南北方）。大概是在八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在阐述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即使在将来我们具备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时，也应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应当由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这样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利。而且要看到，苏联现有的物质基础比我们雄厚得多，他们有比我们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sup>⑤</sup>。”但一个月之后，赫鲁晓夫推翻了斯坦波尼扬所主张的观点，即所有共产党国家将差不多同时地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这是唯一在后来被中国称之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贡献的观点。当时的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在他向苏共二十一大的发言中明确提到：“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越是相互配合，其中发达的国家越是要帮助尚不发达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也就将更快地一起向共产主义迈进。”尤金的这番话具有吸引力，但他肯定比大多数苏联公民清楚，这个把中国经济和苏联及东欧经济大规模地结合起来的呼吁，对中国是不起作用的。

赫鲁晓夫无疑能够在诸如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的问题上采取和解的态度，因为它们是理论上的而不是现实的问题，特别是当

中国在武汉会议对这个问题表示退却之后更是如此。此外，赫鲁晓夫可能希望，毛泽东作为国家首脑引退的决定，最终在武汉会议上得到批准，并在随后公布，这将预示着毛泽东本人以及苏联感到非常不合口味的毛的观点的地位在下降<sup>⑨</sup>。但是人民公社仍然存在着，并且代表着对传统的苏联集体农庄的具体挑战，它们必然通过各种方式受到谴责。赫鲁晓夫认为，集体农庄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继续发挥作用。过早地采用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转变，相反将有损于共产主义的形象，没有物质刺激，就谈不上领导亿万人民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问题。<sup>⑩</sup>

中国暗示赫鲁晓夫关于集体农庄的主张仅仅适用于苏联，从而表示了不同的意见<sup>⑪</sup>。中国并不准备删去《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宣布的值得自豪的词句。这个决议充满激情地宣布：“1958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sup>⑫</sup>，并且接着规定：“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sup>⑬</sup>。决议已经准备承认，有必要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的5个月时间里“对本地区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教育、整顿和巩固工作，即整社工作。”<sup>⑭</sup>

此外，尽管毛在关于人民公社的理论上对苏联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但他在郑州会议上却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以动摇中国的干部们对通常的苏联模式、特别是对斯大林经济观点的尊重。毛泽东的讲话之一，主要是针对斯大林在经济学方面的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曾提议中央省和地区、县一级的党委应该学习这本书。但是，毛在指出这本书前三章的许多观点都是正确的同时，又补充说：“有些地方可能是斯大林自己没有搞清楚”。斯大林没有把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主要是“一条腿走路”，对轻工业和农业不很重视，并且过份

强调技术和技术干部，毛说，斯大林“只要干部，不要政治，不要群众，这也是一条腿。<sup>⑩</sup>”斯大林在这本书主要章节之后的“答阿·弗·萨宁娜和弗·格·文热尔两同志”部分，拒绝了这两位经济学家提出的，把集中在农业机器站的基本生产工具出售给集体农庄，作为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办法。对此毛批评道：“这基本上是错误的”，这表明斯大林“不相信农民”，“对农业机器啃住不放”。斯大林的观点只能是自欺欺人，而且他没有解决在农村中实现两个过渡的问题<sup>⑪</sup>。几天以后，彭真对北京的干部们说，赫鲁晓夫在把拖拉机交给集体农庄方面，比斯大林更进步一些。<sup>⑫</sup>

毛泽东的那些评论是他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以及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的合乎逻辑的发展<sup>⑬</sup>。但是，毛泽东对苏联经济政策的批评到这时已转向个人，不象过去那样停留于广泛的论说。对苏联经济理论的这种既直接有所指，又广泛的抨击，其含义无非是这位前苏联领导人是主要错误的责任者，他对中国政策的错误尚可以由于不了解情况而被原谅，但他对这样重要的国内政策也同样犯了错误。的确，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代表了中国自从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公开捍卫斯大林以来的反向转变。在那篇文章中，这位前苏联领导人受到赞扬，说他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并且“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sup>⑭</sup>。路线的转变大概反映了毛当时对斯大林观点有了进一步的掌握和理解。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肯定会使人大吃一惊：不久前他才认真地读了6年前被誉为对当代经济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高明论著。如果真是如此，就使人饶有兴味地感觉到，毛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但是，即便如此，毛泽东至少在党内还是愿意更多地褒贬斯大林，而且准备出版一本包括毛泽东观点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

些可能更多的是由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关系紧张的结果。<sup>①⑦</sup>

1958年底到1959年初，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达成和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并不奇怪，由副总理贺龙元帅提出的一项中苏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提议为周恩来所否决<sup>①⑧</sup>。这表明，达成和解是经历了一个个单方面的建议，由对方作出逐个让步的过程的，不象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在幕后经历了艰难的谈判。毫无疑问，中国非常恼火赫鲁晓夫的不友好的举动，他向一个“帝国主义”的首要分子——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表露他对人民公社的嘲笑<sup>①⑨</sup>。1959年1月至2月间，在周恩来参加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时，苏联允诺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一大笔新的较大数额的援助，但这并没有消除怨恨。但是，至少周恩来与赫鲁晓夫达成了一个价值50亿卢布的关于建设78个新企业的经济协定，协定中规定中国将以出口偿付债务，这似乎是一个导致恢复双方关系的联合行动<sup>②①</sup>。1959年初，苏联第一枚宇宙火箭发射成功，增强了毛泽东联合的意识，因为联合标志着东风的强劲。这个事件在中国引起了兴高采烈的欢呼<sup>②②</sup>。但其后不到8个月，这种联合关系开始崩溃。

#### 注释：

1. 科罗契科：《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82页。科罗契科在1961年访问加拿大时叛逃，虽然他看到并批评大跃进的过失，但总的说来，他是同情中国人的。
2. 陶鲁笏（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论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新发展》，见《人民日报》1958年5月16日。译文见《当代背景》509号，第23页。
3. 《辉煌的十年》第318页。
4. 尽管1958年工业劳动力增加了3倍，但有劳动保险的工人、职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只增加了20%，即从1150万增加到1380万（比1956年和1957年之间的增长数多了一点），而享受公费医疗的人数只增加了5%，即从660万增加到690万（《辉煌的十年》，第218—219页）。有关四川省医

疗系统运行的报告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95号，第28—29页。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和一些基层干部，因为采用并发展合同制劳动力而受到批判，这些人在福利待遇方面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国家怎样能够提供大量资金担负临时工的费用是困难的。见《刘少奇关于固定工和合同工制度的有关指示》，载《中国大陆杂志选》616号，第21—30页。实际上，与张春桥企图废除计件工资相比，刘少奇不应受到更多的谴责（见本书本卷第6章）。文化大革命以后，黄正身写了一篇为刘和合同工制度辩护的文章《实行‘两种劳动制度’是复辟资本主义吗？》载《新华日报》（文摘版）1980年5号，第26—27页。

5. 关于四川的情况，见李大章：《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四川日报》1959年6月24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109号，第26页。河南的情况见吴芝圃：《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载《红旗》1960年第1期，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摘要》197号，第2页。
6. 关于1958年在农业方面损失的工作日，见陈正人：《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造》，载《红旗》1960年第4期，第4—10页。根据谭震林《关于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若干问题》（《红旗》1960年第6期，第4页）一文提供的数字，我计算了一下，只有 $\frac{1}{3}$ 的工作日用于农业生产。谭计算用于农业的劳动日总数是600亿个，其中50%是用于水利、林业、付食品农作物、渔业等方面。
7. 《当代背景》509号，第24页。
8. 见玛瑞恩·R·拉色：《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农业》，载《中国大陆经济概览》第1卷，第201页。
9. 河北的口号是“向河南学习，超过河南”，见河北省长刘子厚的报告，其译文登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49号，第11页。相互攀比对广东省负责人的影响，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123号，第3页。
10. 《中国大陆杂志摘要》197号，第2—3页。
11. 译文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86号，第17—18页。
12. 《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10月9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75号，第1—3页。也见《人民日报》10月12日的社论，该社论甚至认为收成可能要比预期的还要好，所以，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
13. 《人民日报》1958年11月9日社论，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98号，

第12页。

14.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13号，第6—7页。
15. 参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29号，第4页，及《当代背景》834号，第18页。
16.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698号，第14页，在广东省，由于缺少休息致使儿童中流行麻疹，参见《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你》第3集，第36页。
17.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2卷，第284页。
18. 见山东省副省长晁哲甫在省人代会上的报告，1959年5月22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060号，第36页。
19. 见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的工作报告《在总路线的旗帜下继续前进》，载《安徽日报》1959年2月12日，译文登在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2005—N号，第8页。
20. 见李大章省长在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四川日报1959年6月24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109号，第21页。
21. 《薄一波的四十条罪状》，《红卫兵报》第8期(1967年2月22日)，译文载于《当代背景》878号，第16页。
22. 见本书本卷结语。
23. 李大章估计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20—30%；《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109号，第26页，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一情况。见《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40页。
24. 见李仲明《共产党中国的统计系统》第69—188页及前文第31—32页。
25. 李仲明《共产党中国的统计系统》第93—94页。干部们的相互攀比要归因于毛泽东，见本书本卷第43页。
26. “邓小平的档案材料”，《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7号，第12页。
27. 另两部份是汉口和汉阳，有关这次会议的总结性叙述见利伯瑟《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年》第123—127页。
28.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34—135页。
29. 同上，第140，147页，在147页上有一处印刷错误(中文原文是：《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268页)，在这里毛泽东建议发表的粮产数字是7.3亿斤(不是7.5亿斤)(译按：原文如此)；在同一页其他地方出现的数



字证明这是 对的，此点已被该文的另一篇译文所证实，见《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223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第148页。毛泽东讲话的日期，《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中是12月19日，这也有误，这次讲话刚好是在全体会议结束以后；正确的日期可能是12月9日，这是在目录中标出的。

30.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4日。
31. 《当代背景》479号，第5页，第4条。
32. 《当代背景》892号，第2页，第3条。
33. 《当代背景》508号，第7页。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的原文在1958年没有发表，可能因为这个纲要在大跃进的情况下已经过时了！
34.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98号，第14号。
35. 《人民日报》1958年6月10日，第3版和第4版。
36.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15号，第14页；《新华半月刊》1958年15号，第113页、114页。
37.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34号，第16页。
38.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1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57号，第1—13页。即使是现在，这5项措施看起来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颁布的这些指导措施的顺序上，水利被正确地放于首位，但深耕却被不正确地放在施肥之上，居第二位。
39.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6日。
40.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0日；这次会议的时间是从10月10日到18日。这8条措施被说成是毛泽东提出的。在同一天，报纸还发表了河南省委一位高级干部的文章，提到了7条措施，将防治病虫害删掉了。
41. 同上。
42. 参看上条及《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0日和12日。后者报导了从10月27日开始到11月4—5日结束的2个农村工作会议(西北，东北，南方及西南各省)；由于每个会议决不可能同时召开并一致制定出农业宪法定稿，所以有理由推断这些会议是在农业宪法定稿后召开的。农业宪法是在10月18日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以后琢磨出来的。宣传媒介造成混乱的另一个例子，(见本章注40)在1958年第35期《北京周报》第4页报导西安会议的文章中亦可见到。该报导是在10月28日发表的，当时



第二批多省农村工作会议正开始召开，文章提到了农业宪法，但只列出北戴河提出的5条。也见《北京周报》同期，第8页、10—11页。

43. 赵冈：《共产党中国的农业生产》，第78—80页。
44.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03—104页。
45. 看来，毛泽东有对模范单位和个人表示信任的嗜好。例如，他曾请湖北劳动模范孔木声到他家中作客。孔在1963年受到指责，但从文化大革命中的攻击来看，他的农业小组所宣布的产量是真是假，这一点还不清楚。见《揪出政治扒手王任重》，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9号，第38—40页。
46. 见谭震林：《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红旗》1958年第6期，第10—11页；及《中国大陆杂志摘要》144号，第5页。
47. 《中国大陆报刊选》1857号，第7页。
48. 联合研究：《共产党中国》1958，第74页。
49.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44页。毛把三三制的创造归功于人民，但《人民日报》10月24日的社论却说这一方法是毛泽东提出的。
50. 见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山西经验的讨论，《山西日报》1958年12月8日，译文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46号，第8页，也见新华社1958年12月27日对基本农田制创造者山西的报道，《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20号，第17—18页。
51. 有关会议的报导见10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及对高产田的赞扬；也见《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4日；《北京周报》1958年第35期第8—10页。
52.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0日。
53. 同上，1958年10月24日社论。
54. 同上，1958年11月10日。
55.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12号，第8—9页。
56. 同上，第6页；《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0日。
57.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12号，第11页；《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2日。
58.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93号，第22—23页；及1920号，第17页。
59. 同上，1893号，第23页。
60. 同上，1903号，第23页。

61. 同上。
62. 这些统计数字是依据《共产党中国各省农业统计》第1—2页、30页、50页、60页、139页、159页、179—180页上的各省统计数字得出的。武汉全体会议批准把耕作地的亩数减少 $\frac{1}{3}$ ，见《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96页。
63. 见《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34页。
64.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33页、134页。
65. 恩绍尼·M·唐：《农业的政策和成就》载依克斯蒂·盖仑舍和刘编著的《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势》，第497页。
66. 见毛对安徽取得的成绩的赞扬，载《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42页。
67. 陆仲赞：《华国锋对毛泽东评价的漏洞》，《争鸣》(香港)1980年第35期，译文载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76卷，736号，第20页。
68. 《辉煌的十年》，第121页。
69. 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76卷，736号，第20页。
70. 对谭震林这一时期活动的批判，大多集中于他在西安和山东的讲话，见《批谭战报》1967年8月5日，第4页。他在西安讲话的原文表明了他的这一讲话是在10月份各省农村工作会议发表的(见前文第123页)，而不是在11月或12月陕西西安干部会议上讲的(见前文第84页)。据说谭震林在9月份曾推广使用未经试验的绳拉——拖拉机(《谭震林破坏反对农业机械化的罪行必须清算》，《农业机械技术》第6期，1968年6月8日，译文登在《中国大陆杂志选》624号，第4页)。在同一月份里，毛泽东也曾提倡推广同一工具。(《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874号，第4页)。
71. 第一次郑州会议是在11月中旬召开的，《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31页。
72. 对刘少奇的批判见《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35页；《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33页；及《刘少奇生活中大事编年史(1899—1967)》。译文见《当代背景》834号，第17页。《刘修的传记补遗》，联合研究出版中心档案(华盛顿)41卷，858号，第188页。在此文中，邓小平也受到批判，还宣称毛在给农村干部们的信中，介绍了一种更为合理的政策。但直到1959年4月，才公布(见《当代背景》891号，第34—35页，此处记载的

日期是1959年11月这是不对的)。有关这一重要信件原文的讨论,见本卷第170—171页。

73.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47页。
74. 见本书本卷第89—90页。
75.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41页,144~145页,210页。这里提到的钢产量3000万—4000万吨的目标(第141页)是1960年的还是1961年的不清楚。毛泽东说“在三年以内”,但这可能是指包括大跃进的3年在内(即到1960年),也可能是指从他讲话的时候起的3年之内(即到1961年)。
76. 同上,第133页。
77. 同上,第210页。
78. 同上,第145—146页。
79. 同上,第134页;唐尼索恩:《中国经济体制》,第253页、258—259页。在1959—1960年,煤的运输占了铁路运输总容量的40%。
80. 见利伯瑟:《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年》,第123—124页,他列出了根本没参加或只是部分地参加了郑州会议的领导人名单。
81. 见习仲勋的叙述,载《人民的好总理》第3辑(1979),第18—19页。
82. 见本书本卷第10章。
83. 见王震等:《回忆与继承——怀念王稼祥同志》,《新华月报》1981年2号,第61页。
84.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33页,139页。杨一辰在5月份的代表大会上成为中共中央的候补委员。1958年2月,杨一辰的城市服务部改名为第二商业部,而陈云的商业部改名为第一商业部。在9月份,这两个部合并为商业部,程子华是部长。在1958年11月,陈云成为新建立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主任,而杨一辰调到遥远的青海,承担了一个不重要的职务。直到1962~1963年杨才在中国的心脏地带河北再次露面,成为河北省副省长。见唐尼索恩:《中国经济体制》,第518—519页,而杨一辰的传记见科林与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
85.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33页。

86. 同上, 第138页。
87. 同上, 第133页、139页。
88. 根据《赫鲁晓夫回忆录: 最后的遗言》第274—275页记载, 周恩来在“大跃进开始后”, 带着中国钢铁工业的问题飞抵莫斯科求援。苏联派了一位国家计委副主席, 副总理苏斯杨柯, 去中国实地调查。“几周以后”他向赫鲁晓夫汇报说: 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经验丰富的炼钢工人被派往农村, 留下钢厂由他们当中的生手管理。赫鲁晓夫的追述给人这样一个印象, 即周恩来1958年某时的访问, 完全是由于钢铁生产的危机导致的一次紧急访问。中国总理这次到莫斯科的秘密行动, 意在钢铁生产方面寻求援助, 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 但苏联总理的回忆似乎可能过于渲染了。苏斯杨柯在1959年6月中旬对中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公开访问(《真理报》1959年6月11日和20日;《北京周报》1959年第26期, 22页)。如果这次访问是赫鲁晓夫提到的那一次, 那么它更象是周恩来参加1959年1月2日苏联召开的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安排的。如果是这样, 那么这次访问准备时间之长以及访问时间相对的短暂就不能证实赫鲁晓夫的紧急援助建议。(赫鲁晓夫还详细描述了苏斯杨柯在通往中国的长途列车上是怎样地喝酒。据报作为官方访问, 他来去应该都乘飞机。)同年下半年, 苏斯杨柯同其他人迎接了中国一个重要代表团, 该团由很多同工业有关的副部长组成。见《真理报》1959年9月11日。
89. 《人民的好总理》第3辑(1979), 第6页; 对这次访问的当时报道, 还见《新华半月刊》1958年24号, 第19页。
90.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 第131页。也见段君毅等《少奇同志, 河南人民怀念你!》《人民日报》1980年5月21日。
91.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 第28页。
92. 同上, 第132页。
93. 同上, 第131页。
94. 同上, 第132页。
95. 李锐:《怀念田家英》, 《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 第4期, 第172页;“邓力群同志关于学习《决议》的辅导讲话”, 《中国青年报》1981年7月11日, 译文见《国际广播新闻——中国——81——143》, 第K17页。
96. 《怀念刘少奇同志》, 第377页。

97. 《红旗飘飘》第20辑，第185—187页，242页；安子文，《把我们的党建好——纪念刘少奇同志》，《人民日报》1980年5月8日。
98.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42—143页。
99.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92—495页。
100.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38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257页。
101.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92页。
102. 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概要》，第5部分：远东》5990号，第13Ⅱ/1页。
103.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42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261页。
104. 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第109—133页。此书就苏联对人民公社的反应和中国人宣布的理论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扎戈里亚指出，在北戴河会议决议形成之后但在它发表之前，苏联共产党于1958年9月5日召开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这样看来，好象在决议发表前，苏联已经知道了这一决议的一些内容。
105. 《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摘编》(北京：“首都红代会人大三红批刘邓第一支队”1967年4月)，第47页。
106. 关于毛泽东宣布退居二线一事，(译按：指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见《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87—488页。
107. 最后这两段大部分是根据分析写的，除了特别指出的地方以外，引自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第128—132页。
108. 同上，第133页。
109.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90页。
110. 同上，第492页。
111. 同上，第502页。
112.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29页；毛泽东究竟在1958年还是1959年作关于斯大林的评论，说法不一。参见《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29页、191页。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一书第29—30页证实了毛泽东在郑州会议开始时的一次讲话中谈到这一问题。
113. 同上，第130页。关于斯大林给经济学家的答复，见《苏联社会主义经

- 济问题》，第93—104页。有关斯大林这一论著的政治背景的简介见伦纳德·(斯大林之后的克里姆林宫)，第36—39页。尽管毛泽东批评斯大林，但他要求中国党的党员们继续读苏联这位前领导人的著作，以及其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见《大海航行靠舵手》，第33—34页；《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234—235页。
114.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1967年5月)，第40页。这番评论就象这本书的来源所提示的那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用来反对彭真的，但把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放在一边，而去谴责或证明彭真是追随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分子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彭真还因在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创刊号上写的序言中的一些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前线》1958年11月25日)，但细看一下这个序言，并没有看出这个绪言有反对毛泽东或大跃进的目的。该文的第二句话宣称毛泽东思想将成为刊物的指南。(整段文章的原文见《人民日报》1958年11月26日)。关于批判文章见《《前线》创刊号上的序言是修正主义的宣言书》，载《羊城晚报》1966年5月29日，译文登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3711号，第4—8页；“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1967年6月10日)，译文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639号，第7—8页；《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第34页；《捣毁“三家村”的黑后台》，《光明日报》1967年6月18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3977号，第12—13页。
115. 见本书第1卷，第61—63页；及前文第3章。
116.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47页。
117. 关于新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的报导，见《北京周报》1958年第35期，第18页。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者可能接到指示，提供一个邓小平在年初所称的毛泽东“丰富的”经济思想体系，见《进军报》，1967年6月14日，第2页。
118. 《贺龙在登山运动方面的罪行》，《体育战线》1967年2月9日，译文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75号第19页。贺龙在1959年9月成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他曾在1958年主持了中国登山协会的筹备会议。
119. 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第99页、126页。
120. 《北京周报》，1959年第7期，第12页。有关周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讲

## 第八章

### 136 毛泽东转右

---

#### 第一节 人民公社的调整

人民公社理论上的退却，部分原因是由于党内出现的争论，同时也是中国当时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的反映。武汉会议决定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sup>①</sup>即整社<sup>②</sup>（这个专门用语将在附录 I 中得到确定，（见第181—184页）。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都强调决定从1958年11月至1959年4月进行为期5个月的整社工作，这些会议是：1959年1月27日召开的北京会议<sup>③</sup>；2月初召开的全国省委书记会议；2月27日至3月5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举行的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导致了4月2日至5日仍是在上海举行的八届七中全会。武



汉八届六中全会和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各省召开的党的干部会议以及全国农业干部会议，使基层中的尖锐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sup>④</sup>这些矛盾在党的领导人之间的讨论中也有反应，这使得毛泽东把自己描绘成是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sup>⑤</sup>

甚至在武汉会议文件公布之前，整社工作即已开始并得到加强，因为官方鼓励广大群众利用能够“自由和坦率地”发表他们意见的大字报来进行“大鸣大放”。<sup>⑥</sup>不过有一个重要的改变，在没有同广大农民进一步协商的情况下，就在武汉会议上决定了放松在人民公社化早期曾被推广的军事化训练。在9月份，由《红旗》杂志倡导的“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被扩展为“四化”，即加上了一条“管理民主化”。《红旗》杂志在介绍“三化”的时候，曾经否认这“三化”将会导致命令主义<sup>⑦</sup>。但是武汉会议的决议认为，在人民公社中推行民主制度，有可能被用来阻碍民主生活<sup>⑧</sup>。出于对这一点的担忧而加上的第4条“管理民主化”，意在鼓励农民敢于反对这种倾向。<sup>⑨</sup>

尽管武汉会议赞成群众参加整社工作，但这次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在语言方面的措辞过于审慎，因而不能激起群众更大的热情。广大的基层党委都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即以官方能够接受的形式来动员群众参加整社，首先强调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而将解决其不足之处放在次要地位。

在武汉会议结束后的一周之内，各省党组织先后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决议。山东省在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领导下，用9天时间举行了有3000名干部参加的会议，建议之一是组织3万人的整社队伍<sup>⑩</sup>。其他省份的做法也如出一辙<sup>⑪</sup>。为了与毛泽东关于炼钢的新设想一致，山东省禁止再建立任何“土高炉”；而其他省则下令用国外的或先进的钢铁生产方法来代替土法生产<sup>⑫</sup>。各省会议报道的共同特征，是对1959年的成就将会超过1958年，抱着坚信不疑的乐观情绪。<sup>⑬</sup>

然而，在一向干劲十足的河南省，会议的新闻报道中却流露出压力，对农村形势进行更为现实的评价。根据河南省委的计划，要对人民公社进行彻底整顿。

对人民公社的看法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是多种多样的。一些政策出现重复，而且某些荒谬的主张依然存在。虽然有关产量的指令已经发出，但始终缺乏基本的、组织良好的管理系统去执行。虽然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受到重视，但多种经营的发展却一直有些被忽视。虽然是一种大跃进的形势，但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关心不够，同时对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安排也不适当。<sup>⑭</sup>

## 第二节 广东省的“本位主义”

138 中国南方人民公社更加严峻的情况传到东南亚的华侨那里，他们从广东和福建两省的亲属那里不断得到消息。例如，他们痛苦地抱怨财产被没收充公，“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所有的财产都变成了国家所有；所有的房屋、家俱都变成政府的财产。公社可以为所欲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sup>⑮</sup>。”“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人民公社，任何人都没有私人财产或物品<sup>⑯</sup>。”“你知道吗？缝纫机必须归人民公社公用……，我已经同五叔爷，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了，最后我们决定尽快地把缝纫机卖掉，但缝纫机的价格太低了，因为卖缝纫机的人太多了<sup>⑰</sup>。”“现在，每个人都必须变卖个人财产去‘投资’，看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真正地了解‘投资’的含义。我们被告知，必须把东西交给政府，这就是‘投资’。”<sup>⑱</sup>“所有银行存款或是用来投资，或是被官方没收。从海外（如从东南亚的亲戚）寄来的汇款，只有一小部分给我们自己，其余

全部拿去做公共基金”。<sup>①</sup>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将要重新谈到这类问题。

另一个引起省里和中央关切的较大困难是食品问题，这也是中央内部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一位居住在福建厦门的教师10月23日发出的一封信里，就已有了预兆：城市食物供应危急将在明年出现。他抱怨说：“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吃到一斤肉或一块鱼了。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相同的，任何能食用的物品都得不到。”<sup>②</sup>人民公社的食堂提供人们的基本食物只有米饭<sup>③</sup>或白薯<sup>④</sup>；但每天1斤8两稻米对一个每天工作18小时的人来说是不够的<sup>⑤</sup>。另一封信的作者写道：“人们为了接近饭桶而争先恐后，而米饭永远也不够。”<sup>⑥</sup>此外，即使有时发现了副食品，也没几个人能买得起。“猪肉1元钱1斤。在公家的市场上根本就没有鱼，而黑市上每斤鱼的价格是1元3角到1元4角<sup>⑦</sup>。”“有工作的人可以得到两份配给的副食品。实际上要想买到副食品是不可能的……虾酱和其他类似的食品都没有卖的<sup>⑧</sup>。”“既买不到蔬菜，也买不到鱼和肉，这些东西只有持诊断证明的病人才准许买。鸡蛋黑市价格卖到1角8分到2角钱一个，小鸡卖到3至4元一只<sup>⑨</sup>。”“就拿猪肉来说吧，上个月，我甚至连一小块猪肉都没有能买到<sup>⑩</sup>。”“蔬菜价格太贵不说，还很难买到<sup>⑪</sup>。”在众多呈现一派失望情绪的信中，有一封信总结得比较好：“现在到处都没有东西可买，形势是可怕的，我们饥饿时没有东西可吃。人们害怕死亡，因为他们感到如果死了，他们也不能瞑目。人们在生与死之间踌躇，每个人都在受罪，一切东西都没有了<sup>⑫</sup>。”虽然这一年是共产党掌权后收成最好的一年，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却提出了“一日三餐”<sup>⑬</sup>的口号，这一口号后来招致了灾难。

受到这些来信的影响的海外华侨，又惊动了广东省当局。华侨们表示如果他们的汇款到达后被没收或被集体分掉，或者是得到他们的亲属受到严厉对待的消息，那么来自东南亚的侨汇，这个

中国主要的外汇来源，就会枯竭。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感到有必要对来访的港、澳工商界人士和倾向共产党的港澳中国新闻记者谈一谈有关人民公社的问题。陶铸的这篇公开讲话的摘要，被中国主要的国际宣传机构主办的刊物《北京周报》转载时，突出了这个宣传活动的重要性。

140 陶铸的讲话主要涉及担心消灭家庭、公社的军事化、丧失自由，以及超负荷工作等问题。对所有这些问题，陶铸都坚定地为政策辩护，并且经常提出反驳。虽然他谈到了武汉中央全会增加的人民公社的领导要实行“民主管理”的原则，但他并没有暗示这是由于担心军事化过了头的结果。虽然他也提到最近强调在农村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但在这里他并不是承认，这一做法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在武汉会议上已认识到他们对农民的体力消耗太不顾惜了。更意味深长的是，在这里陶铸没有提及业已开始严重地围扰他及其同事们的食品短缺问题，而这一问题已使上面提到过的那些侨眷忧心忡忡。不过，陶铸宣称，银行存款和华侨汇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sup>⑫</sup>

虽然陶铸提出的保证态度温和，但在武汉会议决议之前，广东省委已经开始就这些问题对大跃进的偏激做法进行了纠正。陶的妻子曾志，在11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强调人们要有足够地休息<sup>⑬</sup>。在12月3日的电话会议上，广东省委一位最话跃的书记，陶的可靠副手，40岁的赵紫阳命令安排工作日程表要考虑休息和娱乐，改善食堂伙食，尊重个人财产，例如房屋、衣物、家俱和存款等。<sup>⑭</sup>

从武汉归来的一个月里，陶铸带领一个工作队在一周之内调查分析了东莞县虎门人民公社的情况，该公社位于珠江入海口。在2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调查报告<sup>⑮</sup>。大约与此同时，1月中旬，广东省委的另一位书记率领另外一支高级别的工作队到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调查研究，他的调查报告似乎

由毛泽东看过，并被广泛传阅。<sup>⑳</sup>

陶铸关于虎门人民公社的详细调查报告占据了《人民日报》的整版篇幅。文章基调是乐观的，这是肯定的，但他还是指出了普遍存在于虎门及广东各地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6个主要问题。<sup>㉑</sup>所有这6个问题中，首要的是集中统一与本位主义这两方面的冲突。本位主义在广大干部中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比较突出”，实际上有一些干部已经堕落，如果不纠正本位主义，那就很有把人民公社变成一个空架子的危险。

本位主义指的是公社的下属单位，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例如，虎门寨生产队在农业合作社时，农民相对地富一些，但自从并入人民公社以来，有些家庭的收入下降。这个生产队的干部企图隐瞒指定要交到公社的粮食、资金和副食品<sup>㉒</sup>。在长达一周的会议以后，大约有5588吨的粮食和12000元钱被揭露出来。另一个隐瞒粮食的生产队解释说，贮存粮食是确保生产队的口粮供应，以防公社的免费供给制中断时有粮食储备<sup>㉓</sup>。1958年10月到11月，隐瞒的资金几乎占了人民公社资本投资的1/4。由于12月份公社的投资比前2个月的投资增加了25倍，所以隐瞒现金也许是一种保留措施，以防生产队的全部资金被吞并到公社的无底洞里。<sup>㉔</sup>

广东省委的另一位书记在徐闻县的详细活动情况，是从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表的唯一的一份含有敌意的文章中得到的<sup>㉕</sup>。陶铸的报告以及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这两个人的批评，使人们能大致了解实际发生的情况。广东省委的另一位书记在他的视察中想得到回答的问题是：“前一年秋天农作物是大丰收吗？如果是大丰收，为什么当时出现粮食短缺？”<sup>㉖</sup>在徐闻县的地里视察以后，他相信了前一年确实是大丰收，还足足有几千斤余粮<sup>㉗</sup>。很多县干部报告说他们发现了很多隐藏的余粮。在1月23日，这位省委书记召集了有4000名干部参加的会议，发动反瞒粮运动。

自动坦白的干部将允许保留粮食,改善食堂伙食,不交待的不允许回家。会上没有一个人说话,会议不得不很快中断。<sup>④</sup>

县里的干部进行个别调查时,揭露出7个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的干部供认有隐瞒粮食的行为(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的文章揭露,这些情况是不真实的,干部们是被迫供认的)<sup>⑤</sup>。在反瞒粮的运动中,曾用过威胁的方法,压力不断增加。有一个队的干部自杀,另一个干部自杀未遂,6人被捕,2人被监禁,并死在狱中;109人被解除职务,总共约50%的基层干部受到了某种形式的批评<sup>⑥</sup>。揭露出38000吨隐瞒的粮食。<sup>⑦</sup>

142 在徐闻县的时候,广东省委的这位书记还召开了一个全省电话会议,宣布他的发现,并号召在各地开展揭露隐瞒粮食的运动。他估计在整个广东省约有300万吨隐瞒的囤粮,几乎是1958年公布的粮食产量的10%<sup>⑧</sup>。在1月25日,他发出了一个指示,简要地说明了他认为全省多数的基层干部都卷入了隐瞒粮食的活动,他认为粮食问题是“现阶段农村中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简而言之,这是意义极为重大的政治斗争。<sup>⑨</sup>

3周以后,在广东省党代会上,陶铸根据武汉会议毛泽东确定的“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宣布要坚决地进行反对本位主义的斗争。陶又说,将全省看作一盘棋也是必要的,并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原则”,特别是人民公社应该更严格地为全国统一计划尽责,言下之意是强调把粮食交给国家的重要性。他否定了那种认为本位主义只不过是革命积极性的一种表现的观点<sup>⑩</sup>。

广东省委的态度得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赞同,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sup>⑪</sup>,这篇文章不容置疑地表明,陶鲁笳在思想上也认为本位主义不符合全国一盘棋方针,应该纠正。他举了一个实例。在进行了反复调查后,他严厉地批评了一个公社,该公社隐瞒了1958年生产的许多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以徐闻县为模式,他动员农民进行大讨论,在讨论中强调了人民公



社对工业和城市居民应尽的义务，列出了国家、集体和个人这样的利益优先的次序<sup>②</sup>。陶鲁笪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来支持他对本位主义的严厉指责(这段话的出处他没有说)：“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sup>③</sup>。

### 第三节 一盘棋的概念

143 省级干部发表的一盘棋的观点同中央阐明的概念是否一致？在《人民日报》题为《全国一盘棋》的社论中，指出一定要反对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小局必须服从大局，下级服从上级，公社服从县，县服从省。按轻重缓急来安排先后次序，眉毛胡子一把抓是不可能的。好象一个人不能用10个手指头同时捉10只跳虱一样，那可能1只也捉不住。国家计划必须涉及选定建设项目，重要资料的生产，原材料的分配，以及采购和分配生产资料及人民生活资料。<sup>④</sup>

毫无疑问，《人民日报》描述的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即是说要由生产队向人民公社缴纳余粮和其他农产品，公社则向县缴纳，县向省缴纳，省再向中央政府缴纳。否则，城市居民还有其它办法得到粮食吗？食品加工厂和纺织厂还有其它办法得到原材料吗？社论的主要论点是强调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的重要性，并且要使各省及下级行政部门抑制1958年大跃进中在各地全力以赴匆匆建立起来的分散的工业，以便缓和原材料普遍紧张的困难，使大型国营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中的大型国营企业，不致于遭到原材料短缺的困难。为了强调这样的信息，这份报纸还在头版登出了描述安徽、浙江、江西和河南等省是怎样在全国一盘棋方针鼓舞下，将最好的铁全部送到上海的报道<sup>⑤</sup>。有意思的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一盘棋方针的重要文章<sup>⑥</sup>，他在文章中强调，上海这个全国主要工业基地和人口集中



的大城市要依靠全国各地输送原材料和粮食。<sup>⑤7</sup>

然而，不管一盘棋方针的最初动机怎样，到了柯庆施和《人民日报》勾划出它的要旨时，隐瞒粮食的问题已使这一方针又增加了一层意思。在提出全国一盘棋这一概念的情况下，记录批评本位主义的一系列措施的时间安排是值得注意的：

1月27日，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北京(政治局?)会议。

1月28日，陶铸签虎门调查报告，批评本位主义。

144 2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柯庆施论一盘棋方针的文章。

2月17日，陶铸在广东省党代会上发表讲话，根据一盘棋的方针，批评了本位主义。

2月21日，在河南的一次会议上，当谈到一盘棋方针时，毛泽东为本位主义辩护。

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论一盘棋方针的社论。

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陶铸的虎门调查报告。

2月27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首次讲话中，为本位主义和隐瞒粮食辩护。

3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陶鲁笏的文章，在谈到一盘棋方针时，批评了本位主义。

3月2日，《南方日报》发表陶铸在广东省党代会上的报告。

3月5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批评性地谈到陶铸和广东省委的另一位书记。

总之，到2月27日郑州会议召开时<sup>⑤8</sup>，广东省的领导者们坚定地反对本位主义，并且认为隐瞒粮食是由于本位主义作怪，号召要在一盘棋方针精神下，消除本位主义。在郑州会议的早些时候，《红旗》杂志发表了山西省抨击本位主义的文章，措辞同广东省一致。毛泽东对广东、山西，可能还有其他省采取的这一立场大不赞成，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里带有同样的情绪。我们现在必须转向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想法。

#### 第四节 毛泽东的重新思考

武汉会议忽略了食品问题，只是在11月下半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及省的领导才开始认识到这一危险因素的滋长，尽管1958年是大丰收之年，但国家粮食收购指标没有完成，而且城市粮食出现短缺<sup>⑮</sup>。据毛泽东说，只是到了北京市民每人只有1两蔬菜时，才引起注意。<sup>⑯</sup>

145

毛泽东对这一问题以及人民公社的有关设想，是在他从武汉返回北京之后才发展起来的。他为解决这些问题冥思苦想，甚至不睡觉<sup>⑰</sup>。1月27日毛泽东召开了一次研究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管理问题的会议<sup>⑱</sup>。2月2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sup>⑲</sup>，在这之后，他开始了有点绕路的旅行，终点是郑州。在天津，他同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进行了讨论。然后到山东，接见了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并参观了由全国农民模范吕鸿宾领导的爱国人民公社<sup>⑳</sup>。2月21日，他在河南省四地区党委座谈会上发表讲话。<sup>㉑</sup>

在2月2日省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主要关心的是勉励与会者再鼓干劲。他认为两个月来的“压缩空气”造成了一些松懈，这不足为奇，但现在我们必须“再鼓干劲”<sup>㉒</sup>。农村工作动得晚了一点。毛很关心积肥活动<sup>㉓</sup>。总路线不能改变，可能每年都有大跃进<sup>㉔</sup>。必须保护扩大干部和劳动人民的热情，当整社期间，有些错误被揭露时，应该记住它这不过是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问题。<sup>㉕</sup>

然而，毛泽东告诫有主观主义倾向的人，不要去做办不到的事，毛号召人们进一步研究有计划和按比例发展的问题<sup>㉖</sup>。他列举了普遍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如：“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经营），

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接着，他这样形容大跃进期间中国的领导特征：“象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痛。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sup>①</sup>。毛泽东似乎准备对大跃进期间过分的工作速度承担责任，拒绝了那种试图原谅他的善意的劝说，他在成都会议上曾提出要劳逸结合。尽管如此，但他注意到还没有制定出一个具体的工作时间表<sup>②</sup>。他再次强调，全党永远要鼓足干劲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要做到多、快、好、省。<sup>③</sup>

在不到3周的时间里，当毛泽东2月21日对河南干部们讲话时，他对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很明显，他重新思考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河北综合了他所收到的信息，他对河南省的干部表示，党已经开始实行一个有重大改变的政策了<sup>④</sup>。可能他也已经收到了赵紫阳从广东写的调查报告的副本，这份报告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几天以后传阅开来<sup>⑤</sup>。他宁愿选择河北的办法，这在郑州变得清楚了。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发表了6次讲话，开始两次是在2月27日<sup>⑥</sup>。毛的这些讲话是重复的，这表明至少有些内容是在分组会上讲的<sup>⑦</sup>。在这些讲话中，毛重申了他在21日对河南省干部讲话的主要轮廓，并有所发挥，而所有这7次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 第五节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仍然强调成绩是主要的——10个指头中的9个指头——而且要反驳算帐派，他还称赞了各级党委在整社中采取了这一立场<sup>⑧</sup>。毛泽东逝世后，薄一波说，主席避免给积极分子泼冷水的愿望妨碍了纠正左倾错误<sup>⑨</sup>。但至少毛泽东已认识到，武汉会议决议未能解决一系列与人民公社有关的重大问题，如：积累与分配，所有制的级别<sup>⑩</sup>，及管理级别<sup>⑪</sup>。而头3个月整社的效

果并不明显：虽然公共食堂伙食有所改善，人们可以多睡一些觉，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sup>②</sup>。尽管毛在口头上说成绩是主要的，但在他的讲话中更多的篇幅是讲缺点和批评。在郑州会议上缺乏武汉会议的谨慎。毛泽东大概估计到，他只能用激烈的言论才能使方针得到修正。

毛泽东用一句短语概括了党在执行农村政策时采取的错误方式：“一平、二调、三提款”<sup>③</sup>。据毛泽东说，这一政策在农村中引起了“很大恐慌”<sup>④</sup>，而且将导致人民公社的“垮台”<sup>⑤</sup>。这种政策是对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否定<sup>⑥</sup>。如果继续坚持这一政策，不可能消除公社干部的恐惧惶惑心理，战胜观潮派、地主分子和坏分子<sup>⑦</sup>。这一政策表明我们高层领导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sup>⑧</sup>

毛泽东认为平均主义（包括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和“共”各种“产”）是去年秋季“共产风”中的内容之一<sup>⑨</sup>，并且强调了同平均主义作斗争的重要性<sup>⑩</sup>。当基层干部指责上级搞平均主义时，后者则以“本位主义”的指责进行报复。毛泽东提倡继续反“左”，就等于在决定性的关头向全党表明他的同情是在“本位主义”一边<sup>⑪</sup>。在公社内部不能随意地将富队的财产转到穷队去，这是无偿占有——甚至是土匪、海盗行为<sup>⑫</sup>——我们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财产也许可以采取剥夺的办法，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sup>⑬</sup>。目前的这种无偿占有行为是对多劳多得这一社会主义原则的否定<sup>⑭</sup>。穷队应当有同富队竞赛的志气，象王国藩农业合作社那样，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力更生）摆脱困难的境地。王国藩农业合作社是在1955——1956年合作化运动中被毛发现而闻名的<sup>⑮</sup>。据毛说，生产队的平均主义是“穷富拉平”<sup>⑯</sup>，现在大部分已纠正了，但还有“余波”存在。<sup>⑰</sup>

实际上，北戴河会议决议已经认识到在人民公社中，穷、富

农业合作社合并在一起将会出现一些问题，并告诫要反对平均主义。但决议流露出一种乐观情绪，认为这是小事一桩，它将在1~2年内随着“人民觉悟的提高”而被消除<sup>⑨</sup>。可惜，这种觉悟的提高并没有出现。一对在中国居住的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夫妇，在河北南部观察了实际发生的事情。杨仪人民公社的领导说，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他们注意到劳动进度很快就减慢下来。在山区的穷队社员松弛下来，是因为他们感到现在有更多的机会依赖富队了。据他们的党支部书记说：“由合作社合并成人民公社，我们得到百分之百的利益，我们这里每人只有一亩多石头很多的地，现在可以得到下边山谷地区生产队的帮助。”然而，这种态度并没有得到山谷地区生产队农民们的赞赏。他们刚开始时还没有松懈下来，但很明显，他们既怨恨穷队将踩着他们的脊背攀向富裕，也怨恨穷队将他们的生活水平拉到一般水准的谷底。这种形势对于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来说，是够严重的，而且他的同事已经得出结论，人民公社中的主要矛盾是穷队和富队之间的矛盾。他们发动了教育运动，想让穷队和富队相信，人民公社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利的，每个人都应为公社和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奋斗<sup>⑩</sup>。可是，行动胜于说教。领导人继续把公社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并在这一基础上平均分配收入，免费提供食物，这就意味着“自动提高了穷队的收入，而降低了状况较好的富队的收入，不管工作效率和生产条件如何。这在穷队和富队中，都不能激发最大的工作热情”。<sup>⑪</sup>只是在武汉全体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这一政策才有了改变。杨仪人民公社也因不分青红皂白地调拨财产，再次犯了毛所指出的那种错误。据一个公社党委成员描述，这第二次错误是：

无偿地将生产队的财产“调到”公社或从某一生产队“调到”另一生产队，这就是社委会接收生产队沿着公路送来的71辆马车和118辆毛驴车的方法；这也是平原地区生产队接

受山区送来的绵羊和山羊的方法，即全都没有任何报酬。这类错误也大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热情。<sup>⑩</sup>

149 杨仪公社的有关报道是有意义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实际例子，而且也是因为干部所犯错误完全符合毛的分类：一平，二调。因此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席的干预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毛列举了“调”的两个类型：物和人<sup>⑪</sup>。“物”不仅包括征调生产队的资产<sup>⑫</sup>，也包括自留地、猪、家禽、房屋和屋内的家具——桌、椅、板凳、刀、锅、碗和筷子，这些主要是拿到公共食堂去了。毛认为自留地收归公社是物归原主，并且承认房屋和家具是不得不借用的。但他批评了不给一分钱就收走家畜家禽的做法<sup>⑬</sup>，他称这是“白日抢劫”<sup>⑭</sup>。毛的这一做法必然会赢得广东和福建那些侨眷的双倍喝彩。

毛泽东认为，农民们并不害怕调土地，因为土地是搬不动的，这种想法可能是他暗中为自留地收归公社所有开脱辩护。但产品和劳动力能被调走，这一点是农民所害怕的<sup>⑮</sup>。他援引河北省一个人民公社的例子。这个社有7—8万人口，劳动力有2—3万，由于猪和家禽收归公社所有，有1万多劳动力离开公社，有些可能盲目流入城市<sup>⑯</sup>。他认为，甚至在人民公社所有制代替生产队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之后。家禽和家畜，房屋旁的树木，小的农具，小工具，以及——在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之前——甚至房屋也仍属于个人所有。<sup>⑰</sup>

毛泽东的主要责难是针对工业和服务业的膨胀，导致了劳动力的转移。与此相联系的还有行政人员数量增加，毛泽东认为这是以牺牲农业做为代价的<sup>⑱</sup>。从中央政府到人民公社有5种级别的工业在运转，工业办得太多了，需要对办工业的热情泼点冷水<sup>⑲</sup>——这可能包括毛泽东在其他场合描述过的“大炼钢铁”的热情<sup>⑳</sup>。毛提到，从清王朝政治家张之洞(1837—1909)办工业之日



起<sup>⑭</sup>，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工业职工人数已增加到400万。从1949年到1957年底，又以平均每年增加100万的速度共增加了约800万人。而大跃进的结果，又有2600万人涌入工业——毛泽东扣除了官方统计数字中约1000万人的水份。这个数字再加上从行政和其他部门调转到工业的400万人，使得在一年内新进入工业的人员总数达到约3000万人。<sup>⑮</sup>

毛泽东估计，工业、行政和服务业这3个部门中的劳动力的浪费，大约在20~40%左右，他提出坚决压缩这些部门中的人数，20%的工人应该回到农村，要回到农村的5个主要行业中——即农、林、牧、副、渔<sup>⑯</sup>。山西省的一个人民公社一次就削减工业劳动力30%<sup>⑰</sup>。服务业职工要大量缩减，因为有的地方平均一个炊事员只负担10个人的饭菜<sup>⑱</sup>。公社不允许成立文工团和体育队，因为这些团队要吸收年青劳力(可能还是精力充沛的)，并且脱离生产<sup>⑲</sup>。行政人员要按公社人口的比例计算，定员不能超出全社总人口的千分之一<sup>⑳</sup>。有些大的公社有几千个行政人员，光吃饭不干活<sup>㉑</sup>。毛特别举了晋南一个人民公社的例子，该公社约有3000人全脱产或半脱产，其中有180多人是文工团成员——全部脱产<sup>㉒</sup>。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人民公社势必崩溃，虽然这只是可能，但若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必将贻笑四方。毛泽东沉着地表示，这也不要紧，对公社重新改造就是了。<sup>㉓</sup>

毛泽东还批评了为修建大型水库及公路、铁路工程而过量使用“义务劳动”<sup>㉔</sup>。“义务劳动”应该减少<sup>㉕</sup>，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劳动量“太大”了<sup>㉖</sup>。毛泽东还热情地提到了11世纪的政治家王安石，赞扬他始创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作各种服役的事业。<sup>㉗</sup>

毛泽东的第三个主要焦虑的是，财政部正向公社收回贷款。这一行动将使公社办的工业难以维持，而毛主张要把这种情况扭转过来<sup>㉘</sup>。他提议，现在还没有向农业投资的国家银行系统，在



今后的10年内，应逐年扩大长期无息贷款的数量，最终达到10亿元，主要贷给贫穷的生产队<sup>⑭</sup>。贫穷的农民们已经接受了为期4年的贷款，要到1960年才到期限；如果现在收回贷款，这意味着人民银行要搞垮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即使已到期应该偿还的贷款，也要延期。<sup>⑮</sup>

151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6周以后，财政部长李先念表示，毛主席的要对公社增大投资的建议已被接受，他当时讲到：

1959年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经济建设支出中增加了对人民公社的投资10亿元，作为国家对人民公社的补助。这笔资金主要地将分配给经济条件较差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使他们能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比较富裕的公社的水平。（着重号是我加的）

但李先念同毛泽东一样，坚持认为大部分落后的单位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劳动和资源，象王国藩农业合作社那样自力更生。<sup>⑯</sup>拨给杨仪人民公社“国家专用的贷款约有41000元，1/3左右贷给了最穷的生产队，”同时，这个贫穷的生产队被告诫要“主动热情地工作”以赶上富队，富队反过来要帮助穷队。<sup>⑰</sup>

10亿元贷款是否足以弥补尚未偿还的贷款，从毛泽东和李先念的讲话以及杨仪公社的报道中都不清楚，而李先念关心的是保护他的部门，不受“一些好心人”的批评。1958年大量增加国家税收，已经意味着将过重的负担加到群众头上<sup>⑱</sup>。李先念在毛泽东不久前对财政部的批评下作了让步，但仍然坚持原则。毛的意图是清楚的：把从富队平调来的资金去援助穷队，减轻国家负担，以达到同时安抚穷队、富队及其干部的目的。

在毛泽东对国家对待人民公社的政策，以及对人民公社自身实行的政策所进行的严厉批评中，可以看出，他时常感到这种严

峻形势的背后，隐藏着斯大林的幽灵。斯大林的头脑过分发热，完全剥夺了农民，而且方式也很粗暴。毛泽东引用一句生动的成语，形容斯大林的作法是“竭泽而渔”<sup>⑭</sup>。显而易见，如果“冒进”的大错误不能在9月以后制止，就有重犯斯大林的错误的危险（这也包括高积累在内），农业就不可能发展<sup>⑮</sup>。在30年代，斯大林未能真正实现集体所有制；他采用的方式是一种比地主还过分的剥夺方式，包括没收农民的70%的产品<sup>⑯</sup>。不过，毛未能指出，在那段苏联农村政策出现错误的关键时期，是斯大林自己下令停止这些错误政策的，他责备他的官员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sup>⑰</sup>。这些正是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

局外人可能会对毛泽东把1959年初中国的形势同苏联30年代初的形势进行比较表示惊异。很清楚，他的目的是要大家记住苏联或中国历史上的教训，看到当时形势的紧迫性，所以在郑州会议上，他用反诘的语气提出了问题：谁能料到，大丰收竟会产生大粮荒？<sup>⑱</sup>

在中国，每年秋收以后到来年夏收之前这段时间里，粮食供应经常紧张，特别是春节以后，而1959年的春节是在2月份第一周的周末。1959年同1958年一样也是个丰收年，粮食问题应该是很小的，但是，毛泽东指出，抱怨食品短缺的声音比1953年和1955年歉收以后的同期要大得多，短缺的食品包括谷物、油料作物、猪肉和蔬菜。国家收购谷物、棉花和油料作物的指标，直到当年年底仍未完成<sup>⑲</sup>。毛承认，去年的大丰收麻痹了我们<sup>⑳</sup>。浪费也是粮食短缺的一个原因，毛泽东恳求他的听众们反对那种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的自满思想，因为当原来的需要满足以后，新的需要又会出现。<sup>㉑</sup>

当然，大范围内的食品短缺的主要原因不是浪费，而是农民“瞒产、私分”<sup>㉒</sup>。毛说农民们“深藏密窖，站岗放哨”<sup>㉓</sup>。为了摆脱上级领导寻找漏报的粮食，农民们白天只吃萝卜缨，晚上天黑

以后才吃米饭<sup>⑩</sup>。当时，隐瞒粮食的现象很普遍，这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和平的反抗)<sup>⑪</sup>。毛泽东估计隐瞒的部分大约是总产量的15%，这就意味着农民掌握着粮食总额<sup>⑫</sup>的45%<sup>⑬</sup>。有时候，一些老太太们封锁了道路，就象她们在1956年刚开始合作化的头一年曾经做过的那样，不让把粮食运走。<sup>⑭</sup>

毛对隐瞒粮食问题的态度，明显地取决于这一问题的大小。试想一个人怎么能同联合起来的5亿农民以及分布在各地的1000—3000万的生产大队、小队干部们作对<sup>⑮</sup>？反对他们和责备他们“本位主义”的只是那些从中央到公社和管理区的6级干部<sup>⑯</sup>。况且，如果广大群众有意见，就会影响到军队<sup>⑰</sup>，因为军队是由应征入伍的农民所组成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sup>⑱</sup>。毛还批评某些公社没收了家在农村的军队干部寄给家里的汇款<sup>⑲</sup>。在一篇讲话中，他承认：“我们的领导没有支持群众<sup>⑳</sup>。”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警告说，盘剥农民的令人寒心的作法，有步秦、隋两个短命王朝后尘的危险。这两个王朝曾成功地统一了国家，但因为统治者的镇压措施而迅速灭亡<sup>㉑</sup>。这些强硬的措辞，清楚地说明了毛在郑州会议上，经常表现出了坦率的“右”倾态度<sup>㉒</sup>。他声称他反对“左”倾、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sup>㉓</sup>，他支持“保守主义”和“本位主义”<sup>㉔</sup>。他热忱地赞同生产队和生产大队隐藏粮食并站岗的行动，认为这是合理合法的<sup>㉕</sup>。他拒绝承认他的这一立场代表了对农民阶级的迁就<sup>㉖</sup>。以前的优先次序必须倒转过来，即要把个人的生活放在公社积累和国家税收之上优先考虑<sup>㉗</sup>。他还用挖苦的口吻说：

他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嘛，他懂得点马克思主义，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办事的。<sup>㉘</sup>

在某次会上，毛告诉与会者，如果他们想“左”倾，他就“右”

倾<sup>⑮</sup>。在这次讲话中他宣称：

我代表1000万队长级干部、5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sup>⑯</sup>

154

## 第六节 毛泽东的解决办法

毛的全部指示同他在2月初在全国省委书记会议上的告诫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时，他主张当年有些事情的速度应当放得更慢一些，人民应该获得更多的休息。在体育界，银行或诗歌方面要少放“卫星”。实际上，当他指出写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时候，就等于动摇了群众诗歌运动的基础。<sup>⑰</sup>

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更多的具体的纠正方法，是包含在他的批评之中的。为了防止平均主义和平调财产，他号召要坚定地执行两个政策：三级所有制，以生产队（以前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所有制为基础<sup>⑱</sup>；三级管理与核算制，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sup>⑲</sup>

毛认为，如果从互助组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转变曾经用了4年时间，那么，从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到人民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转变则需要4～7年的时间<sup>⑳</sup>，这是可以理解的。毛认为这一转变的时间决不会超过7年，但他有时把这一时间的上限和下限减去1～2年，认为这种转变可以在少则3年，多则5、6年完成<sup>㉑</sup>。据推测，他希望尽可能不挫伤干部们的热情。在这个时间表的末尾，他还计划了由公社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到公社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的进一步转变（实际上是全体中国人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将在15～20年内完成<sup>㉒</sup>。这样，尽管他看到了公社问题的实质，但他没有从武汉会议上所作的乐观预言中退缩<sup>㉓</sup>。而且，

和武汉会议决议一样，毛断言，这两种所有制的转变的主要条件是通过扩大社办企业来增加公社的财富。<sup>⑭</sup>

155 谈到三级管理和核算，毛指出，公社行使的支配权太多，至少有10项之多<sup>⑮</sup>。公社应当把某些权力下放<sup>⑯</sup>，最大的争执点，是公社是否应该集中掌握劳动力<sup>⑰</sup>。公社积累过多，刮共产风<sup>⑱</sup>，这是造成瞒产私分的主要原因<sup>⑲</sup>。应该减少这种现象。<sup>⑳</sup>在杨仪人民公社，一些农民说：“我们打了更多的粮食，但是粮食都到哪里去了？我们种得越多，他们拿的越多<sup>㉑</sup>。”显然，广东、福建的侨眷所反映的情况，并不仅仅限于中国南方。毛泽东批评了河南的做法，说他们占用了农业收入的70%，其中包括：农业税（7%），公社积累（26%），生产费用（20%），管理费和福利费（17%），只剩下30%用于消费<sup>㉒</sup>。这就是农民们为什么要瞒产约15%，以便把生活消费的实际比例提高到45%的原因。为了制止这种行为，并且使农民平静下来，毛泽东提议在所有制问题<sup>㉓</sup>以及作为消费和公社积累之间的产品分配问题上公开作出保证，把公社积累的比例从26%减少到18%。<sup>㉔</sup>

毛泽东在一篇讲话中用了14个短语概括了他的指示，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sup>㉕</sup>

毛泽东想通过各省6级干部会议传达他的指示，要求在会议上讲清政策，避免骂人，统一思想。<sup>㉖</sup>

## 第七节 毛制止陶铸

在很多场合，毛泽东借助于一盘棋的概念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他坚持说，5亿农民在全国一盘棋中占有首要位置，是主要的成份<sup>㉗</sup>。现阶段，只有半盘棋，因为分配所得太少，生产队所有制

并没有实行。<sup>⑭</sup>全国一盘棋的观点，实际上意味着统一安排人民生活、公社积累和国家需要<sup>⑮</sup>。过去，一盘棋理论只是由上级掌握，到这时，必须由上下两级一起掌握。<sup>⑯</sup>

156 毛泽东的一盘棋主张和陶铸及广东省委提倡的反对本位主义正好相反。毫无疑问，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他最后一个重要讲话中，提到了陶铸和广东省委的另一个书记。他不相信珠江流域(广东省省会广州所在地)和长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sup>⑰</sup>。毛泽东提到的长江流域可能是指安徽，该省的领导人显然认为农民犯了本位主义的错误，不过，他们采取了阻力最小的对付措施，并且决定，反对把它看成是一个错误。同样，河南也决定不对本位主义采取惩罚行动。<sup>⑱</sup>

奇怪的是毛泽东没有提到陶鲁笏，他在山西实行的反对本位主义的政策同陶铸是一样的。毛详细描述了山东省农民典型吕鸿宾所在公社社员的对立情绪，那里的群众抗拒征收粮食，社领导下令搜查农民的屋子，这些干部发动了一场神经战，但以失败告终<sup>⑲</sup>。毛以非常赞赏的语调谈到了刘子厚，他所在的河北省委在武汉会议后实行了“共产主义”(即左倾)路线，但是5周以后即2月13日，当他们认清了所面临的问题时，就将政策完全改变过来了。然而，即使是河北也没有解决所有制的问题。<sup>⑳</sup>

毛泽东关于陶铸的评论，其影响是决定性的。4—5月在汕头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陶以《总路线与工作方法》为题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并承认他自己在很多问题上头脑发热，其中之一就是反瞒产。显然他还承认了一些与此有关的错误，如：过高地估计了粮食产量，并为国家征购的粮食定额制定了过高的指标(高征购)。他还承认，他曾过分地强调“密植”，过分热衷于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而且在广东“共产风”盛行。根据赵紫阳20年以后的叙述，在所有问题上，陶带头承担了责任。<sup>㉑</sup>

毛泽东对反对本位主义的猛烈攻击已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一



怀的指责的影响，毛泽东的立场有所改变。但在5月看来，陶铸不过是进一步阐明了毛在郑州会议上所持的观点。此外，根据1959年初广东省发生的事情，认为陶铸在大跃进问题上醒悟得比毛泽东要快，这是错误的。<sup>⑮</sup>

后来，赵紫阳在为陶铸的文章作说明时说，这表现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陶曾引用孟子的一段话：“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蚀，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sup>⑯</sup>。”赵紫阳强调，陶铸曾指出：“如果一个‘古之君子’能做到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就更能做到这样了，因为我们为群众工作之心，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不知比‘古之君子’要高多少倍。”<sup>⑰</sup>

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赵紫阳没有试图去反驳姚文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陶铸文章的另外一些更重要的攻击。姚文元说陶铸：

他一面说人民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蓬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一面公然借攻击“太阳”的“过失”，指桑骂槐地说：“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射得过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还有黑点”……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领袖吗？<sup>⑱</sup>

另一方面，根据毛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断言陶铸对党进行了集中的攻击，也是站不住脚的。同毛比起来，陶铸是含蓄而温和的。不过，陶铸暗示毛泽东也犯了错误的说法，更符合实际情况，特别是1965年陶铸的文章再次发表时，曾谨慎地把涉及“领袖”的言论删去，此刻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毛的个人崇拜正在建立起来<sup>⑲</sup>。根据早先毛要陶铸及早收兵退却的事实，陶铸不可能要把大跃进的所有错误都归诸于主席<sup>⑳</sup>，更有可能的是，他受到



毛要求全党干部讲真话的号召的鼓舞<sup>②</sup>，才指出毛对无节制的大跃进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不能把责任简单地归到左倾的党员干部身上，这样也可以弥补一点个人威信的损失。

159 如果是这样，陶铸的意见可以拨动其他省级领导人的同情心弦，他们对毛强令他们服从其政策的做法感到不满。对陶铸本人的谴责，可以使一部分不象他那样热衷于积极宣传的省委书记们松了一口气<sup>③</sup>。当时，他们也受到批评，而作为毛的大跃进的忠实执行者，当毛突然转到反对他们的立场上时，他们肯定心有怨气。即使是开玩笑，他们谁也不会甘冒被指责为站在反党立场的巨大风险，并受到开除党籍的威胁。而毛本人则可以随意采取这样的严厉措施，以达到他的目的。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在经历了1957年整风运动的分歧之后<sup>④</sup>，毛泽东又重新建立起同党的干部的联系。然而，毛在郑州右转弯，又使各省党的干部出现“离心”，尽管他们支持毛的政策。彭德怀是否受到陶铸这篇文章中的不满情绪的影响，使他在庐山会议上利用这篇文章发难，即使是事后诸葛亮，也还是不能肯定<sup>⑤</sup>。这篇文章发表时，彭德怀正在国外。

#### 注释：

1.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502页。
2. 《人民手册》(1959)第44页。关于这段译文的简短讨论，见T·A·夏：《从术语和语义的变化看人民公社在退却》，第24页。
3. 见利伯瑟《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年》，第130—138页；《彭德怀自述》，第299页。利伯瑟认为(第131页)，毛谈论的北京会议象是1月12—26日举行的各省委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参加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但这似乎靠不住。毛谈及的北京会议象是指1959年7—8月庐山会议前的几次会议中的一次。在庐山会议上，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批评者们表示了他们的怀疑(《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95页；第2卷，第311页)。但是，国防部长彭德

怀和其他三个庐山会议上的主要批评者没有理由要参加象农村工作部长们这样相对低级干部的会议，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出席了这次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高级官员仅有谭震林、邓子恢、陈正人，他们负责全国的农村工作。因此，北京会议大概是另一次政治局会议。我已考证出这次会议的日期是27日，因为根据毛的讲话(《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79页)，在那天透彻地讨论了人民公社的管理问题。这可能也是在7年后称之为持续了不到一天的那次会议(《当代背景》891号，第71页)，毛对这次会是不满意的。

4. 关于武汉会议后的情况，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38号，第6—17页；1945号，第7—16页。
5.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第41页。
6. T·A·夏：《从术语和语义的变化看人民公社在退却》，第25页。
7. 同上，第29—35页；又见同前作者《隐喻、神化、仪式和人民公社》，第3—15页。“三化”的正式译文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见《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501页)；“三化”的中文见《人民手册》(1959)，第44页。
8.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501页。
9. 夏：《从术语和语义的变化看人民公社在退却》，第34—35页。
10.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38号，第6—7页。
11. 同上，第12页、14页；1945号，第13页、14页、16页。
12.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38号，第7页、11页、14页。
13. 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38号，第6—17页中的举例；1945号，第7—16页也可见到。
14.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65号，第11页。
15. 沃克：《来自人民公社的信》，第16页。
16. 同上，第18页。
17. 同上，第18—19页。
18. 同上，第39页。
19. 同上，第17页。
20. 同上，第18页。
21. 同上，第20页。

22. 同上, 第23页。
23. 同上, 第34页。
24. 同上, 第38页。
25. 同上, 第30页。
26. 同上, 第36—37页。
27. 同上, 第41页。
28. 同上, 第42页。
29. 同上。
30. 同上, 第19页。
31. 薛光军:《乾坤浩气存——深切怀念陶铸同志》,《红旗》1979年第1期。其译文载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73卷,74号,第83页。
32. 见《文汇报》(香港)1959年1月13日登载的陶铸的讲话,其译文登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39号,第9—10页;《北京周报》1959年第9期,第6—9页。
33. 译文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13号,第8—9页。
34. 沃泽尔:《共产主义下的广东》,第258页。有关赵的年龄以及其他详细背景,见《赵紫阳的经历》,载《野战报》,1967年10月13日,其译文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85号,第13页。
35. 译文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71号,第26—40页。
36.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第39页、41页。
37.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71号,第33页。
38. 同上,第27—28页、29页。
39. 同上,第33页。
40. 同上,第32页、33页。
41. 徐闻县红联:《一起惊人的政治迫害事件》,载《红色造反者》1968年1月4日,译文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123号,第1—11页。
42. 同上,第11页。
43. 同上,第4页。
44. 同上,第4—5页。
45. 同上,第5页。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叙述,言外之意是说,没有隐瞒粮食;在那时,毛并不相信这一点。

46. 同上, 第5—7页。
47. 同上, 第7页。
48. 同上, 第6页。在广东, 这位省委书记拟定了一个揭露隐藏粮食50亿斤——60亿斤的指标。1958年公布的粮食产量是620亿斤。参阅《中国大陆报刊概览》, 1974号, 第32页。
49.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123号, 第11页; 也见第6页, 广东的这位省委书记认为隐瞒粮食的问题遍及全省这已得到证实。
50. 《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8期, 第33页。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在1月29日全省党代会上工作报告中, 当谈到“一盘棋”方针时也提到反对本位主义, 但他没有将它同隐瞒粮食问题联系在一起。见《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7期, 第20—21页。山东省委书记舒同, 在1月24日全省党代会上工作报告中, 激烈抨击本位主义, 但他没有牵扯该省委高层领导中长期存在的政治问题。见《大众日报》, 1959年2月7日。
51. 《红旗》1959年第5期(3月1日出版), 第25—29页。
52. 同上, 第26页。河南省党报在一篇关于“一盘棋”方针的社论中, 强调了存在共同的利益, 该文说, 生产队必须服从于公社, 公社必须服从于县, 县必须服从于省和国家(《河南日报》, 1959年2月13日)。
53. 《红旗》1959年第5期。
54. 《人民日报》1959年2月24日。
55. 同上。
56. 《红旗》1959年第4期, 第9—12页。
57. 同上, 第12页。对上海的这一方针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强调, 邓小平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2月20日该市委工业会议上赞扬了它, 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 1972号, 第17—18页。尽管有高级领导支持, 这一方针的落实仍是困难的。当时有这样·一个插曲, 在上海举办的全国商品交易会上, 广州市代表团的负责人公开拒绝广州市生产的日用产品在广州市以外出售, 除非他的交易条件能被接受。见“打倒广东财贸系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28号, 第19—20页。
58. 《彭德怀自述》, 第299页。
59.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39页、47页。

60.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第278页; 在《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157页上这段译文中“一盎司”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两”, 等于50克。有关采取的紧急措施, 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 1933号, 第2—12页。
61.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39页。毛深夜工作的习惯可在下面的一个例子中得到反映。1959年1月28日凌晨4点钟毛还在给原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基层干部写信, 见《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 第204—205页。
6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60页。文化大革命期间, 毛对这次持续不到1天的会议表示不满(同上, 第45页; 《当代背景》891号, 第71页), 但在当时他似乎是满意的。
63.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第271—279页;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151—158页。虽然这个讲话标明的日期是2月2日, 但毛讲话的原文却说:“现在是2月1日”。不管怎样, 结合上下文来看(毛事实上没说“今天”), 毛只不过是强调一个新的月份已经开始, 而不是说讲话当时的实际日期。
64.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60页。关于这个公社的报告, 见吕鸿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半月刊》1959第11号, 第87—88页; 《北京周报》1959年第20期, 第9—10页)。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从2月13日到23日在农村视察, 见《大众日报》, 1959年5月6日。
65.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3—7页。这篇讲话的题目所涉及的地区, 象“新、洛、许、信”, 我认为是指新乡、洛阳、许昌、信阳。
66.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151页。
67. 同上, 第153页。这两条消息以1959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传播给广大读者。事实上, 省一级的党组织已经忙于积肥运动了。见《大众日报》, 1959年2月3日。
68.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153页。
69. 同上, 第154页。
70. 同上, 第156页。
71. 同上, 第157页。
72. 同上。

73. 同上, 第158页。
74.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4—5页。
75. 同上, 第39页。
76. 同上, 第8—49页。
77. 利伯瑟:《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 1949—1975年》, 第133页。
78.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第16页、17页、25页、36页。
79.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献给党诞生六十周年》, 载《红旗》1981年第13期, 其译文见《国外广播新闻——中国——81—145》第K34页。
80.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10页、20页。
81. 同上, 第47页。
82. 同上, 第40页; 也见第18页、39页、42页。
83. 同上, 第34页、36页、39页、40页、41页、44页; 在第19页, 这个短语的最后部分也可读作“三收款”, 也见第10页。《中国共产党术语汇编》第229页, 指出, 这一短语是首次使用的。(《汇编》所指的是毛对会议的短得多的讲话稿, 已被收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第279—288页)。这个口号后来被林彪采用的情况, 见多梅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 第68—69页。
84.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19页。
85. 同上, 第44页。
86. 同上, 第34页、39页。
87. 同上, 第36页。
88. 同上, 第40页。
89. 同上, 第22页。
90. 同上, 第21页。
91. 同上, 第9页。早些时候, 毛从另一角度对农村的本位主义进行了抨击。见本书第1卷, 第293—294页。
92.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159页。
93.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14页、22—23页。
94. 同上, 第21页; 及第11页。
95. 同上, 第23页、36页、38页、45页。有关王国藩农业合作社的描述, 见毛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 第13—14页、16—26页。

英译本第24--25页、67--81页。

96.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9页。
97. 同上, 第14页。有关河南对这一问题的考虑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 1965号, 第15页。
98. 《共产党中国, 1955—1959, 政策文件及分析》, 第455—456页; 《人民手册》(1959), 第33页。
99. 大卫·克鲁克和伊沙贝尔·克鲁克: 《杨仪人民公社的最初年月》, 第38—39页。
100. 同上, 第42—43页。
101. 同上, 第43页。
10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41页。
103. 同上, 第19页。
104. 同上, 第6页、14页、22页、29页。
105. 同上, 第40页。
106. 同上, 第15页、40页。
107. 同上, 第40页。对劳动力盲目流向城市的问题, 毛只是顺便地提了一下, 郑州会议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见同上, 第48页。
108. 同上, 第15页。
109. 同上, 第6页、11页、12页、15页、21—22页、23—24页、31—32页、41页。
110. 同上, 第11页。
111. 同上, 第41页。
112. 有关张之洞在中国早期现代化方案中的作用的描写, 见邓嗣禹和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响应》, 第164—174页、195—207页。
113.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15页。
114. 同上。
115. 同上, 第32页。
116. 同上。
117. 同上, 第15页、21页、24页、32页、41页。
118. 同上, 第15页、24页。
119. 同上, 第21页。



120. 同上, 第14页。
121. 同上, 第41页。
122. 同上, 第10页、11页。
123. 同上, 第44页、45页。
124. 同上, 第10页。
125. 同上, 第44页。有关王安石变法的简述, 见赖肖尔和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 第206—208页。
126.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9页及第10页。
127. 同上, 第34页。
128. 同上, 第42页。
129. 《当代背景》562号, 第7页。
130. 大卫·克鲁克和伊贝尔·克鲁克:《杨仪人民公社的最初年月》, 第57页。
131. 《当代背景》562号, 第3—4页。
13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11页。
133. 同上, 第26页。
134. 同上, 第44页。对斯大林的其他批评性评论, 见同上, 第5页、48—49页。
135. 见范索德《如何统治俄国》, 第530—532页。
136.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26页。
137. 同上, 第18页; 也见第21页。
138. 同上, 第16页。
139. 同上。
140. 同上, 第10页、11页、18页、21页、26页、41页、47页。
141. 同上, 第21页、29页、38页。
142. 同上, 第26页、45页。
143. 同上, 第38页。
144. 同上, 第9页、26页、45页。
145. 同上。
146. 同上, 第4页。
147. 同上, 第47页。关于基层干部们的特殊烦恼, 见同上, 第36—37页。

148. 同上，第29页。毛还指出，在公社以上干部（公社及地区级）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在上级和基层群众出现对抗时，一些干部保持中立或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见同上，第26页。
149. 同上，第39页；毛的话是：“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
150. 同上。
151. 同上，第48页。
152. 同上，第41页。
153. 同上，第27页。毛有点低估了秦王朝的寿命（公元前221—206年）同时有点过高地估价了隋王朝的寿命（公元589—618年）。
154. 同上，第9页。
155. 同上，第36页。
156. 同上，第11页、13页。
157. 同上，第13页、38页、45页。
158. 同上，第27页。
159. 同上，第13页、16页、26页、31页、38页。
160. 同上，第13页。
161. 同上，第42页。
162. 同上，第41页。
163. 同上，第35页、36页、441页。文化大革命期间，外文部长陈毅曾因为1959年4月告诫《诗刊》杂志不要变成通俗诗的刊物而受到批判。见《东方红战报》第91期，1967年6月15日。看起来象是毛选择了陈毅（曾出版了一本诗集，见《陈毅诗词选集》）去转达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发表的这些具体意见。
164.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第40页。
165. 同上，第22页。
166. 同上，第12页；也见第9页。
167. 同上，第12页、20页、28页、30—31页、37页。
168. 在某个场合，毛指出，在这15年期间，要包括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的过渡阶段，同上，第49页。在另一次讲话中，他还指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可能需要20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并且要加上队向公社过渡的阶段；同上，第20页。毛的含糊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

169. 见本书本卷第131页。
170.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19页、30—31页、37页。
171. 同上, 第26页。
172. 同上, 第22页。
173. 同上, 第23页。
174. 同上, 第22页。
175. 同上, 第10页。
176. 同上, 第22页。
177. 大卫·克鲁克和伊贝尔·克鲁克:《杨仪人民公社的最初年月》, 第59页。
178.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8页、13—14页、45页。较早一点的更不明确的分析, 见第6页。
179. 同上, 第10页。
180. 同上, 第16页、24页、26页、33页、36页、45页。积累与消费的确切关系至少可以用三种方法计算。见福建省经济计划委员会农业办公室:《人民公社积累和消费的计算方法初探》, 载《计划与统计》第5期(1959年3月)。其译文载《中国大陆杂志选》173号, 第44—45页, 其中引证的一个例子, 也许是福建公社中的典型, 根据这一计算方法, 其消费在51.65%~72.61%之间变动。福建的分析和毛提到的河南数字的统计方法之间的主要区别是, 毛显然没有把福利消费计算在消费之内。
181.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35页。
182. 同上, 第30页、35页、45页。
183. 同上, 第24页、31页。在这时, 毛对综合平衡的强调, 见柳随年:《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需要研究的一些问题》, 载《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5号, 第16页。
184.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10页。
185. 同上, 第24页。
186. 同上, 第36页。
187. 同上, 第39页。
188. 同上, 第40页。毛对安徽政策的总结是简略的, 但意思似乎是清楚的。
189. 同上, 第39—40页。

190. 同上，第39页。也见他早些时候对河南省委干部们的讲话，同上，第114—115页。
191. 赵紫阳：《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23日，转载于《新华月报》1979年4号，第56—57页。赵继续列举了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看起来他跳过了1959—1961年发生的一些事件，因为这些措施直到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才被采纳。那时陶铸讲话的原文（见《新华半月刊》1959年13号，第1—6页）包括承认广东省委的错误，但没有自我批评，没有承认头脑发热，也没有提反对隐藏粮食的错误。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陶铸在文章的某一段间接地针对瞒产问题指出，主观和偏见能冲击压倒现场调查的结论（同上，第5—6页）。
192. 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学的评论》，第123页。
193. 这篇文章还被收入陶铸本人的文章选集，书名是《理想、情操、精神生活》（1962年第一次出版）。
194.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载《中国建设》（增刊），1967年11月，第17—18页。
195. 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建议和异议》，第84—85页。
196. 我引用的译文出自雷格：《四书》，第588页。有趣的是，姚文元没有试图暗示，陶的引文是想吸引他的读者去注意紧接着前面那句话：“此外，古之君子犯了错误时，他们能改正错误，今之君子犯了错误却还坚持错误。”
197. 《新华月报》，1979年4号，第57—58页。
198.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第17页。
199. 同上。
200. 这个暗示见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85页。
201. 见本书本卷第10章。
202. 《红旗》从1958年第1期到1965年底，即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在省级高级官员中，只有上海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与陶铸相等，有发表过5篇文章的记录（山西的陶鲁笏发表4篇，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湖北的王任重各有3篇）。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1959年陶铸有6篇文章或讲话被《新华半月刊》转载，与之相比，曾希圣是5篇，

柯庆施和内蒙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各有4篇。而且，没有几个省委第一书记能象陶铸那样吸引党的一批高级领导人参加1959年2月召开的广东省的党代会，诸如：国家副主席朱德元帅、政治局常委林彪、中央委员叶剑英元帅、农垦部部长王震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等人（《南方日报》1959年3月1日）。也见《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7号，第17页，关于党的高级领导人及其家属的广东之行。

203. 见本书第1卷，特别是第3编和第4编。

204. 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指出，在陶铸的文章发表不久，彭德怀就在庐山发动了进攻，但姚没有试图说明进一步的关系。

## 第九章

### 160 刘主席

---

#### 第一节 从郑州开始退却

3月9日凌晨，郑州会议闭会4天以后，毛签署指示，要求省委第一书记们首先迅速召集省、地、县、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六级会议，这类会议是他在郑州会议的讲话中倡议的<sup>①</sup>。这些会议计划开10天，讨论公社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一向打头炮的河南已经召开了六级会议，会议定于3月10日结束。这个会议产生的文件迅即在14日以前送往其他省份以供参考。然而，毛表示他不愿意让第一书记们坐等这些文件的到来，并建议象湖北省那样在11日开始开会。这样，六级会议将会及时结束，好让第一书记们在预订于25日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情况。

就在各省负责人出席这次扩大会议的同时，各

县负责人将召开县、公社、区、队四级会议，共有一两千人参加，为期7至10天，到3月底结束。随后，公社、区、队将召开各自的会议，至迟在4月10日结束。有人提议说这样一个日程安排得太紧，毛不以为然。为了堵住批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即那些“观潮派”和“算帐派”的嘴，速度是须臾不可缺少的。这一系列会议结束后，每个人都会重新鼓足生产干劲，确保在1959年出现第二次跃进。<sup>②</sup>

161

这类多种多样的会议显然是为了澄清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大量糊涂认识<sup>③</sup>，为干部们规定一条新路线，并使农民放心。但是，尽管毛对以群众集会的形式讨论解决问题有着偏爱，他还是很快省悟过来，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他指示要开的会太多了。3月17日，他在另一个指示里告诉第一书记们，县一级会议应当包括五级，再加上生产队（小队，生产队或作业组），参加者至多不超过1万人。这样，公社和下级单位可以不必召开各自的会议，随后根据具体需要再举行会议就行了。<sup>④</sup>

不过尽管在郑州经过长时间酝酿，并且产生了题为《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的草案，中央对于公社问题的政策仍然是不明确的。毛从河南郑州南下到了湖北武汉。在这里，他仔细研究了各省关于六级会议的情况汇报。他很快发现，在应当以公社的哪一级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河南选择了生产大队，湖北则是生产队。毛把邻省湖南的第一书记周小舟找来，同他及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周赞成河南的办法，但在这次讨论以后，毛又接到报告说，广东采用的办法和湖北的类似。与此同时，各地都在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辩论；在湖北六级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执，会上，上一级干部倾向于以上一级为核算单位（如生产大队），而生产队干部们则想把它放在生产队。

毛在这个问题上的指示表明，第二次郑州会议记录的提法是



含混的。记录只是简单地说“队为基础”，而鉴于用词的混乱（在附录1里还要讨论）。记录上本应该详细说明“队”的含意。不过，会议记录很可能是按照毛对这个词的最初用法写成的<sup>⑤</sup>，主席在讲话时用辞显然很不精确，根本不考虑如何保证会议记录在事后能够准确地把每件事情表述清楚的问题。毛现在强调有争议的“队”应当是指生产队，即原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不是生产大队，亦即管理区。

162

这个基本问题在郑州会议的争论中已经尽人皆知：农村中平均主义倾向日益严重。实行核算的基本单位层次越高，平均主义的范围也越广；在同一地区，富队必须补贴穷队。按照毛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他的意思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以减少平均主义，这并不奇怪。非同寻常的是，按照他的指示，他打算放手允许各省自行选择适于本省情况的体制，因为他已经费了许多力气和口舌，劝说各地选择他所倾向的那种体制。

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个阶段，除大多数省份的六级会议刚开了一半的时候，毛已经感觉到企图通过远距离说服动员以取得他在郑州会议上短距离（当面）解释工作所未能取得的成绩，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进一步说，毛通过同周小舟和王任重谈话，通过看了广东的报告，自信已了解到（初次了解到？），区和队在面积上有很大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区比队更接近过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一个省适合的体制对别的省就未必适合。最后，毛在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对农民及3000万基层干部来说多么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指出，他准备赞同河南的办法，只要河南，也许还有其他省份，在县的四级或五级会议确定它能被广大农民所接受。<sup>⑥</sup>

郑州会议记录里另一个引起与会者混乱的问题是，公社是否要因征用生产队的财产而付给补偿。山西省似乎已在县的五级会议上作出否定的决议，但当毛读了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笈对这个问

题的报告以后,当即指出,一个公社既然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400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⑦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赞同了毛的意见。⑧

就在毛通过对第一书记们发指示贯彻郑州会议记录的时候,邓小平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作出指示要新华社收集有关公社问题的材料。邓感到有必要以此补充党了解农村情况的信息渠道,这个很有意思的迹象表明,高层领导对得到的报告有所怀疑。这次书记处会议只收到不多的材料这个情况表明,党的领导人对生产问题和虚报产量问题开始感到忧虑了。⑨

## 第二节 陈云出山,理所当然

1959年头几个月,在忧虑气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转向陈云,听取这位平时发言不多的同事的意见。陈在党内居第五位,他是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并且是资历较深的一位副总理。直到大跃进时期,他一直负责经济工作,但在1958年他似乎降居次要地位而未发任何怨言。他尽心地到十三陵水库工地推手推车⑩,但对大政方针的决策上显然很少影响。他从不俯首贴耳顺从苏联模式,因此赢得了毛的敬重⑪,不过在大跃进的全盛时期,毛并不准备听取他那头脑冷静的劝戒。

到1958年底,毛也许感到需要一种强有力的理论,向左右为难的党的干部说明他新发动的纠左的正确性⑫。毛知道陈能够担当这个任务。更为重要的是,需要陈帮助制定一套办法,使国家经济从毛及顺从于他的同事们所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红旗》杂志3月1日发表了陈云的一篇文章《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这是他在1959年参与经济决策的最主要、也是唯一公开的一次亮相⑬。在这篇文章里,他再次强调在制定工业发展政策时,全国的利益高于各省的利益。他一直反对在每

个省都建立完整无缺、样样都有的独立工业体系，而这是为他的权力下放计划所允许，并受到毛的自力更生原则鼓励的<sup>⑩</sup>。这时，他想弥补损失，用棋盘作譬喻，坚持认为，只要中国有限的资源不从全国角度配置利用，为发展而作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发展速度也会降低（这里语气的缓和是为了抚慰那些大跃进中的速度拜物教者。<sup>⑪</sup>

164 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是工业布局。陈云重申并发展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的观点。1956年，李富春曾与毛进行争论，并获得成功。他认为：在已经过度发展的大城市里新建企业是不经济的，最好是把这些新建企业分布在中小城市，距离原材料和市场更近一些。毛的方针，正如他在《论十大关系》讲话里详细阐明的那样，有利于发挥如上海那样的沿海大城市的作用。这个方针的支持者很可能就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据所有人的说法（也包括主席的），他是大跃进的积极鼓动者之一<sup>⑫</sup>。1958年初，上海透露该市共有698家在建或重建的工业企业，并有一个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不可想象的规划<sup>⑬</sup>。难怪陈云不能不旧话重提。

从战略问题谈到他所说的战术问题时，陈云强调在建设计划上实行并坚持优先原则的重要性，这个原则可以避免重点工程迟迟不能竣工。在谈到设计新工厂时，陈云说，由于自然资源极为缺乏，中国必须量布裁衣，在可能的条件下，优先安排中小型企业，而不是大企业。他强调在一切问题上保证质量都是必须的<sup>⑭</sup>。他要求同事们“实事求是”，这个口号是毛在延安时期反复强调，并由陈云经常严肃认真地提起的<sup>⑮</sup>。他还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申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的名言：“自由是被认识的必然”。与毛对共产主义创始人的敬重相比，此刻毛倒更愿意倾听陈云的意见。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毛采纳了上述概念，并修改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两个月之后这句话被用来鼓励

农村干部中的求实精神<sup>②</sup>。这个修改使中译文更切合原意，也更明确。

165 陈云的下一步是给中央财经小组写了一封信，这个小组是制定经济政策的主体，陈云曾经是小组负责人，但是此刻显然没有参与小组的工作。这封信的主题是关于消费市场的紧张状态问题。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呢？“去年夏收和秋收后，估产高了，吃用多了。”这一年度（译按：指1959年度）的粮食销售量增加（需要增加180亿斤）而库存下降。无论1959年粮食增产多少，节约措施都是至关紧要的。与大跃进的宣传者们乐观的说法相反，陈断言，中国的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

副食品如猪肉、鸡肉、鸭肉、鱼和蛋类的市场供应和生产也同样紧张；用货币计算，缺口约有四、五十亿元<sup>③</sup>。（这年晚些时候，周恩来说，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紧张不仅因为农民减产，而且由于他们消费得多了。<sup>④</sup>）陈云估计，为了部分地弥补市场上的紧缺，起码需要增加10亿元的物资供应，这就要增加1,000万头猪，2亿只鸡鸭，2亿斤蛋类和九万吨鱼。作为第一步，他建议国营、集体、个人“三条腿走路”，指出只有农户（在1958年被公社集体化了）才有足够的经验分散喂养畜禽，才是最可靠而收效最快的办法<sup>⑤</sup>。陈还说明，应当鼓励那种在手工业合作社名义下的个体手工业，以增加消费品生产<sup>⑥</sup>。接着，他转而谈到供求等式的需求方面，建议将多招收的工业工人送回农村去。这将减轻城市市场的压力，同时也就增加了农村副食生产劳动力的数量<sup>⑦</sup>。按照两个月以后毛在庐山会议前夕的党内通信，这位主席同意了陈对市场问题的建议<sup>⑧</sup>。他甚至还更迅速地采纳了陈云的劝告，削减了钢铁生产指标。

### 第三节 陈云和1959年钢铁生产指标

166

据毛事后回忆，他的1959年年产3000万吨钢的建议，是在1959年(译按：原文有误，应为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在1958年晚些时候召开的武汉八届六中全会上，压缩到2000万吨；随后，在1959年3月上海会议上，再次降低到1650万吨<sup>②</sup>。问题是，武汉全会以后公布的钢产指标为1800万吨<sup>③</sup>，而这个数字又为上海八届七中全会<sup>④</sup>及此后的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一再确认<sup>⑤</sup>。据说，对于年度计划负责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曾在上海全会上大力提倡钢产高指标是为了破坏大跃进<sup>⑥</sup>。如果文化革命中的这种说法有点根据的话，那意味着薄一波很可能在会上公开坚持1800万吨钢的指标，以免造成混乱，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这时，他的意见受到冶金工业部的有力支持，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个意见未能再站得住脚。在4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普遍感到必须把这年第二季度的钢材指标削减20%，而这个指标仅仅是一个月以前才制定的；确实，书记处很可能已经意识到，在1959年的前4个月里只能生产336万吨钢(包括227万吨钢材)，剩下的8个月必须生产出近1500万吨钢<sup>⑦</sup>。随着这个危机出现了三个问题。一、1959年的钢产指标是否应当分成两个，一个是可靠的，另一个是争取的？二、钢材的分配，是否应该按照可靠的指标来安排？三、如果钢材分配的数目减少了，是否必须缩减某些建设项目？在书记处的一项提议里(书记处在大跃进期间指导经济工作中起着关键性作用)，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责成中央财经小组作出回答。<sup>⑧</sup>

此时，陈云已经对钢铁工业的问题做了近3个月的调查研究，显然这种工作是独立进行的<sup>⑨</sup>。也许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他重

新成为财经小组的成员，李富春、薄一波及地位不太高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参加了工作。赵尔陆参加进来，肯定是为了照顾他所负责的国防工业的利益。4个人召集了六次座谈会，冶金工业部在会上汇报了钢铁工业(包括铁矿石、焦炭、耐火材料、炼钢以及钢材品种)的总的情况。经过充分讨论以后，陈云在5月间由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1小时的发言，详细汇报了财经小组的研究结果。<sup>⑤</sup>

167

陈在性格上谨慎小心，分析问题逻辑谨严，这与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所制定的简单条文形成鲜明对照<sup>⑥</sup>。要是政治局熟悉钢铁工业运行情况的话，他的详细分析有一大半将会是多余的。人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毛发动大炼钢铁运动以前的北戴河会议上，肯定没有作过如此详细的分析。陈的讲话提供了铁的事实，证实大炼钢铁运动已经使整个钢铁工业体制超负荷运转，有关部门陷入混乱。财经小组面临的选择见表1所示。<sup>⑦</sup>

表1:

单位: 万吨

	可靠的钢产指标	力争的钢产指标
上海全会	1650(未公布)	1800(公布)
冶金工业部(1)		1600(2)
		1500
		1400
		1300
国家计委重工业局	1250—1300	1400
国家经委冶金局	1300	1500

注释:

(1)没有详细说明，哪些指标是可靠的，哪些是争取达到的。

(2)“冶金部还提出过1600万吨钢的数字，但是没有详加说明”!



不清楚为什么那些可能提出过意见(上海全会的指标就是依据这些意见制定的)的干部们,原来对钢产的估计会出那么大的错,以致后来不得不迅速地削减指标。人们不得不认为,在时隔短短的几周,他们开始感受到一阵现实主义的风气。

168 财经小组提出钢的生产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1300万吨(包括900万吨钢材),并且在同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及铁道部协商以前,不急于确定争取达到的指标。年产1300万吨钢,要求压缩基本建设项目,财经小组还要求特别注意确保石油、化工工业的发展。即便如此,这个指标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陈云提出警告说<sup>⑧</sup>。铁矿石的紧张是一个原因,陈云提出这个问题,表明在财经小组提出建议之前作过苦心的分析。

生产1300万吨钢,需要2000万吨生铁,生产这么多生铁又需要7000万吨矿石。中国有14个拥有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设备的大型采矿企业,前一年采矿3460万吨,本年可望达到5300万吨。此外,还有19个中型采矿企业,其中6个有半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其余13个既缺乏机械装备,又没有铁路;上年这些企业共开采680万吨铁矿,本年可以达到800万吨。最后,还有214个小型采矿点,全部是用镐、铲等工具土法开采,当年产量可望由前一年的606万吨增至1000万吨。以上合计可达7100万吨铁矿石,其中可以运出矿山的只有7000万吨。即便如此,为保证这7000万吨矿石的开采,还必须增加空气压缩机、电铲、爆破材料等等的供应<sup>⑨</sup>。

假定铁矿石能够得到保证,下一步的问题就转到生铁的质量要求上来了。所需要的2000万吨生铁中,有900万吨要靠小高炉,但是小高炉生产的生铁有40—50%因使用不纯的焦炭而造成含硫量太高不合要求。这些杂质是由于煤没有洗净造成的,炼焦炭所需要的煤有一半需要由土法洗煤来解决,这一过程需要使用60万个劳动力生产200天才能完成(洗煤2000万吨),在理想的条件下还要新增加粉碎设备和其他工具。陈云列举的数字充分表明,



要给预计不到的不利因素留有余地。如果焦炭的杂质不能除去的话，达到年产500万吨钢材也是不大可能的<sup>④</sup>。不过，即使陈简要地描述过的上述困难以及其他一些障碍得到克服，还需要有充足的设备以完成提出的指标<sup>⑤</sup>。他告戒说，财经小组的框算，只限于以钢铁工业内部的各种条件为依据。这个提议还要通过对钢铁以外的整个工业情况作进一步调查研究来落实。陈云无疑十分清楚，在大跃进期间，各工业部门的负责人往往乐观地、一厢情愿地对本部门的要求作出种种许诺，根本不考虑他们是否能保证得到其他部门的必要合作<sup>⑥</sup>。陈云说，将向主席、政治局和书记处提交进一步的报告，但是不向国务院提出，国务院在这一时期经济决策上的次要功能再次被证实。

尽管有了陈云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中央财经小组的第一流的报告，政治局会议仍未就采纳1300万吨钢和900吨钢材的建议指标作出决定。当薄一波显然已经放弃了过高指标的时候，冶金工业部依然坚持认为低指标会造成怀疑和失望情绪，这一看法得到北京和各省不少人的赞同。在毛缺席情况下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不同意上述判断，认为指标定高了，做不到，反而更会泄气。由于大跃进期间陈云被排斥在毛的决策圈之外，这使他的威望受到削弱。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冶金部仍然坚持1500万吨的指标，并且可能料到毛会支持这个高指标。<sup>⑦</sup>

即使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采纳1300万吨指标的建议，毛的最后表态都是必须的，因为这位主席同大炼钢铁运动的关系毕竟真是太密切了。然而由于出现僵局，政治局无法向毛提出建议，取而代之的是陈云将财经小组报告呈递主席作决定。在一封简短的附信里<sup>⑧</sup>，陈强调指出要达到指标，小高炉炼铁是个薄弱环节，洗煤是关键因素。他坦率地承认，对这个指标有不同的看法，并且提议请持有不同意见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财经小组一起去见毛，使他能够听取双方的不同意见。<sup>⑨</sup>

毛是否要他们在他面前争辩一番，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此后不久他说，1300万吨的指标在6月确定了下来，他显然采纳了财经小组的建议。<sup>④</sup>周恩来和邓小平派出5个调查小组去纠正钢铁工作中的问题：有必要装备和发展前途的小高炉将被保留，其余的将被排除，劳动力将调回农业生产战线。<sup>⑤</sup>

使得毛容易地作出关于钢产量决定的一个因素是陈云的报告只作技术性分析，绝口不谈政治问题。它没有任何批评的口气（陈完全有理由提出批评），即使在论及小土高炉时也是如此。主席接受它，完全不意味着要作自我批评。只要把1959年头半年陈云的报告和同年7月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的分析比较一下<sup>⑥</sup>，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毛对前者欣然接受，而对后者断然拒绝了。

#### 第四节 农村的现实

北戴河会议以后不到10个月，毛同意把预定的1959年钢产指标削减56%，陈云的1300万吨钢的指标实际上达到了，尽管付出了很大代价<sup>⑦</sup>。显然，这位主席赞同陈云的判断，现在需要的是“稳住阵地再前进”<sup>⑧</sup>，而且甚至在他默认钢产指标的不现实以前，他已经充分认识到来自农村的报告和预测存在着普遍的浮夸。4月29日，就在书记处开始重新考虑钢产指标的同一天，毛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尽可能扩大传达的范围，直到生产队一级。在这封信里，他坚持说：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

益处呢?⑤

171

接下去,毛谈及由谭震林和他的同事们提出的迅速增产的几项具体措施。他认为那种“种得愈密愈好”的说法“不对”,并且要求和技术方面应当仔细同老农商量。少种、高产、多收的远景计划是对的,但在10年内不可能全部实行。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机械化也至少需要10年时间;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是不远的将来的主要依靠⑥。毛还强调节约粮食的重要性,并以呼吁坦诚作为结论:

……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必须老老实实……⑦(译按:最后一句与原文略有出入)

毛承认他是在唱低调,甚至是保守主义者(此刻,他引用了陈云关于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的那段话),但是如果实现了高指标,他将谢天谢地。⑧

在此前后,毛还采用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尽管直到1960年才将它付诸施行⑨。周恩来建议加进了“以工业为主导”。陈云赞同这两句话,但是感到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制定一项政策,以便更好地落实。他到农村去调查研究,调查范围自然也包括开路先锋河南。在这里,他发现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仍然相信河南小麦产量翻了一番;本省再也不必返销粮食了,事实上还将会调出粮食。陈云显然不为所动,接连向他提出一连串问题:可耕地有多少?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农村人口多少?按照河南当前的水平,农村每个人至少需要多少粮食才可以维持生活?需要多少种子?需要多少饲料?把以上这些部分相加,农村至少还剩下多少粮食?依据这些问题,再加上与城市粮食需求有关的类似一

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文化大革命的干将们无意于利用这一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这一严重事件作为打倒其政治对手的武器。<sup>⑨</sup>可以肯定，对中印关系以及因此给中苏关系产生严重影响的西藏叛乱事件，实际上并没有在中国领导层里引起分歧。进一步的结论是，在西藏发生的事件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没有直接影响。总之，西藏叛乱，……<sup>⑩</sup>，在本书中只能一带而过。

根据此后及当时发生的事件来看，七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定是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议刘少奇为毛的国家主席的继承人。经过两年半的酝酿，毛退居领导层的“二线”的计划就要实现<sup>⑪</sup>。尽管此时他还保留着更重要的党中央主席职务，但是从此毛更倾向于让他的资深同事们，尤其是刘，在国务方面承担起与日俱增的责任。毛提出这一计划的目的，是要培养一个健康发展、具有自信心的领导集团，以便在他去世后接班，防止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发生的那种有损国力的权位斗争。<sup>⑫</sup>

可以理解，不能指望毛在整社过程中即刻中途退出，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他在其中起着巨大的作用；随后在夏季，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在庐山会议上面对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批评，毛不能不维护他的地位。不过，毛对当时国内政策问题的批示和讲话在篇幅和数量上的逐渐减少，表明在几年之间他的确退居二线了。1959年以后邓小平很少向他汇报，就是他退居二线的明显证明，而不是象毛后来说的那样犯了失敬之罪。<sup>⑬</sup>

随着刘上升为国家主席，他的家庭成员也发生某种情绪变化，孩子们被告诫不要打扰他们的父亲，父亲现在连歇息一下的时间也没有了<sup>⑭</sup>。实际上，刘的子女们太了解这一切了，新任主席已经(确切地说，总是如此)成了一个“废寝忘食工作的人”，在办公室裏边一坐就是10个小时，不哼一声<sup>⑮</sup>；妻子王光美曾经报怨说，坐这么久，屁股都坐坏了！<sup>⑯</sup>刘一天的全部工作时间，包括开会，听汇报，进行调查，正逐渐延长，据他的秘书们回忆，在他成为

国家主席以后，工作时间达到一天十七、八个小时<sup>①</sup>。通常在他上床后，还要读上个把小时的报<sup>②</sup>。他曾经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比不能工作更难忍受的事情了”<sup>③</sup>，而他正是按照这个准则生活的。1956年，为了准备在中共八大上的报告，刘连续工作3天3夜，每天只睡两个小时的觉<sup>④</sup>。每逢重要会议，他的秘书起床时，总是看到他刚刚上床<sup>⑤</sup>。在非常确切的意义上说，除了为党工作，刘对一切都不感兴趣<sup>⑥</sup>。这使他处于毛及文化大革命的干将掌握之中的最终的命运更具有悲剧色彩。

在刘的书架上放着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sup>⑦</sup>，照西方学者看来，小说的主人翁是“一位缺少人情味的完人，他的经历体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冷酷的道德原则，以及他对共产主义个人信仰的政治价值观念”<sup>⑧</sup>。尽管刘性格倔强<sup>⑨</sup>，缺少幽默感，但他并非没有人情味，他似乎很象斯大林时代小说里的英雄，以期毕生追求克己奉公的准则<sup>⑩</sup>。1959年，刘所在的党支部<sup>⑪</sup>发现，在扣除房租、水电费和子女的保姆费以后，刘少奇夫妇的工资所剩无几。他们决定每天给他1元钱补助，按照规定他有权得到这笔补助，因为他总是工作到深夜。3年过去了，刘少奇发觉此事，便坚持从工资中扣钱，以偿还领取的1000多元补助<sup>⑫</sup>。外出视察期间，他从不接受礼品，甚至坚持带上自己的低档烟和茶<sup>⑬</sup>。出国访问时，他总是把节余的外汇开支上缴当地中国使馆。<sup>⑭</sup>

刘非常注意绝不让家属享受特权。1959年国庆节前后，他在自己屋子里的一个小房间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自从他主持政治局工作以来，这幢屋子就成了政治局碰头的地方。他从繁忙的工作安排中挤出这点时间，是要打消子女和亲戚们的错觉，不要以为他升任国家主席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实惠，诸如农转工的就业机会，从农村移居城市的机会，等等。刘只帮助过一个侄女，她的先父曾经为革命工作过，这在国家主席的家里被视为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sup>⑮</sup>。刘坚决执行政治局的规定，公车只能用于公事，

对此绝不通融。刘的子女们走路或骑车上学，要走很长一段路程，后来他花钱专门为他们定做了一辆三轮车。王光美分娩出院，也是坐出租汽车回家的（译按：这段话与所据材料略有出入。是用公车去接，但按规定付了车费）。刘还步行去剧场看戏，从而树立了一个榜样。<sup>②</sup>

刘还采取措施，防止别人给他的子女提供特权。在学校，刘的孩子们都用化名（译按：应为提到父亲都用化名）<sup>③</sup>。他们的父亲还针对快要成年的子女们的优越感指出，他们必须象其他人那样受到平等对待。当一个女儿分配到省里工作时，她的北京朋友们担起心来：她都能下放，她们又怎能逃得掉呢<sup>④</sup>！尽管刘很严厉，但他很少发脾气；据秘书回忆，只有两次他例外地发火了，那是因为一个孩子想改变专业<sup>⑤</sup>。据他的女儿刘爱琴（他的前妻所生）写的回忆，他不宠爱子女，希望他们遵循他所期望的尽善尽美的准则。<sup>⑥</sup>

这些准则之一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刘的伙食很简单，经常吃剩饭剩菜<sup>⑦</sup>。孩子们的衣服是旧的<sup>⑧</sup>；一个孩子买了件价钱很贵的上衣，也被退了回去<sup>⑨</sup>。夏季，刘本人穿着布衣布裤，而在冬季或其他季节，他则靠两套旧服装度过，一件是毛的，另一件是呢料的。他的衣服多次补过；他的一双经常穿的旧布鞋，曾被送去修补过，结果引起保育员的讪笑，他还以为那是卫士的<sup>⑩</sup>。在人们面前，手下的工作人员发现他神情严肃，由于夫人王光美在一边做他的工作，据说，他还是对他们照顾的。<sup>⑪</sup>

刘并非唯一的以生活俭朴、工作刻苦而著称的中国领导人；通常，周恩来也以同样的品德而孚众望。但是，刘的好静的性格以及书生气息往往给人们以教徒的形象。正如刘恢复名誉以后的文章指出的那样，尽管刘有广泛的工作关系，但在私人关系方面，他可以说没有朋友。没有发现刘有如周的国务院内部或元帅之间的那种亲密情谊<sup>⑫</sup>；刘与同事们的关系与其说是亲密的，不



176 如说是正常的。周曾在令人愉快的时期信赖刘，称他在全部重大历史问题上总是正确的<sup>④</sup>，刘则保证周恩来能够得到有关外交问题的全部文件<sup>⑤</sup>。在罗瑞卿将军后来的回忆中，有一点使人感到迷惑。他从公安部设立直到1959年，一直任该部部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够广泛地接触各方面的情报。他暗示刘曾说过对周不利的话。<sup>⑥</sup>

刘与毛的关系似乎更清楚些。使毛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保证主席集中精力考虑重大问题，刘把这视为自己的职责<sup>⑦</sup>。刘曾告诉秘书，只要主席找他，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得立即叫他，这一点更说明他所处的地位。由于毛在长期的革命年代养成夜间工作的习惯，这便意味着还要经常搅乱刘本已很少的睡眠<sup>⑧</sup>。同样说明刘接受了一种从属关系的事实是，即使有人在谈话中偶然提到或者引用毛的话，刘也必须赶紧查找原文，以弄清主席的完整意思<sup>⑨</sup>。毛是一位非常自信的领导，很少作自我批评；刘即使是当了国家主席以后也仍然把自己视为党的工具。他经常作自我批评<sup>⑩</sup>。显然，当毛考虑最重要的方针政策时，是刘给他以某种启发，尤其是1956年对“十大关系”所作的分析。<sup>⑪</sup>

到1959年，长年在最高领导身边吃苦耐劳地工作终于带来了报偿。这位埋头苦干的60岁的第一副手终于可以通过官方宣传渠道使自己的形象与毛的并排一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透露，新的图片安排的指示来自中共中央宣传部，并由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具体实施。周恩来后来的说法是，新华社问过刘的意见，刘没有反对，这使毛也不便反对。周说，当刘第一次看见两幅照片并排悬挂的时候，他应当明白这是违反准则的，但他没有谦逊到发出指示改变这种安排的程度。<sup>⑫</sup>

177 无论毛对他隐退以后的照片安排感到多么不满，根据文化大革命中对刘不友善的一个材料，他本人还是同意中共中央一致决定由刘继任国家主席。<sup>⑬</sup>……<sup>⑭</sup>……另一个多少有些暧昧不明的



事情,即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上海会议上批评了毛。彭元帅批评毛“亲自挂帅”<sup>⑤</sup>,从1942年第一次延安整风时他就是如此<sup>⑥</sup>。后来,毛将上海会议上对他的批评意见形容为不过“叽叽咕咕”<sup>⑦</sup>,而据彭本人说,他又用更严厉的措辞“挑拨”相回敬。<sup>⑧</sup>

这一事件的费解之处是,当主席打算放弃其两项任职之一,并退居“二线”的时候,彭对毛提出了批评。我们知道,在彭毛共事的30年间,彭与毛发生过多冲突,而且正是彭在1956年提议应当从新党章里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sup>⑨</sup>。这时彭是否怀疑毛的隐退是出于真心呢?或者彭声言反对个人专制,是否由于它不仅损害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权力<sup>⑩</sup>,而且还因为他仅对毛选择刘作为自己的继任人,尤其是刘可能同样专权呢?<sup>⑪</sup>

有迹象表明,在1956年刘少奇与彭德怀有工作上的联系<sup>⑫</sup>。不过从根本来说,他们分别属于党的不同方面,即政治组织系统和军事系统,二者在毛领导之下的融合,对取得1949年革命胜利是强有力的因素。50年代初,高岗曾企图利用一个系统对另一个系统的历史遗留下来的相互不满情绪来达到其个人目的,当时他设法得到军队将领的支持,企图取代刘和周恩来成为毛的继任人<sup>⑬</sup>。在清算高岗的时候,彭德怀也就他与高岗的关系作了自我批评。1959年夏季庐山抗争之后,重新调查的结果确认,两个人之间的联系远比到那时为止确认的更为紧密。<sup>⑭</sup>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可以由此推知,彭不满意于这样的事实,即解放军赢得了天下,而党务人员却坐天下<sup>⑮……⑯……⑰</sup>。总之,这些散乱的迹象表明,在上海会议上,彭德怀对继任人选的安排表示不满……<sup>⑱</sup>

确实,刘的当选和继任预示着中国建设道路的变化,即由充分发挥个人活力的“游击”作风向讲求组织秩序的正常方式转变,这种转变已经通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和刘论及大跃进的讲话清楚地显示出来<sup>⑲</sup>。对那些对1957年整风运动中毛的处置感到委

屈，并对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就大跃进中的问题所作的严厉批评感到不满的党的干部来说，这次人事变动预示着一个可以预测捉摸的领导将要出现。湖南毛家乡的一位县委书记似乎对前景也颇为乐观，他说：“毛主席如今年事已高，退居二线以后，少奇同志显然将是法定继承人，刘少奇年轻有为。作为一个著名理论家，他的水平很高……”<sup>⑭</sup>

179 由于刘长期致力于组织工作，这也许使他的工作关系比毛更为广泛。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总喜欢不分清红皂白地把毛的对手统统归属“刘少奇集团”<sup>⑮</sup>。这些材料中提到的一批人的确从30年代以来与刘有密切的联系，到1959年的时候，这些人已是党的重要人物<sup>⑯</sup>：彭真——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第二号人物，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薄一波——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刘澜涛——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安子文——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杨献珍——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廖鲁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农业部部长。

其中一些人又各有一批部下<sup>⑰</sup>，要是刘少奇想用铁一般坚固的组织网把毛包围起来的话，他无疑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刘不是阴谋家，也不是斯大林。他已经建立起领导威信，只希望继续维持这个威信。

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过左行为以后，稳健已成为普遍的口号，刘正是在这种时刻接任国家主席的。毛率先对人民公社问题进行新的探讨，首先是在武汉会议上，随后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又深入一步。不过，这个新的方针贯彻的范围还得超越农村进入城市。以一盘棋口号为标志的经济发展的稳健政策的恢复意味着党必须重新摆正红专关系。早在1958年9月，毛视察武汉大学时，就重新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sup>⑱</sup>。武汉全会不久，周恩来在同一些演员座谈时，向他们建议说，他们戏里的党的书记应当又红又专<sup>⑲</sup>。

1958年以前的教育指导思想在1959年初开始得到恢复<sup>⑮</sup>。3月，在向北京市中学生致词时，外交部长陈毅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对当前重视生产劳动，轻视学习的偏向发出警叹；并认为必须对两者给予同样的重视<sup>⑯</sup>。在更广泛的文化领域里，周恩来鼓励作家和艺术家们要使创作题材多样化，既要有现实题材，也要有历史题材<sup>⑰</sup>。而就在此刻，陈伯达的步调显得不那么一致，他依然提倡厚今薄古<sup>⑱</sup>。

与当时经济问题更有直接关系的是中共中央重新强调原工商业资本家的技术和经验的重要性。此刻主管统一战线工作的彭真<sup>⑲</sup>称赞资本家积极响应大跃进运动，并说应当允许他们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sup>⑳</sup>。这条新的路线很好地配合了刘少奇对中国前景的估计。这年晚些时候，在写给受人尊敬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刘透露过他的目标。这个非共产主义的政党的成员主要来自工商界，并作为中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刘对黄表示，在前10年间，中国领导人的精力主要放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即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国有化问题上。在扼要地正式揭露经济上的浮夸，并宣布削减指标之后，刘承认，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他继续写道：

至于说到今后10年，情形就会不同了。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一些必要的经验，为建设扫清道路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在今后的建设道路上，虽然还要清除一些旧的和新的障碍，但是我们已经造成一种条件，使我们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以主要的精力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会加快建设的速度，使今后10年的建设成就大大超过以往10年，……<sup>㉑</sup>。

对中国来说不幸的是，这个预言并没有实现。否则，在下一个10年即将结束之时，在中共九大上升为接班人的就不会是林彪，

而是刘少奇。

注释:

1.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45页。
2. 同上, 第104—106页;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164—165页, 在这里“观潮派”和“算帐派”被译做“观看者”和“算帐者”。
3.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 第165页。
4. 同上, 第168—169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108—109页; 《彭德怀自述》, 第299—300页。
5.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35页。
6. 同上, 第106—107页;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166—167页。
7.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50页。
8. 同上, 第263页; 也见《彭德怀案件, 1959—1968》, 第17—18页、406—407页。
9. 利伯瑟: 《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 1949—1975年》, 第135页。
10. 《北京周报》, 1958年第18期, 第13页。
11. 邓力群: 《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 第11页。
12. 同上, 第13页。
13. 陈云: 《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载《红旗》1959年第5期, 第1—16页, 收入《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 第70—92页。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166号, 第1—15页, 其摘要载《北京周报》1959年第10期, 第6—8页。
14. 邓力群: 《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 第78—79页。
15.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 第70—73页。
16. 同上, 第74—76页; 本书第1卷, 第63—66页。
17. 《北京周报》, 1958年第6期, 第9—11页。
18.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 第77—89页。
19. 同上, 第94页。有关毛在延安采用这一口号的情况, 见康普顿: 《毛的中国》, 第65页, 有关陈那时对此做的重要附加说明, 见邓力群: 《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 第104页。

20. 有关陈云的原文，见《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84页；有毛泽东的原文，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294页；有同一来源的正式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5页。这一概念来自《反杜林论》，而且整段话的意思就象是对大跃进的理论作肯定的评价：“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摘自《马克思主义手册》的译文，第255页)
21.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93页。
22. 《北京周报》1959年第35期，第14页。
23.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93—94页。有意义的是，陈的数字只代表已宣布和计划产量的百分比中的一小部分，若按此百分比计算，猪肉的产量在1958年是1.8亿斤，而1959年则应是2.8亿斤。(见《北京周报》1959年第17期，第18页)。
24.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94页。
25. 同上，第94—95页。
26. 见本卷第10章。
27.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第244页。
28.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85—486页。
29. 《人民手册》(1959)，第45页。
30. 见周恩来的讲话(《当代背景》559号，第7页)及李富春的讲话(《当代背景》562号，第10页)。
31. 利伯瑟：《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年》，第137页。
32.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97页、102页。
33. 同上，第97页。

34. 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116页。
35. 同上,《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98页。刘少奇出席这次会议表明,陈云就这个问题写给毛的信收到了,很显然,由于此信的内容使得毛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36. 见本书本卷第2章。
37.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98页。
38. 同上,第97—98页。
39. 同上,第99页。
40. 同上,第100页、102页、106页。
41. 同上,第101页。
42. 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83—84页。
43.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104页、106页。在大跃进期间,毛可能忽视了陈云,陈云权威的下降是可以想象的,即使在他专门负责的商业领域里也不例外。见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107页。
44. 肯尼斯·利伯瑟曾提示我说:可能只有这封信的确是交到毛那里了,而且看起来陈在他的信中是不会缺少有力的证据的,不然就会冒被驳回的风险。而主席是否看了这封信,则是另外一回事。
45.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106—107页。
46.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第244页。毛在6月份提出的议案进一步证实,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此议案未被通过。
47. 《人民的好总理》第3辑(1979),第19页。
48. 见本书本卷第10章。
49. 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116页。
50.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97页。
51.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70页。
52. 同上,第170—171页。
53. 同上,第171页。
54. 同上,第172页。
55. 安炳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第45页。
56. 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54—55页。

57. 利伯瑟:《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 1949—1975》第135—138页;《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广东, 1981年), 第2卷, 第351页;《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2卷, 第242页。
58.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第51—53页, 第58—62页;《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175—181页。比较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的讲话和会议后连续发表的16篇文章, 可以看出前者是后者的基调; 上海全体会议, 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提出的“三三制”;《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第2卷, 第351页。
59. 邓小平在1958年冬天认为, 西藏暴乱是3种可能性之中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见《省直红旗》1968年1月, 第4页。亦见“西藏的叛乱是怎样发生的”, 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86号, 第6—12页。
60. 关于这个论题有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章, 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界》; 约瑟夫·弗莱彻, 《19世纪亚洲的大清国》及《全盛期的大清国在蒙古, 新疆和西藏的制度》, 载《中国近代史》第10卷, “清朝末期(1800—1911)”第一部分, 第35—106页、351—408页。关于西藏的叛乱, 见帕特森:《叛乱中的西藏》, 莫拉斯:《西藏叛乱》; 洪德兴:《西藏为自由而战》, 《西藏, 1950—1967》; 金斯伯格及马瑟斯:《共产党中国和西藏》。有关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少数民族的政策总的考察, 见德雷尔:《中国的四千万少数民族》。
61. 毛在此时退居二线的消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证实的, 见《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 第34页。
62. 更全面的讨论见本书第1卷第105—107页, 第152—156页。
63. 同上, 第154—155页。
64. 同上, 第155页。
65. 《红旗飘飘》第20辑, 第172页。
66. 同上, 第277页。
67. 同上, 第227页, 272—273页。
68. 同上, 第227页。
69. 同上, 第40页。
70. 同上, 第228页。这条消息的来源不清楚, 虽此事件发生于第八次党代会之前, 但根据间接的证据表明, 它是偶发的。



71. 同上, 第277页。
72. 同上, 第175页、228页。
73. 同上, 第273页。
74. 厄尼斯特·杰·西蒙斯:《有组织的作家(1934—1946)》见海涅德与奎伯兹:《苏联的文学与革命, 1917—1962》第85页。
75. 《红旗飘飘》第20辑, 第112页。
76. 当然, 这段描述最初是指罗伯斯庇尔。
77. 很显然, 刘的亲眷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成了刘的支部。
78. 《红旗飘飘》第20辑, 第231页、276页。
79. 同上, 第231—232页。《怀念刘少奇同志》第378页。关于礼品问题, 据说刘只有两次超出了惯例, 见《当代背景》834号, 第21页。
80. 《红旗飘飘》第20辑, 第211—213页。
81. 同上, 第204—206页、263—364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传说, 刘在土改时曾向他的地主成分的家庭成员透露过土地改革的计划, 但看起来更象是他的家庭成员问他一些有关土改的问题, 他并没有让他的家庭成员逃避土改运动。见《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刘少奇罪行录》, 译文登在《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6号, 第23—30页。刘的大家族中只有一个成员曾赞成他参加革命, 见刘爱琴:《女儿的怀念》, 第17页。
82. 《红旗飘飘》第20辑, 第233页、264—265页;《怀念刘少奇同志》第381页。
83. 《红旗飘飘》第20辑, 第265页。
84. 同上, 第269页;刘爱琴:《女儿的怀念》, 第52页。
85. 刘爱琴:《女儿的怀念》, 第58页。
86. 《红旗飘飘》第20辑, 第269页。
87. 刘爱琴《女儿的怀念》书中处处可见, 但尤以第63—72页最多。
88. 《怀念刘少奇同志》, 第380页。根据此书记载,, 刘的慢性胃病史可追溯到他在安源的年代。
89. 同上, 第381页。
90. 《红旗飘飘》第20辑, 第265页。
91. 同上, 第209—210页、230页、274—275页;《怀念刘少奇同志》, 第379页。
92. 《红旗飘飘》第20辑, 第226页、254—256页、270—272页。

93. 对元帅们的和蔼，见本书本卷第10章；同国务院干部之间的友谊，见本书本卷第12章。
94. 《怀念刘少奇同志》第2页；也见《美国对外关系，1949》第8卷，第359页。
95. 《红旗飘飘》第20辑，第32页。
96. 《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第21页。罗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为刘少奇恢复名誉以前发表这篇文章的。
97. 《红旗飘飘》第20辑，第32页；《怀念刘少奇同志》第12页。
98. 《红旗飘飘》第20辑，第174—175页、242—243页，277页；《怀念刘少奇同志》第373页。但刘肯定地表示，他决没有干扰过毛！
99. 《红旗飘飘》第20辑，第181页。
100. 关于刘提出党员是党的“工具”的理论，见同上，第171页及《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73号，第16页。有关刘具有自我批评精神，见安子文：《把我们的党建设好——纪念刘少奇同志》，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8日，及李维汉：《刘少奇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10日。刘与毛、周的进一步比较，见本书第1卷，第3—9页。
101. 李伯钊：《卓绝的贡献，学习的模范》，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20日。刘似乎在毛之前也指示过要人们研究中国的医药学，见《红旗飘飘》第20辑，第257页。此外，刘无论在什么地方，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尽可能地毛请示，同上，第121—122页。
102. 《新闻战线》1967年5月13日，第4页，合订本1；也见《新闻战线上大的政治斗争》同上，1967年6月30日，其译文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3号，第32页。有关周恩来的文章，见《各地通讯》1967年9月13日第4期，第1页。其译文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81号，第2页。有关从照片变化看中国政治情况方面的重要性，见麦克法夸尔《论照片》。
103. 小册子《新时代的狂热》，译文登在《中国大陆杂志选》603号，第30页。
104. 实际上，任何35岁以上的人都是有资格的。《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33页；《朱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13页。
105. 王酩：《彭德怀问题选辑》，第394页。

106. 《彭德怀案件, 1959—1968》, 第37页。
107.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 第4期, 第81页。
108. 《彭德怀案件, 1959—1968》, 第37页; 王酩:《彭德怀问题选辑》, 第394页。
109. 本书第1卷, 第100—102页、147—148页。
110. 王酩:《彭德怀问题选辑》, 第394页。
111. 见刘澜涛的文章。刘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文章中, 他宣称“右倾机会主义者”(如: 彭德怀和他的同伙)对于个人的作用和集体领导之间的协调关系一点都不懂; 见《彭德怀案件, 1959—1968》, 第103页。但不只是彭德怀一个人感觉到, 仅提高刘少奇一个人的地位是不能解决保证集体领导的问题的, 见来自另一位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的评论文章:《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摘编》, 第2页。
112. 本书第1卷, 第100页、136—138页。
113. 同上, 第334—335页, 第三章注59。对高岗专案更精辟的讨论, 见泰韦斯:《中国政治及清洗》, 第166—210页。
114. 《彭德怀案件, 1959—1968》, 第41页。
115. 贺龙在1959年参观纪念南昌起义(此事件后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日)的展览时, 表示的态度可能代表了大多数解放军元帅和将军们的特有态度。贺说, 八一起义我在政治上依靠党, 而党依靠我的军队。(《文革风云》1967年第8期, 第34页)。
116. 《各地通讯》第4期, 第1页, 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81号, 第2页; 也见《井冈山》1967年4月18日, 其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3946号, 第2页。有关刘少奇对彭有些生气的反应, 见穆迪:《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政策》, 第142页。
117. 泰韦斯:《中国政治及清洗》, 第412页。
118. 分析这一事件有关的问题之一是, 提供证据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小报, 这些小报的目的是要证明刘少奇同彭德怀之间的勾结, 而不是矛盾和争论。周恩来处理这一矛盾的办法是避开, 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3946号, 第2页。
119. 见本书本卷第51—55页。
120. 引自小册子《新时代的狂热》, 译文在《中国大陆杂志选》602号, 第10页。

121. 见《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证选辑》中举例,译文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651号,第32~36页。
122. 见《看刘少奇丑恶嘴脸!》一文中的举例,载《井冈山》1967年1月,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62号,第7页。《打倒最大的叛徒集团头子——刘少奇》,载《红旗》1967年3月8日,第5页。《彻底粉碎刘少奇的叛徒集团》,载《春雷》1967年3月13日,译文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3951号,第1—6页。
123. 例如在穆迪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政策》第26页中,提到的彭真“集团”。有关彭真同刘的亲密关系,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51号,第38页。
124. 《资料选编》,第232页。1959年夏天,毛访问韶山期间,再次强调教育革命的重要性,但也表示赞成学生要服从老师,见《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63页。
125. 《人民的好总理》第2辑(1978),第404—405页。这一事件估计是发生在周12月7日返回北京以后。(利伯瑟:《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年》,第126页)
126. 《陆定一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言论摘编》(北京: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1967年5月),第17页,第75—76条。也见《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18号,第15—16页。
127. 《新华月报》1980年8号,第144—145页。在195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向教育家们说,要在1958年已取得的成绩基础上,对教育工作进行调整。以巩固和提高教育工作的水平,见《人民的好总理》第2辑(1978),第349页。
128. 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三次讲话》,第1—5页。
129. 《科技革命》1967年8月,第2期,第20—23页。
130.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139号,第12页。
131. 《辽联战报》1967年7月21日,第3页,合订本1;《摧旧战报》1967年5月25日,第2页;《中国大陆杂志选》639号,第6页;也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19号,第59页、75页。1959年1月份,一位资历较深的统战官员徐冰,曾宣布“五不变”政策,以使商人和知识分子放心。这五不变是:定息、高薪、学衔、政治安排,教育改造(见《新华月报》1980年

第4期,第52—53页)。

132.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4集), (北京:北京化工学院“毛泽东思想宣传员”, 1967年4月10日), 第62—63页。

181

## 附录1 正名: 人民公社名称的混乱

《论语》记载孔子的一段著名论述。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sup>①</sup>”有的学者怀疑孔子是否有过其言<sup>②</sup>,但他们对儒家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没有异议。因此,“正名”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sup>③</sup>

本书的其他章节多次表明中共领导人重视准确使用术语。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发生在1959年夏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sup>④</sup>。中国领导人从未象纠正公社名称那样下大力气“正名”,而且从未遇到过比那时更严重的名称含义上的混乱。倘若历史上的儒家学者们得知这次涉及毛本人的混乱是由于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是不会为之惊讶的。具体地说,问题是由于公社内部所有权和管理权归属层次的变动而造成的。由于所有权和管理权上移或下放,公社各层机构的名称随之变更,由此造成名称混乱。对于外国人来说,还多一层混乱,就是中国官方的外文译名没能相应地反映中文名称的变化。<sup>⑤</sup>

182

人民公社的名称混乱始于北戴河会议决议。该决议提出,在合作社合并成公社后,原合作社应改为“耕作区”或“生产队”。<sup>⑥</sup>决议没有为第三级所有权或行政机构命名。这一空缺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得到弥补,但由于公社化过程的混乱,全国没有统一的组织标准。有的公社分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有的分为“大队”和“小队”;或大队和“中队”;或“工作指导站”和生产队;或“耕作区”和生产队。<sup>⑦</sup>

武汉中央全会开始统一各地的人民公社组织结构。公社以下的两级行政机构称为“管理区”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sup>⑧</sup>。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官方外文译名分别是“Production brigade”和“production team”。此后，这两个译名便经常出现于中国有关人民公社的英文出版物和西方国家翻译中文资料的译文中<sup>⑨</sup>。但名称刚统一两个月，中文又混乱了。毛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没有被官方译成外文）提出公社有三级所有、四级管理。四级管理即公社、“生产大队”或“管理区”<sup>⑩</sup>、“生产队”和“生产小队”。<sup>⑪</sup>

其实，毛的所谓四级管理并非口误。有的大公社的确在公社和原合作社之间增加了一级管理<sup>⑫</sup>。但对于毛的听众不幸的是，毛强调“生产队”的重要性时<sup>⑬</sup>，正如他向听众们说明的那样，他指的是武汉会议决议所规定的“生产大队”，即原合作社<sup>⑭</sup>。毛一定了解，尽管他作了解释，混乱依然存在。1959年3月15日，即第二次郑州会议闭会不久，毛向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出一封党内通信，说会议纪要中“队为基础”的“队”是指“生产队”或原合作社，而非“生产大队”或“管理区”<sup>⑮</sup>。这封信中关于原合作社的说明，本应澄清原合作社在公社中的位置，而没有澄清公社（或许大多数公社）中存在的名称混乱。原合作社被称为“生产大队”。<sup>⑯</sup>

183 毛所谓的四级制没有被公开采用，但武汉会议提出的三级制，在1959年夏末的庐山全会后作了修改。第二级改成“生产队”第三级改成“生产小队”。最后，武汉会议提出的三级，在1961 4月又得到了恢复<sup>⑰</sup>。兹将自1958年至1961年中国官方有关人民公社各级组织的名称变化排列如下：

	原合作社
1958年8月 北戴河会议	生产队(耕作区)
12月 武汉中央全会	生产大队(管理区)生产队

1959年2月—3月 第二次郑州会议(毛) 生产大队(管理区)

生产队 生产小队

8月 庐山中央全会

生产队 生产小队

1961年4月

生产队 生产队

以上排列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没有冠以“大”或“小”限制词的“生产队”在哪级。“生产队”似乎是中国政府对公社以下最重要一级单位的命名(武汉中央全会的命名可能是例外<sup>⑮</sup>)。在北戴河，由于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公社一级，这一名称用于唯一的基层行政单位原合作社。在武汉，这一名称用在第三级，大概表明中共领导人希望将公社的部分管理权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sup>⑯</sup>的体制下分散下去。这时，第二级即现改称“生产大队”，将自成一级核算单位，在公社里各负盈亏。它管理“本地的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和军事”。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公社领导下都有必要的权力，组织生产建设和管理财务、福利，但生产队被指定为劳动力组织的基层单位<sup>⑰</sup>。这一措施的意义在于，考虑到农民对于早先公社抽调农村劳动力进行浩大的水利建设(“大兵团作战”)<sup>⑱</sup>、工业和非农业工程的作法的不满。过多的徭役性公差妨碍了农民耕种，并且由于公差是无偿的，这对于农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毛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对于农民的抱怨给予了同情和支持<sup>⑲</sup>。但说武汉会议使用无定语的“生产队”表明生产小队已成为公社行政管理中最重要一级，似乎也不一定。

然而，毛支持四级制和以生产大队为基础，无疑导致了庐山中央全会对公社分级制的公开修改，使“生产大队”成了“生产队”。的确，可能就是因为毛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不得不解释他所谓的“队为基础”，中国当局为简便起见，才决定使用无定语的“生产队”命名这关键一级的单位。因此，当1961年以“小队”取代“大队”作为生产队的正式英文译名时，没有定语的“生产队”一词不得不下



降一级，使“队为基础”仍不失为一句恰当的话，尽管其英文译文必须改成“小队为基础”。

注释：

1. 韦利：《孔子的论语》，第171页。
2. 同上，第21—22页；顾立雅：《孔夫子其人其事》，第240页。
3. 赖肖尔和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第70页。
4. 参见本书本卷第214页。
5. 随后的大部分讨论基于夏的富有启发的分析，参见《从术语和语义的变化看人民公社在退却》，第29—35页。但是，当夏写作的时候，手头没有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可惜他死了，没能读到其中语义混乱的进一步证据。
6.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55—456页；《人民手册》（1959），第33页。
7. 夏《从术语和语义的变化看人民公社在退却》，第36页。
8. 《人民手册》（1959），第43页。
9.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501页。
10.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19页。
11. 同上，第13页，在第10页，同样提到四级，尽管“小”已明显地在无意中被取消。
12. 参见大卫·克鲁克和伊莎贝尔·克鲁克：《杨仪人民公社的最初年月》，第39—40页、196页、227页。
13.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第40页、47页。
- 14、15. 同上，第18页；第107页。
16. 沃克，《中国农业规划》，第18—19页；达特《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第35页。
17. 夏：《从术语和语义的变化看人民公社在退却》，第37—38页。
18. 同上。由于他意识到有没有修改“生产队”的形容词关系重要，夏认为，在庐山会议上，在“生产队”前没有使用限定形容词，这表明当时就出现了公社地位的衰落，而根据我们手头的材料，那个衰落在郑州开始。
19.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500页；《人民手册》

第三编

冲突

100

100

### 庐山的 激烈交锋

---

#### 第一节 一次引发旧情的返乡之行

1959年6月25日下午5时40分，毛泽东回到他的故乡韶山，这是他32年来第一次返回故乡<sup>①</sup>。他从湖南省省会长沙驱车而来<sup>②</sup>。一如往常，陪同他的是新近提升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sup>③</sup>。随行人员包括湖南省委书记徐启文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sup>④</sup>，而中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小说家之一周立波的出现，似乎是为了保证这一历史性时刻载入史册<sup>⑤</sup>。

当天傍晚，乡亲们赶来迎接毛泽东，欢呼、鼓掌和笑声洋溢在韶山招待所的门口<sup>⑥</sup>。毛泽东走进屋里，听取了有关当地人民公社的水利管理、粮食生产及各方面形势的汇报<sup>⑦</sup>。他

被引入他的寝室，那里的一切全都特地准备妥当，他说他自己随身带来了卧具<sup>⑧</sup>。

这一天晚上，毛泽东批阅文件直到深夜。黎明时，他走出房门呼吸新鲜空气，和年轻的警卫人员杨明聊起天来。毛询问他受教育的情况，当杨明告诉毛，他从9岁至15岁接受过学校教育时，毛高声地追述说他自己也有着相同的经历。杨的回答饱含着辛酸，尽管在语气上没有表现出来。他显然知道毛的父亲很富裕，足以雇佣劳动力，所以他回答道：“不，主席，这是不一样的！我家里没有劳动力，我只能在冬天和春天空闲的时候才可以学习，我没有学到多少知识。”毛解释说，他自己年轻时也干过体力劳动。

接着毛问杨明对人民公社的看法，对此，据说杨明尽可能忠实、完整地作出了回答。显然他的一些意见肯定是批评性的，因为听说尽管毛对杨的谈话表示满意，他仍觉得有必要使杨确信，  
188 在一些困难被消除之后，人民公社还会是很好的。<sup>⑨</sup>

次日天刚破晓，毛就穿上“雪白的”衬衫和一双棕色皮鞋，在罗瑞卿和徐启文及其他人的陪同下，动身攀上了一条山路。他首先顺路走访了几户农民，喝了些茶水，询问起在他20年代中初次举起革命旗帜时曾跟随他的那些人<sup>⑩</sup>。在第二户，户主毛霞生硬是让人从地里叫了回来，他对主席——他的本家人——在重返小池塘对面的故居之前首先来到他家感到高兴<sup>⑪</sup>，毛霞生不久后回忆说，主席嘲笑他自报的亩产量800斤为数太高，并估计实际产量只接近500斤。根据这个说法，毛泽东当时曾利用机会向毛霞生宣讲需要避免浮夸风和其他“五风”<sup>⑫</sup>。根据关于此事的报道判断，主席在命运攸关的庐山会议前夕持“右倾”立场。

毛的故居在被国民党没收期间遭到相当大的破坏，1949年后，它的修复工作一直是正在上升的年轻的省委领导华国锋所特别关注的事情<sup>⑬</sup>。当毛环视着故居堂屋时，他对一个向他提问的人笑了笑，一再说“原来就是这个样子”。毛步入他自己的房间，凝视

着他父母的相片说，要是在今天，即使生了病也不致使双亲那么早就离开人世<sup>⑭</sup>。在故乡参观期间，没有坐汽车，他没有在任何时候对自己的故居成为圣地这一点感到尴尬和不快。他似乎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也许有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对他的个人崇拜从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起就一直在不断地滋长。地位较高的同僚如刘少奇、周恩来(他们两人对任何想使他们自己的故居成为旅游胜地的企图都感到厌恶)，甚至彭德怀，都认为把毛的出生地变成一个供参观的场所是合适的<sup>⑮</sup>。

189 毛接着参观了学校。学校设在一块地里，毛曾在这里放过牛。村里的学校最初设在毛氏私塾里。在那里，毛泽东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1925年开办了农民夜校。1952年，建起了一座新学校，毛亲笔题词“韶山小学”。开始仅有100名左右的学生接受小学教育，而在1958年增加了初级中学，到那时有700多名学生和30多名教师<sup>⑯</sup>。

上午10点钟，毛离开学校去吃了点早饭。后来到田野里听取公社书记的汇报。毛再次成为赞成生产稳步发展的典型。他小心地从汇报中筛选出事实，一再向当地干部提出，一年里每亩增加100至200斤粮食就很好了。他说，考虑到缺乏拖拉机这种情况，需要注意养牛，并强调了发展林业的重要性。在汇报会上，对水利管理工作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那天下午，毛决定去看一下当地不久前建成的水库<sup>⑰</sup>。

毛即将来参观的消息显然传播得很快。当他下午3点钟到达水库的时候<sup>⑱</sup>，欢迎他的农民已经聚集在那里。毛通过实地下水游泳的方式进行了他的视察。他在水里呆了2~3个小时，但是不清楚他实际游了多少次，水上活动量有多大。他对护卫他的年轻的游泳运动员们说，他不会蛙泳、蝶泳或自由式。围在一起的群众谢绝了毛发出的跟他一块儿游泳的邀请，因为他们不会游，但他们被毛静止地漂浮在水面上的能力印象颇深<sup>⑲</sup>。

大概是在去水库的途中，毛走访了革命烈士毛福轩(曾是长沙第一个党支部的支部书记)的遗孀。那天晚上，她和另一位姓毛的烈士的遗孀及毛氏家族的四个男性成员<sup>②0</sup>，以及其他老人、革命烈士和革命干部的亲戚，一起参加了主席举行的宴请。灰色砖质平房的周围都是松树和竹子，毛泽东向来客打招呼并一一握手，请他们坐到准备好的木制长凳上。下午7时客人到齐了，毛请他们进入室内，围坐在4张大圆桌边，桌上摆好了酒席。主席绕着桌子向每一个人敬酒。一位70岁的老人大声说：“主席向我敬酒，我实在不敢当。”对此，毛回答道：“人们必须向老人们敬酒，向德高者表示尊重。”<sup>②1</sup>主席在敬酒时请求客人们讲出他们对党委和干部的意见与批评，如果他们害怕公开讲出来的话，那么可以给他写信。据报导，一场热烈的讨论接着就出现了<sup>②2</sup>。

当人们散去的时候，毛泽东回到他的住处。对往事的回忆使他兴奋不已，难以入眠。于是，他提笔赋诗一首：

#### 回韶山 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sup>②3</sup>

在家乡逗留的第二天早上，毛泽东没有向罗瑞卿及其他几个随行人员打招呼，便向附近的一座小山上登去(罗等人随后赶到)。在山顶，有人发现他们已经到了毛父母的坟墓前。一位机灵的年



轻随从即时用一些松枝和野草捆扎出一个花圈，送到毛的手中。毛泽东默默地把花圈放到坟上，深深地鞠了一躬，他的同伴也都跟着鞠了躬<sup>④</sup>。

这件事打动了毛的心弦。在即将结束韶山之行要返回长沙的那天中午午休之后，罗瑞卿去叫毛泽东时，毛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对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接着，毛又补充道，当他再来韶山时，准备再度到父母的坟上祭奠。<sup>⑤</sup>

那天下午，人们成群结队来为毛主席送行。在返回长沙的路上，毛泽东两次要汽车停在他青少年时就记得的地方。这两次耽搁使他直至深夜才到达长沙渡口码头。可是这里仍聚集着兴奋激动的人群向他欢呼。他让警卫站到一边以便与人们握手<sup>⑥</sup>。

## 第二节 登庐山

191 毛泽东怎样从湖南长沙来到邻省江西海拔5000尺的夏季避暑胜地——庐山(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随后在这里召开)，这一点不清楚。但是，他显然是在心情兴奋的韶山一游之后情绪高昂地来到这里的。庐山秀丽的风光使他不由得又赋诗一首：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笼四百旋<sup>⑦</sup>。

.....

若干年后，一位西方记者游览了庐山。他称庐山是一个“极美丽的地方，在那里，山峦、岩石和常青的树木从平坦开阔的长江平原拔地而起……”：

这是一个唤起对过去无数世代的联想的地方。许多世纪以前，诗人和画家就开始来到这里寻求创作灵感。他们站在建造在悬崖边上的小亭子里，凝视着他们来到的叫做五老峰的峰顶，他们坐在仙人洞里，其情其景，正如今天的观光者所感受到的一样。他们品尝着“一滴春”，复述着那个传说：喝足了这种仙水就能变成长生不老的精灵<sup>②</sup>。

据这位记者的记述，避暑胜地庐山有一个“庞大的别墅”（可能是蒋介石30年代的夏季休养居所），还有若隐若现于山坡林荫之中的“许多用石头建造的夏季休养别墅”。在有两套卧室的别墅里配备着一些女服务员，它们似乎是“为一些有地位的中国人”设计的。

当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译按：全会指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的提法不准确，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优美的环境举行时，温暖的气氛笼罩着会场，毛泽东出席了三次会议，他和各省党的书记们谈笑风生。毛针对由大跃进导致的左倾冒进草拟了一个包括十九个问题的一览表，这些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但毛和他的助手们显然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只需要扫尾措施，不像4个月前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那样，需要大动干戈<sup>③</sup>。

庐山会议开幕时，毛泽东发布了几项指示。他号召每一个县和公社编纂一本“好人好事”的书，这样的书将以轶事的形式记述那些在1958年坚持真理，做好了工作，没有随风行事，没有作错误的或言过其实的报告的人。另外，再编纂一本“坏人坏事”的书，这种书将记述那些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犯了严重错误的人<sup>④</sup>。

192 一些要列入后一本书（黑书）的干部可能意识到主席欺骗了他们，虽然那时他们仅有的错误是过分热情的贯彻了主席的指示。但是毛泽东不再支持浮夸的做法，冒进和保守都是不可取的，这时的问题是冒进。为了制止由于基层干部的冒进而产生的“半无政府

主义”，毛也提倡重新实行中央集权制，收回1958年下放的某些中央权力，批评和反对平均主义<sup>⑪</sup>。

毛发生180度转变(对他来说不无代表性)的最明显的根据是他接受了经济规划者们提出的口号和论点，以及被他们用来制止了1956年的冒进的、当时使毛感到很恼火的谨慎的建议<sup>⑫</sup>。综合平衡是制订经济计划的前提。“大跃进的主要经验教训之一就是缺乏平衡。”曾经出现以牺牲其他生产形式为代价的过分集中的土高炉生产；这种状况不能再存在下去了。数量和速度(实际上是大跃进的口号)将不再象以往那样提倡。“我们的产品宁可少些，但要质量好些、品种多些。”<sup>⑬</sup>

此外，传统的苏联模式的排列顺序——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将不得不颠倒位置，改换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毛泽东在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中称赞了那位他几个月来一再认真听取其意见的人：

陈云同志说：“在我们开始进行基本建设之前，要先安排好市场。”许多同志不赞成。但是我们现在认识到，陈云同志的意是对的。我们要先把衣、食、住、行、用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sup>⑭</sup>。

难怪各省书记向毛建议再次委托没有来庐山的陈云<sup>⑮</sup>指导金融和计划工作。他们感到庐山会议将是一次不朽的会议(神仙会)，是一次智囊会议，在会土将以一种理智的和合作的态度解决问题<sup>⑯</sup>。正如毛所说，前景似乎光明了<sup>⑰</sup>。

### 第三节 黄瓜引起的争论

庐山会议刚开始时，毛和他的工作人员大概会认为，万一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出现争论，国防部长彭德怀是最不可能卷入的人。彭德怀不负责经济事务，关于终止1956年的冒进和发动1958年的大跃进的争论他都没有参与。有人特别是陈云或者李富春可能会乘机说：“我来告诉你应当如何如何”，——李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贯彻大跃进路线时一直忠实地抑制着自己的怀疑<sup>③</sup>。但是，彭德怀不是他们这些人中的一员。

然而，即使彭德怀不担任有关部门职务的事实使他攻击大跃进政策的行为顺理成章，也还有一些历史的和个人品质的因素使他的发难不出人意外。

其中一些历史因素已经提到：主要的争论是关于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期间的战略问题。此后，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分歧已经转向国防政策和武装部队现代化问题方面。林彪元帅在政治局里的地位逐渐上升对彭也是不祥的预兆<sup>④</sup>。但是，不管有怎样的怨气或疑虑，彭可能已经有充分理由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这对理解在庐山所发生的一切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据彭德怀最早期的一位战友讲，彭有一副强有力的体格，“兼有粗壮的身躯和桀傲不驯的面孔”。“他具有中国农民稳健和朴实的传统美德。他工作勤奋，能够与他的战士们一起忍受长期的苦难。”<sup>⑤</sup>的确，彭德怀的吃穿象战士们一样俭朴。甚至在北京，他也坚持住在朴素的住宅里<sup>⑥</sup>——他苦行僧的形象由于他那佛教徒一样的光头而更加显著。

彭德怀的吃苦耐劳源于他的家庭出身。他降生的那个农民家庭很不幸，日甚一日地陷入贫穷的境地。彭德怀生于1898年，孩童时便做了放牛娃，十三四岁时是一名煤矿工人，在此之前，他

已废弃了仅仅两年的私塾教育，回家种地。在1912年的一次饥荒中，他帮助组织了反抗当地地主催租逼债的斗争，反抗斗争彻底失败后，彭德怀逃到湘阴县属的西林围，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做了两年堤工。以后当了兵<sup>②</sup>。

彭德怀是归属于毛旗帜下的早期新兵中的一个，1928年他率领数千人加入了在井冈山的朱毛红军<sup>③</sup>。也许毛被他这个湖南老乡的勇敢和忠诚所感动，尽管彭德怀从来没有以他的将才而出名，但不久他便在他的战友中成为地位仅次于朱德的军人。在长征时，毛泽东曾赋诗一首赠给彭德怀：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sup>④</sup>

彭德怀更多地酬答了毛泽东对他的赞赏。他谨慎小心地把他的成绩归功于主席，关心他的生活。当主席召唤他做某件事时，他总是认真、迅速、力求得体地把事情做好<sup>⑤</sup>。毛彭之间也出现过矛盾，有关系紧张的时候，但相互尊重毕竟起着主导作用。

作为指挥官，彭德怀毫不客气地斥责他下级的秉性是众所周知的。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我喜欢批评人。”但是，据他的老战友黄克诚（他也受过彭的训斥）讲，从来没有人对彭的批评怨恨不满。因为这些批评总是公正的，并且总是为了改进工作<sup>⑥</sup>。此外，如彭德怀的部下了解的那样，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行动证明他不怕与上级对阵。1956年，当苏联领导人米高扬率领苏联共产党代表团来中国参加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时，彭德怀当面问他，为什么直到现在苏联党才开始批评斯大林。米高扬毫不掩饰地回答：“当

时我们不敢提出意见，假如那时向斯大林提意见，就要掉脑袋。”对此，彭德怀反驳道：“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195

更为恰当的例子是发生在朝鲜战争期间的一件事。当时，彭德怀显然是为接到了什么命令而感到愤怒。他来到毛的住所，不顾主席的警卫的劝阻，闯进正在休息的毛的卧室，迫不及待地开始向毛进行激昂的申诉。结果毛不但在具体问题上让了步，而且还赞赏他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sup>④</sup>当然，毛实际上的意思是没有其他人敢闯进他的房间。

根据以上的历史背景，彭德怀于1959年春在上海批评毛泽东的领导方法的愿望是非常能够令人理解的。至于彭为什么要把批评集中到这个话题上，则仍是一个问题，因此毛对彭在庐山会议前没有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发表一点意见而感到忿怒是有道理的<sup>⑤</sup>。再者，原先促使彭提意见的现场调查资料到庐山会议召开时已搁置了6个多月。

1958年10月，彭德怀再次视察甘肃省，一个大约10年前他从国民党军队手中解放出来的省份<sup>⑥</sup>。据彭德怀的一位警卫员讲，到达那里时，元帅对土高炉很感兴趣，他由车窗里指着那些土高炉，详细地述说它们的特性。显然彭德怀接受了官方的路线，用这样的方法能够使农民用本地的材料解决农用钢材短缺的问题。展望未来，彭德怀预见将来农民都能够生产简易的炸弹和地雷这样一些军事武器<sup>⑦</sup>。

当彭德怀来到一大片庄稼地前，看到成熟的庄稼躺在地上，似乎没有人收割时，他原有的那种得意情绪一下子降低了。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最后找到了一位年老的农民。他说，所有壮劳力都忙着发射钢铁卫星（即试图创造炼钢纪录）去了。没有足够的人力完成上级指派的各项任务，下达的命令是一切为“钢铁元帅”让路。

彭德怀愤怒地喊道：“你们难道不想想，庄稼收不回去，来年



大家吃什么？总不能吃钢铁嘛！”那位老农用力点点头表示同意，并且中肯地补充道：“是啊，谁不这样说，这样想？可谁顶得住这个风？除非中央派个大干部来象你一样，有权提点意见！”

当彭德怀视察一所步兵学校时，发现学校的教员在土高炉前卖力地干活，他们的衣服象煤烟一样黑，由于缺少睡眠眼睛通红。学校的课程和训练因此而停顿。这时，彭德怀大概真正感到震惊了。彭一进学校，教员和学员抬着他们刚炼出来的“钢铁”跑来欢迎他。他告诉他们：“我为你们的热情感动。但对你们的领导这样不珍惜你们的热情和干劲，我要打他们的屁股！……假若我们军队，我们的军事学校都来搞这个，敌人就会高兴得跳！因为我们不待他们来打，我们自己就垮了！”<sup>⑤</sup>

学校招待所的两个工作人员，也许是彭德怀的陈述给他们壮了胆，开始向彭抱怨当地家庭出现的情形。一些房子被拆掉，果树被砍掉去建造和烧炼高炉，烹调用铁锅被收去当作原料。那天晚上，彭德怀与许多干部进行了诚恳坦率的谈话，这次谈话给了他很多思考的材料。那些干部离开之后，他提笔一直写到深夜。<sup>⑥</sup>

从甘肃回来的路上，夜间通过炼铁炉火烧得很旺的河南省，彭德怀看到农村上空到处闪烁着土高炉的火焰。长时间的沉思之后，彭转头问他的警卫员：“你说这个办法能叫我们国家从此不受穷？”当那个战士谨慎地保持沉默时，彭德怀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不行！这一把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完全不是我们脑子里想的那个东西了！”<sup>⑦</sup>

为什么彭德怀不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或武昌会议和1958年11月至12月的全会上对土法炼钢计划提出疑问呢？根据彭德怀后来的叙述，他接到郑州会议的通知时已经太晚了，只在最后一天出席了在一列（大概开往武昌的）火车上召开的一次晚间会议。毛泽东讲了话，批评了“共产风”，因为大家都没什么异议，会议很快就



死院<sup>②</sup>。他捐赠100元钱给院里每个老人买了一条毛毯，权且补充卧具的不足。<sup>③</sup>

198

那位老人向彭德怀说，他们能够对付自然灾害，但是人为的灾害则是另外一回事。彭清楚地意识到关键的问题是浮夸，尤其是夸大粮食产量。他在敬老院里平心静气地指出，如果虚报的产量——亩产1万斤！——在乌石来说是假的，那就不能指望附近一些报了更高产量的村庄来帮助解决乌石的吃饭问题。问题都出在昏愤上。一些人听了彭德怀的话后叹息不止，另一些人则擦眼泪<sup>④</sup>。其他的人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补充彭的论点说，在养鸡、养鸭都没有足够的地方时，有人建议建造一个能养1万头猪的养猪场，那简直是热昏了头。<sup>⑤</sup>

彭德怀进行了多次会见。一次，他会见了一位县委书记。这位书记公开承认高产田数量很少，最大限度只能亩产800斤。彭德怀赞扬了他的诚实，并说他不相信其他地方亩产800斤或800斤以上的虚报的产量。那位干部解释说，上面施加压力才造成虚报，如果你不放卫星——粮食产量卫星、钢铁产量卫星或吃饭不要钱方面的卫星，就会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危险。彭德怀严厉责骂了这样的做法，并且断言：“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sup>⑥</sup>

不久，彭德怀会见了一位好夸口的大队干部，他声称每亩产量3000斤，让妇女和孩子去收割庄稼，年轻男人去参加钢铁生产。当彭德怀问站在周围的农民这是不是真实的时，他们都笑了，但大概也很紧张，因为他们不敢得罪那个干部。彭德怀在这些农民面前斥责了这个干部，指责他浮夸，并断言根据自己对田地的观察，如果他们能达到每亩300斤，就不错了。这一下子激发了农民批评“吹牛皮卫星”和干部的虚报作风的情绪。令人担忧的是下一年人们将挨饿。彭德怀把那位干部带到一边，向他解释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人们向往大跃进，但不是错误虚假的跃进。如果使用命

令主义，群众就会造反<sup>⑦</sup>——彭德怀已把老战友们的这个告诫牢记在心。<sup>⑧</sup>

但是，干部的浮夸并不是农民不满意的唯一根源。生活在敬老院的老人们对大锅饭和带有军事性质的生活方式感到厌烦。<sup>⑨</sup>那天晚上，彭德怀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他一路陪彭视察）在一个月光普照的院落里散步，彭提出了自己对军事化、集体化、村社化、水资源保护区化、电气化等的怀疑。这些将如何去实现呢<sup>⑩</sup>？如果某个人反对这些“化”中的任何一“化”，他自然会被戴上一顶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sup>⑪</sup>。

症结就在这里，人们担心受到惩罚，1957年的反右运动加深了这种恐惧心理。这就意味着向上级报告真相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彭德怀在敬老院里承认的<sup>⑫</sup>。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周小舟本人也有这样恐惧心理。彭德怀问他大炼钢铁运动是否正确，尽管彭已表示不赞成这个运动所产生的后果，周仍然感到不能批评毛的倡议，仅仅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这很难说。”只是在大跃进政策的实施方面，周才同意过去存在当时依然存在过热现象、缺乏客观性和浮夸倾向等问题<sup>⑬</sup>。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在一个和蔼可亲的政治局委员面前还感到如此紧张，试想一个基层干部要对他的上级汇报不合胃口的实情，不知该怎样叫人害怕呢。

不管怎样，周小舟确实承诺要针对大跃进的过火行为向全省发出批评性指示。作为对应措施，彭德怀象此前向农民作保证那样对周小舟保证，他要向毛汇报事实真相<sup>⑭</sup>。在做出这个保证时，彭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原则，因为他曾经间接地同意农民的看法：毛的政策正在受到曲解，主席本人不可能知道实际情况<sup>⑮</sup>。

当然，对彭德怀来说，要做到暗示基层群众：毛不仅知道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产生的问题，而且肯定对这些问题负有大部分责任——这在政治上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这样做的话，彭不仅违反了党的纪律，而且还要面临实际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对毛的

个人崇拜。甚至彭在家乡偶尔与他青少年时期的朋友谈话时，他也发现，不可能由他单独消除毛的无所不晓的神圣形象。这个形象是刘少奇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颂扬“毛泽东思想”以后树立起来的。

200 这是彭德怀在其后几个月遇到的困难，实际上也是所有对毛可能提出批评的人的困境：怎样把人和神分开？怎样把领导和传奇人物分开？也许这就是彭德怀去庐山前还感到踌躇的原因。当然，当彭德怀耳边回响着他的老战友给他的如果引起农民不满，就会造反的告诫离开湖南时，他决心讲出他要讲的心里话，这些话体现在他在返乡之行的最后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所作的一首诗中：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sup>⑩</sup>。（译按：此诗其实并不是彭德怀所

作）

然而，尽管他随后就视察了江西和安徽<sup>⑪</sup>，但6个月来彭德怀没有真正地代表人民毫无顾虑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在湖南视察访问的最后一天，彭在株洲偶尔遇到了薄一波。他对薄讲他对6000万吨的粮食征购指标感到担心，他坚信，粮食产量的实际数字不可能超过4500万吨。薄建议彭给北京发封电报讲明这个意思。应薄的请求，彭以自己的名字签发了电报，但电报里丝毫未提他对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运动的失望情绪。后来，上海会议时，正值西藏叛乱，彭将主要精力放在制订平定这次叛乱的军事行动计划上，因此没有更多地参加会议的活动，这是他后来讲的。然而，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并没有妨碍他大胆地说出他对领导方法的意见。4月24日至6月13日他对苏联、东欧和蒙古进行了友好访问，访问回来时，他曾要他的秘书向庐山会议请假，因为他感到精疲力竭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来了一个电话劝说他去参加会议<sup>②</sup>。

#### 第四节 彭德怀尝试发表意见

公平地说，彭在庐山会议之前，可能是由于对经济问题不熟悉，彭德怀感到有某种受局限的情绪。而且，前一年12月在武昌会议上部分降低高指标的命令的下达，使一些领导干部思想上不再存在真正的挫败意识，甚至彭在前一年的12月份视察湖南之后，他也只能承认对基层的实际仅是走马观花，作肤浅的了解。但是，在他访问东欧期间，形势迅速地发生了变化。

201 彭德怀离开北京不到一个星期，毛就确定第一批被严格修订过的1958年的产量数字的问题发布了指示。当彭回到北京时，进一步的检查核对工作实际上已经结束。在最高层领导内部，也未能掩饰住这种思想：1958年的生产的发展是事实，但被惊人地夸大了。

到了庐山会议的论题之一大概是：面对已经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下一步应当做些什么。假如预测1959年的收成是好的，即便不像1958年那么好，领导层也可以决定不公布1958年修订过的数字，而故意少算1959年超过1958年的增产数字，经过几年的过程，逐渐使实际产量数字和要求达到的产量数字一致起来（译按：此句前后有矛盾之处，原文如此）。

但是，早在6月底，就有迹象表明，1959年将不会是一个获得好收成的年份。在东北，持续的长期干旱（自1958年底在许多地区开始，一直到1959年6月还没有结束），已经造成了早期作

物减产的局面，而且还意味着晚期作物的播种要受到影响<sup>⑩</sup>。从5月开始，水灾已经影响到大多数省份，尤其是广东省，第一书记陶铸面色苍白，忍受着发烧的痛苦，指挥着抵抗百年来最凶猛洪水的战斗<sup>⑪</sup>。但是，尽管发生了水灾，在6月份，一些省份仍然传出了夏季小麦丰收的消息<sup>⑫</sup>。然而，产量增加超过1958年10—30%的上报数字，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似乎是不可确信的，他们这时已经意识到1958年的浮夸了<sup>⑬</sup>。总之，到庐山会议召开时，丰收的前景已经十分黯淡——尽管影响秋收的干旱才刚刚开始<sup>⑭</sup>——这就加强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满意的人大胆地讲出自己意见的决心。

202 一般说来，彭德怀看不到所有关于农业形势的报告，这些报告大概每天都送到农业部和粮食部。不过，他自己的国防部给他提供了了解基层群众意见的独特机会。部队领导机关关切地注意战士们收到的抱怨他们农民家庭艰苦生活的来信<sup>⑮</sup>。于是彭德怀从国外一回来，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就告诉他，国内一些省区的形势是严峻的，尤其是彭德怀去年秋天视察过的甘肃省，在4月份还宣布自己是余粮省，现在却承认是一个缺粮省。黄表示如果再抽调军事运输力量去运输粮食，就要影响西藏的军运和全国的备战。但是，彭坚持说为了支援缺粮地区，还是应当做更大的努力，想办法抽出一点运输力量来帮助缺粮地区。<sup>⑯</sup>

海外中国人收到的寄自中国南方的亲人信件，也表明了农村存在的值得忧虑的贫困现象。彭德怀根据他自己的信息来源，知道了这些现象。口粮被减少<sup>⑰</sup>，粮食实行配给，粮食的分配据说每个老年人每天定量2—4两<sup>⑱</sup>，在农村，每个能劳动的人每月定量最多35斤（译按：实际上当时多数地区达不到这个数字）<sup>⑲</sup>。连红薯都很昂贵<sup>⑳</sup>。食用油供应缺乏。<sup>㉑</sup>

彭德怀一到庐山就及时地提出食用油短缺的情况<sup>㉒</sup>。在会议的开始几天，与会者分成几个地区小组进行讨论。彭德怀参加了

西北小组，这大概是因为直到1954年中央政府改组前他至少一直是这个地区名义上的领导人。7月9日，他在小组会上讲：

停止供应农村食用油4个月，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这纯粹是主观主义。我一回国，看到那封电报，马上就通过电话提出了我的意见。

其他的会议代表解释说中央已经取消了这项指示，但是彭反问他们是否首先抵制了这项指示<sup>②</sup>。当他后几个星期在与毛的抗衡中需要同盟者时，这种典型的对同事直言不讳的直爽态度可能早使他失去了支持者。

在7月3日至10日期间，彭德怀在西北小组的讨论中至少有7次发言。他的意见反映了他1958年最后几个月里实地视察所了解到的情况。彭德怀断言，打破农民的饭锅违背了他们的利益，并说，党能够不受到抵制仅仅是因为党还享有崇高的威信<sup>③</sup>。他询问土法炼钢运动的价值何在，但有趣的是，他只提出问题——  
203 号召全国人民炼钢正确吗<sup>④</sup>？——并没有谴责大炼钢运动；也许他从周小舟那里学到了谨慎。他批评未经试验就创办人民公社和吃饭不要钱的制度。他指出，一些公社，包括大加宣传的徐水人民公社已经解散了<sup>⑤</sup>。彭还抱怨左倾主义和浮夸的继续存在，用他经常使用的短语来概括，就是“头脑发热”。<sup>⑥</sup>

在小组会上很早的一次显得有些突然的发言中，彭德怀详细地叙述了在他的军事生涯中犯过的四个主要错误<sup>⑦</sup>。他可能是希望通过抢先开展自我批评来减少他的几次坦率批评所遭致的不满。特别是他可能在期待毛的反应，因为彭在自我批评的发言中提到了毛对1958年的错误应负的责任<sup>⑧</sup>。可是事实上彭德怀已经犯了大得多的“欺君之罪”。

在彭德怀7月3日的公开发言中，他实际上指责了毛的谎言。



在他视察韶山的报告里，他说尽管那里的人民公社提高了产量，但增加的数字并没有吹嘘的那样高：

我去那里发现了事实真象，事实上仅增加了16%。我还问了周小舟同志。他告诉我这个公社的产量只增加了14%，需要国家的很多补助和大量贷款。主席也视察了这个公社。我问主席他的调查结果如何。他说他没有谈论生产问题。依照我的看法，他谈到了那个问题。<sup>⑨</sup>

因为就在来庐山之前毛才视察了韶山，这种评论意味着他们两人到达会议地点后不久，彭德怀肯定找主席谈过。彭的辛辣的评论表明，主席曾毫不留情地对待他，这种傲慢态度可能恰好触发了国防部长出名的暴躁脾气，并引起他在西北小组会上对大跃进的一连串批评。

204 在彭的批评结束之后，7月10日，毛认为不得不回去了，尽管准确的场合还不清楚应该在哪里。毛承认，缺乏统一认识正在逐渐损害党内的团结，但是在他的陈述中没有被动防守的意思，他认为根本问题是一些同志不能用全面的观点去分析形势。他驳斥了认为总路线基本错误的不负责任的批评者，——看来不是指彭，起码在这个时候。缺点和错误是应当容许的，毛伴之一个偏袒的微笑说，它们加在一起也不过是十指当中的一指。<sup>⑩</sup>

## 第五节 奇特的一对

在会议开始的日子里，尽管有工作上的压力，彭还是显得非常振奋。这大概是因为在经过几个月的有违个性的克制之后，他为终于能行动起来，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而高兴。他每天黎明时起床，观云海、看日出；黄昏的时候，散步或时而造访历史遗迹。



每碰到一个元帅同僚时，他们总免不了谈笑一番。

但是，情况很快有了变化。彭变得抑郁起来，显得思虑重重。晚间，警卫员照例为他备好洗澡水后，他无心入浴。他不再按习惯服用安眠药，老是乍一躺下又起来，焦虑地来回踱步。午夜以前，他总是不能入睡<sup>⑩</sup>。

大概是同事之间进行的一些讨论，搅乱了彭的心绪。他曾在两个场合同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见过面。第一次见面是在进餐的时候，周热情地描绘了湖南的工业和水利事业由于跃进而得到发展的情景；但仅仅两天以后他们第二次见面时，周的情绪却变得截然不同，他表示湖南省的粮食统计数字被人夸大了，并激烈批评了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由于周仅有过一个短暂的机会得以向毛转达自己的不安，所以他希望彭能够亲自出面去和主席谈谈。

更为重要的是，彭当时经常和住在自己隔壁的政治局同事张闻天见面商谈<sup>⑪</sup>。他们是奇特的一对：彭生性直率，是一个地道的军人；而张却是一个通晓数种语言的文人，一度的文学翻译者、党的宣传家和历史学家<sup>⑫</sup>。20来岁的时候，张曾在美国做工，在日本短暂地学习，随后较长时间地居住在苏联。1930年，他作为受过苏联人训练的一个年轻人团体的领导成员之一，由莫斯科回国。这个团体被国内那些缺乏正规训练但更富于实际经验的同事们戏称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些由苏联回国的人，在莫斯科的倡议下接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权。不过，张与这个著名团体的大多数成员有所不同，他时常是站在毛的一边。在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的一票对于实现领导层的决定性改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之，张作为资深者接任了总书记职务，毛亦暂且满足于领导一个负责军事行动的三人“小组”。此后张以总书记身份主管政治局工作，直到被莫斯科指控与托洛茨基主义者有联系为止。这一指控，给了毛一个解除他实际职权的机会（随后他的职务变得无足轻重了，尽管还继续占有一个明显

205

的位置)。当共产党人于1949年取得胜利后，张开始专注于外交事务，做过驻苏联大使，随后成为周恩来在外交部的主要副手。到这时为止，他仍保留着自己政治局委员的职位，这一职位，他是在1931年获得，后来在1945年毛主持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得到确认的。然而，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他终于被降级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且，1958年当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放弃其外交部长的兼职时，他也未能接任这一职务。在失去脸面的情况下，张甘居下位，与新上任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商定不再负责日常事务，以有利于专心做好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工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一份关于西方阵营内部矛盾的分析报告曾受到毛的赞扬，并获准在庐山印发。张同毛的关系……其意义始终是不明确的。自1955年张不再任驻苏大使以后，这一关系的基础多半已经丧失。象彭德怀一样，张闻天也不难看出自己正被逐渐地撇在一边。很可能是两人共有的一种对毛的辛酸感，促成了他们短暂的、注定要倒霉的联盟<sup>⑭</sup>。

206

根据彭自己的叙述，1959年春以前，他和张很少有交往。1956年4月下旬，出于巧合，他们在肩负不同使命的情况下在24小时内先后飞往东欧，在此之前刚发生过彭在上海全会上抨击个人专断的事情。当时，张对大跃进所曾抱有的热情也已经消失，因为在一次南方之行中他看到了食物短缺所造成的后果。在上海他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尽管不是在全体会议上<sup>⑮</sup>。4月24日，张和彭一道由莫斯科飞往华沙。27日至28日，他们再度在波兰首都相会<sup>⑯</sup>。这些短暂的交往能够为他们就国内形势问题简单地交换意见和看法提供条件，但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两人会切身体验到苏联人对于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的非难情绪在明显地增强。

当彭于6月13日回国后，张去看望他，并特别提起了毛4月

29日的指示。张认为这个指示非常有益，但也体现了个人作风。换句话说就是：毛对大跃进理论的修正是值得欢迎的，但这种由个人发布指示的方式又是专横的，它使人联想到彭在上海抨击过的个人专断。可以想见，彭接受了张的看法<sup>⑩</sup>。

根据彭对他和张的关系的叙述，可以得出这样的必然结论：国防部长曾被政治上比他更精明的前总书记所借重。张闻天没有政治基础，实际上，他之所以能在党的第七和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幸存，是因为他较早地脱离了自己往日唯一的一批赞同者——由苏联教育出来的“布尔什维克”<sup>⑪</sup>。在和彭德怀的交往中，张闻天想必会意识到自己有了一个理想的伙伴：一个军人，受到高度尊重的首要的革命将军，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司令员，他禁欲主义的生活作风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在人民解放军和元帅当中，他拥有一批显而易见的支持者。

到达庐山以后，比邻而居的环境使张闻天、彭德怀二人能够经常见面。他们认为，经过削减的钢和煤的生产指标（钢1300万吨，煤3.4亿吨），甚至也是无法完成的。张还向彭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土法炼钢运动得不偿失。对于庐山上那种不利于指出缺点和错误的相互间只说正面话的气氛，他们都表示不满。政治局会议没有进行真正的讨论，实际上只是毛和其他最高层的领导人向大家作了简要的情况介绍。张批评毛虽然英明，但在使人民服从方面却过于粗暴。彭似乎认为对于一个新政权的缔造者来说，这样的情况本不少见，他把毛比作中国历史上大王朝的创业帝王<sup>⑫</sup>。

## 第六节 海瑞——转移注意力的人物？

如果说张试图通过与彭的交谈来鼓动这位国防部长采取更激烈的行动，那么他成功了。但张并不是唯一鼓动者，毛无意之中大概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这里，我们有必要暂时离开一下叙述

的主题。

在庐山的时候，彭时常在居室里自言自语地念叨毛在前一年成都会议上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倡导<sup>⑩</sup>。那次会议以后，在1959年3月末的上海工作会议上，毛要求自己的同事们向长期被中国史学家誉为刚直的劝谏者的两个封建王朝时代的儒家官吏——唐代的魏征（公元580—643年）和明代的海瑞（公元1515—1587年）学习。同时，他象往常那样批评了怕讲真话的有害的工作作风<sup>⑪</sup>。接着，在4月初的中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他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党内要造成敢于讲话和批评缺点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是很痛苦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sup>⑫</sup>

毛还再次引用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来充分说明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他引用了宋朝的将军岳飞（公元1103—1141年）。由于岳飞在狱中被杀是出于皇帝的旨意。所以这个榜样在毛的一些同事看来似乎有多种含义，特别是毛强调岳飞之有名望，恰恰是因为他被杀了头<sup>⑬</sup>。

随后，显然是根据毛的意见，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发出了关于编印魏征和海瑞文选的指示。此外，分管文艺界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还鼓励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创作一个关于海瑞的剧本，并就提供有关素材一事做了安排。这个委托创作的剧本，由周信芳和他的两个协作者完成，于建国10周年庆祝日——1959年10月1日——到来前夕在上海演出。剧本名为《海瑞上疏》，取材于这个明代官吏对皇帝进行直率批评的非常有名的事件<sup>⑭</sup>。一个关于岳飞的剧本这时也写了出来<sup>⑮</sup>。

在此期间，还有一个“领导同志”曾鼓励杰出的明史专家吴晗响应毛的号召<sup>⑩</sup>。吴晗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但早在30年代年轻的时期，他就已跻身于中国最卓越学者的行列。他20来岁在北京清华大学担任助教时，发表了大量关于明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成了权威性的参考材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北京各大学的教职员工迁往中国西南地区，吴晗作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在昆明度过了战时岁月。他在那里写出的一本明朝创立者的传记，被许多人视为“当代中国人撰写的最好的传记”。

这个时期，吴晗开始对政治问题发生兴趣。迫于压力，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以暗喻的方式来微妙地讽刺国民党，——“指桑骂槐”，诚如他自己所言。抗战结束后，在清华大学教授任上，他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个积极成员。这个党派力图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寻求中间立场。但是内战爆发后国民党的迫害终于逼使他逃往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在那里，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年，他39岁。在一份早期的自我检查中，他曾谈到自己是在思想斗争中克服了对毛个人崇拜的矛盾心理的。<sup>⑪</sup>

1949年以后，作为身居北京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sup>⑫</sup>吴晗发现自己陷入了大量的礼仪活动之中，负有太多的代表职责，相对而言，几乎没有时间从事历史研究。<sup>⑬</sup>他的政治地位，使他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资深的政治局委员彭真更加接近。在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57年，当最高领导层围绕“鸣放和辩论”以及反右派运动问题发生争论时，彭真似乎曾利用这位历史学家对毛发起过一次隐蔽的攻击<sup>⑭</sup>。1959年，吴晗有大量的历史短文问世，从而结束了自己学术上的休闲时期。这些文章主要是写给人民大众看的。他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对“进步的”历史人物做出评价，比如曹操（卒于公元220年），唐朝女皇武则天（公元626—705年）<sup>⑮</sup>，以及更为重要的海瑞。

在一篇抨击浮夸词句的文章里，吴晗初次谈到了海瑞，文章发表在1959年6月15日——彭德怀自东欧归来两天以后——的《人民日报》上。<sup>⑫</sup>第二天，他又用一个并无特别含义的笔名，在该报发表了他第一篇专论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文章论述了这个明代官吏著名的上疏。如果联系吴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的攻击来做事后的分析，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在对毛进行含而不露的谴责。<sup>⑬</sup>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确实，文化大革命中对吴晗的指控，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他提出海瑞问题的时间和论述这个问题的恰当性而来的。历史上的海瑞之所以引人注意，不仅是因为他上疏批评了皇帝，还因为他被解除了官职。下面我们很快会看到，彭德怀在庐山通过他的“意见书”间接地批评了毛，并且被罢了官。这个事件发生在1959年夏末秋初，这一时期，吴晗正好开始认真写作关于海瑞的文章。这样，当毛后来断言海瑞是暗指彭德怀的时候，<sup>⑭</sup>他的判断似乎是恰当的。出现巧合似乎本来就是难以使人相信的。

但是，毛和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们实际上从来不提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事实：是主席本人首先提出了海瑞的名字，并促使大家对他和其他一些历史人物加以注意。而且，人们根据毛去世后的有关报道还得知，毛曾要大家特别注意海瑞这一类人，因为他们有勇敢的意志，甘愿冒因批评上级——对他们来说就是当年的皇帝——而失宠甚至被处死的危险。<sup>⑮</sup>

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无人提及的另一个事实是：吴晗写作有关海瑞的文章，并非是在获悉了毛的意见后自发决定的，实际上当时有一位“领导同志”在找他并特别鼓励他这么做。<sup>⑯</sup>于是问题出来了：这位“领导同志”是谁？他的身分为什么迄今没有披露？他可能是某一个希望利用吴晗来攻击毛的人吗？

210

显然，彭真是这个角色的可能扮演者。作为北京市党的第一书记和市长，他是吴晗最主要的直接上级，也是最有可能向吴晗



透露关于上海工作会议的情况的人<sup>②</sup>。而且，在仅仅18个月以前，他毕竟还和毛发生过迎面冲突。

另一种可能是：一个象周扬这样级别较高的中央宣传部干部曾受命出面，来促使毛关于向历史人物学习的意见得到贯彻。也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张闻天类型的党的领导人，有知识分子的背景，因而完全懂得海瑞的故事能够被用来达到政治目的。最使人惊异，但也最不可能的一种判断是：这个人是彭德怀自己。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所有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没有被指控与此事有关。在当时众目睽睽的气氛下，这种指控本身具有致命一击的效力，——这一点，无论对他们还是对其他任何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洗的中国领导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这位神秘的“领导同志”——从1979年年中公布的材料来看，似乎也不可能包含在那些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不好的作用而受到谴责或处于困境的人之中。这样又可以把陈伯达、康生一类曾经涉足知识分子工作的人排除在外。因为，这个人要是出在他们中间的话，他现在肯定会……受到谴责。

因此，从逻辑上推论，这位“领导同志”必定是这样一个人：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几乎没有受到冲击，由于某种原因，他的声望在有大量材料公布出来的1979年仍然受到保护。显而易见，在这样的范围内，涉足文化工作到了相当的深度以致可能接近吴晗并鼓励他撰写海瑞文章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是毛泽东自己。

周的可能性较大，他与知识分子有特殊的联系，常在必要的时候代表毛制定文化领域的政策<sup>③</sup>。而且，有一点是明确的，周至少部分明白自己在扮演毛内阁的领班角色，负有贯彻主席意图的任务。在这方面，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例发生在1958年初。当时，在赴成都参加会议的途中，他曾带领一些高级领导人巡游长江，把毛两年前进在《游泳》一诗中提出的建造水坝的设想加以具体



211 化<sup>⑫</sup>。不过毛也乐于和知识分子交往，也许他在卓越的文人们表现出的忠顺中感到了一种迟来的安慰，因为他青年时代曾经受过学者的冷漠<sup>⑬</sup>。此外，众所周知，毛曾经给一些知识分子以特殊待遇。这种特殊待遇，或者是友好的——，比如他同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交流诗作之举<sup>⑭</sup>；或者是带有敌意的——，比如他带头谴责作家胡风<sup>⑮</sup>。吴晗确曾被主席召见过一次，为的是就他撰写的那部明朝创立者的传记进行私人交谈<sup>⑯</sup>。

如果这位鼓励吴晗从事海瑞研究的“领导同志”是毛或者周，那就很容易理解此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曾泄露，并且至今难以披露的原因。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1965年的时候，“他”为什么不为了保护吴晗而出来说话呢？而且，对主席来说，人们还可能提出这样一种猜疑：当年由于在大跃进问题上受到责难，所以毛故意提倡描写历史人物——这些人物与当代事物的联系是不难被人领会的，以查明是否有人会利用这种方式来批评自己。

如果假设吴晗撰写海瑞题材的文章是出于毛或者周的鼓励，那我们将有充足的理由来解释这个历史学家的另外一些超乎情理的莽撞举动。比如，他的一篇容易被人认为是在对毛进行严厉批评的<sup>⑰</sup>关于海瑞的文章，甚至敢在彭德怀为他做出示范之前发表。庐山全会以后，当彭实质上被孤立，刘少奇、周恩来肩并肩地和毛站在一起的时候，吴晗发表了他的另一篇海瑞文章。这一次，他的鼓动者显然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高级别的宣传官员胡乔木。胡告诉吴晗，当海瑞的名字在庐山被彭德怀提起的时候，不少与会者对这个人物还不甚了解，因此，需要有一篇起说明介绍作用的文章。吴晗在9月17日即彭德怀被解职的当天完成了这篇文章，4天以后，它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文章里，作者申明，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得以海瑞自居。人们得记住，大约在这段时间里，周信芳的剧本《海瑞上疏》也开始上演。然而，无论是周信芳还是吴晗，都未受到攻击，尽管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时正进

212

人高潮。此后，吴晗仍坚持进行海瑞研究，在不几年的时间写出了关于这个明代官吏的大量文章，为他的海瑞研究文集得以在1962年问世做了准备（这部文集是根据中央宣传部1959年的组稿计划出版的）<sup>⑬</sup>。

看来，在1956年6月，吴晗根本不可能决心在大跃进问题上独自与主席较量。无论吴晗学术上的造诣有多高，在政治上，他终归是北京市党组织属下的一个成员，没有第一书记彭真的支持，他不可能自作主张地采取行动。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没有人提出彭真当年曾给吴晗以这种支持，任何这类说法都难以使人相信。事实上，到1959年6月为止，党的高级干部和毛一样热衷于大幅度的跃进，在大跃进问题上党内分裂的发生，要晚于这个时候<sup>⑭</sup>。

当然，还有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是：60年代初期，党内曾普遍存在着一种同情彭德怀的强烈情绪，因此，吴晗《海瑞罢官》的剧本于1961年2月在北京搬上舞台一事，当具有替前国防部长进行辩白的含义。这个问题，本书的最后一卷将加以论述。但无论如何，毛树立海瑞这个典范，一位神秘的“领导同志”明确地给吴晗以鼓励。这位历史学家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运动中满不在乎地从事海瑞问题的研究以及写海瑞题材的任何一位作者当时都没有受到惩罚<sup>⑮</sup>，所有这些事情如果联系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海瑞“事件”绝没有中伤当时领导人的含义，并且，在毛看来也是这样。

## 第七节 彭德怀的炸弹

当吴晗关于海瑞的第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彭德怀是否读过它，我们难以断定。但彭的警卫员证实，毛关于大家要敢于说话的倡导，曾使彭“异常兴奋”。并且，因为他参加了上

海会议，他大概早已听到毛提起海瑞这个名字。此后不久，正象我们知道的那样，有人——或许就是彭——在庐山也提起了海瑞。彭后来谈到，在庐山开会的时候，他很清楚，尽管已采取了措施，但计划委员会仍未能控制住盲目发展的势头。7月12日晚上，他考虑好了要说的话，但次日清晨他去见毛的时候，发现毛还没有起床<sup>⑬</sup>。随后，7月13日夜里<sup>⑭</sup>，元帅要警卫员给他沏上浓茶后先去睡觉，当警卫员建议他也好好休息，以便精力充沛地参加第二天的会议时，彭解释说：小组会议帮助他理清了思路，现在他要把在基层了解到的情况汇集起来，写信向毛报告。当时他面前摆着一张纸，上面已经写下了“主席”二字。就这样，彭德怀开始了他那封与个人命运攸关的“意见书”的写作。当晚，在彭写信的过程中，张闻天曾登门拜访，并阅读了部分信稿<sup>⑮</sup>。

第二天一早，在练完太极拳——中国传统的健身操——后，彭叫来随从参谋，把拟出的信稿交给了他，要他做文字上的订正并另纸誊清，然后送交毛的办公室。彭的激动姿态向人表明，这时他如释重负，并且，当他从随从参谋那里确知信件已经顺利送到的时候，他原有的紧张感进一步得到消除。彭自己说：“有些话会上我不好说，也说不准，都写在这里头了。我有话就要说，说出来就象去掉一块病。”<sup>⑯</sup>他那封表述自己意见的信的开头一段，基本上也就是这样说的<sup>⑰</sup>。但毛并不象彭的参谋那样接受他的意见。

在彭信的开头部分，大量的篇幅被用来肯定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甚至包括那些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削减了指标以后取得的成就。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66.1%，农业总产值增长25%。粮食和棉花的产量至少增长了30%。“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sup>⑱</sup>

一些基本建设工程中过多过快的投资，阻碍了生产的正常发

提法本身又是一种对领导的不敬，因为在政治局，做总结是主席的特权。接下来，彭的评论真正击中了要害，尽管他以一个贫穷的国家需要通过跃进来解决大量的经济问题这样的话来作为开头。他承认，经验的缺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失误，但接着又写道，“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象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这似乎是在暗示党和政府都不如人民解放军高明<sup>⑭</sup>。

在彭看来，首要的严重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浮夸风气——对此他追溯到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和对粮食产量的过高估计。这导致了一种错觉，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注意力可以转向工业建设了（这是一种直接由毛提出的重点转移，尽管彭没有详加说明）。无论如何，大炼钢铁运动是出自一种肤浅的认识：

我们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sup>⑮</sup>。

这段话的重要之处，主要不在于其作者具有一定的眼光，指出了土法炼钢运动造成的全国性混乱。人们应当记得，彭的阅历、经验和所负的职责都不足以使他有资格来做这种权威性的分析。他的描述所能够依据的，仅仅是两次在庐山出席国务院会议时收集的资料，以及在此之前陈云对钢铁工业的分析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与新华社共同汇编的资料。这些汇编资料，是毛本人当年早些时候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大跃进的有关评论的直接产物，曾为这次庐山会议的召开而在领导人中散发，为的是事先向他们做扼要的情况介绍<sup>⑯</sup>。换言之，在庐山，对毛和其他按要求看过会议材料的人来说，彭的评论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或能够令人吃

惊的东西。

216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彭的其它一些叙述，如胡乱对待秋收，一些干部头脑发昏，认为共产主义即将来临等<sup>④</sup>。上一年秋天在武昌，毛曾亲自敦促要克服乌托邦思想<sup>⑤</sup>。

想必在毛的心目中，彭的真正罪行是详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带来的所有灾难，然后含蓄而又明白无误地把责任归在它最终应当归属的地方——主席身上。彭提到了毛的号召——把冲天的干劲同科学的分析结合起来，两条腿走路（如现代化炼钢和土法炼钢并举），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等——，认为这些号召被曲解和滥用了。庐山的与会者都知道，这些号召是一些扳机，扣动扳机放号令枪的是毛自己。彭应当能够意识到，他的信无异于一份对主席的起诉书，尽管他后来否认这一点<sup>⑥</sup>。难怪他写这封信时感到紧张。

此外，彭冒犯地使用了一种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毛只许自己用于他人而他人还未曾施诸于毛的批评方法。元帅把过去12个月来的“左”倾错误归因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sup>⑦</sup>——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谴责，大概更带有张闻天那样的知识分子气味而不能反映彭德怀的质朴品格这样的用语显然出自列宁的论述：“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气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这位苏维埃领导人曾用这样的话来谴责背叛者<sup>⑧</sup>。这本书很可能是彭读过的有限几本马列经典著作当中的一本。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革命的早期岁月，最先向彭赠送这本书的人就是毛自己，书的封面还附有毛的题词：“欲使中国革命获得胜利，此书非读不可。”<sup>⑨</sup>

总之，不管是谁启发了彭在庐山使用这种形容词，反正比之一个理论新手拿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帽子来，再没有什么其它的话能使毛泽东思想的创始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者更为激怒的了<sup>⑩</sup>。正象彭很快发现的那样，这一时期的毛已经

处于这样一种状况：自我批评尚能做到，但别人的批评难以接受，对于嘲弄更无法容忍。

彭的信送出以后，随即发生的一系列事是至关重要但又忙乱不清的。根据彭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交代，在7月17日毛认真读信之前，这封信(的复制件)已经被分发给与会者了。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主席当然会采取最后措施了。对一封个人信件可以对付过去，而对一份政治局委员署名的会议文件——特别当它以致主席的信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则需要进行公开的驳斥。有迹象表明，彭的“交代”，是由那些拘捕他的红卫兵虚构、口授给他的，以显得他对毛的批评比实际情况更有挑衅的味道。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过一本阅读范围受到一定限制的关于彭德怀问题的文件汇编，其中刊录了毛在“意见书”(译按：即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上做的一个署名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批示的落款日期是7月16日。彭在他的《自述》中说，当时，事先并没有告诉他这封信要予以公布，当7月17日会议秘书处开始分发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标题的会议文件时，他感到震惊。在7月18日的小组会上，他曾徒劳地要求把信撤回<sup>⑨</sup>。这些情况意味着毛读过信，并且还直观地感觉到彭除了在小组会上发表个人意见外，在其它场合大概也过多地隐瞒自己的观点；毛决意接受这场面对面的挑战。

但是主席没有马上回击。可能他有意要等待时机，看彭能得到什么样的支持。周小舟和7月18或19日到达庐山的黄克诚，讲话的大胆程度和彭相近。7月20日，张闻天就经济问题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这些意见，他在准备一篇会议讲话时曾和彭讨论过。随后，在21日，张用同样的调子又作了3个小时的发言。



后一次的会议发言，张事先没有通知彭，因此元帅没有到场聆听。但彭知道情况后，当晚就要张把讲话稿送来看看<sup>⑩</sup>。张的这些讲话，显然没有在会上印发<sup>⑪</sup>。

218 如果不了解张闻天讲话的内容，要想推断这些讲话在多大程度上挫伤了毛是不可能的。但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这些讲话的内容，而在于讲话人本身。象张闻天这样一个谨慎的政治家，一个没有一群明显支持者的人，在被排除于核心领导层之外沉寂了多年以后能够有足够的胆量向毛公开挑战，这必然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言论会赢得普遍支持这一点抱有自信。毛面临的危险是，彭和张的创议可能会激起更难以对付的人出来大胆讲话。

因公务缠身而留在北京的外交部长陈毅，曾给张闻天打来电话，表示祝贺和鼓励，——6年以后，在接待一个外国代表团时，陈毅这样回忆处于大变动时期的1959年的形势：“国家的情况很紧张……许多烟囱不冒烟；工厂没有机器；我们的钱也用完了。”<sup>⑫</sup>难怪陈毅想通过讨论来解决问题。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根据国内主要经济学家们的分析，也准备了一份关于跃进问题的总结发言稿。那份由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及国家经委副主任薛暮桥和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为薄起草的原稿被薄抛弃了，因为他发现风向不对头。所以，薄作了支持大跃进的讲话。如果薄拿出来的是原稿，再加上他职务所具有的权威，那么，可能会有更多中国领导人改变观点，同意失大于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是犯了极大错误的看法<sup>⑬</sup>。可以确信，财政部长李先念一度也为彭所影响<sup>⑭</sup>。毛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一些同志正在动摇”<sup>⑮</sup>。为了防止任何进一步的连锁反应，主席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在张闻天马拉松式的讲话过去两天以后，毛反击了。

7月23日上午毛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是一次卓越的辩论表演，意在振作自己的支持者和震慑彭德怀的同情者<sup>⑯</sup>。这个讲话既掩盖了现实问题，又嘲弄了对现实的批评。为了使听讲者消除



怨气，主席做了自我批评，但同时也暗示自己将不会单独“承担责任”。这些话足以使他的合作者确信有进行自我辩护的必要，也足以告诫那些潜在的反对者，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有对付反击的艰巨任务。他呼吁团结，并隐晦地暗示：如果处于孤立，缺乏支持，众叛亲离，他就可能收起共产党的整个摊子。

为了振作自己的同情者，毛把那些批评意见痛斥为“糊涂”，并解释说，自己已经在会议上沉默了3个星期，因为“他们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人们越要听。我已经告诉同志们，我们应当顶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好久呢？……有的同志说这是‘持久战’。”毛同意这一点，又加上了一句更能激励人的论断：这样的同志是多数；中国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sup>⑮</sup>

在论及这一点之前，毛还把持批评意见的人视为两年前被痛斥过的“资产阶级右派”。他先提起了罗隆基，一个与彭德怀有私交的资产阶级右派。随后，又提到了另一个右派人物，藉此强调确有一种隐藏的威胁存在，自己并不是在讲缺乏根据的离题话。毛认为，如果大量的批评意见公布出去，人民将会起来推翻党。随之而来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sup>⑯</sup>毛的严厉冷嘲看来引起了普遍重视。他决心把批评意见看作原则问题，彭的同情者们应该当心。

毛随后变换话题，谈起当年早些时候反对“共产风”运动的事情。由于曾经再三表示自己属于中间派，所以毛能够相当具体地指出：问题出在县和公社一级干部身上，并已经很快得到了解决<sup>⑰</sup>。他毋须提醒与会者注意，对“左”倾观点的抨击是在自己领导下进行的。说实在点，他完全没有必要提这件事，因为彭指责的主要是当初关于成立人民公社和发起群众炼钢运动的决定有问题。至于六中全会以后的纠正措施，彭谈得很少，因为他缺乏切身体会。<sup>⑱</sup>

220 接下来是给“动摇者”以更加明确的告诫，毛认为他们可能上了彭德怀的船，如果他们开始动摇的样子已经表现出来的话。这一次，毛想象起过去党内挑起争端的幽灵，这是一个更为明显的暗示：他打算把彭德怀列为另一条不正确“路线”的领导人。首先是大棒，然后是胡萝卜——呼吁团结，这对于那些动摇者来说，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同事，都是离开彭德怀回到毛的怀抱的合适借口。主席提醒从事经济计划制定工作的人，他们对他们在“大跃进”前由于反冒进而受到的批判，处理如何宽大<sup>⑩</sup>。这些人因其知识和经历，一看上去就最有可能支持彭德怀。现在毛要收回这笔恩施。

毛站住阵脚后，随之就谈到具体问题，首先是公社食堂。奇怪的是，这个题目彭在他的意见书中没有涉及，尽管他在西北小组会上的一次发言中扼要提到过打破私人饭锅用以炼钢的事。<sup>⑪</sup>毛谨慎地避免提及使用这种强制的方法逼迫农民加入集体食堂的事，他只是表示赞成自愿加入食堂，转而集中讲食堂的组织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由张闻天提出来的）。他轻松地承认困难，并表示即使有三分之二的集体食堂需要解散也不奇怪。然而，毛重申他对集体食堂的信心，并且嘲笑在科学院领导下进行的调查对缺乏猪肉和发夹的表面现象的关注。“无论是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子都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踏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sup>⑫</sup>

最后，毛讲到核心问题：人民公社的形成，大炼钢铁运动和大跃进的总路线。他承认对所有这些问题负有责任。

“一个是九千万七十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其结果九千万人上鞋……”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

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一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sup>⑫</sup>

221 毛提到那位运气不好的记者表明，主席不准备单独承担1958年错误的责任。提到大炼钢铁，毛承认他负有决定性的责任，但又明确提出这个想法是由他信任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供给他的<sup>⑬</sup>。炼钢运动引起了生产和运输的脱节，毛把这种情况归咎于自己缺少知识，也归咎于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没有做好工作，而且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也必须对公社化的速度和过高的农业指标承担一些责任<sup>⑭</sup>。此外，通过将一些省如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上海戴上“左倾”帽子——毛保证那里的领导会认识到他们将不得不与他站在一起，否则他们的错误将被摊开示众<sup>⑮</sup>。“同志们”，毛说：“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sup>⑯</sup>

毛以一种特有的幽默的方式作了总结，他提醒他的听众说马克思也有急躁的毛病。听众中的一个支持者随声附和道列宁也犯有同样的错误。毛断言政治运动不能算经济帐，他继续说：

“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会象1927年那样失败？象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sup>⑰</sup>

简而言之，毛的观点是得大于失，而彭，不管他的实际表达方式怎样，则是失大于得。毛承认了大多数的错误以便使他与元帅之间的对立集中到一个评价问题上，人们应当怎样作出判断？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毛使他的同僚们明白，他们要在他与彭之间

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可能对他们本人，当然，也将对党具有关键性的政治意义。在某一时候，毛似乎准备接受会议的一致意见：“如果我犯错误时你们抓住了我，你们可以惩罚我。”<sup>⑤</sup>但是，在另一时候，他向彭德怀的支持者——元帅和将军们提出了较为坦率的告诫：“如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着重号是我加的）<sup>⑥</sup>。在会议期间的另一场合，毛说了一段话（7年后彭德怀还能逐字记起），——毛甚至更加威胁道：“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跟随彭德怀走，我就去打游击。”<sup>⑦</sup>毛的最后通牒表明了他对彭的挑战是多么严峻。就是在这个时候，毛似乎准备必要时就摧毁国家机关，他最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走了这条路。

但在那个时候还不需要这样做，因为毛是当然正确的。面临着在毛与即便是彭德怀这样一个革命元勋之间的严峻的选择，资格较老的军人们除了倒向主席之外别无其他办法。显而易见，在主席一边有刘少奇和周恩来总理<sup>⑧</sup>。将军们已经意识到支持彭德怀意味着不仅向革命队伍的始祖挑战，而且向他们历来遵从的党和政府挑战。这不是他们应付得了的战役。

彭德怀的不幸在于他选择的书面形式。文笔不是他擅长的武器，运用它做分析观察不是他的长处。如果是彭德怀而不是张闻天，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3个小时的演说，以朴素的语言阐述了对大跃进的看法，效果可能会引人注目。左右摇摆、犹豫不决的人可能为他的超凡魅力所倾倒；主席肯定得处于防御地位，失去从容准备谨慎构思答复回击的机会。实际上，彭后来说，他选择书面形式是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

实际上，毛作为会议主席，心里明白彭德怀没有作出反应的实在权力<sup>⑨</sup>。元帅的言辞如此激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毛拒绝接受他的一个同志的合理批评，并报复性地决定将他排斥到权力圈子之外。毛公开说：“我少年中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到现在也不放弃。”<sup>⑭</sup>当彭德怀逐渐明白这是毛的最后通牒时，他以粗陋不敬的方式爆发出这样的话：“在延安，你骂我四十天娘，现在在庐山我骂你十八天娘，你就来制止我，这不行。”<sup>⑮</sup>但是，这场戏是由比彭德怀更有权力的人导演的。帷幕落下来了<sup>⑯</sup>。当帷幕重新拉起来时，一场新戏又开演了。

## 第九节 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会

与毛的对立花费了彭德怀相当多的精力。他没有食欲，很少谈话。他躺在床上，枕着双手，忧郁地凝视着天花板。他的警卫员不清楚他的意见书和他这种表现之间的联系。警卫员接受了医生的意见，认为彭生病了。但是元帅痛楚地说：“你们在检查我什么呀？我没有病。如果我病了，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医治。”最后，彭的随从参谋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警卫员，警卫员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彭的政治问题不能通过自我批评得到解决。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随后彭的警卫员得到指示，他不能再随便进入会议厅。以后连续几天，彭德怀都参加了会议，他似乎越来越疲惫，他平常红润的面色变得苍白了。晚上回来的时候，他就呆在自己的住所，不看电影，甚至放弃了晚间散步的习惯。其他元帅常常来看望他，但是现在他们不再是笑声朗朗了。他们显得忧心忡忡，坐下片刻就离开。彭的警卫员终于认识到形势是多么的严重<sup>⑰</sup>。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召开了，彭德怀的结局悬而未定。

毛在8月2日主持召开了第八次全会，191名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147名出席了会议。会议日程有两项，修改生产指标和解决“路

线问题”——或曰对彭德怀和其他持不同意见者怎么处理<sup>②</sup>。毛再次机敏地推敲了他的讲话，他强调了他的反对派的弱点，避开了他自己见解中的弱点。

他简要介绍了修正生产指标问题，强调这是在4个月前举行的上一次全会上初步讨论过的一个问题；给人的印象是这个问题一直在讨论。毛现在在受新近公布的1958年产量数字冲击后，不急于修改降低过高的生产指标。在上海会议上，一些人曾“建议修改这些指标，尽管大多数人不同意”。换句话说，毛对1958年在武昌召开的六中全会上制定的过高指标负有部分责任，但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毛当然不会对坚持那些狂热的不切实际的指标负有比武昌会议更大的个人责任！毛把这些过高的指标说成是“自己立的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打破，打破不合实际的指标，钢、煤、粮、棉等”。但如果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同时就必须令人羞辱地承认1958年的产量数字是荒谬的浮夸，在毛的讲话中没有提到这一点。然而，在彭德怀的意见书中主要批评的恰恰就是由大跃进的气氛滋生的浮夸行为。<sup>③</sup>

毛把话题转到他的对立面身上，他说，他不明白他的反对派说人民由于压力不敢讲话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他们不是利用庐山会议“攻击和破坏了总路线吗？”他进一步指责他们忽视了9个月来他主持制定的反左措施，但是他丝毫没有提到他们对大跃进本身的批评。最后，毛继续呼吁团结——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团结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对彭德怀和张闻天要坚持严肃批评和宽大处理相结合的态度；“……对人要有情，但对错误的东西应当是无情的，那是毒药，要有深恶痛绝的态度”。<sup>④</sup>

与这次具有政治家风度的演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同一天给张闻天写信，嘲笑他的攻击，对张的勇气表示怀疑，冷淡地驳回了张提出的面谈的要求：



你干嘛要使自己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这次你有什么意图？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惆怅。<sup>⑨</sup>

与毛在会议上的讲话相比，在这封信中，他对彭德怀和张闻天向他的权威提出的挑战更显示出了不可容忍的愤怒。在见诸公开记载的场合<sup>⑩</sup>，毛则采取通情达理的态度，居然热情祝贺国家计划委员会过去的一个级别较低的官员李仲云，勇于越过官僚主义的条条渠道，直接把一个全面的、“高度中肯的”投诉大跃进期间的计划工作的意见书送到中央委员会<sup>⑪</sup>。然而李仲云对毛来说不是威胁，彭德怀——尽管他后来声明他基本上也一直是在批评计划制订者——却截然相反。<sup>⑫</sup>

## 第十节 苏联的联系

毛在他反击时间的选择上是幸运的。国际事件帮助他把彭德怀的形象涂上虚假的油彩。6月20日，彭德怀结束东欧之行回来后不久，苏联就违背了他们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的协议<sup>⑬</sup>。根据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记载，就在准备装运原子弹样品之前，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一次会议，认为：鉴于中国的“混淆是非运动”和“种



种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必须纠正他们的思想；“我们成了他们的顺从奴仆，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就得给什么，不管他们怎样侮辱我们”<sup>⑧</sup>。看起来这种与当时情况不合拍的言论提前反映了赫鲁晓夫在中苏分裂时使用的语句。对中国人的好斗性的害怕（由毛在莫斯科的讲话和台湾海峡危机得出的印象），几乎理所当然地在1959年违背协议的决定中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大概决定牺牲与中国的已经恶化了的关系，以求得与美国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1月23日，毛反击彭德怀和张闻天的那一天，尼克松副总统到达莫斯科参加美国第一次在苏联首都举办的展览的开幕式。<sup>⑨</sup>尽管在展览期间出现了著名的“厨房辩论”的尖刻交锋，这次访问仍代表了美苏关系的突破，巩固了已经明显出现的缓和倾向，并预示了赫鲁晓夫两个月后对美国的游说之行。后者的访问，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7月中建议的，宣布于8月3日，正好是在庐山中央全会开始之后。<sup>⑩</sup>

这些新情况，与尼克松8月2日从莫斯科取道华沙回国途中受到的波兰人的隆重接待联系在一起<sup>⑪</sup>，也许使毛和他的许多同事感到生气。赫鲁晓夫的政策在共产主义集团的全球战略方面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中国观点的意见。在核技术领域内，它已经出卖了中国的利益。无疑，这些事件削弱了象彭德怀那样的人的地位，他们坚持不懈地强调与苏联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合作。

但是，赫鲁晓夫使毛泽东批评彭德怀和张闻天的工作更加容易进行并令人相信。7月18日，在波兰城市波兹南，苏联领导人强烈攻击了关于公社的想法，声称20年代在俄国追求这种想法的人“对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理解少得可怜，也不知道怎样去建立共产主义”。很明显，这种谴责也同样适用于针对50年代的中国。

在由波兰电台广播的这个讲话的文本中，关于公社的那一段被删掉了。7月21日，苏联和波兰的宣传媒介又拿出一个新的讲

话文本，其中包含对公社的攻击。赫鲁晓夫的攻击打破了苏联领导及其新闻媒介保持了6个月的休战状态。据一个学者说，赫鲁晓夫的讲话的发布方式，听起来象是经过精心策划的。<sup>②</sup>

227 大概是中国在莫斯科的大使馆把赫鲁晓夫的攻击讲话用电报传回了国内。毛对这个天赐良机的反应，是在7月29日散发了3份与赫氏讲话有关的文件，占首位的是来自纽约的台湾中央新闻社的报导。显然，他想展示对人民公社的攻击对中国的敌人所给予的帮助。在一个简洁的注释中，毛嘲笑了批评者，指出中国和苏联在有关公社的试验方面有很大的差异。<sup>③</sup>

但是毛显然想做得更好些。毛注意到赫鲁晓夫的议论可能会引起一些带民族主义色彩的怨恨，因为经过毛前两年的一些攻击——如成都会议时那样——，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心目中，苏联的整体形象想必已经受到了损害。不过，苏联仍然是“老大哥”，是共产主义集团当然的领导。更不用说苏联是中国主要的军事盟友和贸易伙伴了。毛自己承认，在武汉会议上就开始对公社进行一些调整，以此来安抚苏联<sup>④</sup>。面对苏联领导人——包括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和苏联总理——对公社的公开谴责，尽管不是直接的，中国方面总难轻易地置若罔闻。

这种考虑也许能解释为了对付赫鲁晓夫，毛为什么在8月1日寻求中国党内一位主要的苏联问题专家王稼祥的帮助<sup>⑤</sup>。王，象张闻天一样，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当中的一个，这些人在30年代初期结束了在苏联的训练，回国后控制了中国共产党。王早年就是政治局委员，但上述政治关系严重地损害了他自己。虽然他转向毛的一边对遵义会议及其后毛在1945年党的七大取得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七大时他仍然被降为中央候补委员。尽管毛没有赏识他的归顺，他还是为毛做了一件重要的私事。在1946年去苏联治病的时候，在毛的同意下，他使毛的前妻贺子珍从伊万诺夫斯克的精神病院中被释放出来，并把她和她亲生的女儿安置在哈

尔滨。由于王有苏联训练的背景，再加上他为毛做的事，所以他在1949年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驻莫斯科大使。同年，他被恢复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sup>⑤</sup>。在庐山会议上，毛再次把王拉入他的一边，并极力使张闻天处于孤立地位。张是另一个前驻莫斯科的使节，毛有效地阻止了他利用赫鲁晓夫的观点进行自卫。

事实上，赫鲁晓夫在时机选择上的精确性是起了反作用的。他攻击公社的讲话发表在彭德怀讲话之后，张闻天讲话之前，在庐山会议与会者看来这似乎不是巧合。彭和张的攻击毕竟来得很突然，3个人之间是否存在密谋？难道3人中的两个中国人（或者是彭一人）在他们不久前访问苏联时向赫鲁晓夫透露了他们对公社和大跃进的不满？也许他们表示了想在一个适当的场合发言的意向？难道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外交人员不顾一切地想知道庐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原因<sup>⑥</sup>？彭几乎肯定是无可责难的，他与外国人密谋来干预中国国内的事情似乎完全不可能。但是，元帅也许给赫转达了毛在第二次成都会议上对人民公社的评论并陈述了他自己的意见。这些信息对赫来说就是攻击的材料。不管彭与苏联领导人是否有联系，在庐山会议上确有足够的理由提出怀疑。缺少证据也许是在谴责彭与张的决议中对合谋一事只字不提的原因<sup>⑦</sup>。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散布的材料说，彭在他1959年的苏联之行中与赫鲁晓夫接触时有失当之处。这至少表明毛有借口传播对彭的怀疑，损害他的声誉。<sup>⑧</sup>

### 第十一节 彭德怀的孤立

对人民公社的评论所引起的国际波澜，也许能说明彭在政治局的党政同事为什么无法缓和毛的反击。庐山会议前期，在彭发出他的信以后至毛于7月23日发动他的反击之前，刘少奇和周恩来本来完全可以进行调解，共同表明他们个人对毛的支持，并呼

吁对彭不要采取不必要的过分措施。彭无疑将受到处分，但是没有必要把他推到政治荒漠中去。对彭的批评，可作为鲁莽、过时以及不针对现实的言谈不加理会。

关于毛的其它的主要同事，在任的政治局常委，有两个缺席。陈云在大连休养没能来参加会议。当他随后被告知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为什么彭德怀在这个时候写这封信？”很明显，他立刻就明白了，彭的干预是企图恢复实施正常的经济政策，并克服过激的政策所引起的消极作用<sup>⑳</sup>。邓小平在庐山打乒乓球时摔坏了腿，因而不得不离开庐山。<sup>㉑</sup>

其余两名政治局常委都是元帅。但是，不能指望林彪为彭讲话。这一点林也许很清楚。毛使他出名并使他成为彭的接班人，（接任国防部长）彭的意见书似乎加速了这个过程<sup>㉒</sup>。此外，林和彭之间长期存在不和，甚至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就存在分歧<sup>㉓</sup>。另一个元帅是朱德，彭的朋友和棋友，他是政治局核心内部唯一一个愿意对彭提供保护的成员<sup>㉔</sup>。他提议，“如果有人想说些什么的时候不应该惧怕‘左’和‘右’，让他们说吧。如果象我们这样的人都不说话，那么谁还敢说话？”朱自己就批评过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但他不掌握实权。也许是由于他的反对以及其他一些元帅的努力，确保了彭所受的处罚比毛原来设想的要轻。当中央委员会关于彭以及他的“小集团”的决议通过之后，朱再次进行干预，说：“他犯了错误，做过自我检查，也就足够了，我们应该团结他。”<sup>㉕</sup>由于轻率的干预，朱也做了自我批评。据某省一位主要负责人观察，这件事为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追加了理由（译按：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是在庐山会议召开前的1959年4月）。<sup>㉖</sup>

230 对于其他人未能持朱德这样的语调出来为彭说话，应作何解释呢<sup>㉗</sup>？首先，当毛的火气大起来的时候，估计人们是不愿反对他的。毛能够讲出一种令人畏惧的含有讽刺、嘲笑和谴责等意味的词句，用俗话加以表达，有时还算点历史旧帐<sup>㉘</sup>。人们何苦为

一个对已经过去的事情提出批评的笨拙的同事去冒遭致愤怒报复的危险呢？<sup>⑪</sup>

参加庐山会议的每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是这么想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彭德怀对毛的批评，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庐山，也是对刘的一种威胁——无论是对他个人还是对他的职位。

刘在大跃进中曾是毛亲密的支持者。1958年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上的讲话确实是一个关键性讲话。另外，刘对发起人民公社运动持默许态度，并在开创集体生活的可能性方面扮演了一个热情支持的角色。到1959年夏天刘也象彭德怀一样了解到了大跃进的后果以及人民公社中群众的生活状况<sup>⑫</sup>。但是任何详细的对1958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的分析，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刘的批评。确实，刘象毛一样了解，对农村发生的灾难性转折事件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这也许正好解释了他为什么象毛一样在庐山攻击新闻界，因为新闻界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期间不负责任地报导了领导人的讲话<sup>⑬</sup>。刘也许害怕会受到压力，让他把新近得到的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更为中性的人物，……以作为自我批评的标志。总之，这也许与周恩来18个月前被迫放弃对外交部的领导没有多大差别<sup>⑭</sup>。刘在党内的职位同样可以想象受到了威胁。据说彭曾在一些场合拥护轮换党的副主席职位的主张，那时的副主席（排在前面的）是刘，接下来便是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林彪。<sup>⑮</sup>所以，这样的情况也许不会令人感到惊讶：7月23日下午，紧接着毛的反击性讲话，刘建议把会议文件收集起来，作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小册子加以散发。<sup>⑯</sup>

231 即使刘不必被迫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彭德怀的挑战如果成功的话，也能够向他提出严重的制度方面的问题。首先，作为毛的继承人选，刘也许希望继承党的主席职务，从而在制定政策方面占有优势，虽然在使用这种特权时无疑会受到很多约束。但是，



假如庐山会议通过了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决议，那么，决策工作肯定得向更大范围的领导层开门，肯定得向政治局开门，还有可能使中央委员会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其次，彭德怀的胜利将对党的领导在国家结构中的合法性以及党的凝聚力构成严重的威胁。元帅以及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部下无疑会被承认：他们与中国的现实联系得非常紧密，是中国人民最有权威的代言人——因为他们通过应征入伍的士兵与基层群众保持着联系。根据高岗的理论，确实有可能出现派别分裂活动：在红区党与白区党之间，红区党基本上是军队阶层；白区党，主要是由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的地方干部构成，他们在敌后做地下工作。还有周恩来和他的部下，战争期间他们在重庆工作。

有趣的是，刘少奇在庐山的几个讲话后来被红卫兵揭露出来，主要是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他生气地声称，他接手党的领导权力比彭大，再就是他支持毛关于高岗事件是理解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活动的主要线索的观点。毛在庐山上曾口头发问，“到底是高饶<sup>②</sup>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也许人们会说是彭高联盟？”<sup>③</sup>虽然刘过去偶尔也高度赞扬彭个性刚强、觉悟高以及没有架子。但在这个关头他的看法是：彭是高饶联盟中“一个漏网分子”。确实，在以后的场合，刘曾表示彭在庐山的批评并没有错，但又说作为高饶事件的一个参加者，他没有权力发言<sup>④</sup>。在毛和刘的辩解中

232 倒底有多少真实成分现在仍无法肯定。

在确信会议没有动摇自己的地位的情况下，刘似乎对庐山上发生的一切没有表现出惊讶。在毛反击彭以后，会议休会期间，刘曾下山去，重访他早年——大概是30年以前——从事革命活动时到过的地方。他感到很高兴，陪同他的江西省党的干部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平时，少奇同志不喜欢多说话，这时他的话多起来了”<sup>⑤</sup>。与此相反，在休会期间，毛的私人秘书们却默默地、闷闷不乐地在乡村中漫步。……在漫步中，毛的主要秘书田家英

——他占有的位置过去一度为陈伯达所占据——写了一首诗：

四面江山来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sup>②8</sup>

周恩来虽然过去也与国防部长争论过，但他不象刘少奇那样害怕对大跃进的批评。无论周怎样忠诚地参与推动了这场运动，他和他的主要管理经济事务的部长们以往毕竟反对过“不顾后果的跃进”，并且期望通过这种批评从政治上得到尊重<sup>②9</sup>。如果周不能镇静地看待对刘的地位的打击的话，他也许就不是正常人了。但是毛的威望是另一回事。当庐山上的争论更加激烈时，没有退路的毛的反对派们，从个人意气出发，谴责毛为“晚年的斯大林”、“独裁和专横”，“自负轻信，偏听偏信”，“认为毛有点象铁托”，没有人能对他说话，而只有他才有资格当领导。他“坚持自己的错误直到悲惨的结局，而仅在那时他才知道他必须转弯了，如果他转弯，就一定是转个一百八十度的弯”<sup>③0</sup>。

233 随着庐山会议的进行，支持彭德怀和他的同伴越来越意味着反对毛本人。对周恩来来说，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他整个革命生涯的特点是使自己支持毛和他的观点<sup>③1</sup>；对他来说，走反毛的路，政治上看是不可思议的，在心理上也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在庐山，周维护了大炼钢铁运动以及对彭德怀的批判。<sup>③2</sup>

这样，刘少奇的雄心和周恩来的忠诚使毛得以利用他的地位和威望强烈谴责一个革命骨干，一个在军队中干了30多年的老同志，以捍卫自己的地位和威望。由于受辱于彭德怀的鲁莽及种种暗示，毛放弃了集体领导，这至少部分地说明认为他象斯大林那样专横的看法有些道理。这是他第一次武断地使用个人的权力。在这段时间内，毛放纵了自己。由于没有能够加以制止<sup>③3</sup>，刘和周为毛更大程度地滥用权力铺平了道路，这才有了日后的文化大



革命。庐山会议使延安的“圆桌”出现了裂缝，而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它。

## 第十二节 彭德怀的命运

但是，在1959年，个人的专权仍然是有限制的。具有特色的是，彭起初的反应是坚持己见。他有点天真、急躁，认为毛不顾多年的同志关系，甚至没有把他找去谈谈，解释一下他的信出了什么错。但是，在毛实施反击的后一天，两个没有透露姓名的同志跟彭谈了两个小时。他们强调了那些彭已经开始明白的事情，那封信已不再是主要问题了，他应该考虑一下整个的形势。换句话说，毛的威望比彭的命运对革命更重要，是否公正的问题似乎没有被提到。他们劝说彭同意他们的看法，并在中央委员会里做一个彻底的，实际上是夸大的自我批评。这样做之后，他就不会受到敌视。当然，他的军队中的同事，或者说，他在党内的许多同志将会感到难过。处分将是不可避免的，彭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把他的部下召集到一起并告诉他们，他不可能再担任国防部长了，他将放弃他政治局委员以及副总理的职位，以便能回到家乡去种地。他接着说，“我给主席作了三条保证：永远不当反革命；不自杀；自食其力。”<sup>②</sup>在毛看来，这三条保证中不自杀是最重要的。如果彭德怀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军事英雄被迫结束他的生命，那么，一个愤怒和厌恶的浪潮很快席卷军队和党。对毛的信誉来说，元帅的自杀将比一打意见书具有更大的冲击力。<sup>③</sup>彭还得给自己的妻子做工作。她在几天前来到庐山度假，结果听到这个灾难性的消息，他丈夫的事业结束了。<sup>④</sup>

虽然八届中央全会通过了决议，说“彭德怀领导的反党集团”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并谴责他们长期的活动，目的在于分裂党。不过从政治上考虑，仅仅剥夺了小集团成

员的行政职务，而没有剥夺他们党内的职务。彭失去了国防部，但是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头衔。张闻天被解除了外交部副部长职务，保留下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位。其它两个当与彭和张连一起的小集团成员，黄克诚和周小舟，分别丢掉了总参谋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但都得以留在中央委员会内<sup>④</sup>。黄和周与彭的交谈，使他们被划入这个集团，被认为是向彭、张提供了貌似真实的阴谋计划。黄和周的真正罪过也许在于为彭在庐山的意见提供了材料。

彭从庐山回到北京，危机过去了，他重新开始他正常的生活，他早上打太极拳，晚上散步，起居饮食和睡眠习惯逐步走上正轨。他的警卫员说，唯一的变化是他又开始抽烟了。

235 9月9日，彭给毛写了封短信，再次承认他的错误，并要求准许他去学习和到人民公社参加劳动。毛对信的调子感到高兴，他下令把信传达到各级党组织，但是考虑到彭的年纪，不同意他去人民公社学习，周或去工厂和农村转一转，将是彭恢复体面的办法。<sup>⑤</sup>

最后，在10月份，彭离开他在紫禁城中南海的居所，搬到一所破旧的住宅吴家花园。毛泽东和刘少奇以及其它政治局委员都住在中南海。吴家花园位于北京的北郊（译按：应为西北郊），在园明园区域内，他将在这里度过以后的6年。离开前，彭交回了他的元帅制服、狐皮大衣以及他房间的装饰品，如地毯和画。他带走的都是书，声称他将象农民那样过简朴的生活。他拒绝了为他配护士和总管的安排。从现在起，他要擦地板、洗衣服，补自己的衣服。他仅仅保留了自己的随身警卫员。<sup>⑥</sup>

一开始，生活显得有些孤独。彭的妻子浦安修，在北京师范大学里有较高的职位，只有在星期天她才能来看望他。他的邻居是少数庄户人家，他的警卫不让这些人进来，直到彭威胁着要写信给毛，问题才算解决<sup>⑦</sup>。但是彭自己却劝阻政治局的医生不

要前来。傅连璋访问了他，彭说，“我现在的家是个是非之地，从现在起，你不要来这里，我感谢你来看我。”奇怪的是，傅后来向周恩来提出疑问，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怎么会变得那么怪癖？据说总理含糊回答，“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无情的，永远不会奉承任何人。请记住，人民具有很高的判别能力。”天真的傅医生显然对这句话还是不理解。<sup>②①</sup>

同时，彭致力于建立一个小实验农场。他砍掉灌木，种植果树、小麦、蔬菜和瓜类植物，深挖了水塘，并撒了鱼苗，栽满了荷花。他还养了猪、鸭和小鸡。他试验了所有报纸和电台上推荐的农业技术，以便看一看这些夸大的宣传是否有根据。在他的身份暴露前，他急切地向当地农民求教，以致有人问他是否来自农业研究所。

236 彭德怀的邻居知道他的身份后，就常和他来往。有一个母亲带着她生病的孩子前来，显然相信彭用手按一下就会把孩子的病治好。彭喜欢用中南海送来的影片款待他的农民朋友。在粮食短缺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年）时期<sup>②②</sup>，彭德怀把许多匿名送来的食品分发给他的农民朋友和警卫人员。

但是彭的主要活动是学习，这对一个迄今尚未注意博览群书的人来说是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sup>②③</sup>。他从中南海带来20箱各式书籍，一本也不愿丢掉，满满堆置在他的新居里。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也给他找书读，他不时去党校听课。他名义上还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待遇，仔细地阅读重要文件。（另外他享有参加国庆和其他正式庆祝活动的权利，但是他从来没有参加。）<sup>②④</sup>

至于张闻天，他比彭习惯于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只是长期得不到发挥才能的机会。8月18日，张离开庐山之前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告别便条，这意味着毛没有宽容他，也没有接见他，告诉他今后的去向。毛对那张便条的自我批评精神表示欢迎。同一天，

他指示把那张便条印发给参加那次会议的全体人员<sup>④⑨</sup>。次月，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陈毅宣称张的态度比彭好。也许陈感到在鼓动张起来表态这件事上内心有愧<sup>⑤⑥</sup>。由于张再三要求，他才被允许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一名研究人员，集中研究社会科学理论。后来张的同事都盛赞他勤勉、博学、谦逊。<sup>⑤⑦</sup>

所谓彭德怀集团的另一个在地方工作的成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完全销声匿迹了。直到70年代后期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的遭遇才被外界知晓<sup>⑤⑧</sup>。他的职位的接替者是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但长期得利的人却是那时还不出名的在湖南工作的华国锋。1977年，华国锋成为党的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张平化回忆：庐山会议上，在毛个人的推荐下，华国锋被提升为湖南省委的一个书记<sup>⑤⑨</sup>。如果毛泽东确实关心起省里一个比较次要的干部的事件来了，那么可以推测华的提升与彭德怀事件有关，……毛可能原先就赏识华国锋，因为华在任湘潭县委书记时，就把所辖的韶山——毛泽东的故居地——修建成了全国的圣地<sup>⑥①</sup>。毛在庐山会议期间采取提升华的行动，表明华的提升与彭德怀的被清洗有某种联系。

但在当时，华国锋的提升只是一个次要的事情。当时还没有迹象表明湖南省委书记这个职位将为这个谨慎、平凡的官员提供继承毛泽东、周恩来位置的台阶<sup>⑥②</sup>。庐山会议后，一时最主要的政治问题是它对军队的影响。

### 第十三节 庐山会议对解放军的影响

一位革命英雄的被贬黜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对军队的处置不得不谨慎行事。的确，如果彭德怀象所说的那样，深深地卷入了高岗事件，那他当时为什么能逃脱严厉的指责呢？理由可能是他刚从朝鲜载誉而归，谴责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员，

这在政治上是不能想象的。

在刘少奇9月17日以国家主席名义正式签发林彪取代彭德怀的命令之前，毛泽东不得不在8月18日至9月12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向高级干部们解释这个情况和其他高级军事干部的调动<sup>②</sup>。毛在庐山提出问题后，陈伯达在一篇文章中帮腔说：“象彭德怀这样一个昨天的功臣，为什么今天成为祸首<sup>③</sup>？”几星期后，国防部长被罢黜。这势必在军队将领中引起疑问和不满。对此，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不得不做出回答。

238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中作了回答：彭德怀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毛泽东引用彭德怀30年代的讲话来证明他的论断，把彭德怀当时的讲话散发给与会者，以向他们证明元帅的资产阶级观点。毛泽东指出，彭德怀信奉的是自由、平等、博爱，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不分左和右<sup>④</sup>。毛泽东甚至把彭德怀与非共产党人士孙中山比较，认为彭德怀的革命热情不如孙中山<sup>⑤</sup>。在会上还散发了毛泽东1943年的一封信，批评元帅关于民主教育的一次讲话，以证实毛泽东不是在庐山才突然发现彭德怀的错误思想的。<sup>⑥</sup>

在总结中，彭德怀被指责为混入党内的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机会主义者<sup>⑦</sup>，也就是陈伯达说的，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都证明给彭德怀及其支持者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是合适的。有意思的是，陈伯达也感到有必要为毛泽东缺乏度量的指责进行辩解，声称这样做是为了无产阶级，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利益。<sup>⑧</sup>

象在庐山一样，毛泽东嘲笑彭德怀对大跃进的具体批评：如抱怨女人的发卡、雨伞等商品不足。再一次提到在庐山会议前的多次会议上，彭德怀没有暴露自己的思想<sup>⑨</sup>。为了给庐山会议的参加者敲警钟，毛泽东强调，要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国家，维持铁的纪律是极其重要的<sup>⑩</sup>。毛泽东打击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彭

与苏联的“联系”，虽然在他的讲话中暗示很多，明确论及之处很少：

绝对不可以背叛祖国，里通外国……我们不许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组织，挑起其中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们也不许任何人背着党中央去接受外国的引诱。<sup>②1</sup>

239 但比上面列举的罢免彭的种种理由更重要的是，在庐山会议上受到猛烈批判之后彭表示屈从的事实。他9月9日的悔过书前面已经提到过。毛泽东指示把这份悔过书印发所有与会者，并在上面写下了一些表面看来宽宏大量的评论：如果彭德怀态度诚恳，在政治上不再有大的动摇，那么他将“立地成佛”，确切地说是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仅在一个问题上彭德怀立场不变——他坚决否认存在任何阴谋“篡”党的“军事俱乐部”。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最先提到了这个俱乐部。据彭后来回忆，当时会议上对他施加压力，要他承认这一指控，这等于逼供。有些与会者可能受到林彪的鼓动，嘲笑彭顽固，说“不要再欺骗我们了”。彭德怀发了脾气，并且反击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sup>②2</sup>

彭德怀读了陈伯达给毛的信和9月份在党内发行的《内部参考》上有关经济的文章后所做的笔记表明，尽管他承认了错误，但他仍然确信自己在庐山会议上作的分析是正确的。10月，他嘲讽了那种用篡改国家统计局数字来证明大跃进没有破坏国民经济的比例或平衡的企图，他写道：

这些专家同志和陈伯达同志，我相信他们的动机都是纯良的。可是，睁着眼睛硬不看事实，任性地凭主观想象出发，



带着放大镜去找合于自己主观愿望的材料，总想客观事物会照着他们的主观愿望，可是它偏不听话，它照着自己的规律运动和发展。

在不需要寻求具体措施的情况下，彭的言辞甚至比在庐山时更加严厉。他认为人民公社的共产风导致农民的家禽牲畜大量地被宰杀；“农村的劳动生产热情立即下降，农村人口盲目外流，造成当时社会现象混乱”；有人说，农村公社化是一个早产儿，“据我看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240 大炼钢铁运动带来的农业大欠收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无法估计。就其自身而言：“这次全民性的炼铁，实际上是一个普遍性的大破坏。损伤人民元气的破坏，要有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恢复”。<sup>⑤</sup>

这些评论20多年后才公诸于世。但是，尽管彭德怀在公开场合表示承认错误，毛似乎也不能从别的元帅那里获得什么支持。例如后来是彭德怀专案组的代理负责人的贺龙，在他受到周恩来指责之前，他都没按中央指示发表反彭的讲话<sup>⑥</sup>。有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公开表示了对彭德怀遭罢免的忧虑<sup>⑦</sup>。毛只能引用刘伯承元帅的合乎他心意讲话，刘伯承大概说彭德怀脱胎换骨是必要的，这大概是对彭的忠告<sup>⑧</sup>。……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的讲话中充满了辩解的口气……他为不久前政策的改变开脱说，没有一个领导是绝对正确或者没有出过或左或右的偏差的<sup>⑨</sup>，制订政策就象航行目的地是莫斯科的飞行，一会朝这个方向，而后又朝另一个方向<sup>⑩</sup>。很可能就在这个场合，刘少奇捍卫了大跃进中的领导（同时当然也捍卫了他自己的领导）：

过去一系列的革命运动是毛主席个人领导的。他所领导的这些运动不是没有缺点，但如果由别人领导，可能会有更



多的缺点和错误。可不可能呢？我自己认为是可能的。即使在毛主席领导下，也出现了一些缺点。没有毛主席的领导，缺点错误是否会更多呢？<sup>②①</sup>

241 刘少奇关心维护的不仅是毛的行为，而且是毛的威望。他说，长期以来，“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威望没有“资产阶级领袖人物”的那么高。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领导人陈独秀的威望没有孙中山的威望高。甚至毛的威望也没有蒋介石的高<sup>②②</sup>。这就暗示40年代刘和其他人建立毛的个人威望是政治上的需要。关于这一点，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3年前（译按：指1956年）就明确指出说：不再需要人为地树立毛的威望了<sup>②③</sup>。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似乎也同意这个观点。他提出，不要再喊“万岁”，再唱《东方红》了。<sup>②④</sup>

但是，安子文和刘少奇发言的背景是不同的。安子文是在党的八大上为了说明为什么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从党章中删去时提出这个问题的。这是为了使中国顺应苏联集团的非斯大林化所采取的一个姿态。在1956年削弱毛的威望，刘本人可能是乐意的<sup>②⑤</sup>。但是在1959年他有不同的想法了，他不得不向军队强调他不赞同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他告诉与会者，与他过去支持对毛的崇拜相反，现在他赞成提高周恩来，邓小平及彭德怀的继承者林彪的威望<sup>②⑥</sup>。换句话说，刘少奇主张促进集体领导。他说，任何人，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本人或是林彪，如果犯了错误，人们都可加以反对，这就意味着他倾向于比较开明的领导作风。<sup>②⑦</sup>

但是刘少奇并不是完全处于为自己观点进行辩解的地位。他反击那些说他是城市知识分子带有高岗气味的影射。他反驳道：毛自己是个城市知识分子，卡斯特罗和当时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的领导人本·贝拉也是。甚至与会者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要维护自己对领导权的继承地位的：

一旦毛主席有别的事情要做或生了病，中央决定由我代理他的职务。我也相信我能代替他。我看不出有什么使我不能象其他人一样胜任他的工作的理由。到这种时候，我是不会推让的。<sup>②6</sup>

242

刘的讲话可能没有使与会者信服，幸亏毛泽东、林彪是站在他的一边。当时主要问题不是刘的升迁，而是彭的罢黜。在这个圈子里，林彪得起到毛的副手的作用，在解放军中挥舞大棒，以体现他职务的晋升。在9月1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sup>②7</sup>，林彪坚决支持毛对彭德怀的强硬处理：

我们共产党人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通过斗争解决矛盾，坚持斗争哲学是我们党具有朝气和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sup>②8</sup>

林彪谴责彭德怀犯了5次路线错误。在个人野心的驱使下，左右摇摆，倒向右的一边。林彪当面对彭德怀告诫说：“你必须下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样做对你本人对党都是有好处的，这使你有可能改正错误。”林彪提出采取这种严厉措施的一个理由是：如果彭的右倾机会主义不被粉碎，毛泽东一旦逝世，“那么准会出现更大的问题”<sup>②9</sup>。这个含糊不清的论点显然在庐山会议上很有影响。这似乎是说，如果不让彭德怀下台，那他就可能成为最高领导的严重挑战者，至少是反对刘少奇的核心人物。……

鉴于军队干部对庐山会议的决议缺乏热情，毫不奇怪，毛泽东和林彪感到不仅要用军队系统以外的人来取代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指控为彭德怀的主要同谋），而且要罢免与原国防部长（彭德怀）有联系的一些将军，这些人对新任国防部长的忠诚颇成问题。<sup>③0</sup>

新任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有许多有利条件，他与彭德怀的关系不明显，虽说在战争年代他们共过事，但罗瑞卿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批评过彭<sup>②</sup>。多年以来，罗瑞卿在工作中与毛泽东联系紧密<sup>③</sup>。在战争年代，罗瑞卿曾任野战军的政委，但1949年他就任公安部长时形成了不同的机构。他还兼任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的司令员和政委，……最后，他的经历使他具备条件，成为加强军队政治教育和政治控制的理想人物，彭过去一向重视军队的专业化。<sup>④</sup>

军队的另一些高级领导人也有变动，如洪学智、李达、肖克、邓华等将军。洪学智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朝鲜战争中在彭的麾下干了同样的工作，在黄克诚(兼)任总后勤部部长时，他任副部长，洪学智10月14日被解职<sup>⑤</sup>。两位国防部副部长李达将军和肖克将军被调到无足轻重的岗位。李达将军调到他的老司令员贺龙元帅手下任国家体委副主任。肖克在他长征时的老战友王震手下任农垦部副部长。李达将军在朝鲜战争期间曾一度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的参谋长。肖克将军受到冷遇可能因为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训部部长，是彭使军队专业化的主要执行人之一<sup>⑥</sup>。邓华将军是沈阳军区司令员，在朝鲜战争中是彭德怀两个副司令员之一，他被调到四川，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职务<sup>⑦</sup>。有讽刺意味的是，邓、洪及肖诸位将军都和林彪共过事，彭德怀在朝鲜指挥的志愿军的邓、洪主力部队，原来是属于第四野战军的。

看来这些职务的继承者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1959年任命了4名新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是朝鲜战争时的另一位副司令员，他的被提升是为了平息参加这场战争的老将由于彭和邓华被罢免而流露的不满情绪。刘亚楼已经是空军司令员，从20年代起他就是林彪的亲密助手，后来林彪的儿子在空军能获得很高职务也决非偶然之事(译按：此说有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进入空军时，

244 刘亚楼已经逝世)。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虽然是林彪的湖北同乡(译按:许世友系河南新县人),但与林彪没有明显的联系。第四位副部长粟裕在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之前是总参谋长,后来被黄克诚取代,恢复他的地位,目的在于暗示他上次被降职是彭德怀和黄克诚搞的阴谋,以博取这位有才能的军事要员的感恩之情。新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经历鲜为人知,但早年似在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工作过。新任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也是湖北人,但他与林彪没有紧密的联系。<sup>②9</sup>

陈赓和刘亚楼分别在1961年和1965年去世,但是另外3位——陈锡联、邱会作和许世友都在1969年党的九大上崛起,进入政治局。邱会作在1971年随林彪一起倒台。陈锡联在1980年倒台。许世友在此书写作时,依然是政治局委员。粟裕尽管获得了新的头衔,但在60年代早期并不大活跃,这大概是他为什么能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一个受尊敬的军队领导人和中央委员幸存下来的原因。

彭德怀攻击大跃进,就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机会实现他经过长期考虑的计划——把负责军队事务的权力交给林彪<sup>③0</sup>。同时,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运动,加上关于“军事俱乐部”的谣传,也为林彪按照自己的意图改组军队高级领导层提供了理由。另外,庐山上彭德怀的发难和毛泽东的反击为林彪提供了掩人耳目的背景,使他取代彭德怀的事情显得比较自然,因而在他的同僚中没有引起憎恨。

#### 第十四节 新上台的国防部长

在顺利进行的交接中,最重要的是林彪新出任国防部长。……林彪本来是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军队中出现的真正英雄,共产党军队中最伟大的战术天才。他出生于中国

245

中部湖北省的一个小地主家庭，比许多老资格的同僚受过更多的教育。1925年，在反帝斗争的激情中，林彪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通过这个台阶，随即又进入广州市近郊的黄埔军校，这是一个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支持下蒋介石训练军官的场所。军官将派到军队中去，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从事统一大部分中国的大业。林彪20岁时，在蒋介石的北伐军中任连长。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林彪是朱德的部下，他们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林彪很快成为毛泽东十分信任的人。<sup>②9</sup>

林彪在世时，西方研究林彪的专家把他描绘为：

平静、隐晦、寡言、冷峻、克制、审慎、机敏；自我控制力很差，在有压力时，常常深夜失眠，他很善于间接地从书本上、直接地从经验中和从自己和他人的失误中学习。他喜欢埋头于自己的工作细节之中。凡事一经开始，便要坚持做完。同时，他显然不是一个喜欢周围的人公开宣扬奉承的“头面人物”，他甘愿身居幕后，愿意在幕后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电话和手令传递自己的指示，把干部叫到自己家中，而不去出席会议。<sup>③0</sup>

毫无疑问，长期身体不好是林彪不大抛头露面的另外一个原因。条件艰苦的长征损害了他的健康。1938年春，在山西打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之后几个月，他就负了伤，离开了前线。虽然据说在同年晚些时候他身体已经复原，但他还是前往莫斯科去治疗，在苏联呆了3年。1942年回国后，他仅从事军事训练工作，和周恩来一起与国民党打交道。但当内战开始时，林彪再次出征，指挥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路打到中国的最南端。实际上林彪虚弱的身体很难应付紧张的军务，1950年，他没有随他的部队一起去朝鲜。到1951年年底，他的身体再度变糟，据说患了肺结核和溃疡。

246

感到自己不能真正地控制军队。可能事情的确如此。据说，彭德怀要求解散中央军委<sup>②</sup>。随着林彪取代彭德怀，毛泽东事实上感到他又掌握了军权。

## 第十五节 再度发动跃进

彭德怀的失势和军队领导层的改组并没有解决大跃进带来的经济问题——正是这种跃进使元帅愤怒地进了一言，恰恰相反，经济的进一步恶化是这次清洗的直接原因。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这时不是继续紧缩计划，而是认为必须重申1958年政策的正确性，以证明对持不同意见者实行纪律处置的合理性。尽管政府公开承认，在这些政策下，大大地夸大了统计数字，但还是要坚持执行这些政策。八中全会决议降低的生产指标计有：1958年粮食产量的数字从37500万吨减少到25000万吨；棉花从335万吨减少到210万吨；钢铁从1108万吨减少到800万吨（估计有308万吨是小土炉炼制的质量低劣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被迫相应地降低1959年的指标：粮食产量从52500万吨减至27500万吨；棉花从500万吨减至231万吨；钢铁从1800万吨减至1200万吨。<sup>③</sup>

大幅度地压缩统计数字引起了新闻界要求以更大的步伐跃进的呼声，这样，使用1958年的老办法也就不可避免<sup>④</sup>。虽然庐山会议作出决议，要扭转过激的偏向，但庐山发动的大规模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干部心有余悸，不敢贯彻那个决议的精神。

新的跃进是毛自己在庐山发动的，在一个关于湖南恢复公共食堂的批语中他写道：

不应该在困难面前低头，象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新鲜事物是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



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sup>⑩</sup>

几天以后，在另一个文件的批示中，毛把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恺帆曾命令解散无为县的公共食堂<sup>⑪</sup>。在又一个批示中，他赞扬了辽宁省迅速采取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要其它省向辽宁学习<sup>⑫</sup>。在会议结束之前，他指示印发一本名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册子。在前言中他写道：“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着重号是我加的）<sup>⑬</sup>遵照毛的指示，在以后数周内，从省到县开始了紧张的清查工作，很多右倾机会主义的高级干部被揭露出来。<sup>⑭</sup>

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批判右倾思想的社论，其中引用了一段毛泽东1955年的文章<sup>⑮</sup>。随后，公开的猛烈批判就从这个比较低的调子上开始了。以后几天报纸发表了专题社论，指出：如果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就不可能唤起群众战胜自然灾害和夺取丰收的热情。

还有少数干部在克服了主观主义的毛病和强迫命令的作风以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于在大跃进中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组织领导生产运动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增产技术措施，也不去积极推行，放松了领导。<sup>⑯</sup>

在这一阶段，报纸告诫干部要记住毛泽东1955年的文章，充分认识一个新的经济高潮正在兴起<sup>⑰</sup>。直到8月26日，当《人民日报》刊登了庐山会议决议和对周恩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报告报道后，中国老百姓方才知晓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至少这



给当时的党员一个信号：右倾机会主义不单是一个泄气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sup>②</sup>。当然这也意味着，如对强制性的生产命令不作出反应，将严重威胁干部的政治前途。9月17日，单从公布彭德怀及其同僚被解职的消息，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至于公开批判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当时是没有必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进行。

下一步，反击右倾的内容是重申大跃进的主要特点。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公社万岁》的长篇社论。这就公开表明：认为人民公社这个组织形式有毛病的人是要倒楣的：

任凭国内外敌对势力怎样咒骂和破坏，任凭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怎样指责和反对，任凭严重的自然灾害怎样袭击，人民公社都没有垮台，我们因此也有权利说，它将永不会垮台。<sup>③</sup>

3天以后，报纸转向为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唱赞歌。《人民日报》富有诗意地写道：“现在祖国大地布满了各式各样的钢铁厂，铁水奔流，钢花四溅”<sup>④</sup>。9月中旬，这家报纸又反击那种认为大跃进破坏了经济平衡的“荒谬论点”，随后赞扬公共食堂前途无量——这种食堂是彭德怀严厉批评过的。<sup>⑤</sup>

但是在连篇累牍的渲染背后，也承认了一些实际情况。庐山会议决议承认，农村的大炼钢铁运动妨碍了粮食增产。决议还认识到，在欠收年景，不能再从农业方面调出大批劳动力；决议建议，土法生产钢铁的问题以后由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决定，产品留在原地使用，不列入国家计划<sup>⑥</sup>。陈云的工作没有完全白费。

中国领导人撰写的纪念1959年建国10周年的文章，使报刊上赞美诗式的合唱达到了高潮，增强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力量。

当大多数高级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对此问题多少抱超脱态度时<sup>②</sup>，两个兼有省一级党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身份的人加入了捍卫群众性的工业运动和公社化运动的行列。曾提出群众炼钢运动的设想，受到毛泽东称道的上海市领导人柯庆施，驳斥了那种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办工业的“谬论”，说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无视人民群众在建设事业中的热情和首创精神。他还郑重地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实质上是反对党的总路线，因为党的总路线的出发点就是依靠人民的无穷力量。<sup>③</sup>

曾在庐山会议上批评过彭德怀的四川省领导人李井泉更是坚决地捍卫人民公社，他说：右倾机会主义者断言人民公社办早了，这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违背了事实；<sup>④</sup>解散公社食堂是“绝对错误的”。<sup>⑤</sup> 根据1958年北戴河会议做出的决定：

我们完全有根据地设想，在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大部分地区的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可能办到的。在这个任务实现以后，人民公社将进一步担当起由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sup>⑥</sup>

这一号召的结果是：春天退给农民使用的土地，秋天又收归集体所有了。

在柯庆施之后，广东省第一书记陶铸也为大跃进再度鼓气，以激发干部和农民因疲劳而失去了的积极性。陶铸说：虽然是不流血的斗争，但在这个时期也要发扬革命精神，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场更深刻、更广泛、更持久的斗争。与之相反，革命意志动摇就会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心。他嘲笑那些“稳健路线”的拥护者经受不住任何压力：他们在革命群众运动面前指

手划脚，不允许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一点差错；他们有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但不准备付出一点代价；一旦遇到某些困难，他们就长叹一声，裹足不前；在暂时缺猪肉和肥皂时，他们就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陶铸的文章以激励的笔调结尾：

我们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一定要有象岩石一样的坚定。想想那海岸边的岩石吧！你看它们，有的矗立着，有的蹲伏着，有的指向青天，有的面对大海……它们曾经经历过多少次狂风暴雨的侵袭，它们曾经忍受了多少遍惊涛骇浪的冲击啊……但是它们屹然不动。当风雨过后，当浪涛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海边，指向青天，面对大海……我们应该学习岩石的坚定。<sup>⑩</sup>

党经受住了天灾人祸。大跃进恢复了，问题越来越多，结果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 注释：

1. 《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41页。关于毛泽东到达时间的报道有许多差异，这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它反映了官方机构对于这个节日细节纪录的粗枝大叶。一些红卫兵和安排毛在湖南各种参观活动的接待人员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达时间是下午5点44分。但是，在采访毛泽东故乡韶山纪念馆全体人员的报道中，毛到达的时间是下午4点，见《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266页。后一篇报道文章准备在《韶山红日照千秋》上发表的时候，编辑一定注意到了这个差误，就把时间改成“5点以后”（第266页）。还有一篇文章，把到达时间更富有诗意地说成是黄昏，见《难忘的记忆》第5页。所有关于访问的报道都带有敬意，这可能是所要表达的正常感情。
2. 在长沙，毛泽东在湖南省游泳队员的陪同下游湘江（《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46页、264—265页），并且视察了一个学校（同上，第261—263页）。

- 这本书还包括了关于毛的汽车司机对访问的简要印象的记载(第287—289页)。
3. 《难忘的记忆》，第5页。对罗瑞卿的回忆指出，他作为公安部部长，把保证毛的安全当作自己的职责，参见《深切怀念罗瑞卿同志》第205页。罗瑞卿曾对他与毛的关系有足够的信心，以致他在公安学院对学生说，他们能够怀疑任何人讲的话，甚至毛泽东的话也不例外。参见《罗瑞卿罪该万死》，载《井冈山》和《广东文艺战报》1967年9月5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46号，第2页。
  4. 《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42页。关于这样一次重要的访问，不寻常的是，没有出现毛泽东当时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的报道，尽管1958年12月周曾陪同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湖南视察(参见《横刀立马彭将军》)。周可能和毛在一起，但是，当《韶山红日照千秋》1978年出版的时候，周的平反还不象罗瑞卿的那样有保证。如果周由于有正当的但又难于解释的理由不能陪同毛，那么，在毛的陪同人员中有湖北第一书记王任重就容易理解了，参见《逮捕政治扒手王任重》，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9号，第1—2页。
  5. 当时，周立波的报告文学没有公开发表，估计是因为此后不久毛泽东和彭德怀在现场估计湖南实际情况时的对立观点，给主席重返韶山老家之行带来紧张而不是欢乐的气氛，当周立波的报告文学在1966年最后公开发表的时候，他已开始陷入困境，一方面是因为他提到了毛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从而冒犯了当时的夫人江青，另一方面是因为罗瑞卿当时也受到清洗。见《难忘的记忆》第1—4页。
  6. 《难忘的记忆》，第5页。
  7. 《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41页。毛的汽车司机表示，在同一个晚上，毛还参观了一个学校(同上，第287页)。但这个回忆与另一些报道的矛盾在于，那些报道没有提及25号晚上毛做了什么事。
  8. 9. 10. 同上，第247页；第244—245页；第242页。
  11. 《我们在毛主席身边》第200—201页。
  12. 《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42页。这五种作风是：共产作风；自以为是的作风；盲目作风；命令主义和特权作风(同上)。
  13. 见《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第141页。

14. 根据周立波的记事(《难忘的记忆》第6页),毛的父母死于同一年,分别是53岁和49岁。但另一篇有关这次回乡的报道却说他们享年52岁和50岁(《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265页)。
15. 关于刘少奇,参见《怀念刘少奇同志》第343、358页。关于周恩来,参见《我们永远怀念周恩来总理》第20页、164—165页;《周总理的故事》第138页。关于彭德怀,参见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49页。1956年的党章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并未对群众中对毛的迷信产生多大影响。
16. 《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70页;《难忘的记忆》第10—11页。
17. 《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70—271页。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差异,出现于一次理应细心报道的访问中,周立波说在吃中饭以前,毛参观了水库,见《难忘的记忆》第11页。
18. 这似乎曾经是毛的路线,见《难忘的记忆》第11页。
19. 同上;《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72—273页。
20. 21. 22. 《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43页;第274—275页;第243页。
23. 《回到韶山》,根据陈志让:《毛和中国革命》第350页。这次参观访问以后,鉴于毛离开韶山后取得的巨大成就,王任重还写了一首诗暗示他不赞成在访问中的伤感气氛,参见《逮捕政治扒手王任重》,载《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选)29号,第2页。
24. 《难忘的记忆》第9—10页。虽然,毛去看双亲的墓,最有可能的时间似乎是6月27日晨,但也可能是26日,因为这个资料表明,他从墓边到了学校。但是,周立波还说毛在韶山呆了两天而不是一个晚上(同上,第11页),这可能就是他的报道引起混乱的原因。另外两篇较为详细的报道一致认为,6月25日和26日,毛在韶山(《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42—243页、275页)。但由于毛的汽车司机断言毛在6月28日才离开韶山,带来了新的混乱(同上,第288页)!在这样主要的事件上人们又一次被报道中的矛盾弄得莫名其妙。毛泽东拜谒父母坟地的日期是复杂的,因为关于毛回韶山的两篇最好的资料之一没有提到这件事,另一篇也只笼统含糊地提了一下(同上,第273页)。
25. 《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73—274页;《难忘的记忆》,第11页。
26. 《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43—244页、288页。
27. 陈志让:《毛和中国革命》,第351页。

28. 罗斯·门罗《庐山：中国诗人和政治家的平静撤退》，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国际版周刊1977年8月1日。
29. 李锐：《怀念田家英》，载《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4号，第172—173页。田是毛多年的主要私人秘书；李锐曾撰写关于毛早年生活的书（《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是田的助手之一（译按：李锐并不是田家英的助手）。
30.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82页。
31. 同上，第184页。
32. 参见本书第1卷，第86—91页。
33. 34.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82—183页，第183页。
35. 《财贸红旗》1967年2月15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77号，第9页。
36. 李锐：《怀念田家英》，载《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4号第172—173页。
37.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82页。
38. 参见李富春80诞辰的纪念文章：《李富春同志对经济计划工作的巨大贡献》，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22日。
39. 参见本书第1卷，第146—148页。其中提到了毛的大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情况。更详细的报道，见秦成林（音）：《毛岸英》第148—157页。其中披露，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后，没人敢告诉主席，直到两个月后彭德怀回国向他汇报战况时才提到这件事。据报，彭当时说：“我们没有照顾好他”（第156页）。但是，自然没有提到毛是否为这件事责备了彭。关于毛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所生的3个儿子的悲惨命运，参见《难忘的记忆》第124页。关于20年代和30年代毛和彭之间存在的问题的讨论，参见约翰·E·鲁《处在反对派地位的毛泽东，1927—1935》第115页、205页；本杰明·I·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第173—174页、176页。
40. 这是彭30年代的副手之一龚楚的看法，参见《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1页。关于在朝鲜战争的艰苦时期彭体格的健壮，参见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14—15页。
41. 《横刀立马彭将军》，第20—21页、53—54页、69页以下。
42. 参见彭的自传片断，载《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3号，第72页；另

见《横刀立马彭将军》第6页。

43. 科林和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 1921—1965》, 第728页。
44. 关于龚楚对于彭德怀军事才能的评价, 见《彭德怀案件, 1959—1968》第2页。中国的共产党人通常把刘伯承元帅看作最伟大的战略家, 把林彪元帅看作最伟大的战术家。关于彭不畏炮火的例子, 见《横刀立马彭将军》第13—14页。毛写给彭的诗, 见同上, 第13页。根据这篇文章, 彭把“唯我彭大将军”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关于这首诗的大概日期, 见《彭德怀案件, 1959—1968》第13页。关于毛对彭军事才能的赞扬和批评, 参见《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2卷, 第341页、345页。
45.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 第49—51页。
46. 《横刀立马彭将军》, 第19页。在彭德怀生命的最后两个月, 从长时间的昏迷中清醒的时候, 他又一次暗示了他骂人的习惯。见陈云浩:《彭总的临终遗言》, 载《新华文摘》1981年1号, 第169页。
47. 《横刀立马彭将军》, 第17—18页。
48.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 第81页。
49. 《横刀立马彭将军》, 第148页。这是一个奇怪的令人难忘报道(第148—152页), 该书出版于1979年12月。没有迹象表明, (到那时为止,) 彭对于看到的东两, 心中产生了不安情绪。这是他的警卫员在回忆中提出来的。
50. 《在彭总身边》, 第69页。
51. 52. 53. 同上, 第69—70页; 第70—71页; 第71页。
54. 《彭德怀自述》, 第265页。彭德怀表示, 他只参加了两次郑州会议中的一次。由于他谈论那次会议的召开是在谈论武昌中央会议和中央全会之前, 因此, 我估计他参加的是第一次郑州会议; 当时, 的确开始批评“共产风”。彭只出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最后一天(11月10日)的会, 可能因为他在甘肃出差。

文化大革命期间, 在囚禁状态下的一份交待中, 彭说:“在去郑州的火车上, 我们开了一个反对‘共产风’的会”(《彭德怀案件, 1959—1968》第120页), 这就是说, 在甘肃之行的基础上, 元帅曾召开了一个他的全体随员参加的会议。这个情况可能属实, 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 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篡改了彭的交待, 他原来说的是在从郑州出来的火



车上由毛泽东召集了会议。

根据利伯瑟：《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4年》（第125—126页），武昌中央会议和中央全会从1958年11月21日到12月10日召开，而11月21日至24日和12月1日到6日，彭在北京。另请参见《彭大将军回故乡》，载《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4号，第144页。

55. 《彭大将军回故乡》，见《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4号，第144页。
56. 同上；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2页。
57. 58. 《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4号，第245页。
59. 60. 61.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2页；第73页；第72页。
62. 63. 《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4号，第145页。
64.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3页。
65. 66. 67. 68. 《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4号第145页；第144页；第145页；第144页。
69. 同上。在两篇关于彭访问敬老院的报道中，没有大的矛盾，但语气十分有趣地不同。彭的警卫员把农民描绘为亲切而迷惑的样子；《中国青年》的记者（他的报道在《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4号上转载）则把他们的表情描述为愤怒而坦率。
70. 71. 72. 73. 《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4号，第145页；第146页；第145页；第146页。
74. 同上；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4页。
75. 《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4号，第145页；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3页、74页。
76. 《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4号，第146页。
77. 《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120页。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人们看到彭在北京许多正式场合出现，这些活动即便不能使他完全不到会，他也只能参加几天的会议。
78. 《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266—267页；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5页；《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38页。彭企图劝总参谋长黄克诚代他出席会议，但没有成功。
79. 参见《1959年匪区自然灾害情况调查》，第7—8页。
80. 同上，第9—14页。关于官方对广东水灾的报道，包括省委第一书记

陶铸对水灾的估计，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6月21日、23日、25日和27日以及7月1日。关于陶铸当时糟糕的身体状况，参见赵紫阳《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载《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4号第58页。

81. 参见例如《人民日报》1959年6月12日和27日的有关报道。
82. 同上，1959年7月7日社论。
83. 《1959年匪区自然灾害情况调查》，第4—7页。
84. 当60年代一些秘密的军事刊物流传到西方时，这个情况才被透露出来。参见陈吉士：《中国红军的政治斗争》，第15—19页、209页、213页。
85. 《彭德怀自述》，第266—267页；《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37页。
86. 参见沃克：《中国的饥饿》，第19页、35页。
87. 同上，第28页、41页。这些数字非常低，几乎是不可相信的。也许写信的人夸大了他们遭受的困苦，以便获得同情。
88. 同上，第26页、39页。一位城市居民来信谈到每月定量为12斤，同上，第21页。
89. 同上，第26页、28页、29页。
91. 庐山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发动人们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作深入的分析。参见泰韦斯：《中国政治及清洗》，第9章；乔菲：《两次全会之间：中国领导层的内部斗争，1952—1962年》，第8—22页；张旭成：《中国的政权和政策》，第110—119页；安炳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第38—44页；穆迪：《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政策》，第139—146页。
92. 《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4页。
93. 同上，第2页。这句话似乎是对本书本卷第197页所引对敬老院居民情况的追述的呼应，对彭德怀警卫员回忆的准确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94. 同上，第394页。
95. 同上，第2页、3页、4页。
96. 同上，第1页、2页、3页、5页。
97. 同上，第2页。
98. 同上，第2—3页。
99. 同上，第1页。毛比彭德怀更多地视察了全国的乡村，这一点值得注意。主席也许认为元勋的评论是以一种表面肤浅的了解作基础的。但话又

说回来，乡村里没人在同毛谈话时能象跟其他任何领导人谈话那样直言不讳。参见麦克法夸尔：《百花齐放运动和中国知识分子》一书第108页所引一位中国人的话。那位中国人认为毛进行的实地调查是没有用处的。

100.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44—45页。

101.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5—76页。

102. 《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36页；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267—268页。

103. 张闻天曾经翻译过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写的著作。他早年是郭沫若的朋友。郭沫若是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界的泰斗。参见：科林和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第61—67页。

104. 这一概述的许多资料出自科林和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和《怀念张闻天同志》第32—34页、104—106页，但许多解释是我自己作出的。我在本书第1卷第140页里指出，毛在遵义会议上得到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译按：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没有就任这一职务），但这后一则资料表明，他的地位没有那么早就正式确定。

105. 《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420页；《怀念张闻天同志》，第106—108页。泰韦斯指出，在“华沙条约”准备缔结的过程中，彭、张两人曾合作过（《中国政治及清洗》，第389页）。

106. 张于4月23日飞往莫斯科（《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001号，第43页）。彭于4月24日飞抵莫斯科（《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002号，第35页）。两人在4月24日晚继续飞向华沙（《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002号，第35页；2004号，第40页），我认为他们一定是乘坐同一架飞机。中国驻波兰大使4月27日为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设宴，彭是宴会的上宾。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参加华沙条约国外交部部长会议的代表，张闻天作为观察员也在场（《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004号，第39页）。第二天晚上，彭作为客人参加波兰为华沙条约外交部部长举行的宴会（《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005号，第48页）。但是，两人不可能有许多其他机会在波兰首都见面，因为彭4月25日至27日访问了什切青、格丁尼亚和格但斯克，又于4月29日上午离开波兰去东德访问（《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005号，第42页）。

- 107.《彭德怀案件, 1959—1968》, 第420页。
108. 张闻天与留苏集团中地位最高者王明的最后分裂, 据毛泽东说, 似乎是在七大上。但在庐山会议上, 这位主席指责张在七大时没有真正地转变立场。参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62页, 毛在这里用张以前一度使用的别名洛甫称呼他。
- 109.《彭德怀案件, 1959—1968》, 第36页。在往后几年里, 彭承认自己的记忆力衰退, 对他与张闻天的关系作了更温和、更慎重的叙述, 参见《彭德怀案件, 1959—1968》, 第268—269页。
110.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 第75页。
111. 参见《吴晗和〈海瑞罢官〉》, 第2页、137页。豪瓦德·J·威克斯勒用“不屈的道德家和无畏的谏诤者”来形容魏征(参见《剑桥中国史》第3卷第3部分, 第197页), 这个形容也非常适用于海瑞。上海工作会议的准确日期尚不清楚, 但现在听说会议从1959年3月25日一直开到4月4日, 参见《彭德怀案件, 1959—1968》第300页。
- 112.《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 第176页。
113. 同上。关于岳飞的简述, 参见贺凯:《中华帝国的过去》第276—277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毛死后, 岳飞这一榜样被用来反对毛。1980年9月11日, 一位作者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一篇文章, 明显针对这位已故的主席。作者提出, 杀害岳飞的真正凶手, 是中国历史学家一般痛骂的官吏(秦桧)的幕后人, 也就是当时的皇帝赵构。“过去, 我没有认识到为什么秦桧敢于以莫须有罪名杀害象岳飞这样的高级将领。后来, 我认识到, 秦桧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 正是由于得到了赵构的支持。”换句话说, 在林彪和“四人帮”背后, 站着毛主席。岳飞可以代表任何文化大革命的牺牲者。但由于岳飞是一位将军, 也许这篇文章的作者想为之说话的人的就是彭德怀, 尽管“四人帮”与他的免职毫无关系。但不管作者指的是谁, 他在文章的结尾给人们这样一个清晰的提示——应该公开地讲毛的责任:“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 不应当有什么忌讳。我们必须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告诉学生和青年说, 赵构和秦桧都是杀害岳飞的凶手。我们必须让赵构跪在岳飞墓前。”(参见吴兆(音):《我们应当也让赵构跪下》, 译载于《国外广播新闻——中国——80——195》第9—10页。

114. 参见《北京新文艺》1967年6月8日，第2页第1栏。关于周扬在上海推动学习海瑞活动的话，参见《红色批判者》1967年5月24日第4页第4栏。关于这个剧的3位作者，参见托马斯·S·费舍尔：《〈好戏一曲〉：再论吴晗和海瑞》第29—30页（这篇论文，于1974年12月1日提交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加利福尼亚地区研讨班。关于周信芳的详细介绍，参见香港联合研究院编《共产党中国名人录》第1卷第166—167页。根据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说法，《海瑞上疏》的主要作者是徐叔文（音），参见《深入批判〈海瑞罢官〉和〈谢瑶环〉》，载《戏曲报》1966年3月10日，转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528号，第49页。费舍尔认为（见《〈好戏一曲〉：再论吴晗和海瑞》），第三位作者是陶雄（音），他是上海京剧院的负责人（见香港联合研究院《共产党中国名人录》第2卷第606页）。

贺凯在追述历史上海瑞上疏的情况时，作了如下说明：“在一次朝贺明世宗（嘉靖，1521—1567年）的场合里，海瑞来到皇宫门口，递上一个指责嘉靖皇帝一些不良行为的奏折。皇帝勃然大怒，命令海瑞不得离去。太监对皇帝说，‘不用担心，陛下，他已经跟他家人诀过别了，随身带来了他的棺材，等在门口！’世宗听后大吃一惊，宽恕了海瑞的犯上行为。”（《中华帝国的过去》，第306页）。关于海瑞生平的完整叙述，参看傅路特、房兆楹：《明史人物传记辞典》（1368—1644年）第1卷第474—479页有关词条。关于另一个有趣的叙述，参见黄仁安：《1587年：没有功绩的一年》中有关海瑞在湖安（音）的章节。

115. 托马斯·S·费舍尔：《〈好戏一曲〉：再论吴晗和海瑞》，第28页。

116. 《吴晗和〈海瑞罢官〉》，第2页。

117. 对吴晗经历的叙述，主要参考包华德：《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第3册第425—430页吴晗传记部分；另请参看普西：《吴晗：借古讽今》第1—7页。我用“槐树”来代替“栎树”，作为更正确的翻译。

118. 关于统一战线的解释，参见莱曼·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共历史上的统一战线》；另参见本书第1卷第48—50页。

119. 托马斯·S·费舍尔：《〈好戏一曲〉：再论吴晗和海瑞》，第9—10页。根据包华德：《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第3册第427页的说法，吴晗在1949—1958年间似乎只发表过两篇有新意的历史文章。

参见本书第1卷，第271页—272页、276页、277—278页。普西谈到吴晗在反右运动期间的一篇讲话时认为，这是“一篇我所见过的没有吴晗影子的吴晗作品”（《吴晗：借古讽今》第11页）。关于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期，参见《吴晗和〈海瑞罢官〉》第137页。

121. 有关曹操事迹的简述，参见贺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第132—134页；关于女皇武则天，参见特威切特主编《剑桥中国史》第3卷第1部分第5、6两章。郭沫若率先对这几位历史人物作了重新评价。
122. 托马斯·S·费舍尔：《〈好戏一曲〉：再论吴晗和海瑞》，第18—19页。
123. 普西：《吴晗：借古讽今》，第15—17页。
124. 引自施拉姆《毛泽东的本色，谈话和书信，1956—1971年》第237页。文化大革命中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是强调彭德怀庐山上的行动与吴晗对海瑞的研究之间有阴险的配合，参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3698号，第5页。
125. 《吴晗和〈海瑞罢官〉》，第2、137页。我不认为毛当时鼓励人们仿效海瑞和魏征的情况是在毛死后编造的，以便对吴晗作死后的肯定。在文化大革命的资料《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彭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中，可以得到毛在海瑞事件源起中所起作用的最切近的证据，这份资料译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640号第5页。据这个小册子所载，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曾查阅他在1966年1月对吴晗批判的高潮时写的笔记，并对一个同事说：“1959年举行上海会议时，主席采取了肯定海瑞这个历史人物的态度。”但是，这并不表明毛带头谈论这个话题，小册子编者的话暗示刘仁在说谎（他们可能相信情况就是这样）。
126. 《吴晗和〈海瑞罢官〉》第2页、137页。在上一条注释中引证的文化大革命资料里，还提到“领导同志”鼓励吴晗写海瑞的情况（《中国大陆杂志选》640号第5页），但再次暗示刘仁所说的都是谎话。
127. 当吴晗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彭真无论在首都政府中还是在党的领导机关里，都是他的上级。
128. 参见本书第1卷，第33—35页。
129. 《人民的好总理》第3辑，第5页。关于毛的诗，参见黄曼（音）翻译的《毛泽东诗选》第50—53页。关于总理仔细听取毛的指示的其他情节，在对

周的回忆书籍中。随处可见，参见例如《人民的好总理》第2辑第457—458页。

130. 施拉姆：《毛泽东》，第48页。

131. 参见陈志让：《毛和中国革命》，第359—360页。

13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76—178页。

133. 普西：《吴晗：借古讽今》，第9页。

134. 同上，第15—16页。

135. 文化大革命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彭德怀说，他不得不向海瑞学习。参见穆迪：《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政策》，第143页。但胡乔木实际上没有说过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海瑞名字的人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这样的话。关于胡乔木的作用，参见《北京新文艺》1967年6月8日第2页第1栏。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份资料指出，胡乔木负有鼓励吴晗写作海瑞作品的一系列责任。因此，胡可能就是那位神秘的“领导同志。”但是，那份资料并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准确地说明吴晗的两个最重要的海瑞剧本之一的写作时间（《当代背景》874号第42页）。况且，如果说胡是那位被怀疑的“领导同志”，那么，似乎无法解释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用它更明确地攻击胡的事实，也无法解释文化大革命后的文章没有承认这一情况的事实。关于吴晗文章的完成日期，参见吴晗《灯下集》第168页。关于吴晗的其他作品，参见费舍尔：《〈好戏一曲〉：再论吴晗和海瑞》第19—20页、25—26页。

136. 关于相反的观点，参见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建议和异议》，第33—34页。

137. 费舍尔认为，至少有4部关于海瑞的戏在吴晗的剧本写出之前完成。见费舍尔《〈好戏一曲：再论吴晗和海瑞〉》第29—30页。

138.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5页；《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269—271页。

139. 《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14页、120页。

140. 同上，第36—37页。

141.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6页。

142. 《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7页。

143. 同上。



144. 同上，第8—9页。
145. 同上，第121页。
146. 同上，第9页。
147. 同上，第121页。毛的评论证明，在这个方面，“克里姆林学”是分析中国政治的正当方法，参见本书第1卷“对书目和方法的说明”，以及麦克法夸尔《论照片》。有关彭德怀的否认和他的意见书的最新文本，参见《彭德怀案件，1958—1969》第268页、283页。
148. 《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9—10页。
149. 同上，第10页。
150. 参见《吴冷西的交代》，载《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4期第75—76页，《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267页。
151. 《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11页。
152. 同上，第130—131页。
153. 同上，第11页。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在他对庐山会议的出色分析（笔者相当赞同这种分析）中提示说（《中国政治及清洗》第412页）：彭德怀和与他同一观点的批评者是想让毛泽东同意他们的意见，而不是要发动对他的正面攻击。这当然是彭德怀为自己辩白的最佳理由，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由于毛原已考虑过类似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问题，也已经开始对公社进行深入的改革，又由于陈云已在控制大跃进方面采取了措施，因此，如果为了说服主席而对前18个月的政策进行全面的、根本的批评，就是不必要的举动。
154. 《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11页、400页。
155. 参见吐克主编的《列宁选集》，第559页。
156. 《横刀立马彭将军》，第9—10页。
157. 彭认为，这是使主席特别恼怒的措词之一，见《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121页。
158. 毛的批示的准确文字是：“印发各同志参考”，参见《光辉的历史文献》（1967年9月版）第43页。这个出版物的最后一页以及它的资料（规格），表明了它的半秘密性质。关于彭德怀的交代和红卫兵对他的抨击之间的明显相似，参见《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14页、120—121页；关于彭后来的解释，参见该书第276页。

159. 似乎没什么疑问的是，从彭德怀在八届八中全会讲话的中文本来看，张闻天作了两次讲话。但可以想象，中文本说的其中的一次讲话日期是错误的，事实上他只作了一次讲话，而且彭事先也不知道这篇讲话的内容。然而当他谈到它时，发现它反映了两人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参见《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420—421页。另参见《怀念张闻天同志》第35页、108页。关于周小舟和黄克诚是否讲了话的问题，参见《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269—270页。
160. 按彭的说法，张只送来这次讲话的一个大纲。彭读后就拿回去了。所以，可能只有一份抄本。同上书，第421页。
161. 《文革风云》1967年第10期第12页，1967年第5期第23页。
162. 参见《打倒“三反”分子、大叛徒、工交战线上的大恶霸薄一波》，《东方红》1967年2月15日，转载于《当代背景》878号第7页；《反革命分子薄一波犯下的十大罪行》，《井冈山》1967年1月1日，转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62号第14页。齐卫东：《深挖30年代的经济黑线及其后台老板——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载《卫东》1967年6月15日，转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7号第13页。对薄公平而论，他从7月11日至16日不在北京也许意味着，他在毛发动反击之前返回庐山，并没有时间来完成其发言的初稿，参见利伯瑟《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第141页。
163. 《炮轰李先念》（北京：“红代会”、中央财经学院，1967年4月），第25页、33页。两位学者引证了《中国新闻分析》（香港）761号第4页上的话（多梅斯：《中国的国内政策》第112页；迪特默：《刘少奇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第40页），暗示庐山会议进行了两次表决。这也许是事实——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中共领导集团确实是这样作出决定的——，但《中国新闻分析》引用的红卫兵资料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定这个情况，它仅仅引了李先念的话：“第一天，我同意彭德怀的观点，但第二天我就反对他的观点了。”
164.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33页。
165. 《刘邓是农业战线的修正主义头子》一文中提到毛在上午讲话这一事实，见《科技战报》1967年6月2日第8页第3栏。
166.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27—29页。

167. 同上, 第28页、35页。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的讨论, 参见本书第1卷第4编。关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提议, 参见上书第273页、275—276页。罗隆基的好朋友浦熙修是一位记者, 她象罗一样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攻击。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同她是姐妹。参见上书, 第225页、262—263页。浦熙修被禁止做记者工作, 后来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 1970年60岁时死于癌症(参见辛波:《能干的女将浦熙修》, 载《新华日报》(文摘版)1980年12号第181页。)
168.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 第29—33页。关于毛要求做一个中间派的情况, 参见第37页、38页、39页、40页。
169. 《彭德怀案件, 1959—1968》第3页、8页。
170.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 第33—36页。
171. 《彭德怀案件, 1959—1968》, 第2页。
172.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 第37—38页。
173. 同上, 第41页。
174. 同上, 第39页、41页、42—43页。关于柯庆施在百花齐放时期对毛的支持, 参见本书第1卷第200页、281—282页、290—292页。
175.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 第38页、40页、41页、42页。我认为“农业部的×××”(姓名被红卫兵编者所删去)就是农业部长廖鲁言。至于这一段中被删去的其余两个姓名, 却不那么容易猜测。
176. 同上, 第37页。鉴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由于与彭德怀串通而下台, 毛点出你这个省也许是失言。或许他有理由批评同本身是一个明显的左倾主义者, 却又虚伪地抨击左的倾向。
177. 同上, 第43页。
178. 同上, 第42页。这个翻译说是26000里, 而原始资料却说是25000里。
179. 同上, 第40页; 另参见第33页。
180. 《毛主席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第9页。《中国的法律和政府》对这个重要段落的翻译, 照我的判断来看, 并没有领会原文的要旨。毛是在一个几乎离题的段落里作出这种评论的, 但其旨意是非常清楚的。
181.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 第26页。这段话似乎象是附在彭的意见书后的一般评论。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毛的反击就具有更深

远的意义并广予流传。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彭对这一需加澄清的段落的回忆，参见《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121页。张旭成在《中国的政权和政策》第117页中说，据报道，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高级官员赞同彭的信。这个说法是以两位避难者的报告为根据的。张在惠策恩主编的《70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中他撰写的那一章里说，“人民解放军的“大批军官在支持彭的行动的备忘录上签名”，但没有说明资料来源。

182. 有一个证据表明，从八届八中全会后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重要作用。照片上毛泽东的两侧只有刘和周，而不象一般情况下那样，还有其他政治局常委。虽然陈云和邓少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朱德和林彪元帅却是参加了的。我的假设是，朱受排斥是由于他在全会上维护了彭，但如果通过让林彪登台一起照相的办法来孤立他，又是不明智的，那样会进一步引起朱德的对抗情绪。不过，在看来象是经过充分加工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台下的林彪，而看不到朱德。参见195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以及麦克法夸尔：《论照片》一书。毛在一段讲话中指出，在大跃进期间，周是同他站在一起的。参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38页。毛的这段讲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布出来时，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的名字，特别是受批判的人的名字，显然被抹去了，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编者对毛讲话的内容做的手脚。其中被抹去的一个名字(例如上书第42页)很可能就是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生气地同刘交换意见的情况表明，这位国家主席当时是同党的主席站在一边的，参见本书第九章。

183. 毛在他讲话中，通过强调他用了那么长时间硬着头皮听对他的批评，来证明自己已做到了仁至义尽，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27—28页、33页。关于彭如何解释他没有选择全会作为讲话地点的原因，参见《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275页。

184. 《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19页。

185. 同上，第205页、480页。起作用的字被精心地删除了，但删改过的正文的总的意思还是一清二楚的。毛讲他忍耐了20天(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36页)，这和彭后来说的18天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可能毛是指从彭在西北组第一次发难(7月3日)到毛自己讲话当天(7月23日)这段时间。如果彭的话是准确的，那么他讲这些话一定是在7

月21日。但我们知道，彭没有参加那天的全体会议，因为他没去听张闻天的讲话(参见本书第217页)。因此，我的想法是，在激烈争论的时刻，彭随便地说了一个数字。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时提到，在延安，他曾受到40天的批评，也许当时受批评同他与毛在军事问题上的分歧有关(参见《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33页—34页)。毛后来暗示，那次长时间的批评会议正是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召开的，主要涉及百团大战中彭德怀的行为(参见《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2卷第345页)。

186. 这次工作会议(译按：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的准确日期是7月30日(译按：应为8月1日。)毛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会议很快就要休会”，但又补充说，最好还是开到月底结束(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36页)。毛在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讲话中，对中央工作会议(译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如下追述：“第一，开了9天小会，接着我们召开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同上，第61页，我对译文稍微作了点修改)。这段话提示，小组会也许是在7月2日开始(这天毛泽东发出了会议开始后的第2条指示，见《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82—184页)，直到7月10日中午才结束(10日上午，彭德怀在西北组会议上作了最后一次发言)。7月10日，毛泽东作了一次讲话，可能对他所听到的各小组会议上提出的批评意见做出了初步反应。这个讲话也许是紧接着小组会议召开的大会的开幕词，因而可以假定中央工作会议(译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大会是在10日下午开始的(参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44页)。我认为，大会上的争论是由毛7月23日的讲话结束的。此后，讨论也许集中在解决彭的问题上(即通过什么样的决议来处理他)而非集中在大跃进的有关问题方面。这种讨论为与会者提供了匆忙转而拥护毛泽东的观点的机会。也许毛让他的秘书起草了一篇东西，指控彭德怀过去所犯的错误，政治局常委会议于8月1日批准了这个指控性的文件，见《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广州，1981年)第2册第353页。

187.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7页。

188. 《光辉的历史文献》，第12页。如果将毛在会议开始时宣布的与会人数与会议结束时官方公报所说的人数相比较，就会发现全会结束之前似

- 乎又来了两名中央委员,参见利伯瑟:《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 1949—1975年》第145页。此外,这些资料表明,14或15名非中央委员也列席这次全会。同样清楚的是,一些没有参加前一个会议的中央委员,在全会上出现了,参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61页。
189. 关于彭对浮夸的批评,参见《彭德怀案件, 1959—1968》第10—11页。关于毛的讲话,参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60页。当然,不可能是毛讲话的全文。
190.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60—63页。
191. 同上,第54—55页。
192. 没有证据说明毛致张闻天的信被作为会议文件散发。
193.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47—49页。
194. 关于彭的否认,参见《光辉的历史文献》,第46页。
195.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7页。
196.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268—270页。
197. 有关尼克松的访问和争论,参见尼克松《六个关头》第243—281页中有关内容。关于赫鲁晓夫的访问和辩论。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364—367页。
198. 有关这次访问的宣布——实际可视为互访,但艾森豪威尔的回访根本没有进行——,参见《总统公报》“D·D·艾森豪威尔, 1959年”第560—564页。艾森豪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只是说,他为两国首脑互通信件开了头,导致了赫鲁晓夫的访美。赫鲁晓夫说,邀请信是由苏联第一副总理茨洛夫访美回国时带回来的(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368—369页);库茨洛夫是7月13日离开美国回苏联的(《国家公报》第XL1卷第1049号〈1959年8月3日〉第157—158页)。
199. 尼克松:《六个关头》,第284—287页。
200. 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第134—135页。《人民日报》没有刊登这个攻击性讲话。
201.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52页。
202. 参见本书本卷第132页。
203.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一卷第4期,第53页。
204. 关于王在遵义会议上的举动、毛对此的肯定和王对主席的前妻的安排,



参见王震等《怀念与继承——回忆王稼祥同志》，译载于《国外广播新闻——中国——81—038》第10—11页。（还有一些问题，如，贺子珍当时是否呆在可以称之为精神病院的地方，等等）。是在遵义会议上，王和周恩来一起，成为掌握军队的小组中毛的两名副手（译按：毛、周、王三人军事小组是遵义会议后成立的）。以这个小组为基础，毛挫败了总书记张闻天，最后成为党的主席，这就使后来王被毛疏远变得更令人费解。有关王稼祥生平的其他资料，参见科林和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第895—900页“王稼祥”条。

205. 《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180页。

206. 同上，第39—44页。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发布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这一文本，被正式称为“摘要”。可以想象，还有关于彭与赫鲁晓夫之间联系的内容没有公布。但是，在北京和莫斯科互相敌对的时代里，这样的内容如果有的话，就没有理由不予公布。

207. 例子参见同上书第180页。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党代表大会上，正进行热烈争辩的时候，据说赫鲁晓夫指责中国打发彭德怀去劳动营，因为彭在致苏联共产党的一封信中敢于批评人民公社政策（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09页）。不管关于赫鲁晓夫这个讲话的报道多么准确，那封信如果真有的话，不能想象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对这种行为会不加抨击。也许这位苏联领导人企图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制造混乱，他对出席罗马尼亚代表大会的兄弟党代表说，中国共产党内部有反叛集团，它准备也愿意更合理地与苏联共产党打交道。

208. 《打倒反对毛主席的老手陈云》，载《财贸红旗》1967年2月15日，译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77号第9页。到1959年6月，省级领导人还在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政策。这一政策是陈云的口号，目的是恢复国民经济的平衡和组织状态。参见6月7日李玉文（音）作的吉林省政府工作报告，载《吉林日报》1959年6月10日，译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082号，第32页。

209. 参见广东省“上山下乡青年‘夫妻’战斗队”复制的《邓小平自白书》第4页。我推测，这个事故是在庐山发生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另一则材料说，邓“以腿有病为借口退出了”（《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205页），暗示他参加了工作会议（译按：应为政治局扩大会议），但在全会



- 召开前离开了。关于邓对因贪图同时做好一切事情而引起的问题所表示的理解，参见《进军报》1967年6月14日第2页第3栏。
210. 参见本书第1卷第146—148页和本卷第65页。
211. 根据来自周恩来，参见《美国的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远东：中国》第359页。另参见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68页。
212. 关于朱德和彭德怀之间的关系，参见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66—67页。
213. 《朱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2集（北京：“首都彻底批判朱德联络站”，1967年4月15日）第13页。有关朱对公共食堂的评论，参见《新北大》1967年1月23日第3页第2栏。关于朱认为公社建立太早的说法，参见《东方红》1967年2月11日，转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72号第22页。
214. 参见《揭露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琪（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转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3号第10页。李琪（音）当时是山西省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同上，见第1页）。
215. 由于彭德怀在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的黑名单中占据了极显眼的位置，因此我觉得，不管是谁，只要他对彭在庐山会议上的举动说过略表同情的话，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就会揪住他不放。我发现朱德是唯一真正为彭辩护的人。没去庐山开会的外交部长陈毅，是彭德怀回到北京后的第一位登门拜访者。但是，他似乎不赞成彭蛮干，并劝他将来讲话时要缓和一些。参见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67—68页。
216. 除了毛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和他给张闻天的信外，还有陈毅对毛的脾气的评论有助于说明问题，参见《文革风云》1967年第9期第28页，和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第84页。
217. 对中国来说，这并非特别的问题。我的妻子爱米莉·麦克法夸尔曾经问英迪拉·甘地夫人的国大党的一位成员（有独立立场的印度政治家）：他当时为什么不批评英·甘地夫人的紧急法案？他带着毫无戒备的坦率态度回答说，“就我来说，是因为害怕！”
218. 即使农民非常紧张，不敢对刘讲事实，刘也可以通过他家的服务人员了解实情。例如，他的孩子们的一个保姆1959年夏天从家乡返回时，对他的妻子王光美讲了农村粮食短缺的问题和其他一些疾苦情况。参见《红旗飘飘》第20辑，第280—281页。

视为毛的个人副手和一名老资格的同事。例如，在庐山会议期间，他感到必须对保证毛的住所不太热负起个人责任来(《人民的好总理》第396页)。

232. 《人民的好总理》第2辑，第288页。

233.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人在评价庐山会议的重要性时，把它看作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规范的一个逆转点。安子文认为，195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离开了民主集中制(1980年5月8日《人民日报》)。北京市委党校理论调查组认为，庐山会议后中国的政治生活呈现出一种反常状态(《新华文摘》1981年3号第71页第1栏)。至于西方对这一问题的敏锐分析，参见泰韦斯：《中国政治及清洗》第436—440页。

234.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8页。彭德怀的自我批评，见《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31—38页；关于他如何写自我批评，见《彭德怀自述》第276—278。

235. 相比之下，高岗的自杀也许使许多人感到怀疑，但为此担忧的人可能并没有多少。有关高岗事件的讨论，参见泰韦斯：《中国政治及清洗》第166—210页。张闻天的秘书怕他在庐山会议期间服用过量的安眠药，就把药拿开了，见《怀念张闻天同志》第108页。

236.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108页。

237. 中共中央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发表出来，而且只是一个“摘要”。这份决议包含在《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39—44页中。戴维·A·查理斯指出，黄克诚和周小舟曾在一起工作过，那是在50年代初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之时，参见《彭德怀元帅的撤职》，载《中国季刊》1961年10—12月号第69页。

238.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81页。彭的“意见书”的全文和毛对它的评论，见《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87—188页。

239.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81—82页、84页。虽然耽在彭的身边有潜在的政治危险，但彭的警卫员似乎认为在彭身处逆境之时不能抛弃他。他唯一的担心是，会象彭一样必须离开人民解放军，但元帅能够保证他继续在军队工作。关于彭搬家的日期，参见《新华文摘》1981年5号第174—175页。

圆明园曾经是意大利“巴洛克建筑艺术的样品”，是在18世纪由乾

隆皇帝的耶稣会顾问设计的。1860年，英法联军先行抢劫，然后将其焚毁。关于圆明园今天面貌的简介，参见波拿维亚：《中国人》第84页。另参见配文图片“圆明园”，《中国画报》1981年第5期第36—43页。高墙围起来的一个院子以前是圆明园的一部分，可能是吴家花园，彭德怀就被关在那里。

240.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84页、91页。

241. 贺诚：《傅连璋同志——从一个基督教徒到一名卓越的共产主义者》，载1981年3月6日《人民日报》，转载于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77卷968号第15页。英译文提到周恩来“含泪的眼睛”，我想这不是由于他感到喜悦或好笑。

242.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82页、86—90页、91—92页、94—95页。但彭德怀与卫兵保持距离以“避嫌”！见该书第93页。

243. 关于彭较早期的阅读习惯，或者他根本缺少这种习惯的情况，参见《彭德怀档案》，转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7号第22页。更富同情心的一种观点指出，在革命年代里，彭只有片刻闲暇工夫能用来读读小册子，参见《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2页。

244.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106—107页、109页。除了给彭送政府文件外，中共中央还派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作彼此间联络官员，参见《横刀立马彭将军》第71页。1960年5月29日，彭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新华社消息），成为林伯渠治丧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林去世前，是彭在政治局中的同伴。但除此之外，在庐山会议后他完全受到冷落。

245.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86页。

246. 《东方红战报》第80号（1967年6月15日），第6页。（这个材料错误地将会议的年份说成是1957年。）

247. 孙冶方等：《严谨的治学态度》，载《新华月报》1967年8号第18页；《彻底怀疑和打倒重要的反党分子张闻天》，载《进军报》1967年5月31日，转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94号第32页。按照另一种说法，张被指派研究试图把利润作为衡量效益的尺度的苏联经济学家利别尔曼的理论，参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罪行录》，载《东方红报》1967年6月23日第3页第1栏。

248. 《新华月报》1979年5号，第63—64页。

249. 参见《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第17页。另参见《华主席在太阳升起的地方》第73页，和《华主席在湖南》第5页。对这些材料来源进行的比较表明，这时已定出强调华与毛之间联系的标准提法。虽说毛是唯一有权选定继承者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标准提法是一种委托。这些著作发表时，还没有给彭德怀平反。
250. 《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第136—142页，特别是第141页。
251. 关于华国锋早期经历的介绍，参见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和塞重云：《华国锋文化大革命前在湖南的岁月，1949—1966：政治通才的造就》，载《中国季刊》1977年1—3月号第3—51页。关于在中国被加以神化但还有用的对华的经历的介绍，参见本书本卷第249所引证的著作。
252. 军委会议的准确日期难以肯定。彭德怀说会议从8月末持续到9月初，但另一份材料将会期延长到10月。参见《彭德怀自述》第278页；《新华文摘》1981年3号第70页。关于刘少奇的指示，参见《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47页。
253. 《光辉的历史文献》（1967年9月）第22页。这是一篇文章而非讲话的情况已在上引书第47—48页中得到证明。上引书还记录了彭德怀对陈伯达的分析的愤怒反应。关于毛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参见《毛主席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第21页。
254. 参见《光辉的历史文献》（1967年9月）第49—56页中关于彭早期的冒犯行为的说法。关于毛对这些行为的抨击，参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79—80页。
255.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83—84页。
256. 同上，第7—9页。陈伯达以更长的篇幅批评彭德怀1949年以前的观点，参见《光辉的历史文献》（1967年9月）第23—28页。
257.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80—81页。
258. 《光辉的历史文献》（1967年9月）第22—30页。
259.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81—82页。
260. 同上，第82—83页。
261. 同上，第84页。
262.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87页。《彭德怀自述》，第

278—279页。

263. 《彭德怀的一篇札记》，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转载于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第77卷第668号，第6—10页。
264. 关于这个调查委员会，参见《反党篡军分子贺龙的滔天罪行》，载《体育战线》1967年1月28日，转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3912号第12页。有关贺龙不愿批判彭德怀的情况，参见《贺龙档案》，转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7号第27页。
265. 这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参见《二钢红旗》(武汉)第38期(1967年8月22日)。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即1967年夏天，陈将军被卷入“武汉事件”之中，这一事件最后导致了镇压红卫兵的惊人事件。参见菲利普·布利基汉姆：《1967年毛的文化大革命：夺取权力的斗争》，载《中国季刊》1968年4—6月号第24—27页。
266.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82页。
267. 这个说法被许多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所引用，参见例如《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证选编》，转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651号第20页。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只利用了这篇讲话中的几段话，也许是因为讲话的其余部分与红卫兵的观点相抵触。然而，我相信可以推断出刘这个讲话的(真正)意图。
268. 同前一个注释中谈到的情况一样，这个引语也出现在许多地方，如参见《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36页。
269. 引自《刘少奇的反动讲话》，转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5号第21页。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些话是刘少奇8月24日或者更早的时候在庐山主持第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时讲的。
270. 同上，第3页。
271. 本书第1卷，第108页。
272. 例如参见《毛泽东思想照妖镜下的两个赫鲁晓夫》，《斗批改》1967年5月15日，转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2号第18页。这一材料如同登载了这句话的其他材料一样认为，刘的话是8月17日在庐山会议上讲的。由于庐山全会是8月16日结束的，所以人们一定会推想，这是红卫兵编的材料中又一个日期错误的例子。
273. 本书第1卷，第100—104页。

274. 有些红卫兵材料为了明显的政治原因，只引用了刘赞成提高邓小平的威望的话，例如参见《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34页。但至少在一个材料里，周恩来和林彪两人的名字也被提到，参见《新时代的狂人》，译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603号第18页、24页。（在第18页里，林彪和×××被提到了；在第24页里，林彪和周恩来两人的名字都被提到，但没有指明讲话的场合。我推测，第18页中的×××就是周恩来，第24页所没有注明的讲话场合，估计就是这次军委会议。）
275. 《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5号，第4页。
276. 同上，第3页。刘少奇在人民解放军中威信不够高的问题，可从下列情况看出：一个月后，人民解放军一位宣传方面的负责人要求其同事更公开地宣传刘在革命时期的作用，以及他对军事胜利做出的贡献。参见《反革命两面派赵易亚的滔天罪行》，载《新人大》1967年9月21日，译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21号第32页。
277. 关于林彪讲话的时间，参见《中共中央文件》1974年第1号第10页。
278. 《刘少奇在其黑书〈论修养〉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说明》，译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592号第21页。
279. 《林副主席关于彭德怀的谈话（摘要）》，载《革命造反报》1967年11月25日，译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18号第19—20页。
280. 直到1962年才正式撤销黄克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51号第34页；联合研究院《共产党中国名人录》第307页）。1977年8月1日，即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时为黄克诚平了反（见《自由中国周刊》1977年8月8日）。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黄克诚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常务）书记。
281. 参见《罗瑞卿档案》，译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7号第48—49页。
282. 参见本书本卷第187页和《深切怀念罗瑞卿同志》第170—172页、199—201页。
283. 关于罗瑞卿的生平，参见科林和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第642—645页。
284. 参见戴维·A·查理斯：《彭德怀元帅的受贬》，载《中国季刊》1961年10—12月号第73页。
285. 参见上书和科林与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中关



于他们两人的词条，第233—236页、524—526页。

286. 参见科林和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第826—828页。由于彭德怀事件而导致邓华被撤职的情况，只是在后来邓去世之后才得到证实，参见《新华月报》1980年7号第49—50页。
287. 参见科林和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第103—104页（“陈锡联”），113—116页（“陈赓”），359—361页（“许世友”），632页（“刘亚楼”），774—778页（“粟裕”）。以及联合研究院《共产党中国名人录》第1卷第158页（“邱会作”）。
288. 参见本书第1卷第146页—148页和本卷第65页。有人认为（J·D·西蒙：《彭德怀：年表重考》，载《中国季刊》1969年1—3月号第120—138页），在彭德怀出国访问期间，1959年5月和6月上半月已采取步骤使这位国防部部长失去了权力，所以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被贬黜，实际上在会前就是既成事实。（1957年秋朱可夫元帅出国时职务被撤销，与彭德怀的情形类似。）但是，这个观点太看重对人民解放军和安全部门职权移交的时机和动机的猜测。例如，6月中旬被看作邓华被解职的时间，但注释286中引用的新证据说明，他被撤职。是因为出现了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事件，即在庐山会议之后。无疑，毛很长时间以来就打算撤掉彭，所以，总的说来，把庐山会议看作一举完成这个目标的天赐良机，比把它看作为达到这个目标而精心导演的两个月人事变动过程的顶点，似乎更加符合事实。
289. 关于30年代毛的“集团”及其政治意义的概略论述，参见本书第1卷第142—143页。关于林彪生平的一些细节描写，均根据科林和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第559—567页。
290. 罗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2部分（1950—1971年），第148页。
291. 同上，第154—156页；以及科林和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这些材料在林彪是否去过朝鲜的问题上说法不一致。我所请教的中国人说，他没有去过朝鲜。有些中文书籍暗示，朝鲜战争爆发时林彪称病不出，那只是借口而已。参见《横刀立马彭将军》第123页，以及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第77卷第968第16页。
292. 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第77卷第968号，第16页。
293. 《红色宣传兵》1967年5月25日，第3页第4栏。



- 294.《辉煌的10年》，第74页。
- 295.《毛主席语录》，第198—199页。
- 296.本书第1卷，第8页。
- 297.《彭德怀档案》，转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7号第24页。没有证据来支持这个说法，但彭德怀似乎有可能对党指挥枪的原则很不满。据彭的警卫员说，他拜访了许多元帅(见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66—68页)；也许这位国防部长认为他们才是可以与之共商军机大计的更适宜的人物。
- 298.参见《当代背景》589号，第2页、6页。
- 299.参见如《当代背景》588号中的许多地方；《人民日报》1959年8月27日社论，转载于《当代背景》589号第11—15页；《当代背景》590号全部内容。
- 300.《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64—65页。
- 301.同上，第67页。
- 302.同上，第69页。
- 303.同上，第72页。
- 304.同上，第81页。
- 305.《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载《人民日报》1959年8月6日，转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074号第4页。戴维·A·查理斯首先指出反对右倾的逐渐升级的方式，参见《彭德怀元帅的受贬》(《中国季刊》1961年10—12月号第69页)。
- 306.《战胜灾害，力争丰收》，载《人民日报》1959年8月7日，引语转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076号第22页。
- 307.关于1955年背景的讨论，参见本书第1卷第26—27页。
- 308.戴维·A·查理斯：《彭德怀元帅的受贬》(《中国季刊》1961年10—12月号第69—70页)。菲利浦·伯利德哈姆深刻地提示，讲求实际的周发起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评，会大大增强这种批评的影响。
- 309.转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090号，第17页。约尔根·多梅斯认为，庐山会议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开始退却，参见其著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社会政策，1949—1979年》第44—45页。而我相信，公社的退却是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和会后开始的，参见林田：《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的探讨》，载《经济管理》1981年第1期，转载

于《国外广播新闻——中国——81—048》，第 L20—21 页。

310. 《人民日报》社论：《“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引语转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091 号第 1 页。另参见新华社发的吴其康（音）的报道：《中国的小高炉》（1959 年 9 月 4 日），转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094 号第 2 页。
311. 1959 年 9 月 17 日《人民日报》社论：《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译按：原文有误。这不是《人民日报》社论，而是《人民日报》转载的《红旗》1959 年第 18 期的社论），转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105 号第 9—11 页；及 1959 年 9 月 22 日《人民日报》社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转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 2105 号第 12—17 页。
312. 《当代背景》589 号，第 2 页。
313. 参见《辉煌的 10 年》第 1—66 页、90—104 页。
314. 同上，第 192—193 页。
315. 同上，第 217 页。关于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参见《猛烈批判四川的“赫鲁晓夫”》（贵阳地区服务站，1967 年 6 月 17 日），转载于《国外广播新闻》（1967 年 6 月 20 日）；《綦江地区形势》，第 ddd17 页。
316. 《辉煌的 10 年》第 223 页。
317. 同上，第 237 页。
318. 陶铸论革命坚定性的文章最早发表在广东的一个杂志上，（译按：在《上游》1959 年第 16 期上刊登），1959 年 9 月 2 日的《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这篇文章的英译文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103 号，第 1—4 页。8 年后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姚文元将此文抨击为反革命文章！参见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1967 年 11 月《中国建设》（增刊）第 12 页。有关自留地重新归集体所有的例子，参见《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 144 页。

第四编

失 败



## 中苏分裂的出现

---

### 第一节 中印边界之争

1959年9月对彭德怀的清洗，是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契机。而同月晚些时候尼基塔·赫鲁晓夫访华，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9月30日，这位苏联总理抵达北京机场，参加中国的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正如他对前来迎接的态度冷淡的中国领导人所说的那样，“我刚刚访问了美国，回到莫斯科，实在地说，就是刚下飞机就换上了另一架”<sup>①</sup>。当着中国东道主的面，赫鲁晓夫开始兜售刚刚在戴维营会谈中得到最后确认的和平共处方针。也许他自认为谈一谈也无妨。几年后他回忆道：

我不得不承认，在1959年中印边界冲

突爆发时，我对北京之行完全失去热情。我知道，对我的正式礼遇会按惯例执行，但是不能指望我会受到象1954年首次访问北京时那样的兄弟般的款待。我们同中国的亲密关系已经失去，取而代之的是我一到达便能感觉得到的冷漠。②

赫鲁晓夫指出中印边境争端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方面在翌年公开透露，他们对苏联全球战略总方针的不安与日俱增。苏联人对北京与新德里之间不断升级的争吵所持的态度，正是这种战略的一个具体表现。这种战略深深地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

256 在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印关系是友好的。两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周恩来曾经互访，周恩来在新德里受到欢迎，人们高声赞颂印度和中国的兄弟情谊。1954年，双方签定了一项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议，它为解决英国给印度遗留下来的在西藏通商及其他权益问题扫清了道路。遗憾的是，正如后来的变化显示的那样，双方都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使印度和中国西藏的边界确定下来。③

双方对东部的边界是有争议的，但是问题基本上是可以解决的。印度人坚持从英国人那继承下来的由麦克马洪线所确定的边界。而据北京方面说，麦克马洪线是帝国主义的残余物，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它。但是周恩来指出，中国准备承认现实并接受现状。周的姿态含有一种暗示，双方应就确切的边界线进行谈判并正式签定协议。但是周并没有详细说明。在尼赫鲁这边，他宁愿让边界线维持现状，并且设想如果周并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可以推想中国人接受了印度人确定的边界。

此后，周在1956年对新德里的访问中，没能提出中印应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并签定协议，也许是因为尼赫鲁对这个问题也保持沉默。中印边界中麦克马洪线部分也许会较为容易地解决，但是周预见到解决西部边界将存在困难。两国的版图对这段边界的

领土主权有着不同的解释，这时，中国方面从新疆到西藏西部的公路已建成一半，其中有100公里穿越了印度宣称其具有主权的阿克赛钦地区。这条公路对中国其它地区与西藏的联通是至关重要的。这部分是由于从四川穿山越岭进入西藏东部的公路十分艰险。更重要的原因是，西藏(上层人物)第一次叛乱的教训说明，由四川入藏的公路很容易被切断，如果周坦率承认中国正在建造这条由新疆到西藏的公路，中国需要这个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也许能促使尼赫鲁同意放弃这个印军边界巡逻队从未进入的荒凉地带，印度对这个地带实际上只有其版图上的关系(但是周和尼赫鲁也许同样都认为不必去挑起双方都认为不存在的问题)。如果尼赫鲁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并开始派出军队去确保印度的权利，那会使正在筑路的中国人感到难堪。事实是，中国出版的地图引起了印度政府的关注，最终促使它于1958年7月向这个地区派送巡逻部队这才发现有这样一条公路存在，这种发现的方式使后来边界谈判的成功困难重重，而使中印双方都蒙受损失的边界武装冲突导致了谈判的失败。

对这条公路的突然发现，促使尼赫鲁采取了断然的政策，在整个边界地带派驻了巡逻部队。1959年春天西藏的叛乱在印度舆论界引起的反响，以及后来达赖喇嘛逃到印度一事坚定了尼赫鲁的决心。同时，中国军队也逼近边界线，以切断西藏地区叛乱者的逃亡路线。8月25日，当一支印度巡逻部队在麦克马洪线中国一侧建立哨所时，双方军队相互交火，一名印度士兵被打死，另一名受伤。正是这次事件最终导致中印边界争端第一次公开化，并迫使苏联对此采取公开立场。<sup>④</sup>

## 第二节 塔斯社声明

据中国人宣称，苏联驻北京代办听取了中国政府对9月6日的



冲突事件的详细介绍。乍一看来，俄国人没有理由不接受中国方面的观点，虽然这个观点明显地与中国对印度的政策的评价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评价与苏联对印度的看法并不一致。中国人宣告，是印度政府挑起了冲突以反对共产主义的中国，他们警告俄国不要上尼赫鲁的当，“尼赫鲁正在利用苏联向中国施加压力”。

258 9月9日早晨，苏联驻北京的代办向中国人提交了一份第二天就要发布的有关中印边界冲突的苏联塔斯社声明的副本<sup>⑤</sup>。这也许就是苏联作家在后来谈到的莫斯科采取“外交和其它渠道以表明立场”的时机<sup>⑥</sup>。声明描绘这次事件是“令人遗憾的”，并指出，苏联将维持与中国（“在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伟大原则基础上”）和印度（“遵循和平共处的设想”）的友好关系。据报道，苏联领导层表示相信，“两国政府将会消除出现的误解……”<sup>⑦</sup>

塔斯社的声明很显然没有偏向任何一方，持这种骑墙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再明显不过了。实际上，声明的前半部分并非针对事件本身，而是针对这一事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声明坚持认为，这次事件被一些人特别是美国人所利用，他们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企图“阻碍紧张局势的缓和并使事态复杂化”<sup>⑧</sup>。4年以后，俄国人则指责中国人抱着破坏和平共处的目的，于1959年挑起了同印度的武装冲突。<sup>⑨</sup>

这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清楚地表明，他是怀着渴望和紧张的矛盾心情，期待着他的访美之行的<sup>⑩</sup>。当时苏联新闻报道指出，赫鲁晓夫把这次访美视为苏联历史及其国际外交上的一个转折点，是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同美国并驾齐驱、共同裁决国际事务的得到确认的良机<sup>⑪</sup>。而且，他显然意识到避免美苏之间爆发核战争的重要性。1959年夏，他对美国一些州长以及随后对一些苏联公众这样说道：

我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其他国家

之间爆发战争，是可以被制止的；但是，要是战争在美国和我国之间爆发，那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止它。它将会在巨大范围内酿成空前的灾难。<sup>⑫</sup>

象诸如中印边界争端之类的节外生枝的事件，是这位苏联领导人最不希望出现的，这会给他的美国之行带来损害。如果莫斯科发表支持中国方面的声明，他就会因为美国当局敌视中国而受到可以料想得到的冷遇。要是莫斯科不发表任何声明，赫鲁晓夫在访美的每一个场合下都会遇到要他对争端表示态度的麻烦。因此，需要一个不偏向任何一方的声明，至少在他访美期间能够起到搪塞作用。<sup>⑬</sup>

259 上述的某些原因一定得提出来，以说明俄国人之所以不顾中国人的劝阻，坚持要发表塔斯社的声明。据中国方面说，（俄国人从未公布过有关这件事的任何详细材料）9日上午，他们一见到塔斯社声明（译按：指苏联临时代办送交的声明文本），当即表示，他们希望莫斯科对边界争端问题最好不要发表任何评论。当天下午，为了使俄国人改变做法，中国方面把周恩来前一天致尼赫鲁的信的副本交给了苏联临时代办。同一天晚上，中国方面通知苏联临时代办，他们现已发表了这封信，并且说，请苏联政府考虑周恩来表明的立场，应当停止发表塔斯社声明。<sup>⑭</sup>

周发这封信的时机，可由9月7日发表的印度关于边界争端的白皮书得到解释。两国总理间的信函往来开始于尼赫鲁，他于1958年12月致信周恩来；周回了信，随后尼赫鲁于1959年3月22日再次致信。印度方面的白皮书透露了信的细节，并强调这样的事实：在发生西藏叛乱和达赖喇嘛逃往印度的事件6个月之后，周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多事的6个月似乎是一个足够的理由，要求中国总理作出答复。相反，《人民日报》批判了“西藏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而周继续保持沉默<sup>⑮</sup>。然而，当时的情况表明需

要作出个答复，中国必须表现出同印度方面一样的关注于解决边境冲突的态度。于是便有周的信件出现以及9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召开，讨论边界冲突。不过，事情的原委也可能是这样的：中国方面获悉苏联政府正在考虑发表一个声明，并希望通过周的复信阻止苏联发表声明。

260 无论动机如何，不论周的复信，还是随后该信的立即发表，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俄国人在中国方面广播了周的复信之后不到6小时，便于9日晚间提前发表了塔斯社声明，既没有暂停发表这个声明，用一定时间考虑中国的请求，也没有等到10日再发表<sup>⑩</sup>。也许他们不愿意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就塔斯社声明进行更高层次的外交交涉，这种交涉可能使苏联的目的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所能作出的唯一反应便是于9月13日送交一份照会，认为“塔斯社的声明将中苏对于中印边界事件的意见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印度资产阶级和美、英帝国主义会对此幸灾乐祸”。<sup>⑪</sup>

赫鲁晓夫的策略没有成功。在他的美国之行中，他未能逃避有关中国政策的提问，例如参议员对他的质询<sup>⑫</sup>，艾森豪威尔则公开否定了苏联总理的要求，即两国首脑同意不讨论第三国的话题<sup>⑬</sup>。显然，在戴维营会谈中，赫鲁晓夫千方百计避免谈中国<sup>⑭</sup>。在访美结束不久，国务卿赫特声称，只要苏联自称是共产主义集团的领导者，它就应当对中国的举动负有一定的责任。<sup>⑮</sup>在10月底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断然驳斥了这种说法<sup>⑯</sup>。但即便如此，也于事无补。他对赫特的怒气，由于回想起访问北京时同中国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发生的分歧，更增添了几倍。他一定意识到，已经没有能力去影响中国，更不用说象那位国务卿暗示的那样去约束中国了。

### 第三节 赫鲁晓夫在北京

261 尽管有所预感，个性很强的赫鲁晓夫在北京还是没有闪烁其词。在到达当晚的国宴上，他告诉东道主们3件事：他相信艾森豪威尔想要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和平共处是列宁所赞同的；虽然共产主义集团已经很强大，也没有必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sup>②3</sup>“这是错误的：人民决不会理解也不会支持那些认真推行这条路线的人”<sup>②4</sup>。毛没有公开作出反应，这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又有如此重要的贵宾的情况下是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据赫鲁晓夫说，即使在随后的个人交谈中，他的确居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中国方面的主角是外交部长陈毅<sup>②5</sup>，在关键的8月，他很可能负责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与此同时，他的政治局同事们正在庐山聚会，因此他最了解情况。

争执发生在10月2日<sup>②6</sup>。中国方面出场的是一个强大的阵容，其中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防部部长林彪，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第二号人物彭真、陈毅，以及书记处中的“苏联问题专家”王稼祥。赫鲁晓夫的陪同者有，苏联头号理论家苏斯洛夫，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苏联临时代办也在座<sup>②7</sup>。据4年后《人民日报》提供的简要情况，中国方面介绍了边界冲突的看法，谴责印度方面的挑衅，并说，“对印度反动派一味迁就是不行的”。赫鲁晓夫对详细说明置若罔闻，坚持说“打死人就是错误的”。<sup>②8</sup>

后来苏联总理对当时情况的回忆更为生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决定让陈毅出来对付我。对话很快就变得激烈而紧张起来。陈毅非常粗鲁。我弄不清他的粗鲁究竟是一种精心策划的政治计谋，还是一种个人性

格。②

也许陈毅的同事们之所以选择他作为发言人，正是因为在那个人中，他和赫鲁晓夫最相近，直言不讳，说话容易冲动，因此是最适于对付这位苏联总理的争强好胜的论战风格的人选。③

262 根据赫鲁晓夫对当时争论的印象，陈毅“脱口而出”：“你们怎么可以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呢？”——从中流露了北京对于莫斯科在这场边界争端中公开保持中立态度而产生的愤懑。陈争辩说，尼赫鲁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支持中国。赫鲁晓夫回答说，尼赫鲁是进步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步人士，边界争端无论如何也不值得诉诸武力，尤其当边境线早在10年前就已划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陈毅紧接着这句话提出，这片领土理应属于中国，尽管在英国统治时期曾被英国人占有；中国需要它（显然是为了修路）④。赫鲁晓夫再次站在印度一边，要求中国领导人设身处地地为尼赫鲁想一想，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很自然地认为中国占有西藏（译按：西藏本身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一种潜在威胁。这种理由很难指望他的对手接受。说到底，赫鲁晓夫根本不相信中国方面对边界冲突的说法⑤；9个月以后，当边界发生了更大的流血冲突时，他在布加勒斯特告诉彭真说：“我知道什么是战争。既然印度死了人，这说明是中国进攻了印度。”⑥

随着陈毅的发言，不满苏联在争端中持中立态度的一系列抗议照会，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1月30日接连6次递交到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手中。对此，在1960年2月6日的答复中，俄国人指责中国人对印度的态度是“狭隘的民族主义”。⑦

在引退的年月里，赫鲁晓夫回忆这次争端时这样写道：“我认为，毛挑起中印争端仅仅是为了把苏联也拉下水。他想逼我们处于被动，除了支持他而外，别无选择。他想由他来决定我们应

该做些什么<sup>⑤</sup>。”实际上，没有迹象能够证明，1959年秋中国方面的言行可以被解释为马基雅维利式的（译按：马基雅维利，中世纪意大利政治家，主张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赫鲁晓夫的冥想的确表现了他的无知和猜疑的交合，这二者的交合便是当时中苏领导人之间关系的特色。这种多疑的毒瘤已经侵入中苏联盟的机体。

在赫鲁晓夫方面，他指责中国人好战<sup>⑥</sup>，口是心非<sup>⑦</sup>，民族主义<sup>⑧</sup>。他自认不能理解诸如“百花齐放”和大跃进等中国国内许多政策的逻辑<sup>⑨</sup>。这类政策会引起东欧国家的共鸣，估计这是他更加担心的事情。后来他确实回想起，为了把在一般情况下非常忠诚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从其跃进的边缘挽救回来，他花了多大力气。<sup>⑩</sup>

263 中国方面则怀疑赫鲁晓夫正在出卖他们，为了苏联而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中印边界争端不是唯一的问题。苏联对台湾的态度也激怒了中国人。在美国，赫鲁晓夫未能使这个海岛排除在一项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条约之处<sup>⑪</sup>。当他在北京的时候，这位苏联总理私下说，台湾问题不仅能够以军事手段而且能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后来，苏联宣称，它仅仅是在附和中国人的想法，因为他们在1956—1957年曾经表示愿意同国民党人再次组成统一战线政府，并在其中给蒋介石一个高级职位。<sup>⑫</sup>

这种多少有些不坦率的解释将1957年以来中国对台政策的变化<sup>⑬</sup>掩盖了起来，而俄国人对这种变化是了如指掌的。赫鲁晓夫显然关注着台湾海峡出现的任何会给苏美关系带来影响的危机，因为华盛顿坚持认为莫斯科对北京的举动负有一定责任。据中国方面对这次私下会谈的记载（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对此未置一词），苏联总理说：

在国际时局中，台湾问题是一个不安定因素，这是因为



美国支持台湾的缘故，其结果是造成大战迫在眉睫的气氛；而苏联的立场是要创造一切条件，以缓和国际紧张趋势，并消除战争。<sup>④</sup>

中国的反应是坚定而明确的，实际上反应已经作出。在10月1日国庆庆典上，即赫鲁晓夫同陈毅对话的前一天，国防部长林彪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的领土、领空和领海全权的完整，必须受到尊重，中国人民以这种方法或者那种方法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完全统一伟大祖国的愿望，一定要得到实现，外国不得干涉。<sup>⑤</sup>（着重号是我加的）

中国人不准备在领土完整问题上妥协，尽管有莫斯科的请求。只要有必要，就会诉诸武力。

中国公众对赫鲁晓夫准备按照“戴维营精神”“支持”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领导人的程度感到明显的怀疑和愤慨。一年以后，邓小平在共产党领导人莫斯科高级会议上说：

当赫鲁晓夫公开说艾森豪威尔得到美国人民的全力支持的时候，用外交礼仪的需要就难以说得过去了，或者说，赫鲁晓夫是在不明智地美化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sup>⑥</sup>

264 在美国之行以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赫鲁晓夫在国际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忠诚已经是大可怀疑的。



“帝国主义是非常凶恶的。”那是说它的本性不会改变。帝国主义分子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直至他们灭亡。<sup>⑤</sup>

如果说此刻中国人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改变还抱有幻想的话，而当10月31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正式报告时，这些幻想就被他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强有力的阐述打消了。这位苏联总理重申他的看法，盛行于西方世界的是武力抗衡的观点，这意味着从现在起对战争必须不加考虑。他重申“为了和平相互让步”，并宣称这不是放弃原则，而是仿效列宁在1918年同德国人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时表现出的灵活性。他提到托洛茨基冒险主义者反对这项条约时，显然是在暗示应当把毛归入异端。这位苏联总理列举国际关系中真正缓和的证据，显然是要驳斥中国关于帝国主义的“烟幕”的断言。更直接与中国有关的是，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继续坚持中立的立场<sup>⑥</sup>，争端在他访华之后又进一步加剧起来，死了更多的人<sup>⑦</sup>。更令人吃惊的是，他还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问题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声明支持戴高乐总统的停火建议。他的动机显然是要在他次年春天访法之前改善法苏关系的气氛<sup>⑧</sup>。对于一贯强烈反对戴高乐计划的中国人来说<sup>⑨</sup>，这更是赫鲁晓夫准备背叛朋友和同盟以讨好西方的证据。

一个月以后，12月1日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赫鲁晓夫对毛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更为直接的，但依然还是含蓄的攻击。“如果我们变得骄傲自大，如果我们在自己的领导中犯了错误，如果我们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曲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这些错误就会被共产主义的敌人所利用，就象1956年所发生的那样……”这显然又是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攻

击。在国际问题上，赫鲁晓夫一再强调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基础上的团结的必要，“比方说，我们必须对一下我们的表”，明显地是在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应当与莫斯科保持一致，并听命于莫斯科<sup>⑤</sup>。在代表大会会下，赫鲁晓夫显然更激烈地批评中国领导人<sup>⑥</sup>。

北京却漠视赫鲁晓夫对团结的呼吁。陈毅打算承认的只有一点，即认为随着共产主义阵营在经济上取得优势地位，帝国主义和平地下台，这种情况为时尚远<sup>⑦</sup>。在12月同一次文化工作会议的讲话里，邓小平号召不断地批评苏联，而不是一次一般性的攻击<sup>⑧</sup>。中国对国际问题的公开声明，至此更明显地不同于苏联的口径，这尤其表现在对1960年1月艾森豪威尔国情咨文的反应上<sup>⑨</sup>。而且，中国人表示，他们根本不考虑用自己的外交政策去迎合俄国人的胃口。他们正式表示欢迎1月14日赫鲁晓夫提出的全面裁军建议，认为它证明了苏联爱好和平并具有对军事力量的自信心。但是还没过一星期，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听取了外交部长陈毅有关这个问题的发言之后，通过一项决议，强调“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及其代表团签字，任何一项国际裁军协定对中国都没有任何约束力”。<sup>⑩</sup>

对于苏联来说，更加感到惊讶的可能是1960年1月中国人开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外围组织中——如世界和平理事会和世界学生联合会，阐明自己的观点<sup>⑪</sup>。此时，刘少奇个人关切地注意到被他视为西方扩大中苏之间裂痕的企图，其手法是称中国为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称苏联为稳健力量<sup>⑫</sup>。然而，只有中国方面的行动和争论更会带来这种效果，而不是西方的文章。还是在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讨论外交问题，大约就在这次会上，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以后首次发生的中苏对抗局势，作了认真的分析。

## 第五节 华沙条约组织会议

267 到本书写作时为止，1960年2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国高级首脑会谈的原由，还被神秘的气氛笼罩着<sup>⑤</sup>。有迹象表明，俄国人希望能够阻止中国与会，因此直到会议前夕才通报了开会的消息；与此同时，则以出席一次农业会议为托辞把东欧领导人召到莫斯科。无论苏联人如何谋划，中国人还是获悉了这次会议。消息可能来自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很快就将以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盟友出现。中国领导人决定行使自己的权利，以“观察员”资格与会，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接到了正式邀请<sup>⑥</sup>。他们选择“熟悉苏联的老手”组成代表团：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都在苏联生活过若干年；代表团的第三位成员是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刘晓。<sup>⑦</sup>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3人小组，在可以预料到的不利环境下，能够很好地应付局面。<sup>⑧</sup>

这次华沙条约国会议的目的，是要支持赫鲁晓夫在未来几个月同西方国家领导人举行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中，尤其是春天的巴黎“四巨头”会晤以及夏天艾森豪威尔对苏联的回访中，提出和平共处政策和裁军建议。与会者同意他们“共同的、衷心的意愿”是：“美国总统的访问”导致苏联和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朝着友好与合作的方向发展，这是全世界和平不遭破坏的重要保证。”<sup>⑨</sup>

中国领导人派出观察家代表团的目的是，要在这一重要会议上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是他们在莫斯科的东欧盟国面前阐明观点的第一次机会。由于涉及相同的具体事件，会议的两个文件——康生在大会上的发言（在华沙条约成员国里没有允许发表）与华沙条约集团的声明（在中国得到发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这年的晚些时候，论战更多地转向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声明的基调相对来说是温和、乐观的，而康生发言的调子则是强硬、悲观的<sup>⑧</sup>。声明没有提“美帝国主义”；发言则反复地提到这个词。前者提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强德国“军国主义”，但又补充说，与会者“表示相信西德复仇主义分子的计划不会得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现时盟国的支持”；与此相反，康生在讲话中说，“加快西德军国主义的复活”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康生声讨说，声明只是谴责，而且调子低沉，缺乏义愤。

声明援引了四段论据来证明它的乐观态度；康生的讲话回避了其中的三条论据，而将第四条论据（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解释成为华盛顿被迫作出的毫无意义的姿态<sup>⑨</sup>。当康生承认缓和趋势的某些迹象时，就把这种情况归之于坚强、团结的共产主义阵营的斗争，这种斗争还得到“和平民主力量”以及极其重要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

这个声明的主题是宣扬赫鲁晓夫的整个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核战争必将导致战争双方的大规模毁灭，而不仅仅是帝国主义者一方。康生发言的关键内容是提到美国“在国际问题上采取歧视态度来对付我国”，以此为中国拒绝遵循它没有参与制订的任何国际条约辩解。除了旷日持久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外，华盛顿排斥北京，愿意同莫斯科打交道，这是一种对共产主义集团的不同组成部分采取不同方针的政策，招致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赫鲁晓夫对这种政策的顺应，是他在中国首都受到冷遇的主要原因。受到冷遇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公开场合嘲笑毛的情况与日俱增。在华沙条约国会议闭会的宴会上，据说他形容这位主席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充满怪念头的人，倒象一双老式的鞋，样子刚好足以摆在角落里供人观赏”。<sup>⑩</sup>

这时，莫斯科和北京在对世界问题的分析及共产主义集团的行动方针上，公开地互相对立。政策之争日趋严重。然而，华沙

269 条约国会议之后仅仅10天，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0周年纪念日里，双方的首都均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就象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sup>⑩</sup>。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宴会上，刘少奇提议为两国人民的“伟大的牢不可破的亲密友谊”干杯，朱德表示中国“衷心感谢”苏联对他的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给予的帮助。然而，潜在的问题还是露出了一点苗头，朱德提出以1957年莫斯科宣言作为阵营团结的基础，而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则强调社会主义与和平密不可分以及不久前发表的旨在谋求和平共处的华沙条约国声明的重要性。<sup>⑪</sup>

也许由于朱德是苏联大使馆的客人，因而表现得有所节制。外交部长陈毅在中国举行的宴会上，重申中国对全球局势的严峻分析，以庆祝这个时机<sup>⑫</sup>，然而在会下，他显得比较理智。他暗示，如果中国获得了核武器，就有可能达成不使用这些武器的协议。<sup>⑬</sup>

## 第六节 中国的孤立

似乎是在这些周年庆祝活动刚刚过去后，中共中共又举行了关于外交问题的工作会议，这次是在广州，估计讨论了华沙条约国会议，并就如何最有效地采取对策的问题做出了决定<sup>⑭</sup>。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在杭州举行了第三次工作会议，估计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领导人通过了在4月发表的论战文章的草案或正式文本（译按：指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和陆定一的报告《在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及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等一组论战文章）。

尽管这些论战文章的风格充满自信的语调，毛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仍表明，至少他的一些同事担心中国会逐渐陷于孤立<sup>⑮</sup>。毛的评论《关于反华问题》包含了一些想象的统计数字，以消除有些

人的顾虑(译按: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列举了大量的人口统计数字和百分比,说明反华反共的人只是极少数)。中国的敌人包括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相当于第三世界)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

270

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假定说,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反对我们,全世界二十七亿人中,不过只有二亿七千万人反对我们。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②

毛继续指出,现在反华活动有一短暂的间歇,假如中国经济搞得好,这种间歇还会延长。他以颇令人吃惊的语言引用俄国的例子说:“我们前面有苏联的经验可遵循。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人反对苏联有好结果。”③然而,尽管有历史教训,毛仍将领导中国共产党反对苏联!

毛的这番话——刘亦持相同的观点④——是配合中国在巴基斯坦举办的展览会开幕而讲的⑤。当然,由于中国当时与邻居和近邻的争论,反华情绪主要存在于亚洲。毛讲的间歇是北京采取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的结果。

就印度来说,早在11月7日,周总理就在一封比以前语调友好得多的信中向尼赫鲁总理提出了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建议⑥。尼最初表示拒绝,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并要求周到新德里去。2月26日,中国总理接受了邀请。访问的日期后来定在4月中旬。⑦

与此同时,中国迅速采取行动来消除一些其它边界问题。1月,北京接待了缅甸总理奈温将军。3月又接待了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先生。两次访问都达成了边界协定,尽管与缅甸的定界最



后要由联合委员会裁决。中缅还签定了一个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对尼泊尔，中国则提供1亿卢比的援助。在同缅甸的协定签定后，中国报纸问道：“在中国和缅甸之间能够出现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够同样出现在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之间，出现在亚洲各国之间呢？”<sup>⑤</sup> 很明显，这里指的是印度。

中国在亚洲的另一个重大争论是与印度尼西亚的纠葛，它是由雅加达政府1959年5月禁止华侨从事乡村贸易的决定引起的。

271 10月印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对北京的访问没解决问题<sup>⑥</sup>。据当时印尼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苏班德里约与陈毅的会谈就象这位中国外长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一样尖锐激烈，尽管有迹象表明陈理解华侨问题的历史渊源和适应殖民统治结束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这个现实的需要<sup>⑦</sup>。不管怎样，次月中国人就被从家里和商店里赶了出来，商品被没收了。一些中国人挨了打，另一些则被关进了监狱<sup>⑧</sup>。其后重新开始的外交活动最后在12月导致了北京同意批准1955年的双重国籍条约。同时，中国主动提出收容不再愿意留在印尼的华侨，10余万人接受了这一安排，乘中国船离开了印尼。<sup>⑨</sup>

中国在亚洲的争论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中国好斗的结果，就象史料记载的那样。然而，中国的外交行为确实表现出比较强硬的特征，这种特征反映了伴随大跃进的发动而出现的一般来说更加强硬的姿态。此外，中国人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评也没有改善他们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形象，因为铁托与他们中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建立了密切关系。1959年底和1960年初北京稍许缓和的态度表明它已意识到，在中国将来与苏联对抗和继续与美国对抗可能需要朋友的时候，自万隆会议以来由周恩来巧妙的亚洲外交取得的成果正在白白消失。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访问印度和1960年2月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许在中国看来预示着反华力量之间的联合正在形成。而任何这样的势态都必须防止。<sup>⑩</sup>



对于中国来说，一种方法是发展它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有计划的行动一个接着一个出现，3月19日北京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中国——拉美友好协会的成立，一个月时间不到，4月12日，以中国工会领导人刘长胜为主席的中非人民友好协会成立<sup>⑧</sup>。5月，在周恩来与尼赫鲁的边界谈判无结果的情况下<sup>⑨</sup>，毛会见了一连参加了四次会议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代表团，为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政治上的良好关系作出了建树。毛主席向他的几批客人强调说，共同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只能通过团结和斗争才能打败它。<sup>⑩</sup>

为了避免持续而无效的与美国的大使级会谈所引起第三世界或苏联对中国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诺言的怀疑或嘲笑，中国政府调整了自己的外交活动。3月中旬，大约在中共中央广州会议评价华沙条约会议精神后两个星期，两名天主教主教，一名美国人，一名中国人在上海突然被审判。中国人龚品梅被控犯有重大叛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它13名中国天主教徒也受到审判，分别被判处5至20年不等的徒刑。美国人詹姆士·爱德华·沃尔什（曾在共产主义革命后拒绝回国），被指控指导龚的“反革命叛国集团”，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sup>⑪</sup>。沃尔什和龚关在监狱里多年，在这个特别时刻审判他们的目的，看来只能从中国在首次攻击赫鲁晓夫和平共处政策前夕需要作出一个反美姿态的意图中得到解释。这个姿态确实有效，根据一个中美会谈历史学家的说法：“华盛顿被大大激怒了，大使级会谈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一事件向华盛顿提出了继续会谈是否真的有用的问题。”<sup>⑫</sup>

## 第七节 在列宁纪念日的进攻

中国利用196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日作为大规模谴责苏联外交政策的时机。总共有四篇文章<sup>⑬</sup>，其中《人民日报》

编辑部文章列举最近发生的37个事件证明，“尽管在戴维营会谈以后，尽管在东西方最高级会谈的前夜，我们看不出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有任何实质的改变，看不出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本人所执行的政策有任何实质的改变”。<sup>⑤</sup>毫无疑问，最主要的一篇是《红旗》杂志刊登的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冗长的、没有署名的文章，因为它把争论由具体政策提到了意识形态原则的高度。<sup>⑥</sup>

在这里，中国终于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倡导的新理论提出了反驳。这时中国最后感到要把毛泽东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同意了的妥协放在一边。<sup>⑦</sup>这些妥协主要涉及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革命或改良。

这篇肯定是由毛审定的文章<sup>⑧</sup>论证说，列宁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仍然是有效和正确的。不论是西方的帝国主义者还是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没有改变它们的本性；全球竞争的特点基本上没有因为象核武器这样的“技术进步的一些具体事例”的存在而有所改变<sup>⑨</sup>。战争仍然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制度。在帝国主义制度和剥削阶级死亡以前，这样性质或那样性质的战争，总还是会出现的。”<sup>⑩</sup>

从列宁起，共产主义者就主张和平共处。但经验证明，帝国主义最终会放弃和平而转向战争。正确的办法是两种策略的结合，“揭穿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和“准备在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时候，用正义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的不义战争。”<sup>⑪</sup>

和平共处只适用国家与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不适用于资产阶级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共产主义者应当参加议会斗争，但不应当对只是资产阶级专政装饰品的议会制抱有幻想。正如列宁指出的，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革命清楚地证明了这些论断。“请大家根据历史上和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一切血淋淋的事实，想想老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

义者所谓‘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一连篇的鬼话吧!”“和平过渡”，如列宁论证的，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机会。”<sup>⑩</sup>

274 在引用大段列宁的话的同时还穿插着对铁托的批评，隐藏在这个活靶子后面的是更为重要的赫鲁晓夫。南斯拉夫被谴责(为“无耻地把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艾森豪威尔叫做是‘消除冷战和建立持久和平及不同政治制度间和平竞赛的奠定人’”)。赫鲁晓夫在访问中国时曾提出过同样的观点。<sup>⑪</sup>

文章还隐射莫斯科同北京在印度问题上的对立态度。“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在不是受到国外敌人侵略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军队越出国境”<sup>⑫</sup>，在非共产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除了在必要时采取解散议会的办法以外，还能够采取公开或幕后的各种把戏，使议会中原来第一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变成少数派，或者使工人阶级政党纵使能够在选举中得到比以前更多的选票，而却减少了议会的席位……，第二次大战后欧洲和亚洲各国的经验又对这一点再作了新的证明。”<sup>⑬</sup> 在这里，中国清楚地指尼赫鲁解散世界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共产党政府——喀拉拉邦政府一事。<sup>⑭</sup>

促使发表《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问世的具体原因是几年间中苏外交政策的分歧，但它的理论纲领具有更基本和更持久的意义。中国人首次伸张了他们为共产主义阵营制定路线的权利。在那以前，中国的理论分析不是被说成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探讨(如1956年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两篇文章)，便是只与中国本身有关(如1957年毛的矛盾问题讲话)。但到这时，中国开始承担分析时代的本质和为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得出结论的最基本的理论任务。假如不遇到挑战，北京将取代莫斯科成为共产主义正统理论的中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罗马。而这是赫鲁晓夫所不能容忍的。

276 鲁晓夫的话谴责现代修正主义<sup>⑩</sup>。继列宁的纪念文章之后，中国在这个场合的行为，使他们失去了克里姆林宫中那些同意中国对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进行批评但不准备让出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的成员的同情。<sup>⑪</sup>

在世界工联会议的最后几天里，中国能够宣布他们的论点有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富有战斗性的学生支持下进行的反对延长美日安全条约的激烈示威游行，迫使日本政府要求艾森豪威尔总统把即将到来的访问延期。虽然新的条约被国会批准了，但岸信介首相此后不得不立即辞职。比之于议会活动，革命斗争的效果更令人信服<sup>⑫</sup>。从这样的事件看，说苏联企图利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作为机会向中国的极端主义发动隐蔽的进攻，是缺乏说服力的<sup>⑬</sup>。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凶猛地进行了反攻。

5月12日，在知道巴黎最高级会谈将告失败的前夕，苏联领导人曾邀请毛去莫斯科，毛拒绝了<sup>⑭</sup>。接着在6月初，苏共中央提议把预定在该月20日召开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在最高级会议流产之后交换对国际形势看法的机会。中国既反对仓促开会又反对把非执政党排除在外。两个党的中央都认为应该举行所有共产党的会议(11月在莫斯科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可以作为初步讨论的时机。<sup>⑮</sup>

在罗马尼亚党代会开会期间，赫鲁晓夫和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彭真再次陈述了人们所熟悉的苏联和中国关于和平、战争和革命的论点<sup>⑯</sup>。在幕后，激烈的对抗正在酝酿。苏联代表向兄弟党系统地介绍中苏间的争论，并散发了一封署名为《情况介绍》、落款时间为6月21日的长达80页的信件，谴责中国的错误思想和不友好的行为(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和在世界工联会上进行反苏宣传)。277 俄国人第一次试图维护他们理论上的卓越地位，但其指责是否有权难以估价，因为这封信的内容从未公布。<sup>⑰</sup>

布加勒斯特大会的秘密会议6月24日开始，26日结束<sup>⑮</sup>。据说彭真对受苏联宣传影响的各国代表上台发表的一系列反华演说吃了一惊，但他很沉着，以说理来回答。更有效的措施是，他给代表散发了另一封长达80页的苏共给中共的信件。它的“恐吓和严厉”的语调与《情况介绍》信里说理的论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破坏了后者反映出的政治家风度。

在中国采取上述措施提醒其他共产党注意苏共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做法的刺激下，赫鲁晓夫上台发言。他“放弃了论证说理和审慎分析分歧的姿态，以纯粹意气用事的语言作了一次激烈冗长的演讲……<sup>⑯</sup>。”根据中国的报道，“苏共领导人”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捡起来”，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和采取‘托洛斯基方式反对苏共’（指其他地方提到的中国在世界工联会上的活动）<sup>⑰</sup>”。中国没有提到赫鲁晓夫对毛的攻击，他把毛说成是“忽视除自己外任何人利益，编造脱离现代世界实际的理论”的另一个斯大林，认为中国领导人已成了“极左派、极端教条主义者，真正的左倾修正主义者。”<sup>⑱</sup> 赫鲁晓夫也谈到彭德怀事件，但明显暗示他是因为向俄国人流露了自己对大跃进观点而被解职的。<sup>⑲</sup> 彭是一个“好朋友”，他——赫鲁晓夫愿意挂他的像。<sup>⑳</sup>

278 赫鲁晓夫威吓的举止显然没有吓倒彭真，据说他的回答比苏联领导人“更高雅更有力量”，根据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后和在巴黎最高级会谈上截然不同的行为，彭真谴责他对帝国主义大国时热时冷摇摆不定的态度<sup>㉑</sup>。更重要的是，彭被授权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声明，谴责苏共第一书记“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行为和采取“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

他在实际上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看成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在这次会谈中，



他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屈服。<sup>⑫</sup>

中国的声明不同意已提出的会议的公报的一部分内容，但因为公报主张实行共产主义的团结<sup>⑬</sup>，“为了更大的利益”，象后来中国说的那样，彭真签了字。<sup>⑭</sup>

### 第九节 俄国人执意前行，俄国人执意前行

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与彭真对抗后，更大规模的行动计划在他思想上萌生了。7月13日至16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最后一天听取了关于布加勒斯特的报告。报告人是科兹洛夫，尽管这个苏联高级领导人没有出席那次会议。做如此安排，目的大概是要向中国表明，苏联领导人团结一致反对他们——科兹洛夫是苏共主席团中有反对西方倾向的成员——<sup>⑮</sup>和中央正式“完全批准了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活动的政治路线”。<sup>⑯</sup>月底，苏联理论权威苏斯洛夫在向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党员作关于全会报告时明确说，因为中国好斗，今后的关系将只在国与国的基础上维持，假如年底世界各国党的会议不能解决争论，将要公开宣布两党关系破裂<sup>⑰</sup>。更为重要的是，苏共中央全会还明确地批准了主席团关于从中国撤退所有苏联顾问的决定。7月16日，中国外交部收到了这个意见的照会（根据苏联<sup>⑱</sup>和中国<sup>⑲</sup>的资料），并立即采取了行动：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化学家米哈伊尔·A·科罗契科（当时在遥远的昆明的冶金和陶瓷研究所）后来报道说，他是7月16日收到召回电报的。<sup>⑳</sup>

苏联没有公布过召回决定，但中国把苏联照会的内容给所有将要离开的苏联顾问看了，并解释给他们听。提出的主要理由是：中国人不遵守苏联的技术意见并经常对之表示蔑视；中国人

制造了苏联顾问无法容忍的事情，暗中监视他们，搜查他们的行装，拆开他们的邮件；有时苏联专家被骚扰，甚至被殴打。因此，所有的苏联顾问将在7—8月间撤走<sup>⑮</sup>。7月31日，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收到中国的答复<sup>⑯</sup>。它逐条否定苏联的谴责，把它们说成是“一个就象捕风捉影一样的奇怪而无效的行动。”<sup>⑰</sup>

苏联的决定看来使顾问们和他们的中国主人们都吃了一惊。科罗契科从中国科学院得到的召回电报说，他必须立即回到他的莫斯科研究所去。这消息使还不了解实情的科罗契科感到迷惑，因为他在同年6月的第三周还被通知能呆到12月。科罗契科也知道，当时在苏联科学院正是“淡季”，整个莫斯科在9月前不管怎样都难找到在搞研究的科学家。”<sup>⑱</sup>

科罗契科从3月份到达时起就意识到在中国人和他们的苏联顾问之间存在着紧张气氛，这种气氛在1958年他前次在华工作期间是没有的<sup>⑲</sup>。一个月后，他和其它外国专家参加一个会议。会上，一位高级省级官员向其它干部讲解《列宁主义万岁》，在这个科罗契科实际上一点也不懂的讲演之后，每个苏联专家都得到了这本这篇文章的俄文本。其后，所有在华苏联顾问都被他们的大使问过是否手头上有一本这个异端邪说的文件。科罗契科不把外交上的这个风波归咎于这篇文章的内容，“它容易被看作愚蠢无益，而实际上这个文件代表了中国政府首次公开提出的与苏联不同的观点。”<sup>⑳</sup>然而五一节仍是以通常的礼仪庆祝的。<sup>㉑</sup>

280 尽管有电报，科罗契科真诚地希望在离开前完成他当时手头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为实现苏联在华顾问人员的迅速撤离给苏联外交官受到的巨大压力。在与北京的大使馆连续通电话的结果仍是要执行打起背包撤离的绝对命令后，科罗契科感到不能再拖延了，在参加了他同事为他举行的一个令人感动的告别会后，7月28日飞到了北京。<sup>㉒</sup>

在中国首都，一个苏联外交官通知科罗契科，苏联政府正为



他们安排了每周两次的北京到莫斯科的加车。当时大约有1500名顾问和2500名家属在中国，他们到8月底必须全部撤离。科罗契科本人则被要求不迟于8月4或5日离开。他再次设法拖延，以便为他的主人写一份关于中国科学的综合报告，实际到8月13日才离开。<sup>⑭</sup>

在北京的最后几天时间里，科罗契科听取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对顾问中党员作的关于撤退原因的解释。大使批评了中国的国内政策——百花齐放、人民公社——但火力却集中在他们的外交政策上——中国侵略印度的蠢事；“为了几个小商人的利益”恶化了与印尼的关系；与南斯拉夫关系的不必要的恶化和对阿尔巴尼亚的过分友好；在第三世界人民中进行反苏宣传；中国对美国威胁分析上的矛盾。他特别对中国在世界工联会上的行为表示愤怒。在他看来，更一般地说，中国企图接任世界革命的领导，尽管它对马克思主义或革命实践欠精通。苏联撤退的目的在于迫使中国人重新考虑他们的行动并可能改变他们的政策。<sup>⑮</sup>

中国没有表现出突然改变政策的迹象，但他们一直到最后都以礼相待。科罗契科报告说他的中国同事甚至比以前还要热情<sup>⑯</sup>，外交部长还为即将回国的顾问举行了宴会。在宴会上，陈毅感谢顾问们的巨大帮助，希望他们回国后身体好，工作顺利。契尔沃年科提醒中国别忘了莫斯科给中国的60亿卢布和派来的10000名顾问。然后，一个苏联代表概括地作了答词，大意是，“我们为你们做了这么多，可你们还不满意。”<sup>⑰</sup>

281

这种感情，据科罗契科证明，没有引起大多数苏联顾问或苏联国内科学家的共鸣。至少在这个圈子里，撤退被认为对苏联利益有害<sup>⑱</sup>。原因不难理解。当时有1390名苏联顾问在中国工作。除了把他们撤退外，俄国还撕毁343个专家协定和补充协定，废弃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sup>⑲</sup>。由于撤退，很多中国的“重要设计和科学研究项目不得不停止，一些正在进行的建设项目不得不

下马，一些正在进行试验生产的工厂和矿山不能按计划投入生产”<sup>⑭</sup>。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苏联撤走专家对海军建设的影响<sup>⑮</sup>。根据后来情绪激动的报告，苏联的行动使中国的发展遭受了“巨大的损失”<sup>⑯</sup>。刘少奇大概不是唯一的对撤退表示忧虑并主张转向西方补偿损失的中国领导人<sup>⑰</sup>。但直到刘受辱死去后这个建议才被采纳。

同时，即使苏联关于中国人虐待他们的顾问的说法有部分事实根据——象科罗契科所表明的那样<sup>⑱</sup>——这数千名苏联人却是情报的独特来源，通过他们，苏联政府可以了解中国各部门的政策，工厂的情况，边远地区的生活水平，科学的状况，即关于中国总的活动情况。由于撤退他们的顾问，俄国人使他们的情报来源降到了任何其它外交使团都享有的水平，而这时正是他们对中国人的行为感到惊恐而渴望增加而不是减少对他们的巨大邻国的了解的时候。

282 但是，撤退有一更深的感情上和象征上的意义。不管合作关系处理得怎样不完善，这1万名苏联顾问代表了几年间对中国发展事业的巨大人力资源的投入。中国对苏联的债务是巨大的，陈毅在为苏联顾问准备的最后晚餐上表示的感激是真诚的。但债务一笔勾销，感激的心情也由于关系的中断而荡然无存。（译按：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债款并未勾销）

也许同样有意义的是，即使不是很明确的话，苏联的行动破坏了两国政界、工业界以及知识界的精英通过在一起工作建立起来的大量人际关系，这种关系本来大大有助于两国间的关系。另外，俄国人破坏了中国的精英中的亲苏力量——苏联培养的计划工作者、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中国政府中的骨干地位。这些人与俄国人的特别关系不再是他们的资本，而日益成为受怀疑的原因。很多人得转向西方。

假如苏联领导人在1960年7月中旬就断定与中国完全破裂不

可避免甚至是需要的，那么，撤走顾问不过是迟早的事。但是，假如苏联把布加勒斯特会议当作摊牌的场所，对北京的行为进行愤怒的反击，以为这样就能使北京觉醒过来，那么，苏联人完全错误地判断了中国人的心理。撤退的结果很清楚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感情，加强了毛走自己道路的决心，使中国领导中本来也许感到毛压俄国人太厉害的任何成员都团结在他的旗帜下。在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认为，苏联的观点是要中国人完全否定自己的国内政策<sup>⑮</sup>。国内对大跃进的反对者中很少有人会同意这样的令人感到屈辱的苛刻要求。

283

由此可见，撤退专家产生的后果比关于对美国和印度政策的争论还严重。政策可以改变，妥协可以达成，特别是在巴黎最高级会谈失败以后，但两国间的人际关系不可能再恢复。这样使重大政策争论无情地扩大的裂痕就在1960年引发一系列事件，其中包括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对苏共的理论权威地位提出挑战和苏联撤走专家破坏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

然而，中国暂时还保持了区别轻重缓急的判断能力。主要敌人仍然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这是陈毅1960年8月1日在外交事务会议上讲话的内容<sup>⑯</sup>。大概就是在这个场合，陈毅私下承认（中国决不会在同年与莫斯科辩论时公开承认）：一些美国领导人意识到有缓和紧张关系的需要<sup>⑰</sup>。陈的态度是中国当然想和平共处，但目的是利用它来消灭帝国主义，就象帝国主义希望用它来消灭社会主义一样。<sup>⑱</sup>

## 第十节 莫斯科会议

9月10日，中共正式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上散发的通知书作出答复。中国的信包括解决争论的五项建议：苏共和中共团结的思想基础应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1957年莫斯科宣言；共产

党国家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平等、友好和国际主义的基础上；中共和苏共应当“充分协商、从容讨论”所有有争论的问题，“必要时”这些观点应提交给其它党；可能破坏团结和帮助敌人的行动应当避免。共产党应当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一块协商以便在11月莫斯科会议上产生一个把它们作为共同纲领的文件<sup>⑨</sup>。中国拒绝了据说是俄国人提出的把共产党内实行的民主集中制运用到共产党之间的建议：

……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究竟谁是谁非的问题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以谁是多数来判断。真理毕竟是真理，谬误不能因为暂时的多数而变成真理，真理也不会因为暂时的少数变成谬误。<sup>⑩</sup>

284 根据其它报道，正是在这封长信中，中国首次把争论追溯到苏共二十大。在这个会上苏联不经协商就否定斯大林的积极作用，提出和平过渡的理论。中国也利用这个机会透露1956年他们曾劝阻俄国人不要在波兰使用武力，但赞成其在匈牙利使用武力。这封信还向俄国人追述了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的分歧和毛在宣言签字前曾坚持的修改。在很大程度上，这封信是企图把争论恢复到《列宁主义万岁》提出的基本思想原则上去，不过中间也有一段小小的插曲。赫鲁晓夫曾取笑毛把美国描绘成“纸老虎”，但中国的信指出，列宁自己曾说过“英法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这个论点如此被证明站得住脚，以致最后在1962年12月《真理报》不得不撰文阐明纸老虎与泥足巨人的差别！<sup>⑪</sup>）

这封信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莫斯科代表团与以苏联最高理论家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9月10至22日进行的严厉而无效果的讨论的概要<sup>⑫</sup>。促使中国不妥协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得知赫鲁晓夫8月间曾企图唆使阿尔巴尼亚加入反华集团<sup>⑬</sup>。此后，中

国人很明显先是回去了，然后又回来参加10月1日开始的26党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为与庆祝1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时间一致的世界共产党会议起草一个宣言。

这个筹备会开到10月20日<sup>⑮</sup>。在宣言草案的一系列观点上达到了一致，但一些重大问题仍没有解决<sup>⑯</sup>。中国人在阿尔巴尼亚和印度尼西亚党的支持下反对苏联关于“个人崇拜”的理论，很清楚它能用来作为反对毛和它的最初目标斯大林的武器。中国在大多数党的支持下——日本、朝鲜、印尼、越南和澳大利亚——反对在最后文件中对“分裂”活动的任何攻击（所谓分裂活动，很清楚是指象在世界工联会上中国宣传他们的观点一类的事情）。<sup>⑰</sup>

285 当赫鲁晓夫从纽约的联合国大会返回苏联时，甚至这个有限的协议也遭到了破坏。他坚持要废除一些已经苦心拟出的协议<sup>⑱</sup>。而当苏联领导人在结束预备会议的宴会上与中国党的总书记针锋相对地交换意见时<sup>⑲</sup>，气氛则进一步恶化了。这样，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八十七个党的81位领导人在随后的一个月云集莫斯科时，他们所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即产生一个具有一致性的文件，前两个小型的会议未能就这个文件达成一致的意见。

中国代表团的阵容是强有力的。毛在那种使他容易丢脸<sup>⑳</sup>的情形下倾向于小心谨慎，代表团的团长由刘少奇担任，尽管他的许多家庭问题与苏联有牵扯。1960年10月，刘少奇夫人的兄弟叛逃到苏联去了<sup>㉑</sup>。同年，刘的一个儿子刘允斌与他的苏联妻子离婚<sup>㉒</sup>；另一个儿子刘允若于6月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国后，对中国的条件表示不满，说他正在与一位俄国姑娘恋爱并打算去苏联看望她，他甚至要求和父亲同路去莫斯科。为了避免在机场发生难堪的事件，刘禁止他的家人到机场去为他送行。<sup>㉓</sup>

陪同刘前往苏联的人大都是在前几年中苏对抗中高举中国意识形态红旗的人。他们是邓小平、彭真和康生。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是代表团中一个出人意料的成员，而宣传部长陆定一是

代表团中的一员则是预料之中的事。代表团的成员中还有，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他还是北京的一位主要的“日本问题专家”。中国工会主席刘宁一。他们两人都在国际性的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做过大量工作。从这也可以看出，北京已经意识到在莫斯科需要对那些在野的共产党，特别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做大量的工作。总之，代表团成员中有4名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两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5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sup>⑭</sup>

286 中国代表团是仅有的5个不由其最高领导人率领的代表团中的一个。尽管来参加会议的都是世界上的老资格的共产主义者，大多数与会的代表团还是受到了俄国人的怀疑，在不开会的时候，尽量把他们限制在住房以内，明显地是为了阻止第三者讨论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争论。正如在布加勒斯特那样，苏联共产党的密使们在双边基础上极力游说那些兄弟党的代表。<sup>⑮</sup>

所有的代表团都收到了俄国人散发的声明草案的副本。草案说明了在预备会议上要达成的协议的范围，还附有苏联主要的政治理论家苏斯洛夫对一些主要分歧——特别是有关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以及个人崇拜等等条文的分歧——的评论。在会议开始前几天，苏联共产党散发了一封长达127页的信，该信写于11月5日，是对中国共产党9月10日来信的答复。在这封信中，俄国人极力反驳中国人对它们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赫鲁晓夫本人的攻击。<sup>⑯</sup>

大会是在克林姆林宫的圣乔治大厅中举行的，从11月25日起开会，其中只有星期天休会。会议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2点，两小时休息后，继续开会直到晚上。会议大部分的时间被那些小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并非总是中肯的发言所占据，他们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人物面前出点风头<sup>⑰</sup>。总之，108个代表团在33次会议上发表了演讲。<sup>⑱</sup>

赫鲁晓夫正式拉开了辩论的帷幕，并以克制的态度重申了苏



联的立场。然后，苏斯洛夫介绍了声明草案，声称这个草案如能作为大会讨论的基础文件就是成就。但是，这种讲道理的辩论气氛很快消逝。一些在野的共产党，其中大部分是来自第三世界，立即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进行攻击，使中国人处于明显的不利境地，因为中国人本来把这些代表团看成是自己的支持者。<sup>①7</sup>

据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说，大会的主要议题关系到当今这个时代的性质，如战争与和平问题，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准则问题<sup>①8</sup>。11月14日，在大会期间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的邓小平以严厉的措词回敬了那些对他的党的立场的攻击。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他声明，中国人从来没有认为世界大战或其它任何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认为帝国主义的存在增加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甚至是核战争，共产党人有责任进行反抗。大国关于裁军的对话令人们感到迷惑；而和平共处只能是共产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方面。<sup>①9</sup>

在谈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时，邓再次强调了中国人的观点，即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以印度为例，邓争辩道，在印度，资产阶级领导人是如何倾向于滑向右翼并向帝国主义靠拢的<sup>②0</sup>。尽管如此，邓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并不反对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所有决议<sup>②1</sup>。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准则问题时，邓再次提出了曾隐含在公开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中的挑战；苏联共产党无权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定行为规范。邓提问说：

以[少数服从多数]这样一条组织原则为名，使自己凌驾于各国党之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依据的是什么样的超级党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通过了这样的党章？<sup>②2</sup>



尽管邓拼命地捍卫中国共产党为它的观点进行申辩的权力，中国代表团仍然强烈地表示赞同维护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俄国人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由于毛的坚持而同意扮演这个角色，但是在1960年的会议上，俄国人放弃了这个角色。他们也许预计中国人希望有一天接替苏联人扮演这个角色。<sup>⑭</sup>

288 邓发言后的第二天，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企图把这种挑战说成是分裂主义。他明确地指出，“如果搞小集团或派别，那么就不再会有一个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sup>⑮</sup>。中国人把对正在讨论的问题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混同于在大多数的党反对他们的观点后仍然散布他们错误观点的权力”<sup>⑯</sup>。多列士正面提出了一个给苏联共产党的支持者们的难题，这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引用列宁的话而带出的准确判定当今时代的性质的问题。他问道，“我们当今的世界难道仍然是列宁在写他论帝国主义的杰出著作时所面临的世界吗？”他的回答是一个肯定的“不”字。其理由是，列宁的时代并不存在共产党国家；而现在，帝国主义不仅受到全面发展的苏联和强大的共产主义阵营的挑战，而且面临以前为其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的挑战。当今的时代不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是帝国主义分崩离析的时代，是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代，是建立和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

不去注视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而坚持列宁半个世纪前的定义，继续认为帝国主义是决定性的力量，这就丧失了思维的现实性，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sup>⑰</sup>

多列士的语调中带有一种傲慢的肯定，他知道他能够向一个颇有威望的对手挑战是因为他站在胜利者一边。到那时为止他并

没有使用诽谤的手段，但是在阿尔巴尼亚党的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在11月6日进行反苏的谩骂之后，苏联的支持者们有了一个可以发泄满腔怒火的替代的靶子，他们认为反对阿尔巴尼亚也就是反对中国。霍查在大会开始的时候挫败了苏联人想把他拉过去的企图<sup>⑧</sup>，随之对赫鲁晓夫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谴责他欺骗和愚蠢的行为，指责苏联企图利用阿尔巴尼亚的自然灾害使阿尔巴尼亚的党就范。霍查指出“当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挨饿的时候，苏联的老鼠却有得吃。而苏联供应阿尔巴尼亚的一点粮食还得用黄金购买。”<sup>⑨</sup>霍查的讲话被波兰党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形容为“令人作呕的，可耻的，恶棍般的不负责任的攻击。”<sup>⑩</sup>意大利党的代表团领导人隆哥声称，“我们无法用适当的语言谴责”霍查的指责和批评，不过，我们尽力充分地谴责了阿尔巴尼亚。霍查的言行简直是“不屑一顾的”。霍查使用了“欺骗”的手段。“对我们大家来说，阿尔巴尼亚代表的行动越是用友谊和兄弟般的情谊等等圆滑的保证加以伪装，越是令人作呕。他们使用的形容词和一般措词，人们可以想象只适用于阶级敌人。”<sup>⑪</sup>

但是隆哥最关心的大概是捍卫赫鲁晓夫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理论，因为这是意大利共产党政策的核心所在：

289

我们的中国同志让我们向他们证明有哪一个国家用这种方式取得了进展。我们充满信心地回答说，我们自己的PCI就一直以这种信念为指南，它非常适合意大利的形势，到目前为止，它无疑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在我们最近的两次大会上……我们准确地确定了我们所认为的民主方式，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一种群众民主斗争的方式，通过改变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关系以达到改变议会和使国家的政治领导权力平衡的目的。<sup>⑫</sup>

隆哥坚决地捍卫意大利共产党的路线的举动，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所面临的问题。一些——也许有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对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进行挑战感到津津有味，这对他们来说是想做也做不到的。但是，大多数非执政的共产党都困于国内的形势，而那里的形势比较接近赫鲁晓夫的分析而不是毛的观点。赞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以及它那满不在乎的强硬姿态，将意味着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自杀。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将没有希望赢得同盟者，不管他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推理多么纯净。

也许由于认识到争辩的无用，邓才在11月24日他的第二次发言中对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据邓说，苏联党的第一书记在他的大多数的发言中都间接地攻击了毛，“他显然不了解毛泽东说的是什么，这是他的惯伎”<sup>⑩</sup>。邓大概觉得不必象他在第一次发言中所作的那样过分详细地捍卫主席<sup>⑪</sup>。至于哥穆尔卡——他曾间接地指责中国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分裂主义者，宗派主义分子，托派分子和分裂论者<sup>⑫</sup>——邓说，他用“他那猥亵的攻击污辱了阿尔巴尼亚。”<sup>⑬</sup>

中国党的总书记的第二次发言是大会的最后两天中发生的主要事件。在长时间乏味的会议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十分激动人心的事件和没有预料到的有趣插曲<sup>⑭</sup>。但是，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主要观点上都不肯让步。问题在于，能否为了维持表面的团结而拼凑出一份妥协的文件？

290

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在北京的毛及其同事们，相互之间在战术问题上也许存在着分歧。当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如果苏联共产党拒绝去掉大会宣言中中国不愿接受的观点，中国该怎么办的时候，刘少奇倾向于签署最后宣言并同时发表一份解释性声明。毛打电报给代表团，要求他们为去掉文件中那些令人不快的内容而斗争<sup>⑮</sup>，只要不导致关系破裂即可。不管怎样，

甚至那些文化革命中带有偏见的积极分子，也没有说代表团准备迁就苏联共产党，或者毛宁愿与苏联决裂，不愿签署宣言。

尽管中国人公开地坚持己见，他们——包括毛在内，还是倾向于认为，如果在当时那个阶段以至以后几个世纪招致分裂主义的公愤，将不利于中国人的革命事业。大会表决的结果存在分歧，中国人处于极少数地位，只有几个党给予他们全力支持<sup>②8</sup>。其他代表团，特别是印度代表团向刘少奇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逼他们作出让步。因此，中国人表示，只要能考虑中国方面的意见，对苏联人一手炮制的一些条文做确实修改——主要是删除对分裂主义的谴责，中国代表团将同意在大会结束时的会议宣言上签字。但是，在宣言签字的时候，刘少奇声称他仍然不同意其中的某些条款，即他原来未提出过的有关策略问题的部分<sup>②9</sup>。从晚些时候中国的一个报道可以看出，中国代表团不得不做出一些类似于毛3年前作出的让步：在宣言中保留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在大会期间，对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条文进行了修改，并加劲对个人崇拜进行谴责<sup>③0</sup>）和对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评价<sup>③1</sup>。主要的分歧在于，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坚持在1960年的宣言中对谴责个人崇拜的问题应有具体、正面的陈述，而这在1957年的宣言中是没有的<sup>③2</sup>。彭真明显是起草委员会中主要的中国代表，他最终得到指示接受了这一条款，为文化大革命中对他、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攻击提供了把柄<sup>③3</sup>。当俄国人可能为了影射毛而坚持这一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没有得到主席的授权就接受俄国人的要求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  
291 毛如果责备刘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作出了使他难堪的让步的话，他就不可能去机场欢迎他们归来。<sup>③4</sup>

在克里姆林宫内长达两个星期的争论所涉及的其它主要问题上，对苏联人提出的每个条文，中国人都相应地补充了附录。<sup>③5</sup>这意味着，各方都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旨解释宣言。条文的一

致性以及统一行动的计划性让位于表面的休战，它持续了不到一年。

但是此刻双方都保持了表面的礼仪。苏联领导人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愉快地拥抱在一起照像留念，俄国人微笑着，而中国人大多面无表情，虽然后来证明只有中国领导人乐意让他们的人民看到这表示兄弟般友谊的“迹象”。<sup>⑤</sup>

在宣言上签字以后，刘少奇作了一次短期的友好访问，到了明斯克和基辅。陈毅在12月14日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到，目前的重点是进行反对美国的斗争而不是与俄国分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威望必须得到支持<sup>⑥</sup>。在争论已接近分裂边缘的情况下，中国人似乎极想表明其致力于中苏友好关系的愿望。如果北京希望在以后的论战中得到更多的盟友，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让别人看起来要有很诚实地赞成与苏联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形象，只是由于苏联的错误和攻击，才导致对抗的出现。

回顾1959年早秋的那段时期，就可看出许多使中苏论战转变成全面分裂的主要原因。由于在中印边界争端中苏联人所采取的态度以及莫斯科因对美国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而忽略了中国的利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才被激发出来。中国人由于向苏联人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定行为规范的权力进行挑战从而激怒了苏联领导人。双方都认为对方背叛了自己，对俄国人来说，是中国人世界工会联合会会议上的所作所为，损害了苏联；对中国人来说，是俄国人从中国撤走了所有的苏联专家。

292 1959年至1960年中苏论战中有两个因素值得特别注意，这是因为它对最终导致中国文化革命发生的那些国内事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赫鲁晓夫的作用。他的苏联同事们在多数时间内似乎听任他为所欲为<sup>⑦</sup>，所以苏联第一书记放肆的态度以及他那带有侮辱性的谈话标志着整个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以及对毛个人的态度，从而加剧了中苏在关键时刻的争吵——1959年9、

10月份在北京，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以及1960年11月在莫斯科。

中国人逐渐地觉察到赫鲁晓夫这个人——他的政策、态度、行为——是中苏争吵的基本原因。据说，刘少奇在八十一党会议闭幕时会见赫鲁晓夫时甚至向他建议，他作为苏联领导人应退出处理中苏问题的第一线，以便空出余地来改善两党关系<sup>②</sup>。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在1964年下台时，中国人会作最后一次尝试看中苏关系能否得到挽救。虽然到那时，北京在论战中已谴责了整个苏联的制度。相当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的作用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早在60年代初毛泽东就逐渐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领导的本质以及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性发生兴趣。这种兴趣，正象我们在以后所看到的那样<sup>③</sup>，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把论战提到了思想意识高度。这当然使论战升了级，并使莫斯科和北京更加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当争论越来越激烈时，中国人就会合乎逻辑地、也是不可避免地将他们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实质性分析进一步扩展到对这种错误的根源的追寻上去。中国人把这种根源说成是苏联社会的堕落<sup>④</sup>，而这使毛思索它在中国会产生的后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解决问题的方案。

#### 注释：

1. 引自赫德逊、罗文泰尔、麦克法夸尔：《中苏论战》，第58页。
2.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263页。
3. 麦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76—80页。以下三个段落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依据该书第67—134页的内容。
4. 印度发现中国的道路横跨阿克赛钦，但双方都保守两国总理随后相互通信的秘密。同上，见第116页。
5. 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1963—1967年》，第114页。



6. 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 1945—1970年》, 第157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7. 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 1963—1967年》, 第327页。
8. 同上。
9. 同上, 第112页。
10. 《赫鲁晓夫回忆录: 最后的遗言》, 第368—375页。
11. 参见老练的观察家埃德沃尔特·克兰克肖对苏联情况的分析:《新的冷战: 莫斯科与北京》, 第84—85页。
12. 引自同上书, 第85页。
13. 按赫鲁晓夫对塔斯社声明的发表时间的错误回忆(故意的?), 这个声明是在他去美国访问以后才发表的。同上, 见第307页。
14. 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 1963—1967年》, 第114页。9月8日晚, 周的信交给了印度驻北京的大使; 尼赫鲁于9月9日晚收到这封信(见《政治家》〈加尔各答〉, 9月10日)。9月9日格林威治时间10时20分, 即北京时间下午6时20分, 新德里时间下午3时50分, 中国用英语(显然这是第一次)向欧洲广播了这封信。见《国外广播新闻—远东—126》第AAA1页。假使《政治家》的报道是正确的, 那似乎意味着欧洲人在尼赫鲁先生有机会读信以前, 就获悉了此信的内容。
15. 《人民日报》1959年5月6日, 转载于《当代背景》第570号第2—16页。
16. 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 1963—1967年》。周的信是在格林威治时间10:20播送的, 塔斯社的声明是在格林威治时间16:00播送的(《国外广播新闻——苏联和东欧——177》〈1959年〉第BB1页)。
17. 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 1945—1970》, 第158页。这一引语没加注释, 但可能来自中国给莫斯科的一份照会, 因为北京当时实际上没有发表公开声明。
18. 《纽约时报》1959年9月17日。
19. 《总统公报》“D. D. 艾森豪威尔, 1959年”, 第670—671页。
20. 同上, 第697页。
21. 《纽约时报》1959年10月7日。
22. 同上, 1959年11月1日。
23. 赫德逊、罗文泰尔、麦克法夸尔:《中苏论战》, 第58页。



24. 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 1963—1967年》, 第332页。
25. 《赫鲁晓夫回忆录: 最后的遗言》, 第308页。
26. 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 1963—1967年》, 第114页。
27. 1959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没有出席(几个月后他将在中苏论战中起重大作用), 可能是由于他的腿有了毛病, 虽然他的确参加了10月1日的国庆检阅。或许他当时正陪伴在京参加庆祝活动的其他重要人物。
28. 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 1963—1967年》, 第114—115页。
29. 《赫鲁晓夫回忆录: 最后的遗言》, 第308页。
30. 有关与赫鲁晓夫打过交道的人对他的辩论技能的评论, 参看尼克松《六个关头》第250—271页。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同红卫兵的激烈对抗中, 陈毅的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例子参见《陈毅讲话集》, 转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636号第28页。
31. 《赫鲁晓夫回忆录: 最后的遗言》, 第308—309页。如果赫鲁晓夫的报告是正确的, 那就不清楚陈毅在谈到英国占领问题时, 是否只是指英国人通过绘制地图“夺取”了麦克马洪线划出的地段或者阿克赛钦, 参见麦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26—36页。
32. 《赫鲁晓夫回忆录: 最后的遗言》, 第308页。
33. 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 1963—1967年》第115页。
34. 塔特:《克里姆林宫的权力: 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 第46页。
35. 《赫鲁晓夫回忆录: 最后的遗言》, 第311页。
36. 同上, 第255页、260—261页。
37. 同上, 第269—270页。
38. 同上, 第283页。
39. 同上, 第271—275页。
40. 同上, 第275—278页。有关保加利亚“跃进”的讨论, 参见利利阿那·布里斯比《保加利亚: 没有公社的跃进》, 载《中国季刊》1960年7—9月号第80—84页。有关对东德、匈牙利和波兰对当时中国发展情况的反应的评论, 参见马汀·艾斯林《东德: 北京——潘科轴心?》, 塔马斯·阿克泽尔《匈牙利: 南京传来的喜讯》, 里奥波尔德·拉波茨:《波兰: 跃进的斜路》, 以及同上赫鲁晓夫著作第85—103页。

41. 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 1963—1967年》第117页。
42. 同上, 第118—119页。在北京的公开场合中, 赫鲁晓夫甚至不提通过和平途径或武力方式解放台湾, 只是重申需要把国民党政府从其在联合国占据的席位上赶走, 参见A·M·哈尔彭:《共产主义中国与和平共处》, 载《中国季刊》1960年7—9月号第18页。
43. 参见本书第1卷, 第316—317页。
44. 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 1963—1967年》, 第118页。
45. 195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46.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 莫斯科与北京》, 第87页。
47. 利伯瑟:《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 1949—1975年》, 第155—157页。
48. 哈尔彭:《共产主义中国》, 第18—20页。
49. 引自上书第20—21页。
50. 引自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 第244页。
51. 同上, 第281—283页。
52. 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 第110—111页。
53. 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 第270—272页。
54. 同上, 第273页。
55. 同上, 第284—286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一个红卫兵出版物声称, 参加匈牙利党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谭震林赞成赫鲁晓夫关于世界形势的观点。事实上, 谭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动议只表示了通常的中国礼貌, 而且, 在“但是”之后, 他说了更多的话, 即说明由于美帝国主义的行动, 这些动议将是无法实现的, 参见《关于谭震林问题的初步综合材料(速记)》第114号第13—14页中的引语, 《新华半月刊》1959年24号第149—150页的全部文字。
56.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 莫斯科与北京》, 第91页。
57. 见陈毅1959年12月27日在一个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东方红战报》第45期(1967年6月15日)第4页。陈毅也承认, 赫鲁晓夫在一些事情上可能是对的(同上, 见第40期)。
58. 《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论摘编》(“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批刘邓第一支队”, 1967年4月), 第60页。

59. 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第288—290页;哈尔彭:《共产主义中国与和平共处》,载《中国季刊》1960年7—9月号第21页。
60. 引自《当代背景》619号第6页。另参见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第290—292页;哈尔彭:《共产主义中国与和平共处》,载《中国季刊》1960年7—9月号第21页。
61.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91页。
62. 《刘少奇材料汇编》(第1集),第112页。当时刘正在同他妻兄王光英的家人谈话。
63. 关于这个谜的简略论述,参见赫德逊、罗文泰尔、麦克法夸尔:《中苏论战》第58—59页。
64. 参见上书。另外,关于中国人宣布中国代表团离开的背景,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192号第44页。
65. 30年代康生在莫斯科度过了大约4年时光,伍修权从1926年到1931年也生活在莫斯科。参见科林和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关于他们的条目。
66.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指控伍修权在参加华沙条约会议时未能报告赫鲁晓夫对毛的谩骂,见《红卫战报》1967年4月13日第4页第2栏。如果赫鲁晓夫的谩骂是包含在他的讲话中——据说这些话是“公开的”——,那就弄不清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指控,因为这种指控也许同样可以针对红卫兵崇拜的英雄之一康生。
67. 赫德逊、罗文泰尔、麦克法夸尔:《中苏论战》,第64页。
68. 下面三个句子中的分析均以上书第59—61页的内容为依据;宣言的正文和康生的讲话也都包含在这本书中,见第63—77页。
69. 其他三条论据是基于这样的设想:创建一个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永久性联合国委员会;签署关于和平使用南极的1959年东西方协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停止进行核试验(同上书,见第60页)。
70. 塔特:《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第46页。
71. 关于所有仪式、消息等的完整报道,载《当代背景》613号。
72. 同上,第21页(刘少奇的祝酒词)、23—24页(朱德的讲话)、25—27页(契尔沃年科的讲词)。
73. 同上,第11—12页。

92.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223号, 第1—5页。
93. 杨格:《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谈判》, 第227页。
94. 《列宁主义万岁》, 载《红旗》1960年第8期, 译载于赫德逊、罗文泰尔、麦克法夸尔:《中苏论战》第82—112页。《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 人民日报编辑部1960年4月22日。于兆力:《帝国主义——现代战争的策源地——与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道路》, 载红旗1960年第7期, 译载于《北京周报》1960年第15期。陆定一在列宁诞辰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载《北京周报》1960年第17期。
95. 引自赫德逊、罗文泰尔、麦克法夸尔:《中苏论战》, 第82页。
96. 这里对《列宁主义万岁》的分析, 是以《中苏论战》中的译文为依据的, 见该书78—81页。
97. 同上, 见第7—8页。
98. 起草人之一是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见吴的自述, 载《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4期第77页。
99. 赫德逊、罗文泰尔、麦克法夸尔:《中苏论战》, 第90页。
100. 同上, 第98页。
101. 同上, 第96—98页。
102. 同上, 第99—110页。
103. 同上, 第99页。
104. 同上, 第100页。
105. 同上, 第107页。
106. 对喀拉拉邦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探讨, 见哈里森《印度: 最危险的几十年》, 第193—199页。
107. 赫德逊、罗文泰尔、麦克法夸尔:《中苏论战》, 第119页。
108. 以下这段话是库西宁对核武器理论的创新:“为了战争目的发明的新式武器却开始对和平产生有利的影响, 这就是军事工程发展的辩证法。”(同上书, 第119页)。
109. 《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摘编》, 第49页。
110. 见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 第320—325页。事件的过程, 见《当代背景》620号和621号。官方对刘长胜讲话的报道, 见赫德逊、罗文泰尔、麦克法夸尔:《中苏论战》第123—126页。

111. 见毛里斯·索尔兹在十一月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载达林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的多极化：文献记录，1961—1963年》第842—843页。
112. 见塔特：《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第104—105页。
113. 事情的梗概，见《纽约时报》索引，1960年，第523—527页。
114. 见赫德逊、罗文泰尔·麦克法夸尔：《中苏论战》第127—131页摘录的两篇文章。
115.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496页。并见塔特：《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第48页。作者标出的日期为5月11日。
116.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9—80页。
117. 赫德逊、罗文泰尔、麦克法夸尔：《中苏论战》，第132—140页。
118.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97—103页。其中有对此信内容的极有价值的长篇叙述。但是由于没有原文，很难判断其价值。
119.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80页。据克兰克肖的《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这次秘密会议开始于6月25日，见该书104页。
120.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04—106页。
121.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80页。有关中国代表在《世界工联》会议上的“托派”行为，见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09页。
122.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07页。也许正是在这个场合下，赫鲁晓夫断言，中国的经济困难应直接归咎于毛的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见《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第3页。赫鲁晓夫对毛的这番抨击没有注明日期，然而彭真转达了这番话这一事实，就足以证实它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说的。
123. 查尔斯：《罢免彭德怀元帅》，载《中国季刊》1961年10—12月号第75页。
124. 《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34页。这一消息来源没有注明赫鲁晓夫说出赞扬彭德怀的那番话的时间。但是，这样一种具有挑衅意味的言辞是与其他一些有关他在布加勒斯特的活动的报道相吻合的，虽然，也不排除他在9个月之前的北京之行中讲这番话的可能。
125.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109页。我只找到了一份文化革命中批判彭真在布加勒斯特的言行的材料，其中说他在申辩反驳时表

现得消极、迟钝，但从所有其他的迹象看，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见《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37页。

126.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109—110页。

127. 同上，第111—112页。

128. 同上，第81页。

129. 塔特：《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第79—80页。

130. 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第327页。塔特：《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第110—111页。

131. 塔特：《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第103—104页。

132. 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第212页。俄国人也查禁了中国人在莫斯科发行的《友谊》杂志，借口是它经常发表倾向性很强的社论。  
同上，见第186页。

133. 《中国百科年鉴》1981年，第563页。

134. 科罗契科：《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65页。

135. 同上，第177—178页。

136. 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第212页。科罗契科的回忆是，中方照会的日期为7月23日至26日之间，见《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178页。

137. 科罗契科：《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178页。

138. 同上，第164—165页。

139. 同上，第122—123页、105—112页、154—156页、159页。

140. 同上，第146—148页。

141. 同上，第152—154页。

142. 同上，第165—169页。

143. 同上，第171—176页，180—181页，190页。

144. 同上，第181—187页。科罗契科尖刻地评论道，契尔沃年科的全部抱怨中隐藏着的不满，是中国再也不做莫斯科的驯服工具。同上，见第186页。中国人对撤走专家一事立即作出反应，停止派代表团出席8月9日至1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学专家大会。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专家大会》，载《中国季刊》1960年10—12月号第114—116页。

145. 科罗契科:《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188—190页。
146. 同上,第187—188页。
147. 同上,第179—187页。科罗契科的个人观点并不具有代表性。他对苏联的制度不抱什么幻想,在结束了中国的专家生活之后便在加拿大寻求政治避难。因此,他未必会象许多苏联人那样对同北京论战抱有民族情绪。不过,他的著作的主题说明,他是如实地转述了他的那些科学家同事们的看法。
148. 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1963—1967年》,第139页。
149. 同上,第140页。
150. 《人民的好总理》(第2辑),第245—246页,249页。另见《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文选》,第82页。
151. 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1963—1967年》,第140页。
152. 见《两条路线斗争史》,载《农业机械技术》1968年第9期,转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633号第25页。《刘少奇生平大事》(1899—1967),见《当代背景》834号第211页。
153. 科罗契科:《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178—179页。
154. 《八·一三红卫兵》,1967年4月7日第4版,第3—4栏。
155. 《东方红战报》第36号(1967年6月15日,第3版。
156. 《文革风云》1967年第9期,第38页。据说,刘少奇在某一年的年初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美国的目的是战争,而是要占领中间地带,见《外事红旗》1967年6月14日第2版第2栏。
157. 《文革风云》1967年第9期,第42页,该评论的落款日期为7月30日。
158.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84页,113—114页。
159. 同上,第337页。
160.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13—114页。
161. 《中国百科年鉴》1981年,第563页。
162. 威廉·E·格里菲思:《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初步的重组》,载《中国季刊》1962年7—9月号第47页。
163. 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第186—187页。参加草案起草会议的各党的情况,见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15页。
164.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84—85页。格里菲思:《1960



- 年11月莫斯科会议：初步的重组》(《中国季刊》1962年7—9月号第40页)。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16—117页。
165.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20页。
166.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85页。
167.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17页。
168. 格里菲思：《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初步重组》(《中国季刊》1962年7—9月号第48页)。文章提到，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没有出席会议是由于他小心翼翼，不愿卷入这种“危机四伏的国际会议”。
169. 关于刘少奇夫人的妹夫张凡(音)叛国的详细情况至今仍不很清楚。张凡是1952年同王光桦(音)结婚的，1955年到苏联留学。1960年他在那里“背叛”了他的国家。到了1962年，尽管北京提出了正式抗议，苏联当局还是拒绝遣送张凡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理由是他们已经要求政治避难。见《从张凡的叛国立场看刘少奇的背叛嘴脸》，载《千钧棒》。1967年4月第2期，译载于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第41卷第858号第78—82页。
170. 《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38页。据另一份材料说，首先是刘的儿子和其妻子在1959年分居了，这是中苏关系紧张的直接结果，见《刘少奇生平大事记》，载《当代背景》834号第19页。刘的这个儿子刘允斌是刘的前妻所生，她在30年代被杀害了。为了安全起见，允斌和他的弟弟、妹妹被送往苏联。1957年回国时，他大约32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死。见刘爱琴《女儿的怀念》一节对她哥哥的追述，该书第18页、24页、66页、92页。
171. 《呐喊战报》1968年2月号，译载于《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140号第4—5页。刘允斌的弟弟刘允若未能完成学业就回国了，也许他日益增长的对苏联的同情被北京察觉了，因此决定召他回国，以免这位国家元首的儿子在两个共产党大国公开分裂时站到错误的方面去，而且，不管怎么说允若也一直是他父亲关切的对象。同上，见第5—15页。另见：《红旗飘飘》第20辑，第127—138页；《怀念刘少奇同志》，第363—371页，刘本人在莫斯科留学时的情况，见该书第83—89页。
172. 赫德逊、罗文泰尔、麦克法夸尔：《中苏论战》，第157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376号，第27—32页；2377号，第38—40页。

173.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18页。
174. 同上,第119—121页。
175. 同上,第122页。
176. 同上,第118页。
177. 同上,第123—124页。
178. 格里菲思:《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初步的重组》,载《中国季刊》1962年7—9月号第40页。
179. 同上,第43—44页。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25—126页。
180.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26—127页。
181. 《彻底清算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中央统战部‘红色联络站’和‘东方红公社’资料组”编,1967年2月4日,第7页。这份材料并不说明邓的那番话是在两次讲话中的哪一次讲的,只说明他在会议中讲了什么话。另一份材料则说,在11月14日的发言里,邓提倡在阶级斗争中搞人道主义,见《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论摘编》第16页。
182.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338页。书中不认为这段话是邓讲的,而认为是中共代表团的意见。但是从另一些地方引的邓关于同一主题的一段言论(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28—129页;格里菲思:《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初步的重组》,《中国季刊》1962年7—9月号第44页)与这段引文完全相同,证实了这段话确实出自邓的发言。
183. 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第346—347页,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28—129页。这年9月,陈毅对外国友人说,只有苏联能够领导这个阵营,见《东方红战报》第39号(1967年6月15日)第3版。
184. 达林主编:《国际共产主义的多极化:文献记录,1961—1963年》,第841页。在该书830页上提到了索尔兹发言的日期。
185. 同上,第842页。
186. 同上,第832页。
187. 格里菲思:《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初步的重组》,见《中国季刊》1962

年7—9月号第46页。

188.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31—132页。
189. 同上,第113页。
190. 达林主编:《国际共产主义多极化:文献记录,1961—1963年》,第848—850页。
191. 同上,第855页。
192.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33页。
193. 同上,第128页。
194. 同上,第132—133页。
195. 同上,第133页。
196. 这次大会的一位参加者告诉我,就在彭真对赫鲁晓夫猛烈抨击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令人发笑的插曲。彭真与赫鲁晓夫面对面而坐。彭的翻译,一位中国人用同样激昂的语气把彭的那篇檄文译成俄语。于是,赫鲁晓夫用不寻常的柔和语气请求彭不要让他(赫鲁晓夫)大声喊叫。
197. 见吴冷西的检讨,载《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4期第78页。
198.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34页。其中说中国共产党只得到阿尔巴尼亚、缅甸、马来亚和澳大利亚党的支持。吉廷斯在《中苏论战之概观,1963—1967年》第146页提到:“亚洲党(除印度)都倾向中国方面,不过印度尼西亚、北朝鲜和北越代表团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中立的立场,尽管它们也具有亲华的色彩。”
199. 赫德逊、罗文泰尔、麦克法夸尔:《中苏论战》,第174页。
200. 见本书第1卷第4章,该章论述了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关于1957年毛在莫斯科的让步,见该书第1章。
201. 中国承认他们已被迫接受这些观点,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87—88页。
202. 赫德逊、罗文泰尔、麦克法夸尔:《中苏论战》第202页。
203.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4期,第78页。
204. 《当代背景》34号,第19页。
205. 中国方面在声明的最后修正本中所说的“胜利”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86—87页。关于外界对(共产党阵营的)平衡在莫斯

科被打破一事的评论，见赫德逊、罗文泰尔、麦克法夸尔：《中苏论战》第174—176页（上述声明本身也被收录在该书第177—205页中），格里菲斯：《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第54—56页，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第343—369页，吉廷斯：《中苏论战之概观，1963—1967年》第145—146页。

206. 表现中苏友谊的照片共6页曾在中国杂志《人民画报》1961年第1期上刊登，并在《中国季刊》1961年1—3月号转载。照片上有赫鲁晓夫、科佐罗夫(KOZLOV)、苏斯洛夫、米高扬、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人。

207. 《东方红战报》第37号（1967年6月15日）第3版，第41号第4版。这些引文的第二段认为，陈毅讲话的时间应当是8月4日，而不是12月14日。除非在这一前一后的日期中召开过两次完全相同的会议，是后者的可能性才比较大。

208. 塔特：《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第105页。

209.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4期，第78—79页。

210. 见将要出版的本书第3卷。

211.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415—480页。

## 大跃进的终止

---

### 第一节 刘少奇的海南研讨班

1961年初,毛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在1960年,由于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中苏论战,因而妨碍了他们对国内事务的充分注意<sup>①</sup>。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宣传工作者要为新一轮同俄国人的论战做准备<sup>②</sup>,只好把重要的国内事务搁在一边。在1960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六次会议专门讨论国际事务,其他一些中央会议的主要议题大概也是如此<sup>③</sup>。党的书记处的两位负责官员,邓小平和彭真,从6月到12月初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参加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其间回到北京时,他们的主要事情大概也是与同事们磋商中苏争论。有四分之一的政治局成员留在莫斯科参加长达1个月的81党会议。<sup>④</sup>

讲是不公正的<sup>①</sup>。薛显然已经受贬，如果他的错误是与“右倾机会主义”有牵连的政治错误的话，那么刘邀请他去海南的举动便是非同寻常的。不管怎样，有一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所断言的刘和薛当时是在蓄谋策划一项反毛的经济计划。在当时，刘完全有理由争取保持毛对他刚刚取得的高位的支持<sup>②</sup>。看来，刘用了一个月听取薛的观点，这对他在大跃进结束后为摆脱严重经济危机而改变路线是有益的。

研讨班开始于11月10日<sup>③</sup>，刘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刘将学习比作“逆水行舟，不进则退”<sup>④</sup>，并在海南每每工作到凌晨。当他发现护士在等着为他治疗的时候，便建议护士按正常时间就寝，直到他准备放下书本时，再让警卫叫醒护士。就是在治疗过程中，他也还是要读书。<sup>⑤</sup>

295 遗憾的是，我们所见到的有关海南研讨班的材料，谈的尽是刘的道德品质，而不是他的思想发展。我们获悉，刘在11月24日度过61岁生日时，曾经生气地拒绝了特地为他准备的食物和蛋糕<sup>⑥</sup>，因为党中央作出过不许为政治局成员祝寿的决定<sup>⑦</sup>。可靠的材料表明，刘少奇在研讨班上表示，不赞成解放初期在干部中实行部分供给制<sup>⑧</sup>。与此同时，毛则仍然热衷于这种免费消费的“供给制”。他认为，这种制度可以消除资产阶级迷恋名利地位的思想，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sup>⑨</sup>

据说，薛暮桥把研讨班的讨论记录分发给孙冶方和其他经济学家。但是，编写一本显然是基于海南会议的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书的打算落空了<sup>⑩</sup>，大概是因为毛正在发表他自己的关于苏联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不管怎么说，文化大革命后出自经济学家们之手的材料表明，刘从这个时期开始强调经济中的现实主义<sup>⑪</sup>。这可能是因为刘自这时起定期请教那些经济学家。<sup>⑫</sup>

刘在海南停留期间，曾经写信给黄炎培。信中讲到，社会主

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经济发展应当成为60年代的主要口号。<sup>②</sup>刘在信中没有说明怎样发展才能成功，不过他明确地期望从前的私营工商业经营者将能够发挥重要作用。<sup>③</sup>

## 第二节 毛的经济研究

差不多与刘在海南举办研讨班同时，毛自己也正在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行研究<sup>④</sup>。对苏联当前在暴力革命、和平过渡和战争的论点所作的尖锐批评，在毛的读书笔记中随处可见，这些批评将在纪念列宁的论战文章中予以披露<sup>⑤</sup>。读书笔记的大部分内容反映出毛试图摆脱这本正统苏联的教科书的束缚，提出自己的经济思想，以引导同事们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中国道路是毛同他的同事们一道披荆斩棘闯出来的。

296 毛着重强调对苏联模式的不满和与苏联模式的不同之处：在建国初期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不得不全盘照搬苏联的办法，尽管我们对此从未感到完全满意。<sup>⑥</sup>

苏联的经济学观点认为，每一个旧的经济阶段的结束和新的经济阶段的开始，都是界限分明的。针对这种僵化的、绝对的关于经济阶段的看法，毛提出了世界处于永恒的流动变化中的观点：

“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105页)，“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许多不同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了，……<sup>⑦</sup>(着重号是我加的)



毛将关于发展变化的基本观点与经济发展相联系，指出：“这本教科书中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都没有，这是不能设想的。任何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sup>②</sup>毛在写到他很得意的题目时，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可能的，但是，发展总是不平衡的：

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普遍的规律。这个普遍规律难道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么？应当说，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适用这个规律。矛盾、斗争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计划工作中的各种平衡，也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sup>③</sup>

这是一种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毛能够镇静地看待大跃进进程中的来潮和落潮。正如人们可能想到的那样，毛的读书笔记中的许多处评论，反映了庐山以后、大跃进以前的激进情绪，而不是毛在1959年上半年所抱有的比较保守的观点。中国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完成工业化<sup>④</sup>，但是与此同时，毛似乎显得对怎样实现这一点还不甚了了<sup>⑤</sup>。在另外一段话里，毛坚定地强调，如果我们想赶上并超过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我们就必须提出高速前进的计划<sup>⑥</sup>。人民公社是人民创造出来的<sup>⑦</sup>，理应加以推广<sup>⑧</sup>。热烈的情绪和群众运动——“让人民行动起来”<sup>⑨</sup>——是极为重要的；决不能过份强调物质刺激，否则就“无法击败”资本主义<sup>⑩</sup>。

艰苦奋斗、扩大再生产、共产主义前景——这些是我们所必须强调的，而不应该去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引导人民前进的目标不是“老婆、别墅、汽车、钢琴、电视机。”因为这是一条服务于个人而不是服务于社会的道路。“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若是人们只盯着脚下而无远大理想,那就有问题了:哪里还有革命干劲和革命热情呢?④(着重号是我加的)

毛在1959年春天讲过一句后来家喻户晓的警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当时,毛的这一警句得自于陈云②。毛此时引用这一警句,却不同于1959年4月,他附加了一句大大削弱原句份量的限制语——“而必然并非一下子就可以认识清楚的。”③

毫不奇怪,毛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批评苏联教科书没有强调上层建筑对于促成经济和社会变化的反作用④。更有趣的是,毛在一次关于价值规律的讨论中坦率地承认,彭德怀对群众炼钢运动的批评是对的——群众炼钢运动得不偿失:“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从局部短期来看,大办钢铁好象是吃亏了,但是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局面打开了,……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我们的速度。”⑤

出人意料的是,毛没有谈到当前和长远的政策。然而,与强调优先发展工业的苏联教科书不同,毛反复申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工农业并举”。毛估计,在1960年度,将拿出十分之九的钢材用于重工业、十分之一用于农业⑥。毛还强调了各省份要尽可能自力更生。⑦

298 毛急于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如何处理人口问题。不是如何控制人口增长速度,而是如何处理全国人口中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过高的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相形之下,美国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农村人口。必须在农村建设工业(这肯定是大跃进的一个关键因素),以避免出现城市人口过度拥挤的现象。当时所面临的政策问题是:我们是打算防止农村生活条件劣于城市呢,还是打算保持二者大体相同,或者是打算使农村生活

条件略优于城市<sup>⑧</sup>？只有德高望重的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在这个时候有勇气不顾周恩来对他进行友善的规劝，公开地一再坚持中国的人口规模必须加以控制<sup>⑨</sup>。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却遭到彻底批判<sup>⑩</sup>，他本人也失掉了在北大的位置。<sup>⑪</sup>

不论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有多快，毛在1960年3月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清楚地说明，尽管他的眼光放远了一点，从而更可贵地观察未来，但是他对这个国家所能达到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抱有一些幻想。他推测，到本世纪末，中国钢产量可望达到人均一吨的水平。即便假定从1960年到2000年间人口毫无增长，这也意味着要达到6.5亿吨的钢产量，这是一个完全不现实的数字。他还期望，到2000年时，中国的粮食产量都能达到人均一到两吨左右的水平。即使按照根本不可能的假定——届时人口没有增加，这也意味着要达到6.5亿吨到13亿吨的粮食产量。当时，1958年和1959年所报产量已经被迫压低，据此，毛预测的产量数字是大得令人无法理解的。<sup>⑫</sup>

有一点也许是件幸事。中苏论战的严重危机迫使主席不能日复一日地关心经济问题。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以后的12个月里，主席发布的唯一涉及农业政策的具体指示是一封关于养猪问题的信，此信签发日期是1959年10月11日<sup>⑬</sup>。但是，毛毕竟已经勾画了党在庐山以后所要遵循的总的政策方针。

### 第三节 以农业为基础

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时，毛就强调农业机械化。接着，  
299 他在1959年4月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10年时间。4年以内小解决，7年以内中解决，10年以内大解决。”在1959年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主要是改良农业生产工具和实行半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每个省、地区和县都应当建立

农业生产工具研究站，设计和试验新的农业生产工具<sup>⑧</sup>。随后，在庐山全会上讨论到发展的优先顺序时，毛指示，应当把农业作为整个经济的基础。同时，毛力主设置农业机械部<sup>⑨</sup>，事实上这个部很快就成立起来了，毛最信任的下属之一陈正人负责这个部的工作。<sup>⑩</sup>

10月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积极倡议进行农业技术革新。这个倡议固然出于对谷物和棉花需求增加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大跃进使中国从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变为一个劳动力不足的国家。薄举出河北省一个人民公社的情况为例。这个人民公社在1958年还号称拥有18958名劳动力，但在这一年的秋天，就有2000农民离开这个公社涌进城市的工人队伍。此外还有2000农民离开农业生产岗位转入社办工业，其中一部分人在1959年春天又返回农业生产岗位（可以推测，这是农村群众炼钢运动萎缩的反映），但是这个公社的劳动力仍然不足<sup>⑪</sup>。当然，这只是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导致城市劳动人口的迅速增长。城市劳动人口在1957年为900万，1958年增至2500万，1959年达到2850万。<sup>⑫</sup>

其后，在农业方面保持领导岗位的谭震林，从另一个角度详细阐述了同样一个问题。全国的农业劳动人口，包括全劳力和半劳力，总共是2.3亿人，相当于2亿个全劳力。全国可耕地共有16亿亩，按比例，一个农民有8亩耕地。但是，百分之二十的劳动力要用来搞水利建设，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大约有7000万人参加水利建设。谭还估计，有3000万人要从事副业生产，有500万人投入社办工业，还有1500万人从事福利事业。这样算下来，真正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是农村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五十略强，大约1亿左右，即每个农民平均要种15亩地。如果再考虑到每个农民平均每年工作300天，则用于每亩耕作地的工作日为20天，用于每亩播种地的工作日只有14—15天，这个数字

对于全面贯彻“八字宪法”是远远不够的<sup>⑨</sup>。谭指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实现农业机械化，他再次重申了毛的四、七、十年规划。<sup>⑩</sup>

新任部长陈正人为农业机械化的三个发展阶段的每一阶段布置了具体任务。陈正人首先指出了只有百分之五的耕地使用了机器这一事实。接着他说，农业机械化问题在4年内达到初步解决，包括农业、畜牧业很低程度上的机械化和灌溉排涝工作的“基本”机械化；随着农业机械工业的成长壮大，全国农村有一半可耕地可望实现机械化生产；大约10年内，全国农村将基本上实现机械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电气化。<sup>⑪</sup>

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几个月中，农业机械化政策很快得到认真研究和贯彻落实。但是直到1960年，才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年文章中，宣布了更为基本的政策，即以农业为基础，处理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李富春这篇文章的内容是总结1959年的经济成就，提出1960年的任务。推迟发表这项基本政策的理由，看来是考虑到紧张的干部们正忙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应当避免在这个时候交给他们一项新的重大政策，不管怎样，反右倾运动看来已于1959年底结束，可能是因为领导层感到，1960年的跃进由一个自我教育的正面运动来推动，比由一个反对不同意见、因而会导致许多争议的批判运动来推动更好。除此以外，领导层还可能想到了在推出新的经济政策之前，最好让干部们有个喘息时机，以缓解浮夸的统计数字所造成的思想震荡。<sup>⑫</sup>

301

即使如此，李富春必须阐明以农业为基础是一项“引人注目”的新政策<sup>⑬</sup>。李还指出“某些同志”对这项新政策感到不舒服，他们认为迄今采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要比迅速发展农业更重要。李用若干篇幅来论述农业增长与工业增长的互补性质，并努力消除斯大林式的正统工业化信徒所持的疑虑。<sup>⑭</sup>

李富春在他的文章中宣称，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所要完成的指标，在这个计划的头两年（1958—1959年），已经或者超额完成，因此应当为计划的后3年制定“引人瞩目的具有更高水平”的新指标，但是李并未冒失地对新指标提出具体建议。李还声称，8月份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制定的工业指标已经完成，例如钢产量达到1300万吨，而指标是1200万吨。但是他对农业的评价与此不同，农业遭受了“数百年来不曾遇到的严重自然灾害”，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耕地受到影响。从李的措词方式来看，他似乎暗示1959年谷物产量大概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所定指标2.5亿吨左右，而不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所定2.75亿吨的指标。可是，3个星期后公布的官方统计数字为：2.705亿吨，这与前述第二个指标相差不大<sup>⑥</sup>。不过这些数字都与实际相差甚远，这一事实将在后面几年暴露出来。

特别要指出的是<sup>⑦</sup>，李强调要以高速度按比例的方式来完成1960年的跃进<sup>⑧</sup>。但是，他的文章的标题——《迎接1960年的新跃进》，及其文章主旨，只能促使干部们相信，由庐山会议肯定的大跃进的工作姿态和方法将在新的一年中继续坚持。李着重指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重要性，号召所有重工业部门开展“规模巨大的”基本建设，同时要求所有企业单位继续开展反右倾斗争。<sup>⑨</sup>

李富春撰文重申的大跃进，在文化艺术领域也得到反响。老作家沙汀在他1960年发表的题为《你追我赶》这篇短篇小说里，描述了生产队之间为争得每月一评的放“卫星”奖而展开的热烈竞赛。其实，此类竞赛是一种导致浮夸风的制度，农民们曾对彭德怀反映他们反对这种搞法：

自从开展竞赛以来，人们的干劲愈来愈大，荣誉感也更强了。在月终评比这种规模较大的场合，如果哪一个管理区



评比垮，有的人还特别不好受。今年春天，石门因为在评比中一下从“飞机”垮到“牛车”邓大娘就气得哭过。可是龙唯灵却充满信心鼓励她道：“咋兴哭呵？爬起来又干嘛！……”<sup>②</sup>

石门模范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龙唯灵的话，使人回想起1958年大跃进高潮：

他用洪亮的嗓音不断同干部们谈着下一段的工作计划，满口兵家术语：“据点”、“战线”、“集中火力”等等。他没有打过仗，但他懂得，他们是在同大自然作斗争。自从大跃进以来，实际所有农村干部，几乎都是这样谈庄稼生产的。<sup>③</sup>

现实生产中的龙唯灵们得到更左的省委第一书记们的鼓励，异军突起的河南省的吴芝圃就是这样一位省委第一书记。这些省委第一书记们要使龙唯灵们相信，人民公社要比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大得多的力量，能够“更有效地与自然灾害作斗争、更有效地改造并征服自然”<sup>④</sup>。吴再度成为《红旗》杂志撰稿人这件事本身，就是形势变化的一个信号。吴大概是大跃进高潮时期最为刚愎自用的省委领导，但是他在1959年中也小心谨慎，避而不向党刊投稿，或投了稿也由总编辑陈伯达搁置一边不予刊登。而在1960年，他却在党刊上写了两篇文章。这是他最后的两篇文章，因为庐山以后的时代气氛已经不再欣赏象吴这样的人，他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也由别人接替了。但在1960年1月1日，吴还能夸耀河南的集体主义成就：29.8%的生产队实行免费供给制；46.9%的生产队实行食用粮免费供给制；19.1%的生产队实行基本食用粮免费供给制或者说是部分食用粮免费供给制；4.2%的生产队实行薪金与免费供给相结合的制度。总计结果，免费供给数额占人民公社成员全部分配总额的百分之四十<sup>⑤</sup>。据称，当时



303 全国的平均结果是，免费供给数额只占人民公社成员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吴芝圃想通过实现更高的免费供给额来力争河南成为“卫星省”。<sup>⑦</sup>

吴宣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两条道路斗争的例子”表明，象吴这样的人在1959年上半年实际情况不利于激进主义时，是怎样处于守势的。在吴的例子中，有个生产队把劳动力口粮和生产任务全部交由个体家庭负责<sup>⑧</sup>。作家王汶石(音)在一篇故事中对当时的典型情况做了形象得多的描绘，这篇故事讲的是1959年秋庐山会议之后在一个村子里所发生的斗争：

在生产中，他们推行个体合同制来反对集体化运动，这导致许多公社成员重新萌发了资本主义念头，全都去搞市场投机买卖，以期迅速富裕起来。结果，集体的农田里草都长的比庄稼还高了，也无人过问。阎祖玉及其同伙搞到这个程度还不罢休，他们还要把农具和牲畜都永久地分给各家各户，从而在实际上瓦解人民公社。<sup>⑨</sup>

在这时，故事里的英雄开始进行成功的反击。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自然要为攻击彭德怀和右倾机会主义而拍手称快，但就是这些材料也表明，在真实生活中，河南所展开的反击出现过火的情况。这些材料承认，在1959年秋季，好干部被错误地指控为“犯有严重右倾错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继任者刘建勋则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弄得人人自危，父母之间、夫妻之间都不敢讲话”<sup>⑩</sup>。根据文化革命后一份材料的说法，那场运动使河南省人民遭受了“更加严重的创伤”。另一份材料提到，1960年在信阳地区过量征收粮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事端<sup>⑪</sup>。刘少奇1960年4月视察河南时，曾试图对吴芝圃及其同事灌输现实主

304 义，他对低估困难和极端平均主义提出警告<sup>⑧</sup>。但从河南后来的问题来看，他的话究竟发生了多少效力是很成问题的。1961年末陶铸回顾这个时期时讲：

在1959年3月之前，主席就发现，我们不能刮“共产风”，而要实现三级所有制。如果我们当时这样做了，事情会和今天很不一样，我们获取经验所花费的时间会短一些、付出的代价会小一些。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做？就是因为庐山会议上出了个彭德怀元帅，从那之后，反“左”运动变成了反右运动。<sup>⑨</sup>（着重号是我加的。）

直到1960年的头几个月，尽管第二次的大跃进甚嚣尘上，但实际情况清楚表明，食品情况没有改善。5月，一位有同情心却不乏批评态度的苏联科学顾问米哈伊·科罗契科的观察是这样的：

众所周知，每个成年人每个月只能配给二两多肉，政府动员人们自愿省出这点可怜的供应给从事特别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工人享用。大家也都知道，面粉和米的配给份额也已经减少，在南方某些地区已经部分或全部由玉米代替大米配给。1958年在北京市场上随处可见的糖和面包，现在只能在高级饭店的小卖部才能买到。只有作梦才能见到充足供应的时鲜水果和蔬菜。棉制品的配给额减少了大约50%。<sup>⑩</sup>

当时的条件如此困难，致使一些省一级的官员将食品作为礼品送给中央领导。例如，周恩来曾收到一些送来的鱼，但他命令办公室工作人员给那些热心的官员打电话，批评他们的举动。周认为这种举动无非是要他这样地位的人享受特殊待遇和特殊权力<sup>⑪</sup>。据报道，刘少奇也严格遵守中央办公厅发放生活费的标

准<sup>②</sup>。那时，最高领导者每日的伙食标准是2.40元<sup>③</sup>，超过标准的部分只能来自宅旁园地的生产补助。刘的秘书们在中南海内刘的办公室和住宅旁边种上了蔬菜，刘自己也和警卫们一起种菜豆。住在附近的朱德夫妇则因种植南瓜等而出名。<sup>④</sup>

305 虽然中国领导人个人尝到了困难生活的滋味，仍然不能改变大跃进第三年的目标，也许春季他们感到的匮乏是1959年的恶劣气候造成的，而1960年的好运气将能恢复1958年后期那短暂的好景。不管怎样，3月29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年度会议，要求粮食和棉花增产百分之十，生猪增长百分之三十五，这或许反映了前一年秋季毛所表达的意愿。<sup>⑤</sup>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还掸去了蒙在农业12年发展规划上的灰尘，对这个规划给予重新肯定，并正式采纳。新通过的规划与以前相比，内容上只有一处明显的变化，就是要加以消灭的四害之一麻雀换成了臭虫。此举纠正了消灭麻雀的这一灾难性错误。消灭麻雀是1958年干的事，其结果是，通常靠麻雀捕食消灭的那些害虫繁衍成灾。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这一发生在农村的最重要的根本性变化，在最后这个版本中竟然没有反映。所以说这个文件带有陈旧的气息。似乎政治局只是为了在第三个跃进年作些姿态，但是没有人再有耐心根据1958—1959年的生产指标对规划加以修改，因为人们对那个指标的信心已经严重动摇。<sup>⑥</sup>

#### 第四节 城市人民公社

城市中第二次大跃进的主要象征是城市人民公社。1958年在城市中进行了一些建立人民公社的尝试，但是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将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事搁置起来，来自城市居民的普遍反对显然是搁置此事的一个因素。可是由于庐山会议的结果，反对意见却靠了边。

城市人民公社以三种模式发展，这三种模式的区别在于其组织中心：工厂、政府机构或学校、或者是居民区。公社规模大小不等，每个公社的平均人口为20000—30000人。象宣传农村人民公社一样，党的宣传工作者极力论证这种新组织的主要优越性在于产生新的劳动力，特别是由于民办食堂和幼儿园的成立而使妇女劳动力得到解放，并得到合理使用，让他们在小“工厂”工作，使用废弃材料做原材料，为正规工厂生产零件，或是生产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公社还关心范围广泛的福利和服务事业，工资可包含免费供给部分。城市不同于农村，人民公社的界限往往与城市行政区划相互交错，如果这种情况长期持续下去，就会引起问题。<sup>②</sup>

有一个方面，城市人民公社与农村人民公社的情况完全一样：人们用抒情诗歌赞美公社解决了其成员经济的、社会的以至个人的种种问题，甚而能够消除婆媳之间传统的紧张关系。1958年，河南省省会郑州出现最早的一批城市人民公社，这是必然的。在其中一个公社里，人们写了3万首诗歌称颂这个新组织。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人民公社是百花园里的一朵鲜花；  
她的芬芳飘入万户千家。  
我们一起工作，无忧无虑心花怒放；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欢呼：  
党是我们的好领导。  
人民公社伟大坚强。<sup>③</sup>

## 第五节 鞍钢宪法

城市的左倾表现并不仅限于人民公社，也渗入工业领域，这

种情况完全是毛直接介入的结果。庐山会议期间，位于东北工业省份辽宁的中国主要钢铁中心鞍山的干部提出一个反对右倾的报告，倡议来一个大跃进，提出一个高的、但却可以达到的指标。毛后来追述，中央委员会“读到这份报告时极为高兴”。在彭德怀严厉抨击大跃进之后，毛得到这样一份支持大跃进的具有权威性的材料，他本人肯定特别高兴。这篇报告立即通过电话传达到全国各地，以支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时，毛指出鞍山要全力以赴反对右派错误，现在正是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sup>⑧</sup>。后来，仍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对辽宁省响应他这一指示的速度大加赞扬。<sup>⑨</sup>

307

薄一波显然是工业新路线热心的执行者之一，也许是想弥补他曾经反对过大跃进的过错。他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宣布1960年的口号：“让新年伊始充满成就”（照字面讲就是“开门红”）<sup>⑩</sup>。他的口号意味着每一天每个月都要出现新成就。据说，煤炭工业由于这些政策受到不小损失，在1960年下半年产量显著下跌，“给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sup>⑪</sup>

钢铁仍旧扮演着火车头的角色。尽管地方小钢铁已被基本放弃，制定的计划仍然要求钢铁生产增长37%。增产的方法是把“小土群”钢铁厂变成“小洋群”钢铁厂，换句话说，如果有可能，就巩固和提高地方冶炼炉的生产水平。如无可能，则换上一些比较现代化的设备。按照冶金部长王鹤寿于1960年4月10日在全国人大上的说法，这种增产方法就象东方升起的太阳，朝气蓬勃，前景灿烂。据他统计，1959年两类这样的小工厂生产出的铁矿石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小型现代化工厂为农村地区提供了400万吨生铁、钢和钢材，除此而外，还为比较大的工厂提供了生铁。王列举一个这样的工厂所生产的钢不仅可用于制造手推车、镐、锤子、铁锹、犁和耙子，而且其品质好到足可用以制造播种机、锯床和“土车床”这样的机器。<sup>⑫</sup>

王鹤寿承认这些小工厂生产效率低,例如过于依靠人力劳动。有人批评小工厂不是一种长期解决问题的方法。王不同意这种批评,“成百上千”的小工厂还太小,在今后几年里仍有必要继续动员群众,建立更多的小工厂,包括现代小工厂和土小工厂<sup>④</sup>。不过,王没有接受1958年的经验和庐山会议决议,这位部长想通过别的途径来推动群众炼钢。事实上,这种新的群众炼钢运动根本没有出现。

308 王鹤寿并没把他倡导的群众运动限制在小钢铁厂的范围,他还谈到大钢铁厂贯彻“多、快、好、省”的路线,这些工厂必须作出更大努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干劲冲天地开展群众运动。”<sup>⑤</sup>

玉的建议看来直接受到毛于3星期前关于鞍山今后发展问题的谈话的鼓舞。鞍山市委提出一份关于工业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这份报告建议的管理制度根本不同于鞍钢当时正在实行的常规管理制度,即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的管理制度的翻版<sup>⑥</sup>。新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加强党的领导,政治挂帅;发动群众;“两参,一改,三结合”,或是说,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改革过时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工作中相互协调,密切配合;进行强有力的技术革命。<sup>⑦</sup>毛在3月22日关于新制度的评论中,<sup>⑧</sup>把新制度命名为“鞍钢宪法”,并欢呼鞍钢宪法“在丹东、在中国出现了”<sup>⑨</sup>。他在别处写道,要破除对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宪法(译按,即“马钢宪法”)的迷信。<sup>⑩</sup>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瞄准了“走资派”,尤其是瞄准了薄一波,其理由是他压制鞍钢宪法,代之以(于1961年底颁布的)工业七十条<sup>⑪</sup>。事实上,所谓压制鞍钢宪法并非薄一波之过,倒是恰恰反映了中苏论战对国内工作的极大影响。毛后来承认,中苏论战导致了对国内事务的忽视。

当毛赞扬鞍钢宪法之后,《人民日报》准备了几篇评论以公布



其基本原则。该报主编吴冷西没能批准发表这些评论，因为他正忙于准备列宁诞辰日的针对莫斯科的论战文章。6月，在上海的一次机械工业会议上，吴向邓小平请示如何宣传鞍钢宪法。邓说这事不急，现在大家都集中精力于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邓还作了明确的补充，他认为除了其他因素以外，这部宪法的事情本身还有一些问题<sup>⑧</sup>。没有证据表明，邓当时在想什么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例子，如果他当时有反对工业领域群众运动的说法，吴一定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交代。进一步说，可以证实的是，即便没有推广和普及鞍山“模式”，党的干部也很清楚在其他领域贯彻其基本原则的重要性。

陶铸称赞了汕头的一个化学工厂，他认为这个工厂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提高了工人们政治觉悟，避免单纯强调物质刺激。他强调，这个工厂的突出成绩是在没有专家帮助的情况下取得的，职工的“冲天干劲”使他们获得成功的技术突破<sup>⑨</sup>。中国主要钢铁中心之一，位于包头的炼钢厂党委书记强调了政治挂帅和发动群众的重要性<sup>⑩</sup>。在此前后，周恩来赞扬大庆油田在实践中运用了鞍钢的原则。<sup>⑪</sup>

但是，苏联专家于7—8月突然撤走和1960年大跃进受阻，迫使中国领导人重新估价工业政策。鞍钢宪法显然成为这一过程的牺牲品。没有一篇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表明，毛在1961年的困难日子里曾经为保留鞍钢宪法而斗争。

## 第六节 托拉斯

另一项政策性建议是刘少奇6月10日在上海机械工业现场会议上提出来的。这项政策看来是苏联专家撤退之后提出的<sup>⑫</sup>。刘号召组织工业托拉斯。但是直到1963—1964年，这一建议才得到明确。<sup>⑬</sup>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为此遭到攻击。但不清楚的是，当初的政策建议是否严重偏离了毛本人在当时的想法。刘的原话是：“必须组织托拉斯，综合性工厂和联合企业。这也是生产关系的变革。”<sup>⑩</sup> 1958年9月，正值大跃进运动处于巅峰之际，毛在武汉说，象武汉钢铁厂这样的大型企业应当逐渐地转变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毛觉得，武汉钢铁厂除了生产钢铁，还可以生产机器和化工产品，并且还可以从事建筑。毛显然是把农村人民公社作为典范，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办农业、商业、教育和军事（估计是指民兵）。<sup>⑪</sup>

前面引证过的包头钢铁厂党委书记的文章表明，他们在认真落实贯彻毛的上述指示。他及时强调在大型现代化企业中开展群众运动的重要性，其主要目的是表明，包头是多么忠实地执行他所作出的指示。<sup>⑫</sup>

毛和刘都讲过综合性公司，毛与刘提出的托拉斯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横向联合的例子，即毛式联合企业，后者是纵向集中。托拉斯后来在60年代发展为对整个工业部门或者整个贸易部门实行集中管理<sup>⑬</sup>。没有充分理由证明，纵向集中不能补充毛于1958年9月倡导的综合性企业所不足的方面，一个钢铁厂应当能够经营为其提供原料的煤矿。也没有任何充分理由证明，横向集中比纵向集中更具有无产阶级性质。最后，从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或别的材料中都找不到证据说明，当刘在1960年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托拉斯建议时，毛对这一建议作过批评。主席倒是可能非常支持这一建议。在60年代后期，他对托拉斯的看法是否有变动，将在本书的最后一卷加以研究。

## 第七节 培养资本家

自1959年末至1960年初，中共的农村政策和工业政策的基本

趋向是左倾的，但在一个重要方面，党表现了务实精神，而这种务实精神可能而且在后来确实被说成具有右倾性质。这种务实精神体现于针对工商业者的政策之中。这些工商业者的资本在1956年被赎买，他们的商号转变为公私合营公司<sup>⑭</sup>。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明确暗示，毛本人同意这一新路线，并且可能是新路线的发起人，而刘少奇则是主要的政策发言人，而在其后却因此受到非难。<sup>⑮</sup>

担负这项工作，刘少奇是一位合适的人选。人们不会忘记，刘对毛在1957年的开明路线所抱有的矛盾心理，当时刘承担了这样的责任：终止了开明路线的试验，发动了反右运动<sup>⑯</sup>。毛和周恩来被资本家们视为试图弥合党与党外人士之间的裂痕的领导人，刘少奇则被当成党的典型的高级干部，他主要关心的是党的思想意识的纯洁性和党的利益。对刘来说，可悲的是即使在他成为国家主席之后，他的谦虚缄默的本性使他显得超然崇高，他在1966年的下台则被看作是党内的而不是国家的事情。刘在1960年初对非党人士作出承诺。这一承诺如果出自周恩来，其重要性就会显得不那么突出，这完全是因为刘同非党人士保持一定距离的缘故。

鉴于前几年的经历，中国资产阶级此时感到焦虑不安。1957年，他们响应毛的号召对党进行批评，结果被打成“右派”。1958年，由于中共热衷于动员群众，并以此作为打开经济发展之门的钥匙，他们事实上被抛到一边。1959年，他们满怀关切之情目睹了对经济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派错误的批判。与他们接触最密切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说法是，“由于种种错误干扰，他们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害怕党内整风和反右斗争会扩大到党外，害怕1957年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击会重演”。<sup>⑰</sup>

庐山会议后，刘试图安慰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举动是召集最高

国务会议。最高国务会议是根据宪法产生的实体，国家主席通过国务会议召集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一起讨论重大政策问题。毛把最高国务会议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向非党人士说明党所做出的决定，以提醒他们注意即将发生的政策变化。刘的第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于1959年8月24日举行，周恩来简要介绍了对经济计划做出的修改和反对右倾的必要性，刘讲了国内外的基本形势<sup>①6</sup>。党外人士仍然认为刘的话让人捉摸不透，而毛有着更高的权威。因此仅仅过了3个星期，毛再次召开同样是这些人参加的特别会议，主要是对同样议题交换意见。<sup>①7</sup>

刘安慰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努力是他于11月29日写信给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黄炎培。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会聚商业界人士的两大组织之一。对于即将来临的60年代，刘没有谈及思想意识方面的变化，而是谈了他个人对经济增长的意见。除此之外，刘阐明他坚信只要商业界人士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付出主观努力，并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的思想是可以得到改造的。<sup>①8</sup>

中国共产党需要安慰“工商界”。在毛的指引下，中共正在极力强调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sup>①9</sup>。第二次大跃进的基本特色是，将依靠“土”型工业转变为现代工业，但是仍然把动员“群众”作为基本路线。资产阶级工业家和技术人员的态度，对于成功地实现这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安慰他们，争取他们的赞助。于是，在刘写这封信的两星期后，估计是在李维汉的同意下，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另一个主要的工商界人士的组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代表会议。会议于1959年12月16日开幕，正式会期从12月19日到1960年2月21日，为期两个月。在此期间，会议通过经讨论而起草的一个文件。<sup>②0</sup>

会议开始时，进行得不顺利。“许多代表精神紧张，为了能够过关，在发言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在会议上表明他们对党的支持，并进行自我批评。”估计是李维汉看到这种反常情况，

313 便建议两个会议一起举行，并实行“三自”、“三不”原则：自己提问题，自己分析问题和自己解决问题；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看到“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顾虑”，刘少奇又被请出来以加强对他们的安慰，由他传达原准备由李维汉和中央统战部传达的信息。”<sup>⑭</sup>

2月11日，刘少奇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对资本家们的工作和进步采取积极态度：在1962年取消定息之前，我们还有3年时间。在这3年之中，我们必须做好工作，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措施。<sup>⑮</sup> 根据另外一则报道，他说，由于资本家们正在向党靠拢，党也应当向他们靠得近一点。<sup>⑯</sup>

第二天，刘接见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常委会委员<sup>⑰</sup>。按李维汉后来的说法来看，刘这次谈话的基本内容是建议互相合作：商业界人士应当“注重自我改造和为人民服务”，而国家应当“满足工商业界的物质利益”。<sup>⑱</sup> 但是事实上，刘的讲话对这一点并没作出具体的保证。

工商资本家在1956年被迫将产业参加公私合营时，给他们的甜头是：资本是被赎买下来的，至少在1956—1962年的7年当中，他们可以领取股息。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一些人大胆建议，股利息期限应当延长为12年，但是这些要求遭到指责和批判<sup>⑲</sup>。刘在政治局的发言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他对工商界人士的讲话是坦率的，但是仍然暗示了重新考虑问题的可能性：

定息取消以后怎么办？我们还没有想，工商业者现在就想了，这也难怪，因为对他们是切身问题。这个问题，毛主席有过指示，7年定息，到1962年取消，必要时可以留个尾巴。现在还是这句话。至于尾巴多大多长，我们还未研究，你们可以想想，我们也可想想，时间还来得及。……真有困难，总要解决。<sup>⑳</sup>

与股份红利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工商界人士领取高额薪金。

314 从刘的讲话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一些听众抱有希望，希望能够提高他们的薪金，以补偿他们在股息方面的损失。刘是这样劝导他们的：“原来的高薪不减，也不好再增加。”他能做的全部保证是，将会妥善处理任何因为工作调换而造成的薪金减少。由于当时国家尚未作出退休待遇的规定，刘许诺，国家会照料所有与之合作的经营者。眼下“暂时”的安排是，不能继续工作的工商业界人士退离工作岗位，但却继续领取全部薪金。<sup>⑭</sup>

总之，刘要工商业人士相信党：“不论老、病或有其他困难，国家都负责到底，包到底，这点请各位放心。具体办法还要议。总之是照顾到底，不要担心”。<sup>⑮</sup>

刘所期待的是，工商界人士继续改造世界观（当然是通过温和的方式），这样他们可以愉快地接受社会主义。他们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任何事物都应以最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为准则——这是一个基本要求”，这句话是刘的功利主义格言<sup>⑯</sup>。刘在声明他个人所深信的一个信念时，是这样讲的，从长远的观点看，很好地照顾多数人的利益，就能够最好地照顾到个人的利益。<sup>⑰</sup>

从刘对工商界人士的谈话内容看，没有表明中共对他们要采取新路线，人们只能推测他的讲话只是个人所表示的友善姿态。李维汉已经准确无误地向工商界人士传达了刘的保证：他们不会成为反右倾运动的目标。尽管没有人对在1962年以后继续发放股息作过任何保证，可是李维汉以个人身分对工商业这样讲道：工商界人士至少可以因为终止股息而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说，刘在1960年指使李起草一份于1962年摘掉资本家帽子的计划<sup>⑱</sup>。刘显然不曾打算劝导大批经过改造的工商界人士加入中共。他告诉他的内弟，一位工商业家，这样做将降低他们在国外的影响<sup>⑲</sup>。大概刘也意识到，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资本家为了

315

国家和自身的利益应当合作共事，这种国家形象比苏联实行铁板一块的一党制国家形象，更受国际社会欢迎。

即使在工商界人士面前没有争取入党的勉励，也有足够的动力推动他们投身于一项使全国上下为之狂热的计划。在这项计划中，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在一场政治运动中最出色地完成自己这方面的任务<sup>⑭</sup>。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在外来激励之下给毛呈上一封信，信的语句有点象向上帝祈祷的味道：

“我们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得到了坚定有力的引导和真摯的帮助。我们得以不断地提高觉悟、增强信心，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思想，因此我们才能继续进步。敬爱的毛主席，党和您如同父母般的对待我们，党和您如同老师一样的教育我们。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和对党对您的热爱之心……我们对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灿烂前程感到由衷的宽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天比一天完善，对我们来说，能同全国人民一道分享这一幸福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为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感到无上光荣。”<sup>⑮</sup>

这封信也许是写信人自我宽慰的一种手段。幸好早在1960年初，主席和党就受到他们的感激了。苏联专家撤走以后，中国前资本家的专业技能变得更加重要。如果到苏联撤走专家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才向他们作出友善的姿态，其效果无疑会大为降低。

## 第八节 教育改革

到了大跃进的最后一年，中国实干家的忧虑与中国共产党对



他们能够作出的谅解之间形成对照，这也暴露了中国政治生活的矛盾性。1958年不断高涨的狂热症，与1959年上半年持续出现的现实主义交相融合，形成了1960年混乱、复杂的局面。这种复杂和混乱在文化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都是显而易见的。

316 在教育方面，1959年初的向右转意味着要再度强调教育的质量。在1959年1月召开的一次马拉松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宣传部长陆定一承认，由于“狂热、鲁莽和愚蠢的思想方法”，在1958年的教育“大”发展期间犯了错误：“在大跃进中，我们的文化教育工作出现了什么情况？总起来说，有了一个大的跃进；具体地说，某些方面跃进了，某些方面没有跃进，某些方面还倒退了。”<sup>⑮</sup>他强调教育改良而不是教育改革<sup>⑯</sup>，要提高而不是要降低<sup>⑰</sup>，要培育尖子<sup>⑱</sup>。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195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时说，中小学必须全力以赴地尽“最大的努力去提高基础训练的教学质量，以便为今后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sup>⑲</sup>同年稍后一些时候，陆定一对各省的文化和教育负责人说，在有些地方，宁可不办小学，也不搞不成样子的小学。<sup>⑳</sup>

1959年1—3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显地引起了教育界的重新思考，进而产生了1960年的教育改革方案<sup>㉑</sup>。尽管庐山会议后有大跃进的复兴倾向，但教学质量问题仍受到重视。陆定一和杨秀峰在向1960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阐述改革方案时承认，自从1949年以来，数学和外语的教学水平在下降。事实上，“现在中学里所学的数学、物理、化学中，有不少都是19世纪的旧玩艺儿，一点也不能代表今天的科学技术”。<sup>㉒</sup>改变这种状况的措施也被提出了。

但是，尽管改革的支持者们在他们的发言中强调要重视质量，但改革本身却有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改革方案的主旨，是要把现存的中小学12年一贯制改为10年一贯制的教育体制。并且，实践已从多方面证明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北京师范大学甚至提出9



年一贯制也是可行的。虽然学制被缩短了两至三年，陆定一认为仍有可能提高高中毕业生的水平，以达到大学一年级末的水平。

建议背后的动机，反映了大跃进经济的失调。小型工业的快速发展，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使得中国的经济计划者们继续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教育改革的目的是试图加速在校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进程。陆定一坦率地谈到了这种状况：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十年一贯制”？因为孩子们从六七岁开始上学的年龄长到十六七岁被当作全劳力的时候，需要10年的时间……现在我们高中里所有的学生都是全劳力，所以，我们没有力量来普及高级中学教育，否则，我们从生产战线上抽出的劳动力就太多了。<sup>⑭</sup>

但是，如果经济战线要求缩短学制的学生早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话，大部分学校就必须增加课堂教学的比例。1958年的改革，使学生的学习时间减少。1959年初，小学生平均每周从事体力劳动的时间为4小时，初中生平均为6小时，高中生为8小时。武汉会议退却的结果，使得人们意识到强调体力劳动必定会影响教学质量。人们提醒师生，学校的宗旨是学习。<sup>⑮</sup>

庐山会议之后大跃进再度复活，使人们对教育界的意见被抛到九霄云外，中国领导人对大跃进作了再次肯定。1959年10月，刘少奇就期望有朝一日教育能与生产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工厂能培养出大学生、教师、工程师和干部<sup>⑯</sup>。1960年2月，陆定一谈到大跃进中兴办起来的农业中学的不景气状况。但他认为农业中学正被教育和劳动密切结合的全日制中学所代替<sup>⑰</sup>。陆定一和杨秀峰在向196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里说，学校需要增加而不是削减体力劳动，课时减少了，可以由增加课外作业来弥补。<sup>⑱</sup>

庐山会议后的复兴倾向在教育领域里还产生了一些别的影响，它为工农子弟上大学开了方便之门。1960年，北京大学班级里工农子弟的成分占61%<sup>⑭</sup>。苏联化学家科罗契科邂逅了一位16岁的姑娘，她原先是昆明科学院的清洁工人，后来成了这个城市冶金陶瓷方面的研究人员。她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男生的赛球上<sup>⑮</sup>。在当地一所师范学院里，他看到有机化学专业的低年级所用的课本，是他们一面学习，一面自己编写的。<sup>⑯</sup>

毛泽东要使教授们放下架子，不要搞什么奖学金和学位。<sup>⑰</sup>科罗契科在1960年上半年的调查报告中提出，根据当时的情况，单纯搞学术的危险是不存在的。在北京中国科学院，一位高级研究人员正忙于带领他那个研究所的40个人员经营赌场<sup>⑱</sup>。尽管呆在实验室和办公桌边工作的科学家比1958年多了，但仍然存在一个事实，一个人的学历和地位越高，他浪费在会议上的时间也就越多<sup>⑲</sup>。在北京地质学院，科罗契科发现，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在星期一上午的工作时间要进行政治学习，而在过去，这种活动只安排在周末。原因之一，也许是由于他们对闲置在那里的设备缺乏使用知识<sup>⑳</sup>。科罗契科认为中国的科学界状况总的说来是不妙的<sup>㉑</sup>。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鼓吹者却歌颂1960年科技革命和技术革新的浪潮。后来，他们把大跃进的3年称之为“伟大的教育革命”时期<sup>㉒</sup>。

## 第九节 意识形态的逆流

在较为严肃的意识形态领域内，庐山会议后也曾一度陷入了混乱。在这方面，没有哪一位干部试图去将矛盾的目标结合在同一个政策里（象陆定一在教育界做的那样）。相反地，不同的领导者都在追随着不同的政策。看上去并不存在什么大的对抗，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干将们已各就各位，准备

行动了，争论的焦点就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著作的态度。

319

政治局在八大期间对党章中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党的宣传机关得到的指示是用“毛泽东著作”来代替“毛泽东思想”<sup>⑮</sup>。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作出开展学习毛的著作的决定之后再一次被提了出来，也许是为了肃清彭德怀的影响和迎接《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出版发行。中宣部一直维护着1956年的主张，直到1960年1月，中宣部批发了共青团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个文件。很明显，这个文件是经过刘少奇和邓小平批准的<sup>⑯</sup>。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认为，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使用它<sup>⑰</sup>。事实上，这一时期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由于书本短缺而受到限制。因为纸张限量供应，而且得到优先照顾的是学校教材用纸。<sup>⑱</sup>

两个月以后，某宣传机关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报告，提出要谨防把毛泽东著作庸俗化，并举例说，有人牵强附会地将体育运动中所取得的成就也归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结果<sup>⑲</sup>。同时，一位乒乓球运动员写的一篇文章也由于同样理由受到批评。这篇文章说学习毛泽东著作如何使其在比赛中获胜。批评这篇文章的有谭震林等<sup>⑳</sup>。（但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受赞赏）<sup>㉑</sup>

刘少奇提醒人们不要把什么成果都归功于学习毛泽东著作，而且指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样的词句用于对外宣传<sup>㉒</sup>。当党内的狂热分子把毛泽东欢呼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世界革命的导师的时候，彭真采取了同样降低调门的态度。他还提出，在马克思列宁之后，无需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理论作进一步的研究了<sup>㉓</sup>。陆定一解释了为什么说毛泽东的思想不能超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sup>㉔</sup>

一股逆流来自康生。1957年前后，康生似乎接替刘少奇领导高级党校<sup>㉕</sup>。庐山会议后，他除了在党校组织撰写反击彭德怀的文章外，还不断地强调并要求党校以学习毛的著作来代替学习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sup>⑭</sup>。康生在1958年夏季曾形容毛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他看起来很得势，因为党校负责人杨献珍当时正由于说了怀疑大跃进正确性的话受到批评。<sup>⑮</sup>

另一名毛泽东思想的主要鼓吹者是国防部长林彪。1960年中期，他发出了一系列强调政治思想工作重要性的指示。<sup>⑯</sup>他推行毛的“三八”作风，据说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反对这么做。<sup>⑰</sup>他竭力支持民兵，明显地同他的前任彭德怀对着干。<sup>⑱</sup>

不过，林彪在这个舞台上最重要的活动发生在9月和10月，即他召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时候（他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sup>⑲</sup>）。他发表了欢呼《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的重要文章。

军委扩大会议从9月14日延续到10月20日，实际上是在林彪对他刚赢得的这个职位作了一年多试探之后才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他制定了一个试图建设新的现代化军队的原则，这个过程将在本书最后一卷加以研究。根据1960年的情况，在这里论述他的主要原则就够了。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石，是“统帅，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和保证”。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政治工作是“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与政治工作密不可分的有四个主要关系。首先是人与武器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林彪写道：

武器和人这两方面我们都要重视，但是更要重视人的作用。精神的原子弹，即人的思想觉悟、人的勇敢，比物质的原子弹强得多，有用得多。掌握精神原子弹，只有我们办得到，敌人是办不到的，因而这是我们专有的，是帝国主义无法同我们比赛的。

其次便是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只要政治工作作好了，其他各项工作也便作好了。政治工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政治工作中的思想工作与其他方面工作的关系，思想工作是关键；还有书本思想与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思想是需要的，而活思想则更重要。<sup>⑮</sup>

321 关于林彪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的情况，没有材料表明他高度赞颂毛泽东的思想，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资料却透露：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的思想被称为“马列主义在当代的顶峰”<sup>⑯</sup>。陆定一指示宣传机关不得使用这种赞颂之辞，这个指示当时没有公开<sup>⑰</sup>。但即使如此，也可以作如下推论：如果在解放军中强调思想工作，那么只能大力学习毛的著作，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对军事并没有多少论述。林彪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评论也许已经消除了对这一点的任何疑问。林彪说，收入四卷的主席在40年代后期的著作，论述了同国民党决战最后阶段的问题。

这篇文章的题目突出了这样一个主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sup>⑱</sup> 文章回顾了国内战争的过程，指出在每一个转折关头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都是正确的，并且大胆地向俄国人暗示，共产党只有通过革命暴力，才能夺取政权。林彪提出了如下评价：这部书的出版，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个伟大事件，因为这部书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取得的胜利”。他总结说，不论是对他的高级同事，还是对俄国人和其他外国共产党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同形形色色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作斗争，是我们当前的重要战斗任务。”<sup>⑲</sup>

意味深长的是，在北京出版的林彪文章的英译本中，结束句中的“思想”一词，并没有象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予以大写，也许是因为刘少奇发了指示，不让在国外使用这样的词。但是，林彪却举起了毛的思想旗帜，这就在其他毛的第四卷评论者中引起混乱。有些评论者仅把评论限于主席的著作，其余的人则同时评论毛的

思想<sup>⑨</sup>。这样一来，林彪便撇开了1956年八大的决议，重新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并使他的同事注意到，他将把自己的命运和毛这颗巨星联系起来。而且这位元帅显然得到了主席对他的作法的赞赏：

322

“四个第一”(即四种关系)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sup>⑩</sup>

毛林联盟由此开始形成。

## 第十节 农业灾害

然而，到了1960年秋，出现了比令中国领导人不安的林彪野心和毛的著作的正确名称远为紧急的事情。国家遭受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农业灾害，这个灾难远远超过了1959年所受的危害，而且正是由于1959年的灾害而使1960年的灾难变得更加严重。到了这年年底，9亿亩或超过半数的耕地遭灾，有时连续遭灾。

灾害持续发生了几个月。1960年最严重的问题是旱灾，春旱和夏旱影响了除西藏和新疆以外各省的6亿亩农田。有13个省在春夏两季都遭受旱灾。受灾最严重的是华北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诸省，那儿60%的农田遭受了6至7个月以上的旱灾。山东受灾最严重时，这个省的12条河中的8条干涸；在3月和4月的40天内，可以在黄河的较低河段蹚到对岸。

山东还受到了12个省的台风和水灾的猛烈袭击。除山东省以外，受灾最严重的是东北和其他沿海省份如广东、福建和江苏。辽宁东部遭受的水灾是历史罕见的。

旱灾不用说了，而大多数水灾是由台风造成的。台风袭击中国本土的次数是过去50年中的任何一年所没见过的。从6月到10



月受到台风袭击达11次之多,并且每次台风都比往年持续时间长,平均在10小时,最长达到20小时。

而且大自然使出了新的招数。台风不象往常那样向西北方向冲击,而是向北进攻。于是增强了它们的危害,因为这意味着它们不会受高山的阻拦,而且意味着中国西部的雨水更少。与旱灾和水灾俱来的,还有虫害和农作物病害。<sup>⑫</sup>

323

7月,中国领导人召开了例行的夏季工作会议,地点不在晦气的庐山,而如同1958年一样在北戴河。但基调却大不同于前两年,主张紧缩而非扩张的意见在盛行。就在这时,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提出了第一个建议,建议采取有效措施结束第二次跃进,并且提出了“调整、巩固、提高”的方针。北戴河会议似乎没有接受这项建议的行动,也许毛泽东还没有准备面对另一场退却,或者也许领导层正忙于考虑中苏争论问题,没有多少时间进行经济决策。然而,8月底李富春向周恩来汇报时又一次提出了这个方针。这位总理肯定了这一方针,并加上“充实”二字。<sup>⑬</sup>

秋天,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主持召开了一个小会。据说陈云在这个会议上对国家经济的困境作了出色的分析。总理完全同意这个分析<sup>⑭</sup>。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李先念开始更加赞同陈云的分析,而非毛泽东的分析了<sup>⑮</sup>。也许大约在此时,薄一波放弃了左的倾向,采取了他一贯的温和立场<sup>⑯</sup>。但是,即使所有计划者的意见都一致,经济紧缩的全套方案还必须交给毛泽东和同他一样观点的人。周恩来和李富春不无困难地这么做了。当时,毛、刘和邓小平专心致志地对付莫斯科会议,因此周和经济计划制订者们再次获得了对经济的实际控制。邓和彭真出国期间,李富春主持书记处工作<sup>⑰</sup>。由于周恩来实际参加书记处的会议,李富春是书记处成员,使得书记处具有国务院的色彩。

毛泽东别无选择,只有赞同。如同1959年春季一样,他突然转了个180度的大弯,拚命试图防止跃进的愚蠢行为无限制地加



剧自然灾害。10月27日，他签署意见，同意受灾最重的省份之一山西所采取的措施，即从工业中调110万人回到农业中去，以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力来恢复农田生产。正如毛泽东所承认的那样：

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目前农业战线劳动力太少和劳动力太弱的情况，那末所谓“以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以粮食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就会成为空话。“人是每天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办教育，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

接着下了重要指示：“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抽调尽可能多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迅速改变当前劳动力不足的严重形势。”<sup>⑧</sup> 这一指示下达到各省党组织，其中一件有意思的事便是批准了山西省已经贯彻了3个月的政策。这个例子大概说明中苏论战是怎样使毛不能集中精力解决极其紧迫的国内事务。但是，它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还有多少别的省也自行其是？可能毛的通知并非一个指示，而只是一个事后的追认。

下一步就是恢复对农民的物质刺激。公社规模的集体主义浪潮再次被迫退却。虽然毛本人在第二次成都会议上反对平均主义，并且上海和庐山全会已经批准生产大队所有制，但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鼓励了象吴芝圃那样的人再次卷土重来，从而增加了公社对于大队和生产队的权利和特权。谭震林那样的权威人物也承认，“五风”（平均主义、命令主义、瞎指挥、浮夸、干部特殊化）<sup>⑨</sup> 的重新抬头，造成了公社的巨大损失。<sup>⑩</sup>

9月，毛泽东向政治局常委会的同事们发了一个便函，重新肯定他在郑州会议的最初立场，认为大队（不是管理区）应当是所有制和核算的基本单位<sup>⑪</sup>。这个便函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

作的十二条紧急指示。紧急指示于11月3日发出，它看来只是重复1959年整顿公社时期已经同意了的东西。如果1959年的形势实际占了上风，那末这个指示也就无需发布了。中共中央乐于无条件地反对一平二调，这是毛在18个月前在邓州的战斗口号。毛的便函发出之后，可能又由于1960年紧张的农业形势，土地的基本所有制转向生产大队，有的交给生产队。更多的集体收入应当分配给农民。农民也应当被允许种自留地，从事自己的副业活动。农村市场被准予恢复，以出卖农民的产品。适当的劳逸结合，再次成为干部们关心的重点，男人每月有4天假期，妇女6天。<sup>⑨</sup>

1960年，大跃进正式结束了。一个经济恢复的长征开始了。经济恢复途中会遭受许多自然的和人为的挫折。目标是将经济恢复到允许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程度。这个目标将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达到。到那时，大跃进的精神和方法只会成为历史的记忆。毛泽东的第二次大胆的实验结束了。

####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8页。
2. 例如《鞍钢宪法》，见吴冷西的材料，《中国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4号，第77—78页。
3. 见利伯瑟：《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年》，第154—164页。
4. 彭德怀和张闻天受到的屈辱包括在政治局里徒有其名。除他们之外，政治局还有24名正式及候补成员。
5. 见毛在九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8页；《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转载于《中国建设》，1967年11月号第8页；《看陶铸的丑恶面目》，见《红卫报》第3期（1967年1月22日）；《陶铸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讲话》，见《贵阳八·三一》1968年2—3月。
6. 《红旗飘飘》第20辑，第182—183页。关于刘少奇的病痛，使他不得不

- 服用安眠药片入睡，见上书第214页、247—251页。刘是中央高级领导中第一位视察海南的人，同上书，第239—240页。1959年周恩来也病了，在医院养病，见《人民的好总理》第2辑，第520页。
7. 《红旗飘飘》第20辑，第182页。毛对苏联这篇文章的看法，见该书第295—298页。
  8. 《红旗飘飘》第20辑，第182—183页；薛暮桥《怀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同志》，载《红旗》1980年第10期，第9页；《怀念刘少奇同志》第375页。
  9. 联合研究院《中国共产党名人录》第2卷，第676页。
  10. 科林和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第372页。1960年12月，薛暮桥重新就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同时免去国家经委副主任职务；同上。
  11. 李卓敏：《中国的工业发展，1958—1963》，《中国季刊》1964年1—3月号，第36页。
  12. 见本书本卷，第218页。
  13. 见《彻底拔掉经济界的黑旗——薛暮桥》，载《进军报》1967年3月11日，文化大革命版本。毛去世后对薛的经历的说明，见邱健：《一位经济学家的治学之路——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载《光明日报》1981年2月12日。薛的观点和陈云的观点的比较，见多罗西·厂·索林格：《中国通过打破旧格局实现经济改革：右派的思想来自何处？》，载《亚洲概览》1981年9月号，第947—960页。
  14. 支持这一假定的是如下事实：薛离开中国统计局看来不是为了更好地安排顺从的统计员而进行大规模人事调整的结果。薛由他的一位副手贾纪云（音）接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批判。见联合研究院《共产党中国名人录》第1卷，第130页。
  15. 《深挖三十年代的经济黑线及其后台老板——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载《卫东》1967年6月15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6号，第27页。
  16. 《红旗飘飘》第20辑，第183页。这个日期不准确，可能是由于刘在1959年12月间的活动不清楚。据报道，13日那天他在上海，见《解放日报》1980年5月17日，第2版。如果这个消息是准确的话，刘去海南大约就

此外，还有一些提法又表明评论完成于1960年之前，谈话的开始时间应在1959年底。在35页，毛说“六〇年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在88页，他提到“去年大办钢铁”，这个“去年”肯定是指1958年；在96页，他谈到河南省“1959年和1960年以后的计划”，这表明说这番话时1959年还没有结束；在117页，他说“从1960年起，十三年中还要紧张地劳动”（即五年计划的最后3年，1960—1962年，以及后两个五年计划），这表明他是在1960年以前，至少也是1960年刚刚来临时说的。

最后，很难想象，在毛写作评论的时候，如果苏联专家已经开始撤离，毛还会以乐观态度来谈论中国工业发展的前景，而这种乐观态度的确又是这部作品的显著特征。另一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毛在评论中没有提起这一事件（译按：指苏联专家撤离）。根据这些情况，他的评论肯定应当完成于1960年7月中旬之前，或者更早一些。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译本出版于1959年1月，见李云的评论文章，《红旗》1959年第15期，第36—41页。载《中国大陆杂志选》，183号，第13—19页。

29. 例见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学的评论》，第37页，28—39页、40—42页、48—50页、105页。
30. 同上，第122页。又见第48页、90页、94—95页、97—98页、100—101页、107页。
31. 同上，第55—56页、57—58页。
32. 同上，第80页。
33. 同上，第81—82页。
34. 同上，第126页。
35. 同上，第52—53页。
36. 同上，第87页。
37. 同上，第119页。
38. 同上，第93—94页。
39. 同上，第95—96页；又见第79页。
40. 同上，第79页。
41. 同上，第112页；又见第67页、70页、82—86页、98—99页。
42. 同上，第75页。

43. 参见同上，又见《毛泽东思想杂集》第1卷，第172页。
44. 毛，《对苏联经济学的评论》，第51、55、66页。
45. 同上，第88页。
46. 同上，第97—99页。
47. 同上，第102—104页。
48. 同上，第126—127页。
49. 马寅初：《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载《新建设》第11号，1959年12月7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摘要》195号，第43页。马的文章的最后一段所说的“一位好朋友”，根据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指周恩来。又见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载《新建设》第1号（1960年1月7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摘要》，201号，第15页。
50. 见不同文章的英译文，《中国大陆杂志摘要》，201号，第1—10页、16—19页；同前书，208号，第1—14页；《中国大陆杂志选》，213号，第24—36页；同前书，214号，第1—10号。
51. 马的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的10年任期，到1960年3月28日结束，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244号，第1页。又见《新华月报》1979年9月号，第71页。
5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252页；同前（1969年），第319页。
53. 《当代背景》891号，第32—33页。
54.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171页。
55. 谭震林：《关于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若干问题》，载《红旗》1960年第6期，第3页。
56. 联合研究院《共产党中国名人录》第1卷，第77页。在1955年合作化运动中陈正人对毛的重要性，见本书第1卷，第18页。
57. 薄一波：《为加速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伟大任务而奋斗》，载《红旗》1959年第20期，第24—25页。据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说，薄认为毛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说法是“不完全的”，见《彻底清算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农业机械化方面的滔天罪行》，载《农业机械技术》第5期（1967年8月8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10号，第18页。然而，在薄的这篇文章里没有任何反毛的迹象；而且毛也认为，没有他提出的“八字宪法”，机械化就是不完全的。

58. 见本书本卷,第149页;许辛学《又是大跃进的高速度, 又是有计划的按比例》,载《红旗》1960年第3期,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摘要》203号,第2页。
59. 谭震林:《关于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若干问题》,载《红旗》1960年第6期,第4页。
60. 同上,第3页。
61. 陈正人:《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造》,载《红旗》1960年第4期,第6页。
62. 李富春:《迎接一九六〇年的新跃进》,载《人民日报》1960年1月1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172号,第2—11页。“右倾机会主义”一词在1960年多数中央及各省领导人的文章里已经很少见了。李富春等代之以“右倾”这个词,同上,第2页。他在1960年全国人代会(译按:指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的报告里,回顾1959年的情况时提到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随后没有再提,见《当代背景》615号,第7页。
63.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172号,第7—8页。
64. 同上书,第6—7页。
65. 同上书,第2—3页。《人民日报》1960年3月31日(《当代背景》615号,第39页),据报道,对第二个五年计划后3年的补充计划正在准备之中,但是没有提出。1959年计划执行情况公报,发表于1960年1月21日。
66. 见本书第1卷,第124页。
67.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172号,第3页。
68. 同上书,第10—11页。
69. 英译文见许芥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第515页。
70. 同上书,第513页。
71. 吴芝圃:《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载《红旗》1960年第1期,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摘要》197号,第1页。
72. 同上,第3页。
73. 据刘少奇说:“人民公社是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引自吉群义的文章,《红旗》1960年第5期,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摘要》210号,第19页。这两个数字可能是不可比的,因为吴的百分比不会包括自留地的收入,而吉的统计数字却很可能包括。不过,这种比较依然是适当的,因为来自自留地的收入很快就被挤掉了,这是庐山会议以后普遍出现

的现象。

74. 吴芝圃:《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载《红旗》1960年第1期;《中国大陆杂志摘要》197号,第5页。
75. 王汶石(音):《生产队的新领导》,英译文见许芥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第481页。
76. 《刘建勋的罪恶事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两面派》,1967年3月12,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32号,第16页。文化大革命中,吴芝圃和刘建勋都断然否认是走资派。
77. 《少奇同志,河南人民怀念你》,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21日第2版;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55页。
78. 《人民日报》1980年5月21日,第2版。
79.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200号,第9页。
80. 科罗契科:《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159页。
81.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3集,第85页;《人民的好总理》第2辑,第442页。
82. 《红旗飘飘》第20辑,第202页。
83.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恶史——从解放后天津之行看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真面目》,载《八·一三红卫兵》1967年5月13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588号,第19页。
84. 《红旗飘飘》第20辑,第196—197页。刘少奇在1960年上半年视察了几个省份。这类指责都是捏造的,以败坏他生活朴素的声誉。当然,一种情况是会有:地方负责人为了表示对来宾的重视而设宴洗尘,而刘也觉得很难简单地拒绝出席这类宴会。刘视察的部分情况,见“刘(少奇)和王(光美)视察张家口”,《斗批改》1967年5月15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2号,第23页(山西,4月);《少奇同志,河南人怀念您》,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21日(河南,4月);《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在成都工具厂的罪行》,载《二七战报》1967年7月25日(四川,5月);《少奇同志,上海工人怀念您》,载《解放日报》1980年5月17日(上海,5月)。
85. 见李富春在全国人代会上的讲话,《当代背景》615号,第14页。
86. 见新版本,谭震林对它的说明,及《人民日报》后来发表的社论,《当代



- 背景》616号。
87. D. E. T. 卢亚德:《城市公社》; 见《中国季刊》1960年7—9月号, 第74—79页。
  88. 引自《红旗》——一个城市人民公社, 载《中国建设》1960年7月号, 又载《中国大陆杂志选》218号, 第35页。这篇文章充分表明宣传鼓动者们企图在城市重新造成在1958年盛夏时农村曾经出现的那种气氛。
  89. 《辽联战报》1967年7月21日, 第3版;《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230页。
  90.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 第4期, 第69页。
  91. 《对薄一波的四十个质问》, 载《红卫兵报》1967年2月22日, 英译文见《当代背景》878号, 第16页; 我曾修改过这个译文。
  92. 《打倒“三反”分子、大叛徒薄一波, 揭发他在工交战线的严重问题》, 载《东方红》1967年2月15日, 英译文见《当代背景》878号, 第7页。这些红卫兵攻击薄的问题, 都是转述毛对薄的批评, 他认为薄应对由1960年冒进引起的经济衰退负责。
  93. 见在全国人代会上他的发言, 英译本见《当代背景》618号, 第12—15页。
  94. 同上, 第16—18页。
  95. 同上, 第17页。王鹤寿在钢的问题上继续“左倾”, 使他本人也身受其害。这次讲话以后, 他就不再露面(科林·克拉克:《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 1921—1965》)。
  96.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 第249页;《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 第1卷, 第230页, 这里苏联钢铁工厂被错误地冠之以“马克思”, 而不是本来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
  97. 《中国新闻界声讨修正主义经济路线》, 见新华社, 1967年8月25日, 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12号, 第17页;《砸烂修正主义的黑纲领“工业七十条”》, 载《邮电战报》1967年6月28日, 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10号, 第27页。
  98. 毛讲话的准确日期见《北京周报》1970年第16期, 第3页。
  99.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第249页。
  100. 毛《对苏联经济的评论》第124页。
  101. 例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 27号, 第27—31页。可惜地质部忽

视了这个特点，该部党组书记说：“这是鞍山钢铁公司的事，跟我们的地质队毫无关系。”不过，估计这更反映了该部缺少工厂，而不是这位党委书记的修正主义。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长工的七条罪状》，载《科技红旗》1967年5月11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86号，第27页。

102.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4号，第77页。这次会议是关于机械工业的专门会议，见注106。

103. 陶铸：《关于领导厂矿企业的几个问题》，载《红旗》1960年第12期，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18号，第7—12页。

104. 陈守中：《包头钢铁公司的多种经营》，载《红旗》1960年第17期，第34—35页。

105. 《我们永远怀念周总理》，第13—14页。

106. 一些材料提供了这次会议的特征，例如可见《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36页，《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黑话录》，《进军报》1967年4月16日，英译文见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41卷，889号，第60页。我尽可能找到刘讲话的日期，只有后一个材料标出了这个日期。我估计，这次会议和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样都在6月召开。在上海会议上，邓小平和吴冷西讨论了《鞍山宪法》，因为这次会议也同工业管理有关。很可能是研究外交工作的5月上海会议（利伯瑟：《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年》，第159页）一直开到6月，一些与会者决定召开一次关于工业问题的现场会议，因为他们正好是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现场会议即在工厂、公社或其他组织召开的会议，这个单位取得了成绩或出了某种事故，在那里展开讨论以便为其他单位提供经验或教训）。

107. 《必须清算谭震林破坏农业机械化的罪行》，载《农业机械技术》1958年第6期，英译本见《中国大陆杂志文选》624号，第6页；《揭露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大阴谋》，载《文汇报》1967年4月29，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87号，第7页。1963年，刘似乎再次提出托拉斯问题，并在1964年开始进行试验。

108. 《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36页。

109. 陈守中引用了毛关于“综合性的联合企业”的指示，见《红旗》1960年第17

期,第31页。

110. 同上,第31页。

111.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87号,第8—10页。

112. 本书第1卷,第19—25页。

113. 见《刘少奇在人民商业中心推行对资改造的投降主义路线的罪行》,1967年6月,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19号,第50页、52页。在50页,有两处提到毛。第一处,提到毛主席对处理资本家的指示。第二处说,“他们恣意歪曲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在处理同资本家的关系时,只讲‘宽’不谈‘严’……”(引文中的“他们”指的是按刘的意见行事的天津负责干部)。这段话无意中透露了毛也说过“宽”。而它并不能证明在中共同资本家的关系上刘没有谈到存在的问题。第二段话涉及中共天津市委准备的关于处理资本家的报告。这个报告有这样一段话:“听了李经理指导性的发言,王经理的新设想,以及党和主席的意见,工商界人士都感到无限高兴”(着重号是我加的)。这里再次提到主席,即毛,这是关键。要是他对这项方针表示反对,或是保持缄默,这些天津资本家的欢乐就是有限的了!

114. 见本书第1卷,第3编和第4编,特别是第285页、289页。

115. 李维汉:《刘少奇同志对统战工作的指导》,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10日,英译文见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75卷,872号,第43页。

116.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086号,第1—2页。

117. 同上书,2100号,第1—2页。主题的唯一不同是另加特赦罪犯的论述,以庆祝革命胜利十周年。

118.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4集,第62—63页。

119. 见《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229页;《高教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载《教学批判》1967年第2期,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18号,第16页。

120. 见新华社报道,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219号,第1页。

121. 李维汉:《刘少奇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10日。

122. 同上。

123. 《八·八战报》1967年4月21日,第8版。这个材料标明政治局会议召

开于1月。也许有一个1月份开始的会议延期至2月，也可能是这个材料有错误。

124. 李维汉：《刘少奇同志对统战工作的指导》，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10日。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次接见的日期据说是2月2日，有时又说是2月20日。这次讲话的文本见《刘少奇选集》第4集，第71—74页；《刘少奇资料汇编》第1集，第114—118页。
125. 李维汉：《刘少奇同志对统战工作的指导》，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10日。
126. 见麦克法夸尔《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第197—200页。
127. 《刘少奇选集》第4集，第71页。
128. 同上。
129. 同上，第72页。
130. 同上，第72页、74页。
131. 同上，第72—73页。几天前，刘在同王光美的哥哥一家谈话时，阐明了相同的方针；见《刘少奇资料汇编》第1集，第110—111页。这无疑是刘个人哲学的一个基本信条。它以刘对个人经历的总结为依据。见本书第1卷，第5—6页。
132. 《八·八战报》1967年4月21日，第4版。
133. 《刘少奇资料汇编》第1集，第111页。
134. 见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工作计划，《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213号，第4—12页；在天津的活动，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19号，第47—59页。
135.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213号，第3页。
136. 《过去十七年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载《教育革命》1967年5月6日，英译文见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41卷，932号，第31页。
137. 《陆定一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言论》，北京：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合委员会，1967年5月，第17页。
138. 同上，第21页。
139. 同上，第20页。
140. 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41卷，932号，第32页。

141. 《陆定一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言论》，第21页。
142. 罗伯特·D·巴林德森在《1960年的教育改革》一文里提供了进一步的论述，见《中国季刊》1960年10—12月号，第55—56页。
143. 引自同上，第60页。
144. 引自同上，第59页。
145. 同上，第56页。
146. 《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36页。
147. 《陆定一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言论》，第20页。
148. 巴林德森：《1960年的教育改革》，载《中国季刊》1960年10—12月号，第58页。陆定一和杨秀峰在1960年全国人代会上的发言，英译文见《当代背景》623号，第1—19页。
149. 《中国青年报》1966年8月16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3772号，第11—12页。
150. 科罗契科：《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130—131页。
151. 同上书，第138页。
152. 《全无敌》1967年6月20日，第2版。
153. 科罗契科：《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153页。
154. 同上书，第135页。
155. 同上书，第157—158页。
156. 同上书，第176页。
157. 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41卷，932号，第26页；《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18号，第16页。
158. 本书第1卷，第100—101页、105页。
159. 《他们多么恶毒》，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8号，第3页；观《进军报》1967年3月26日，第4版。
160. 《胡耀邦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录》，载《青年战线》1967年6月1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194号，第30页。
161. 《刘少奇在文化艺术方面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载《红色宣传兵》1967年5月10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05号，第34页。
162. 《全无敌》1967年6月26日，第2版。
163. 《批谭战报》1967年8月5日，第2版。

164. 庄家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载《人民日报》1966年5月15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3707号,第6—9页。
165. 《外事红旗》1967年6月14日,第4版。
166.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1967年6月10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文选》639号,第1—2页;《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1967年5月,第4页;《清算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载《井冈山》、《进军报》1967年4月20日,英译文见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41号,858号,第94页。又见《新北大》1967年4月22日,第4版;《北京工人》1967年5月27日,第4版;《北京》1967年6月10日,第8版。
167. 《陆定一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言论》,第2页、3页。
168. 杨献珍:《党校建设的鼓舞者和指导者—怀念少奇同志》,载《红旗》1980年第7期,第21页。这篇文章没有点康生的名,只是代之以“理论权威”的称呼,因为他还没有被公开否定。
169. 同上,第22页。又见《红旗》1980年第18期,第23页。
170. 《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37页。1959年12月,杨献珍作自我批评时,说到他的错误意见基本上是从彭真及其他人那里听来的;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39号,第9页。康生1958年的讲话,见《四十年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提法》,载《红旗》1981年第2期,英译文见《国外广播新闻—中国—81—030》第L13页。
171. 见《东方红战报》1967年6月15日,第5版;《科技战报》1967年5月22日,第6版;《中国大陆报刊概览》3933号,第8页,注34;《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18号,第16页。
172. 《反革命两面派赵易亚的滔天罪行》,载《新人大》1967年9月21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221号,第31页。“三八作风”,见吉庭斯:《中国军队的作用》,第102页。
173. 见他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闭幕式的讲话,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252号,第16—18页。
174. 《中国大陆杂志选》602号,第8页。
175. 新华社,1960年10月8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2358号,第1—3页。

176. 《彻底清算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第2页。
177. 《陆定一个人简历》，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补遗)27号，第45页。文化大革命中，广泛流传一种奇怪的说法，陆定一的夫人曾给林彪家写过匿名信。这个说法的可靠性和它的政治影响难以估定。见《揭发清算陆定一和他的夫人一反革命分子严慰冰折磨林彪同志和他的家庭的反革命罪行》，载《战报》1967年1月18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卷)165号，第12页。
178. 这篇文章被译成英文，见《北京周报》1960年第41期，第6—15页。
179. 同上，第15页。
180. 有关《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这些文章，英译文见《当代背景》641页，643号，正式版本见1960年8月14日李维汉对民主党派的讲话，英译文见《当代背景》639号，第9—21页。
181. 《大比武是罗瑞卿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暴露》，载《人民日报》1967年8月28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022号，第2页。
182. 新华社的报道见《人民日报》1960年12月29日，转载于《人民手册》(1961)第273页。
183. 顾卓新等：《李富春同志对经济计划工作的重大贡献》，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22日。
184. 《人民的好总理》第3辑，第19页。
185. 《北京公社》1967年5月26日，第3版。
186. 《辽联战报》1967年7月12日，第4版。
187. 《人民的好总理》第3辑，第19页；《经济研究》1980年第5期，第6—7页；《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第70页。
188.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232页。
189. 见难民报告《联合研究院院刊》第28卷，第198—200页。
190. 《关于谭震林问题的初步综合材料》，1967年4月6日，第8页。
191. 林田《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的探讨》，载《经济管理》1981年第1期，英译文见《国外广播新闻—中国—81—048》，第L20—21页。
192. 这个指示从未公布过，但已传入香港和台湾，例见《联合研究院院刊》第28卷，第200—201页。林田：《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的探讨》，似乎确信这十二条指示将“小队”定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过这并非事实。



---

### 第一节 跃进的平衡表

大跃进不是结束在一片喜庆声中，而是结束在一阵抱怨声中<sup>①</sup>。没有举行集会，没有发表讲话，也没有印发小册子。的确，并没有发表关于结束跃进的声明。只能从1961年《红旗》杂志新年社论中引出一点看法，社论把1958—1960年视为大跃进取得伟大成就的3年。这个杂志没有号召一个新的跃进。而是要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奋勇前进——这种看来只是语义上的变化，却包含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sup>②</sup>

没有哪一个政府愿意承认失败。当采取一项全新的政策时，对正被放弃的政策

常常是加以粉饰，声称这个政策取得了成功。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违背这一常规。1961年1月举行八届九中全会，全会结束时发表的公报列举了一系列的成就，主要是工业部门的成就：在世界的名次表上，中国的钢产量已从第9位上升到第6位，煤产量从第5位上升到第2位；工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已得到了“巨大的加强”；机床的生产是1957年的两倍多；工程师和技术员的数量的增长也超过了一倍多；工业生产的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率超过40%，是一五计划期间增长率的两倍多<sup>③</sup>等等。

只是到了20年以后，中国人才发表了对大跃进的更加客观的评价——这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在最后一批文化大革命的干将被清洗之后，在邓小平第3次复职以及实行“实事求是”的口号之后才进行的。

跃进期间确实出现了工业的迅速增长，但这种增长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据官方记载，重工业在1958年和1960年间，以230%的速度增长。特别是1958年，由于大炼钢铁，在冶金工业上的投资几乎是以往的3倍，对重工业的总投资是以往的两倍多。由于资金积累率从1957年的24.9%提高到1958年的33.9%，重工业产值明显地上升了78.8%。对重工业的高额投资，导致了对轻工业和农业投资的减少。普遍的高额投资还引起了消费的下降。尽管1959年农业生产下降，1958年的跃进模式还是重复了下来，而且资本积累率达到了43.8%的“危险”水平。领导层企图“通过各种人工手段<sup>④</sup>”完成钢的指标，导致了1960年经济不平衡状况的进一步加剧，投资比例达到了39.6%<sup>⑤</sup>，再次超过1958年的水平。投资政策的不合理可以从下表一中体现出来。<sup>⑥</sup>

主要是钢铁工业得到了好处，它的产量从1957年的535万吨上升到1960年跃进结束时的1800万吨，据一个中国分析家说，工业的高指标是通过“强化开采”（煤的产量从1957年的1.3亿吨上升到1960年的3.9亿吨）<sup>⑦</sup>、“粗糙马虎的超负荷操作和制造”等方式

表一：基本建设总投资中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投资比例(%)

部 门	一五计划期间(1953-1957) (年平均)	1958	1959	1960
农 业	7.8	10.5	10.5	13.0
轻 工 业	5.9	7.3	5.2	4.0
重 工 业	46.5	57.0	56.7	55.3
冶金工业	10.14	17.68	16.13	13.16

取得的<sup>⑧</sup>。大跃进3年中生产出来的大部分钢来自“土”钢厂和小高炉，并且必须在“外国大炉”中再熔炼一次。由于成本太高，质量太低，这种虚假的“生产高峰”没能持续多长时间。因此，生产必须削减，这对以钢作为原料的机器制造工业和许多基本建设工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sup>⑨</sup>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钢产量下降到700万吨<sup>⑩</sup>。国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升了8.7%，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下降了5.4%<sup>⑪</sup>。轻工业由于缺少资金从1960年起连续3年萎缩<sup>⑫</sup>。在这些投资数字中，人力的比重是令人吃惊的(表二)。<sup>⑬</sup>

328

表二：

(百 万)	1957	1958	1959	1960
重工业工人 <sup>a</sup>	4.5	17.5	14.18	1572
重工业劳动者 <sup>a</sup>	5.57	35.5		
非农业人口	106.19	122.1		
城市人口	99.49	107.21		
农业劳动力	192.0	151.0		192.0 <sup>b</sup>

a: 大概重工业工人是指在现代化工厂中工作的人，而重工业劳动者还包括那些土法炼钢的人。

b: 谭震林在1960年初使用2亿的数字；见本书第299页。

劳动力发生了巨大的流动，从农村流到城镇，从农业流到工业。这种流动在1958年尚未显示出严重性来，因为气候不错，农业产量增加。但就在这一年，由于夸大收成和建立提供“免费食物”的公共食堂，产生了一种“消费狂热”，吃光了以往两三年积攒下来的储备粮。况且，对那些炼钢的人还得进行额外的粮食补助；因此，当1959年自然状况恶化时，由于1958年减少了20%以上的农业劳力，使人们无法应付这种困难。1957年，农民人均须经营8.8亩耕地，而1959年则需照料11亩。并且由于耕畜数量锐减——大概是在成立公社时害怕被充公而屠宰的——使耕种尤为艰难。虽然重工业确实在大跃进期间提供了两倍于前的生产资料（拖拉机、化肥等），但也弥补不了劳动力的缺乏，因为这些生产资料“质量差，不适用或者就是废品”。<sup>④</sup>

毫不奇怪，自然灾害和劳动力短缺的结合就对农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使“饥荒”盛行于1959年冬，特别是在1960年至1961年<sup>⑤</sup>。大跃进年份的粮食数字现在已经公布出来了，表三是现在公布的实际数字与当时公布的数字的对比。

表三：粮食产量(百万吨)

	1957	1958	1959	1960
公布的(不包括大豆)	185.0	250.0	270.5	
实际的(不包括大豆)	185.0			136.2
公布的(包括大豆)	195.05	260.05	281.55	
实际的(包括大豆)	195.5	200.0	170.0	143.5

中国方面的资料还说明，1958年的两亿吨的数字是什么时候算出来的。据经济学家薛暮桥说，这个数字是在1961年核实的，也就是在这些粮食吃光两年以后。<sup>⑥</sup>

十分清楚的是，1956—1957年达到的生活标准，在此之后就下降了，直到1965年才恢复到跃进前的水平<sup>⑭</sup>。跃进时粮食分配数如表四所示。<sup>⑮</sup>

表四：

粮食配给	1957	1958	1959	1960
每口人(公斤)	203.0	198.0	186.0	163.5

农民受的苦特别严重，政府从农民那里购买供应膨胀的城市人口的粮食，是基于上报数字而不是基于实际需要。虽然可出售的农产品占农业产量的15—20%，但国家的征购数字在许多年超过20%，有些年份超过25%，1959年高达28%，而这一年粮食大幅度减产。在农村，尽管劳动十分繁重，但在许多地方粮食分配只有200公斤左右，有些地方低到150公斤。“当劳动者处于半饥饿状态时，他们怎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呢？”<sup>⑯</sup>

1960年，服役于解放军中的农民子弟用气愤的评论公开讲了农民的困苦状况：<sup>⑰</sup>

现在，村里农民吃的甚至比过去狗吃的都差。过去狗吃糠和粮食，现在人们饿得无法劳动，猪也饿得不能动。公社社员问：“毛主席会让我们饿死吗？”

毛主席住在北京，他知道农民的日常生活吗？粮食收获了那么多，它们都上哪去了？

是毛主席让他们吃糠咽菜的吗？维修中南海的工人（毛和其他领导人住的地方）每月粮食定量为60斤（即每年360公斤）。但他们还抱怨没有气力干活，而农民只有蔬菜和甜菜，根本没有粮食吃。

城市有足够的粮食，而且供应的尽是细粮，但在乡村，供应的尽是粗粮……甚至家中的病人也得吃甜薯。工人吃大米白面。为什么农村生活那么苦？

这些仅反映广东某县情况的议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透露出来的：20000人被饿死<sup>①</sup>。在全国范围内，死亡率从1957年的1.08%上升到1960年的2.54%，增长了一倍。1960年人口实际下降了4.5%……。②

中国经济学家回顾这段可怕的岁月时，都予以激烈的抨击。当今的经济学界老前辈薛暮桥曾谈到“巨大的浪费和比例失调”<sup>③</sup>。孙冶方把大跃进描绘成一场“社会主义的大破坏”<sup>④</sup>。曾担任过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骆耕漠说，“大跃进变成了一场大跃进。”<sup>⑤</sup>

以下数字证实了上述论断。1960年到1965年间，100000个企业都被关闭，大约2000万人——1961年春天为1000万人<sup>⑥</sup>——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帮助克服农业的灾害<sup>⑦</sup>。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全部损失现在估计为1000亿元，几乎两倍于一五计划期间对基本建设的总投资(550亿元)。把一五计划与二五计划相比较，情况就更清楚了。(表五)<sup>⑧</sup>

表五：平均年增长率(%)

	一五计划 (1953-1957)	二五计划 (1958-1962)
国民收入	8.9	-3.1
工业生产(产值)	18.0	3.8
农业生产(产值)	4.5	-4.3
工业和农业(产值)	10.9	0.6

## 第二节 大跃进的起因何在？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有分寸的语言解释大跃进<sup>⑨</sup>：“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331

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 and 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大跃进期间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同志之一谭震林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开始骄傲和不谨慎起来”；不断强调对生产关系的改造（大概是指人民公社的形成）；“过分”关注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不改革管理，不完善按劳分配制度。<sup>⑩</sup>

薄一波或许在大跃进期间是不情愿地跟着“左”的倾向走的。他也说，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包括我本人”，变得“不谨慎、骄傲自满和急于求成”起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发出成立人民公社的号召后，“由于他对形势的不正确估计，以及过高地估计了人的主观意志和努力的作用，一场重大的轻率行动产生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特征的潮流在全国严重泛滥起来……公正地说，正是毛泽东首先号召纠正1958



种习惯，这种习惯的影响远比党的方针政策的影响更大。”<sup>⑤</sup>虽说重工业要服务于其他的部门，但它只考虑它自己<sup>⑥</sup>。可能毛泽东绝没有完全接受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经济思想，而这些思想似乎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sup>⑦</sup>

### 第三节 毛泽东的作用

333 中国人对历史所作的上述估价都是有根据的。这些估价反映了在那些年代里平民和领导者们亲身经历的痛苦和灾难。但是，1981年6月，中国领导层不可能完全直率地对大跃进中毛泽东的作用加以评价。甚至那些对毛泽东晚年最激烈的批评者，也不想重蹈在中国人眼里看到的赫鲁晓夫犯的非斯大林化的错误：揭露已故领导人太多的内幕，会使党和党的事业遭受危害。

当然，毛泽东要负最终责任是明确的。但是，如果按照6月决议（译按：即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说法来看，他仅仅是发动大跃进的一批人中的地位最高者。然而，任何一位明眼人都一定会从历史记载中得出下列结论：没有毛泽东也就没有跃进，没有毛泽东也就没有公社，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群众性的炼钢运动，没有毛泽东也就没有第二次大跃进的复兴。

毛泽东或许也提倡注意客观情况，但他企求震撼世界的进步的超常愿望，又要求人们夸大成功。毛也许告诫人们不要超越社会主义阶段，但他胸中燃烧了要立刻改造社会的烈火一般的雄心，又把他引向“五风”（译按：即命令主义、浮夸风、平均主义、瞎指挥和“共产风”）以及公社化早期的极“左”。毛也许口头上重视农业，但他要超过苏联和美国的梦想，却使中国投入到以大炼钢铁为先导的群众性工业高潮中去，因为钢铁是50年代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国际标志。毛泽东一方面反复讲要治病救人，另一

方面却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打倒在地，以至于重新发动大跃进，沿着错误的路线走向灾难。对此，党史决议，（译按：即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确予以承认。刘少奇、谭震林、薄一波和许多别的领导人都参与了上述所有活动，但是他们不象毛那样脱离实际。

大跃进中也有可以肯定的东西。在任何发展中国家，很关键的一条就是，人们应当具有不作大自然的奴隶的思想。毛泽东对这个观点是讲得很透彻的，并且一直在这么讲。就象一位军士长高喊口令，使新兵进入生气勃勃的新世界一样，毛泽东使他的人民充满生气。许多农民所接受的高指标，必定是被发动起来但由于经验又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下层干部提出来的。而许多其他人的热情是基于一种观念：再加一把劲，他们可以冲破贫困的枷锁<sup>③</sup>。但是，大跃进的过分行为及其最终破产，使得比较理智的人们在大跃进的震惊之余，进而对经济发展抱冷漠态度。

334 毛的同事似乎被毛的幻想所打动。他为了重新塑造中国而掀起一场革命。这位曾带领他的从漫长的革命征途走向胜利的人，现在又以某种捷径，带领他们向乌托邦发起了冲刺。这不是远在天边的马克思主义的烟霞缭绕的天堂，而是一个新国家——社会纯洁，经济强盛；受到各国尊重——即此时此地中国的农田和工厂。骆耕漠坦率地承认，就连他这样的经济学家也被冲昏了头脑：

当时有不少同志忧虑粮食这样大幅度增产，如果不相当大量出口，就连大建国家储备仓库也难赶上，想用以后减少粮食耕地面积，改种经济作物以至增添农村绿化面积来平衡。这类美好的长期远景规划，我个人当时也相当向往，现在想来是很天真的。<sup>④</sup>

但在当时，谁会去提醒作为神的毛说，大自然可以驯服，却

不可被践踏；人们可以移山，却不能创造奇迹；政治革命可以在10年或者甚至1天里成功，但思想却需要几个世纪。鉴于毛泽东在他的同事中拥有绝对权威（在庐山会议上，这种权威非常可怕地表现了出来），谁能说个不字——周恩来可能会说，陈云肯定会说，彭德怀只是在大跃进发生之后才说了。总之，很少有人会这么说。

那么，刘少奇的态度如何呢？他谨慎而勤奋，本来应当发现这种轻率的运动是完全不妥当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他应当摒弃毛主义的唯意志论。如果依着洁身自好的美好想象的话，他应该躲开大跃进的浮夸和吹嘘。但是，刘和毛一起制定目标，他帮着用党来作为工具，他懂得群众动员的方法，并共同指挥经济上的大突破。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恢复曾在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党所失去的威信呢？也许他或者任何一位毛的同事对大跃进产生过怀疑，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又从毛主席在关键时刻一直正确的事实得到安慰，希望他还会再次正确。如果说外国人，包括思想深刻的经济学家完全不必相信但也相信了大跃进的成功<sup>⑨</sup>，那么，为什么作为大跃进主体的中国人就不能对它寄予厚望呢？

335 一些人也许记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是书斋中的理论家，他们是外国人，决不会想象到中国会比自己的民族——德国先发生革命。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间了。而毛此时正在中国发挥他的意志，他认为意志可以改变经济基础（同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左）。

当然，还有苏联顾问，他们确实说了个不字。但他们也是外国人，并且在中国人眼中是粗鲁的和趾高气扬的。他们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但他们损害本国的农民，削弱自己的农业，而且他们的工业管理模式表明：他们一点也不懂得动员群众<sup>⑩</sup>。此外，如果中国走苏联的路，那么会几乎不可避免地注定成为追随者，

而决非领导者。那样做必定不适于任何中国领导人所追求的未来图景，尤其在苏联外交政策有碍于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那么，毛泽东本人如何呢？他也被自己的幻想所左右了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提得荒唐。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已被迅速取得震撼性进步的思想牢牢地抓住。他不象刘少奇，他热衷于动乱<sup>②</sup>；早些时候评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句话，集中体现了他的性格。他说：“‘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看来，他为自己所运用的权力所振奋。薄一波说，当毛泽东得知2000万人被送回农村时，他又一次高喊：我们有2000万人听从指挥。除了中国共产党外，有哪一个政党能做到这一点？<sup>③</sup>

然而，尽管毛泽东富于幻想，但他有着灵敏的政治触觉。这是他在1958年秋天主动退却的一个原因，党的历史决议对此加以肯定（另一个可能存在的原因是：只有毛泽东敢于决定退却）。1959年春天，他觉察出了危险，并指示进一步后退。

如果说他不愿意放弃大跃进的话（如薄一波指出的那样<sup>④</sup>），那可能是他不想去承认彭德怀的正确。然而，毛泽东已经准备好了辩护词。1960年6月，在总结10年工作时，他写道：

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sup>⑤</sup>

最终，毛泽东作出了承认错误的姿态。大跃进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共产党遭受的最大挫折。但在1960年大跃进结束时，毛并没有象1957年结束大鸣大放的试验时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分歧那

样，和他的同事出现争执<sup>④</sup>。可能因为从大跃进的失败中提高威信的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从来没有向毛泽东的个人地位和权威挑战的意图。

所以，毛泽东退到“第二线”去医治他的创伤（在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他在1961年似乎很少说话），让刘少奇和其他同事收拾残局<sup>⑤</sup>。对党员们来说，一个时代的结束必定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不那么令人振奋，却是一步一个脚印，虽然更加沉闷，却更加平稳。

终于，毛泽东对他的同事为克服大跃进后的萧条而试图开辟自己的道路感到不快，他为自己的威望和权威的降低而恼怒。最重要的是，当中苏论战加剧时，他一直思虑着革命的变质问题，不断促使他直接或间接地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来。他所发动的政治大动乱，将是本书最后一卷研究的主题。

#### 注释：

1. “这是世界毁灭的方式，不是炸弹的巨响，而是哀怨和哭泣。”见 T·S·埃利奥特：《空虚的人们》。
2. 《本季度大事与文献》，载《中国季刊》1961年4—6月号，第183页。
3. 《当代背景》644号，第1页。
4. 杨坚白、李学曾：《论我国农轻重关系的历史经验》，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译按：此处原期号、页码均有误。页码略去，下同。）
5. 刘国光、王向明：《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的探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第23页。
6. 杨坚白、李学曾：《论我国农轻重关系的历史经验》，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7. 《经济研究》1980年第5期，第4页。
8. 刘国光、王向明：《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的探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第26页。
9. 骆耕漠：《关于我国计划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曲折过程的分析》，载《经

- 济研究》1981年第2期，英译文见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华盛顿)卷，77卷—793号第9页(我对句法作了改动)。
10. 冯宝兴、万欣、张大简：《在一定时期内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客观必然性》，载《经济研究》1980年第1期，第20页。
  11. 刘国光、王向明：《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的探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第29页。
  12. 杨坚白、李学曾：《论我国农轻重关系的历史经验》，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13. 这些数字是根据同上第195页、196页上的数字合计的。(译按：此处页码有误。)
  14. 同上，第196页；骆耕漠：《关于我国计划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曲折过程的分析》，载《经济研究》1981年第2期，第7页。
  15. 骆耕漠：《关于我国计划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曲折过程的分析》，载《经济研究》1981年第2期。
  16. 辑自 K-R 沃克《中国粮食生产战略：评赵冈的研究论文》，载《中国季刊》1980年4—6月号，第342—343页；赵冈：《中国观察家的尝试》，载《中国季刊》1980年1—3月号，第102页；《中国农业年鉴》1980年，第34页。又见薛暮桥《当前我国经济的若干问题》，第14页。
  17. 《经济研究》1980年第1期，第24—25页。
  18. 杨坚白、李学曾：《论我国农轻重关系的历史经验》，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19. 同上，第207页。
  20. 下面的话引自陈吉士《中国红军的政治斗争》第13页。战士们也许会得到错误的教导，但是在对危机的政治影响作估计时，他们的直觉和真理具有同等意义。
  21. 《中国大陆杂志选》578号，第28页。
  22. 《经济管理》1981年第2期，第3页；《人口理论概述》(河南，1981年)，第83页；我非常感谢艾尔德提供的对人口下降情况的估计。
  23. 薛暮桥：《在第一次中日经济理论交流会上的讲话》，英译文见《国外广播新闻——中国——81——123》，第K5页。
  24. 孙冶方的讲话，英译文见《国外广播新闻——中国——81——143》第

K12页。

25. 骆耕漠:《关于我国计划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曲折过程的分析》,载《经济研究》1981年第2期。
26. 陈吉士《中国红军的政治斗争》第459页。
27.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献给党诞生的六十周年》,载《红旗》1981年第13期,英译文《国外广播新闻——中国——81——145》,第K34页。
28. 预计中的下降情况,见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25页;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资金投资额,见《北京周报》1959年第16期,第28页;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比较,见《经济研究》1980年第1期,第24—25页。
29. 《北京周报》第27期,第19页。
30. 谭震林:《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乘胜前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载《红旗》1981年第13期,英译文见《国外广播新闻——中国——81——147》,第K15页。
31.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献给党诞生的六十周年》,载《红旗》1981年第13期。
32. 《北京周报》第27期,第19页。
33. 骆耕漠:《关于我国计划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曲折过程的分析》,载《经济研究》1981年第2期。
34.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献给党诞生的六十周年》,载《红旗》1981年第13期。
35. 杨坚白、李学曾:《论我国农轻重关系的历史经验》,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36. 《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2号,第66—69页。
37. 见回忆贾拓夫的文章,他在1956年是轻工业部长。见《新华月报》1980年7号,第60页。
38. 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76—77页。
39. 骆耕漠:《关于我国计划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曲折过程的分析》,载《经济研究》1981年第2期。
40. 他们没有留下姓名。
41. 这一点在毛《对苏联经济学的评论》第121—122页、124页里有所暗示。



42. 见理查德·H·所罗门:《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
43.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献给党诞生的六十周年》,载《红旗》1981年第13期。
44. 同上。
45.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卷,第231页。
46. 见本书第1卷,第270—292页。
47.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献给党诞生的六十周年》,载《红旗》1981年第13期。



## 索 引

中国科学院 13, 119, 211, 218, 220, 236, 279, 318

苏联科学院 279

积累和消费的比例, 参看公社条

全国工商联 312—315, 再参看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条

全国总工会 17—18, 275, 再参看工业条

“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 323

冒进, 参看急躁冒进条

非洲 272

农机部 299

农业中学 参看教育条

农业 2, 61, 77, 81, 85, 89, 213, 310; 农业土地面积的减少 119—128; 农业宪法 122—128, 300; “以农业为基础” 171, 300—301, 324; 基本土地制度 124—126; “中共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 324; 密植 122—124, 170; 深耕 123—124; 灾害 (1960) 322—325; 双季作物 3, 45; 旱灾 (1959) 201, (1960) 322; 食油 202; 试验田 32, 122, 125; 肥料 2, 3, 18, 19, 32, 122—123; 水灾 (1959) 201, (1960) 322; 增长率(“一五”期间) 3, 330, (“二五”期间) 330; 发展战略 4, 122—128; 未能搞好收获 120; 工具 32, 43—44, 46, 48—49, 119, 122, 127, 171, 299—300; 投资 326—327; 劳动力短缺 116, 119—121, 299—300, 317, 323—324, 328; 使劳动力回归农业 323—324, 330, 335; 机械化 32, 43—50, 171, 298—300; 北戴河决议 85; 自留地 87, 103, 148—149, 325; 前景(1958) 82—83; 省级会议 79—80, 123, 124; 种子 32, 122—123; 突出劳动 119—120; 与工业同步发展 33—34; 卫星田制度 124—126; 国家支援 33—34; 甜薯 32, 122, 138, 202, 330; 技术改进 2, 3; 三三制 124—126

粮食 生产 140—142, 143, 152—153, 154—155, 156—157; 消费 2, 84—85, 328—330; 大跃进, 产量最后数字 328—349; 收获(1958) 121—122, 126, 141, 144, 200—201, 204, 247; (1959) 201—202, 301; 增长率(一五计划) 3; 损失 (1958) 120—121; 产量 2, 116,

127, 198, 213, 215, 334; 短缺 144—145, 164—165, 202, 328—  
329; 国家采购 329; 指标(1958) 33, 43, 82, 85, (1959)247,  
(1960)305; (二五计划)18; 产量 2, 42

农业部 47, 201

爱国人民公社 145

空军 参看解放军条

阿克赛钦 256

阿尔巴尼亚 267, 280, 284, 288, 289

阿尔及利亚 解放斗争 241, 265

全国供销社联合会 27

美国 参看美利坚合众国条

厦门 138

安子文 179, 241

《论语》 181

英法帝国主义 284

安徽 104, 120, 126, 143, 200, 248; 本位主义 156; 大跃进日程表 25,  
30

鞍山钢铁公司 130; 鞍钢宪法 306—309

反右运动 参看资产阶级右派条

农业生产合作社 46—47, 108, 109, 130, 131, 140, 147, 154, 182,  
183, 302, 305; 合并 77—78, 104, 147, 148, 151, 181; 转变为公  
社 78—80, 86, 87

阿拉伯联盟 92

北冰洋 95

军队 参看人民解放军条

原子弹, 原子武器, 参看核武器条

澳大利亚共产党 284

秋收起义 83

土造钢 参看钢铁条

巴格达条约 92, 93

万隆时期 73; 万隆会议 271

贝尔格莱德 73

本贝拉 241

血吸虫病 24

生育控制 参看计划生育条  
 盲目前进 参看急躁冒进条  
 鸣放(1957) 28, 29, 136  
 布尔什维克革命 273, 284; 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 7  
 “资产阶级权利” 参看公社、物质刺激条  
 资产阶级右派 1, 28, 33, 37, 52, 219, 311, 332  
 资产阶级 25, 37, 40, 107, 179, 273, 274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 265  
 勃列日涅夫 10  
 大队 参看公社、基层组织条  
 英国 参看联合王国条  
 布加勒斯特 262, 274, 276, 277, 282, 283, 285—286  
 佛 41, 239, 265  
 预算 27, 33  
 N. A. 布尔加宁 68  
 保加利亚 71, 262  
 国家机关 26—27, 28, 59  
 缅甸 270  
 商人 179—180, 310—315; 再参看中国民主建国会条  
 干部 30, 32, 33, 45, 85, 91, 101, 103, 121, 123, 126, 128, 136,  
 137, 140, 141, 142, 144, 145, 151, 153, 158, 164, 172, 300  
 戴维营 255, 260, 263, 272, 277  
 加拿大: 在中国的加拿大科学家 23  
 广州 21, 42, 113, 156, 245  
 基本建设 参看工业条  
 资本家 参看商人、中国民主建国会条  
 菲德尔·卡斯特罗 241  
 天主教徒 27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31, 32, 51, 52, 56, 59, 75, 86, 87, 129, 132,  
 138, 173, 179, 199, 206, 225, 227, 234, 235, 238, 240, 244, 267,  
 276, 285; 与鞍钢宪法 306; 中央委员的津贴 304  
 会议: 广东会议(1960) 264, 269, 272; 杭州会议(1960) 264, 269,  
 298; 军委会议(1958) 66—68, 96; (1959)237—244; (1960)320—322;  
 上海会议(1960) 264, 266

决定,指示,联合指示,信和决议: 农业贷款 151;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 77; 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 133—134, 137; 关于台湾海峡危机致苏联共产党的信 99; 关于深耕 124; 关于教育 110, 112; 除四害 24; 与国务院的联合指示 61; 关于公共食堂 104; 关于党史 330—333; “和平过渡” 8; 关于彭德怀 229, 234; 关于农村工作的十二条指示 324—345; 突击劳动 120; 毛的继承人 176—7; 水利 34  
部门和官员: 主席和副主席 32, 230; 办公厅 304; 高级党校 179, 236, 319—320; 对外联络部 73; 军事委员会 63, 65—70, 80, 172, 246—247, 320—321; 组织部 179; 宣传部 109, 127, 176, 107, 212, 319; 统战部 311, 313

全会: 八届二中全会 27; 三中全会 4, 16—17, 18—19, 25, 55—56, 58, 60; 四中全会 21; 五中全会 60, 62, 63, 65, 75; 六中全会 91, 121, 126, 127, 129, 130, 132, 133, 136, 139, 140, 142, 144, 146, 148, 154, 156, 165, 179, 182, 183, 184, 196, 200, 219, 224, 305, 316; 七中全会 136, 165, 166, 167, 172, 173, 177, 200, 205, 206, 207, 224, 324; 八中全会 121, 128, 157, 181, 183, 191, 211, 223—225, 226, 228, 231, 233, 234, 236, 242, 247, 249, 250, 261, 293, 296, 298, 300, 301, 303, 305, 306, 307, 311, 316, 317, 318, 319, 324, 331—332; 九中全会 326; 再参看中国共产党、中央财经小组、政治局条

中国共产党 1, 22, 28, 37, 38, 39, 41, 43, 44, 45, 53, 54, 78, 83, 84, 88, 105, 127, 145, 158, 176, 177, 208, 221, 241, 265, 270, 310, 324, 326, 333, 336; 中共与资产阶级 40, 179, 310—315; 中共与商人 310—315; 中共被批评 1, 33; 中共对外政策的制定 71—75; 中共与政府 30—31, 59—63, 73—75, 323; 中共与国民党 245; 中共的领导 55; 北方局 178; 中共与解放军 1, 63—71, 215, 231, 246—247; 清洗 62—63; 中共与南斯拉夫共产党 72—73, 271  
会议: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51, 291; 省长会议 136

代表大会: 七大(1945) 188, 198, 205, 227; 八大(1956) 8, 18, 174, 194, 205, 241, 246, 301, 318; 八大二次会议(1958) 17, 19, 20, 21, 33, 42, 49, 51—59, 62, 75, 78, 83, 122, 124, 178, 330; 九大(1969) 180, 244

党章 177

政策: 对资产阶级右派 1, 52; 对合作化 37; 再参看中央委员会、政

## 治局条

中国民主建国会 180, 312—315; 再参看资产阶级、商人条

中央财经小组 164—165, 166—169

中央新闻机构 227

中央条约组织 92

张之洞 149

张春桥 104, 106—108, 115

长葛县 124

张仲良 123

张恺帆 248

张平化 236

章伯钧 219

张闻天 生平与性格 204—205, 227; 命运 234, 236; 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 205—206; 在庐山会议上 204—206; 庐山会议讲话 217—218, 222; 与毛泽东的关系 205—206, 210, 218, 224—245, 226, 228, 236, 239, 246, 331; 与彭德怀的关系 204—207, 213, 214, 216, 217

长沙 21, 187, 190

赵尔陆 166

赵紫阳 140; 调查本位主义 140—142; 与毛泽东的关系 140, 144, 146, 156—158; 流传的报告 146

浙江 20, 48, 49, 83, 143

陈正人 299, 300

陈锡联 244

陈赓 243, 244

陈伯达 210; 在建立公社方面起的作用 78—82; 提倡取消货币 130—131; 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41, 179; 任《红旗》杂志主编 41, 73, 302; 与毛泽东的关系 41, 104, 129—130, 232, 239; 与彭德怀的关系 237—240, “穷过渡” 131; 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人 73

陈独秀 241

陈毅 35, 83, 205; 论资产阶级 40; 生平和性格 74—75, 261; 接任外交部长 73—75; 处理中印外交关系 75, 260—263; 与印度尼西亚 271; 与日本 74—75; 与北朝鲜 74; 与苏联 269, 280, 281, 291; 与美国 283, 291; 论帝国主义 266, 283; 谈中国要掌握核武器 69;



论“红与专” 79; 与张闻天的关系 218, 236; 与周恩来的关系 75; 与赫鲁晓夫的关系 260—263, 271; 与刘少奇的关系 75; 与毛泽东的关系 75; 与彭德怀的关系 236; 论大炼钢铁 115

陈云 20, 294; 文章、报告和讲话: 论粮食短缺(1959) 164—165; 论工业布局(1959) 163—164; 论钢的生产指标(1959) 165—170, 215, 249, 307; 论经济危机(1960) 323; 论华沙条约国会议(1958) 72—73; 权力被削弱 169, 171—172; 生平和性格 32, 163, 230; 中央财经小组成员 164—165, 166—169; 论“下棋”的艺术 163; 在大连 229; 关于权力下放 60, 163—164;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 58; 引证恩格斯的话 164; 负责一五计划 60, 163; 在河南 171—172; 对急躁冒进的态度 17; 在十三陵水库 163; 谈彭德怀 229; 与毛泽东的关系 25, 32, 49, 57—59, 60, 129, 163—165, 169—170, 171, 192, 193, 297, 334, 336; 论实事求是 164

郑州 145, 306; 再参看政治局、第一次和第二次郑州会议条

成都 21, 35, 101; 再参看政治局、成都会议条

S. V. 契尔沃年科 262, 269, 280

“下棋的艺术” 129, 142—144, 155—156, 163, 179; 再参看经济发展战略条

蒋介石 74, 96, 191, 221, 245, 263

《解放军报》 66

钱三强 13

七里营人民公社 80—81

秦朝 153

中华人民共和国 1, 2, 14, 21, 27, 40, 43, 44, 46, 54, 64, 75, 77, 79, 82, 84, 85, 91, 94, 95, 113, 114, 115, 119, 123, 124, 127, 130, 132, 133, 137, 139, 147, 163, 178, 180, 182, 187, 194, 202, 206, 219, 238, 292, 298, 308, 309, 314, 322, 331; 赶上苏联 90, 106; 赶上英国 17, 28; 赶上美国 90, 297—298; 中国与裁军 266; 经济权力下放 10; 经济问题 1, 3—4, 326—330; 外交关系 1, 11—12, 71—73, 74—75, 91; 与缅甸 270; 与印度 75, 172, 255—260, 265, 270, 271, 277, 280; 与印尼 270—271, 280; 与日本 74—75, 83, 193, 208, 245; 与尼泊尔 230; 与苏联 264—266; 与联合国 75; 与美国 9, 71, 75, 96—100, 101, 115, 264, 268, 271, 272; 与南斯拉夫 71—73, 280; 核技术和核武器 71—75, 69—71; 政治制度

1; “一穷二白” 28; 人口 1, 197—198, 330; 科学和12年科学规划 12, 29; 解放台湾 7, 71, 96, 263; 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 246, 249—250, 255; 要求12海里领海权 97; 再参看中苏关系条

中国民主同盟 208

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 271

中国人民志愿军 74, 243

清朝 149

井冈山 83, 194, 245

邱会作 244

周恩来 237;

生平和性格: 32, 175, 230; 在庐山 222, 233; 在十三陵水库 75—76; 辞去外交部长的兼职 33, 73, 230; 自我批评 57, 58; 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 61

外交方面: 亚洲外交 271; 持续的作用 73—7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体姿态 71, 72; 台湾海峡危机 98, 100, 101; 与印度 255—256, 259, 270, 271; 与北朝鲜 43—44; 与苏联 135, 261, 281; 与南斯拉夫 71

重大问题和事件(态度、行动和看法): 鞍钢宪法 309; 资产阶级 311; 经济调整 323; 财政部 25—26; 粮食短缺 165; 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34; 大跃进 30, 34; 海瑞 210—211; 急躁冒进 17, 232; 以工业为主导 171; 毛崇拜 188; “红与专” 179; 右倾机会主义 249—250; 苏联模式 37—38; 大炼钢铁 113, 129—130, 169—170, 233

关系: 与张闻天 205; 与陈毅 75; 与贺龙 240; 与高岗 178; 与李富春 61; 与李先念 61; 与林彪 245; 与刘少奇 57—59, 175—176, 178, 232, 241; 与马寅初 298; 与毛泽东 25, 32, 33, 49, 57—59, 71, 129, 171, 210—211, 222, 232—233, 246, 334, 336

讲话和书信: 致尼赫鲁的信 259; 在人大的讲话(1957) 58; 在人大的讲话(1958) 71, 74; 在人大常委会上的讲话 248;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9) 311—31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文章) 249—250

周小舟 161—162, 198—199, 203, 204, 217, 234, 231, 237, 331

周信芳 207, 211—212

周立波 187

周扬 207, 210

朱德 35, 70, 230, 245, 261; 继承毛地位的意图 177—178, 194, 229,

230; 对公社的批评 229; 维护彭德怀 229; 种菜 304; 自我批评 229; 对中苏关系的态度 269

株洲 197, 200

重庆 21, 22, 36, 112

《中国青年报》 105

中南海 235, 236, 304, 329

煤 16, 18, 21, 33, 53, 89, 168, 169, 206, 215, 307, 326, 327

煤炭工业部 167

合作化 37, 44, 58, 88, 147, 152—153, 180

商业部 25, 27

人民公社 32, 47, 84, 97, 129, 187, 193, 201, 219, 280, 305, 310, 326

源起: 1, 76, 77—89, 220—221; 北戴河决议 85—88, 104, 181

主要特点: 78—81, 65—68, 310; 寄宿学校和托儿所 105—106; 集体主义生活作风 87, 101, 103—106; 基层组织 86, 140, 141, 147, 148, 150, 151, 161—162, 181—184, 302, 303; 免费供给和义务服务 103—104, 107, 121, 302—303, 305—306, 328; 敬老院 87, 106, 197—198, 199; 妇女劳动力的解放 103—106, 305; (公共)食堂 87, 103—104, 121, 138, 141, 146, 148—149, 197, 204, 220, 229, 249, 328; 民兵 101—102; 非物质刺激 106—108, 324; 两种类型的所有制 130—131; 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82, 84, 86, 87, 88, 103, 104, 111, 130—131, 133

问题: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 155, “共产风” 147, 154, 331; 广东和福建的民意 137—140; 财产的没收 138, 165; 本位主义 137—144, 155—156; 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 149—150, 317; 平均主义 146—149, 161—163, 324—325; 粮食供给和价格 138—139; 自留地 87, 103, 148—149, 325; 三个变化 136; 管理和所有制的三级形式 146, 154—155, 181—184; 资源的转移 146—149, 324—325

整顿: 134, 136—137, 140—159, 160—162, 173, 181—184, 191—192; 以大队为基础 155, 161—162, 324; 18条 172; 四种变化 136—137; 激进调子的降低 132—135, 136; “关于农村工作的十二条紧急指示” 324—325

城市: 305—306

中国人口后的总结: 1, 331

共产主义集团 参看社会主义阵营条  
 世界花园的共产主义运动 7, 9—10, 36  
 “共产风” 参见公社问题条  
 孔子 41, 181, 220  
 棉花 18, 33, 213, 247, 305  
 苏联共产党 7, 47, 194, 227, 287; “反党集团” 12, 14, 61; 中央全会(1960) 278; 主席团 278; 党与红军 14—15; 与波兰共产党的关系 12; 与南共的关系 12, 71—73; 书记处 61; 二十大 8, 9, 50, 273, 283, 287, 290; 二十一大 132, 135, 275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45, 46, 51, 58, 60, 68, 75, 84—85, 90, 104, 111, 120, 127, 158, 172, 173, 174, 176, 178, 210, 217, 222, 228, 244, 249, 255, 290, 291, 292, 294, 295, 303, 308, 309, 310, 314, 318, 319, 321, 326, 332; 再参见红卫兵条  
 达赖喇嘛 257, 259  
 达尔文 41  
 戴高乐 265  
 出生率 参见死亡率条  
 权力下放 15—16, 36, 46, 59—63, 163—164, 192  
 国防部 201, 234; 再参见彭德怀、林彪条  
 民主党派 28  
 本位主义 参见公社  
 非斯大林化 1, 38, 39, 241, 332  
 “胜利冲昏头脑” 152  
 旱灾 参见农业  
 杜勒斯 26, 69, 93, 97, 98, 100  
 《东方红》 241  
 东风、西风 9—10, 93  
 东欧 12, 19, 133, 200, 205, 209, 262, 267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134  
 经济发展战略 1, 3—4, 15—19, 37, 51, 55—59, 88, 179, 300—301, 323—325, 326—330; 再参见“下棋的艺术”条  
 教育 37, 84; 农业中学 87, 109, 317; 寄宿学校 105; 北戴河决议 85; 教育和生产劳动 32, 108—113, 179, 317; 强调质量 315—316; 学制的缩短 17; 工农学生入学 317—318

埃及 92

D·D·艾森豪威尔 69, 92, 94, 98, 226, 260, 263, 266, 267, 271,  
272, 274, 275, 276

恩格斯 38, 164, 321, 334-335

英格兰 参见联合王国条

欧洲 93, 274

“全民皆兵” 参见公社、民兵条

专家 参见“红与专”条

费·萨尔国王 92

计划生育 1, 4, 40, 298

远东 64

财政部 17, 24-27, 59, 60, 150-151; 再参见李先念条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255-256

水灾 参见农业条

粮食部 27, 201

民歌 参见诗条

粮食短缺 137-139, 144, 164-165, 202, 205, 304-305, 329, 332; 再  
参见农业、谷物缺乏、猪等条

紫禁城 235

外交部 33, 37-38, 73, 278

外贸部 27

四害 参见卫生条

第四野战军 243, 244, 245

法国 92, 93, 265; 共产党 286, 287

傅连璋 235

福建 125, 138, 143, 149, 155, 322; 农业学院 112

抚顺 21

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 1, 2-3, 18, 53, 60, 62, 164, 296, 326, 327,  
330; 一五计划与二五计划的比较 330, 二五计划 18-19, 31, 53, 82,  
90, 299, 301, 327, 330; 三五计划 325

“四人帮” 236

联合国大会 94

日内瓦会议(1961) 75

地质学院 318

德国 135, 265, 335  
哥穆尔卡 288, 289  
中国政府 22, 27, 59; 对核试验的立场 69; 公共保健政策 23; 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30-31, 59-63, 73-75, 323; 补贴农业 33-34; 资助炼钢运动 115-116  
大不列颠 参见联合王国条  
大跃进 28, 33, 39, 50, 56, 57, 58, 75, 78, 99, 123, 127, 137, 179, 192, 193, 201, 211, 212, 249, 282, 302, 309; 源起 3-4, 17, 20, 29-30, 32, 34, 42, 220-221; 战略 3-4, 24-25, 32, 40-42; 总路线 42; 发动 51-76; 游击作风的领导 62; 新闻的作用 81; 北戴河的转折点 82-90; 矛盾的形象 84-85; 高潮 91-116; 六中全会的退却 91; 农业劳动力的短缺 4, 119-121, 124, 299-300, 317, 323-324; 工业劳动力来源的扩大 149-150, 299-300; 大跃进的复苏 247-251, 296, 301-305, 316; 对苏联人的影响 262; 对文学的影响 41-42, 301-303; 军事术语 302; 教育革命 316-318; 1960年运动结束 325, 326; 对经济的影响 1, 326-330; 对死亡率的影响 330; 原因 330-336; 再参见农业、公社、工业、跃进(1956)条  
中国长城 245  
葛罗米柯 98, 261  
海瑞 207-212; 《海瑞罢官》 212; 《海瑞上疏》 208, 211-212; 《海瑞骂皇帝》 209  
海南岛 293-295  
汉朝 44  
杭州 20, 22; 再参见政治局、杭州会议条  
汉口 21, 40  
敬老院 参见公社条  
哈尔滨 227  
卫生 除四害运动 21-24, 42-43, 305; 卫生 6; 毛泽东思想 319  
黑格尔 164  
黑龙江 47, 126  
克里斯汀·赫特 260  
贺龙 35, 70-71, 135, 240, 243  
贺子珍 227  
河南 79, 80, 83, 105, 121, 129, 143; 水利建设运动的效果 34; 开

伊尔-28轰炸机 96  
 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 7, 10, 64, 72, 73, 101, 264-265, 268, 269-270, 273-274, 286, 287-288, 320  
 急躁冒进 17, 18, 25, 42, 113, 147  
 印度 92, 93, 101, 105, 282, 287; 印度农业与中国农业的比较 2; 与中国的边界争端 75, 255-263; 印度共产党 290  
 印度尼西亚 75, 270-271, 280; 印尼共产党 284  
 工业 1, 2, 37, 44, 77, 81, 213, 215; “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 323; 基本建设 213-214; 一五计划末期的工业增长率 3; 大跃进期间的工业增长率 326-328; 劳动力的增加 119, 149-150, 299-300, 317, 328; 公私合营 310, 312; 劳动生产率 328; 以工业为“主导” 171; 轻工业的不景气 326-328; 工业布局 163-164; “土办法” 4, 29; 北戴河决议 85; 工业政策 297, 300-301; 比农业优先 89, 332; 技术革新 312; 托拉斯 309-310; 劳动力从工业返回农业 165, 170, 323-324, 330, 335; 再参看钢铁条  
 雅加达 270  
 饶漱石 28, 83, 231, 234  
 日本 204, 285; 日本农业与中国农业的比较 2; 日本共产党 276, 284; 与中国的关系 74-75, 83, 193, 208, 245; 日本社会党 276  
 上帝 41  
 亚诺什·卡达尔 71  
 加里宁 68  
 康生 210; 与农业机械化 45-47; 土法炼钢 113; 论公社 103; 分管高级党校 319-320; 论毛泽东思想 319-320; 与毛泽东的关系 45; 与苏联的关系: 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1960) 267-268; 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1960年莫斯科会议 285  
 康雨文 79  
 甘肃 123, 195-196, 197, 202  
 高岗 28, 39, 59, 177-178, 231, 234, 237, 241  
 《资本论》 294  
 加德满都 75  
 赫鲁晓夫 70, 274, 276, 286, 289; 回忆录 14, 255; 下台 17  
 苏联内部事务, 行动和态度: 权力下放 48; 非斯大林化 8, 39, 332; 经济政策 15-16, 28, 40; “轻率的计划” 17; 机器拖拉机站 47; 超



过美国 16; 苏共书记处 61; 朱可夫被革职 14; 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讲话(1956) 8, 9, 273;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 7; 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讲话(1959) 275; 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1957) 16, (1960) 265

国际事务, 行动和态度: 裁军 266; 在印度 271; 在印尼 271; 中东危机 92-94; 核试验 68-70; 流产的巴黎首脑会议 275; 帝国主义 9-11, 72-73, 258, 260; 与美国的关系 68-69, 72-73, 92-94, 225-226, 255, 258, 260, 263, 264, 265; 访问美国 226, 255, 258, 260, 264, 268

中苏关系: 双边问题——需要中国的支持 12, 14; 个人的作用 291-292; 军事合作 11-15, 68-70, 225-226; 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 14, 225; 争执问题——阿尔巴尼亚 284, 288; 和平过渡 8; 东西方的力量对比 10-11; 中印边界 255, 260-263, 265, 277; 向共产主义过渡 132-133; 战争与和平 9-11, 72-73, 258, 275; 国际会议——匈牙利党代表大会 265-266; 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 276-278, 292; 访问中国 (1954)255, (1958)80, 93-96, (1959)255, 260-264, 266, 271, 292, 298

对中国内部事务, 行动和态度: 人民公社 132-135, 226-228, 265; 大跃进 262, 265; 百花齐放政策 262; 台湾 262-263; 台湾海峡危机 95-100, 225

与中国领导人的关系: 与毛泽东 7-19, 40, 63, 68-70, 93-96, 98-99, 132-135, 225-228, 260, 261, 262, 265, 268, 274-275, 277, 284, 291-292; 与彭真 276-278; 与彭德怀 7, 226-228, 277; 与邓小平 285, 289

江西 24, 25, 83, 143, 191, 200, 232

江苏 83, 322

基辅 291

金日成 129

吉林 125

岸信介 74, 276

米哈伊尔·A·科罗契科 23, 278, 279-280, 304, 318

国民党 9, 25, 35, 83, 93, 95, 96, 97, 99, 188, 195, 208, 245, 263, 321

柯庆施 论资产阶级 40; 论“下棋的艺术” 143-144; 建议免费供给制

104; 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62; 与毛泽东的关系 21, 36, 62, 83, 89, 164, 250; 与谭震林的关系 83; 炼钢运动的倡导者 83, 89, 221, 250; 工业布局 164

B·P·柯伊拉腊 270

《共产党人》 72

朝鲜战争 39, 65, 74, 193, 194, 237, 243, 245, 246

费洛尔·科兹洛夫 278

克里姆林宫 276, 286

龚品梅主教 272

昆明 112, 115, 208, 278, 318

郭沫若 211

奥托·库西宁 275

广西 20-21

广东 126, 137-144, 146, 149, 154, 156, 157, 158, 172, 250, 294;  
水灾 (1959)201, (1960)322; 党代表大会 144; 公社的整顿 161-162; 再参见赵紫阳、陶铸条

贵州 35

土地改革 3

老挝 75, 264

拉丁美洲 272

跃进(1956) 4, 17, 25, 26, 27, 28, 29, 36, 42, 48, 49, 57, 193;  
再参见大跃进条

黎巴嫩 92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216, 276

列宁 38, 55, 103, 104, 135, 216, 220, 221, 260, 264, 265, 272-274, 275, 276, 284, 287-288, 319, 321, 335

列宁格勒 278

列宁主义 参见马列主义条

李井泉 35; 维护公社 250; 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1960年莫斯科会议 285; 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62; 与毛泽东的关系 21, 35-36; 与彭德怀的关系 250; 与邓小平的关系 62; 支持大跃进 36

李仲云 225

李富春 文章、报告、讲话: 中华全国总工会 18-19; 《人民日报》(1960) 300-301; 经历与性格: 进入中央书记处 57-58, 60-61, 323; 中央财

经小组成员 166; 重大问题和事件(态度、行动和看法): 以农业为基础 300-301; 经济调整政策 323; 急躁冒进 17; 工业布局 163-164; “多快、好、省……” 18; 超英 18; 按比例发展 301; 二五计划 18-19; 301; 炼钢运动和钢铁指标 18, 89-90, 166, 221, 301; 与周恩来的关系 61; 与毛泽东的关系 89-90, 129, 163-164, 193, 221, 336

李先念 123; 文章、报告、讲话: 1958年八大讲话 33; 1959年人大讲话 150-151; 经历和性格: 进入中央书记处 57-58, 60-61; 在财政部的作用 26-27; 重大问题和事件(态度、行动和看法): 在庐山会议上 218; 供给制 104; 急躁冒进 17; 权力下放 60; 赞同陈云而不赞同毛泽东的经济分析 323; 与周恩来的关系 61; 与毛泽东的关系 25, 26-27, 57-59, 150-151, 323

李白 41

李达 243

李维汉 311-314

廖承志 285

廖鲁言 45, 49, 122, 179, 221

辽宁 21, 114, 126, 248, 306, 322

解放区 37

林彪 261; 文章、报告、讲话: 军委会议(1959) 239, 242; 谈《毛选》4卷 320-321; 九大报告 180; 经历和性格: 244-247; 晋升为政治局常委 65, 75, 193; 中共中央副主席 230; 成为国防部长 237; 重大问题和事件(态度、行动和看法): 庐山会议 229; 毛泽东思想 246, 320; 人与武器的关系 320; 民兵 320; 思想政治工作 246, 320-322; 整顿军队 242-244; 与邱合作的关系 244; 与周恩来的关系 245; 与刘少奇的关系 241, 242; 与刘亚楼的关系 66, 243; 与毛泽东的关系 65, 244, 245, 246-247

扫盲 42

文学 301-303; 再参见诗歌条

刘爱琴 175

刘长胜 271, 275

刘建勋 303

刘晓 267

刘澜涛 179

刘宁一 275, 285

刘伯承 13, 35, 240

刘少奇 127

经历与性格: 173-176, 232, 295, 311, 319; 资深的中央副主席 1, 230; 经济研究 293-295; 家庭生活 173-175, 285; 在政治局第一线 32; 国家主席 173-180, 229, 230; 健康问题 293, 294; 党支部 174; 主持政治局 166, 169, 174; 送子女去公社劳动 131; 改造中共机关 1; 种菜 304; 工作作风 173-175, 178, 294

外交事务: 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1960年莫斯科会议 39, 285, 290, 291, 323; 中苏关系 266, 269, 281, 285, 290-291, 292; 建议赫鲁晓夫后退 292; 访问苏联 291; 论西方 281

重大问题和事件(态度、行动和看法): 农业机械化 44, 47; 土法炼钢 113; 寄宿学校 105; 商人的作用 180, 295, 310-315; 集体领导 241; 公社的出现 78, 81-83, 230; 经济政策 17, 18; 教育和生产劳动 108-113, 317; 供给制 104, 295; 大跃进 30, 51-54, 230, 334-335; 高岗 231-232; 庐山会议 222, 230-232; 对毛的个人崇拜 188, 199, 240-241; 毛泽东思想 319, 321; 党的领导 55; 出版 88, 230; 生产成果 131; 整风运动(1957) 51-52; 右倾机会主义 249-250; 规章制度 30; 突击劳动 119; 苏联模式 44; 钢铁指标(1959) 166, 169; 研究美国 108; 三三制 127; 向共产主义过渡 88, 111, 130, 230; 托拉斯 309-310

关系: 与一般的中央委员的关系 178-179; 尤其与陈毅的关系 75; 与周恩来的关系 57-59, 175-176, 178, 232, 241; 与朱德的关系 177-178; 与薛暮桥的关系 294-295; 与林彪的关系 241, 242; 与毛泽东的关系 32, 33, 34, 51-59, 82, 108-110, 131, 173, 174, 176-177, 178, 188, 199, 211, 222, 230-232, 233, 240-242, 270, 289-290, 294, 309-310, 319, 333, 334, 335, 336; 与彭真的关系 61, 175, 179; 与彭德怀的关系 177-178, 230-232, 237; 与人民解放军的关系 177-178, 240-242; 与薄一波的关系 58, 179; 与孙冶方的关系 295; 与陶铸的关系 294; 与邓小平的关系 241; 与吴芝圃的关系 303-304

讲话、书信、指示、文章: 全国总工会 17, 51; 布尔什维克革命40周年 56;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52; 八大 8, 52, 174; 八大二次会议 17, 51-54, 56-57, 178, 230; 在河南致函黄炎培 180, 295, 312; 庐山 241; 中共中央军委 240-242; 关于半工半读的政治

局会议(1958年) 108-109; 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政治局会议 313; 与  
《工作方法六十条》 29, 3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 249-  
250; 关于共青团 108  
在国内的视察: 海南 293-295; 河南 105, 111, 303-304; 徐水  
131; 江西 232; 江苏 104, 108, 111; 山东 108; 巡视全国(1958年)  
91  
刘子厚 145, 156  
刘亚楼 66-67, 69-71, 243, 244  
刘允若 285  
刘允斌 285  
罗瑞卿 176, 187, 188, 190, 242-243  
骆耕漠 330, 332, 334  
罗隆基 219  
伦敦 100  
《列宁主义万岁》 272-274, 275, 279, 282, 284, 287  
长征 107, 194, 205, 221, 243, 245  
隆哥 288-289  
吕鸿宾 145, 156  
陆定一 285; 基本问题: 教育和生产劳动 109-112, 317; 教育质量  
315-316, 318; 毛泽东思想 319, 321; 与毛泽东的关系 112  
雷州 140  
龙唯灵 302  
庐山 68, 187, 190-191, 228, 234, 323; 另见庐山会议、中央第八次  
全体会议条  
马丁·路德 41  
马寅初 298  
中共中央军委, 见中共中央条  
澳门 139  
第一机械工业部 166, 167  
拖拉机站 46-48, 134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 308  
格奥尔基·马林科夫 32  
R·Y·马利诺夫斯基 15, 65, 93, 95  
满洲 39

毛福轩 189

毛霞生 188

毛泽东 7, 14, 19, 51, 127, 237, 289, 325, 329

经历和性格: 谨慎 25; 与斯大林和铁托比较 232; 批评和自我批评 49—50, 129, 145, 216, 218—219, 220—221, 222; 崇拜对象 27, 240—241, 284; 去世 294, 326; 早年 187, 188; 急躁 88—89, 333—334; 过于自信的主张 4; 父母 187, 188, 190; 农民运动讲习所 42; 不做国家主席, 退居政治局二线 32—33, 133, 173, 177, 336; 重视农民问题而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领导地位 88; 游泳 189; 报复 223, 229—230; 贺子珍 227; 杨开慧 188; 工作作风 20, 88—89

外事活动: 7—17; 中国的敌人 269—270; 东风、西风 9—10, 93; 中东危机 93—95; 与西方的关系 9—11, 72, 96—100, 265, 272; 台湾海峡危机 95—100; 第三世界来宾 271—272; 美国的实力 9—11

主要问题和事件(态度、行动和看法): 不怕开除党籍 153, 159;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 155; 农业宪法 123—124, 农业是基础 171, 297, 299, 324; 农业机械化 44—49, 171, 189, 298—300; 年年跃进 145; 大鸣大放 28, 29; 资产阶级 40—42, 311—312; 队为基础 155, 161—162; 商人 310, 311, 313, 315; “一盘棋” 129, 155—156; 秦王朝和隋王朝 153; 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3—4, 88; 商业部 25; 人民公社的起源 77—82, 88—89, 129, 220—221, 331, 333; 人民公社的整顿 146—159, 181—184, 191—192, 247, 296; “共产风” 147, 154, 196, 219, 221, 304; 孔子 220; 学习美国的长处 129; 劳役 150; 取消货币 130—131; 权力下放 15—16, 59, 60; 深耕 124; 本位主义 142, 144, 147, 153, 155—157; 经济调整 323; 经济政策 18; 庐山会议后的经济战略 296—298; 经济研究 293, 295—298; 教育和生产劳动 108—112, 318; 平均主义 146—149, 153, 154, 162, 192, 324—325; 犯错误 335—336; 计划生育 4, 40; 财政部 17, 24—27, 59, 150—151; “五风” 188; 粮食消费 85—86; 食物短缺 144—145, 152; 免费供给制 104, 295; 瞒产 144, 152—153, 154—155; 粮食收成(1958年) 121—122, 126; (远景展望) 298; 大跃进——总路线和战略 40—42, 145, 192, 220—221, 224, 333; 毛个人的作用 331—336; 问题 145, 248, 结局 336; 海瑞 207—208,

210-212; 卫生政策 21-24, 42-43; 高潮(1958年) 责任所在 91, 220-221; 河南的作用 42-43, 155; 胡风 211; 百花齐放 1; 急躁和冒险主义 25, 42-43, 147; 工业劳动力队伍扩大 149-150; 知识分子 27-29, 40-42, 211; 高岗 231-232;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216; 列宁 220; 工业布局 164; 长征 221; 三级管理 154-155, 324; 体力劳动 75-76; 对毛的个人崇拜 54-55, 188; 马克思 221; 物质刺激 106-107; 食堂 220, 247-248; “军事俱乐部” 224, 239; 军队现代化 13, 14, 15, 63-64, 67, 70-71; 民兵 98, 100-102, 310; 人力动员 54-55, 333; “多、快、好、省” 52, 54, 146; 土法(上马)工业化 29; “十指中的一指” 145, 146, 204; 赶超苏联、美国 333; 赶超英国 17, 90; 三级所有 154, 324; 所有制两种类型 130-131; 党对政府机构的控制 25-27, 59; 党对人民解放军的控制 63-71, 246-247; 党的领导 55; 党的团结 58-59, 219, 220, 224, 238; 农民 88; 猪 305; 计划体制 31-32; 诗歌 41-42, 154; “一穷二白” 28; 人口 297-298; 新闻报道 81, 88, 220-221; 按比例发展 145, 192, 296; 省一级的“清洗” 62-63; 现实目标(1957年) 51-52, 311; 红与专 28, 30, 40-42, 179; 右倾机会主义 136, 153; 科学 29; 实事求是 164, 326; 自力更生 297; 突击工作 120; 工农业并举 33-34, 39; 大胆说话 207, 212; 苏联模式 4, 28-29, 36-40, 49-50, 67, 129, 134-135, 192, 227, 270, 295-298; 斯大林 7-8, 32, 38, 54, 55, 134-135, 151-152; 统计工作 31-32; 钢铁 4, 83, 88-90, 113-115, 128-130, 137, 149, 167, 169-170, 192, 220-221, 197, 198, 333; 孙逸仙 238, 247; 技术革新 312; 三三制 124-126, 127, 170-171; 劳动力从工业转移到农业 323-324, 335; 资源转移 146-149, 324-325; 向共产主义过渡 88, 130-135, 154; 托洛茨基 29; 托拉斯 309-310; 《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 22, 52; 不断革命 29; 两条腿走路 216; 向自然开战 27-28; 水利 127, 187, 189; 魏征与岳飞 207  
与下列人物的关系: 张春桥 104, 106-108; 张闻天 205-206, 218, 224-225, 226, 228, 236, 239, 246; 陈正人 299; 陈伯达 41, 78-82, 104, 130-131, 232, 239; 陈毅 75; 陈云 25, 32, 49, 57-59, 60, 129, 163-165, 169-170, 171, 192, 193, 297, 334, 336; 周恩来 25, 32, 49, 57-59, 71, 129, 171, 188, 210-211, 222, 232-233, 246, 334, 336; 周小舟 204; 华国锋 188, 236-237; 康



生 45; 赫鲁晓夫 7-19, 38, 40, 63, 68-70, 71, 93-96, 98-99, 132-135, 226-228, 260, 261, 262, 265, 268, 274-275, 277, 284, 291-292; 柯庆施 36, 83, 89, 164, 221, 250; 郭沫若 211; 李井泉 35-36; 李富春 89-90, 129, 163-164, 193, 221, 336; 李先念 25, 26-27, 57-59, 150-151; 廖鲁言 221; 林彪 65, 244, 245, 246-247, 320-322; 刘少奇 32, 44, 51-59, 82, 108-110, 131, 173, 174, 176-177, 178, 188, 198, 211, 222, 230-232, 233, 240-242, 270, 289-290, 294, 309-311, 319, 321, 333, 334, 335, 336; 刘子厚 145, 156; 刘亚楼 66-67; 罗瑞卿 187, 188, 190, 242; 陆定一 122; 彭真 58, 210, 336; 彭德怀 1, 14-15, 38, 63-71, 82, 100, 157, 170, 173, 177-178, 188, 193, 194-195, 199, 200, 203, 204, 207, 213, 214, 215-217, 219-223, 224-245, 226, 228, 229, 233-234, 237-239, 242, 244, 297, 331-332, 333, 334, 335; 薄一波 57-59, 331, 333; 斯大林 38-39; 谭震林 61, 82-84, 124, 127, 170, 221, 300, 333; 谭启龙 81, 145; 陶铸 141, 144, 156-159; 陶鲁笏 156; 邓小平 32, 50, 61, 173, 319; 邓子恢 57-59; 王稼祥 129, 227-228; 王任重 36, 161-162, 187; 吴芝圃 42-43, 80-81, 129; 吴晗 209, 210-212.

中苏关系(事件和问题): 36-37, 38-39, 94-95, 98, 132-135, 293, 308;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的举动 289-291, 323; 列宁周年纪念日的论战 273, 295; 1957年莫斯科会议 7-17; 不亲自出席1960年莫斯科会议 276, 285; 核武器 11-12, 70, 98; “纸老虎” 10-11, 99-100, 284; 和平过渡 8-9, 295; 苏联军事力量 9; 对斯大林的崇拜 7-8; 战争与和平 10, 98, 295.

讲话, 诗词, 会见, 书信, 指示, 文章: 关于鞍钢宪法 306, 308-309; 《登庐山》 191; 中共中央八中全会: 第二次会议 27; 第三次会议 4, 16-17; 第四次会议 21; 第六次会议 121-122, 126, 127, 128, 129, 132, 142, 154, 179; 第七次会议 207; 第八次会议 233-234, 299;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 205; 八大二次会议 50, 54-59, 124, 178; 批准散发“意见书” 217; 关于四害 22, 24; 在庐山 191-192; 同省委书记们 160-162, 182; 将劳动力转移回农业 323-324; 《送瘟神》 24, 河南四个地区 145, 146;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99-100; 党内通信 170-171; 中央军委(1958年) 66, (1959年) 237-239; 致政治局常委的备忘录 324; 1957年莫斯科会议

9-10, 225, 284;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5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 21; 《关于反华问题》 269-270; 写给彭德怀的诗 194; 批评信(1943年) 238; 政治局会议——郑州(第一次) 128-129, 130-131, 134-135; 郑州(第二次) 138, 141, 144, 146-159, 178, 179, 215, 228, 324-325; 成都 21, 36-43, 46, 55, 77, 134, 207; 杭州 20, 22, 24; 庐山 203-204, 218-223, 233; 南宁 21, 24-27, 59; 北戴河(1958年) 88, 97, 110, 124, 129; 北戴河(1960年) 323; 北京 145; 上海 207; 武昌 128, 129, 216; 省委书记会议 145;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 295-298; 重返韶山 190; 选集四卷 319, 320; 《工作方法十六条》 172; 《工作方法六十条》 21-22, 24-25, 26-27, 29-33, 78, 87, 108, 109, 122, 167, 172;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 27, 52, 56, 57; 最高国务会议(1957年2月) 39-40, 51, 274; 最高国务会议(1957年4月) 51; 最高国务会议(1957年10月) 22, 49; 最高国务会议(1958年1月) 21, 27-29; 最高国务会议(1958年9月) 89, 90, 97-100, 102, 110-111; 关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134-135; 苏联最高苏维埃 10-11; 《游泳》 210-211; 十大关系 39, 52, 59, 134, 176, 332; 《十年总结》 335-336; 青岛声明 62 在国内的视察: 20-34, 91; 安徽 25, 30, 104; 广州 21; 长沙 21; 浙江 48; 郑州 145; 成都 21; 重庆 21; 抚顺 21; 杭州 20, 22, 24; 汉口 21; 河南 80-81, 145, 146; 河北 80, 84, 104, 146; 湖南 187-190, 197; 湖北 111, 161; 十三陵水库 75-76; 南宁 20-21; 山东 81, 145, 220; 韶山 187-190, 191, 203; 四川 34, 35-50; 天津 80, 110, 145; 武汉 21, 179

毛泽东思想 216, 241, 246, 318-321, 322

马克思 38, 41, 53, 55, 153, 221, 274, 319, 321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 9, 13, 133, 153, 156, 164, 208, 216, 246, 248, 250, 264, 265, 266, 272-274, 278, 280, 283, 288, 289, 312, 319, 321, 334, 335

五一国际劳动节 279

莱因·麦克马洪 256, 257

日本明治时期 2

孟子 158

公共食堂, 见人民公社条

冶金工业部 166-167, 169

中东 92—94, 96, 115, 272  
米格15, 米格17 96  
阿纳斯塔西·米高扬 194  
“军事俱乐部” 224, 239, 244  
民兵 85, 98, 100—102, 107, 310, 320  
明王朝 2, 207, 208, 212  
十三陵水库 75—76  
明斯克 291  
动员人力 1, 4, 19, 40—42, 51—55, 76, 77, 101, 127  
蒙古 200  
“多、快、好、省” 16, 17, 18, 30, 52, 54, 56—59, 146, 213  
中国的死亡率 330  
莫斯科 1, 4, 7, 10, 11, 12, 14, 15, 16, 17, 19, 37, 39, 64,  
69, 70, 91, 93, 94, 96, 98, 99, 132, 135, 204, 205, 206, 227,  
240, 242, 245, 255, 259, 260, 261, 263, 266, 267, 268, 272, 274,  
278, 308  
莫斯科会议(1957年) 7—19, 71, 98, 225, 284, 287  
莫斯科会议(1960年) 39, 263, 276, 283—293  
莫斯科宣言(1957年) 7, 8, 269, 273, 283, 284, 290  
莫斯科声明(1960年) 289—291  
珠穆朗玛峰 135  
互助组 154  
长崎 74  
南昌起义 70  
南京 24, 113, 军区 244  
南宁 20, 南宁会议, 见政治局条  
南苑农机站 47  
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收入 330  
国民党人, 见国民党条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268  
新华通讯社 22, 162, 176, 215  
奈温将军 270  
贾瓦哈拉·尼赫鲁 98, 255, 256, 257, 261, 262, 270, 274  
《内部参考》 239

尼泊尔 270  
新德里 255, 256, 270  
纽约 226, 284  
乌石 197  
聂荣臻 70, 127  
理查德·尼克松 226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74, 129, 132, 284  
北越 132, 284  
北魏王朝 43—4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74, 261; 会议:(1958年) 20, 21, 33—34, 71, 73, 82; (1959年)50—51, 165, 172, 173;(1960年)305, 307, 316, 317;  
常务委员会 61—62, 248, 259, 266  
核试验 68—70  
核武器 10, 11—15, 63, 91, 99, 273, 320  
华侨 137, 138, 139, 140, 202, 270—271  
太平洋 94  
百泉农机站 47  
巴基斯坦 270  
包头钢铁厂 309, 310  
巴黎公社 79  
巴黎最高级会议 267, 272, 275, 276, 277, 282  
珠江 156  
农民运动讲习所 42  
农民 3, 4, 45, 54, 83, 86, 88, 101, 102, 103, 104, 107, 119, 120, 130, 147, 148, 149, 155, 235, 299—300, 302—303, 317, 324, 329, 333; 再参见公社条  
北京 1, 4, 9, 11, 14, 17, 20, 21, 35, 39, 47, 51, 69, 70, 73, 74, 75, 91, 93, 98, 99, 135, 144, 145, 169, 175, 177, 179, 193, 200, 208, 209, 218, 234, 235, 255, 256, 257, 259, 261, 263, 264, 265, 268, 269, 270, 271, 272, 274, 275, 279, 280, 290, 293, 298, 304, 318, 321, 329, 332, 333; 共产党组织 120, 134, 212, 261;  
卫生运动 22; 民兵 101—102  
北京师范大学 235, 316  
京剧 207

《北京周报》 114—115, 139

北京大学 78, 114, 298

彭真 20; 经历和性格: 中央书记处书记 61, 179;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 1, 20, 179; 政治局委员, 也许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秘书 179; 主管统一战线工作 179

主要问题和事件(态度、行动和看法): 领导1957年反右运动 1; 资产阶级 40, 311; 商人 179—180; 毛泽东思想 319; 大炼钢铁 115

与下列人的关系: 赫鲁晓夫 261, 262, 276—278; 刘少奇 61, 175, 179; 毛泽东 58, 311, 319, 336; 吴晗 208, 209—210, 212

中苏关系 293, 把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相比较 134; 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党代会 276—278; 参加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中国共产代表团成员 285, 290

彭德怀 241, 302, 303

经历和性格: 193—196, 203, 213, 214, 237, 238; 在安徽 200; 参加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中国共产代表团成员 12, 14;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 196; 被免职 237, 249, 255; 命运 233—237; 在敬老院 197—198, 199; 在河南 196; 在湖南 196—200, 203; 在甘肃 195—196, 197, 202; 在江西 200; 在庐山 204, 207, 223; 庐山会议的冲击 304, 319; 庐山会议决议 228, 229, 234; 率领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1957年) 12—15; 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65, 246—247; 发誓不自杀 233—234; 1981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重新评价 331—332; 访问苏联、东欧和蒙古 200, 205, 206, 209, 225; 太极拳爱好者 213, 234; 妻子浦安修 234, 235; 在武昌会议上 196

主要问题和事件(态度、行动和看法): 基本建设 213—214; 人民公社 199, 200, 203, 214, 219, 239—240; 关于夸大的产量数字 197—198, 203; 免费供给制 203; 粮食产量 200; 大跃进 121, 199, 213—216; 海瑞 210, 211, 212; “自由、平等、博爱” 238; 对毛的崇拜 38, 188, 194, 199; 公共食堂 220, 249; “军事俱乐部” 239; 军队现代化 14—15, 63, 70, 226, 243; 军队运输救济粮济荒 202; “多、快、好、省” 213; 独裁 177—178, 195; “小资产阶级狂热” 216; 人民解放军 222, 223; 与苏联的“联系” 205—206, 225—228, 238; 国家计委 212—213; 大炼钢铁 114, 115—116, 195—197, 200, 202—203, 206, 214, 215, 219, 240, 297; 台湾海峡危机 100, 215, 244; 西藏叛乱 200, 202, 215;

与下列人的关系: 张闻天 204—207, 213, 214, 216, 217; 陈伯达 238—240; 陈毅 236; 周恩来 101, 232—233; 周小舟 198—199, 203, 204, 217, 234, 237; 朱德 177—178, 194, 299; 贺龙 240; 黄克诚 194, 201—202, 217, 234; 高岗 178, 231, 234, 237; 赫鲁晓夫 7, 226—228, 277; 李先念 218; 林彪 65, 193, 229, 239, 246—247; 刘伯承 240; 刘少奇 177—178, 230—232; 罗瑞卿 242; 罗隆基 219; 毛泽东 1, 14—15, 38, 63—71, 82, 100, 114, 157, 170, 173, 177—178, 193, 194—195, 199, 200, 203, 204, 207, 213, 214, 215—217, 219—223, 224—225, 226, 228, 229, 233—234, 237—239, 242, 244, 246—247, 297, 331—332, 333, 334, 335; 薄一波 200, 218; 陶铸 159;

讲话, 诗作, 书信, 指示, 文章:《自述》 214, 217;“交代” 217; 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40周年 13;“意见书” 213—217, 223, 224, 233; 庐山会议 199, 200; 庐山会议小组会 202—203, 234; 中央军委(1959年) 237—239; 庐山会议后坚持己见 238—240; 近海岛屿的炮击 100; 诗 200; 自我批评 233, 234, 238—239; 上海会议 177—178, 195, 205, 206; 苏联红军建军40周年纪念 64, 95

中国人民银行 27, 150

公社, 见人民公社条

人民日报 58, 71, 88; 主要问题和事件(新闻报道和评论): 农业宪法 122—123; 农业机械化 48; 鞍钢宪法 308; 张春桥文章的再版 107; “一盘棋” 142—144; 人民公社 81—249; 苏共二十大 9; 本位主义 142—143; 试验田 122; 卫生 24; 高产 124—125; 跃进(1956年) 26; 李富春的文章 300—301; 庐山决议 248; 公共食堂 103—104; 中东危机 93, 94; 民兵 101; “多、快、好、省” 17; 国庆(1958年) 123; 尼赫鲁 259; 与民休息 140; 右倾机会主义者 248; 生产突击 120; 中苏关系 261, 272; 苏联建军节 64; 大炼钢铁 114, 249; 陶铸文章 140, 144; 吴晗论海瑞 209, 211

小资产阶级狂热 216

菲律宾 97

体育运动委员会 243

猪 18, 138, 139, 148, 149, 165, 198, 220, 251, 305, 329

平江起义 197

平型关 245

人民解放军 65, 107, 206; 与中国共产党 1, 63—71, 178; 215, 231, 246—247; 应征士兵对经济状况的不满 153, 201—202, 329—330; 赴莫斯科代表团 12—15; 八一建军节 70; 总后勤部 243, 244; 总政治部 67, 320; 军训部 243; 卫生运动 22—23; 庐山的冲击 237—247; 民兵 101; 现代化 63—66, 70, 243; 从军官到士兵 67; 政治思想工作 320—322; 苏联模式 13, 15, 64, 66, 67;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320, 322; 训练计划 63—64, 243

空军 66, 69, 71, 96, 243

薄一波 20; 文章报告、讲话: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 33—34; 经历和性格: 中央财经小组成员 166; 抛弃左的观点 323; 庐山会议后的左倾观点 306—307; 主要问题和事件(态度、行动和看法): 农业损失 120—121; 农业机械化 44, 299; 鞍钢宪法 308; 大跃进——日后的评价 331, 332; 在庐山 218, 294; 对毛的看法 146, 331, 335; 大炼钢铁 90; 钢铁指标(1959年) 165—166, 169; 与周恩来的关系 58; 与刘少奇的关系 58, 179; 与毛泽东的关系 57—59; 与彭德怀的关系 200

诗词 41—42, 154, 306;

波兰 12, 184, 288

政治局 1, 4, 17, 20, 26, 27, 29, 62, 74, 78, 80, 109, 113, 123, 129, 174, 179, 193, 199, 205, 214, 217, 218, 227, 231, 233, 234, 235, 244, 250, 261, 267, 285, 293, 295, 305; 与书记处 61; 主要问题和事件(行动或立场): 农业机械化 43; 公社 77, 80, 104; 毛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32; 毛泽东思想 318—319; 钢铁指标(1959年) 166, 167, 169

会议: 关于工商界的会议 313; 第一次郑州会议 121, 128—129, 196; 第二次郑州会议 136, 141, 144, 146—159, 160, 161, 162, 172, 178, 179, 182, 183, 184, 191, 214, 215, 228, 324—325; 成都会议 25, 34, 35—50, 77, 145, 210, 227, 298; 关于教育工作的会议 108—109; 与葛罗米柯 98; 杭州会议 20, 21—24, 26, 29; 庐山会议 121, 165, 170, 172, 173, 178, 188, 191—193, 195, 199, 200, 201, 202—204, 206, 212—223, 224, 231, 232—233, 237, 238, 241, 294, 304, 306, 331—332, 334; 南宁会议 21, 22, 24—29, 59; 北戴河会议(1958年) 81—90, 91, 97, 110, 113, 114, 121, 122—123, 124, 129, 131, 147, 165, 170, 181, 215, 250, 331; 北戴河会议(1960



年) 323; 北京会议 136, 143, 144; 上海会议 136, 160, 162, 172, 178, 195, 207, 212, 214; 武昌会议 121 128—129, 196, 214; 另见中共中央条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25, 32, 58, 65, 163, 229; 一线和二线 32  
 政治设计院 219  
 人口 1, 2, 3, 40; 大跃进的冲击 330  
 波兹南 226  
 真理报 94, 284  
 价格 25, 138—139  
 自留地, 见农业条  
 生产大队、小队, 见人民公社条  
 按比例发展 30, 89  
 浦安修 235  
 公共卫生, 见卫生条  
 金门 96, 97—99, 129, 216  
 铁路 89, 129, 168; 铁道部 167  
 整风运动(1957年) 33, 36, 40, 51—52, 58, 62, 159, 178, 334; 延安整风 242  
 正名: 人民公社名称的混乱 181;  
 “红与专” 28, 30, 36, 37, 40—42, 49, 179  
 《红旗》 73, 78, 79, 80, 106, 112, 136—137, 142, 144, 272, 326  
 红卫兵 75, 217  
 中国革命 8, 37, 39, 88, 216, 273, 333  
 革命浪漫主义 242  
 反右倾运动 212, 230, 238, 242, 247—251, 294, 300, 303, 311, 331—332  
 罗马尼亚 273; 共产党代表大会 276—278, 283  
 罗马 274  
 国务院 27, 57, 59, 60, 73, 175, 215; 超越 169, 和中共中央书记处 61, 323, 全会次数的减少 61; 第7办公室 47, 钢铁问题的会议 113  
 与中共中央的联合指示: 教育 110, 112; “四害” 24; 生产突击 120;  
 水利 34  
 血吸虫病 24  
 科学、科学家 11—14, 23, 29, 41, 318

科学规划委员会 70, 127  
 东南亚条约组织 264  
 第二野战军 35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92, 93, 94  
 “实事求是” 164  
 汉城 99  
 工业七十条 308  
 沙汀 301—302  
 上海 21, 22, 29, 62, 104, 106, 107, 143, 164, 221, 309  
 山西 124, 125, 142, 150, 156, 162, 245, 322, 323—324  
 山东 34, 80, 81, 101, 120, 137, 145, 156, 220, 322  
 韶山 187—190, 197, 203, 237  
 沈阳 21; 沈阳军区 243, 244  
 石景山 81, 111  
 舒同 137  
 西安 123, 127  
 新疆 39, 256, 322  
 中非人民友好协会 271  
 中苏关系 1, 36—40, 227, 265, 266, 271  
 文件来往、会议: 中苏两党会议(1960年9月) 284; 中共致苏共的信  
 (1960年9月) 243—244; 苏共致中共的信 277; 苏共“通知书” 276  
 —277, 283; 苏共二十大 8, 9, 283; 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日的论战  
 264, 272—274, 275, 276, 282, 295, 308; 莫斯科会议(1957年) 7  
 —19; 莫斯科会议(1960年) 283—292; 匈牙利党代会 265; 罗马尼亚  
 党代会 276—278; 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1960年) 266—269; 世界工  
 会联合会会议 275—276  
 争端: 7—11; 中国的国内事务 293, 298, 308, 323, 324; 人民公社  
 132—135, 206, 226—227, 280; 个人崇拜 7—8, 284, 290; 文化  
 关系 39; 防务协定 11—15, 63, 269; 非斯大林化 38; 经济关系  
 12, 19, 60, 132, 133, 135, 280—281, 335; 大跃进 1; 中苏争论  
 的影响 336; 国际共运的领导 286—287; 中东危机 91—94; 军事合  
 作 12—15, 64, 68—71, 94—96, 225—226; 核试验 68—70; 核武  
 器 11—15, 63, 69—70, 225—226, 273—274; 和平过渡 8—9,  
 273—274, 276, 284, 286, 287, 288—289, 290; 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9—11, 282; 科学技术合作 11—12, 119, 280—281, 304; 中印边界争端 255—264, 265, 274, 280, 282;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争端 280; 中苏条约 38—39; 在中国的苏联“侨民” 38—39; 苏联给予国民党的支持 245; 斯大林 7—8, 274, 283, 284; 台湾 262—263; 台湾海峡危机 92—100, 262—263; 西藏叛乱 172; 战争与和平 9—11, 72—73, 273—274, 275, 286—287, 290, 291; 撤回苏联顾问 278—283, 291, 332;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71—73, 273—274, 280; 再参见赫鲁晓夫条

《工作方法六十条》, 见毛泽东条“讲话、诗词、会见、书信、指示、文章”部分

社会主义阵营 14, 36, 93, 132, 227, 260, 264, 288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42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27, 52, 56

东南亚 71, 74, 137, 138, 139, 271

南朝鲜 97

西南联大 208

苏联 17, 63, 90, 92, 95, 129, 133—135, 173, 200, 204, 205, 227, 228, 245, 275, 315; 农业 2—3, 16, 135, 151—152; 权力下放 15—16; 经济学家 16; 作为仿效的模式 1, 2—3, 4, 13—19, 28—29, 36—40, 44—49, 66—71, 270, 335; 禁止核试验建议 68—70; 赶超美国 16, 17; 红军 9, 10—11, 13, 64, 67; 与法国的关系 266; 与印度的关系 274; 与波兰的关系 12; 与美国的关系 68—69, 72—73, 92, 226, 258, 263, 267, 275; 火箭 9—10, 135; 七年计划 16; 为政权而斗争 32; 再参见赫鲁晓夫、中苏关系条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 10, 335

最高国务会议 (1957年2月) 51; (1957年4月) 51; (1957年10月) 22, 49; (1958年1月) 21, 27—29; (1958年9月) 89, 97—100; (1959年8月) 311—312; 再参见毛泽东条“讲话、诗词、会见、书信、指示、文章”部分。

斯大林, 斯大林主义 29, 32, 38, 48, 157, 173, 179, 194, 232, 274, 277, 283, 301, 321; 与中国 38—39; 集体化政策 2—3, 46, 134, 151—152; 个人崇拜 7—8,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134; 斯大林奖金 278

国家经济委员会 20, 44, 90, 120, 165—166, 167, 174, 215, 218, 294, 299; 再参见薄一波条

国营农场 46, 130  
 国家计划委员会 17, 19, 89—90, 129, 164, 167, 193, 212—213, 215, 218, 221, 225, 294, 300, 323, 330; 再参见李富春条  
 国家统计局 41, 218, 239, 294; 再参见统计条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45  
 统计, 统计制度 31—32, 41; 再参见国家统计局条  
 钢铁 4, 16, 17, 91, 97, 198; 土法 32, 82, 113—116, 128, 170, 195—197, 206, 215, 247, 307, 327; 运动 88—90, 106, 113—114, 119, 120, 128—130, 215, 216, 219, 220—221, 240, 247, 250, 301, 307—309, 326, 327; 畸型的投资政策 326—327; 产量(1958年) 128, 247; (1959年) 301; (1960年) 327; (1962年) 327; 指标: (1958年) 33, 53, 85, 89, 90, 116; (1959年) 90, 128, 206; (缩减) 165—170, 247; 第二个五年计划(1962年) 90, 128, 247  
 T·A·斯坦波尼扬 132—133  
 粟裕 100, 244  
 苏班德里约(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270—271  
 隋王朝 153  
 孙逸仙 41, 238, 241, 247  
 孙冶方 218, 330  
 宋王朝 207  
 苏联最高苏维埃 10, 68, 265  
 苏斯洛夫·M·A 261, 278, 284, 286  
 汕头 156, 309  
 叙利亚 92  
 四川 21, 34, 35, 62, 221, 243, 250, 256; 共产党组织 22; 收获工作的失误 120; 卫生运动 22, 民兵 101; 土地面积减少 125—126; 工业劳动力增加 119  
 四川日报 22  
 大庆油田 309  
 太极拳 213, 234  
 台北 99  
 太平天国起义 2  
 台湾 71, 227  
 台湾海峡危机 92—100, 115, 225, 244

在中苏关系上: 263, 266, 275, 282, 284, 285, 286—287, 289, 293;  
1960年莫斯科会议 286—287, 289, 290, 323; 谈苏联 132—133  
邓华 243  
邓子恢 大跃进中的作用 58, 61, 83; 与毛泽东的关系 57—59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293, 295—298  
第三世界 264, 269, 272, 273, 280, 285, 286, 288  
莫里斯·多列士 286, 287—288  
困苦的一年 236  
西藏叛乱 172—173, 200, 202, 215, 256, 257, 259, 262, 322  
田家英 232  
天津 80, 145  
铁托元帅 71, 72, 73, 91, 232, 271, 273  
东京 74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主义 29, 205, 265, 277, 289  
托拉斯, 见工业条  
曹操 208  
曾志 140  
曾希圣 120  
济南 113  
青海 125  
清华大学 208  
遵义会议 205, 227, 232  
杜甫 41  
董必武 230  
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1956—1967年) 16, 18, 21, 22, 31, 36, 42—43,  
45, 49, 52, 122, 305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204—205, 206  
“两个中国”的建议 71  
U—2型飞机 275  
英国 17, 18, 51, 68, 90, 112, 115, 147, 256, 260, 261; 派遣部队  
到约旦 92, 99  
乌兰夫 62  
联合国 26, 75, 91, 92, 93, 284; 秘书长 92  
不断革命 29, 30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92  
 统一战线 179  
 美国 2, 9, 10, 16, 17, 44, 68—69, 72, 74, 90, 91, 94, 96—97, 101, 106, 108, 113, 129, 135, 204, 258, 260, 263, 264, 267, 272, 275, 280, 282, 284, 291, 297—298; 在莫斯科的展览会 226; 对中东危机的反应 92—93; 对台湾海峡危机的反应 96—100; 美日安全条约 276  
 城市公社, 见人民公社条  
 乌托邦 334  
 弗·格·文热尔 134  
 沃尔什主教 272  
 王安石 150  
 王震 243  
 王稼祥 经历 227—228; 与毛泽东的关系 129, 227—228; 与苏联的关系 261  
 王鹤寿 169, 307—308  
 王任重 21, 36, 187; 与毛泽东的关系 36, 161—162  
 王光美 173, 175, 294  
 王国藩 农业生产合作社 147, 151  
 王力 106  
 王树华 23  
 战争与和平, 见中苏关系条“争端”部分  
 华沙 206, 226  
 华沙条约 1958年会议 72—73; 1960年会议 226—229, 272  
 华盛顿 99, 263, 264, 272  
 水利 3, 4, 19, 25, 30, 187, 189, 204; 1957—1958年的运动 34, 42, 53, 106, 122—123; 与公社的起源 77  
 魏征 207  
 西方(世界) 10, 72, 75, 91, 92, 93, 100, 205, 258, 265, 269, 273, 281  
 西德 268  
 黄埔军校 245  
 妇女, 见人民公社条“主要特征”部分  
 世界工会联合会 275—276, 277, 280, 284, 291

世界和平理事会 266  
第二次世界大战 10, 13, 274  
第三次世界大战 10, 91  
吴家花园 235  
吴芝圃 在《红旗》上刊载的文章 302; 与陈云的关系 171—172; 与毛泽东的关系 42—43, 80—81, 129; 恢复大跃进 302—304, 324  
女皇武则天 208—209  
吴晗 经历 208—209; 论海端 209—212; 与胡乔木的关系 211; 与毛泽东的关系 208, 209—212; 与彭真的关系 208, 209—210, 212  
伍修权 267  
吴冷西 176, 308—309  
吴波 27  
武昌 121; 武昌会议, 见政治局条  
武汉 21, 36, 119, 121, 145, 161; 钢铁厂 309—310  
杨献珍 179, 236, 320  
杨秀峰 316, 317  
杨开慧 188  
杨明 187—188  
杨一辰 129  
长江 21, 36, 156, 191, 210  
杨仪人民公社 147—148, 151, 154  
姚文元 158  
共青团 108, 245, 319  
叶剑英 12—13, 75—76  
黄河 322  
也门 92  
延安; 延安传统 63, 64, 66, 68, 70, 76, 107, 223, 233, 242  
余秋里 73  
圆明园 235  
P·F·尤金 94, 133  
岳飞 207, 208  
南斯拉夫 71; 共产党 7, 12; 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谴责 72—73  
安东·尤高夫 71  
浣江 21



## 关于书目的说明

我在本书第一卷的“对书目和方法的说明”中指出，本卷的基本的原始资料由两类组成：当时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人对事件的观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资料，其主要目的是丑化被罢官的领导人的形象，因此使用起来要特别当心。

自从毛去世以及1976年秋“四人帮”倒台以来，又出现了第三种类型的资料，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使被文化大革命鼓吹者们歪曲了的记载还其本相。这类资料也有偏颇，但是在下面要提到的种种条件的限制下，看来没有出现象红卫兵小报那样失实的内容。这类资料有多种形式。最早的形式是高度神化了的主要是回忆毛和周恩来的文集。即使是这些资料也包含着重要的见解和有价值的内容。

其次，这些更丰富，也更有价值的资料，大批出版始于1978年12月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此时邓小平在毛以后的领导层里成为主要人物。人们开始作出更加坚定更加彻底的努力，为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不公正迫害的党的干部恢复名誉。鉴于一些干部现已故去，便采取了文章或文集的形式，虽然这些文章或文集再次出现了神化的倾向。这些书里提供了比早些时候有关毛和周的书中更多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讲话和文章的内容被发表出来。某些内容只限于国内流传，不过副本最后还是传到了西方。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学家解放了思想，着手极其详细地清算过去的错误，他们的分析大多涉及大跃

进。因此，当你要了解一本近几年在中国出版的书有多少价值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转过书的背面，看一看它是否出版于1978年12月以后。

估价文化大革命后材料的政治份量的另一个重要日期是1980年5月，在这个月，刘少奇终于恢复了名誉。在此之前，在为其他领导人恢复名誉的书里还有可能提到刘少奇，对其形象的丑化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相类似。1980年5月以后，原则上有可能恢复他的形象，使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下一个阶段将要等到有可能公开发表涉及象林彪那样的文化大革命的鼓吹者的资料；那些人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但也犯过很大错误。还有，重要会议的官方记录也还没有公开。

这些新资料能起什么作用呢？对任何一个全盘接受文化大革命期间提供的历史资料的人来说，这些资料显然具有清醒和说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文化大革命的鼓吹者勾画出来的非曲即直、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形象恢复其本来面目。这种对人物的简单刻画，甚至被那些本来对受害者怀有同情的人所接受。在本书第一卷的导言里，我断定在1956—1965年这一时期，中国领导层的相互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这些新资料将使这种复杂性更加突出，而且有助于对这种复杂性的描述。

## 书 目

安炳炯:

《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 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 1976年。

《美国外交政策: 当代文献, 1958年》 华盛顿: 国务院, 1962年。

斯特芬·安多尔斯:

《中国的工业革命: 政策, 计划及管理, 1949年至当代》 伦敦: 马丁、罗伯逊公司, 1977年。

A·多克·巴尼特:

《共产党中国的干部、政府机构和政权》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7年。

大卫·波拿维亚:

《中国人》 纽约: 里宾科特和克罗维尔公司, 1980年。

包华德:

《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 第1—4册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7—1971年。

O·B·鲍里索夫和B·J·科洛斯科夫:

《苏中关系, 1945—1970年》 布鲁明顿: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75年。

泽毕戈纽·K·布热津斯基(译按: 本书第一卷中文本译为Z·K·布热津斯基。以现在的译名为准):

《苏联集团: 团结与分裂》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出版社, 增订版, 1967年。

S·钱德拉—塞卡尔:

《今日共产党中国》 伦敦: 亚洲出版社, 1961年。

张旭成:

《中国的政权和政策》 大学公园: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 1975。  
张万山(音):

《共产党中国的国务院: 结构和功能分析, 1954—1965年》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未出版。

赵冈:

《共产党中国的农业生产》 麦迪逊: 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 1970年。

陈志让:

《毛和中国革命》 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5年。

陈志让主编:

《毛论文集: 文选及书目》 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0年。

《陈毅诗词选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年。

陈云(主要资料来源):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年。

邓力群:

《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年。

冀朝鼎(译按: 本书第一卷中文本误译为姬朝鼎。以现在的译名为准):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要地》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3年。

秦成林(音):

《毛岸英》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

《中国共产党人物辞典》 台北: 国际关系学院, 1970年。

周恩来(主要资料来源):

《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永远怀念您》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年。

《峥嵘岁月》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7年。

周恩来:

《关于文艺工作的三篇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年。

《周总理的故事》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7年。

《人民的好总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

《人民的好总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年(第2辑), 1979年(第3辑)。

《我们永远怀念周恩来总理》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77年。

周舜莘:

《中国的通货膨胀, 1937—1949》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3年。

《朱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北京: “首都彻底批判朱德联络站”, 1967年4月15日。

钟仲乌(音):

《毛主义与发展: 中国工业管理政策》 耶鲁: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0年。

《中国农业年鉴》(1980)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0年。

沃尔特·C·克莱门斯:

《军备竞赛和中苏关系》 斯坦福: 胡佛研究所, 1968年。

《共产党中国, 1955—1959: 政策文件及分析》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2年。

《共产党中国, 1958年》 香港: 友联研究所, 1959年。

博伊德·康普顿:

《毛的中国: 党的整风文献, 1942—1944年》 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52年。

埃德沃尔特·克兰克肖:

《新的冷战: 莫斯科与北京》 哈蒙斯沃斯: 企鹅图书出版公司, 1963年。

顾立雅:

《孔夫子其人其事》 伦敦:罗特雷兹和凯根·保罗公司, 1951年。

大卫·克鲁克和伊沙贝尔·克鲁克:

《杨仪人民公社的最初年月》 伦敦:罗特勒基和凯根·保罗公司, 1959年。

亚历山大·达林主编:

《国际共产主义的多极化:文献记录, 1961—1963年》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3年。

维拉迪米尔·德迪耶:

《铁托讲演集》 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逊公司, 1953年。

洛厄尔·迪特默:

《刘少奇和中国文化大革命》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4年。

《裁军问题文献(1945—1959)》, 第2部分, 1957—1959年 华盛顿:国务院, 1960年。

约尔根·多梅斯:

《中国的国内政策》 纽约:普拉格公司, 1973年。

约尔根·多梅斯: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社会政策, 1949—1979年》 伦敦:C·赫斯特公司, 1980年。

德斯蒙得·唐纳利:

《三月风》 伦敦:科林斯公司, 1959年。

奥德里·多尼索恩:

《中国经济体制》 伦敦:艾伦与昂温公司, 1967年。

琼·特乌菲尔·德雷尔:

《中国的四千万少数民族》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

G·达特：

《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 伦敦：亚洲出版社，1967年。

亚历山大·艾克斯坦：

《中国的经济革命》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

亚历山大·艾克斯坦、沃尔特·盖伦森、刘大中主编：

《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向》 芝加哥：奥尔丁公司，1968年。

罗伯特·S·埃利根特：

《毛的伟大革命》 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逊公司，1971年。

马克·埃尔文：

《中国历史的模式》 伦敦：伊瑞·梅瑟恩公司，1973年。

梅乐·范索德：

《如何统治俄国》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修订版，1963年。

费正清：

《剑桥中国史》第10卷：《晚清，1800—1911》第1部分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

法兰克沃·费日多：

《中国—苏联，霸权的终结：共产主义运动重大分歧的由来，1949—1957年》 巴黎：普朗公司，1964年。

大卫·弗洛伊德：

《毛与赫鲁晓夫的对阵》 纽约：普拉格公司，1964年。

D·W·福克玛：



《中国的文学理论与苏联的影响, 1956—1960年》 海牙: 摩顿公司, 1965年。

《美国的对外关系, 1949年》第8卷: 《远东: 中国》 华盛顿: 美国政府印刷局, 1978年。

乔治·加勒:

《中国没有苍蝇》 伦敦: 艾伦和昂温公司, 1955年。

雷蒙德·L·加特霍夫主编:

《中苏军事关系》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6年。

乔治·金斯伯格、马瑟斯·迈克尔:

《共产党中国和西藏: 起初的十二年》 海牙: 马蒂缪斯·内伊霍夫公司, 1964年。

约翰·吉廷斯:

《中国军队的作用》 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8年。

约翰·吉廷斯:

《中苏论战之概观, 1963—1967年》 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8年。

梅乐·戈德曼:

《中国的知识分子: 建议和非议》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1年。

梅乐·戈德曼:

《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分歧》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7年。

傅路特、房兆楹:

《明史人物传记辞典》(1368—1644年)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两卷本, 1976年。

塞缪尔·B·格里菲思:

《中国人民解放军》 纽约: 麦克戈雷山外交关系委员会, 1967年。

摩尔顿·哈尔波林:

《中国和原子弹》(译按: 本书第一卷中文本译为《中国和炸弹》。以现在的译名为准) 伦敦: 帕·麦尔公司, 1965年。

摩尔顿·哈尔波林主编:

《中苏关系和军备控制》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967年。

A·M·哈尔彭:

《战后世界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出版, 手稿存外交关系委员会, 纽约。

A·M·哈尔彭主编:

《对华政策》 纽约: 麦克戈雷山外交关系委员会, 1965年。

《汉英时事英语词汇》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年。

《马克思主义手册》A类 纽约: 兰顿出版社, 1935年。

塞利格·S·哈里森:

《印度: 最危险的几十年》。

哈罗德·C·欣顿:

《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66年。

哈罗德·C·欣顿:

《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的“无原则争论”》 华盛顿: 美国新闻署—IS—98—55, 1955年7月。

恩维尔·霍查:

《对中国的感想》 地拉那: “8 Nëntori”出版社, 1979年。

罗纳德·夏:

《共产党中国的价格控制》 纽约: 太平洋学会, 1953年。

T·A·夏:

《从术语和语义的变化看人民公社在退却》 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  
中国研究中心, 1964年。

T·A·夏:

《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 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 1961年。

谢兰莉(音):

《共产党中国在核时代的战略》(译按: 本书第一卷中文本译为《核时代:  
共产党中国之战略》。以现在的译名为准) 新泽西: 恩格尔伍德,  
普林梯斯—霍尔公司, 1962年。

许芥煜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 布鲁明顿: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80年。

《华主席在湖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年。

《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年。

《怀念张闻天同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

黄震遐:

《中共军人志》 香港: 当代历史研究所, 1975年。

黄仁宇:

《1587年: 没有功绩的一年》 纽黑文: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1年。

查尔斯·O·贺凯:

《中华帝国的过去》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5年。

G·F·赫德逊:

《中国的人民公社》 伦敦: 苏联观察, 1960年。

G·F·赫德逊、理查德·罗文秦尔、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中苏论战》 纽约：普拉格公司，1961年。

雷亚·洪德兴主编：

《西藏为自由而战》 孟买：东方朗曼公司，1960年。

《1959年匪区自然灾害情况调查》 台湾：“国防部”情报局，1959年9月。

印度政府粮食和农业部：

《印度农业计划和技术代表团访华报告》 新德里：印度政府出版社，1956年。

埃丽斯·乔菲：

《两次全会之间：中国领导层的内部斗争，1952—1962年》 安阿伯：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75年。

埃丽斯·乔菲：

《党与军队：中国军队干部的职业化和政治控制(1949—1964)》(译按：本书第一卷中文本译为《党与军队：中国军官的职业化与政治控制(1949—1964)》，以现在译名为准)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65年。

查尔梅斯·约翰逊：

《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

美国国会经济共同委员会：

《大陆中国经济概要》 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7年。

斯坦雷·卡诺：

《毛和中国》 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72年。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 伦敦：德乌兹公司，1974年。  
N·S·赫鲁晓夫：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1957年11月6日) 伦敦：苏联新闻，1957年。

沃纳·克拉特主编：  
《中国模式》 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现代亚洲研究所)，1965年。

唐纳德·W·科林、安尼·B·克拉克：  
《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

米哈伊尔·A·科罗契科：  
《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 蒙特利尔：国际出版商代理人，1964年。

荷曼·科尔克维兹：  
《苏联军队和共产党》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

郭沫若：  
《李白与杜甫》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

郭华伦主编：  
《中国共产党术语汇编》 台北：“国立”诚政(音)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1978年。

亚瑟·拉尔：  
《共产党中国怎样打交道》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选读》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欧文·拉铁摩尔：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界》 波士顿：比亚康出版社，1962年。

詹姆士·雷格:

《四书》: 台北: 文化图书公司, 1960年。

沃尔夫冈·伦纳德:

《斯大林之后的克里姆林宫》 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2年。

李嘉(音):

《中共税收系统》 香港: 联合研究院, 1969年。

肯尼斯·利伯瑟:

《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 1949—1975年》 利皮特, 纽约: 国际文理出版社, 1976年。

威克特·D·利皮特:

《中国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发展》 利皮特, 纽约: 国际艺术与科学出版社, 1974年。

刘少奇(主要资料来源):

《刘少奇选集, 1945—1957》和《刘少奇选集, 1958—1967年》 香港: 联合研究院, 1969年和1968年。

《打倒刘少奇——反革命分子刘少奇的一生》 北京: 北京市第四医院“井冈山战斗队”, 1967年5月。英译文见《当代背景》834号。

《怀念刘少奇同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

《红旗飘飘》第20辑 北京: 1980年。

刘爱琴:《女儿的怀念》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0年。

《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 未注明出版地 “只争朝夕战斗队”和“我自岿然不动战斗队”, 1967年5月30日。

《刘少奇材料汇编》(第1集) 天津: 1967年4月。

《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年。

《三反分子刘少奇罪史》 北京: 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换新天’红卫兵代表大会”, 1967年5月。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证选编》 天津: “誓与刘邓陶血战到底联络站”, 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 1967年4月。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651—653号。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4集 北京:北京化工学院“毛泽东思想宣传员”,1967年4月10日。

刘政(音)、宋健等:

《中国人口:问题与展望》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1年。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 纽约:普拉格公司,1960年。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 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和共产主义事务研究所出版,1974年。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中美关系(1949—1971)》 纽约:普拉格公司;牛顿·阿伯特,德文郡:大卫和查尔斯公司共同受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委托出版,1972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

毛泽东(主要资料来源)[注]: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毛主席教育语录》 北京:北京电机学校“‘东方红公社’红代会”,1967年7月。

《毛主席论文艺语录》,未注明日期 上海:上海戏剧学院“革命路”编辑部。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北京:北京电影制片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1967年7月。

《毛主席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 未注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毛主席文选》 未注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毛主席语录》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6年第2版。



毛泽东：《对苏联经济的评论》 纽约：每月评论社，1977年。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4卷，1960年；第5卷，1977年。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北京：外文出版社，第1—4卷，1960年；第5卷，1977年。

《毛泽东思想万岁！》 未注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毛泽东思想万岁》 未注明出版者，1967年。

《毛泽东思想万岁》 未注明出版者，1969年。

《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毛泽东：未名文集》 未注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第1、2卷 华盛顿：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中心，61269—1号，61269—2号，1974年。

《毛泽东主席语录》 北京：外文出版社，1972年。

《韶山红日照千秋》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

《大海航行靠舵手》 未注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最高指示》 未注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资料选编》 未注明出版者，1967年1月。

《我们在毛主席身边》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N·马克斯韦尔：

《印度对华战争》 伦敦：凯普公司，1970年。

克劳斯·梅纳特：

《北京和莫斯科》 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逊公司，1963年。

《缅怀刘仁同志》 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年。

彼得·R·穆迪：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政策》 汉姆顿，康涅狄格：舒·斯特林出版社，1973年。

法朗克·莫拉斯：

[注] 一些补充条目，包括英译本和内容的详细说明，可以查阅本书第1卷第409—411页。——作者注

《西藏叛乱》 纽约: 麦克米伦公司, 1960年。

《难忘的记忆》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79年。

理查德·M·尼克松:

《六个关头》 纽约: 双日公司, 1969年。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

《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制定: 群众性大兴水利运动情况(1957—1958)》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未出版。

乔治·N·帕特森:

《叛乱中的西藏》 伦敦: 费伯公司, 1960年。

彭德怀(主要资料来源):

《彭德怀案件, 1959—1968》 香港: 联合研究院, 1968年。

景希珍: 《在彭总身边》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年。

《纪念彭德怀同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年。

《横刀立马彭将军》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彭德怀自述》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王酃(音): 《彭德怀问题选辑》 香港: 明报社, 1969年。

德怀特·珀金斯:

《中国农业的发展, 1368—1968》 芝加哥: 奥尔丁公司, 1969年。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65年。

《共产党中国分省农业统计》 埃萨卡, 纽约: 中国经济问题委员会,  
SSRC, 1969年。

《总统公报》“D·D·艾森豪威尔, 1959年” 华盛顿: 美国政府印刷  
局, 1960年。

詹姆斯·R·普西:

《吴晗：借古讽今》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69年。

卢西恩·W·派伊：

《毛泽东：突出的领袖》 纽约：基础书店，1976年。

卢西恩·W·派伊：

《中国政治之灵魂》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8年。

乔治·H·奎斯特：

《核时代的外交：最初的二十五年》 纽约：杜奈伦公司，1970年。

埃德温·O·赖肖尔、费正清（译按：本书第一卷中文本译为费尔班克，以现在的译名为准）：

《东亚：伟大的传统》 伦敦：艾伦和昂温公司。

托马斯·W·罗宾逊：

《林彪的政治和军事生涯》第2部分，1950—1971年 圣摩尼卡：兰德合作研究所，1971年8月。

约翰·E·鲁：

《处在反对派地位的毛泽东，1927—1935》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译按：本书第一卷中文本误译为1962年）。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1972年。

斯图亚特·R·施拉姆：

《毛泽东》 哈蒙斯沃斯（译按：本书第一卷中文本译为哈蒙兹沃尔斯，以现在的译名为准）：企鹅图书出版公司，修订版，1967年。

斯图亚特·R·施拉姆主编：

《毛泽东的本色：谈话和书信，1956—1971年》 哈蒙斯沃斯：企鹅图

书出版公司，1974年。

斯图亚特·R·施拉姆：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哈蒙斯沃斯：企鹅图书出版公司，修订版，1969年。

彼得·施拉恩：

《中国农业的发展，1950—1959年》 厄本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69年。

法朗兹·舒尔曼：

《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工作》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修订版，1968年。

本杰明·I·许华茨：

《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

哈里·施瓦茨：

《斯大林后的苏联经济》 伦敦：戈兰兹公司，1965年。

马克·塞尔登：

《中华人民共和国》 纽约：每月评论社，1979年。

《深切怀念罗瑞卿同志》 北京：群众出版社，1978年。

阿格尼斯·史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时代和生平》 纽约：每月评论社，1956年。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伦敦：戈兰兹公司，1937年。

约瑟夫·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莫斯科：外文出版社（英文版），1952年。

本尼迪克特·斯塔威思:

《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政策》 埃萨卡: 科奈尔大学出版社, 1978年。

陶铸: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4年。

米歇尔·塔特:

《克里姆林宫的权力: 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 纽约: 威金公司, 1970年。

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

《中国政治及清洗》 利皮特, 纽约: M·E·沙帕公司, 1979年。

《辉煌的十年》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60年。

《伟大的十年》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60年。

《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论》 北京: “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国人民大学红色批刘邓三队第一支队”。

邓嗣禹、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响应》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4年。

《西藏, 1950—1967年》 香港: 联合研究院, 1968年。

T·R·特里格:

《中国地理》 伦敦: 伦敦大学出版社, 1965年。

罗伯特·C·吐克主编:

《列宁选集》 纽约: 诺尔顿公司, 1975年。

丹尼斯·特威切特主编:

《剑桥中国史》第3卷: 《中国隋朝和唐朝, 589—906年》 第1部分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9年。

亚瑟·韦利:

《孔子的论语》 伦敦: 艾伦和昂温公司, 1945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

肯尼思·R·沃克:

《中国农业规划: 社会主义成分与私有成分(1956—1962)》 伦敦: 卡斯公司, 1965年。

理查德·L·沃克:

《中国的饥饿》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未注明日期。

理查德·L·沃克:

《来自人民公社的信》 纽约: 新领导者出版社, 1959年。

威廉·W·惠策恩:

《中国高层军事指挥机构: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年》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73年。

威廉·W·惠策恩主编:

《七十年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权力》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72年。

《共产党中国名人录》 香港: 联合研究院, 修订版, 2卷书, 1969年。

J·T·威尔森:

《中国一月》 纽约: 赫尔—王公司, 1959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顿:

《中国的早晨》 伦敦: 卡伯公司, 1960年。

黄曼(音)译:

《毛泽东诗词》 香港: 东方地平线出版社, 1960年。

吴晗:

《灯下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

《吴晗和〈海瑞罢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吴元黎:

《共产党中国的空间经济》 纽约: 普拉格公司, 1967年。

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苏冲突(1956—1961年)》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年。